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2

魏晋南北朝卷

周少川 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ISBN 978-7-5068-1784-4

9 787506 81784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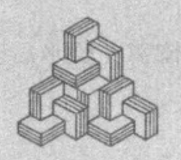
定价：62.00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2

魏晋南北朝卷

周少川 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周少川等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4-4

Ⅰ．中…　Ⅱ．周…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909号

责任编辑/游　翔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30.25　彩页4
字　　数/435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2.00元

前　言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有较长时间的封建割据、分裂和战乱，曾经被人看作是黑暗和倒退的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和文化虽然遭到战乱的破坏，但是社会仍在继续发展，动荡和迁徙将北方的生产力和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开发了南方的经济，江南的繁荣后来超过了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的进发，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不仅有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汉民族也从中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从而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活力，推动了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社会进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出版事业在奠定基础后走向逐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民族融合、中外交通为出版事业的初兴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生产、流通的有利条件。同时，历朝统治者也大都比较重视图书的编撰和出版，如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出版事业顺应社会的需要，取得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成就。

首先，在这三百多年中，虽然社会战乱频仍，然而学术思想却非常活跃。除了魏晋时出现的玄学外，传统的儒学也未停止发展，产生了大批新的经学注疏之作。佛教渐入华俗，魏晋以降，

更势如江河，不可遏止；而孕生于本土的道教也在此期盛行于南北。文学和艺术方面，诗、乐府民歌、文学批评和绘画、书法艺术大放异彩，诗文评、总集和类书等新文体、新体裁先后问世。史学、地理学得到飞跃式发展，史书的出版数量剧增。自然科学方面的算学、医学和农学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期不仅出现了范缜、王弼、陈寿、陶渊明、祖冲之、王羲之、顾恺之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画家和书法家，还产生了像《三国志》、《文心雕龙》、《文选》、《水经注》、《齐民要术》等传世的名著。各种新体裁、新内容的作品大量涌现，为魏晋南北朝的出版事业提供了丰富的著作来源。

其次，图书载体材料的革命，纸写本的普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东汉以后，造纸术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推广。在魏晋南北朝，造纸的材料进一步拓宽，除了用麻，还用藤，甚至用海苔。抄纸的工具也从浮式布帘改为浸式竹帘，使纸的生产量大大提高。此外，纸的染潢技术不仅起到防蛀的作用，还增强了纸的美观。造纸术的改进使纸写本逐渐取代简帛书，成为重要的图书形态。不过，这一取代过程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三国时期即公元3世纪时，纸写本初步流行，图书的载体材料为简、帛、纸三者并行。两晋十六国时期，纸写本逐步推广，图书载体材料出现以纸为主、简帛为辅的局面，到404年，东晋权臣桓玄自立为帝，下令“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这是我国最早的用纸书写的规定。此后的南北朝时期即5—6世纪时，纸写本得到了普及。

【1】[唐]徐坚:《初学记》卷21《纸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

第三，图书的流通方式增多，流通速度加快，流通范围更为广泛，是此期出版事业的另一特色。魏晋以后，民间图书市场逐渐增多，繁华的都市里有大批书铺，除固定书铺外，还有送书上门的流动书商。从文献记载上看，当时图书的流通速度也很快，西晋左思《三都赋》出，“洛阳为之纸贵”；南朝诗人谢灵运每有新作，即“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由于社会对书籍需求量不断增加，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佣书”

业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魏晋以后，我国的书籍就已通过当时的属国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又传入日本。

第四，纸书卷轴装的出现，是此期图书出版业对中国图书装帧史的一大贡献。魏晋时期，纸张被大量利用后，从抄写到制卷，逐渐改进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纸书卷轴制作制度，其装帧形式可以从敦煌发现的纸卷中得到实证。这种“揽之则舒，合之则卷”[1] 的纸书卷轴装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持续影响了隋唐两代的书籍装帧形式，至今仍为许多书画作品的传统装帧形式所沿用。

【1】[西晋]傅咸：《纸赋》，《艺文类聚》卷5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五，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的捶拓技术及在此期不断发展的水色印章技术，为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思路，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诸多成就，体现了此期出版业不断变革、呈现初兴的时代特点。本卷力图以真实可靠的材料，大体上按照时代背景、编撰出版机构、图书整理编撰与出版活动、重要人物、出版物的材料与形制、图书出版的相关技术、图书的流通与管理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求全面系统地展现此期出版事业的面貌，并从中总结相关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

目 录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及时代背景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到589年隋朝建立为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分裂与统一交替。然而，在分裂中走向统一，在战乱中追求和平，一直是此期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在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版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进步的。

第一节　社会动荡与学术思想的活跃

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其间战争连绵不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然而社会的动荡、封建政权的相对软弱，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控制也相对放松，因此这个时期的学术界、思想界又显得异常活跃。加之中国素为崇尚文教的国家，是以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所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和文化建设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

1. 三国两晋十六国的兴亡

东汉末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天下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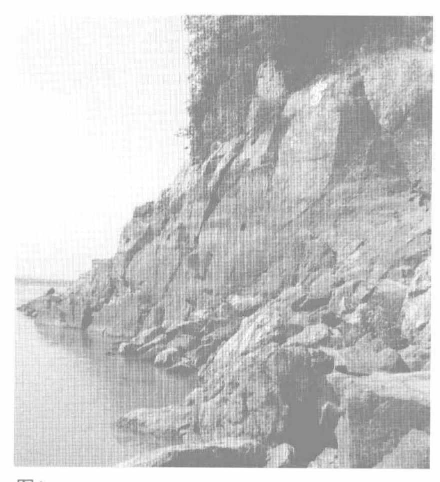


图1
赤壁战场遗址

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一战中打败曹操（图1），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战后刘备占有荆州大部，从此拥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曹操退回北方，孙权则稳定了在江东的统治。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220—265年）。221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1—263年）。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正式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222—280年）。这样，正式进入了三国分立的时期（图2）。

三国中，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最为强大。到齐王曹芳在位时，发生了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之争。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处死曹爽及其党羽，曹魏的政权从此就落入司马氏之手。在统治稳固后，司马氏将兵锋外转，于263年出兵灭蜀。265年，司马昭子司马炎接受魏禅，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65—316年）。280年三月，西晋出兵灭吴，再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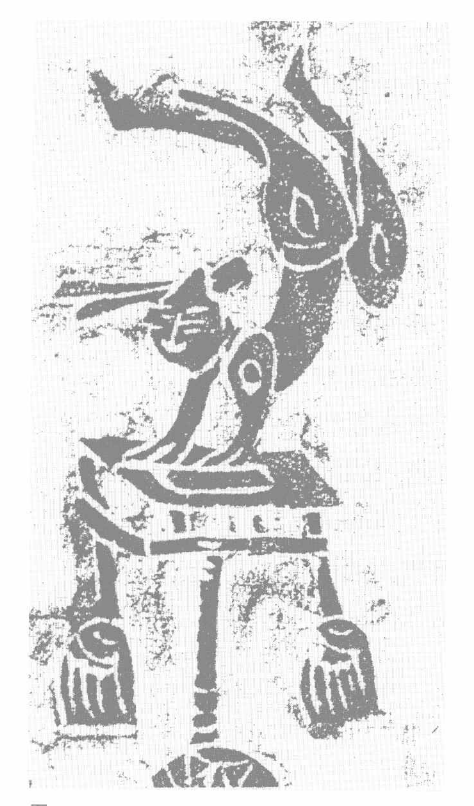


图2
三国沂南古墓画像石：戏车倒立

然而，西晋的统一很短暂。晋惠帝即位不久，即发生宗室诸王间的混战——“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291—306年）之久，削弱了皇权，耗尽了宗室诸王的实力，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并导致了“五胡乱华”和北方的持久战乱。

“八王之乱”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给少数民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时机。从304年巴賨李雄和匈奴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迄439年北魏灭北凉为止，共136年，在中国北部和巴蜀地区先后建立了被称为十六国（其实数目不止于十六）的各族政权。其中除了西凉、北燕、前凉、冉魏四个政权为

汉人建立者以外，其余政权的统治者为“五胡”。习惯称这段历史时期为“五胡十六国”或“五胡乱华”。以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十六国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此期还有鲜卑拓跋部所建代国，及冉闵所建魏国，不在十六国之列。后期政权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此期另有西燕不在十六国之列[1]。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征战不已。316年，晋愍帝投降刘曜，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称晋王，318年称帝，都建康（以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立东晋（317—420年）。东晋政权为门阀政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皇权不振。420年，次等士族出身的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东晋灭亡。

2. 南北朝的对峙

从420年刘宋建立，到589年隋灭陈，江南地区连续出现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个封建政权，历史上称为南朝。南朝为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过渡的时期，政权更迭比较频繁，政治动荡不安。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却获得了较快发展。589年，随着陈朝被隋军所灭，南朝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北方在长期的战乱之后，最终出现了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386—534年）。490年，魏孝文帝元宏亲政后，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随即又推行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汉化改革，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北魏末年政治矛盾不断激化，523年爆发的六镇起兵，则揭开魏末大动乱的序幕（图3）。534年，北魏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535—550年）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535—557年）。550年，高欢子高洋废掉东魏，建立北齐（550—577年）。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也废掉西魏建立北周（557—581年）。577年，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北方。北周晚年政治败坏，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缩印本)，“十六国”条，58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图3
西魏作战壁画（敦煌285窟）

584年，杨坚废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北周灭亡。589年，隋灭陈，再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建设

从220年曹丕代汉，到589年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历时369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动荡时期。其间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作为上层建筑的

文化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然而中国素为崇尚文教的国家，文化的传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方面，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文人学士，他们对文化的关注、研究、创作，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或朝代的变迁而停止，相反，他们对文化的热情有时还因为世易时移而更加高涨。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新王朝建立后，出于对享国长久的期望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只要稍有可能，统治者莫不提倡教化。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就使得自两汉发展起来的，包括图书整理、出版在内的文教事业，并没有因为战乱动荡而稍歇，甚至在某些领域中，还获得了更大发展。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间各族政权在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必须予以关注。

1. 三国两晋的文化建设

以文学为例，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所以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曹操父子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纮，皆成乐章”[1]。可见，曹操并未因戎马倥偬而漠然文化事业（图4、图5）。魏文帝曹丕更是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魏明帝曹叡亦好尚文辞，与曹操、曹丕，合称曹氏三祖。而文学成就至大者，则推陈思王曹植。辞赋创作的高潮之所以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辞赋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学体裁，与曹氏父子积极投入辞赋创作，是有一定关系的。辞赋创作的勃兴，也带动了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图4
三国沂南古墓画像石：绳伎倒立

【1】［晋］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8曹丕《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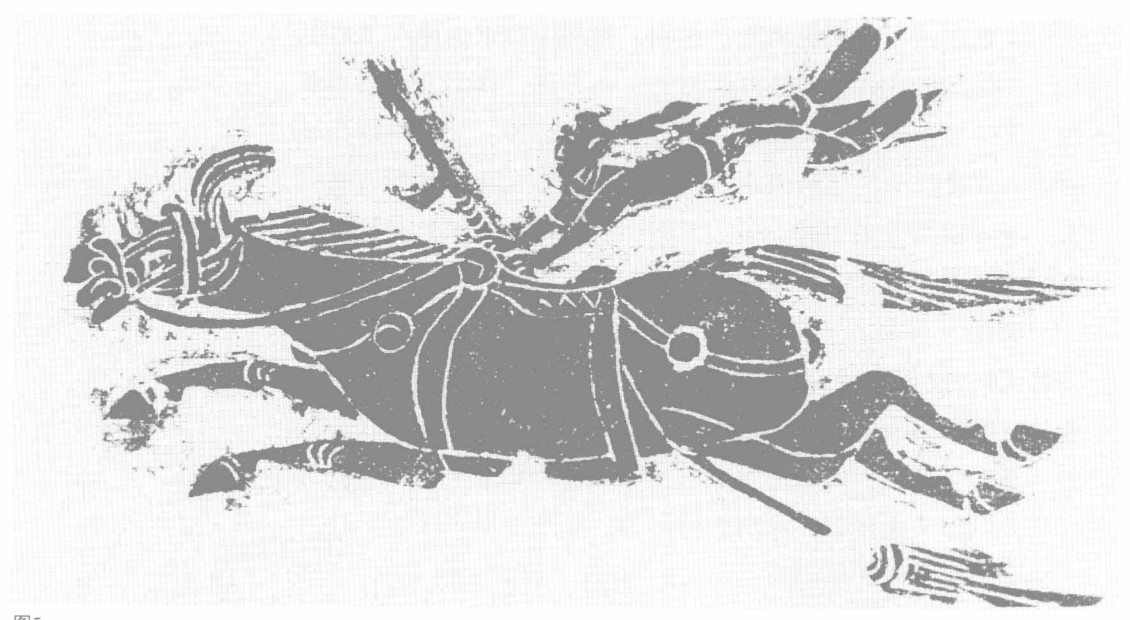


图5
三国沂南古墓画像石：马戏

"洛阳纸贵"[1] 正是图书出版业繁荣的一个显例。

【1】[唐] 房玄龄等:《晋书》卷92《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北京,中华书局,1974。

在古代中国，礼乐教化从来都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因此只要有可能，统治者无不有兴学之举。尽管我们可以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经学独尊的地位已经失去，但经学仍然是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之一。为了使经学得以传承，曹魏不但恢复了太学的设置，还对当世名儒大加褒奖。这样就在魏国出现一大批讲经、注经的儒师。为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他们不但讲论辩难，而且进行了大量的撰述。如王肃遍注群经，对郑玄的学说进行攻击；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等，在治经上别开生面；隗禧与人讲《诗》，"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2]。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蜀汉虽偏据巴蜀一隅，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也不甘落后，如刘备在定蜀之后，即设儒林、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以搜集、整理典籍。而从蜀汉曾设有"博士"一职，可知蜀汉当亦有太学或国子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3]。东吴孙权除自己留心经史之外，还经常劝导部下读书。江东治史者渐多，正是在孙吴政权建立之后，其中成就较大者为虞翻。史载虞翻门徒常有数百人，所训注《易》、《论语》、

【2】《三国志》卷13《王肃传》及注引《魏略》。

【3】《三国志》卷42《周群传》、《许慈传》、《来敏传》、《尹默传》。

《老子》等，皆流传于世。可见，蜀、吴两国的文教、图书出版事业，还是得到一定发展。

以上所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事业，仅仅是就文学创作以及儒学典籍的收集、整理、编纂而言，如果将其时史学、地理学、医学、方伎、农学等方面的著述也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业，并未因战争和动乱而停滞不前，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两晋时期之兴学，更是史不绝书。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在兵事未息，全国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即恢复了太学的设置。咸宁二年（276年），又设国子学，教学人员也较曹魏时有所增加。除此而外，西晋还在京师洛阳刻石写经，修明堂、辟雍、灵台，令皇太子亲自释奠祭孔等，无不显示出对文教事业的重视[1]。东晋虽偏安江南，亦未尝忘怀于兴学，建武元年（317年）十一月，司马睿即因王导、戴邈等人之请，建立太学，其后晋成帝、晋孝武帝时，都有兴学之举，教育机构、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发展[2]。两晋时期文教事业的发展，必然对其时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和编纂要提出新的要求。早在三国时期，曹魏即开始大规模收集散佚的图书典籍，命秘书郎郑默进行整理，制成《中经》。到西晋时期，秘书监荀勖又以《中经》为蓝本，制作《新簿》，确立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上的"四部"分类法。经过此次整理后，西晋国家藏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3]。经过这两次由国家主持的大规模校书之后，魏晋的图书业臻于一时之盛。然而西晋末年的战乱，却又使得好不容易鸠聚起来的图书典籍再次受到重创，即所谓"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4]。东晋从建立之初，即开始对图书典籍进行收集整理，后经著作佐郎李充整理校订，共得三千余卷，这个数字虽仅为西晋极盛时的十分之一，但却为江南地区的图书出版、编纂事业在东晋南朝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梁］沈约等：《宋书·礼志》、《晋书·裴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书·礼志》、《晋书》之有关本纪及列传。

【3】［唐］魏征等：《隋书》卷32《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

【4】《隋书》卷32《经籍志一》。

2. 南朝的兴学

早在刘宋建立之前，宋武帝刘裕即开始关注文教事业，如义

熙十二年（416年）北伐关中，收得姚秦官府藏书四千余卷[1]。及刘宋始建，刘裕即下诏立学。到孝武帝大明五年（462年）国子学终得确立。从总体情况看，刘宋官学（国学）不及两晋，但私人办学却有较大发展，这与刘宋统治者的奖助有很大关系，如宋武、宋文、宋明诸帝，都曾资修学馆、召见名儒、接见诸生，对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在刘宋诸帝的热情关注下，刘宋时期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获得空前发展，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国家藏书即达64 582卷，到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又得15 704卷[3]。萧齐建元、永明、永泰年间，国家都曾有立学之举，王俭、刘瓛的私学也曾得政府的资助，这些举措在成效上，可能有小大之分，而崇尚文教的传统却不能被抹杀[4]。萧梁时期的学校教育更有所发展，这与梁武帝本人较高的学识才华有一定关系。梁武帝即位不久，即下诏兴学，在东山为名儒何胤兴建学馆、招聚生徒。天监四年（505年）又设五经博士，七年（508年）下诏建立国学，九年（510年）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入学就读，大同七年（541年）又创立文林馆，延集学者讲述[5]。与大规模兴学同时进行的，是萧梁政府对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与编辑出版。梁武帝本人在学术和文学上都很有成就，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武帝一生著述、编纂的各类文籍共有29种、730卷之多[6]。在梁武帝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下，萧梁的文教事业盛极一时，图书典籍的编纂出版也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7]。但"侯景之乱"却几乎毁灭了萧梁的全部官藏典籍。梁元帝萧绎在乱平后，立即着手征集公私藏书，共得七万余卷，全部运到新都江陵。然而这批劫后重生的典籍，不久又随着江陵被北周攻破而遭灭顶之灾[8]。陈在南朝诸政权中国力最弱，直到世祖陈蒨即位后，才有暇对图书典籍进行收集整理，其后诸帝也多次有兴学之举，但终因国力单弱、境域狭促而终无大成，因此，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陈朝的图书出版业都无法与萧梁时期相比。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2】《宋书》之《范泰传》、《何承天传》、《周续之传》、《雷次宗传》、《明帝纪》。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

【4】[梁]萧子显：《南齐书》之《高帝纪》、《武帝纪》、《王俭传》、《刘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5】[唐]姚思廉：《梁书》之《武帝纪》、《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6】《隋书》卷32、33、34、35《经籍志一、二、三、四》。

【7】《隋书》卷32《经籍志一》有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由此可见萧梁图书出版发行范围之广泛。

【8】《隋书》卷32《经籍志一》。

3. 十六国、北朝的文化建设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在整体上不及中原的汉族。但随民族融合的深入，少数民族开始走上汉化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胡”出身为主的十六国政权统治者，对文教事业也莫不予以深切关注，特别是那些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首领，对文教事业的热情和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丝毫不亚于汉族统治者。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史籍中随处可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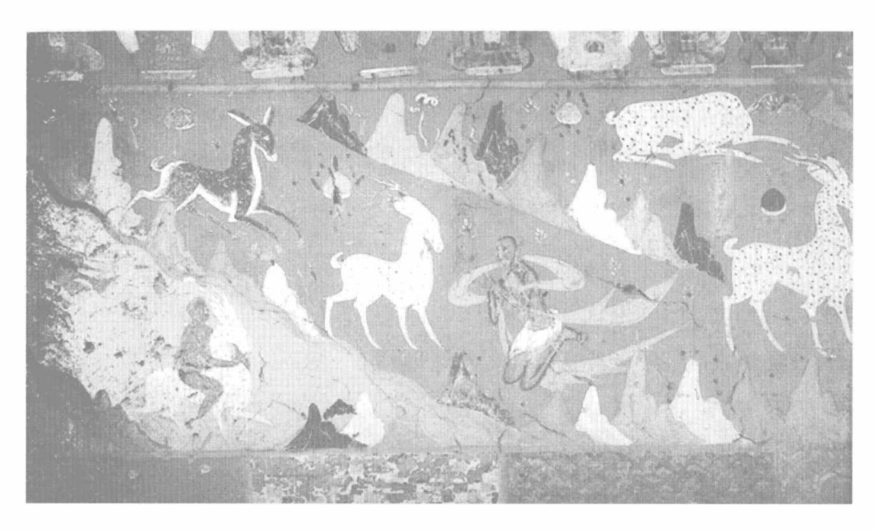


图6
北朝九色鹿拯救溺人壁画

汉赵政权的开创者刘渊及其子刘和、刘聪等，汉文化水平都很高，与幽冀一带的名儒硕学多有交往。刘曜即位后，分别建立了太学、小学，并设置国子祭酒、崇文祭酒以管理学校，简选匈奴贵族子弟入学，并“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另外，刘曜还不时驾临太学，亲自策问学生，其优异者除以官职[1]。充分显示出对文教事业的重视。再如后赵石勒，其本人目不识丁，对文化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敬意，因此在局面粗定后，即设立太学，并在襄国四门设小学十余所。及其称赵王后，下令郡国普设学官。他还经常亲临学校，考试诸生，其中成绩优异者予以奖励。石虎即位后，也下令诸郡国必须设置五经博士，还派遣博士到洛阳摹写石经，还组织学者在秘书省校理中经[2]。

在诸少数民族政权中，氐族建立的前秦与羌族建立的后秦，

【1】《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2】《晋书》卷104、105《石勒载记》，卷106、107《石季龙载记》。

在兴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据载，苻坚广立学宫，凡公卿子孙均须入学受业。苻坚每月都要亲临太学一次，策问诸生。甚至中外禁军将士、后宫阉人女隶，都“令修学”，并为之“置典学、立内司”、“置博士以授经”。在苻坚的大力倡导下，关中地区的学校教育，一度跃居天下之冠，即如史言：“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苻）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1] 后秦姚苌、姚兴，兴学也是不遗余力，如姚苌曾下诏令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姚兴则每于听政之暇，引名儒于东堂讲论，还下令关尉，凡诸生往来出入，不得拘于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2]。周边诸族对文教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兴趣，并非个别现象，事实上，十六国政权几乎都有兴学之举，如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五燕”政权（其中“北燕”为汉人冯跋所建，“西燕”未入十六国之列）、偏据巴蜀的成汉政权、河西地区的张氏前凉政权，其统治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在位期间都能置史官、修学校，还常于听政之暇，亲临学校听讲[3]。

北魏统治者拓跋氏为北方一游牧部落（图7），但入主中原即留意于文教，如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虽日不暇接、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在学生员即达一千余

[1]《晋书》卷113、114《苻坚载记》。

[2]《晋书》卷116《姚苌载记》，卷117、118《姚兴载记》。

[3]《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卷110《慕容儁载记》，卷111《慕容暐载记》，卷123《慕容垂载记》，卷124《慕容宝载记》，卷121《李雄载记》，卷86《张轨传》。

图7
西魏猪群壁画（敦煌249窟）

人。天兴二年（399年），国子太学生员更增至三千余人。其后，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献文帝拓跋弘也都曾大规模兴建学校，令各郡选举人才，到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前，北魏的学校建制已经比较完备，不但中央有太学、国子学，郡有郡学，甚至广大乡村也都设有“乡学”。及孝文帝南迁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北魏的文教事业得到更大发展，经学、史学、文学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及至宣武帝元恪即位后，再次下令营建国学、四门小学，大选儒生，于是“学业大盛”。即使是到了国势衰微的末期，只要条件稍微许可，统治者也依然不忘兴学，如正光二年（521年）孝明帝元诩亲自释奠于国学，孝武帝元修以末代君主，于永熙年间（532—534年）仍亲自释奠于国学，为国学置生员72人，迁都邺城后，又置国子学。因此仅就兴学一端而言，北魏一朝对文教事业，始终都是比较关切的。正是有了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重视，所以北魏的图书编纂出版事业比较兴旺发达，特别是在孝文帝、宣武帝之际，由于天下太平，图书出版业一度出现了“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的繁荣景象[1]。

北齐、北周之间虽长期争战不休，但亦都有兴学之举，据《隋书·百官志》载，北齐不仅学校体制较为完备，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各级学校，而且对教授人员、学生人数及入学资格都有较为明确规定，这就为其后隋唐时期学校建置体系的完善作了铺垫。另据《北齐书》等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都曾先后下诏令郡国立学，要求有关机构勤加督课。北周在文教方面，最重视太学，宇文泰常会见太学生，以示劝奖。武帝宇文邕则常常驾幸太学，并以于谨为三老而行问道之礼。宣帝宇文赟亦曾幸学释奠[2]。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其时战争频繁，齐、周两代的文教事业不及北魏时发达，相应地图书典籍的编纂出版，也不及北魏时盛。

【1】［北齐］魏收：《魏书》卷84《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1、2《文帝纪》，卷5、6《武帝纪》，卷7《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二、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以及由此所造成的

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对文化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政权的频繁更迭，人们思想所受到的钳制也相应地减少了，这就使得魏晋南北朝成为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其间学术界异常活跃，为玄学的兴起及其他各家学说在不同程度上的复兴提供了条件；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思想得到了交流；中外交往的进一步拓展，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又丰富和补充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以下从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新发展，以及由学术新发展所带来的图书出版方面的进步略加阐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的最显著变化，发生在哲学思想领域内，即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和魏晋玄学的形成。思想界的这一变化，正是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变的结果。作为一种新思潮新学风，兴起于曹魏后期的玄学，其主旨以老庄思想为骨架，儒道融合，所研究的课题则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1]。前期玄学代表人物有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他们撰写有大量论著，以阐述“无为而治”的思想。魏晋嬗代之际，则以阮籍、嵇康等所谓“竹林七贤”为代表（图8），到这时候，玄学已逐渐流于虚诞。进入西晋，在向秀、郭象注《庄子》后，玄学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63—8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图8
竹林七贤墓砖画（局部）

家开始老庄并举，造成玄学的又一次大变化。东晋南朝，玄学之风依然盛行，就连王导、谢安这样的政治家都厕身其间，其中王导还曾是清谈之一时领袖。再后来随着和尚、道士也不断加入到清谈的行列，玄学在内容上也渐渐融入佛道方面的东西。

玄学成为思想领域内的主要思潮，并不是说封建统治阶级就不需要儒学了，儒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在魏晋南朝玄风强盛的时候，儒学也依然在发展，并且许多玄学家还有意识地以玄学来阐释儒经，这样就使得儒学也掺入了玄学的内容[1]。与魏晋南朝不同，由于很少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北朝的儒学仍然多遵汉儒之说，偏重于章句训诂，儒经之外，少有涉猎，这就与南朝儒学杂以玄学的情况迥然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其中所概括的南北学风的显著差异，也正是南北经学的不同[3]。

玄学与儒学的相互辩难、玄学的不同流派之争、儒学内部的南北之争，彰显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内始终争辩不休。为弘扬自己的学说，他们或注疏经典，或另撰新著，对异己者加以批判。伴随着每一次学术领域内的党同伐异，都有大量的学术著作问世。据《隋书·经籍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仅有关儒家“五经”的著述（包括隋时已亡佚者）计有7 392卷，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批判异己者而作。可见，学术思想领域内的争论，对于繁荣当时的图书出版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另外，还有许多居家教授的学者，出于讲授之需，也进行了大量的撰述，《魏书》、《晋书》之《儒林传》所载儒学人物，几乎都有所撰著，如晋代刘兆博学洽闻，从其受业者数千人，晋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凡所赞述百余万言”[4]。这些私人撰著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显著特点[5]。有很多迹象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

【1】《晋书》卷91《儒林传序》所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

【2】《隋书》卷75《儒林传序》。

【3】关于南北学风的差异，可详参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四章《南北学风的差异》。

【4】《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

【5】本节所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及概况等方面内容，主要参考周一良先生的如下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见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史学著作开始摆脱经部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次，几乎每一个政权都设有专职的史官。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修史事业格外地兴旺发达。除了官修史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撰之风也十分兴盛，如有关晋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就有包括《晋纪》、《晋阳秋》在内的所谓“十八家晋书”，而实际上可能有二十余家[1]。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包括隋时已佚者）共计有817部，16 550卷。

【1】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繁荣，还表现在谱牒学成为专门之学。出于维持门第等政治需要，从东晋后期开始，许多世家大族竞相编撰族谱、家谱，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修谱之风经久不衰，结果使得谱牒在此时期内蔚为大观。修族谱、家谱本来是一些世家大族为保证其高贵门第的纯洁性而编写，纯系私家行为。但到宋、齐以后，由于精通谱学与否，已成为士大夫学识修养的一项重要指标，和担任吏部官员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人们愈益重视谱学。另外，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诈冒户籍现象，也需要对各类谱牒加以甄别。因此从南齐开始，政府就插手编写谱牒之事，到萧梁时，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职掌氏族谱牒，谱学也因此不再是单纯的私学[2]。从此，谱牒学更加兴旺发达，私撰及官修谱牒目录开始大量出现。谱牒修撰的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了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内容。

【2】《南齐书》卷52《文学·贾渊传》：“朝廷给（贾）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是为国家开始过问修谱事。据《通典》卷3《食货典三》：“（梁武）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严。”周一良先生即据此认为国家设机构管理谱牒始自梁武帝。详参前引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形式以辞赋骈文为主，其中虽然颇多辞藻华丽、空洞无物的篇章，但同样有许多艺术水平很高、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如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篇”，不但继承了汉诗的优良艺术传统，还能够从民歌中吸取有益成分，因而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再如东晋陶渊明的山水诗，庾信晚年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除了诗辞歌赋外，志怪小说、家训、笔记也应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的文学体裁，如张华的

《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都是比较著名的志怪小说，成为唐人传奇的先驱；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署名葛洪撰的《西京杂记》等，则是比较有影响的笔记小说，尤其是前者还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经典著作，所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南北朝社会现实的内容，因而为历来治文史者所看重。

随着大量文学作品的问世，也是为了对文学创作进行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还编纂出大量的别集和若干文学总集。所谓别集，就是将个人的文章辞赋编集起来；总诸家之作，合而编之，即成为总集。据《隋书·经籍志》载，包括到隋时已经亡佚的文集共1 146部，13 390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集的编纂，在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由于佛教、道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二教之间的互相辩难，也促进了佛教典籍和道教典籍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所载佛、道二教经书共2 329部，7 414卷。佛、道二教典籍的撰写与流传，也是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民族融合与南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人类的精神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物质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图书出版事业在内的文化教育活动，较之秦汉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物质基础。与秦汉以前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发行的范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而是扩展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版发行地域的扩大，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什么会有这个发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为大动荡时代，但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随着各民族间交往的日渐加深，边疆的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就必然促进其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以下就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少数民族汉化与文化发展等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在物质基础方面的原因。

一、南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古今中外一切历史发展都表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深深地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根本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活动。尽管由于长期的战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产发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与两汉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江南等局部地区，其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得更快。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就为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主要在北方中原地区进行，对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影响要小得多，特别是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带来丰富的劳动力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结果造成了南方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进步，具体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全面发展上。

1. 东晋南朝农业的全面发展

早在孙吴统治时期，江南的农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北方持久战乱，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南移。他们不但为孙吴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如建安十八年（218年）孙、曹之间发生的濡须口之争，仅这一次流入孙吴的人口就有十几万户[1]。大量劳动力的流入，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孙吴的统治者还积极推行扩大

【1】《三国志》卷47《吴主传》。

屯田、奖励农桑的政策，这当然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孙吴的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中诸如纺织、造船、制瓷、盐业，特别是造船业尤为发达。与同时期的曹魏、蜀汉相比，孙吴的商业更是一枝独秀，除了与蜀、魏之间的互市外，孙吴与海外诸国的商业交通，更是远超前代。据史载，孙吴的使者所经过的和听闻的海外诸国有"百数十国"之多[1]，由此可见其商业贸易之发达。总之，经过孙吴时期的开发，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南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这就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孙吴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晋南朝农业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的大量开垦上。在孙吴土地开发的基础上，东晋南朝土地开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大量抛荒地和原始荒地被垦殖成产量较高的可耕地。如宋文帝元嘉年间"湖孰废田千顷"被重新垦辟；又因为京口地区有大片抛荒地，于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2]。三吴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产量较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孔灵符曾迁移人民在"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并成良业"[3]。再如雍州治所襄阳，经过南齐时的开垦后，"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湘州则"民丰土闲"；益州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南朝虽屡经战乱，但基本仍能保持"州土瓌富"的局面[4]。从刘宋大明年间颁行的"占山格"来看，江南地区包括池泽湖山在内的许多半荒地、原荒地，都已经被陆续垦殖出来。刘宋政府"占山格"对人们开湖占山权利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出土地开辟的长足发展。

东晋南朝农业的全面发展，还表现在农田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兴修，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等方面。水利的兴修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据记载，萧梁时夏侯夔在豫州苍陵兴修水利，"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5]，平均下来则亩产可达10石左右，这个数字应该说

【1】[唐] 李延寿：《南史》卷78《海南诸国传序》："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书》卷5《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宋书》卷54《孔季恭传附孔灵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

【5】《梁书》卷28《夏侯亶传附夏侯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是比较高的。而在一些土地肥沃处，亩产量更高。据《太平御览》卷821《资产部》引《豫章记》所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多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这个产量为前者一倍。尽管不是任何地方的亩产量都能达到这个水平，一些贫瘠之地产量仍然较低，但粮食单产能够达到10斛20斛，还是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2. 东晋南朝手工业的显著进步

东晋南朝在中央、地方都设有专职的管理机构，对手工业的组织生产、经营等进行切实的管理，如少府作为中央主管机构，其下属有兵器、冶铸、纺织等部门，地方则普遍设有“作部”，负责各种手工业的生产制作。还有一点就是，东晋南朝官府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虽仍属低贱者之列，但比较以前仍有所改善，特别是南朝后期，国家对“百工”的管制进一步放宽，如萧齐是给工匠假期，梁武帝时则开始“和雇”工匠，即支付工匠以一定的佣金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这里可以从与出版事业相关的纺织业、造船业和造纸业，看此期手工业的发展。

先看纺织业。东晋南朝纺织业仍以麻织业为主，除了因为传统的因素外，还与麻布是人民须向官府交纳的租布有关。东晋南朝时期丝织业则是刘裕灭后秦，迁关中“百工”到南方，在建康设锦署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南齐时，织锦业已经比较发达，因为柔然曾向南齐政府求织锦。梁末，侯景也曾向梁武帝“求锦万匹”以为军服。这说明南朝织锦业已有相当发展。南方织锦业仍以成都为最发达，永嘉、豫章等郡丝织业也日渐兴隆。从总体上说，东晋南朝的丝织业不及同时期的北方，但呈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纺织业的发展，为帛书的传写，也为造纸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再看造船业。造船业的发展与出版物的运输、贸易有间接的关系。东晋南朝的造船业，在孙吴基础上继续发展。如荆州“作部”，在短短时间内即可造千艘战舰，陈朝华皎曾在湘州造金翅大

舰二百艘，足见造船能力之强。民间造船业也同样发达，如隋文帝灭陈之后，曾下诏没收民间大船，目的即在于防止民众造反[1]。另外，东晋南朝时期船舶载重与航速都有很大提高，这也是造船技术进步和造船业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如颜之推就曾见到能装两万斛的大船，他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实验也。"[2] 载重二万斛，比孙吴的万斛大船载重量增加了一倍。东晋南朝船的航行速度，也大大加快，如侯景在与王僧辩作战时，侯景叛军"又以鸼舠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3]，航速之快如风似电。

【1】《隋书》卷2《高祖纪下》。

【2】[北齐]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5《归心篇》，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3】《梁书》卷45《王僧辩传》。

最后看造纸业，在所有手工业中，造纸业与图书出版业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来，造纸技术一直在不断进步中，东晋南朝的造纸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不但纸的产量有了较大增长，而且种类明显增多，质量明显提高。不仅能造麻纸，而且还能造出藤纸。藤纸由于质地优良，而被用作官府文书专用纸。如东晋范宁曾命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4] 除藤纸以外，东晋南朝还会用桑树皮造纸，其质地也比较优良。能够反映东晋南朝造纸技术发展重要成就的，还有纸的压光与染色，东晋南朝掌握了压光与染色技术，对于纸质的提高和丰富图书出版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造纸业的发展和造纸技术的进步，东晋南朝纸的产量已经大大增加，这就使得纸取代简、帛，成为主要文字载体。

【4】[宋] 李昉：《太平御览》卷605《文部·纸》，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东晋南朝商业的持续繁荣

农业、手工业的全面发展，为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物质的保证。无论是与北朝，还是与前代相比，东晋南朝的商业活动都要发达得多。

以建康、荆州、成都等为代表的一批商业都会城市逐步兴起、繁荣。以六朝首都建康为例，它不仅是南朝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有研究者推算，萧梁时期的建康人口，当在140万人左右，为当时世界所罕见[5]。建康城内

【5】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有大市四个、小市十余所，自东晋以来，更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1]。除建康以外，长江下游地区的会稽、余杭、京口、广陵、吴郡等地，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商业都会，它们与建康一道，构成了长江下游商业区域。长江中游的荆州，也是重要的商业都会，素有“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之称[2]，是长江中游“商赂所聚”之地[3]。成都则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蜀锦、川马历来有名，资财多百万的富商大贾，常会聚于此。珠江流域的广州，则为东晋南朝南方地区的最重要城市，广州素以海外贸易发达著称，每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少则几艘，多则数十。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少受战乱影响，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史言“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卷握之资，富兼十世”[4]，由此可见广州之富庶与对外商业贸易之繁荣。

【1】《宋书》卷33《五行志四》。

【2】《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

【3】《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

【4】《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

南北互市与对外贸易的发达，也是东晋南朝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商业贸易的发展冲破了南北的界限，南北政权在边境开设互市，即使是在双方战争时期，也都有商品交换在进行。如陈时南徐州刺史侯安都“接邻齐境，贸迁禁货”[5]；北魏守边官吏也是“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以至于“贩贸往还，相望道路”[6]。而当南北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边境的互市贸易就更加繁荣，其中淮河流域的寿春和汉水上游的襄阳发展成为南北互市的中心。南北互市的开设及南北之间的商业往来，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定人民的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

【5】［唐］姚思廉：《陈书》卷8《侯安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6】《魏书》卷69《袁翻传》。

除了南北互市外，南朝对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晋南朝是中外交通与经贸联系开拓发展的重要时期。传统上就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朝鲜半岛、日本及南海诸国，在这一时期与东晋南朝政权仍保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另一方面，由于南北分隔所导致西北对外陆路交通孔道的阻塞，再加上南朝商业、造船业的发达，因此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在东晋南朝时期有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由广州出海，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波斯湾到达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沟通了南中国与南海诸国以及印度、阿拉伯乃至欧洲的中西

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是东晋南朝对外贸易发达的重要标志。

总之，魏晋南北朝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为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北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相对于江南地区而言，北方广大地区所经受的战火摧残更为严重。在三国鼎立时期，曹魏政权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北方地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在经历西晋短暂统一之后，北方重新陷入纷乱之中。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相寻，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攻战杀伐，使得曹魏和西晋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生产，再次化为灰烬。直到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北方人民才又重新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北方的社会生产力，也因此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北魏末年，由于六镇反汉化势力的起兵，使得统一的北魏王朝分裂为互相对峙的东、西魏政权（图9、图10）。再到北齐、



图9
西魏男贵族及奴婢壁画（敦煌288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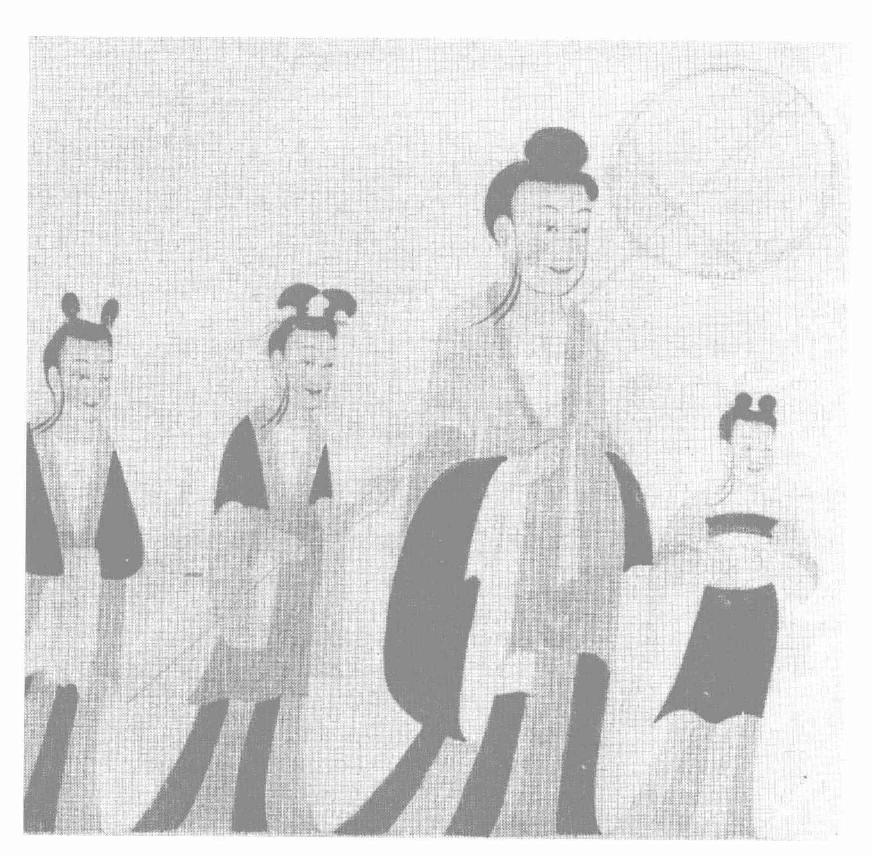


图10
西魏女贵族及奴婢壁画（敦煌288窟）

北周的互相抗衡，北方地区再次陷入分裂战争之中，北方的社会生产力再次受到重创，直到隋朝建立为止。从总体情况看，北方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及水平，除北朝后期外，大部分时间不及同期的南方，但北方毕竟没有完全停滞不前，比以前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和基础条件。

1. 曹魏、西晋北方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自黄巾起义以来，由于连年混战，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农业生产十分衰败，造成了粮食的极度短缺，整个北方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局面[1]。民以食为天，解决粮食问题已成为整个北方社会的当务之急。因此，曹操在迫汉献帝都许以后，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于建安元年（196年）开始大兴屯田，发展农业生

【1】《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产。曹魏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在黄河流域普遍推行，并以屯田效果作为考核官吏成就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曹魏屯田取得明显效果，直接解决了军粮的供应，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还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及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进步。

同一时期的蜀汉政权，特别是诸葛亮期间，也注意发展农耕，并维护农田水利，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发展。蜀汉的工商业相对比较发达，盐业、冶铁业，尤其是织锦业在三国中最为发达。川马、蜀锦成为蜀汉与吴、魏两国贸易的重要物资，蜀锦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系蜀汉财政的命脉。总之，由于诸葛亮的个人才能，也由于蜀汉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在三国中地盘虽最小，但仍支撑了近半个世纪。

西晋完成统一后，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田制上的变化，即在全国颁行占田课田制。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完成统一，正式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制。占田课田制的实行，一定程度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又由于占田课田制具有鼓励垦荒的倾向，因此大量荒地被重新垦辟，同时也由于新的户调制有抑制豪强、平均力役的内容，因此实行后对于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史言占田制推行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1]。其中虽不免有溢美的成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推行占田制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当时社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还反映在户口明显增加上，据载，公元280年，全国共有户245万余，到太康三年（282年），即达377万余[2]。不到三年间增加130余万户，其中虽有不少是检出的隐、漏、逃户口，但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应很多（图11、图12、图13）。

【1】《晋书》卷26《食货志》。

【2】《三国志》卷22《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

2. 十六国、北魏社会经济的破坏与恢复

十六国为中国北方大动乱的时期，其间各少数民族政权迭相更代，战争不已，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力严重衰败乃至倒退的局面，一直到北魏政权崛起统治中原地区以后，才开始扭转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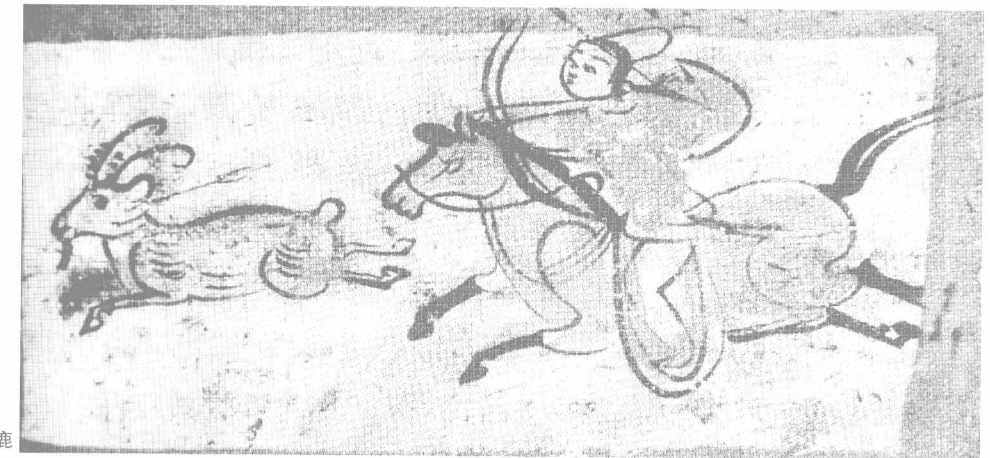

图11
西晋砖画：猎鹿


图12
西晋砖画：采桑


图13
西晋砖画：屯垦

(1) 北魏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本是漠北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早期拓跋部，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到拓跋珪定都平城，建立北魏以后，尽管畜牧业仍在北魏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农业的地位开始日显重要。北魏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国力增强，为其大规模征战提供了物质保障，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并一度南下攻宋，兵临长江，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从此形成。

拓跋氏形成国家的过程，也正是其汉化的过程，而且愈到后来，汉化的速度愈快，并终于在孝文帝元宏时出现了汉化的高潮。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孝文帝的经济改革措施及其对生产力恢复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推行均田制及与之相配套的赋役制度，乃是孝文帝改革的重点。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遣使者巡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1]，一般认为这就是北魏推行均田制的开始。

自推行均田制以后，由于北魏政府多次将“禁苑”分给农民耕种，鼓励垦荒，因此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多少都得到了些土地，许多抛荒地重新又被垦辟出来，粮食生产明显增加，农民也有了一定的储藏。如太和十四年（490年），京师平城发生旱灾，但“关外诸方，禾稼仍茂。苟动之以礼，绥之以和，一岁未收，未为大损”[2]。农业的恢复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与稳定（图14），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前后，“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3]。其时的平民生活也比较安定，“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4]。

(2) 北魏手工业、商业发展概况

尽管北魏乃至整个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与同时期的南朝相比，显得落后，但还是缓慢地向前发展着。北魏的手工业由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部分构成，以前者占优势。

北魏纺织业以丝织业为主。在拓跋氏入据中原初期，丝织品

【1】《魏书》卷7《高祖纪上》。

【2】《魏书》卷54《高闾传》。

【3】《魏书》卷19中《任城王云传附元顺传》。

【4】[北魏]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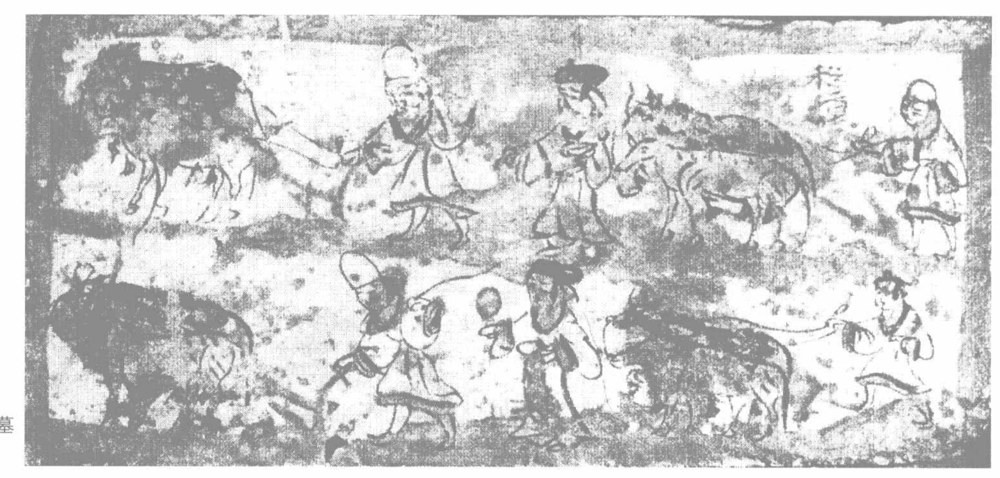


图14
嘉峪关魏晋墓
耕作壁画

较为缺乏。但在加强对手工业和工匠的控制后，特别是占据丝织业发达的河北地区后，绢帛增长很快，史籍常有关于朝廷颁赐百官绢帛绫锦的记载，如灵太后时，听任百官入左藏库取布绢，少则百余匹，多则二百匹，有如此大量的绫锦，说明丝织业已很发达。北魏民间丝织业也有了发展。颜之推曾说："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1]

【1】《颜氏家训》卷1《治家第五》。

除了丝织业外，北朝比较重要的手工业，如矿冶业、制盐业、酿酒业等也都有所发展。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大市的通商、达货二里"尽皆工巧、屠贩为生"；延酤、治觞二里则多以酿酒为业；另有调音、乐律、阜财、金肆诸里，均有相应的业务。"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所经营的手工业当然种类繁多。由此可见，北魏手工业发展的确已有相当水平（图15）。

北魏商业，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有了一定发展。在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前，北魏官吏没有俸禄，主要由官商经营商业贸易，取利以供官府和官吏所需。孝文帝改革时"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2]。孝文帝班禄之后，取消了官吏经商的权利，但在实际上很难禁止，这从北魏多次下发诏书禁止官僚经商可以知道。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北齐、北周。

【2】《魏书》卷7《高祖纪上》。

尽管官商始终未能完全禁止，民间商业还是获得较大发展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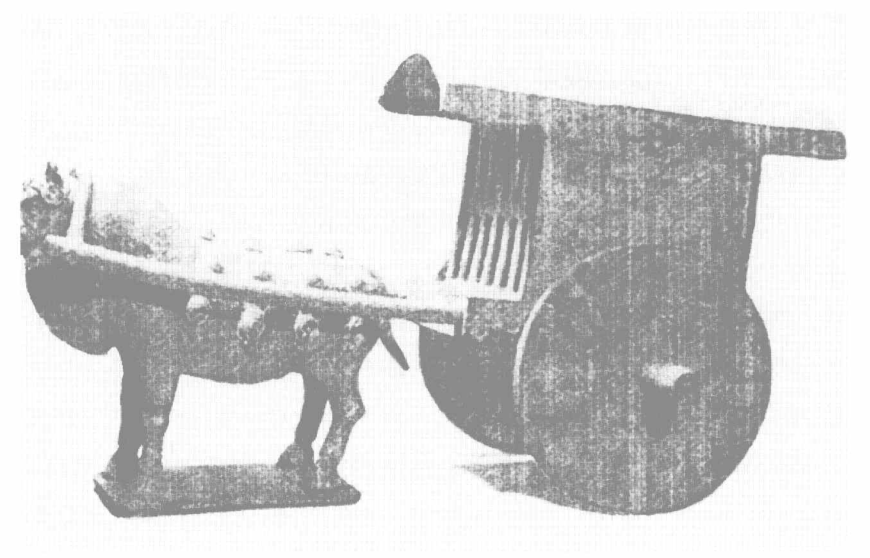


图15
北魏陶牛车

间，到宣武帝元恪以后，商业活动就已相当活跃，邢峦曾上疏说："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1] 北魏商业的发展，可以从洛阳城的繁荣得到证明。洛阳作为北魏的新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有大市、四通市、马市、小市等，均为商贾云集之地。位于西阳门外的有通商、达货等十里，"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2]。洛阳之外，邺城、长安、晋阳等也都是北方著名的商业都会。

【1】《魏书》卷65《邢峦传》。

【2】《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除了境内贸易，北魏与南朝及境外少数民族间的商业往来也有了一定发展。为此北魏政府还设立互市监专职负责其事。南北朝之间的互市自不必多说。北魏和境外的贸易包括和少数民族以及国外之间的贸易两部分。北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主要是和突厥、吐谷浑、高昌、龟兹、疏勒、乌孙、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贸易的商品除金银宝器、名马珠玉、貂裘食货等吃用之物外，还包括图书典籍。如高昌与北魏之间由于商贸关系的密切，先后十余次遣使来朝贡献"珠象，白黑貂裘，名马，盐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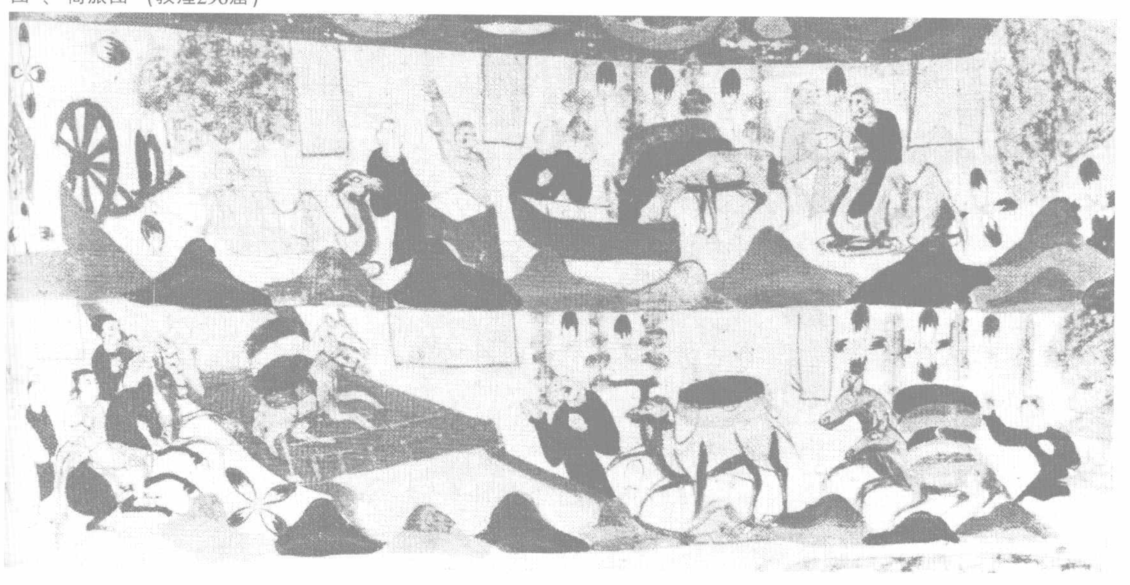
等”，并于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年），“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1]。图书典籍流布到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促进当地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发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1】[唐] 李延寿：《北史》卷97《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北朝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开展得比较早（图16）。如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代，就建立了经常的商贸联系。北魏与西方诸国的贸易，包括中亚的粟特、大月氏，西亚的安息、波斯，南亚的天竺等国。由于境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来到洛阳的人很多，这些人除使节外，更多的是从事贸易的商人，北魏为此在洛阳设立了四馆和四里，以供其居住。时南朝来者，处于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北方少数民族来者，处于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西方少数民族和国外来者，处于崦嵫馆，三年后赐宅慕义里。四馆四里的设置，正是北魏对外贸易发达的一个证明。

总而言之，北魏的手工业、商业虽不及南朝发达，但有了较大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满足了北方人民的生活需要，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进步，又为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证。

图16
北周福田经变壁画之“井饮图”、“商旅图”（敦煌296窟）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既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同时也是各族大融合的时期。随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迁徙移动，以及与中原汉族的接触交往，这些原本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为少数民族汉化的一个高潮期，从东汉末年开始的长期战乱，使得强大统一的中原政权瓦解，在历经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接着出现的是更大的社会混乱和动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来往更加密切和频繁，汉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明显加快加深。尤其是那些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他们为了适应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不但模仿汉族政权建立封建国家统治机器，而且提倡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如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政权”，尽管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少数民族色彩，但都着力推行汉化，并最终完全融入汉民族的历史。除了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外，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并未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也随着与汉民族交往的增多，而逐步接受汉族地区先进的文化（图17、图18、图19）。

东北境内诸族包括鲜卑、乌桓、夫余、室韦、高句丽等众多

图17
嘉峪关魏晋墓犁地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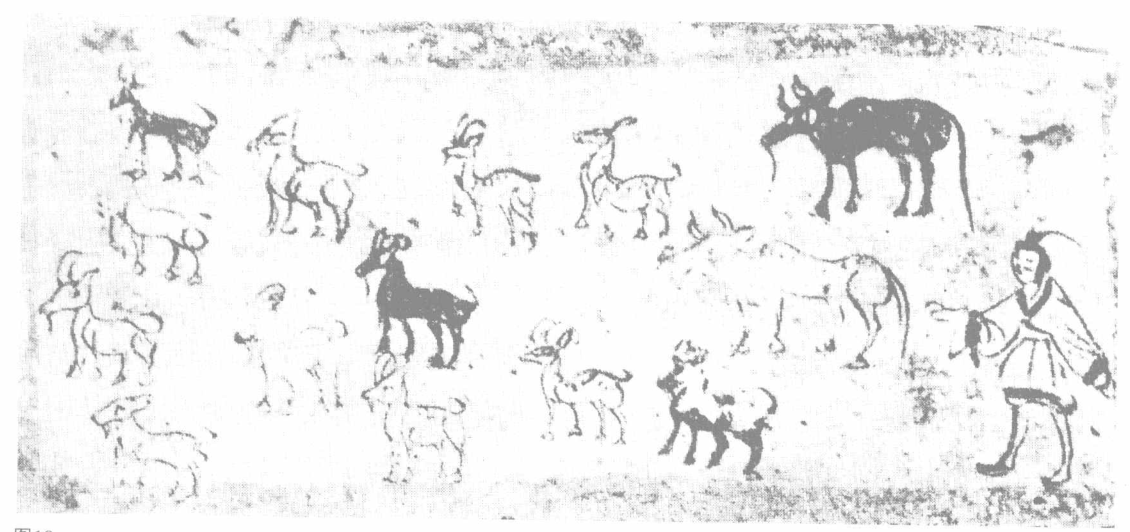


图18
嘉峪关魏晋墓畜牧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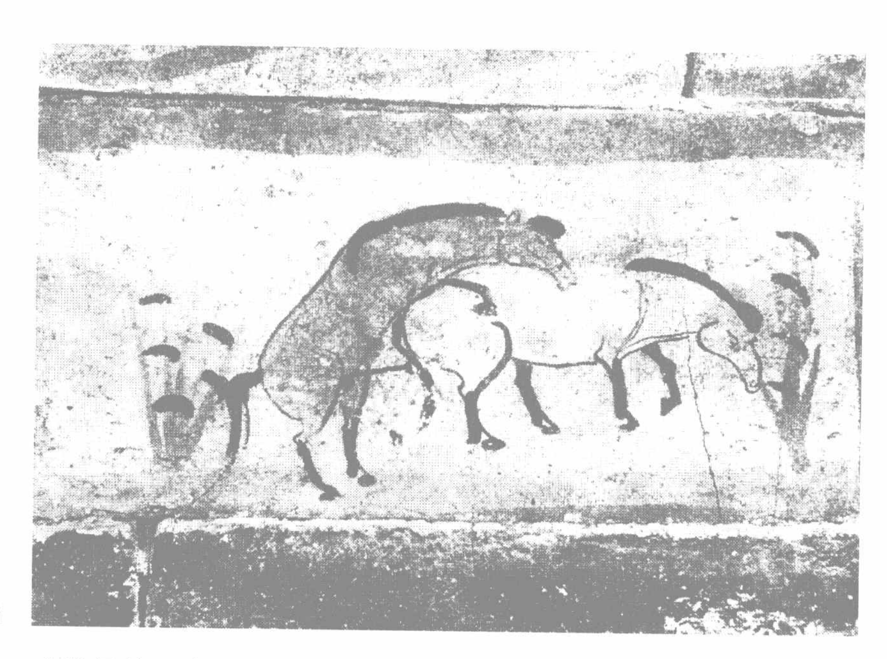


图19
嘉峪关魏晋墓配种壁画

少数民族，除了进入中原的鲜卑等族外，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如夫余族，生活在今松花江流域方圆二千余里的辽阔天地，早在东汉时期，夫余族人民就开始种植五谷，饲养牲畜，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与近邻的鲜卑游牧部落专事掠夺截然不同。从东汉光武帝时起，夫余就与中原政权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到魏晋南北朝时，联系更加密切。如晋武帝时，慕容廆攻破

夫余，武帝命护东夷都尉何龛出兵援助。北朝时期夫余与北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比较密切。如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夫余王派出使者到平城访问，并馈赠方物。再如勿吉（古称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勿吉在汉魏之际，还基本处于“无文墨，以言语为约”的阶段[1]，但已经有了世袭制。在曹魏、西晋、十六国前赵政权时期，挹娄都曾遣使入贡方物，所贡有楛矢、石砮、貂皮等物，而带回去的则有中原政权回赠的锦罽、锦帛等礼物。北魏时期，勿吉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据《魏书》记载，从孝文帝太和以后，勿吉先后十五次遣使来北魏贡献方物，其中最大一次使团人数有五百人之多，在北魏、北齐各时期，也先后有十四次或以勿吉，或以肃慎，或以靺鞨的名义，进贡方物。与中原政权的频繁往来，对于促进勿吉的社会文化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他如室韦、契丹、库莫奚等东北诸族，他们与中原政权的来往也比较频繁，在一些地区北魏王朝还设置城戍，进行管理，这些无疑都有助于这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而文献记载表明，这些民族与中原地区已开始进行商业贸易，如北朝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密云（今河北丰宁）一带，设有互市，与契丹交易，若遇到饥荒年景，北魏王朝还允许契丹“入关市籴”，库莫奚部则“与安、营二州边人参居，交易往来，并无欺贰”[2]（安州在今河北隆化县境，营州则为今辽宁朝阳市）。像这样与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开展贸易，对于推动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如靺鞨、契丹、库莫奚诸族到隋唐时期更加强盛，与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中原政权频繁往来，不断吸取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就大有关系。

北魏初年，高句丽势力开始强大，在辽东发展。其长寿王十五年（427年），高句丽政治中心已迁于平壤，但“自东晋、宋，至于齐、梁、后魏、后周，其主皆受南北两朝封爵”[3]，与中原政权仍然保持着藩属关系。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偶有冲突外，高句丽绝大部分时间与南、北朝政权之间保持频繁的往来。

【1】《三国志》卷30《魏书·挹娄传》。

【2】《北史》卷94《奚传》。

【3】[唐] 杜佑：《通典·边防·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92。

仅从官方外交往来来看，高句丽派遣到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使节，前后有九十次之多，有时一年中派出的使团，就有二次或三次；高句丽派往东晋南朝的使节，先后也有三十多次。每次使团到来，双方都会互赠大量礼物，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高句丽一次就赠送战马八百匹，刘宋也回赠相应的礼物；在北魏太武帝全盛时期，高句丽每年赠送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魏王朝也回赠价值相等的礼物。至于民间的商贩贸易，人民的迁徙流动，就更多了，仅举一例以作说明。北魏末年，天下大乱，中原人民大量流亡到高句丽，后来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三年（552年），遣使臣崔柳出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1]，高句丽王一次就遣返五千余户。

【1】《北史》卷94《高丽传》。

由于和中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兼之大量中原人流入高句丽，使得中原文化亦影响高句丽，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互赠礼物中，中原的儒家经典著作也在馈赠之列。高句丽王有时还专门向中原王朝请求典籍，在都城平壤设置太学，教以传统儒家经典。高句丽文化除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外，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大约在公元4世纪70年代，佛教经过前秦统治区域传入高句丽，大量佛教典籍也随后流入朝鲜半岛。

魏晋南北朝时，最为强大的少数民族是北方的柔然、突厥、高车等族。这些游牧在蒙古草原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与中原地区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诸政权之间，一直处于争战状态，但也有交往的时候。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与中原诸政权交往的频繁，促进了他们的社会文化进步。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柔然（或称芮芮、蠕蠕）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柔然政权与北魏之间的战争，一直延续到北魏末年。在与中原政权的长期接触中，柔然也逐渐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据《宋书·索虏传》所载，大约从公元464年起，柔然开始模仿中原政权建立年号，时予成继位自号永康元年，此前柔然"国政疏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到这时已经"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如柔然可汗曾写信给南齐武帝萧赜，希望

南齐派遣医生和锦工到柔然，指导他们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同时还要求告诉指南车和漏刻的制造方法，以便仿制。凡此，均说明柔然的文化已经有很大提高，否则不会提出这些要求。到阿那瓌统治时代，柔然不仅"乞粟以为田种"，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在礼乐制度上学习中原政权，如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534—537年），汝阳王暹遣其典签淳于覃出使阿那瓌，覃遂为阿那瓌所留，"亲宠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阳，心慕中国，立官号，僭拟王者，遂有侍中、黄门之属。以覃为秘书监、黄门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转至不逊，每奉国书，邻敌抗礼"[1]。由此可见中原先进文化对柔然的巨大影响，正是在接受汉化的过程中，柔然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发展。

【1】《北史》卷98《蠕蠕传》。

突厥本受柔然役使，大约从公元5世纪末期起，开始逐渐摆脱柔然的控制。他们开始以牲畜、手工业品同西域各城邦及西魏进行贸易，西魏执政者宇文泰于大统十一年（545年）派使者前往突厥。对于中原使者的到来，突厥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认为"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2]。次年，土门可汗遣使到中原赠送方物。从此，突厥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这种联系有力地促进了突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大约到公元563年，突厥与波斯萨珊王朝，合力击灭与柔然世代姻亲的中亚嚈哒汗国，将领土拓至今克什米尔后，一举成为东北亚最强大的草原汗国。

【2】《周书》卷50《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高车与匈奴为近属，史称"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3]，汉代称之为丁零（或丁灵），南北朝时始称高车或敕勒。高车是游牧民族，保持部落组织，他们在大漠以南北魏统治的区域内，基本上仍然过着"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的游牧生活。但是，由于他们也开始"渐知粒食"[4]，即开始了解农耕生活，这当然是汉化的重要表现。及至北魏末年六镇起兵，六镇的高车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王朝，在和各族人民并肩作战中，他们走上了汉化的快车道，很快与汉族融合在一起了。

【3】《北史》卷98《高车传》。

【4】《北史》卷98《高车传》。

西北民族繁多。自两汉以来，西域诸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就十分频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联系更加密切，如三国曹魏时期“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1]。北魏王朝与西域诸国的的往还，更是年年而有。西北诸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大大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水平，以及各族之间的交流。例如高昌王国，由于其国民中有很多是从内地迁徙去的，故而汉化水平比其他诸国明显高出许多。据记载，高昌王的“坐室”，就画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2]。高昌王麴嘉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年），曾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为博士，到高昌讲学，因此《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等书籍，在高昌流布[3]。另据记载，高昌麴氏王朝曾设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同时“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4]。高昌以汉文作为通行文字，同时兼用本族文字。这是对汉魏以来传统做法的因袭。

除高昌而外，伊吾、鄯善、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乌孙、渴槃陀等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也都有比较频繁的交往，因此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汉化影响，如龟兹、焉耆均曾于西晋武帝时遣使来洛阳，并派遣王子到洛阳学习文化。北魏以后，这些政权遣使到中原南、北朝政权访问的次数就更多了。如于阗在北魏献文帝时，因受柔然攻击，遂遣使至北魏贡献并请求支援，北魏为此特意举行一次公卿会议。尽管北魏此次并未出兵救援，但于阗却从此更加迫切要求加强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从此，于阗频繁地遣使到北魏、北周、萧梁等王朝贡献。总之，西域诸族在同中原政权的交往中，逐步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的熏染，随着汉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他们的社会、文化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中原的丝帛、纸张或造纸技术流传到西域，也促进了西域图书事业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在西域先后出现的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书籍，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水平和出版技术的提高。

【1】《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2】《北史》卷97《高昌传》。

【3】《通典》卷191《边防典·车师附高昌》，北京，中华书局，1992。

【4】《北史》卷97《高昌传》。

南方及西南诸族主要包括长江、淮河、汉江流域的蛮、獠诸族及今甘肃、宁夏、川西地区的仇池、吐谷浑、宕昌、邓至等部族。南朝所谓的“五溪蛮”，是指生活在荆、雍地区的少数民族，即盘瓠蛮的后裔。“五水蛮”则指豫州地区蛮族，即廪君蛮的后代[1]。獠族则为“南蛮之别种”[2]，是生活在汉中到邛州笮州之间的所谓“洞蛮”。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区均为地形险要、交通不便的南北交争之地，故而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无法将其完全控制。由于当时逃入蛮中谋生的汉人较多，因此这些所谓“夷蛮”之族的社会、文化还是有一定的进步。另外，南朝政府在“讨蛮”之余，有时还实行绥靖政策。因此有些蛮族首领还接受了南朝的官爵封赏，如宋明帝即位初年，四方反叛，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人，响应宋明帝，起兵攻克郢州，事后宋明帝封田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并创立宋安、光城二郡，分别以田益之、田光兴为二郡太守，后又封益之为边城县王，成邪财为阳城县王。后来田益之一度被征为虎贲中郎将，到建康做官[3]。

[1]《宋书》卷97《夷蛮传》。

[2]《北史》卷95《獠传》。

[3]《宋书》卷97《夷蛮传》。

生活在今陕西、川西交界处的仇池，本属氐族。仇池杨氏先后建立武兴、阴平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仇池汉化水平较高，从西晋武帝时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被推为首领后，“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4]。大量汉人知识分子的到来，加速了仇池汉化的进程，在历经几代发展后，到南北朝时期杨难当即位后，“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5]。仇池除了模仿中原政权建立比较完备的职官组织外，他们还不断接受南、北政权的封爵官号，更有许多人到南、北朝为官。凡此均说明仇池的汉化水平很高。

[4]《北史》卷96《氐传》。

[5]《北史》卷96《氐传》。

吐谷浑，本为徒河鲜卑慕容氏的支庶，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迁徙的背景下，辗转来到枹罕（今甘肃临夏）、陇西（今甘肃陇西）一带，由于宋文帝曾封其首领慕利延为河南王，故南朝史籍又称之为河南国。河南国与北魏及南朝诸政权均有频繁的往来，因而也慢慢地汉化了，如宋元嘉末年，吐谷浑拾寅继

为河南王后，“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到萧梁时，河南王伏连筹曾遣使贡献并请求在益州建九层佛寺，“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1]。其他如宕昌、邓至诸族，汉化水平虽不及仇池、河南国等，但也在与中原政权的接触交往中，逐渐走上通往文明社会的征途。

[1]《南史》卷79《夷貊下·河南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受到汉化的影响，其社会组织、政治、经济不断进步，与中原地区往来频繁，扩大了中原地区图书的流通范围。同时，由于中原丝帛、纸张和造纸技术的传播，也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不同文字的出版物丰富了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内容。

第三节　中外交通与外来文化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外来文化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精神风貌，魏晋南北朝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乃至文学家，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又一个思想空前解放和富有创造性的时代，与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交锋、融汇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果从图书编撰出版的角度来看，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对此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是，外来文化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图书编撰出版的内容，如佛教经典的翻译、刊刻，中国学者研读佛经的心得体会，就佛教传播所展开的争执论辩，在当时都曾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内容。《隋书·经籍志》及有关的魏晋南北朝诸史籍中，都记载有这方面的大量撰著。其次，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的流布，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提高，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信仰。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人们便开始以写经、译经为功德，还有人靠替人抄经为生。总之，频繁的中

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频繁的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强大崛起，使得秦汉时代形成的作为中外交通主体的中西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不过，这一时期中外交通发展史也有新局面，即海上交通得到较快发展。当时的南、北双方都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尤其是南朝政权在政治、自然地理的双重限制下，与国外交往的陆上通道绝大部分被堵塞。因此它与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海上交通迅速发展起来，并通过南海航线与印度、东罗马诸国频频往还。从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交通，比起秦汉时期，又有了较大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都有所拓展，传统的外交关系继续保持加强，一些新的外交关系得以建立。

（一）魏晋南北朝与海东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海东诸国，包括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及日本的邪马台、大和诸国。

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与中国的南、北朝都有友好往来。据文献记载，百济曾先后四次遣使到北朝诸国，派往东晋南朝的使节，则有十一次之多。百济人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典籍，其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及佛教的影响。据记载，百济国内“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1]，百济佛教是从东晋传入的。何承天的《元嘉历》，在南朝时也传入百济，史称百济“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2]。新罗是由辰韩、弁韩发展而来的国家，其由部落联盟形成国家，大约在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为当时半岛实力最弱者，它发展成为半岛强国，是到了隋唐时期。其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都曾受到中国的影响。史言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死有棺敛，葬送起坟陵”[3]。新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曾多次遣使来中国。据文献记载，西

【1】《北史》卷94《百济传》。

【2】《周书》卷49《百济传》。

【3】《北史》卷94《新罗传》。

晋武帝时辰韩王曾三次遣使到洛阳访问并贡献方物。南朝梁、陈时期，新罗使者先后四次到建康，北齐武成帝、后主时期，新罗两次遣使到邺城馈赠方物。

日本列岛诸国，早在两汉时期就与中国有所交往，东汉光武帝还曾赠其中的“倭奴国”以印绶。到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邪马台国，其国王是一个名叫卑弥呼的单身女子，卑弥呼女王曾多次遣使到曹魏和西晋王朝，双方互有馈赠。大约与邪马台国同时，日本列岛出现另一个较为强大的大和国，大和国曾先后十次遣使到东晋南朝，南朝也曾主动遣使出访，并赠予大和国王荣誉位号。除了官方使节往还外，从西晋时起，中国就有人开始流徙到日本列岛，如晋武帝太康年间，有“吴服师”，即江南地区的裁缝师，经百济到达日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也传播到日本。大约在晋武帝太康时，我国的儒家经典《论语》被带到日本，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大和国又从刘宋请来织匠和裁缝师，不久，大和朝廷又下令本国种桑养蚕，从此日本的蚕桑和丝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1]。

【1】〔日〕井上清：《日本历史》，转引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705—7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二）魏晋南北朝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往来

南海诸国包括今越南、印尼及斯里兰卡、印度等东南亚、南亚一带的国家。从西汉时起，南海诸国就与中国有所往来，到三国以后来往日渐增加，如孙权曾遣使聘问诸国。使节所经过的和听说过的，有百数十国。到刘宋、萧齐时，来往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到萧梁时则其“航海岁至，逾于前代”[2]。这说明南朝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

【2】《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

南海诸国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重要国家，分别是林邑、扶南、河罗单、干陀利、婆利等国。林邑国，又称占婆国，在今越南中南部，东晋南朝时代，占婆国虽因势力扩张，经常与交州刺史发生战争，但双方外交往来也很频繁，据史书记载，从孙吴时起到隋统一之前，林邑国先后二十多次遣使到洛阳或建康访问。由于林邑与中国接壤，故而有很多中国人移居其国内，双

方民间往来十分频繁，大量中国人流入林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因此林邑受到汉文化影响较深。与林邑同处印度支那半岛的另一大国扶南（又称夫南），从东吴时即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在东晋南朝时代，扶南也先后遣使二十多次到中国访问，奉献方物。除此二国之外，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今泰国境内的金邻、顿逊、狼牙修等国，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盘皇、丹丹、盘盘等国，也大多与中国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如盘皇国王曾七次遣使到建康访问，丹丹、盘盘则分别有六次、十次遣使来华。

印尼群岛的国家建立稍晚，主要有今爪哇岛上的诃罗单，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陀利国及今巴厘岛上的婆利国。这些国家从刘宋以后和中国开始有往来。如诃罗单先后五次遣使到刘宋贡献方物。干陀利在宋、齐、梁也先后五次遣使访问。婆利国也曾三次遣使到建康访问。我国东晋时著名旅行家、取经僧法显，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船回国，中途曾在干陀利国停留五个月之久，在那里他受到了干陀利人民的热情款待。这些都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友好往来的明证。每次的使节聘问，双方都以礼物互赠，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而得到加强。

（三）魏晋南北朝与五天竺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五天竺国，主要指今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次大陆国家。东汉时起，今印度境内的国家与中国就有友好往来，魏晋南北朝时代来往更加频繁。如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在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381年），其国王超日王遣使到前秦都城长安访问，并馈赠火浣布等物。东晋时著名的取经僧法显，则在中天竺的都城华氏城（今印度比哈拉邦的巴特拉）住了三年之久，并且写下了著名的《佛国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天竺的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现在了解印度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后宋、齐、梁、陈诸朝都曾有中天竺使节来访。被南朝称作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北魏则称之为南天竺，它与北魏也有频繁的友好往来，在北魏宣武帝统治

时期，笈多王朝曾五次遣使到洛阳，并馈赠骏马、佛牙、金银等珍贵礼物。

南北朝时期，北天竺国家中的犍陀罗国、乌苌国（均在今巴基斯坦），与北魏都有频繁的友好往来。仅宣武帝一朝来使就分别有五次、六次之多；另外，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取经使者宋云，曾到达乌苌国，乌苌国国王进行了隆重招待。这表明两国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北天竺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尼婆罗（即今尼泊尔），三国时中国称之为临儿国。由于这里是佛教圣地，相传释迦牟尼就诞生于此，因此中国的取经僧侣凡去五天竺者，必到这里巡礼（图20）。如东晋法显、唐初玄奘，均曾来过。南北朝时期，尼婆罗国王仅在北魏宣武帝一朝就四次遣使到洛阳馈赠方物。此外，东天竺的盘是国（在今孟加拉国），西天竺的一个国家（名已无考）也都曾遣使访问过平城或洛阳。

图20
十六国供养菩萨（敦煌272窟）

克什米尔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开展得较早，这个地方的罽宾

国，种植五谷，善于编织。在北魏太武帝、文成帝、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先后六次遣使到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访问，有时一年还两次遣使。频繁的友好往来，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锡兰岛的斯里兰卡，因为其国人善于驯养狮子，故中国史书称之为狮子国。东晋取经僧法显，曾在狮子国住过两年，在其《佛国记》里，描写了狮子国的气候时节、都城建筑、人民生活等情况。从其记载来看，中国的白绢扇已作为珍贵商品运销到狮子国了。东晋南朝时期，狮子国多次遣使到中国的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其中佛像、佛经等都在赠送之列。

（四）魏晋南北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西域诸国主要包括今中亚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如大宛、粟特、嚈哒汗国、波斯萨珊王朝以及大秦帝国等。在今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大宛、者古、悉万斤、忸密等国，到隋唐时被称为所谓“昭武九姓”国，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与中国都有友好往来。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王朝，均与这些国家有使节往还。传入中国的不仅有葡萄酒、汗血马等，他们的音乐也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粟特人善于经商，除了民间商人的商贩贸易外，国家间的使节来往也比较多。粟特人前后遣使有十几次之多，双方都有礼品互赠。

被欧洲人称为白匈奴的嚈哒，南朝称为滑国，北朝称为嚈哒。大约到5世纪中叶，嚈哒开始摆脱柔然汗国的役属，逐渐强大起来，到6世纪初，取代大月氏贵霜王朝成为中亚一带的强国。嚈哒人信仰祆教，即拜火教，不信佛法，其社会制度处在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嚈哒汗国与北魏、西魏、北周之间有着频繁的外交往来，仅据正史记载，嚈哒遣使到以上三朝者，即有十五次之多。另外，嚈哒与南朝政权也有交往，仅梁武帝时，就曾三次派使节访问建康。由此可见，嚈哒汗国与南北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

从公元2世纪以来，统治伊朗高原的是安息帝国（帕提亚）。由于长期内乱和对外战争，到公元3世纪初，安息王国开始衰

落。公元226年，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灭亡了安息，从此成为伊朗高原的主宰者。萨珊王朝建都宿利城，在今伊拉克巴格达西南。中国史籍对其社会风俗、物产等都有比较详细记载，如记载宿利城，“城方十里，户十余万，（幼发拉底）河经其城中南流”[1]。宿利城有十几万户，可见其繁华。波斯处在“丝绸之路”上，为发展丝绸贸易，波斯国王不断派遣使节，来到中国。如北魏文成帝、献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及西魏废帝时，波斯使者先后十一次到达洛阳或长安访问，并馈送方物。北魏也曾遣使到波斯，如献文帝拓跋弘时，派韩羊皮出使波斯，韩羊皮回国时，波斯王派使节随其回访[2]。除与北朝之间的交往外，波斯还通过海路与南朝来往，如梁武帝时期，波斯使者先后两次到建康访问。

【1】《北史》卷97《波斯传》。

【2】《魏书》卷102《于阗传》。

罗马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秦国，或称“海西国”。西汉时期，大秦就与中国有外交往还。三国、西晋时，分别有商人、使节到达东吴首都建康及洛阳，双方都有礼物互赠。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所记载的这时候的大秦，已是指首都为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罗马帝国了。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新都洛阳有四夷馆，有商胡集中居住区，在众多四方商贾中，有很多商人即来自大秦。近年考古发掘中，在河北赞皇县北齐李宗妻崔氏墓中，出土了东罗马帝国时代的金币三枚。凡此，均说明中国与大秦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综合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突出的例子是纸张贸易促进了图书出版在世界范围的发展。造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其他国家仍未掌握这项技术，中国的纸张是当时世界上独家经营的商品。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使得纸张流传到世界各地。作为图书文字的载体，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图书编撰出版的范围进一步

扩大。如近代以来，在西域各国的城邦中，经常有这个时期的纸张残片出现，书写内容有公牍、汉文典籍、私人函件，足见纸张在西域地区已十分流行。魏晋以后，纸张更多地为西域少数民族和中亚国家所用，如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西晋至隋朝的古纸中，就书写有多种外国文字，其中有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吐火罗文等，而在叶尔羌地区发现的一批纸写本残卷中，则有笈多天城体文字[1]。凡此，均说明中国纸张的外传，对于丰富图书出版内容和促进世界范围内图书出版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1] 张维华：《中国古代外交关系史》，48—4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二、佛教的传播和影响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其时政府对于汉人出家为僧，还是厉行禁止的。因此那时的佛教虽在中国已有所传播，但毕竟还是有限。及至三国以后，政治动荡、战乱相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信徒因此得以迅速增加。限制人们信教的禁令，也随着汉王朝的垮台而寿终正寝。及至十六国时代，北方动乱不已，佛教传播尤为迅速。后赵时龟兹僧人佛图澄深为石勒、石虎信任，"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朝会之日，和尚开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是以后赵境内，"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2]。佛教几乎成为后赵国教。这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北方的流传。其后的北方其他政权也多推崇佛教。到北魏时期，佛教传播终于盛极一时（图21）。如到公元534年时，佛教徒已有200余万，及至东、西魏分裂到北齐、北周时代，两国僧尼人数已有300万左右，约占当时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唐朝会昌灭佛之前，全国僧尼人数也不过26万，不足北朝的十分之一，北朝佛教之盛况可见一斑。

[2] [梁] 释慧皎：《高僧传》卷9《晋邺中竺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早在孙吴时佛教即在江南传播，到东晋南朝时继续发展。其中由于梁武帝的佞佛，使得佛教在南朝时盛况空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四百八十寺"多数是在梁时所



图21
北魏刻造的云冈石窟大佛

建。南朝君臣、士家大族，佞佛成风。如江南竟陵王萧子良，身为宰相，多次在府中大会僧众，亲自送饭送水，并手抄佛经七十余卷。在其影响带动下，一般百姓也往往"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1]。无论北朝还是南朝，佛教都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势力集团。

佛教的传播，除了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产生重要影响外，对于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编撰出版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个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佛经的翻译，丰富了图书出版的内容。出于传播佛教的需要，佛经的翻译势所必行，因为梵文原著佛经，中国极少人能够看懂，最早的译经者都是异邦僧侣，见诸史籍的第一批来华僧人，是东汉明帝十年（67年），应邀前来洛阳的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在洛阳白马寺编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译本。到东汉末年献帝为止，来华僧人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魏晋以后来华僧人日益增多，魏晋之际的竺法护，为此时期的译经代表性人物。法护本为大月氏人，曾游历西域诸国，西晋时开始专意从事将佛经"写为晋文"的工作[2]。法护"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更译出佛经169部，为佛经翻译作出了重要贡献。后秦时的名僧鸠摩罗什（344—413），于公元401年到达长安。后秦姚兴专门辟出逍遥园作为译经的场所，以鸠摩罗什担任译主，僧肇等百余名僧人协助，专门从事佛经的译写工作。到公元409年鸠摩罗什圆寂，共译出佛经98部、425卷，数量之多，仅次于后来的玄奘，但所译的经、论范围却比玄奘广泛（图22）。

随着译经事业的开展，许多中国僧侣也纷纷加入译经的行列。魏晋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重要时期，其间外国来华及中国本土僧侣从事佛经翻译者很多，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得到所在政府

【1】范缜《神灭论》。

【2】《高僧传》卷1《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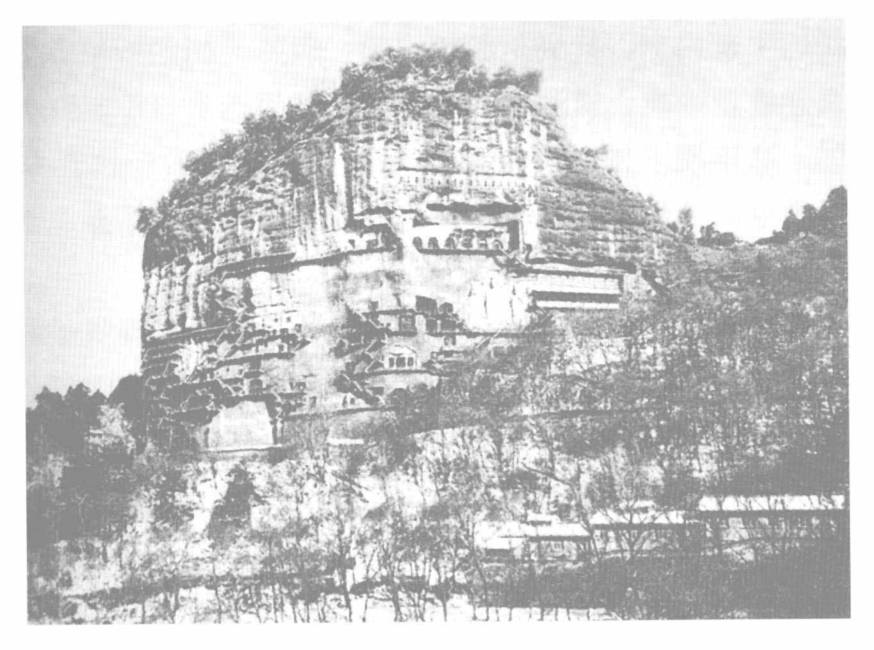


图22
麦积山石窟全景

的支持，因而所翻译出来的佛教典籍更加系统，无论是大、小乘，还是经、律、论，大体都翻译了过来。仅据唐代僧人智昇《开元释教录》所载，从三国以来至北周、北齐为止，包括十六国时期在内，各朝译经者合起来有118人，所译佛经共有1 621部、4 180卷。尤需指出的是，此时佛经翻译，并不仅限于由胡、梵文译为汉文，亦有汉著译为外国文字者。如北魏僧人昙谟最所著《大乘义章》，胡僧菩提流支读后，大加赞叹，遂译为胡书，传之西域[1]。再如北齐人刘世清通晓四夷诸语，后主高纬命其将《涅槃经》译为突厥语以赐突厥可汗，并令中书侍郎李德林为之作序[2]。（图23）

无论是梵文译为汉文，还是将汉语译为胡书，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也丰富了当时图书编撰出版的内容。

其二，佛经的传播及译经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本土僧侣的撰著。这也从某个方面丰富了图书出版的内容。随着译经事业的持续进行，中国本土僧侣在参与、协助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也开始独立撰著，为后来佛教的中国化及佛教宗派在唐时的形成

【1】《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唐］李百药：《北齐书》卷20《斛律羌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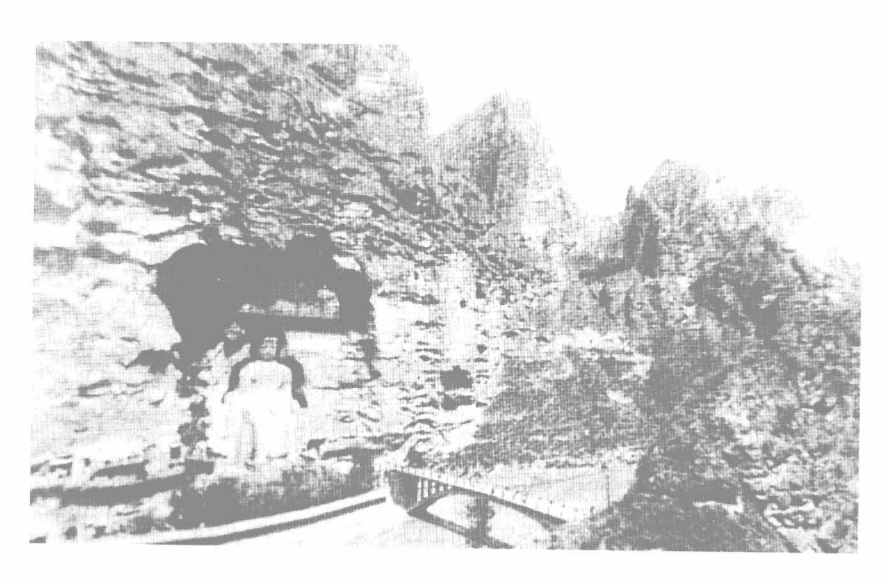


图23
炳灵寺石窟全景

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三论宗的奠基人僧肇，本为鸠摩罗什的弟子，在协助其师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也开始独立撰著。其著作主要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三论从哲学体系来看，虽仍使用一些玄学家习用的词汇，但实际上已是佛教哲学著作。再如竺道生，彭城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为鸠摩罗什座下四大弟子之首，一生著述甚多，如《维摩经义疏》、《泥洹经义疏》、《法身无色论》、《维摩诘经法》等，但这些著作今天大都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妙法莲华经疏》两卷。类似僧肇、道生这样的僧人很多。他们能够独立撰著，一方面表明中国本土僧人在佛教经义理论的探讨上，佛学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对于丰富当时图书编撰出版的内容，也有积极意义。中国僧侣除独立撰著外，还对已经翻译成汉文的佛经进行注疏。从释道安以后，对佛经的注疏日渐增多，这也成为其时图书编撰出版的一项新内容。

另外，由于佛教的广泛流传和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在民众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信仰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和皈依，人们除了建塔造像之外（图24），或抄写佛经，或为禅师树立碑文。至于一些贵族和有钱人家，他们有时用不着自己亲自抄写，而是雇人抄经，结果社会上出现一批靠抄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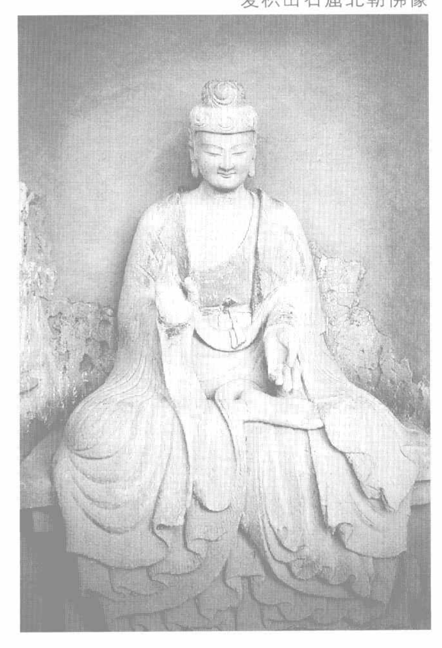
为生的人。因此，佛教经典或与佛教有所相关的文章典籍，一时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中的荦荦大者。如刘慧斐“少博学，能属文，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1]。这是佛教信徒自己动手抄写佛经。又如陈时姚察，幼年即从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提戒，及入仕陈朝，所得俸禄都用于建塔造寺，并亲为禅师撰写碑文。史言姚察谙熟于佛典，故所撰众塔及众僧文章，无不绮密遒丽[2]。这是以僧侣、塔寺为题材撰写文章。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开府聚士，抄写五经及佛教经典，自然多数情况下都用不着自己亲自动笔。再如陈时徐孝克，陈后主曾将石头津税收赐给了他，但徐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3]，这也是雇人抄写佛经。又据《陈书》卷36《始兴王叔陵传》载：叔陵母彭氏死，叔陵“初丧之日，伪为哀毁，自称刺血写《涅槃》经……”表明其时已有为死者抄写佛经以超度亡魂的社会习俗。(图25)



图24
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1】《南史》卷76《隐逸下·刘慧斐传》。
【2】《陈书》卷27《姚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3】《陈书》卷26《徐陵传附弟徐孝克传》。

图25
麦积山石窟北朝佛像



其三，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流行，西方绘画艺术也大量传入中国（图26）。这也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的内容。据文献记载，东汉明帝时所建佛寺中，就已经有了佛教壁画，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画已在中国大行其道，中亚地区与今印度半岛的绘画技法也开始为中国画家借鉴、吸收。如南朝画家张僧繇即善画寺院壁画，其笔法即颇受印度技法的影响，史言其“殊方夷夏，实参其妙”。他以前的中国画画面多是线条型，凹凸不易显示，在吸取了天竺的晕染法后，就增添了画面的立体感，据载，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新建一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



图26
敦煌莫高窟西魏壁画

【1】许嵩：《建康实录》卷17《梁高祖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6。

如凹凸，就视即平"[1]。时人因称之为凹凸寺。晕染法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颇大，以后便成为中国画的基本技法之一。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外国绘画技法完全是由于佛教的流传而进入中国，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当时采取印度画技的壁画或图画中，绝大多数是为佛经或寺院所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佛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外国绘画技法在中国的流行。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注疏的盛行及西方绘画技法为中国画家所使用，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这个时期图书出版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概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迭，社会比较动荡，然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冲破了两汉时儒学定于一尊的束缚，社会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的宇宙本体论、佛教的思辨哲学、道教的养生之学、范缜的无神论等等学说，纷繁并呈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史学、文学、艺术和科技等领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各种新体裁、新内容的作品不断涌现。这些

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上的创造，都为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提供了精彩和丰富的著作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当时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文化，这不仅有利于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也使汉民族吸收了不少新鲜血液，大大增强了以汉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为出版事业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流通的许多有利条件。而此期频繁的中外交流，也为图书出版事业注入了新的思想文化内容，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从而推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阶段性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思想文化的进步，此期出版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几个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三国两晋时期（220—316年）是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前，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国家收藏的图书“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1]。政府原来建立的图书编纂出版机构瘫痪，士人或家破人亡，或逃避山林。然而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社会稍趋安定，魏、蜀、吴三国就迅速恢复、开展了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在编纂出版机构方面，三国西晋时的秘书监开始脱离中书机构而成为专门司掌典籍、艺文的独立官署。为了加强图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曹魏时还加强了自东汉时就出现的著作郎制度，设置了佐著作郎。到了西晋，著作郎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机构——著作局，并设有著作郎、佐著作郎、著作令史等一系列官职[2]。

著作机构加强促进了图书编撰出版工作。曹魏时秘书郎郑默编制国家书目《中经》14卷，记载了当时国家收藏的大批图书。西晋时秘书监荀勖编撰国家书目《中经新簿》，著录当时的图书1 885部，20 935卷，这些整理出来的图书被“盛以缥囊，书以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晋书》卷24《职官志》。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序》。

缃素"[1]，即用浅黄色的丝织品来书写，成为国家图书的精品。政府还开展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和复制活动，如曹魏正始年间镌刻三体石经，西晋整理出汲冢竹书中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汲冢琐经》等15部著作，使这些重要典籍得以流传。

此期公家、私家也编纂了大批新著，新体裁、新作品大量涌现。第一部大型类书《皇览》在曹魏时问世。曹丕的《典论·文论》、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著作。当然，文学著作方面还有在曹操父子（"三曹"）及"建安七子"影响下产生的大批诗文作品。史学上，除了当时三国史家新撰的本国史外，最著名的要数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的《续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科技著作方面，较突出的则有曹魏时数学家刘徽的《海岛算经》、西晋名医王叔和的《脉经》和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佛经的翻译在三国西晋时也成就显著。仅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三国时翻译的佛经就有201部，435卷；西晋时译出的各种经、律、论、集、传则达333部。随着道教传播的广泛，此期也出现了《三皇经》、《灵宝经》等一批新的道教经书。

三国时期，书籍的材料还处于纸、简、帛并行时期。然而，纸的制造技术和使用相比东汉已得到进一步改进和推广，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到了西晋，造纸的材料有大的突破，出现了用藤造的纸[2]，纸写本进一步流行。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不断发掘西晋时期的纸写本遗物，六七十年代，又发掘到写于西晋泰始九年（273年）的标有确切年代的纸写本[3]，说明了纸写本使用范围的广泛。此外，三国西晋时期，我国出版的图书还流传到国外。西晋时，《论语》已经流传到日本。上述情况，都表明出版事业在三国西晋这一阶段由恢复到迅速发展的特点。

【2】［西晋］张华：《博物志》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

【3】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

第二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事业的缓慢发展和过渡阶段。西晋后期，自发生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后，中国北部的匈奴族首领刘聪又率兵攻陷了洛阳、长安，西晋灭亡。"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4]。

【4】《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序》。

国家藏书与出版机构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到东晋初李充整理国家藏书，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国家藏书已锐减为3 014卷。东晋时期，由于国家偏处南方，国力削减，后期又有桓玄的起兵割据和篡位，有孙恩、卢循相继而起的农民起义；北方则由于十六国长期征战，政局混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导致东晋十六国阶段的出版事业未能在已有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转入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

在图书编纂出版机构方面，东晋政权沿袭了西晋的秘书监、著作局等官署的建制，十六国政权也都有了著作官制度。这些机构的设置，保障了出版工作的延续。从各类著作的编纂出版来看，东晋十六国阶段的出版工作仍然保持了进展的态势。比如史书方面，东晋有多部公修私撰《晋书》的出版，也出现了《华阳国志》这部重要的地方史以及谱学著作《姓氏簿状》；而在北方则有十六国多部关于本国史的史著。文学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为当时诗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医学方面，东晋葛洪著《肘后卒急方》，收集了当时大批切于实用的医方。在艺术方面，则有东晋顾恺之、卫协等画家的人物画，以及王羲之父子书法的流行。佛经的翻译出版和道经的出版，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则比前阶段更为兴盛。由于译经的丰富，东晋释道安编纂了第一部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东晋法显则撰写了著名的佛教游记《佛国记》。道教由于葛洪、杨羲等高道的传播，使《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等大批道经广泛地流传。

东晋十六国阶段的出版物材料进一步显示了以纸为主、竹帛为辅的特点，特别是在南方的东晋地区，以藤为主要原料的造纸技术不断提高，东晋末年桓玄当政时，已下令要以纸代替竹简作为出版物书写材料了。

第三阶段：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是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发展的高峰阶段。南北朝阶段，社会局势逐步趋向稳定，南朝虽然迭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但是凭借东晋以来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图书出版事业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技术的

保障。北朝的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由于统治者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重视文化事业，又注意向南方搜求图书资源，所以北朝的图书出版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

在出版管理机构方面，南朝基本保持了西晋时期秘书监与著作局的设置，而北朝出版管理机构却更为发达。北魏为了加强图书的收集和国史编撰，新增了集书省，北齐甚至还设立了称为“史阁”的史馆。此外，从北魏开始，还出现了监修史书制度，这种制度为北齐、北周所继承。刘知几说：“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1] 北朝的史馆与亲贵大臣兼修史书制度，成为官府修史制度之滥觞。

【1】[唐]刘知几：《史通》卷11《史官建制》，北京，中华书局，1984。

南北朝时期，纸的使用已经非常普及，并逐渐形成了纸写本的特殊装帧方式——卷轴装。从敦煌发现的经卷可以反映南北朝纸写本的抄写和制作模式。此期纸张的加工工艺技术也迅速提高。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关于纸的修潢加工、以防腐蛀的方法。对于纸写本图书的装裱保护工艺也不断进行了改进。唐朝张怀瑾说刘宋孝武帝让人将藏书重新装裱，最长的卷轴达到二十尺。

纸写本的日益推广，为图书出版流行提供了很多方便。南北朝阶段的图书出版数量剧增，并为后代留下许多名著。史学如《宋书》、《南齐书》、《魏书》，文学如《世说新语》、《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科技如贾思勰《齐民要术》、祖冲之《大明历》，名家名著真是不胜枚举。佛经、道经的流传更为丰富，此期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南朝孟法师的《玉纬七部经目录》记载了佛经、道经的繁富。按文献记载，当时社会上出版流行的图书达十多万卷[2]。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序》记载隋朝承继北周藏书共15000卷；《通鉴》卷165《梁纪》22记梁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攻入江陵，“帝（梁元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宝善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

由于图书出版数量的剧增，这一阶段图书流通数量也大大增加。南北方分别出现了建康、洛阳两大图书发行流通中心，南北朝的图书还有许多流传到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甚至外国。如当时附属南北朝的高句丽，就流行着“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图书[3]；百济国则曾向刘宋求得《易林》、《式占》、

【3】《北史》卷94《高丽传》。

《元嘉历》等图书；陈朝天嘉六年（565年），陈文帝派使者到新罗，带去佛经1 700卷。此期的日本则通过百济得到中国的图书。梁武帝时，百济人段杨尔将《诗》、《书》、《易》、《礼》、《春秋》传入日本。总之，这一阶段图书的出版数量和流传规模达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峰。

二、出版事业进步的区域性特征

出版物既是一种精神产品，又是一种物质产品。因而，出版事业的发展，既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又需要有足够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济文化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出版事业的进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区域性特征。

首先，一些曾经作为国都的城市，由于人文荟萃，又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出版业发达的地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北对峙的建康（今南京）和洛阳两大都市。建康是南方最有代表性的出版中心。从三国时期开始，建康就先后成为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等六朝都城，是六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无论是图书的编纂，还是抄录、发行都比较发达。建康依傍长江，又有通商之利，平日“贡使商旅，方舟万计”[1]。都城内有许多市场，秦淮河两岸更是遍布大市、小市[2]，商品经济繁荣，书业非常兴盛，大约在城南的朱雀桥边，书肆比较集中。比如，南齐时名儒姚方兴就在朱雀桥书肆购得寻访已久的《尚书·舜典》篇，“始列国学”[3]。梁朝学者傅昭幼时贫寒，曾“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4]，又可见朱雀桥一带书肆贩书品种之丰富。当然，建康也不止朱雀桥一带有书肆，其他市廛也有不少贩卖图书的地方。南齐时江夏王萧锋想要博览群书，于是“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5]。期月之间，就能收集社会上流通的图书，说明当时的建康确实是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中心。

与建康可以相比的是北方的洛阳。洛阳自魏晋到北朝，也多次被立为国都。文人学者云集于此，许多传世的名著名篇也在此

【1】《宋书》卷33《五行志四》。

【2】《隋书》卷24《食货志》。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

【4】《梁书》卷26《傅昭传》。

【5】《南史》卷43《江夏王萧锋传》。

产生。比如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左思《三都赋》、曹丕命群臣编纂的《皇览》等等。洛阳还是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虽不比南方的建康繁华，但当时城内外也有二百多里坊，居民十万九千多户，南来北往、甚至外国的商旅很多。《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的书肆在东汉以来就很兴盛，到北朝时，北魏的崔鸿父子为撰写《十六国春秋》就充分利用洛阳书肆，访购诸国旧史，完成了这部重要的编年体史著[1]。北魏秘书监常景雅好藏书，尤其"对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2]。他依靠洛阳发达的出版业，丰富了自己的藏书。

【1】《魏书》卷67《崔鸿传》。

【2】《魏书》卷82《常景传》。

除了建康、洛阳，曾经作为都城的成都、邺城，当时的出版业相对其他地区也比较进步。成都曾经是三国时蜀汉、十六国时成汉的都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聚书篇》曾经描写他派人在四川成都一带买书、写书的情形，说明成都的图书出版业也有一定的基础，图书流通较多。北方的邺城是北朝的大城市，又是东魏、北齐的都城，图书出版、发行很繁荣。南朝出版的图书经过长途贩运，也在这里流通。《北史·祖珽传》记载有书贩在邺城出售梁朝出版的类书《华林遍略》，东魏的大将军高澄以观书为由，"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盗抄了这部类书。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另一方面的地域性特征还表现在，从总体而言，南方的出版业比北方发达。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南方历朝政权收藏的图书数量远比北朝各代政府收藏的图书多。其中最突出的是梁元帝时国家藏书多达14万卷。这其中固然有承继前朝留存的图书，但更多的应是当时依靠图书出版业所生产的新本、复本。而按照文献记载，北朝的国家藏书最多也不过万卷。其二，南方图书出版业比较发达，图书流通繁荣的地区也比北方多。除了上述建康、成都两地外，南方书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还有荆州、江陵、寿春、襄阳等处。其三，南方发达的造纸业为图书出版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

的制造技术不断进步，在原料方面，除了原有的麻、楮皮之外，更多地利用了桑皮、藤皮来造纸。由于原料更为广泛，因此纸的成本大大降低，产量也不断增加。到南北朝时期，纸张的运用已经开始普及。西晋张华在《博物志》里说："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说明在公元3世纪时南方的剡溪（今浙江嵊县）已开始生产藤纸。东晋范宁认为："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1]可见当时藤纸的质量较高，并且已普遍适用于公私之间了。藤纸不仅在剡溪生产，当时浙江的余杭、衢州、婺州亦生产藤纸。此外，南方的荆州、湖州、蜀中也是造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出为荆州刺史，曾"上武帝纸万幅，又奉简文红笺五千番"[2]；梁朝阮孝绪之父阮彦为湖州从事，孝绪随父之任，"不书南纸，以成父之清"[3]；梁朝陆倕有答谢安成王（梁武帝之弟萧秀）赐西蜀纸之启；这些材料都说明了梁朝时荆州、湖州、蜀中造纸业的情况。总之，南方是魏晋南北朝造纸业的集中地区，高质量和数量丰富的纸张保证了南方出版业有较优于北方的进步。

【1】《太平御览》卷605引范宁语。

【2】[元]鲜于枢:《笺纸谱》引。

【3】[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上海,中华书局,1936。

三、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规模

对魏晋南北朝出版规模和成就的估计，自然要有一个量化的尺度。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散失，又因为当时所有的出版物不可能被世人所熟知和著录下来，因此对于此期出版物数量的评估，虽然是量化的，然而实际上也只能是一个大致接近于事实的数字。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认识此期出版事业的发展水平时有一个基本的印象，有一个可供定位的参照值。

魏晋南北朝不断进步的出版事业为当时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出版物，其中主要的出版物是图书。此期流传下来的一些国家藏书目录，除了反映对前朝藏书的一些继承外，在很大程度上著录了当时出版的图书。

比如，西晋荀勖编撰《中经新簿》著录所藏典籍（包括佛经）1 885部，29 945卷。刘宋元嘉八年（431年）由谢灵运等撰

的《宋元嘉八年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 564部，14 582卷。刘宋元徽元年（473年），由王俭编撰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著录图书2 020部，15 074卷。南齐永明元年（483年），由王亮等编撰的《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2 332部，18 010卷。萧梁天监四年（505年），由刘孝标等编撰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著录图书2 968部，23 106卷。当然，还有其他政权所编的一些政府藏书目录，但因文献散佚不能流传下来，或不能了解其记载情况。不过，从以上几种主要书目，可以看到当时图书出版流传的一些情形。比如，南朝几代的书目因只反映南方政权的图书保藏情况，在卷数上自然不如西晋统一政权时编纂的《中经新簿》多，但南朝的几部书目反映了当时图书出版流传逐步增长的一种趋势。

除政府藏书目录反映当时图书流传外，一些史书也记载了图书出版流通的情况。比如，据《续晋阳秋》所记，东晋孝武帝时，曾"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1]。这说明东晋时图书的出版发行恢复发展很快，在短时间内，中央图书收藏就从初期《晋元帝四部书目》记载的3 014卷扩充了10倍。又如《北齐书·颜之推传》引用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曰："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这段材料反映了南朝萧梁藏书8万卷的数量以及当时图书出版多有复本的情况。然而，按照《通鉴》的记载，梁朝元帝时收藏的图书则要比8万卷还多得多。《通鉴》卷165《梁纪》21记梁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攻入江陵，"(梁元）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此外，《隋书·经籍志》的总序中，提到北周整理藏书"方盈万卷"，后又说北齐藏书"五千"，所以北周藏书至少有15 000卷。

又有一些清人或近人编撰的补史目录，通过史传记载，来看某个朝代著述出版的情况。如清代姚振宗撰《三国艺文志》，就著录三国时的著作1 010部，5 170卷。清代文廷式撰《补晋书艺文志》著录两晋著作2 268部，14 222卷。近人徐崇撰《补南北史

【1】[宋]王应麟：《玉海》卷52引，大华书店。

艺文志》著录南北朝著作1 268部，20 543卷。

上述是以往文献对于魏晋南北朝出版规模的一些记载，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做出以下大致的归纳：第一，《通鉴》卷165所述梁朝图书14万卷是反映当时图书出版流通数量最大的一个数字，从梁朝图书出版多制复本的做法而言，这个数字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这个数字还未包括北朝的及当时社会上出版流通的图书，故此期出版的图书至少有20万卷。第二，西晋《中经新簿》记西晋初图书1 885部，这可以看作是三国末社会上流通图书最基本的种数，如再加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所记两晋编撰出版的图书2 268部，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所记南北朝编撰出版的图书1 268部，则有约6千种。这样，仅以图书而言，魏晋南北朝的出版规模则至少有6千种、20万卷。这是对这一时期出版事业，及其所取得成就的一个基本的估计。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力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提高，民族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都为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支持。除了这些因素外，图书出版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有较为长足的发展，与秘书监著作郎等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的成立，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的成立和完善，反映了国家对图书典籍的重视，促进了图书编撰出版事业的发展。尽管它们的主要职能还在于职官、政治，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专职出版机构。但仍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编撰出版机构、职官的出现，对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下试分几个阶段，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加以论述。

第一节　三国时期的秘书监、著作郎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秘书监一职的设置，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设有秘书监一人，职掌图书保管及古今文字，并负责考订古今图书在

文字方面的异同。因其所典掌的图书文字都具有一定的保密性，故而称为“秘书”。其时之秘书监，还不是独立机构，其上级领导机关为太常，职能与东汉时期的东观类似，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主要是收藏东汉国家的藏书，与现时政治之间似无直接关系。其后，秘书监一职曾一度废罢，大概是由于桓灵时期政治腐败，国家政局动荡不宁，已无暇于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秘书监的再次恢复设置，则已经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其时三国鼎立已初现端倪。是年，曹操任魏王，在王府内设置秘书监一职，刘放、孙资为秘书郎，负责机要命令的撰拟。曹操恢复秘书监一职，主要目的当然不在于收集整理或保管图书典籍，而是以秘书监“典尚书奏事”，即由秘书监典掌尚书府文书，并撰拟机要命令，夺取了尚书的出令权，从而控制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的秘书监职能相当于后世的中书机构，是以杜佑认为此时之秘书监，“即中书令之任”[1]。因此，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所恢复的秘书监，其功能主要是通过秘书监“典尚书奏事”的方式，控制政治决策中枢。当然秘书监也典掌图书典籍，但那只是其附带职掌。很明显，这时候的秘书监仍不是专职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秘书监的名称、职掌一仍其旧，只是将刘放、孙资所任之秘书郎改名为秘书左丞、右丞。同年十月，曹丕代汉建魏，改元黄初(220年)。魏朝建立后，曹丕下令改秘书为中书监，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二人各加给事中。这样，刘、孙二人正式成为中书机构的首长，职掌中央中枢决策文书。中书监已成为曹魏中枢决策机构。这时候如果仍由它负责图书典籍的管理收藏，显然已经不太合适。因为就重要性来讲，后者显然不及前者重要、机密。因此，成立新的机构负责图书、秘记的保管，已成为现实的问题。

就在改秘书监为中书监的同时，曹丕又新成立了秘书监，“掌艺文图籍之事”[2]，专职负责典籍的收集保管工作。由于新置

【1】《通典》卷26《职官八·秘书监》。

【2】《通典》卷26《职官八》。

秘书监，与政治决策基本无涉而专职负责图书典籍，因此，可以认为曹丕新设之秘书监，才基本算得上专职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不过，这时候的秘书监，还未成为独立职官机构，而隶属少府。其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大约在魏明帝景初（237—239年）前后，时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1]。王肃认为魏秘书之职，即东汉时期的东观，不宜仍隶属少府，此事载《初学记》卷12秘书监条：“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从此秘书监就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

[1]《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子肃传》。

以上只是对曹魏秘书监设置、变化等情况的大致概述。欲明了其具体职掌，还必须对其组织机构、组成人员作一叙述。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初置秘书监时，置令丞各一人，主要职掌为“典尚书奏事”，其中秘书令为秘书长官，丞为长官助手。有迹象表明，起先可能只有一丞，直到魏文帝黄初年间才有左、右丞之分。据《通典》卷26《职官八》秘书丞条注：“文帝（曹丕）征何桢，至为秘书郎，月余，桢因事，帝令问外曰：‘吾本用桢为丞，何故为郎？’按主者罪，遂改为丞。时秘书旧丞尚未转，乃以桢为右丞。”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秘书丞原本只有一人，魏文帝曹丕本来欲用何桢为丞，“主者”却用为郎，文帝认为未尽其才，故而治“主者”罪后，将何桢由秘书郎改为秘书丞。由于原秘书丞并未迁转，故而只好任命何祯为右丞。又《三国志》卷21《刘劭传》注引《庐江何氏家传》，明帝时有谯人胡康，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帝以问秘书丞何桢“康才何如？”则何桢所任为秘书丞，或者即秘书右丞的省称。这样，秘书监就由一丞，增加为左、右二丞。秘书监除令、丞为长官、副贰之外，尚有秘书郎、秘书校书郎等职。秘书郎一职，在东汉时，主要是在东观典校图书。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设秘书监时，即有秘书郎一职，时刘放为郎。据《通典》，西晋时秘书郎的职掌为“掌中外三阁经书，校阅脱误”[2]，知曹操所设秘书郎及曹魏秘书郎职掌与此类似，由于秘书监长官主要参与中枢决策，故而

[2]《通典》卷26《职官八》“秘书郎”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其附带管理图书典籍的任务，具体就由秘书郎负责。至于秘书郎员数，《宋书·百官志》云“郎四人”，《南齐书·百官志》则云“不著员数”，《通典》云“(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看来，秘书郎有定员四人，在西晋时是不成问题的。《宋志》言有郎四人，说的可能是晋之定员，《南齐书》言“不著员数”，则未敢肯定。如所周知，任何职官机构从产生到成熟都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三国时期的秘书郎，起初并无固定员数，但随着其职能的发展，秘书郎员数逐步相对固定。到晋武帝时，终于定员四人，此后南朝也基本以此为准。秘书校书郎一职，两汉均有设置，属兰台、东观属官，西汉兰台及东汉东观，既是藏书地方，也是著述的场所。校书郎一职，主要就是在兰台或东观负责校雠图书。两汉校书郎，人员组成似也不确定，如“后于兰台置令使十八人（注：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可见组成人员并不固定，他官亦可临时充任。正由于此两汉校书郎名称似不确定，即“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1]。曹魏时正式定名为秘书校书郎，职掌当与两汉时类似，主要负责图籍的整理校订。

【1】《通典》卷26《职官八》，“秘书郎”条。

曹魏时秘书监，主要是负责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及保管、复制，作用性质与西汉兰台、东汉东观基本相同，属于国家文化事业机关，可以视为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由于秘书监所从事的职业对文化素养要求较高，因此能够到秘书监任职者，多为博学多识之士。如曾任职于秘书监的王肃、刘放、杜挚、薛夏等人，均为饱学宿儒。是以，任职于秘书监所代表的崇高荣誉，仍为世人所瞩目。

尽管由于中书的崛起，使得秘书监远离了权力中枢，但仍无法完全脱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据《三国志》卷2《文帝纪》：黄初三年十月，魏文帝曹丕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诏书，令曰：“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这表明曹魏秘书监仍负有保管国家诏敕政令副本的职责。在这一点上，它与尚

书、三公府的政治职能是一样的。再则，秘书监所负责的修撰、校正图书的职能，正是先秦时代史官政治职能的演变，与国家政治本来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也正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故而才有王肃上表论争秘书监官员的政治待遇（地位），《通典》卷26“秘书郎”条注引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王肃上表认为应提高秘书监的地位，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秘书监官员政治地位的高低，是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重视与否的一个体现，可以反映“陛下崇儒术之盛旨”。

【1】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等文。阎氏：《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除秘书监外，还要提到著作郎。作为专职的著作官员，著作郎、佐著作郎（刘宋以后改为著作佐郎）也是国家出版编撰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郎一职，东汉时已有设置，其时国家图书尽在东观，故而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称为著作东观。当时入东观著作者，都是以他官兼领。如班固、傅毅著作东观时的职官为兰台令史，陈宗则以睢阳令，尹敏以长陵令，孟异、杨彪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入东观著作。可见，这时的著作官还未成为专门的职官，专职的著作机构尚未成立。曹魏初年仍未见专职的著作机构出现，其国家编撰机构一直由秘书监独力承担。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始置著作郎官一人，负责国史修撰，其上级领导机构则为中书省。从现有史料来看，这时的著作郎官仍是由他官兼领，如卫觊以侍中尚书之职受诏典掌著作。这种他官兼领著作官的做法，甚至一直延续到曹魏末年。如应璩在曹爽秉政期间，也是以侍中典掌著作[2]。那么，曹魏时期的著作官员与东汉时是否完全相同呢？我们认为，在以他官兼领而无独立职官机构这一点上，曹魏与东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曹魏的著作郎官职掌更为明确，即专门负责国史的修撰，这是著作郎官走向专职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

【2】《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应璩传》注引《文章叙录》。

除著作郎以外，曹魏还设置佐著作郎，刘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乃是著作郎的佐助副贰，主要协助著作郎工作。据《初学记》卷12“著作郎”条云：“著作佐郎，魏置，掌贰著作，佐郎修国史，（与著作郎）初俱隶中书，谓之中书著作佐郎。”可见，著作郎与佐著作郎为曹魏时著作郎官，由于隶属中书省，故而又称中书著作郎、中书著作佐郎。虽同为著作官员，著作郎与佐著作郎的工作却各有侧重。据《通典》卷21《职官三·中书省·史官》，著作郎主要负责撰写，而佐郎则“主广采博访”，主要负责收集史料，提供给著作郎作为撰写依据。著作郎与佐郎之间的这种分工合作，协调行动，有效地保证了修撰工作的质量。佐著作郎员数，西晋时八人，估计曹魏时也有八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曹魏已设有秘书监典掌图书文籍，为何又要设置著作官员？据《初学记》卷12“著作郎”条：“魏晋之际，中书兼国史之职，史官在焉。故魏代王沈为中书著作郎。”因此我们认为，虽然秘书监与著作官所掌之事均与著作图籍有关，但侧重点不同，中书兼修国史，具体承办人就是它属下的著作郎官，由于它专修国史，故而朝着专职史官的方向发展。而秘书监则重在典掌其他图书及诏敕政令等副本的收藏、复制、保管诸事宜，因此，与著作郎相比，其与现实政治依然保持着更多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强证。据《三国志》卷27《王昶传》注引《别传》：任嘏，字昭先，“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同书卷15《司马朗传》载：司马朗曾上复五等爵等建议，裴注引《魏书》曰：“文帝善朗论，命秘书录其文。”凡此均可见，臣下行状及奏书文集等，秘书监均有复制、收藏、保管之责，而且常常是奉君主诏令行事。

同时期的吴、蜀两国，由于相关的史料较少，情况不甚明了。但根据情理推测，也应该有类似职官设置，特别是孙吴，职官设置与曹魏存在更多的相似性。先说蜀汉，蜀先主刘备，从小

【1】《三国志》卷32《先主传》。

【2】《三国志》卷40《彭羕传》。

"不甚乐读书"[1]，彭羕也曾讥骂其为"老革"[2]。然实际刘备对于经学还是知其一二的，如他早年曾追随名儒卢植，在徐州时也曾向郑玄问学。而在入蜀以后，更是表现出对儒学的重视。对于"耆宿学士"备加礼敬，并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官，职掌文化教育。有记载表明，刘备对于图书文籍的收集整理也颇为重视。据《三国志》卷42《许慈传》："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据同卷诸传，时来敏为典学校尉，孟光为议郎。另外，谯周在诸葛亮时曾任劝学从事，"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因此，蜀国的图书编撰应由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劝学（典学）从事等文化教育机构承担。

另外，蜀汉也设有秘书监之类机构，《三国志》卷42《孟光传》有云："后进文士秘书郎郤正数从（孟）光谘访，光问正太子所习读并其情性好尚……"同卷《郤正传》："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郤正传》所载，不但有秘书机构，而且职官设置次序井然，有秘书吏、秘书令使、秘书郎、秘书令四个级别，从郤正所习均与图书有关，似可推知，蜀汉的秘书机构也参与了图书文籍的管理收集等工作。因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蜀汉的著作官员包括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文化教育官员及以秘书令为首长的秘书诸职，这些机构也是蜀汉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

东吴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这首先与孙吴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图书典籍的编撰整理收集有很大关系。如孙权就非常重视史学，他除了注重对吴国国史的编撰外，对于继承人和部属臣僚读书学史，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再如孙休，少年时代即从射慈、盛冲等人受学，即位不久即下诏兴

学，史言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1]。除了统治者重视这一因素外，孙吴能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取得较大成就，还与孙吴的图书编撰机构设置比较完备有一定关系。东吴职官设置与图书典籍编撰出版有关者，有秘府中书郎、太史令、东观令、左右国史等。

据《三国志》卷65《华覈传》载，华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这是秘府郎。秘府郎人选以“文学”充当，因此当与图书文籍有关，秘府郎是秘府中书郎的简称。《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右国史华覈上疏，其中有云“大皇帝（孙权）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太史令的职掌是修撰国史。此外，东吴还设东观令、丞。《三国志》卷65《华覈传》说华氏“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据《晋书》卷58《周处传》说周处“仕吴为东观左丞。孙皓末，为无难督”。东观令一职的设置，明显是沿袭东汉的做法，不但名称未作改变，就连职掌也基本相同。孙吴的东观不仅有东观令，而且有东观左丞一职，而根据其时职官设置一般规律，既有左丞，也应当设有右丞一职，至于令、丞之间，则是长贰的关系。又据《三国志》卷60《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曰：“牧之在濡须，深以进取可图，而不敢陈其策，与侍中东观令朱育宴，慨然叹息……”朱育官职是“侍中东观令”，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的特点，“侍中”为加官，看来孙吴的东观令有时还可以加侍中参与中枢决策，这说明东观令一职在政治上也相当有地位。东吴的左右国史主要是为修撰吴国国史《吴书》而设置。从孙权末年至孙皓时，先后参与《吴书》修撰者有丁孚、项峻、韦昭（即韦曜，陈寿修《三国志》时，为避司马昭讳，而改为曜）、华覈、薛莹、周昭、梁广等人[2]。以上诸人或亡或黜，历久未成，最后实际由韦昭独自完成，但仍剩下述、赞等部分未就，韦昭即因事下狱被杀。其中韦昭、华覈、薛莹诸人，曾任左、右国史之职。有材料表明，左、右国史似不能独立成职，而一般用作加官，如韦昭在孙亮统治时期奉命修撰《吴书》，时官

【1】《三国志》卷48《孙休传》。

【2】《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

太史令；孙休即位后，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孙皓即位后，“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1]。华覈，“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其余诸人，在参与修《吴书》时，也都有不同官职。因此，左、右国史之职，当是领官或兼官。

【1】《三国志》卷65《韦曜传》。

以上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有关图书编撰出版机构设置的情况。应当指出，无论是曹魏的秘书监、著作郎官，还是蜀汉、孙吴的儒林校尉、东观令、太史令等官职，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它们还承担文化典籍事业之外的其他政治职能，有些机构、职官在某些特定时候，政治职能还远大于其在文教方面的职能。它们所负责保管、收集或整理的图书秘籍，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国家发布的诏敕政令，从而与现实政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从职官隶属关系来看，这些机构也很难完全摆脱与政治的干系。如著作郎一职，就隶属于中书省，中书机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央政治决策的核心所在。至如以秘书著作官员带侍中之类的加官以参与政治决策的情况，也可表明这些官员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另外，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本身也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教化从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施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统治者对于图书的编撰出版传播，始终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和兴趣，这样就必然考虑设置相关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三国时期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尽管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职编撰出版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分工的日趋细致化、专职化，三国时期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也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两晋时期国家编撰出版机构较之三国时期更为完备、成熟，正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秘书监、著作局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三国时期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是二者的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更加靠近。如著作官员脱离中书而隶属于秘书，专职掌修国史，成为专职史官。与此同时，它们与政治决策的距离愈加疏远，但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其次，无论秘书监还是著作官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秘书、著作官员已有固定朝服。另外，著作官员已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且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这也是它走向独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两晋时期专职编撰机构——秘书监与著作局

图27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秘书监在西晋武帝（图27）时期，曾一度并入中书省，但所领秘书著作等职掌不变。即《晋书》卷24《职官志》云：“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入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晋武帝并秘书监入中书省，是在何时？据《晋书》卷3《武帝纪》，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七月，曾对职官机构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省并，时“罢五官左右中郎、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秘书监就是在这次职官调整中被并入中书省的。秘书监、著作郎重新并入中书省，乃是秘书监在西晋初年发生的一次变化。

自秘书监并入中书省后，终晋武帝之世一直如此。秘书监再次脱离中书省独立，是在晋惠帝永平年间（291年），《晋书》卷24《职官志》

云："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省。"这里，我们必须对惠帝时重新设置秘书监予以特别的注意。首先，惠帝时复置秘书监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因为就秘书著作官员发展历史来看，这次复置的意义十分重大，正是这次复置，使得秘书监作为专职图书编撰、管理部门，其文化职能进一步凸显。因为它不但"并统著作局"，而且专职"掌三阁图书"[1]。另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自是秘书之府，始居于外"[2]，这就是说，秘书监不仅在名义上脱离了与中书省的关系，而且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或办事机构，所谓"始居于外"，是指始居于中书省之外。这一点意义非同寻常，如果秘书监仍像从前一样在中书省内办公，尽管它可能在名义上已不属于中书，但却很难完全避免中书省官员插手过问其事。

【1】《通典》卷26"秘书监"条。

【2】《通典》卷26"秘书监"条。

公元291年，秘书监脱离中书省而独立，当时著作官却依旧属于中书省，这是因为著作官在西晋初年一直都属于中书省。据《晋书》卷44《华峤传》：华峤"泰始初，赐爵关内侯。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安平太守。辞亲老不行，更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所谓"典中书著作"，即指此时著作官员仍为中书省属官。后来泰始九年前后合并秘书监入中书省，自然没有把著作郎并入秘书的必要。著作官该隶秘书省，是到了秘书监独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292年。据《晋书》卷24《职官志》："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292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晋惠帝元康二年，将著作官改隶秘书省，从此以后，秘书与著作的关系就确定下来，基本不再有什么变化。

两晋时期秘书监的组成人员，有秘书监一、秘书丞二，为秘书省长官、副官，秘书郎四人，分掌秘书图籍。东汉时曾有设置的秘书校书郎及秘书正字等职，两晋时则未见记载。两晋时著作局，即由汉魏时著作郎演变而来，隶属秘书监，主要组成人员有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专掌国史；佐著作郎八人，主要协助

著作郎工作，如著作郎撰写国史时，佐郎则负责提供查阅资料。这是两晋秘书监著作局主要组成人员情况。

秘书著作官员人选多为饱学之士，从西晋开始就成为清要之职，能够进入秘书著作为官，为世人所推重，到东晋南朝以后更是成为高门子弟的起家之官。据《初学记》卷12“秘书郎”条：“此职（指秘书郎）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历江左多仕贵游。”结合《晋书》诸史记载，情况的确如此。这表明在西晋时期，能起家为秘书郎、著作郎，还有许多人是靠才学而入选，而到了东晋以后，则几乎变成了世家子弟的专利。这主要是由于秘书、著作官在西晋时已具有崇高的荣誉性。根据西晋制度规定，佐著作郎就任以后，先要撰写名臣传记一篇，含有测试之意，如果达不到要求，很可能就会被辞退。其次，自秘书、著作官员出现之后，以高级官吏身份甚至宰臣身份兼领的情况，一直都存在，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秘书著作官员的身价。再次，秘书、著作官职自成立以来，一直处在宫禁之中。在两汉时期，他们基本属于皇家私人藏书的管理者，到曹魏两晋时期以后，虽然职掌不限于皇家藏书的撰辑整理，但与君主的关系仍较为密切。基于以上原因，到西晋时期，秘书、著作官员开始颇受人们的青睐，当时许多人，出于各种不同考虑，竞相请为秘书、著作。如左思撰写《三都赋》，认为自己所读不甚广博，而主动要求充任秘书郎中；又如应亨在《祖嘉让著作表》中曾说：“自司隶校尉奉至臣父，五代著作不绝，邦族以为美谈。”[1]再如，国子祭酒邹湛曾以阎缵才堪佐著作，向秘书监华峤推荐，华峤拒绝说：“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用缵[2]。足见秘书、著作之为时人所重。

在一般情况下，秘书监著作局的人员，可以由秘书监长官自己选取，即“秘书监自调补之”。这一点还可以从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诏书看出，据《通典》卷26“佐著作郎”条注：“秘书无监，使吏部选佐著作郎，有监复旧。”这是说秘书在不设首长秘书监的时候，佐著作郎由吏部尚书代为铨选，如有秘书

【1】《通典》卷26“秘书监”条自注。

【2】《晋书》卷48《阎缵传》。

监，则由其自己选官。众所周知，是否拥有挑选属官的权力，对于该职官机构的意义非同寻常，秘书监在两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拥有自辟属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只有掌握这项权力，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职官机构。除此之外，秘书著作官还可以由皇帝直接征召。如山涛负责选举时，曾向晋武帝启奏，认为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武帝以为嵇绍之才不但可以为郎，而且才堪为丞，"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1]。

【1】《晋书》卷89《忠义·嵇绍传》。

同时还有材料表明，在两晋时期至少在名义上，秘书监咸为与中书监平行的两个机构，如在西晋的大驾卤簿方阵中，中书监与秘书监就是并列同行，据《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次相风，中道。次中书监骑左，秘书监骑右。次殿中御史骑左，殿中监骑右……"秘书监能够与中书监并骑而行，说明二者是平行的两个职官机构。这一点还可以从秘书、著作官的朝服上得到证明。两晋时期秘书、著作官员已有固定朝服，据《通典》卷26"秘书监"条：秘书监"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秘书丞"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秘书郎"进贤一梁冠，绛朝服"。著作郎"进贤两梁冠，介帻，绛朝服"。佐著作郎"进贤一梁冠，绛朝服"。这里应注意到，秘书监、著作郎二职，在冠梁上与卿、大夫、八坐尚书是一样的，而秘书丞郎、佐著作郎则与中书丞郎、尚书丞郎相同。这种朝服上的相同，也说明秘书监著作局在名义上与中书监、尚书省是平等的职能部门。

二、两晋编撰出版其他相关机构

秘书监与著作局可视为两晋时期的专职国家编撰出版机构，除此以外，尚有一些职官机构因为与秘书监的关系较为密切，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确曾与图书编撰出版事有关涉，因此也可视为两晋时期编撰出版关涉机构。它们的存在在某些时候丰富和补充了图书收集编撰出版的内容。

散骑常侍，在曹魏、西晋时期，政治权力较大，与门下官员“共平尚书奏事”，与时政关系较为密切，到东晋时才失去共平尚书奏事之权。从其成立起，散骑常侍就与图书编撰有某种联系，因为它参与与共平的尚书奏事文本，都是秘书著作官撰写起居注、时政记的参考文献，故而不可能与著作之事完全无涉。另外，从曹魏时起，许多著作官往往都有“散骑常侍”这一官衔，或常常以散骑常侍兼领著作事宜，这种情况在两晋时更是常见，这就使得它与图书编撰必然发生联系。如王沈在曹爽被杀后，曾任秘书监之职。后高贵乡公正元年间（254—255年），“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𫖮、阮籍共撰《魏书》……”表明魏晋之际即已出现散骑常侍、侍中兼掌著作的情况，到西晋以后就更加习见。如华峤，“泰始初，……出为安平太守。辞亲老不行，更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这是华峤在泰始初年，以散骑常侍的身份，同时典掌中书著作等事宜。再如孙绰，在东晋时曾任永嘉太守，后来“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1]。这是孙绰以散骑常侍兼领著作。再如葛洪，咸和初年，“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2]。尽管葛洪没有就任，但干宝推荐他才堪国史，也是准备以散骑常侍而领著作郎。凡此，均表明两晋时期的散骑常侍一职，与图书著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在散骑还独立成省，未成冗散之前，这方面的职能应当更加突出一些。

太子洗马、诸王文学等东宫诸王属官，也是两晋时期编撰出版机构的一个重要关涉机构。据《晋书》卷24《职官志》，魏晋时东宫属中有“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出则直者前驱，导威仪”。《通典》卷30《职官十二》谓洗马：“魏因之。晋有八人，职如谒者，准秘书郎。……掌图籍……”显然，太子洗马“掌图籍”这一职掌与秘书郎是相同的，只不过秘书郎典掌的是国家的图书典籍，而洗马则负责太子东宫图书典籍的管理、收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太子洗马也是当时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的一个关涉机构。其后南朝宋、

[1]《晋书》卷56《孙楚传附孙绰传》。

[2]《晋书》卷72《葛洪传》。

齐、梁、陈均有设置，所典图籍之事始终不废。继承汉魏旧制，西晋初年继续分封宗室，这些宗室诸王都有自己的一套职官设置，其中师友、文学一类的文化教育官员，与图书编撰诸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据《晋书》卷24《职官志》：“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景帝（司马师）讳，故改师为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号。……典书、典祠、典卫、学官令、典书丞各一人，治书四人……”则两晋不仅有师、友、文学之设，而且诸王属官中与秉笔撰述事宜有关的属吏还有典书、学官令、典书丞、治书诸职。诚然，这些秉笔职官扮演的主要是刀笔吏角色，但与图书编撰不可能全然无涉。如李重，太熙初年（290年），“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1]。这不但表明西晋有诸王文学等职，且此职掌与秘书郎有相同之处，其相同处大概就有修撰典籍一事。联系南朝诸王，如宋临川王刘义庆聚徒修撰《世说新语》，梁昭明太子修《文选》等，每聚文学文士于府中修撰典籍诸事可知，南朝东宫、诸王聚徒修撰，当是其来有自，是对西晋诸王文学这方面职能的继承和发展。两晋南朝宗室诸王有招聚学士入府充当师友的传统，他们与诸王之间有点类似于幕僚职能的或师或友的关系，他们主要是备诸王应对，解答诸王在政治、生活中的疑难问题，既可为诸王在政治上出谋划策，亦可从事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乃至于进行文学创作等文教事业。这些职能，诸王文学往往是身而兼之，如挚虞，以“才学博通，著述不倦”，历任郡主簿、太子舍人诸职，“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颉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后历秘书监，卫尉卿……”挚虞迁为吴王友，靠的是“才学博通”，他以吴王友的身份参与讨论荀颉《新礼》得失，表明撰述、修正礼法著作乃是诸王师友的工作之一。而挚虞所出任秘书监之职，正是在此次参与讨论《新礼》之后任命的。后来南朝宗室诸王师友这方面的职能正是沿袭魏晋时的做法。

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决策机构，既是国家权力的中枢所

【1】《晋书》卷46《李重传》。

在，有时也过问或直接负责图书收集编撰等具体工作，特别是在国史修撰，朝廷大仪、律令的修订编纂方面，中书、侍中二省官员首长更是要亲自参与，甚至领衔此事。因而无论是中书省，还是侍中省，也都可视为两晋国家图书编撰出版的关涉机构。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如贾谧于惠帝时任秘书监，掌国史。“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光、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贾谧）寻转侍中，领秘书监如故。”[1] 参与讨论者，除秘书监、国子博士等图书编撰、文教专职官员外，主要就是侍中、黄门侍郎等门下官员。其中秘书监贾谧更是在事后，以侍中身份兼领秘书监。这说明门下省在国史修撰一事上，有重要发言权。如此一来，门下官员与图书典籍的编撰，也就存在一定的关系。至于此事中所说事下“三府”，经过“三府”讨论，似乎三公府也对国史修撰有重大影响力，但实际上由于三公在两晋时期只是荣誉性高官，且置无常人，让其对国史修撰发表意见，大概只是为了表示对当事者的礼敬以及国史修撰的严肃庄重。关于中书、门下官员参与图书、典籍、礼法、律令的编撰诸事，两晋时颇有其例。如荀勖，晋武帝受禅不久，“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与贾充共定律令”。后又“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荀勖从事律令删定，及“整理记籍”，均是以中书令的身份厕身其间。再如庾亮，“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2]。又如王峤，王敦之乱平定后，“除中书侍郎，兼大著作，固辞”[3]。庾亮、王峤二人都是以中书官员兼领著作官。总之，中书、门下作为重要职官机构，在中央权力中枢中的作用是主要的，但它们的权力触角对图书典籍的收集、编撰等文化事业，也偶有所及，因此从文化教育事业角度而

[1]《晋书》卷40《贾充传附孙贾谧传》。

[2]《晋书》卷73《庾亮传》。

[3]《晋书》卷75《王峤传》。

论，它们也可视为两晋时期国家图书编撰出版的关涉机构。

两晋时期的太常博士等职官，也是国家编撰出版的重要关涉机构，这也是由博士的性质决定的。一般说来，能充当博士者，学识修养都比较高，对于礼法、律令、音乐、历法等方面都很有造诣，故而在朝廷大仪创革、商讨修订律历法令等时候，能够提出合乎需要的主张。有时他们还成为讨论的“主议”或“议主”。据《文选》载萧梁陆倕《石阕铭》云：“乃正六乐、治五礼，改章程，创法律，置博士之职，而著录之生若云。”可见举凡修治乐礼，改创章程、法律，都由博士负责研讨并著录在册。太常作为国家专职礼官，在礼制建设方面更是无以辞其责，根据文献记载，太常属官也保存有文献典籍。据《艺文类聚》卷49载潘岳《故太常任府君画赞》：“遂管秘籍，辨章旧史。”由于太常是礼官，故所收藏之“秘籍”，多与礼法有关。正因为太常掌握有大量关于礼制设置沿革方面的文献资料，故而在朝廷有事涉礼仪的讨论或问题出现时，太常都要参与其间，有时还扮演重要角色。

三、两晋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的职掌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局的最主要职能，就是收集、整理、编撰图书典籍，在这一过程中，中书、门下等关涉机构也要参与协助。秘书监、著作局的第一个重要职能是修撰历史，其中国史修撰主要由著作官员承担。作为著作局的上级领导机关，秘书监对于包括国史修撰在内的图书事业，职无不总，而著作局则主要侧重国史的编撰，即著作郎“谓云大著作郎，专掌史任”。有关两晋秘书监、著作局修史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前引贾谧，在晋惠帝时为秘书监，掌国史。晋武帝、惠帝时两次修撰国史，都是由秘书监与著作郎负责，武帝时由于秘书监已并入中书监，故荀勖以中书监身份插手此事。实际就是代表秘书监，而著作郎与秘书监同样都是中书监属官。惠帝时，秘书监重新脱离中书省，贾谧以秘书监职掌国史。另外，我们看到当时参

与意见的其他官员，主要是门下省的侍中、黄门侍郎，则是以编撰出版关涉机构的身份对国史修撰发表意见。又如束皙在太康年间（280—289年）“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1]。束皙修撰《晋书》，一方面是因为身为著作官员，有修史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因为秘书监著作局作为国家藏书机构，保存有大量图书典籍，秘书监著作局官员拥有图书资料方面的优越条件[2]。

【1】《晋书》卷51《束皙传》。

【2】如左思“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晋书·左思传》)左思之所以欲到秘书省任职，是因为那里藏书丰富，可以阅读到更多书籍。

东晋对于国史修撰也颇为重视，据《晋书》卷82《干宝传》：“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在王导等人的提倡下，东晋时史官备置，有关国史著作甚多。除干宝《晋纪》外，另有秘书监孙盛所撰《晋阳秋》，秘书丞、著作郎虞预所著《晋书》，著作郎王隐所著《晋书》，著作郎谢沈所著《晋书》等。义熙初年，刘裕控制东晋政权，仍注意国史修撰，其时尚书奏称：“左史述言，右史书事，……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于是敕徐广撰集晋史，到义熙十二年，徐广修成《晋纪》共四十六卷。

除了国史以外，前代历史的修撰，也是秘书、著作官员的一个重要职能。综观诸史所载，大凡在著述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者，都有在秘书监或著作局任职的经历，如华峤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汉后书》及大量诗赋论议在内有数十万言，他就曾先后任职中书著作、秘书监等职，据《晋书》卷44《华表传附孙华峤传》：“后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术数，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初，峤以《汉纪》繁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

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华峤能修成《汉后书》，并有大量著述，与他本人学识丰富固然有关，但与他担任秘书、著作官员，有条件大量翻阅参考秘书监藏书，掌握丰富文献资料也很有关系。再如陈寿所著《三国志》，已成为史学名著，他也曾先后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职。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古国志》、《益部耆旧传》等著作，后者成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的一部重要参考书[1]。又如司马彪在泰始年间，先后任秘书郎、丞，其间他参考众书完成《续汉书》80余卷[2]。再如，东晋太兴（318—319年）初年，典章稍备，朝廷征召王隐、郭璞等人为著作郎，令撰晋史。当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由于虞预为南方人，对于西晋史事所知甚少，遂多次向王隐询问，并借阅王隐所著有关书籍，最后完成了《晋书》的著述[3]。至如虞预、孙盛、干宝等人，都是东晋时期著名史学家，他们一生几乎都在秘书、著作任职。

【1】《晋书》卷82《陈寿传》。

【2】《晋书》卷82《司马彪传》。

【3】《晋书》卷82《王隐传》。

秘书监、著作局的另一个重要职掌，是收集和整理图书典籍，诸如收藏保管、校勘订正、编制目录等工作，都由秘书著作官员负责。秘书监为图书收藏之所，其所收藏之图书典籍，包括帝王人君或政府所发布的诏敕政令、礼书律历等政府办公文档，据《文选》载陆机《吊魏武帝文并序》云：“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陆机见到曹操遗令，是在秘书省任著作郎期间，可见秘书监作为藏书“秘阁”，保管有“魏武帝遗令”一类的诏敕政令。当然，秘书监所藏的图书文献，内容十分丰富，不止于政府文书档案。据《晋书》卷35《裴秀传》：“（裴秀）……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所藏之“秘府”即秘书府。前引华峤传，华峤在任著作郎、秘书监期间“得遍观秘籍”，正是因为秘书监为藏书之所，后其所著《汉后书》在荀勖、和峤等人建议下，也“藏之秘府”，即由秘书监收藏保管。搜求亡佚图书，校正勘误是秘书监的又一项重要工

作，据《隋书·经籍志》，魏晋两朝“采掇遗亡”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收集起来的图书全数保存在秘书中外三阁。然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的长期战乱，使得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图书典籍“靡有孑遗”。至东晋初年才有条件“渐更鸠聚”。对于这些历经兵戈战乱的图籍，校正勘误、补残拾遗的工作，自然是必须的。西晋时司马彪“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他于晋武帝泰始中，出任秘书郎、丞，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两晋秘书省、著作省中均有校书郎之职，此职专司图籍校正勘误，如晋孝武帝世，徐广“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令校书”。这是徐广先后以秘书郎、员外散骑侍郎的身份，兼领秘书“校书”之事。对汲冢书的编次整理，乃是两晋时期古籍整理事业的一项重大成就，具体负责此事的就是秘书监与著作局。编制图书目录，乃是图书整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两晋时期图书编目方面成就突出，四分法得以创立与全面运用。

除了要从事上述图书收集、整理、编校等方面的工作外，两晋时期的秘书、著作官还参与礼仪法令的讨论、修订、整理及就时政发表议论等工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就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或争议展开的讨论，因而，与现实政治关系较为密切。这些本应由尚书、中书、门下等权力机关负责主持。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几乎每次都有秘书、著作官员参加，甚至有些时候，秘书、著作官员的意见，被最终采纳。原因在于，秘书监作为国家档案中心，其中保存有大量诏敕政令、前代故事等文献资料，秘书著作官员由于整日要面对这些文献典籍，故而掌握的文字资料比较丰富，兼之他们一般都是学识渊博之士，对于礼仪法令、政令诏敕比较熟悉或精擅，因而在讨论时往往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或证据。例如挚虞，在西晋武帝、惠帝两朝，曾多次参与皇室丧礼、郊祀、庙祭等朝仪的讨论、修订。如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三月，皇太孙司马尚薨，有司奏皇帝应服齐衰期，诏下群臣通议，当时散骑常侍谢衡、中书令卞粹、博士蔡克、秘书监

【1】《晋书》卷20《礼志中》。

挚虞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挚虞的意见被采纳[1]。其他如佐著作郎陈寿、著作郎干宝、秘书郎徐广等人都曾参与过关于丧礼的讨论和制订。再如虞预，于东晋太兴二年（319年）、明帝咸和初年（326—334年），两次就旱灾问题上奏议，时分别任佐著作郎、秘书丞、著作郎。

经过两晋时期的发展，秘书监、著作局在图书编撰、收集管理政府文书档案、整理文献典籍等方面的职能进一步加强，但同时它们仍然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诸如朝廷礼仪、律令的讨论修订，秘书著作官员都要参加，有时还成为议事的主体，这是因为这两省官员掌握着大量的文献资料，因为其机构同时就是国家的图书资料中心。

第三节　十六国时的著作官

“十六国”政权尽管立国时间都不是很长，所统治的范围也不是很大（只有前秦曾短暂地统一北方），职官设置也不很完备，但基本上也都设有专职的著作官，或以他官兼掌图书典籍的修撰、整理。据《通典》卷21“史官建置”篇所列十六国政权中曾修撰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至于由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更是没有例外，可见十六国大都修撰了自己的历史。尽管各国修史官的名称或有不同，但职掌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国史的修撰则是相同的。是以，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及当时的图书出版事业，十六国的情况不可视而不见。

一、前赵、后赵的著作官

十六国中最早建国的汉赵政权，是由匈奴族建立的，由于其开创者刘渊起兵时，假托是两汉皇室的后裔，因此汉赵政权建立后，其职官设置遥承两汉制度。其史官著作之职由太中大夫承

担，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同书《史官建置》篇：“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左国史”系由《汉书》所载的“左史”发展而来，职当内史，掌记注、国史[1]。除“左国史”负责修撰国史以外，汉赵政权还以他官修史，据《史通·古今正史》所记：“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按《晋书·刘曜载记》记载，和苞是在侍中或领谏议大夫任上修撰的《汉赵记》。

【1】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羯族建立的后赵，对文教事业也颇为重视。而从现有史料来看，正是后赵石勒最早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2]。据《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319年石勒称赵王后，“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从中可见，自后赵政权建立，石勒就注意本国历史的修撰。不过从修史者职任来看，还基本都是以记室官或他官兼领修撰事宜。随着后赵政权统治的继续，其职官设置也不断完善。在石勒统治时期，就已经有秘书、著作官员的设置了。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称天王，行皇帝事时，大封百官，其中“署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又据《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徐光，字季武，顿丘人，好学有文才。（石）勒署为参军，迁为中书令，领秘书监。及勒薨，虎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求光与襄国诏狱。光在狱中，注解经史十余万言。”秘书监主要职掌经史著述，徐光被囚后完成十余万字的著述正说明了这一点。以中书令兼领秘书监，这是模仿曹魏、西晋初年的做法。后赵不但设有秘书监，而且有著作官，《石勒载记下》又云：“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又据《晋书》卷95《艺术·佛图澄传》载，石虎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即位后，百姓竞相出家，真伪混淆，“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石赵设有著作郎一职可知。至于石赵著作官员的人数如何，已不可确知，但著作郎、佐著作郎完备地构成石赵著作官体系，则是可以肯定的。而其佐郎“录述时事”，与魏晋南北朝著作郎职司资料收集、实录撰写的作用是相同的，乃是著作郎最重要的助手。

石虎在历史上素以残暴著称，但他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不争的事实。史言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1]。从所引材料亦可知，石赵由秘书省负责整理国家藏书。又，国子博士一职，乃是石虎新设置一职，据《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石）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从派遣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一事来看，国子博士、助教等与文教事业有关的官员，也有协助秘书著作官员收集、整理图书典籍的职责。

【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二、五燕政权的著作官

慕容鲜卑汉化程度高于羯人，因此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职官体系也远比后赵完备。如由慕容廆创建的前燕政权，其著作官制度就比后赵完备得多。前燕四主慕容廆、皝、儁、暐，均有很高的汉学修养，无不精熟经学天文，因此都很重视文治教化。他们起用了一大批汉人士族，特别是著作官员，多用汉人，不似石赵，多以羯人尸充其位。如出身清河崔氏的崔逞，在慕容暐时，就曾任著作郎。“（崔逞）少好学，有文才。慕容暐时，郡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2]。前燕也设有秘书监一职，据《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附韩恒载记》，慕容儁即位时，议定五行次序，韩恒参与谋议，为儁采纳，“儁秘书监清河聂熊闻恒言，乃叹曰……”是前燕曾设秘书监。除秘书监、著作郎以外，前燕文化官员中与图书编撰出版有关者，另有典

【2】《魏书》卷32《崔逞传》。

书令，专门职掌图书典籍的搜集整理和保管，如安定人皇甫真，“及（慕容）儁僭位，入为典书令。后从慕容评攻拔邺都，珍货充溢，真一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1]。皇甫真不爱珍宝，唯收图籍，固然与他不贪财货、品格高尚的为人有关，也与他身为典书令，职司图籍的责任有关系。刘知几曾说：“前燕有起居注，杜辅诠录以为《燕纪》。”[2] 这是说杜辅诠修撰《燕纪》所据材料是前燕四主的起居注，这就表明，前燕有记注制度，其任务就由史官承担。据《晋书》卷95《艺术·黄泓传》，黄泓，魏郡斥丘人，博览经史，尤明《礼》、《易》，“及（慕容）皝嗣位，迁左常侍，领史官，甚重之”。左常侍领史官，除备皇帝参谋顾问外，兼掌时事记录。后黄泓又担任或兼领过太史令一职。此职掌天文历法，对于天地异常、灾异灵征都凡事必录，也兼有撰著的职能。

[1]《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附皇甫真载记》。

[2]《史通·古今正史》。

再看后燕的情况。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建兴元年即公元386年，距慕容垂建立后燕仅二年时间，因此可以认为后燕自立国时起，就专设史官以修本国历史。只不过董统所任职官具体名称，已不可知。有材料表明，后燕置有秘书监之职，据《晋书》卷124《慕容盛载记》，慕容盛曾在东堂集议，与群臣讨论周公辅政之美，“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慕容）恪之功焉。又引中书令常忠、尚书阳璆、秘书监郎敷于东堂，问曰……”是后燕有秘书监一职。从由中书负责撰写《燕颂》一事来看，可能秘书、著作官仍受中书省领导，这当是沿用曹魏晋初的做法。

慕容德建立的南燕，以及由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也都有自己的著作官。二者均以近侍的中书官员职掌撰写起居注及历史修撰，这些也都是对魏晋制度的承继。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慕容）德、（慕容）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

卷。”据《十六国春秋·南燕录》，王景晖在南燕撰起居注时，官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一职在魏晋之际既是中书部门的重要属官，也属于靠近人主的近侍官。

由慕容泓创基的西燕，因为同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几乎同时并存，为争正统，二者不断交兵。西燕在历史上痕迹不显，故其职官设置不得而知。

三、前秦、后秦、西秦的著作官

在十六国政权中，以前秦最为强大，一度几乎统一中国北方。从现有史料看，早在苻生统治时期，即有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官的设置。据《苻生载记》，苻生曾派遣阎负、梁殊前去招服前凉，前凉凉州牧张瓘问阎、梁二使，前秦有何等人物时，二人回答说：“……文史富赡，郁为文宗，则尚书右仆射董荣、秘书监王飏、著作郎梁说……。”从《苻坚载记》等相关记载来看，前秦秘书监的政治职能较强，比较重大的政治决策或谋议，秘书监都有权参与意见，如秘书监朱肜曾请求诛杀国内鲜卑人，后来在决策伐晋的群臣会议上，秘书监朱肜再次参加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秘书监首长既然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多，那么他所承担的著作职能，当由其属官秘书郎及著作郎等承担。

前秦的著作官有秘书郎、著作郎、著作佐郎等，职员构成比较完备。据《资治通鉴》卷102、103载，“秦王（苻）坚入邺，释梁琛，除中书著作郎”、“秦以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又《史通·古今正史》：“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前秦不仅著作官构成比较完备，其撰修著作制度也比较规范，史官所修起居注、实录等，即使是君主也不得而观。据《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甘露十七年八月，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见苟太后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其加罪。著作郎赵渊、车敬已死，乃止。著作郎董朏虽皆书时事，然十不留一。”按此段记载亦略见于

《晋书·苻坚载记》。苻坚怒焚史书、大检史官，距赵渊、车敬等修撰起居注已有十几年之久，这说明当初史官在著作时，苻坚并未检视，这与起居注、实录撰写要求保密有关。正因为保密制度执行较严格，所以赵渊、车敬等人才敢秉笔直书。及苻坚收观记注大检史官之后，著作郎董朏就不敢如实记录时事，只能“十不留一”了。

由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对文化事业尤其重视。姚苌称帝后，曾“置百官”[1]，因此也当设置有著作官。《史通·古今正史》说：“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后秦姚兴信佛，故特别重视佛经翻译，因此佛经翻译成为后秦图书出版业最具特色的一项内容。为了译经，姚兴礼请天竺僧人鸠摩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并专门辟出西明阁、逍遥园作为译经场所。姚兴有时亲自为其执经，即“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2]。后秦翻译佛经通计300余卷，实为当时译经荦荦大者。

【1】《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2】《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西秦是陇西鲜卑乞伏氏所建立的政权，僻处陇西地区，是十六国政权中相对比较弱小的国家。刘知几曾说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3]。即西秦亦曾有著史的官员。

【3】《史通》卷12《古今正史》。

四、五凉政权的著作官

前凉系汉人建立的政权，其创建者张轨，史称是汉常山景王张耳十七代孙，“家世孝廉，以儒学显”[4]。河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扰攘之际，能一直保持文化昌明，与前凉张氏世代儒学，推重学术的执政方略很有关系。张氏历代都重视文化建设，如张寔在位期间，曾“遣都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5]。可见张氏政权在图书典籍的收聚方面颇有成效。另据同传附《张天锡传》有“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费。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的记载，其中“校书祭酒”一职，当是专门负责校勘整理图书典籍的官员。

【4】《晋书》卷86《张轨传》。

【5】《晋书》卷86《张轨传附子张寔传》。

前凉的著作官中，有西曹掾一职，据《史通·史官建置》蒲

起龙《通释》："丛书崔鸿《录略》有云：命西曹掾集阁内外事付索绥，著《凉春秋》。"这是说张骏在位时，曾命西曹掾将撰集的阁内外事交给索绥，由索绥据此撰写前凉国史《凉春秋》。很明显，西曹掾所"集阁内外事"，与起居注或实录性质是相同的。索绥修史，事在张骏十五年（338年），见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索绥所任何职？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索绥，字士艾，敦煌人，幼举孝廉，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可见，儒林祭酒也是前凉的著作官。又据《史通·史官建置》："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参诸《史通·古今正史》"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二十卷"，可知，刘庆是由护军参军转迁为儒林郎、中常侍以后，专职修撰国史。因此，儒林郎、中常侍也在前凉著作官之列。

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因为与前秦同出于氐族，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官制多模仿前秦。据《晋书》卷122《吕光载记》："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是后凉置著作郎。又《隋书》卷33《经籍志二》载："《凉记》十卷，记吕光事。伪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是后凉有著作佐郎一职。

南凉建立者秃发氏，族源于拓拔鲜卑。南凉也比较重视文教。早在秃发乌孤统治时期，就曾设置国纪祭酒一职，专掌记事，据《史通·史官建置》："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再如秃发利鹿孤即位之后，曾任命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博士祭酒一职，专门负责王室子弟教育。

北凉第一代君主段业，曾在吕氏后凉政权担任过著作郎，因此对文教事业也颇为留意。北凉后继者沮渠蒙逊为临松卢水胡人，史载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2]，汉文

【1】《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2】《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

化修养较高。北凉设有秘书郎一职，专掌记注。如敦煌人刘昞，在西凉时曾任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及沮渠蒙逊平定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1]。北凉国史撰修，似由秘书郎承担，据《魏书》卷52《宗钦传》，宗钦“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北凉秘书省官员中，还有秘书考课郎中一职，专门负责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如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

[1]《魏书》卷52《刘昞传》。

五凉政权中的西凉，是由陇西李氏建立的汉族政权。据《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是时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皆栖其园囿，其群下……请史官记其事，玄盛从之。”是西凉设有史官负责记录祥瑞灾异之事，而且儒林祭酒就是史官。引文中“儒林祭酒刘彦明”即刘昞（唐人避讳，而称其字彦明），据《魏书》卷52《刘昞传》：“刘昞，字延明……李暠（即李玄盛，唐人修《晋书》避讳而称字玄盛）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刘昞任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时，见李玄盛亲自补辑图书，请求代其完成，除了出于臣下不忍见其君主操劳的原因以外，还与他任职儒林祭酒、校勘整理图籍乃属份内之事有关系。从李暠所为，可知西凉对于图书典籍颇为重视，这也正是河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仍能保持文化昌明的重要原因。

第四节　南北朝的秘书省与著作官

经过三国两晋时期的发展，南北朝时期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的建置更加完善。秘书省作为国家专职编撰出版机构，其主导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具体的编撰出版工作则由其所属的著作郎、著作佐郎等著作官员负责。另外，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秘书省都不是唯一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南、北朝秘书省的作用与职能，也不尽相同，即使同在南朝或北朝，不同时期的著作官的设置、职能，也不完全一样。但所有这些变化或不同，都只是枝节上的微小差异，秘书、著作作为国家编撰出版主体机构的地位，已无法动摇。秘书、著作官员，特别是秘书官员已属“清要”，南北朝皆然，在南朝尤其如此，已经成为门阀士族首选的起家之官。从史官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北朝所创立的包括国史监修在内的国史修撰制度，为隋唐以后史官编修制度所承继，北朝的史官制度成为其后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演变的主流。

一、南朝的秘书省与著作官

南朝秘书省的名称，前后有所变化，刘宋、萧齐时仍沿袭东晋，称秘书监，萧梁时改称秘书省，陈朝因梁而未作变化。著作局统领于秘书监（省），在南朝则一直未变。南朝之秘书、著作官员，已成为“清要”之职，在齐梁时期尤其如此，如刘孝绰除秘书丞，梁武帝谓周捨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1] 正因为秘书、著作官职属“清要”，故成为士族的起家之官，不轻易授人。而有迹象表明，在萧梁以前，南人似乎很少能出任秘书、著作，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均为南迁之世家大族所把持[2]。南朝秘书省著作局的职掌，大致与前朝无异，主要负责图书典籍的校定编撰，以及国史修撰，其中国史修撰工作，一般情况下由著作官员承担。

【1】《梁书》卷33《刘孝绰传》。

【2】《梁书》卷33《张率传》，吴郡人张率，祖、父两代显达于宋、齐，迁秘书丞时，梁武帝谓之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梁武帝此语，至少表明宋、齐时期南人要出任秘书丞一职，是极其困难的。

（一）刘宋的秘书、著作官

据《宋书》卷40《百官志下》，刘宋的秘书监在职官设置上，基本沿袭两晋旧制。设有秘书监1人，为秘书监首长，另有秘书丞1人，秘书郎4人。国史修撰主要由秘书监所属之著作官员负责，设有著作郎1人，著作佐郎8人，著作令史若干，著作治书若干。此外，刘宋时期还有史学生，他们有时参与一些修史事务，故而亦可入著作官之列。

秘书、著作官虽为同一官署下的职官，但职掌已有很大不同。就与图书编撰方面的关系而言，著作官似专职负责国史的修撰，秘书官员则总揽与图书典籍有关的一切事务，在修史一事上则具有业务领导的性质，并为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的服务，有时并不需要插手国史修撰的具体事务。史籍表明，刘宋国史修撰，或与国史修撰关系密切的集注起居，一般情况下都由著作官负责。据《宋书》卷64《何承天传》：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同书卷94《徐爰传》："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另外，同书卷11《志序》、卷100《自序》均有何承天以著作官员身份修撰《宋书》的记载。有关刘宋著作官员负责国史修撰的记载，还有许多具体的例证，如"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大明）六年，又以（徐）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1]。刘宋国史修撰前后有四次之多，最后一次才由徐爰以"领著作郎"的身份基本完成。又如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吴癸依（刘）洪法，制新术，令太史施用之"[2]。这是著作令史负责历法的修订，也是国史修撰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据《宋书》卷14《礼志一》：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而"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这是史学生山谦之自行搜集撰定耕藉礼仪方面的著作。又同书卷18《礼志五》载："秘书著作治书，……朝服，进贤一梁冠。"这表明著作官序列中，还有著作治书一职，其职掌当然也与史书修撰有关。

【1】《宋书》卷94《恩幸·徐爰传》。

【2】《宋书》卷13《律历志下》。

需要说明的是，刘宋的国史修撰及前史整理，虽主要由著作官员承担，但以他官兼充撰著事宜的情况也每有其载。如前引山谦之、苏宝生在宋孝武帝时，就是以奉朝请、南台侍御史的身份参与国史修撰。再如裴松之奉命注陈寿《三国志》，时官任中书侍郎；后续撰何承天国史时，则是以太中大夫、国子博士的身份担当[1]。他如孙冲之、丘巨源、谢灵运、沈约等人，都曾以他官身份参与修史。

【1】《宋书》卷64《裴松之传》。

另外，修撰起居注，常制均由著作官员承担，史籍也有刘宋兼掌起居注的记载，但是，在相关史籍中却并未找到这方面的实例。相反，所见不多的几例起居注，其撰写者均为其他官员，如裴松之元嘉二十年（443年）奉诏拟写《元嘉起居注》，时官中书侍郎[2]。又据《宋书》卷83《吴喜传》："吴喜……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这是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府中小吏撰写起居注。此二例说明，刘宋也以他官掌起居注，确属可信。至若《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宋永初、景平、元嘉、大明、泰始、泰豫共7部起居注，均不言著者名姓，因此它们是由著作官，还是由他官所撰成，已不得而知。

【2】[宋]李昉：《文苑英华》卷754裴子野《宋略·总论》，北京，中华书局，1966。

有学者认为，一直到宋文帝元嘉初年，刘宋王朝始置著作官员[3]。但确有证据表明，刘裕早在晋末辅政、尚未革命之际，就在其宋台设有秘书郎等职，而在受禅建宋以后，亦有大臣以他官撰录记注，并以此为刘裕所知。据《宋书》卷63《殷景仁传》："殷景仁……迁宋台秘书郎，世子中军参军，……入为宋世子洗马，仍转中书侍郎。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迁太子中庶子。"另据《宋书》卷55《徐广传》："永初元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这表明刘宋建国伊始，即设有秘书监一职。秘书监作为一个职官机构，不可能只独高秘书监一职，肯定也同时设置相应的属官。秘书监既然成立，作为秘书监的重要属官，著作郎

【3】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第四章，148—14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诸职亦当同时设置。只不过，刘宋王朝在创基之初，国史修撰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史籍不载著作官员诸职情况而已。

刘宋时期，秘书、著作官就已成为“清要”之职，尤其是秘书丞、郎等秘书官员，更是成为世家大族或皇室姻亲竞相争取之官。据《宋书》卷66《王敬弘传》：敬弘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其理由是“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琅邪王氏为东晋南朝一流高门，自然有资格起家秘书郎，但王敬弘更愿意儿子处于不竞之地，而为求奉朝请，却透露出门阀社会对秘书职务竞争之激烈。以下检录《宋书》、《南齐书》诸史籍，对刘宋时期任职秘书官人员的情况，列表于下以供分析（“资料出处”一栏，“宋/51/5/1467”指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卷51，第5册，第1467页，本文所有表格之“资料出处”均依此类推）：

表一　刘宋秘书、著作官员简况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傅演	北地灵州	秘书郎	宋/43/5/1341	
谢世休	陈郡阳夏	秘书郎	宋/44/5/1350	
刘楷	彭城	秘书郎	宋/51/5/1466	宗室
刘彪	彭城	秘书郎	宋 51/5/1467	宗室
刘秉	彭城	侍中守秘书监	宋/51/5/1467	宗室
刘义宾	彭城	秘书监	宋/51/5/1470	宗室
刘义庆	彭城	秘书监	宋/51/5/1475	宗室
谢瞻	陈郡阳夏	秘书丞	宋/56/5/1559	
殷淳	陈郡长平	秘书郎、丞	宋/59/6/1597	
刘铣	彭城	秘书郎	宋/61/6/1652	宗室
张敷	吴郡吴	秘书郎、丞	宋/62/6/1663	
谢灵运	陈郡阳夏	秘书监	宋/67/6/1772	
范晔	顺阳	秘书丞	宋/69/6/1818	
徐湛之	东海郯	秘书监	宋/71/6/1844	外戚

续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孟灵休	平昌安丘	秘书监	宋/71/6/1845	
王僧绰	琅邪临沂	秘书丞	宋/71/6/1850	
刘休祐	彭城	秘书监	宋/72/6/1879	宋文帝 13 子
颜延之	琅邪临沂	秘书监	宋/73/7/1902	
刘祎	彭城	秘书监	宋/79/7/2038	宋文帝 8 子
刘休范	彭城	秘书监	宋/79/7/2045	宋文帝 18 子
孔觊	会稽山阴	秘书丞、监	宋/84/7/2154	
王景文	琅邪临沂	秘书监	宋/85/8/2178	外戚
王绚	琅邪临沂	秘书丞	宋/85/8/2184	外戚
萧惠开	南兰陵	秘书郎	宋/87/8/2199	外戚
丘继祖	吴兴乌程	秘书监	宋/91/8/2248	
褚渊	河南阳翟	秘书丞	南齐/23/2/425	外戚
褚贲	河南阳翟	秘书郎	南齐/23/2/431	外戚
王俭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南齐/23/2/433	
何戢	庐江灊	秘书郎、丞、监	南齐/32/2/583	尚山阴公主
王延之	琅邪临沂	秘书丞、监	南齐/32/2/585	
王僧虔	琅邪临沂	秘书郎	南齐/33/2/591	
萧子晋	南兰陵	秘书监	南齐/35/2/622	
王普曜	琅邪临沂	秘书监	南齐/42/3/741	
江敩	济阳考城	秘书丞	南齐/43/3/757	母淮阳公主
谢颢	陈郡阳夏	秘书郎	南齐/43/3/762	
谢瀹	陈郡阳夏	秘书郎	南齐/43/3/763	
沈文季	吴兴武康	秘书郎、监	南齐/44/3/775	
萧缅	南兰陵	秘书郎	南齐/45/3/794	
王慈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南齐/46/3/802	
袁彖	陈郡阳夏	秘书丞	南齐/48/3/832	
王缋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南齐/49/3/852	王景文子，外戚
丘系	吴兴乌程	秘书监	南齐/52/3/889	

续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王亮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梁/16/1/267	尚公主
王志	琅邪临沂	秘书郎	梁/21/2/318	尚安固公主
袁戢	陈郡阳夏	秘书丞	南史/26/3/701	
著作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刘秉	彭城	著作郎	宋/51/5/1467	宗室
谢绍	陈郡阳夏	著作佐郎	宋/44/5/1350	
褚湛之	河南阳翟	著作郎	宋/52/5/1505	尚公主
江智渊	济阳考城	著作郎	宋/59/6/1609	
沈统	吴兴武康	著作佐郎	宋/63/6/1687	
何承天	东海郯	著作佐郎	宋/64/6/1704	
江湛	济阳考城	著作佐郎	宋/71/6/1848	外戚
江恁	济阳考城	著作佐郎	宋/71/6/1850	尚淮阳公主
顾愿	吴郡吴	著作佐郎	宋/81/7/2087	
徐爰	南琅邪开阳	著作郎	宋/94/8/2310	
萧映	南兰陵	著作佐郎	南齐/35/2/621	萧道成3子
江敩	济阳考城	著作郎	南齐/43/3/757	
徐聿之	东海郯	著作郎	南齐/44/3/771	
徐孝嗣	东海郯	著作郎	南齐/44/3/771	
王秀之	琅邪临沂	著作佐郎	南齐/46/3/799	
萧惠基	南兰陵	著作佐郎	南齐/46/3/810	
刘绘	彭城	著作郎	南齐/48/3/841	
王奂	琅邪临沂	著作佐郎	南齐/49/3/847	
王逡之	琅邪临沂	著作郎	南齐/52/3/902	
何求	庐江灊	著作佐郎	南齐/54/3/937	
王莹	琅邪临沂	著作佐郎	梁/16/1/273	尚临淮公主
许珪	高阳新城	著作佐郎	梁/40/2/575	
孔灵运	会稽山阴	著作郎	南史/27/3/727	

以上共检得刘宋时期秘书官员45人，著作官员23人。在45例秘书官员中，其中刘宋宗室成员9人，其他或出于佐命功臣，或出自高门，而且有很大部分人与刘宋皇室有姻亲关系。他们之所以或起家秘书郎，或曾任职秘书丞、监，均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秘书官员在社会观念中为“清要”、“华选”，并无多少实权，然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刘宋皇室却将那么多的宗室成员任命为秘书官，其中原因与皇室试图改变文化形象的心态有着密切联系。

秘书监作为刘宋“五省”机构之一，其职能并不单一，但负责图书典籍的整理、校订，仍是它的一项重要职掌。据《宋书》卷59《殷淳传》：“殷淳……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爱好文义，未尝违舍。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又《宋书》卷67《谢灵运传》：“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遗阙。”还有，王俭在宋时曾任秘书郎、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1]。凡此均表明，整理校补、编定图书目录，仍是秘书监的一项重要工作。另外，包括国史修撰在内的史书编撰工作，虽主要由著作官员承担，但秘书官似也参与一些修史工作，如前引谢灵运就任秘书监后，除整理秘阁藏书外，“又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这是谢灵运以秘书监的身份撰修晋史。

【1】《南齐书》卷23《王俭传》。

刘宋著作官设置，与两晋大致相同，唯“佐著作郎”改名“著作佐郎”。《宋书》卷39《百官志》记，两晋制度规定，佐郎到任时，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含有测试之意。但刘宋初年，以王朝建立不久，无适当对象，故将此制废止。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简化了著作官员的选任程序，实际上对著作官员文化修养方面的要求却降低了。这样就使得刘宋时期的著作官，不再是单纯凭文才出众始可为之，那些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显贵或门阀世

族，都可以依靠政治权力或显赫门第，而获得此职。

（二）南齐的秘书、著作官

齐承宋制，萧齐的著作官设置，基本同于刘宋，据《南齐书》卷16《百官志》："秘书监一人，丞一人。郎。著作佐郎。"其中"郎"当包括"秘书郎"、"著作郎"。因为据《通典》，与刘宋一样，萧齐秘书监除监、丞以外，也设有秘书郎。萧齐秘书郎为清美之选，为当时门阀世族的起家之官，凡以此为起家官者，不长时间即可获得高升，即"宋、齐秘书皆四员，尤为美职，皆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十日便迁"[1]。

【1】《通典》卷26《职官八》。

萧齐秘书省也是国家藏书之所，因此收藏、保管、维护图书典籍，也是它的一项重要职能。据《南齐书》卷40《晋安王子懋传》，晋安王萧子懋于永明八年（490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秘阁"。又《南齐书》卷52《王逡之传》：琅邪王珪之，曾撰写《齐职仪》，永明九年（491年），其子王颢上表，希望将父亲所著"永升天阁，长铭秘府"，齐武帝萧赜遂"诏付秘阁"。除此而外，遇到国家性的修撰活动时，秘书省也必须参与、承担一些具体事务。据《南齐书》卷9《礼上》，永明二年（484年），修定礼乐，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为此萧齐专门成立了"治礼学士及职局"负责，"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永明二年的这次修礼活动，是萧齐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秘书省作为国家文化机构，必然也要参与。

国史修撰，仍例由秘书省所属的著作官承担。但萧齐在继承刘宋史官制度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史修撰多以外朝的其他官员兼任，而不用著作郎；二是著作官员专司集注起居，且在内朝任职。其中第一个变化，即国史修撰不用著作官而以他官兼领，与刘宋时期相比，是最大的不同。据《南齐书》卷52《丘灵鞠传》："建元元年，转中书郎，中正如故，敕知东宫手笔。寻又知掌国史。"又同卷《檀超传》："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又

《南齐书》卷36《谢超宗传》："世祖即位，使掌国史，除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领记室。"另外，沈约在建元四年（482年），也是"被敕撰国史"[1]。除了国史修撰不由著作郎承担外，前代历史的修撰，也不让著作郎插手，据《南齐书》卷52《王智深传》：齐世祖萧赜"又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其中未见王智深有任职著作官员的记载。另外，国史修撰及前代历史修撰，多是奉皇帝之敕令而进行。

关于萧齐著作官职司起居注，萧齐初年已然，据《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萧道成即位之初，崔祖思在上疏中曾论及史官事，云："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所云"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验诸史籍，确乎不爽，如周颙曾"转太子仆，兼著作，撰起居注"[2]。又如王逡之，"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3]。萧齐除以著作官掌起居注外，有时还以其他官员，如侍中等内侍官集注起居，如王思远在齐明帝时，就曾以侍中掌起居注，据《南齐书》卷43《王思远传》："上既诛（王）晏，迁为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有人认为，齐著作官例同内侍官，其集注起居的制度，实袭自晋朝[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为萧齐确定了著作官专门负责起居注的制度，故而其起居注修撰较之刘宋，更加系统完整，据《隋书》卷33《经籍志二》所载，萧齐起居注有"《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梁有二十四卷，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兴、建武起居注》四卷，《中兴起居注》四卷，亡）"。除缺少东昏侯萧宝卷永元起居注外，其他基本毕备。虽然各起居注未标出撰写者，但以前引崔祖思所陈启可知，这些起居注当由著作官员完成无疑。南齐秘书、著作官员的情况如下。

[1]《宋书》卷100《自序》。

[2]《南齐书》卷41《周颙传》。

[3]《南齐书》卷52《文学·王逡之传》。

[4]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5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表二　南齐秘书、著作官简况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王寂	琅邪临沂	秘书郎	南齐/33/2/598	
萧子晋	南兰陵	秘书监	南齐/35/2/622	宗室
萧鉴	南兰陵	秘书监	南齐/35/2/629	宗室
萧锋	南兰陵	加秘书监	南齐/35/2/630	宗室
萧颖胄	南兰陵	秘书郎	南齐/38/2/665	宗室远属
陆澄	吴郡吴	秘书监	南齐/39/2/683	3 次任此职
萧子卿	南兰陵	秘书监	南齐/40/3/704	宗室
萧赏	南兰陵	秘书郎	南齐/42/3/749	宗室
江祀	济阳考城	秘书丞	南齐/42/3/752	
江敩	济阳考城	秘书监	南齐/43/3/759	
谢瀹	陈郡阳夏	秘书郎	南齐/43/3/763	
萧遥欣	南兰陵	秘书郎	南齐/45/3/792	宗室
萧遥昌	南兰陵	秘书郎、丞	南齐/45/3/792	宗室
王慈	琅邪临沂	秘书丞	南齐/46/3/802	皇室姻亲
王融	琅牙临沂	秘书丞	南齐/47/3/818	
萧宝攸	南兰陵	秘书监	南齐/50/3/865	宗室
江淹	济阳考城	秘书监	梁/14/1/250	2 次任此职
谢朏	陈郡阳夏	秘书监	梁/15/1/262	
谢览	陈郡阳夏	秘书郎	梁/15/1/265	尚齐钱唐公主
王暕	琅邪临沂	秘书丞	梁/21/2/322	尚淮南公主
王泰	琅邪临沂	秘书郎	梁/21/2/323	
王份	琅邪临沂	秘书监	梁/21/2/325	
袁昂	陈郡阳夏	秘书丞	梁/31/2/451	
萧子恪	南兰陵	秘书监	梁/35/2/507	宗室
何胤	庐江灊	秘书郎	梁/51/3/735	
王肃	琅邪临沂	秘书丞	魏/63/4/1407	

续表

著作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周颙	汝南安城	著作郎	南齐/41/3/732	3次任此职
王嵩之	琅邪临沂	兼著作郎	南齐/43/3/767	
王逡之	琅邪临沂	著作郎	南齐/52/3/902	3次任此职
沈顗	吴兴武康	著作郎	南齐/54/3/944	
王瞻	琅邪临沂	著作佐郎	梁/21/2/317	
萧秀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22/2/342	宗室远属
萧业	南兰陵	著作郎	梁/23/2/360	宗室远属
萧藻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23/2/361	宗室远属
傅昭	北地灵州	领著作郎	梁/26/2/393	
萧介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41/3/587	宗室远属
萧洽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41/3/589	宗室远属
萧眎素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52/3/762	宗室远属
王僧祐	琅邪临沂	著作佐郎	南史/21/2/580	
王肃	琅邪临沂	著作郎	魏/63/4/1407	

（三）萧梁、陈朝的秘书、著作官

梁初官制基本沿袭萧齐。但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对官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将职官九品变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梁武帝的官制改革，也直接影响到秘书、著作官，如班品、职掌等方面，与萧齐时虽大体相同，却也有些许变异。据《隋书》卷26《百官志上》：梁“秘书省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谓之大著作，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又有撰史学士，亦知史书。佐郎为起家之选”。

萧梁秘书省的主要职掌，依然是“掌典籍图书”，负责图书典籍的收藏、保管与编目，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萧子显，“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1]。皇侃“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

【1】《梁书》卷35《萧子显传》。

成奏上，诏付秘阁”[1]。萧子云“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2]。再如，徐勉在普通年间，负责组织修撰“五礼”，最后完成“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3]。以上诸例都说秘书监收藏保管图书典籍之责。秘书监还要对所收藏的图籍进行编目等管理工作，如任昉曾任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4]。正因为秘书省收藏有大量的图书典籍，故有好学者每每求请到秘书省观书，或任职秘书省而不愿升迁，前者如江子一，起家王国侍郎、奉朝请，曾“启求观书秘阁”，梁武帝许之，遂敕直华林省[5]。后者如张缵，尚梁武帝女富阳公主，起家秘书郎，“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6]。秘书监有时也直接参加史书修撰，如谢昊就曾以秘书监的身份，与沈约等人一起修撰国史[7]。江淹亦曾以秘书监身份重新修订《齐史》十志[8]。不过，秘书监亲自参加史书编撰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这项工作主要由其下属的著作官承担。

萧梁国史修撰主要由著作郎负责，著作郎号称大著作。此外，萧梁以他官兼领大著作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所统计到的萧梁国史修撰诸例，几乎都是如此。萧梁的著作郎，还几乎毫无例外地待诏文德省，负责起居注的撰写。像这样由著作郎既掌国史，又集注起居的情况，与宋、齐时期相比，的确有较大不同。这方面的例子，史籍记载颇多，如裴子野，“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以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9]。又如“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撰国史，引（刘）显为佐”[10]。再如王僧孺，“天监初……待诏文德省。……拜中书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迁尚书左丞，领著作如故”[11]。前者裴子野是以著作郎而身兼国史修撰与起居注二职；中者是傅昭以五兵尚书领著作的身份，修撰国史；后者是王僧孺以中书郎领著作的身份，修撰起居注。除此而外，萧梁著作郎有时还要承担一些临时

【1】《梁书》卷48《皇侃传》。

【2】《梁书》卷35《萧子云传》。

【3】《梁书》卷25《徐勉传》。

【4】《梁书》卷14《任昉传》。

【5】《梁书》卷43《江子一传》。

【6】《梁书》卷34《张缵传》。

【7】《史通》卷12《古今正史》。

【8】《梁书》卷14《江淹传》。

【9】《梁书》卷30《裴子野传》。

【10】《梁书》卷40《刘显传》。

【11】《梁书》卷33《王僧孺传》。

性的修撰任务，如陆云公，“梁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初，（陆）琼父云公奉梁武帝诏敕撰《嘉瑞记》”[1]。陆云公校定《棋品》、撰写《嘉瑞记》，都是奉诏而为的临时性修撰任务[2]。

除著作郎、著作佐郎外，萧梁著作官序列中还有著作令史、撰史学士等职，据《隋书》卷26《百官志上》，萧梁著作正史，为三品蕴位，至于撰史学士，或称“修史学士”，则是承袭萧齐而来[3]。

再就萧梁时期秘书官、著作官的人选来看，也会发现不同于宋齐时期的一些情况。根据对萧梁时期秘书、著作官情况的分析，发现秘书、著作官作为起家官，在萧梁时期已经明显出现分途而进的趋势，在宋齐时期尤其是刘宋时期，秘书、著作官同为天下“清官”的情况，到萧梁时期已经不尽如此。作为起家官，秘书郎更加“清华”，基本为世家大族、皇亲国戚所垄断。与此同时，著作官虽不能说沦落到“浊官”的行列，但已不再“清华”，根本无法和秘书郎等相比。实际上，早在萧齐时期，秘书郎与著作佐郎、著作郎在起家之选的道路上，已经开始出现分途的现象，当时的一流高门，就已经不愿就任著作官，却愿意应秘书郎之选，如琅邪王峻，“起家著作佐郎，不拜”[4]；王泰“起家为著作郎，不拜，改除秘书郎”[5]。这种情况到萧梁时更加如此，就统计到的萧梁著作佐郎，其家庭出身均非高门，绝大多数为中下层士族子弟。而秘书官甚至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官”，如吴郡著姓张率，“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6]。再如刘孝绰，“出为上虞令，还除秘书丞。高祖谓舍人周捨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此职”[7]。凡此均可见秘书官之为时人所看重。

【1】《陈书》卷30《陆琼传》。

【2】《梁书》卷50《陆云公传》，云公先后以尚书仪曹郎、给事黄门侍郎兼领著作郎。

【3】《史通》卷11《史官建置》云，萧齐“又置修史学士”。

【4】《梁书》卷21《王峻传》。

【5】《梁书》卷21《王泰传》。

【6】《梁书》卷33《张率传》。

【7】《梁书》卷33《刘孝绰传》。

表三　梁朝秘书、著作官简况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柳忱	河东解	秘书监	梁/12/1/219	
江淹	济阳考城	秘书监	梁/14/1/250	
任昉	乐安博昌	秘书监	梁/14/1/254	
王亮	琅邪临沂	秘书监	梁/16/1/270	
王训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梁/21/2/323	
王泰	琅邪临沂	秘书丞	梁/21/2/324	
王锡	琅邪临沂	秘书郎	梁/21/2/326	
王佥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中	梁/21/2/327	
柳恽	河东解	秘书监	梁/21/2/332	
蔡撙	济阳考城	侍中领秘书监	梁/21/2/333	
江蒨	济阳考城	秘书郎、丞	梁/21/2/334	
萧推	南兰陵	秘书丞	梁/22/2/346	宗室
萧范	南兰陵	秘书郎	梁/22/2/352	宗室
萧业	南兰陵	秘书监	梁/23/2/360	宗室
萧孝俨	南兰陵	秘书郎	梁/23/2/361	宗室
萧象	南兰陵	秘书监	梁/23/2/364	宗室
萧昱	南兰陵	秘书郎	梁/24/2/371	宗室
傅昭	北地灵州	秘书监	梁/26/2/393	2 次任此职
萧琛	南兰陵	秘书监	梁/26/2/397	宗室远属
陆杲	吴郡吴	秘书监	梁/26/2/399	
殷钧	陈郡长平	秘书郎、丞	梁/27/2/407	尚永兴公主
陆襄	吴郡吴	秘书监	梁/27/2/409	
张率	吴郡吴	秘书丞	梁/33/2/475	
张缅	范阳方城	秘书郎	梁/34/2/491	外戚
张缵	范阳方城	秘书郎	梁/34/2/493	外戚
张绾	范阳方城	秘书郎	梁/34/2/503	外戚
萧子恪	南兰陵	秘书监	梁/35/2/509	宗室远属
萧子范	南兰陵	秘书监	梁/35/2/510	宗室远属

续 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萧序	南兰陵	秘书郎	梁/35/2/513	宗室远属
萧子云	南兰陵	秘书郎	梁/35/2/515	宗室远属
孔休源	会稽山阴	秘书监	梁/36/2/520	
谢举	陈郡阳夏	秘书郎、丞	梁/37/2/529	
何敬容	庐江灊	秘书郎、丞	梁/37/2/531	
王规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梁/41/3/581	
王褒	琅邪临沂	秘书郎、丞	梁/41/3/583	
王承	琅邪临沂	秘书郎	梁/41/3/585	
褚向	河南阳翟	秘书郎	梁/41/3/585	
褚翔	河南阳翟	秘书郎	梁/41/3/586	
褚球	河南阳翟	秘书监领著作	梁/41/3/590	
殷芸	陈郡长平	秘书监	梁/41/3/596	
张嵊	吴郡吴	秘书郎	梁/43/3/609	起家官
谢征	陈郡阳夏	秘书监	梁/50/3/717	
王冲	琅邪临沂	秘书郎	陈/17/2/235	起家官
王通	琅邪临沂	秘书郎	陈/17/2/237	
王劢	琅邪临沂	秘书郎	陈/17/2/238	
袁敬	陈郡阳夏	秘书郎	陈/17/2/239	起家官
袁枢	陈郡阳夏	秘书郎	陈/17/2/240	起家官
王质	琅邪临沂	秘书郎	陈/18/2/247	起家官
谢哲	陈郡阳夏	秘书郎	陈/21/2/277	起家官
谢嘏	陈郡阳夏	秘书郎	陈/21/2/279	起家官
王固	琅邪临沂	秘书郎	陈/21/2/282	起家官
王玚	琅邪临沂	秘书郎	陈/23/2/301	起家官
徐陵	东海	秘书监	陈/26/2/332	
萧济	东海兰陵	秘书郎	陈/30/2/395	起家官
徐僧权	东海郯	领秘书郎	陈/34/2/468	
王彬	琅邪临沂	秘书监	南史/22/2/611	

续 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王寂	琅邪临沂	秘书郎	南史/22/2/612	
王实	琅邪临沂	秘书郎	南史/23/2/623	起家官,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
袁宪	陈郡阳夏	秘书郎	南史/26/2/719	起家官
著作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徐悱	东海郯	著作佐郎	梁/25/2/388	
傅昭	北地灵州	领著作郎	梁/26/2/393	
陆襄	吴郡吴	著作佐郎	梁/27/2/409	
裴子野	河东闻嘉	著作郎	梁/30/2/443	
王僧孺	东海郯	领著作郎	梁/33/2/470	
刘孝绰	彭城	著作佐郎	梁/33/2/481,483	
徐谅	彭城	著作佐郎	梁/33/2/484	
萧持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35/2/515	宗室远属
到荩	彭城武原	著作佐郎	梁/40/2/569	起家官
许懋	高阳新城	著作郎	梁/40/2/575	
刘刍	彭城	著作郎	梁/41/3/592	
刘遵	彭城	著作郎	梁/41/3/593	起家官
萧几	南兰陵	著作佐郎	梁/41/3/597	起家官
柳敬礼	河东解	著作佐郎	梁/43/3/611	起家官
许云	吴郡吴	著作郎	梁/50/3/724	
虞荔	会稽余姚	领著作郎	陈/19/2/256	
萧引	南兰陵	著作佐郎	陈/21/2/288	起家官
谢绥	陈郡阳夏	领著作佐郎	陈/32/2/426	
杜之伟	吴郡钱唐	中书侍郎领著作	陈/34/2/454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包括国史修撰在内的所有与图书典籍出版、编撰、整理有关的文化事业，虽然有秘书、著作官员

专职负责，但以他官兼职著作事宜的情况，也始终存在。这种情况在萧梁时期，似乎还要更多一些，如萧梁的文德省、寿光省等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成为国家组织较大规模编撰出版的主要场所[1]。

由于陈朝职官制度基本承袭梁朝，且立国时间较短，故而在此附带说一下陈朝秘书著作官的情况。

陈朝秘书、著作官人选情况与萧梁时期基本相同。其中著作郎俗称大著作，全部都以他官兼领，负责国史及其他各朝史书的撰写，如杜之伟、许亨、虞荔、徐陵、陆琼、姚察等人，都是以他官兼领著作[2]。著作佐郎，员额依然为8人，其出身门第较之齐、梁时期，进一步下降，据《隋书》卷26《百官志上》："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这表明著作官与秘书郎在起家之选的分途中，进一步"浊化"的倾向。另外，在著作官内部似乎也开始有等级之分，仍据上引《隋志》，"秘书著作佐郎（自注：并四百石。依减秩例。）……品并第七"。自注中所谓"并四百石。依减秩例"，意味着著作佐郎中也开始分等，一种是四百石七品著作佐郎，另一种是同四百石依减秩例七品佐郎。这种分等，说明著作官员内部因为分工不同，所承担的任务轻重有异，故而重要程度也就不一样了，因而开始有等级之分[3]。这种情况说明，随著作官制度本身的发展和完善，其职官体系也需要进一步细化，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同萧梁一样，陈朝亦有著作令史、撰史学士等职。其中撰史学士，又称"撰史著士"，其官品史书阙如，大概是不入品的散官，张正见、顾野王、阮卓、许善心等人曾任此职。

【1】《梁书》卷33《王僧孺传》，卷33《张率传》，卷40《许懋传》，卷49《到沆传》、《袁峻传》、《庾於陵传》，卷50《任孝恭传》，以及《陈书》卷19《虞荔传》。

【2】《陈书》诸传。

【3】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一书有关章节，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表四　陈朝秘书、著作官简况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蔡景历	济阳考城	秘书监	陈/16/1/226	
徐仪	东海郯	秘书郎	陈/26/2/336	
江灌	济阳考城	秘书郎	陈/27/2/347	

续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姚察	吴兴武康	秘书监领著作	陈/27/2/350	
江德藻	济阳考城	秘书监	陈/34/2/457	
庾持	颍川鄢陵	秘书监	陈/34/2/458	
蔡凝	济阳考城	秘书郎	陈/34/2/470	起家官
著作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虞荔	会稽余姚	领著作郎	陈/19/2/257	
徐陵	东海郯	领著作郎	陈/26/2/332	
陆琼	吴郡吴	著作郎	陈/30/2/396	
陆从典	吴郡吴	著作佐郎	陈/30/2/398	起家官
顾野王	吴郡吴	领著作郎	陈/30/2/399	
许穹	高阳新城	领著作郎	陈/34/2/459	
张正见	清河东武城	撰史著士	陈/34/2/470	
阮卓	陈留尉氏	撰史著士	陈/34/2/472	

二、北朝的秘书省与著作官

北朝的秘书省与著作官，在名称上与南朝大致相同，但具体职掌方面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北朝的著作郎一职，多数都加有军号，且任职者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或确曾领兵打仗，而南朝这种情况则几乎不见。若从国史修撰这一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差异更为明显，北朝修史机构不但比南朝完善周密，而且更加制度化、正规化，且创立了国史监修制度。另外，从北魏到北齐、北周，著作、起居逐渐明显分为二途，与南朝著作、起居往往合二为一、身兼两任的情况，大为不同[1]。以下即以史官制度为核心，对北朝秘书、著作等国家编撰机构的职掌、变化等方面情况，略加叙述。

【1】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4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一）北魏的秘书省与著作官

1. 北魏秘书、著作官体系的历史追溯

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鲜卑，本为北方草原一游牧部落，在正式建国以前，曾长期活动在今中国北部鄂尔多斯草原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图28）。由于和汉族接触较少，其文化极为落后，刚刚由畜牧业进入农耕业，处在氏族公社到部落联盟阶段。一直到拓跋猗卢南至勾注泾北地区，接受西晋册封为代公、代王，才开始建立起带有国家性质的政权，与汉族的接触才逐渐增多。但在猗卢被其子六修杀害之后，代政权又进入了长期的混乱之中。在经



图28
北魏鲜卑的发祥地嘎仙洞石室遗址

过几代混乱之后，到拓跋什翼犍统治时期，拓跋鲜卑才开始设置百官，并移都盛乐，筹建国家。正是从什翼犍时起，拓跋鲜卑才摆脱过去“不为文字，刻木纪契”的原始记事方式，进入了有册簿记录的文字时代[1]。据《魏书》卷24《许谦传》载：“许谦，字元逊，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即拓跋什翼犍）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不过，由于这时候的代政权还只处在国家的雏形阶段，其职官设置极其简率，尚不成体系，因此要说这时已经有了专职的著作官，还为时尚早，许谦所任郎中令只是“兼掌文记”，最多只能算是兼职。

【1】《魏书》卷1《序纪》。

拓跋什翼犍统治不久，代政权又为前秦所灭，直到淝水之

战，前秦瓦解之后，什翼犍孙拓跋珪被推为盟主，于登国元年（386年）继称代王，建都盛乐，不久拓跋珪改称魏王，拓跋鲜卑才正式复国。拓跋珪继称代王，特别是称魏王后，更加注意学习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并大量吸收汉人士大夫到统治集团中来。可以说，从拓跋珪统治起，拓跋鲜卑才走上了社会、文化进步的快车道。据《魏书》卷2《太祖纪》，皇始元年（396年）“始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1]。尽管拓跋珪所建职官制度，还具有浓厚的“胡汉杂糅”的色彩，但北魏的职官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有材料表明，从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时起，北魏的秘书、著作官就初步建立起来。据《魏书》卷24《邓渊传》，邓渊“博览经书，长于《易》筮。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从邓渊所造《国记》“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可知,其时北魏当已有“起居注”的修撰。至于邓渊奉敕所撰《国记》，视为北魏国史修撰之滥觞，亦未尝不可。另据同书卷24《崔玄伯传附次子崔简传》，崔简“好学，少以善书知名。太祖初，历位中书侍郎、征虏将军，爵五等侯，参著作事”，显然，崔简是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参与“著作事”的，这是模仿的汉魏旧制，因为曹魏、西晋时期，著作官一度属于中书省，其时著作郎一般称为“中书著作郎”。崔简的事例正好为北魏前期官制“胡汉杂糅”，提供了一个直接证据：由于拓跋鲜卑文化落后，故而在与文化事业有关的著作官等职官的设置上，只能采用汉魏旧制。

[1]《魏书》卷113《官氏志》所载与此大致相同。

北魏前期著作官中，另有“占授著作郎”一职需加注意。据《魏书》卷2《太祖纪》，天赐三年（406年）四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虚立成图》三百六十时”。同书卷108《礼志》：“太祖天赐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唯时间不同，可能是四月始造，至十月完成。或以为此职之设置，表明北魏早

期史官巫史不分[1]。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1】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6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随北魏势力在中原地区的扩张及其社会文化全面进步，其职官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秘书、著作官的建置也日臻完备。据《魏书》卷113《官氏志》，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曾两次议定百官，第一次颁布的职官体系中，有秘书监，二品下；秘书令，三品上；秘书丞，四品下；秘书著作郎，五品上；秘书郎、秘书著作佐郎，五品中；集书校书郎、秘书著作郎、秘书钟律郎，从六品上；秘书舍人、秘书令史、集书令史，七品中。第二次是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制定的职官令，这次职官令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后，才正式颁行，并成为北魏后期的职官标准，在这个职官系列中有：秘书监，三品；秘书丞，五品；著作郎，从五品；秘书郎中、著作佐郎，七品；校书郎，九品。第一次职官令是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北奔后帮助孝文帝制定的，主要是对南朝官制的模仿[2]。由于时间紧迫，这个职官令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一个征求意见的草案。太和二十三年的职官令，则是在经过仔细研究，认真推敲后制定出来的定稿，它直到孝文帝驾崩后才正式颁布，基本确定了北魏后期的职官制度。职此之故，第一次职官令在职官体例上芜杂不清，许多职官都存在重复交叉设置的现象，这个情况在秘书、著作官的构成上也有体现，如前一职官令中的秘书令、秘书钟律郎、秘书舍人、秘书令史诸职，在后一职官令中就已不见。此外，秘书、著作官员的品级上，后者也比前者有不同程度的下调，如秘书监、著作郎、校书郎等职，都相应地下调了半品至三品不等。

【2】《通典》卷19《职官一》:“至孝文太和中（即太和十七年),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改次职令,以为永制。”

孝文帝太和年间改定官制，是对北魏前期官制的一次全面整饬，并由此基本奠定了北魏后期官制的标准。其指导思想则主要是模习南朝，即“百司位号，皆准南朝”，这是孝文帝改制的主流。但这并不是说北魏此前已有的职官设置，在新颁职官令就无足轻重而委诸沟壑。因此，欲全面认识、把握北魏的职官制度，除了应对孝文改制后的职官制度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对此前的职官制度进行分析，对北魏的秘书、著作官制度的研究，

也必须如此。

2. 北魏的著作局与著作官

北魏前期职官体系中，存在两个秘书机构，一为内秘书，一为秘书省。内秘书始置于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之前，据《魏书》卷46《许彦传附子许宗之传》："初入为中散，领内秘书。世祖临江，赐爵高乡侯。" "世祖临江"指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南征至瓜步，因此知该职当置于此前。内秘书设在禁中，故又称中秘，职掌参议机密，出纳诏命，权力极大，如李敷、李䜣、李冲等均曾担任此职[1]。内秘书官员来源为中书学生，中书学系北魏统治者为培养鲜卑贵族及汉族高官子弟而设立的特殊学校，该校学生学成，按通例均可出任内秘书等内侍官，执掌机要。与内秘书几乎同时成立的秘书省，一般称为外秘书，职掌图籍文书、撰写历史，权力很小，一般由汉人文士充当，如高允、高祐、韩兴宗等均曾担任此职[2]。因此，秘书省主要是文化机构。同一时期的中书省，职掌主持中书学，但由于距离禁中较远，且内秘书在当时执掌机要，故而它更多的是参与撰写历史和撰写官场上应时的诏旨，并未能进入权力核心，因此在性质上与秘书省相似，更像是文化机构，所以当时的中书省，尽管地位十分崇重，但在实际权势上远不如内秘书。

[1]《魏书》卷36、卷46、卷53诸传。

[2]《魏书》卷48、卷57、卷60诸传。

北魏秘书省设有著作局，或称著作省，刘知几《史通》卷11《史官建置》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它官，不恒厥职，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另外，《通典》、《大唐六典》等均有"后魏著作省置校书郎"的记载，其中的"著作省"当即"著作局"。著作局作为北魏的官方修史机构，建置于何时？有学者考证，认为当在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以后，皇兴五年（471年）之前[3]。那么，在著作局成立之前，北魏的著作官设置情况，就只能是"杂取它官，不恒厥职"，著作郎等职并不常设，大概是有撰事则置，无撰事则罢，其间见诸史籍的著作郎，有邓渊、崔琛、崔浩、高允、宗钦、段承根、阴仲达等人。因为著作

[3]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67—1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官员不是常设,故当时史官多数取自中书、秘书二省官员，这种以他官兼掌修撰者，一般称为“参著作”或“参著作事”。如崔简“太祖初，历位中书侍郎、征虏将军，爵五等侯，参著作事”，这是崔简以中书侍郎、征虏将军的身份“参著作事”。又如神䴥二年（429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崔）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再次下令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崔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1]。总之，在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国史修撰事宜主要由秘书省负责，中书省的官员（如中书侍郎等）也扮演重要角色。也正因此，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诛杀崔浩后，“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北魏“国史之狱”死难者，主要是秘书官员（图29）。

【1】《魏书》卷35《崔浩传》。

【2】《魏书》卷62《李彪传》。

【3】《魏书》卷67《崔光传》。

图29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拓本



一般认为，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国史之狱”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北魏罢置史官，一直到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460年）才又重新恢复史官。从和平元年恢复著作官，到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历任著作郎、佐郎者代不绝书。除此而外，北魏以他官兼领著作者，也是极为常见，如李彪、高祐就曾分别以秘书丞、秘书令的身份参著作事[2]。这是以秘书官员参撰国史。再如孙惠蔚，也曾以黄门侍郎代领著作事。这是以门下官员参与修撰。甚至还白衣修史者，据《魏书》卷67《崔光传》：“初，（崔）光与李彪共撰国书，太和之末，彪解著作，专以史事任光。彪寻以罪废。世宗居谅闇，彪上表求成《魏书》，诏许之，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著述。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3]

表五　北魏秘书、著作官简况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元稚	代	秘书郎中	魏/16/2/408	宗室
元爽	代	秘书郎	魏/16/2/409	宗室
元太兴	代	秘书监	魏/19 上/2/443	宗室
元详	代	秘书监	魏/21 上/2/559	宗室
崔徽	清河东武城	秘书监	魏/24/2/624	
穆建	代	秘书郎	魏/27/2/667	勋臣八姓，起家
穆绍	代	秘书监	魏/27/2/671	勋臣八姓
穆铁槌	代	秘书郎	魏/27/2/673	勋臣八姓
高谧	勃海蓨	秘书郎	魏/32/3/752	
王宪	北海剧	秘书郎	魏/33/3/776	
李预	中山卢奴	秘书令	魏/33/3/791	
刁献	勃海饶安	秘书郎	魏/38/3/871	
李德明	陇西狄道	秘书郎	魏/39/3/889	
李伯尚	陇西狄道	秘书郎、丞	魏/39/3/893	撰太和起居注
李季凯	陇西狄道	秘书监	魏/39/3/894	
源子雍	河西	秘书郎	魏/41/3/929	河西秃发氏
房坚	清河绎幕	秘书郎	魏/43/3/972	
伊	代	秘书监	魏/44/3/990	宗族十姓
韦朏	京兆杜陵	秘书郎中	魏/45/3/1015	
裴询	河东闻喜	秘书监	魏/45/3/1023	曾监起居事
窦瑾	顿丘卫国	秘书监	魏/46/3/1035	
卢渊	范阳涿	秘书令、监	魏/47/3/1047	
卢道裕	范阳涿	秘书丞	魏/47/3/1051	尚乐浪公主
卢义僖	范阳涿	秘书郎	魏/47/3/1053	起家官
卢元缉	范阳涿	秘书郎	魏/47/3/1061	起家官
刘模	长乐信都	秘书校书郎	魏/48/3/1093	
吕世兴	东平寿张	秘书校书郎	魏/51/4/1140	
胡丑孙	安定临泾	秘书郎	魏/52/4/1149	
游雅	广平任	秘书监	魏/54/4/1195	
游祥	广平任	秘书郎	魏/55/4/1218	

续表

秘书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刘懋	彭城	秘书郎	魏/55/4/1230	
郑羲	荥阳开封	秘书监	魏/56/4/1238	
郑道昭	荥阳开封	秘书郎、丞、监	魏/56/4/1240	
郑敬宾	荥阳开封	秘书郎	魏/56/4/1249	
高祐	勃海蓨	秘书令	魏/57/4/1260	
崔孝忠	博陵安平	秘书郎	魏/57/4/1274	
韩兴宗	昌黎棘城	秘书郎	魏/60/4/1333	
程骏	广平曲安	秘书令	魏/60/4/1346	
毕哲	东平安昌	秘书郎	魏/61/4/1365	
李彪	顿丘卫国	秘书丞、令	魏/62/4/1381	
王诵	琅邪临沂	兼秘书监	魏/63/4/1412	
元梵	代	秘书丞	魏/65/4/1453	宗室
李谐	顿丘卫国	秘书监	魏/65/4/1461	
崔光韶	清河东武城	兼秘书郎	魏/66/4/1482	掌校华林御书
崔子元	清河	秘书郎	魏/67/4/1505	
甄侃	中山毋极	秘书郎	魏/68/4/1517	起家官
甄楷	中山毋极	秘书郎	魏/68/4/1517	
高长云	勃海蓨	秘书郎	魏/68/4/1523	
李凯		秘书监	魏/69/5/1528	
皇甫长卿	安定朝那	秘书郎中	魏/71/5/1579	
房亮	清河	秘书郎	魏/72/5/1621	
山伟	河南洛阳	秘书监	魏/81/5/1792	原籍代
李琰之	陇西狄道	秘书监	魏/82/5/1797	修国史
祖莹	范阳遒	秘书监	魏/82/5/1800	
常景	河内	秘书监	魏/82/5/1805	
梁祚	北地泥阳	秘书令	魏/84/5/1845	
平恒	燕国蓟	秘书丞	魏/84/5/1845	
孙惠蔚	武邑武遂	秘书丞	魏/84/5/1845	

续表

著作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邓渊	安定	著作郎	魏/24/2/635	
封回	勃海蓨	著作佐郎	魏/32/3/764	
谷纂	昌黎	著作郎	魏/33/3/782	曾监国史
王遵业	太原晋阳	著作佐郎	魏/38/3/878	
李瑾	陇西狄道	著作佐郎	魏/39/3/888	
李燮	陇西狄道	著作佐郎	魏/39/3/889	
陆恭之	代	著作佐郎，领著作郎	魏/40/3/907	勋臣八姓
房景先	清河绎幕	兼著作佐郎	魏/43/3/978	修国史、起居注
许赤虎	博陵	著作佐郎	魏/46/3/1038	
高允	勃海蓨	领著作郎	魏/48/3/1068	
闵湛		著作令史	魏/48/3/1069	
郄标		著作令史	魏/48/3/1069	
宗钦	河西金城	著作郎	魏/52/4/1155	
李叔胤	赵郡平棘	著作佐郎	魏/49/3/1103	
成淹		著作佐郎	魏/50/3/1120	
裴定宗	河东闻喜	著作佐郎	魏/52/4/1151	
段成根	武威姑臧	著作郎	魏/52/4/1158	
阴仲达	武威姑臧	秘书著作郎	魏/52/4/1158	
李郁	赵郡平棘	著作佐郎	魏/53/4/1178	
游雅	广平任	著作郎	魏/54/4/1195	
郑敬祖	荥阳开封	著作佐郎	魏/56/4/1243	起家官
崔孝芬	博陵安平	著作郎	魏/57/4/1266	
韩显宗	昌黎棘城	著作佐郎	魏/60/4/1338	
程骏	广平曲安	著作佐郎、郎	魏/60/4/1345	
程灵虬	广平曲安	著作佐郎、郎	魏/60/4/1350	
傅毗	渔阳	著作郎	魏/62/4/1397	
王理	琅邪临沂	著作佐郎	魏/63/4/1412	

续 表

著作官员				
姓名	籍贯	任职	资料出处	备注
郭庆礼	太原晋阳	著作佐郎	魏/64/4/1427	
张珉	清河东武城	著作佐郎	魏/64/4/1434	
邢祐	河间鄚	著作郎	魏/65/4/1449	
邢产	河间鄚	著作佐郎	魏/65/4/1449	
李邕	顿丘卫国	著作佐郎	魏/65/4/1461	
崔光	清河	著作郎	魏/67/4/1487	
裴延儁	河东闻喜	著作佐郎	魏/69/5/1528	
裴景融	河东闻喜	著作佐郎	魏/69/5/1534	
裴聿	河东闻喜	著作佐郎	魏/69/5/1535	
袁翻	陈郡项	兼著作佐郎	魏/69/5/1536	
柳谐	河东解	兼著作佐郎	魏/71/5/1577	
阳尼	北平无终	秘书著作郎	魏/72/5/1601	
山伟	河南洛阳	领著作郎	魏/81/5/1792	土难氏 改
刘仁之	河南洛阳	著作郎	魏/81/5/1794	本代人
李琰之	陇西狄道	兼著作郎	魏/82/5/1797	修国史
平恒	燕国蓟	著作佐郎	魏/84/5/1845	
阳嘏	北平	著作佐郎	魏/84/5/1845	
裴定	河东闻喜	著作佐郎	魏/84/5/1845	
赵元顺	河西金城	著作佐郎	魏/84/5/1845	
孙惠蔚	武邑武遂	著作郎	魏/84/5/1854	
李同轨	赵郡高邑	著作郎	魏/84/5/1860	修国史
李业兴	上党长子	著作佐郎	魏/84/5/1862	

3. 监修制度与集书省

与南朝史官制度有很大不同的一点，是北魏确立了监修制度。北魏监修制度，一般认为创始于太武帝拓跋焘时。神䴥二年（429年）、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先后两次下诏征集学士撰述国史，均以崔浩总领其任，是为国史监修之肇端。崔浩之后，高允、李彪、崔光、崔鸿等人又先后典领国史，逐渐成为

制度。史料表明，在孝明帝元诩正光以前，监修者全为汉人。其后，国史监修之权转由少数民族人物充当，即“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1]。谷纂、山伟出自代北少数民族，由于受文化水平限制，谷、山二人在主事期间无所发明，史言谷纂虽监修国史，而“不能有所缉缀”[2]，山伟主事国史，亦无任何著述，“时事荡然，万不记一”[3]。北魏创造的国史监修制度，为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朝所继承，并为其后的隋、唐所承继发扬。

【1】《史通》卷11《史官建置》。

【2】《魏书》卷33《谷浑传附孙谷纂传》。

【3】《魏书》卷81《山伟传》。

这里还要提及北魏的集书省及记注官。集书省为北魏后期职官制度中央“六省”之一，六省中尚书、中书、门下这前三省权力重大，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后三省即秘书、集书、中侍中三省，其中的秘书、中侍中二省系北魏前期内侍官组织之遗留，集书省则系模仿南朝制度而设置，在性质上与秘书省有较大相似性，更多地是参与国史修撰、图书收集整理等文化事务，因此也可以说算得上是文化机构。据《通典》卷21《职官三》，北魏、北齐皆置集书省，隶属于门下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据此，集书省与现实政治联系密切。集书省和著作官员的联系，是由于它兼掌起居注的缘故。在献文帝拓跋弘以前，北魏不置起居官，起居注由著作官或其他文职侍官兼任。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始置左、右史官[4]，记注官制度始确立。孝文帝所置之“左、右史”，即起居令史，据《通典》卷21《职官三》：“后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据《魏书》之《官氏志》，起居令史官从七品上。又据《大唐六典》“门下省”条，后魏“集书省领起居注令史之职，从第七品上”。可知，起居注令史实归集书省领导。关于集书省负责起居注修撰，这里还有直接例证，孝文帝曾就起居注编撰事宜，批评过负责集书省事务的尉羽、卢渊、元景等人，据《魏书》卷21《广陵王羽传》：

【4】《魏书》卷7《高祖纪》。

（孝文帝）又谓守尚书尉羽曰："卿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今降为长兼常侍，亦削禄一周。"又谓守尚书卢渊曰："卿始为守尚书，未合考绩。然卿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今降卿长兼王师，守常侍、尚书如故，夺常侍禄一周。"……又谓散骑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于卿。今降为中大夫、守常侍，夺禄一周。"

随起居注修撰工作的继续，到孝明帝元诩时，北魏又设置监典官，加强对起居注修撰的控制，如裴延儁"肃宗初，迁散骑常侍，监起居注"[1]。他如崔鸿、祖莹、羊深、裴伯茂等人，也先后以不同官职充当监典官。设官监典起居注，是对国史监修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制度为其后的东魏、北齐所承继，并成为隋唐，乃至后世国史监修制度的源头。

【1】《魏书》卷69《裴延儁传》。

（二）东魏、北齐的秘书、著作官

东魏、北齐的秘书著作官制度，基本沿袭北魏。著作官隶属于秘书省，但由于著作官多数由中书官员兼任，故国史修撰在实际运行中，由中书机构掌握。起居注的修撰，也与北魏时期大致相同，一般情况下，仍由中书或门下长官监典。

东魏、北齐的秘书、著作官人员组成，可根据《隋书》记载知其大概。《隋书》卷27《百官志中》说："后齐官制，多循后魏……秘书省，典司经籍。监、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领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二人。"另外，集书省在东魏时期仍存在，并在起居注修撰中发挥作用，前引《隋志》曰："集书省……又领起居省，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各一人，校书郎二人。"不过，由于起居注早就归中书、门下长官监典，集书省在起居注修撰方面的作用愈趋式微，特别是高洋受禅、北齐建立，成立史

馆以后，与国史修撰密切相关的起居注修撰，自然而然就成为史馆的职能，集书省及其领导的起居省，也就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转入史馆。

谈东魏、北齐著作官制度的发展，必须注意北齐时期所创立的史馆。高洋在接受魏禅、建立北齐后，为凸显自己的文治武功，于天保二年（551年）建立史馆[1]。此后到国家灭亡，史馆都是北齐最主要的修撰机构。史馆，或称史阁，主要职能和任务就是修撰北齐的国史，至于有时称以“史阁”之名，则主要是就史馆中有收藏图书的阁楼而言。由此可知，史馆同时也是北齐国家的重要藏书处所。

北齐史馆的建筑，除了有收藏图书资料的楼阁建筑（“史阁”）之外，还有史官办公修史的场所，以及缮写抄录的工作室和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宿值处”[2]。作为国家修撰机构，北齐史馆的组织机构比较完备，人员构成及分工都比较明确。主要有监修大臣，著作郎、佐郎，修史臣，校书郎，著作令史等职。

自史馆建立起，北齐监修大臣即例由高官充当。据《北齐书》所载，北齐历任监修大臣有高隆之、魏收、崔劼、赵彦深、阳休之、崔季舒、祖珽等人。先看上述诸人充任监修大臣时的本官官品——高隆之：“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3]，其官一品；魏收则曾两次监修国史，第一次是天保八年（557年），“除太子少傅，监国史”，第二次是皇建元年（560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监史”[4]，官均正三品；崔劼，皇建年间（560年），“寻转五兵尚书，监国史”[5]，官正三品；赵彦深，“河清元年（562年），进爵安乐公，累迁尚书左仆射、齐州大中正，监国史”[6]，官从二品；阳休之，“天统初，征为光禄卿，监国史”[7]，官正三品；崔季舒，“加持节，监国史”[8]，官正二品；祖珽，“由是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撰御书”[9]，祖珽监国史时，官从二品，“入文林馆，总撰御书”时，官正三品。再从他们的出身或家世来看，北齐的监修大臣，或为宗室成员，如高隆之；或出身

【1】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8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18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

【4】《北齐书》卷37《魏收传》。

【5】《北齐书》卷42《崔劼传》。

【6】《北齐书》卷38《赵彦深传》。

【7】《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

【8】《北齐书》卷39《崔季舒传》。

【9】《北齐书》卷39《祖珽传》。



图30
北齐造像碑

名门望族，如魏收、崔劼、崔季舒、阳休之、祖珽等，而且这些人中，除高隆之外，其他人均为硕学鸿儒。北齐监修大臣的崇高社会、政治地位，一方面反映出最高统治者对国史修撰的重视，因而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提高了秘书著作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使得原本就极具荣耀性的修史工作，更加为世人所看重（图30）。

据《隋志》所载，北齐著作郎二人，其品级，为从五品。著作佐郎八人，官七品。校书郎八人，据《大唐六典》记载，北齐著作省校书郎二人，正第九品上[1]。北齐秘书省也置有著作令史，品秩不详。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北齐史馆有所谓“修史臣”，为其他朝代所无。所谓修史臣，据牛润珍所著，为临时抽调入史馆修史的官吏，员额不限，修撰完毕，即还原职，他们不属于史馆固定编制，具有后世使职差遣的性质。如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陆印、李广、綦母怀文等人，都曾以不同官职充当修史臣。一般情况下，修史臣需由著作郎推荐，再经皇帝批准后，方可进入史馆参与修撰。能够充任修史臣者，多数是国子博士、中书侍郎、中书舍人、通直常侍、尚书郎等品级较低的文职官吏。

（三）西魏、北周的秘书、著作官

西魏秘书、著作官一同北魏，秘书监领著作事，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秘书省官员并不承担国史修撰的实际工作，所谓秘书监“领著作、监国史”，只表示著作官员在行政上与秘书省之间的隶属关系。《通典》卷26《职官八》“秘书丞”条下注：“后周柳虬为秘书丞，时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因虬为丞，始令监掌焉。”这表明，在柳虬担任秘书丞之前，西魏秘书“虽领著作”，但“不参史事”。那么，在这期间，国史修撰实际上由哪一部门掌管？根据北魏及东魏北齐同一时期的情况可以推知，在秘书监“不参史事”之前，著作国史诸事实际也归于中书省。

【1】[唐]李林甫等:《大唐六典》卷10“秘书省”条注，222页，三秦出版社影印广池本（广池千九郎校点），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柳虬以秘书丞监掌史事的时间是大统十四年（548年），从这以后，国史著作权转入秘书。这一转变意义重大，标志西魏史官制度的一次巨变，从此著作官就由兼职转为专职。

从魏恭帝二年（555年）开始，宇文泰在西魏推行“复古”改革，模仿《周礼》建立“六官”制。在宇文泰进行的“六官制”改革中，秘书、著作官隶属于春官府。据王仲荦《北周六典》卷4《春官府》：“外史下大夫，正四命。外史上士，正三命。”外史的职掌，与秘书监相同，《大唐六典》卷10载秘书监职掌曰：“后周春官府置外史下大夫，掌书籍，此秘书监之任也。”同卷载秘书丞职掌云：“后周春官府有小外史上士，比秘书丞之任。”这是北周的秘书官。在北周六官序列中，著作上士、著作中士分别与著作郎、佐郎对应。据《大唐六典》载著作郎、佐郎职掌：“后周春官府置著作上士二人，即其（著作郎）职也。……著作中士四人，即著作佐郎之任也。”

据《通典》卷26《职官八》“著作郎”条：“后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缀国录，属春官之外史。”可见在六官制序列中，外史与著作上士、中士之分，实即秘书官员与著作官之分，在行政隶属上，著作上士、中士归外史领导，这与著作郎、佐郎归秘书监领导的情况是相同的。西魏、北周外史负责起居注修撰，国史修撰则归著作上士，据《通典》“后周有外史，掌书王言及勋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著作之任，自此而分”[1]。可知，西魏、北周时期之“国志”，即起居注，“国录”即国史，“国志”、“国录”之分，即起居注与国史之分，亦即秘书、著作官之别。

西魏、北周春官府还有校书下士一职，据《北周六典》卷4《春官府》:“校书下士，十二人，正一命。”校书下士一职，即相当于北魏秘书校书郎（北齐时径名校书郎），属于外史。与其他朝代一样，西魏、北周也常以他官兼领史任，如张羡曾以司成中大夫“典国史”[2]，寇颙也曾以使持节、仪同大将军“专修国史”[3]。

【1】《通典》卷21《职官三》。

【2】《隋书》卷46《张煚传》。

【3】《隋翊师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内史大纳言扶风郡太守濩泽公之墓志》，载王仲荦《北周六典》卷4《春官府》，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收集整理和出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然而，各个时期，割据势力为了巩固政权，致长治久安之效，在长年征战之中，也从未置文化事业于不顾。因此，此期各封建王朝还是继承了汉以来集中校书的传统，注重古今典籍的征集、整理、传抄和再版。应该说，这些工作对于及时挽救图书，繁荣学术文化，推进各类新著述的创作和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三国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东汉末年，两汉积累起来的图书遭到极大的破坏。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曰："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这里说到图书的破坏，前后共三次：一是迁都时的混乱，二是路途跋涉中的遗弃，三是兴平二年（195年）李傕与郭汜在长安相攻、焚烧宫室时的损失。魏、蜀、吴三国分立之后，分别对所掌握的图书进行了收集、整理和传抄，及时恢复了对图书的

保护和出版流通。

一、曹魏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图31
曹操画像

曹魏政权作为三国分立中的强者，在它夺取东汉政权之后，最早展开对图书的征集工作。曹操(图31）是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又有高深的文学修养，“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仍手不释卷”[1]，“外定武功，内兴文学”[2]。因此，他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就十分注意对图书的搜求。袁涣在攻破吕布时，舍财物而“取书数百卷”[3]，深得曹操赏识。他向曹操建议说：“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4] 操深表赞同。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5]。曹操还向一些藏书故家征集图书。东汉大学者、藏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能诗善文，从匈奴回中原后，曹操向她了解家藏图书的情况，并请文姬抄录图书内容，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6]。因此丰富了曹魏的藏书。

鉴于曹操、曹丕父子数人皆为建安文学之翘楚，雅好文学，时文人学士多集邺下，著述日盛，曹操又利用多种形式聚书，因而为曹魏的政府藏书奠定了基础。《隋书·经籍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7] 说明曹魏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图书。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图书，曹魏组织了对图书的多次整理、校勘和出版，发展了文化事业，其中最突出的是郑默撰成《中经》和魏正始石经的刊刻。其实，早在曹操时，尚书卫觊就针对台阁旧籍散乱的情况，对典籍进行了整理[8]。曹丕称帝后，更加重视对政府藏书的收集和整理，令人整理秘书中、外三阁藏书，但成效最显著的还是魏明帝时秘书郎郑默的校勘编目工作。郑默，字思元，开封人。曹魏时任秘书郎，主管图书工作时对魏国官藏进行认真分类、考订，做了比较细致的校勘整理工作。他

【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

【2】《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3】《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

【4】《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

【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后汉书》卷84《蔡琰传》。

【7】《隋书》卷32《经籍志一》。

【8】《三国志》卷21《魏书·卫觊传》。

【1】《晋书》卷44《郑袤传附郑默传》。

【2】《初学记》卷12引王隐《晋书》。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

"考核旧文，删省浮秽"[1]，重新校抄、再版了大批典籍，并于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撰成《中经》十四卷，记载了曹魏秘书中、外三阁藏书的情况。这部目录对当时曹魏图书的优劣等级做了鉴别和区分，时任魏中书令的虞松在评价郑默整理官藏的成就时，认为《中经》编成，"而今而后，朱紫别矣"[2]，高度评价了郑默考订之审慎明确。此外，郑默的《中经》还首创了图书的四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曰："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3]说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是依据郑默《中经》而作分类的。《中经新簿》按四部分类，说明《中经》所采用的也可能是四分法。如果确定，那么，《中经》乃是我国目录学史上"四分法"的"起源之作"，郑默也就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个打破七分法，首创图书四分法的学者，他所开创的分类法影响了整个古代图书的分类，为历代官修目录相沿不更，并不断完善。

曹魏正始三体石经（图32）为魏废帝齐王芳正始时所刊立，刻于正始二年（241年）三月，因其刻于正始年间，又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写刻，故称"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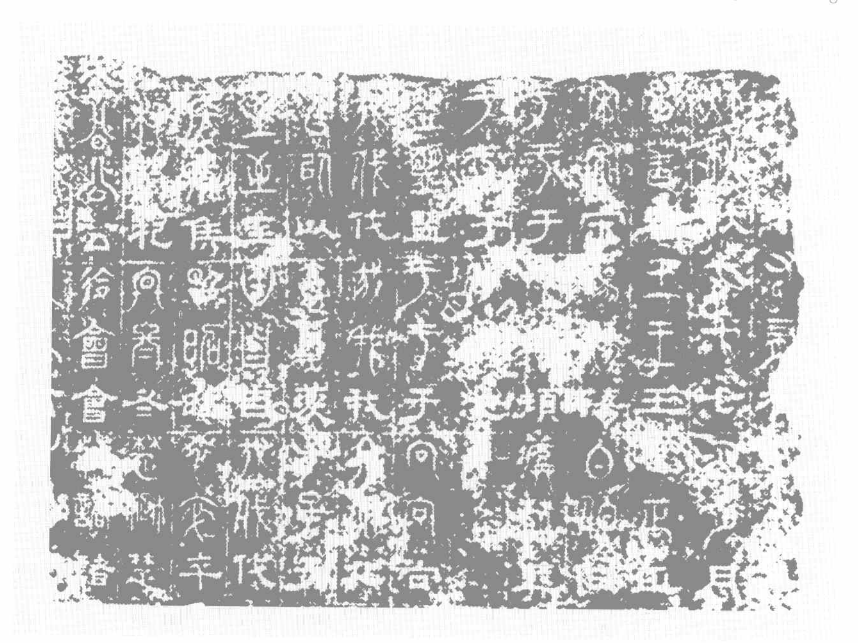


图32
曹魏正始三体碑

经文包括《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未刊完），立于洛阳魏故城南，朱家圪、龙虎滩一带。石经原碑自晋永嘉之世始，屡经崩坏废毁，至唐贞观中已十不存一。唐初“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1]，尚有完帙，《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梁有十二卷）。然至开元中，仅存十三纸。宋皇祐癸巳（1053年），苏望得拓本，摹刻于洛阳。宋金之乱，石经不存，宋拓本亦失。“三体石经”之残石，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始见出土，以后续有发现。其经文有周进《尚书残石拓本》、徐鸿宝氏《诸家集拓本》、吴宝炜氏《集拓本》、许光宇氏《集拓本》、王献唐氏《集拓本》、陈乃乾氏之《魏正始石经残字》等诸家传拓、影印本。总括今日所有残石，得字约2 500个，其中古文一体，与《说文》、《汗简》所收古文大体相近，当为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重要材料。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小学序》。

后世常说“三体石经”是蔡邕所写。其实关于书石者，历史上亦是众说纷纭。《晋书·卫恒传》及《水经·谷水注》记载书石者为卫觊，《魏书·江式传》云为邯郸淳，《晋书·赵至传》及《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嵇绍《序》又言“三体石经”为嵇康所书，皆不确。嵇康系摹写石经，而非书石。至于邯郸淳和卫觊，应是邯郸淳传古文，曾摹写古文《尚书》，卫觊又摹写邯郸淳的《尚书》古文摹本，语见《晋书》卷36《卫恒传》，云：“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叔（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王国维通过分析石经遗字，认为魏石经非一人所书，较以上三说为妥。关于魏石经之数，亦未有定说。惟各书所记不同。王国维据出土石经残字排魏石经碑图，定以《西征记》之三十五石之说为确，而据马衡推定应有27块。1957年6月在西安市青年路西段出土一块魏三体石经，为石经基部，正面刻《尚书·

梓材》，文十行三十字，左下方刻“第十七石”四大字，右边有“始二年三”直书小字，背面刻《春秋》成公元年二年残文十行十五字。由此碑所记石数可推知碑数，由“始二年三”可知刊刻时间，因此，这一发现对于恢复魏三体石经全貌具有重大意义。后人对魏正始三体石经多有考证、著录之作。或考源流，或释文字，或集遗字，或录拓本。清孙星衍据宋洪适《隶续》所载，将三体石经残字，理而董之，证以经典字书，撰《魏三体石经遗字考》，为之音释、校勘、考证，按经文篇章顺序编排，今存咸丰五年（1855年）《石经汇函》本。王国维有《魏石经考》五篇（见《观堂集林》卷20）、《隶释所录魏石经碑图》（见《王忠慤遗书·内编》）等作，在魏石经研究中取得了划时代成就。随后孙海波编著《魏三字石经集录》，首录拓本，次述源流，次及碑图，次释文字，堪称集成之作。此后又有马衡所著《魏石经概述》。

“三体石经”的刊立，目的在于规范版本及文字，给人提供一种经典的标准本，以免辗转传抄出现错误，同时也是曹魏图书整理、校勘、出版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三字石经的字体，以古文为主。因此，魏三体石经残存的资料不仅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古文献学的研究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其古文字体系，等于保存了先秦经书的文字材料，比《说文》中的古文更具特殊意义，因为它们体现在成文的经书当中，等于给我们提供了摹写的先秦经书古本，其中有不少通假字异文，极具校勘价值。同时它的刊立不仅在中国古代书籍整理、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可以让我们由此了解当时学术发展的概况，反映了汉代古文经学地位的变化。正所谓“自后汉以来，民间古学渐盛，至与官学抗行，逮魏初复立大学。暨于正始，古文诸经盖已尽立于学官，……是魏时学官所立诸经，已为贾马郑王之学。其时博士可考者亦多古文家，且或为郑氏弟子也。当时学官所立者既为古学，而太学旧立石经，犹是汉代今文之学，故刊古文经传以补之。……要之汉魏石经皆取立于学官者刊之。汉博士

所授者皆今文，故刊今文经。魏学官所立《尚书》为马郑王三家，故但刊三家所注之三十四篇。其逸篇绝无师说，又不立学官，且当时亦未必存，故不复刊，亦犹《尚书》、《逸礼》、《春秋左氏传》同为古文，《逸礼》绝无师说，又不立学官，故仅刊《古文尚书》及《春秋左氏传》也。其刊引三经者，以汉世所未刊。其不刊逸书及逸礼者，以学官所不立。至《费氏易》、《毛诗》、《周官》、《礼记》、《谷梁春秋》魏时已立学官而石经无之者，盖《礼记》、《谷梁传》均为今学，《费氏易》、《毛诗》虽为古学，或已无古文之本，而魏石经必具三体，故未之及，或欲刊而未果，与《左传》之未毕工者同。然则汉魏石经皆刊当时立于学官之经为最显著之事实矣"[1]。王国维的这段话，详细说明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地位的上升，以及到东汉末三国之际今古文经学逐渐汇合的趋势。三体石经的刊立适应了这种趋势，它在经学史上的意义是当时其他经学出版物所不能比拟的。

[1] 王国维:《三字石经考三》。

二、孙吴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三国时，蜀、吴政权的建立和对南方的开发，使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官府藏书也开始由以洛阳、长安等北方城市为中心而转向南方，形成较为分散的南北平衡分布状况。

孙吴政权据有江东，依照汉制设置了图书机构——东观，典藏经藏，在重藏的同时，又重整理典籍，选博学之士，设为专门的典籍管理人员，其最高长官称东观令，下有左右丞两人。孙皓时华覈"以文学入为秘府郎"[2]，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周处曾任东观左丞，后迁任东观令。吴国在大量据有图籍的基础上也对政府藏书进行过整理工作，校定前朝所藏，并注重利用。史载，景帝孙休即"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3]，他自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4]。因此，在他即位不久，便命博士祭酒韦昭（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5]。韦昭（204—273），字弘嗣，为避晋司马昭讳，改称韦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三国孙吴著名史学家。《三国志》卷65有传。少好学，能属

[2]《三国志》卷65《吴书·华覈传》。

[3]《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孙休传》。

[4]《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孙休传》。

[5]《三国志》卷65《吴书·韦曜传》。

文。孙权在位时他曾任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太子孙和被废后，任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昭为太史令，与华覈、薛莹等共修《吴书》。孙休即位，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受命依刘向旧事，校定群书。孙皓即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后因不能对孙皓尽意逢承，以"不承用诏命"之罪下狱。狱中撰成自伏羲至于秦、汉的古史《洞纪》，纠《释名》之谬撰成《官职训》、《辨释名》，后终遭诛。华覈称韦昭之在吴，"亦汉之史迁也"[1]。《三国志》评价韦昭，说他"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计述之才"[2]。韦昭的著述，《吴书》仅缺叙赞而未成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五卷，注"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后不传。《官职训》、《辨释名》虽已成书，今不传。《汉书音义》七卷、《孝经解赞》一卷，见《隋志》著录，亦不传。今行于世者仅有《国语解》一书。关于韦昭于东吴景帝孙休时校定群书之事，史籍未能保存更具体材料，不过，透过"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寥寥数语，可以看出，当时孙吴政权虽已接近末世，朝廷仍十分重视对政府藏书的管理工作。对于此次校书后是否曾编制过目录，亦史载阙如。但按末帝孙皓对东观令华覈所说"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3] 来看，东观令的职责就应该是负责整理图书。韦昭任此职七年，估计吴国应有图书目录。

【1】《三国志》卷65《吴书·韦曜传》。

【2】《三国志》卷65《吴书·韦曜传》。

【3】《三国志》卷65《吴书·华覈传》。

三、西蜀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天下三分的魏、蜀、吴时期，军阀混战，三国鼎立，各国统治者为了"自强"的需要，分别采取了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魏氏代汉，采掇遗文，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吴国据有江东半个多世纪，在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的基础上，亦不忘派遣专人校定群籍。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的蜀汉政权在搜求、整理国家藏书方面同样不遗余力。

蜀国虽偏处西南，但自称承刘汉正统，在强国富民的同时，

亦重视发展图书文化事业，所以依照东汉旧制，设立东观，以为国家图书馆，典藏国家图书。设有东观郎、秘书令、秘书郎、秘书吏等诸官吏专职管理图籍，且主管多为重臣，如以王崇补东观，以“博览群书”的郤正为秘书郎，掌管东观典籍，重视图书事业，力所能及地对政府所藏经籍进行搜集、整理，并不断扩大官府藏书的范围。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单茕只立，而安贫好学，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性淡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其实，早在刘备定蜀之初，即曾对政府藏书进行过积极的搜求和整理，由秘书令典校秘书，或以他官领之。据《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1]，对图书进行了整理工作。命许慈、胡潜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2]。许慈是名儒刘熙的学生，治《易》、《尚书》、“三礼”等很有名；胡潜则对“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3]。许慈、胡潜、孟光、来敏等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藉此足以证明蜀汉对官府藏书建设的高度重视，可惜终因国事短祚，难以形成持续发展之局面。

【1】《三国志》卷42《蜀书·许慈传》。

【2】《三国志》卷42《蜀书·许慈传》。

【3】《三国志》卷42《蜀书·胡潜传》。

总之，蜀、吴政权的确立，不仅在发展南方经济、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它们都重书、藏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图书收集、整理和出版事业的南北平衡发展。尽管这种发展相对而言是比较缓慢的，但对推动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业的繁荣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节　两晋十六国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王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不断，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作为学术、文化载体的图书出版事业的发

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在图书整理、出版事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图书事业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十分明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统治集团开明的文化政策和措施，都是图书事业发展不可缺略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不少皇帝、重臣皆雅好典籍，重视图书管理和书籍出版，典籍整理事业无论在内容、机构、设施、方式等方面都比汉代有较大的发展，加之纸张的广泛使用，书籍制度的变革，私人著述的增多都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朝廷对出版的重视程度、当时的出版水平、出版图书的数量、品种等方面都为后世图书事业的进一步兴盛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图书整理工作，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西晋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王朝，史称西晋。西晋建立以后，直接接管了曹魏的官府藏书。史谓曹魏之官藏“晋氏承之，文籍尤广”[1]。晋武帝司马炎也比较注意对图书的收集。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大将王濬率军攻入吴国都城建业后，“搜其图籍，封其府库”[2]，并把图书运至洛阳，司马炎对此大加赞赏，专门派人慰问王濬。虽然西晋建立后，内部王位之争不息，外部各族的反晋斗争不止，但它的短暂统一结束了三国时的动荡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使社会经济得到初步稳定，文化也随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西晋政府一方面集中前朝遗书，收魏、蜀、吴三国旧藏，使西晋政府藏书初具规模，另一方面又号召各地向中央献书，不断扩大自身的藏书范围。晋愍帝时，凉州刺史张寔，“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3]。经过多方收集，西晋政府官藏有所增多。亦由于纸的发明，使书籍制作相对简单，社会上读书、抄书、藏书之风大盛。《晋书·文苑传》载，左思著《三都赋》后，因其文思精妙，“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足见

【1】《隋书》卷49《牛弘传》。

【2】《晋书》卷42《王濬传》。

【3】《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寔传》。

当时书籍的复制量相当可观。在近现代发掘的文书中，也可以证明这一时期手抄复制图书文籍并非个别现象。如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的手写卷子中，最早的就是手抄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之《陀罗尼神咒经》经跋，是现存最早的手抄经书之一，可惜已流失海外。发现于新疆都善吐峪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发现于新疆楼兰遗址的《战国策》残页（现藏日本）皆为晋代手抄纸写实物。这些手抄纸写实物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复制书籍之勤。复制的盛行，使这一时期书籍的出版量大为增加，西晋的国家藏书数量亦随之有所增多，按西晋秘书监荀勖整理、校定政府藏书所编之《晋中经簿》记载，当时西晋政府藏书已达到20 935卷，其规模大大超过了三国时的官府藏书，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官藏体系。这就使图书的典藏、整理工作势在必行。西晋政府对书籍整理、出版的重视具体体现在编制了一部对后世目录学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图书目录——《晋中经簿》及对汲冢书的整理。

西晋的官藏整理主要集中在晋武帝时期。晋武帝泰始间（265—274年），随着政府藏书的再次增多，荀勖和张华对国家图书进行了整理，这是西晋初年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官府藏书（图33）。据《晋书·荀勖传》载：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荀勖“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与贾充共定律令。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1]。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是西晋文学家、音乐家、目录学家。学识渊博，历仕魏、晋两朝，入晋后为中书监、秘书监，后任尚书令。荀勖与张华对政府藏书的这次整理规模很大，为此，荀勖不得不辞去了他负责的音乐方面的职务。他在奏报《上乐事表》中说：“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在废顿。”[2] 荀勖等依刘向《别录》整理当时的政府藏书，首先网罗众本，确定书名，接着审定篇第，校勘文字，最后抄写定本，记录了图书的存佚情况，为后人进行考定和甄别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在丰富的校书实践基础上，荀勖以

【1】《晋书》卷39《荀勖传》。

【2】《北堂书钞》卷110。

郑默的《中经》为依据，“总括群书”，编制了一部新的综合性的官府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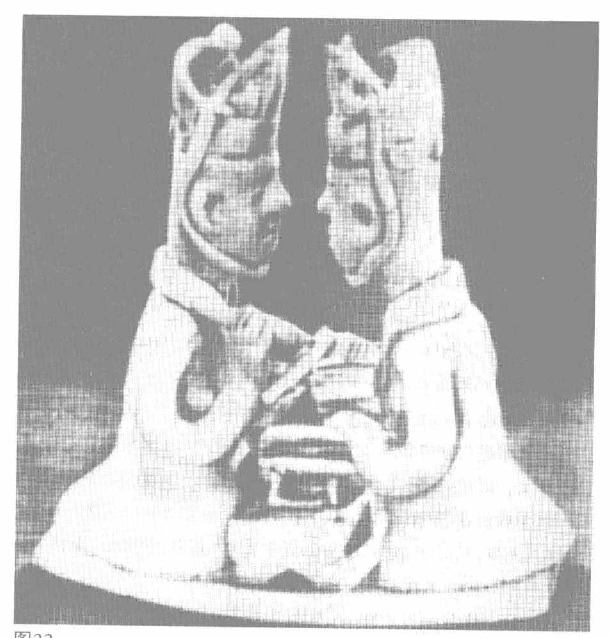


图33

西晋校书陶俑

《中经新簿》正文十六卷，另附佛经二卷，约撰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至咸宁五年（279年）间。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著录图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1]，另据《古今书最》所载，此目与阮孝绪《七录序》共保存于唐释道宣之《广弘明集》卷3，内云该目共著录图书1 885部，20 935卷。其书早亡，所著录图书的实际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今姑且两说俱存。《中经新簿》在分类上采用四部分类体系，“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2]。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图书分类中以甲、乙、丙、丁为四部的次序符号，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四大类，比较符合中国古代书籍及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具有较高的科学性，适应了当时学术的变化与典籍增长的需要。按《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其四部的大致情况如下：“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中经新簿》的体例是只著录书名、卷数、撰人，而无解题、附注、注序，所以《隋书·经籍志》说它“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3]，即只是客观地著录书籍的书名、卷数及著者，并对其内容作简要说明，而没有对学术源流的考辨及图书内容的评论。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登记书目这一书目体裁即是由此而始。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

荀勖的《中经新簿》是对西晋图书的一次总结，它较好地反映了自《七略》成书以来图书事业的发展情况。它虽是依郑默

《中经》而作，但在《中经》的基础上还是有所创新。它继承了《中经》的成就，变革了刘向、刘歆所创造的已沿用三百年之久的六分法，发展了由《中经》以来的四部分类体制，较系统地反映了《七略》成书后三百年内，由于时代变迁、学术发展而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的扩大和变化。魏晋时期，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史书体裁多样，不仅有纪传体、编年体，还有起居注、谱牒、地方志、史评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史书有七百多种。史学的发展、史书数量的迅速增长是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图书的整理、校订和编目工作一方面是以丰富的图书为前提，是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对社会上业已形成的丰富图书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时代中典籍产生、流传和散佚的大致情况，亦可以从中反映出该时期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荀勖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和典籍发展的趋势，在《中经新簿》中将史部独立为一大部类，改变了过去六分法时史书附于经部春秋类的附庸地位。作为西晋整理图书的重要成果，《中经新簿》还开辟了目录书著录存亡之先例，在目录学史上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来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荀勖的远见卓识，《中经新簿》在著录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同时，还另附佛经二卷，使佛教典籍首次在目录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勖还重视图书的誊抄和保护，“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即用浅黄色丝织品书写，然后把书卷收藏在青白色的丝袋中，说明当时对保护书籍已经有了新的方法和标准。《中经新簿》著录典籍二万余卷，相比《七略》著录的一万余卷，数量超过了一倍，经过战火洗劫仍能保存下来如此数量的图书，说明东汉至三国二百多年时间内，我国文化典籍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另外，《中经新簿》所著录图书的丰富也为东晋到唐代学者考查当时图书的残亡、存佚、真伪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西晋政府第二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活动是对汲冢竹书的整理。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有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朝廷

【1】《晋书》卷3《武帝纪》。

【2】《晋书》卷3《武帝纪》。

发现后，收回了一部分随葬品，“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1]，装载数十车运到洛阳。这批竹简一则因年深日久，编丝朽断；二则因盗墓者的无知，不仅扰乱了简策的次序，而且点燃竹简，当作火把借以照明，致使竹书出土时就已不完整。据《晋书·束皙传》载："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为此，西晋政府曾先后两次组织专人对这批竹简进行整理、校订，并编制了目录，“藏于秘府”[2]，纳入国家藏书。史载，先后参加整理工作的有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皙等人，皆为当时著名的学者。

关于汲冢书的整理过程，按朱希祖撰《汲冢书考·校理年月考》所载，汲冢书之编校、写定，始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讫于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历时约二十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自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至太康八、九年（287、288年），为荀勖、和峤分编时期，《穆天子传》、《纪年》皆于此时写定。据史书记载，太康二年（281年），晋武帝下令整理这批竹简，荀勖与和峤参加最早。在整理的程序上，他们全仿刘向父子校书方法，考校、写定，并撰写序录，所撰序录现仅存荀勖《穆天子传序》一篇。在整理过程中，他们还十分忠实于原书，校雠时采用相当于原简长度——长约二尺的黄纸抄写竹简上的文字，既容易发现和改正错简，又可以大致算出残简所缺漏的字数，用□□代替。为了辨认这些古文字，他们还把简文与正始三体石经核对，最后用晋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成定本。经荀勖、和峤整理的汲冢竹书计有15部87卷。第二期自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二月至六月，为卫恒考定、厘正时期。晋惠帝时，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秘书丞卫恒，开始从文字学角度研究汲冢竹书，但当时正值“八王之乱”，他与父亲同时被害，研究工作为时很短即被迫中止。第三期自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至永康元年（300年），为束皙考证、写定时期，《竹书纪年》重行改编，于是16种75篇全部告成。束皙博学多闻，是卫恒的好友。卫恒被害后，“皙在著作，得观竹书”，接续卫恒的工作，

对汲冢竹书重新编定、考证,“随疑分释，皆有义证”[1]，完成了对竹书的再次整理工作。《晋书·王接传》亦云:“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2] 经束皙考证、厘定的汲冢竹书计有16种75篇，与荀勖整理的分卷和篇名均有所不同，这是由于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各异所致。

【1】《晋书》卷51《束皙传》。

【2】《晋书》卷51《王接传》。

汲冢竹书经多位学者历时二十年加以勘定、整理，从中整理出“《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3]。但今传世者仅有《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两种，其余诸书到了宋代均已散佚，现在只能看到后世的辑本了。今本《竹书纪年》亦比较复杂，是后人根据宋代的三卷残本及《师春》，并杂采他书补缀而成。《纪年》原本，发现于晋咸宁五年（279年），亡于北宋末期（11世纪末期），晋时原有荀勖、和峤整理本和束皙改定本两种不同的整理本子。荀、和旧本起自黄帝，及东周以后，仍以周纪年；经束皙考证、改定，始起自夏、商，迄于周幽王灭亡，学《春秋》以鲁纪年之法，改用晋纪年。清以来又有古本辑佚之作，如朱右曾辑《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等。《穆天子传》晋时先后亦有荀勖、和峤等的整理本和束皙的改定本，据《玉海》卷47引

【3】《晋书》卷51《束皙传》。

王隐《晋书·束皙传》，束本名《周王游行》。今传《穆天子传》郭璞注七卷本为荀勖等人的整理本。

汲冢竹书的发现，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继西汉古文经书发现之后的又一次有关先秦古文献的重要发现。汲冢竹书的整理、写定，在古文献学史和中国书籍整理出版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的整理写定，使不少久逸之书重见天日，为人们研究先秦古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可靠的史料。如《穆天子传》提供了古代亚洲的地理资料和公元前4世纪欧亚文化交通的情况。《竹书纪年》使当时和后来的学者得以据其补充史书记载的缺漏，或据其订正某些记载的讹误，在古史研究、考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一些史事的记载因竹书与传世史书的记载不同，对历史研究亦有很大启发。第二，按荀勖《穆天子传序》中的说法，“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指平定八王之乱）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1]。则汲冢竹书在整理后，除了在“二尺黄纸”之上抄写定本之外，还另外抄有副本。作为早期的整理出版形式——抄录副本，对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为研究、整理战国文字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文字资料。如曾对汲冢古文做过研究的晋代文字学家卫恒著有《诏定古文官书》一卷，续咸著有《汲冢古文释》十卷，他们在书中分析了大量的同字异形材料，从而表明了战国时六国文字多歧的复杂情况，并为阅读古文献时识别异体字提供了方便。

【1】[晋]荀勖:《穆天子传序》。

二、东晋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西晋统一时间较短，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西晋末年的战争，接踵而至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对古代官府藏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遭到了比东汉末年更为严重的摧残，魏晋以来的官府藏书几乎全部毁于战火，正所谓“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2]。在此之后的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

两百多年里，官府藏书的恢复和发展极其缓慢。晋室东渡后，华夏文化的主流势力随之南迁，但历经"惠、怀之乱"后的经籍图书散失惨重，政府藏书寥寥无几。东晋建立之初，政府曾采取多种措施，努力鸠集，力图恢复西晋的官府藏书。但终因典籍损失过于严重，短期内藏书规模已很难恢复到西晋时的水平。东晋元帝时整理政府官藏，"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1]，仅为西晋官府藏书的九分之一，至太元十六年（391年），才增加到36 000卷，藏书事业根本无法恢复到前代的水平。这场图书大浩劫对东晋王朝的统治无疑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当时的开国宰相王导虽力主兴学，却因书经残缺太甚，国学只能办办停停，即使开学也是"品课无章"。但东晋王朝并没有放弃征集、整理图书的努力，继续不断地搜求遗籍，并先后两次组织人力整理政府官藏，编制国家书目。图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校雠、整理、编目，东晋政府在发展图书收集、整理、出版事业方面的不遗余力，主要就体现在李充、徐广的典校秘书和编制官藏目录方面。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中经新簿》完成不久，即遭"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胡骑践踏，黄河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遭到了比东汉末年更为严重的摧残，秘阁藏书，销毁殆尽，官藏"典籍混乱"，书籍损失严重。晋元帝偏安江左后，才又重新努力收集图书。虽渐更鸠聚，力求恢复西晋官藏，但李充在整理政府藏书时，以荀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仅有3 014卷。其后经不断搜求，中朝遗书才稍流江左，但藏书已不及西晋时期。在整理藏书的基础上，李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2]，编撰了《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穆帝时，任征北大将军褚裒参军。后除剡县令，赴母丧后迁大著作郎，终官中书侍郎，《晋书》有传。李充是东晋前期著名的学者、目录学家，史传称其与名士孙绰、许绚、支遁等皆以文名冠于世，又与王羲之同好。李充此次主持整理政府官藏，编制国家书目大约是在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61年）。由于当时政府所存的图书数量较少，只有3 014卷，比起荀勖编目时的存书数目相差甚多，所以李充编目，

【2】《晋书》卷92《文苑·李充传》。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序》。

“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1]。也就是说，他的书目只分四部而不立小类。据《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所撰《晋书》记载，李充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是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它的四部分类虽是承袭《中经新簿》的方法，但变更了原来乙、丙两部的顺序，虽仍以甲、乙、丙、丁为名，却以经、史、子、集为序，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的顺序，反映了史学地位的提高，甚有条贯，成为后世公私藏书分类体系的基础，在目录学史上一直被沿用了1 500多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自尔因循、无所变革”[2]，后世“秘阁以为永制”[3]，正说明了他在目录事业发展史上的贡献。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序》。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序》。

此后东晋王朝仍然继续进行过图书的收集、整理和编目工作。据《续晋阳秋》所记，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4]，此36 000卷有可能一部分是重抄副本，但总的来说，数量比东晋初年要大大增加。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东晋史学家。广为人学识渊博，“百家数术，无不研览”[5]，“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义熙初，领著作”[6]，曾著有编年史《晋纪》四十六卷。《晋书》没有记载徐广主持这次校书后是否编目。《古今书最》中记载，东晋义熙四年（408年）曾编制有《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该目很可能就是在经过十余年的收集整理后，根据徐广所校编制的。除此之外，晋孝武帝太元中，东晋政府还就当时谱学名家贾弼之所藏派员缮写，扩大政府收藏。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7]，抄书总数有数百卷。孝武帝时还有桓石绥所主持的校书活动。桓石绥为东晋权臣桓温弟，桓豁之子。桓玄势炽时，拜黄门郎，左卫将军。此次校书事见《初学记·职官部下》“秘书郎”条引《晋宁康起居注》曰：“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关于此次校书因无其他资料可供考论，所以关于其校理过程及校书后是否编有目录均

【4】[宋]王应麟：《玉海》卷50引。

【5】《晋书》卷82《徐广传》。

【6】《晋书》卷82《徐广传》。

【7】《南齐书》卷52《文学·贾渊传》。

无从得知。

概而言之，图书事业的兴衰与社会政治、经济紧密相联。政局剧变，藏书数骤减实属必然。因此，东晋初李充校定秘阁时藏书仅3 014卷。但一旦政局稳定下来，藏书数量则不断回升，自李充至徐广前后数十年间官方藏书即增至36 000卷，猛增17倍之多。纵观两晋的图书事业发展史，除了政府对图书典籍不遗余力的搜求以外，两晋在整理官藏中亦取得了不少成果，对官府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荀勖、和峤、束皙、李充、徐广等人在校理图书和进行编目工作中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创四部之体始于郑默，立四部之名始于荀勖，定四部之序则起于李充。西晋、东晋的两部国家书目不仅著录了当时书籍的状况，而且在目录分类上，完成了四部分类法由创始到建立、确定的全过程，使后世以为永制。而两晋时期藏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书的正、副本分藏于不同之处，亦开创了我国书籍正副本分藏异地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十六国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匈奴人刘曜夺取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而此时的北方，正是“战争相寻，干戈是务”。其实，早自西晋惠帝建武元年（304年）开始，北方就处于五胡混战，纷纷割据的状态，曾先后建立过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其时长达135年之久。史载，十六国“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1]。“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惟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2]。在十六国这一百多年里，北方经常处于动乱之中，人民流离失所，典籍损失严重。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图书事业不可能有较大发展。但令人瞩目的是，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短暂登基，其上层人物都纷纷仿效前朝秘书监制度，置官定员对经籍图书进行搜求、整理。如后赵统治者羯人石虎曾派国子博士到

【1】《隋书》卷49《牛弘传》。

【2】《魏书》卷84《儒林传序》。

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1]，藏于秘阁；还将国子祭酒聂熊注的《谷梁春秋》列于学官。前秦首领氐族人苻坚统一北方后，不仅广修学宫，招纳学生，在宫中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还曾亲到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2] 苻坚便派人编抄了一些书籍，以充府库，使“正经粗集”[3]。苻坚是十六国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比较注意文化事业的发展，可是博士王寔仍然说：“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4] 十六国以来，北方图书损失之严重可见一斑。前凉统治者亦重视图书的搜集，故宫中多有藏书。史载张寔曾“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5]。后凉统治者沮渠蒙逊时期也曾收集过图书。元嘉三年（426年），他派世子兴国去刘宋索书，宋文帝给了《周易》及子集诸书475卷。沮渠蒙逊还向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王弘抄了一部给他[6]。据《魏书·阚骃传》记载：“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7] 由此看来，其中央机构的藏书应该不在少数。除此以外，《宋书·氐胡·沮渠蒙逊传》载，元嘉十四年（437年），后凉曾向刘宋朝廷进献文物，其中包括一批图书，计19种，150卷。由此可见，虽说整个十六国时代战乱连年，但各短暂王朝的统治者只要稍有宁日，便立刻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把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看作是他们共同的财富，作为自己建邦立国的精神支柱与思想指南。在这一时期，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虽不免草率，却从未因战乱而长期停止过。但总体来讲，此时北方地区的官府藏书还是出现了衰退的势头，远不如与它对峙的东晋，以至“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而且“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8]，可见其图书业之凋敝落后。

【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2】《晋书》卷96《列女·韦逞母宋氏传》。

【3】《晋书》卷96《列女·韦逞母宋氏传》。

【4】《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5】《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寔传》。

【6】《宋书》卷98《氐胡·沮渠蒙逊传》。

【7】《魏书》卷52《阚骃传》。

【8】《隋书》卷32《经籍志一》。

第三节　南北朝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晋恭帝，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宋。从此，在中国南部出现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迭，史称南朝；北部中国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交替，史称北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时期。就图书事业而言，由于各朝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社会功用认识各有不同，重视的程度不一，所以，南北政府在图书事业的处理上亦各有得失。即使是一朝统治者，也有认识先后的不同，因而其图书收集、整理和出版事业的成就也不尽相似。

一、南朝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南朝，是指公元420—589年相继建都于建康（江苏南京）的宋、齐、梁、陈四个政权。与北方战乱不已的局面相比，南朝是相对安定的。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一些文人学者也将图书带到江南，使南朝的图书事业建立在较高的基础上，加之一些统治者也注意搜求图书，从而使南朝的官府藏书发展较快，数量逐渐增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虽更替频繁，但图书工作还是列入了国家的整个体制之中，它们都因袭旧制，置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等掌管典籍之官；设有秘阁，典藏图书，正所谓“晋宋以还，皆乃阁之号”。特别是梁武帝时，由于图书增多，便把图书分别收藏，设立文德殿、华林园典藏经籍，文德殿陈列众书，华林园总集佛典，秘阁放经史杂书。此时亦开始注意复本，并把复本分别收藏在不同地方和部门，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第一次。南齐时也效仿前朝旧制，将一些善本书放在一起，专门设置了学士馆。陈朝的藏书除秘阁外，也还有寿安殿、德教殿、承香殿等地。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抄书是主要的图

书复制、再版形式。此时即由于图书再版的需要，官府中开始设立专职人员，从事抄书工作，如在秘书省之外又设立了弟子和正字。弟子是写书人员，正字负校对之责。弟子写完后，交由正字校对。南朝各政权在对图书进行搜求、典藏的同时，也进行了整理工作。整理图书往往以编制目录为结果，那么，南朝图书编目活动之频繁、目录之多、体裁之异、目录学家之众，都远远超过了魏晋。

刘宋政权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对图籍的收集整理工作。其实，早在其建国之前，其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在任东晋大将军时，就注意收集图书。史载，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攻打姚秦，进入长安后“收其图书，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1]。刘裕把这些图书全部运到了建康，扩大了东晋的官府藏书。刘裕取代东晋后，就全部接管了这批官府藏书，使刘宋官藏建立在继承东晋及后秦遗书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又通过战争中的掠夺不断扩大官藏范围。元嘉八年（431年），刘宋的官府藏书已有14 582卷，到了刘宋后期的元徽年间（473—477年），更是增至15 704卷。官府藏书日益丰富，图书整理工作也就随之展开。据文献记载，刘宋政权规模较大的整理官藏活动主要有两次：

【1】《隋书》卷49《牛弘传》。

第一次是在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这次整理官藏工作以秘书监谢灵运和秘书丞殷淳为代表，整理当时的官府藏书。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南朝著名诗人、学者。《宋书》本传称，“太祖（文帝义隆）登阼，诛徐羡之等，征（灵运）为秘书监……乃出就职，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遗阙”[2]。在当时雕版印刷尚未发明之时，“补足遗阙”的唯一手段就是抄写。经过这次校理，编成《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四十卷，共著录图书1 564帙，14 582卷，另收佛经438卷。此数较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多出11 568卷，这11 568卷图书多为刘宋时抄写。此书虽题谢灵运撰，但主要作者应为殷淳。因谢灵运当时虽为秘书监，但主管图书时间很短，后迁官侍中，元嘉五

【2】《宋书》卷67《谢灵运传》。

年（428年）他又托疾东归，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建康。而殷淳从元嘉时任秘书丞，至元嘉十一年（434年）卒，一直没有离开过建康。《宋书》、《南史》中殷淳本传对他编制四部书目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殷淳字粹远，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宋书》本传称淳“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在秘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

第二次是在宋末，后废帝元徽年间（473—476年），由目录学家王俭负责主持的校书活动。王俭在整理官府藏书的基础上，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收书15704卷，与元嘉目录收书相仿。王俭（452—487），字仲宝，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为南朝著名目录学家。出身南朝大族，刘宋时任秘书丞，明帝时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后反而辅佐齐高帝即位，历任侍中、尚书令、中书监等职，《南齐书》中有传，称他“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继刘宋之后的南齐政权在南朝四朝中，统治时间最短，享国仅23年（图34）。因其立国日浅，其国家藏书虽在刘宋的基础上稍有发展，但收效甚微，所增不多。尽管如此，南齐政府对图书事业的关注和重视丝毫未减。在其统治的短短23年中，曾多次组织校理政府官藏，编制国家书目。南齐初，“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就曾主持“校四部图书”于东宫。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梁书》本传称：“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

图34
南齐武帝萧赜景安陵麒麟

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等亦曾奉命整理秘阁藏书，按梁阮孝绪《七录序》云："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王亮、谢朏在整理当时官府所藏的基础上，编制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8 010卷，比《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所收增加2 300卷。南齐明帝时庾於陵再次组织整理政府官藏。当时“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庾於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1]。经过这几次对政府官藏的集中整理，使南齐国家藏书在刘宋的基础上稍有发展。然而，据《隋书》卷32《经籍志一》载，"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2]，“图书散乱殆尽”[3]，南齐的官府藏书再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1】《南史》卷50《庾於陵传》。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

【3】《梁书》卷21《王泰传》。

在南朝宋、齐、梁、陈的迭相更替中，梁朝前承萧齐，从公元502年立国，历经武帝、简文帝、豫章王、武陵王、元帝、贞阳侯、敬帝，于公元557年为陈所灭，享国五十五年。虽然梁代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暂，但它的文化事业较为发达，其官府藏书多达十余万卷，直承两汉遗风，是南朝四朝中最兴盛的。建立梁朝的梁武帝萧衍，雅爱书籍，勤于著述，在他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的统治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稳定社会，繁荣经济，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其实，早在建立梁朝前，萧衍就非常注重图书的收集工作，如在平定东昏侯前，其手下将领柳恽就曾上书，“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4]。萧衍接受了他的建议，平东昏侯后，便“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5]。为帝后不久，萧衍又接受了秘书丞王泰的建议，大力向民间搜集图书，要求“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网。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6]。由于梁武帝的大力征集，使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梁朝在建国初期官府藏书即达到23 106卷，比起前两代刘宋藏书的15 000多卷、萧齐藏书的18 000多卷，已然具有俯瞰之姿，并且正式建立了正御本制度。经过武帝及其后继者的大力征集，图书数量逐渐增多，梁朝的秘府藏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为南朝

【4】《梁书》卷21《柳恽传》。

【5】《梁书》卷1《武帝纪上》。

【6】任昉：《为梁武帝集坟籍令》，《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58。

之冠。

梁朝的图书事业多集中于前期，尤其武帝时期，是南朝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顶峰。梁天监元年（502年），王泰对当时的官藏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整理。史载，当时秘书丞王泰“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1]。天监二年（503年）以后，秘书监、著名学者任昉，因“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汇同秘书丞殷钧，躬加部集，再次对政府官藏进行整理。他广搜异本，“手自雠校”，在校订的基础上，编纂了《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由是篇目定焉”[2]。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东南）人。齐梁间著名学者，撰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书》本传曰：“天监二年，昉出为义兴太守……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殷钧，字季和，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东晋大臣殷仲堪五世孙，尚梁武帝之女永兴公主。善书法，与范云、任昉等友善。《梁书》本传称他“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列为品目”。梁天监年间校理国家藏书后的成果，除《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形成的目录还有丘宾卿的《天监四年四部书目》、殷钧的《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遵的《梁东宫四部目录》等。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梁朝还注意到对精善本的挑选，有了“正御本”的概念，其意义是指经过整理，选择精本，剔除复本，作为国家正式藏书，以备皇帝阅览，这种做法沿袭到隋代。梁元帝时，图书校勘活动达到高潮，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记载了当时藏书、校书的情况，可作参考。注曰：“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郎邓荩、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

[1]《梁书》卷21《王泰传》。

[2]《梁书》卷14《任昉传》。

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1] 这段材料反映了梁朝藏书数量及其对图书质量的区分，反映了当时的校书规模及分工情况，这里还首次提到经史子集四部名称，代替了此前四部分类只称甲乙丙丁的简单说法。

【1】《北齐书》卷45《文苑·颜之推传》。

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萧衍不仅在图籍的整理、校订方面充满激情、颇有作为，对传统经典的复制和收藏也极为重视，他在位期间，曾大量复制图书，以充实国藏。史载，他对汉末"书遭厄运，礼乐崩坏，国异家殊"的局面深以为憾，对齐末兵火下"青编素简，一同煨烬"的惨景十分惋惜。为防止悲剧不再重演，他认为国家藏书必须多置复本，分存异处，以备不虞，于是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梁武帝天监初年（502年），张率即奉诏主持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玡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2]。天监二年（503年），"到洽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3]。天监七年（508年），张率"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4]。这就是说，梁武帝天监年间，几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将官府所藏四部群书全抄了一遍。萧衍还接受沈约的建议，召集了五名旧学士，令他们各自荐一名助手分抄五礼，遣沈约、张充和徐勉参与此事。并规定在抄写的过程中，如有不明确的地方，"莫不网罗经诰"，依石渠、白虎故事，请制旨断决。天监十一年（512年），五礼抄成，共1 176卷，8 019条，其副本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完毕后，列于秘阁，正本颁行天下。这种由国家发起的图书复制行为不仅充实了国家藏书，成为国家的基础学术资源和出版资源，同时也推动了社会上图书复制和发行业的崛起。正是由于出版资源雄厚，梁朝在图书生产方面才得以保持长期的繁荣，不仅北朝不可企及，在南方六朝中也遥遥领先。梁之藏书整理也为隋唐大规模修志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梁朝后期，政权不稳，陷于内乱，使梁朝的图书遭到极大破坏。梁武帝末，侯景之乱前，在梁武帝犒赏侯景部队时，欢宴起火，致使东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侯景叛梁，大举进攻

【2】《梁书》卷33《张率传》。

【3】《梁书》卷27《到洽传》。

【4】《梁书》卷33《张率传》。

建康，对江南地区进行了空前的蹂躏。围攻台城时，武帝之子萧纲命人烧侯景所据宫殿，宫殿及多年积聚的图书、文物几乎全部被毁。梁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1]，藏书颇有增广。元帝性嗜书籍，即位后即不断广泛征集，不停地多方收书、抄书、买书，遂使萧梁秘府藏书达十万多卷，成为南朝图书事业最兴盛的时期。但是，公元554年，镇守襄阳的萧詧引西魏军攻打江陵，梁军惨败。在城将陷落之时，梁元帝怕典籍为敌所虏，于是“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2]，西魏军从余烬中收拾残遗仅得4 000余卷。这就是历史上说的“梁元帝焚书”，这次焚书使极一时之盛的梁朝官府藏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到了陈朝都没有恢复过来。

纵观梁朝历史，梁朝的图书文化在收集、整理、编纂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了不凡的业绩，而梁武帝是形成这一辉煌业绩的关键人物。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汉相萧何第二十四代孙，与南齐同族，曾任齐之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于公元502年起兵，禅代称帝，建立梁朝。萧衍博学能文，在位四十八年，勤政爱民，生活简朴。在任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发展文教，国势蒸蒸日上，境内相当安宁，一度呈现出魏晋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景象，史称“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江左文献，于斯为极盛”[3]。但他晚年信奉佛教，大建寺院，更曾四次戏剧性地舍身同泰寺。虽然从政治角度看，梁武帝难称一代英主，他在年轻时还颇有勇略，起兵夺取帝位，天下初定后便逐渐对政治丧失了兴趣，专注于学术、宗教、文学艺术，晚年更因佞佛和纳降侯景而最终招致丧身失国，为历代史家所诟病。然而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梁武帝不仅终其一生保持书生本色，潜心学问，而且利用皇权，充分放大自己在图书生产方面的才能，领导、组织、策划出版了一些皇皇巨著和传世名作，以“经天纬地”的才能和权威不断地在图书世界里开疆拓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5《梁纪》21，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

土，创造辉煌的纪录，在图书出版史上亦是贡献良多。萧衍在图书出版方面发挥了多种角色的作用，他不仅是策划者、组织者，还是一位富有成果的创作者和编撰者。据《隋书·经籍志》所列，萧衍的著作不仅品类多，而且涉及的面相当广泛，计有《周易大义》、《尚书大义》、《毛诗大义》、《礼记大义》、《孔子正言》、《通史》、《梁武帝诗赋集》、《梁武帝杂文集》、《净业赋》、《乐论》、《黄钟律》、《梁主兵法》、《围棋赋》、《梁武连珠》等等。他在图书创作方面的积极表现，起到了垂范作用，上行下效，带动了广大文士的创作热情。作为一国之君，萧衍能亲历创作，体验著述之甘苦，对图书编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有切身的了解，这对指导全国的图书生产大有益处。他还策划识字课本《千字文》，组织编撰以《华林遍略》为代表的大型类书，前者的流通数量在封建社会的出版史上位居前列，后者在图书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出版理念、统揽全局的组织才能都足以使萧衍在出版史上名垂千古。他在图书出版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竞争精神令人敬佩，堪励后人。

陈朝的官府藏书整理成就不高，文字记载的也不多。陈朝建立以后，由于梁末的周师入郢和元帝焚书，图书遭到很大损失。尽管陈文帝天嘉年间（560—566年）大力搜求，"又更鸠集"，但是考其篇目，仍然是遗阙尚多，整个藏书已无法恢复到梁朝的水平，而且图书质量也很差，有"纸墨不精，书亦拙恶"[1]之称。其后陈后主又禁断佛道诸教，佛道典籍亦受到禁绝，藏书更是一蹶不振。虽也屡编书目，但终因国力日衰，图书数量没有增加，在藏书规模上再也没有赶上前朝。加之陈朝统治者无暇顾及官府藏书的建设和整理工作，只是将秘阁、寿安殿、德教殿和承香殿的藏书做了登录而已，在收集和整理图书方面，是南朝最差的时期。陈朝的官府藏书不仅数量少，缺漏多，而且质量也很差，属于历史上官府藏书的低落阶段。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二、北朝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北朝曾有许多藏书、校书处，如北魏的秘阁、东观，北齐的仁寿殿、文林殿、麟趾殿，北周的虎门殿等。各朝秘书省也纷纷利用殿阁藏书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图书整理，其间以北魏、北齐最为用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南朝而言，其藏书起伏不定，加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本身对汉文化典籍的整理缺乏根基，因而编目工作远逊于南方各朝。今可考见的书目仅两部：一部是为搜寻图书而编制的《魏阙书目录》，另一部是类目不全的《甲乙新录》。

北部中国，十六国交相更替，社会动荡不安，几乎无图书整理可谈。北魏拓跋焘平定“五胡十六国”以后，统一北方近百年，社会始出现暂时安定的局面，文化亦有所发展。但北魏初年，政府并不十分重视图书典籍的收藏，也没有建立官府藏书，就是在战争中获得的典籍也是作为一般物品奖赏有功之臣，“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班赐功臣及将士各有差”[1]。但北魏统治者的文化程度较高，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在其政权稳定以后，统治者还是很快就认识到了图书典籍的社会功用，并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典籍搜集工作，设秘书省掌管国家典籍，从事图书的访求、校勘、分类、编目等工作，也对图书进行了相应整理。此后，在他们向中原发展势力的过程中，始终不断地搜集图书，校书不辍，并编制出《魏阙书目录》，以此为依据到南朝借书，卢昶的《甲乙新录》也是当时图书整理的成果。北魏几次重要的整理、校订图书活动情况如下所述：

【1】《魏书》卷2《太祖纪》。

第一次是北魏太祖道武帝天兴四年（401年）十二月，太祖道武帝“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2]，首先对经书进行了整理。先时，太祖道武帝并不重视藏书，在与贺麟的战争中稍后，李先任秘书监，太祖始有藏书之念，欲俱天下图籍，于是问秘书监李先：“天下何书

【2】《魏书》卷2《太祖纪》。

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惟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采纳了秘书监李先向民间征集图书的建议，“班制天下，经籍稍集”[1]。从李先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北魏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书活动是太祖颁制天下，经籍稍集，但收书并不多。这一次征书活动虽然收获不大，《隋书》卷32《经籍志一》认为“粗收经史，未能全具”，但它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很突出的，直接影响了后两次征书活动，并对后期的民间征书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魏书》卷33《李先传》。

第二次是献文帝天安年间（466—467年）。据《魏书·高谧传》载，高谧“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高谧认为“坟典残缺”，建议“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献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2]。

【2】《魏书》卷32《高湖传附高谧传》。

第三次是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作为北魏最有作为的君主，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加速了鲜卑贵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孝文帝虽禁谶纬之书，但对官府藏书还是比较重视。迁都洛阳后，更加注意官府藏书的发展，诏求遗书于天下。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优赏。”[3] 经过孝文帝的广泛搜集，北方的官府藏书随之得到充分的发展，略具规模。据《魏书·李修传》载，“太和中，（李修）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中，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可见，这次抄书的内容都是药方。又“寻敕光韶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4]，校定华林园御本图书。值得一提的是，开明的孝文帝不仅重视

【3】《北史》卷3《魏本纪第三》。

【4】《魏书》卷66《崔亮传附崔光韶传》。

官府藏书，广泛搜聚图籍，还注意加强文化交流。为了准确地收求遗书，他还派人检查了北魏缺书的情况，编定《魏阙书目录》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并派人到南齐按书目借书，《隋志》记载："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1]

此外，魏世宗宣武帝也征集过天下遗书。永平三年（510年）六月，宣武帝"诏重求遗书于天下"[2]，聚书之活动多年不辍，官府藏书进一步发展。北魏最大的一次校理官府藏书是在宣武帝即位后。当时，秘书丞孙惠蔚入东观，典籍混乱不堪，于是上疏请求征集整理。他在奏疏中分析了历代官府藏书对统治和学术文化的作用之后，又陈述了当时官藏的具体情况，曰："……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继而他提出"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从其奏疏中看，孙惠蔚这次整理官府藏书的计划是相当完善的。因当时书多，错误也不少，为了加快进程，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整理任务，孙惠蔚提出"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3]的要求，得到了宣武帝的赞同，于是，孙惠蔚领导了这次规模较大的整理官藏工作。按《魏书·儒林·孙惠蔚传》的说法，这次对图书的校理工作是根据卢昶编写的国家书目《甲乙新录》进行的，因此，孙惠蔚校书后没有再重新编制目录。

北魏长时间的统一与安定，为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加上统治者重视图书事业，对图书不断地搜求，国家藏书数量日益增加，但没有编出一部系统的政府藏书目录，是为憾事。北魏末年，统治腐朽，尔朱氏发动"河阴之变"，加之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北魏王朝分裂为西魏和东魏。在北魏分裂后的几十年里，图书损失严重，成为整个北朝藏书史上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2】《魏书》卷8《世宗纪》。

【3】《魏书》卷84《儒林·孙惠蔚传》。

最大的一次挫折，整理官藏的工作一度停止，大部分藏书流散。从此，北朝藏书转入低潮。东、西魏时代的官府藏书一直没有得到恢复，所以也就谈不上有所发展。虽说西魏政权曾搜集过图书，据《周书·寇儁传》载，大统五年（539年），"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1]，但毕竟收效甚微。到北齐、北周时，北方的政府官藏才又略有恢复，但也极其有限。

【1】《北史》卷27《寇儁传》。

北齐建立后，在接受东魏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继续求书，使官藏有所增添扩充，"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2]，官府藏书才略有增加，藏书大约30 000卷，但图书质量不高，剔其重杂，有价值的大约5 000卷。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诏樊逊等十二人"校定群书"，供皇太子用。当时秘府典籍纰缪颇多，要刊定群籍必须广集众本，于是樊逊提议向邢子才、魏收、辛术、穆子容等"多书之家"借阅，以"参校得失"；后来，"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3]。隋朝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说："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4] 可见，北齐也曾编制国家书目。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北方再次出现统一局面。北周继承了前代政府遗书，但宫廷藏书数量非常少，史载北周武帝"保定之始，书止八千"，以后经过收集，"后稍加增，方盈万卷"[5]，比南方官藏少得多，官府藏书明显不如前朝。灭北齐后，北周政府"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6]，从北齐藏书中选择其原来没有的图书5 000卷充实北周官藏，使政府藏书达到15 000卷。北周对官藏的整理，主要在明帝时期。明帝对其官藏极为重视，曾"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7]。这次整理官藏规模也很大，但校书后是否编目，《周书》未载。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

【3】《北齐书》卷45《文苑·樊逊传》。

【4】《隋书》卷49《牛弘传》。

【5】《隋书》卷32《经籍志一序》。

【6】《隋书》卷32《经籍志一序》。

【7】《周书》卷4《明帝纪》。

总的来说，北朝虽然在官藏整理、编目和图书复制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比较简单粗糙，没有突出的成就。所编目录亦都未能得到流传，其图书事业较南朝逊色许多。推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战乱不断和文化的落后。此后，随着隋朝全国统一局

面的出现，官藏整理、编目和图书出版事业才逐渐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官府藏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历来是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形式。而由统治者组织人力编写的国家书目则是各个王朝校订、整理其国家藏书的直接结果，从中不仅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官府藏书的聚散得失，也可以揭示出历代王朝对其官藏所进行的整理、校定、复制、再版的历史过程及当时学术文化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从而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以下是魏晋六朝时期官方藏书数量之大略统计，只有在大体上了解魏晋六朝官方图书的收集、整理情况之后，我们才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官藏加以评价。

表六　魏晋六朝官方藏书数量统计

朝代	记事	藏书数	史料出处	备注
晋武帝泰始咸宁间	荀勖撰《中经新簿》	29 945 卷	《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	《古今书最》作 29 035 卷
东晋穆帝永和间	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	3 014 卷	《晋书·荀勖传》《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	
东晋孝武帝宁康间	徐广主持校书	36 000 卷	《玉海》卷 52 引《续晋阳秋》	
宋文帝元嘉初	谢灵运等撰《元嘉八年四部书目》	1 564 帙,14 582 卷;另有佛经 55 帙 438 卷	《宋书·谢灵运传》《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	
宋后废帝元徽间	王俭撰《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	2 020 帙 15 704 卷	《南齐书·王俭传》《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	《古今书最》作 15 074 卷
齐武帝永明间	谢朏、王亮撰《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	2 332 帙 18 010 卷	《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	

续 表

朝代	记事	藏书数	史料出处	备注
梁武帝天监初	刘孝标、祖暅撰《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	2 968 帙 23 106 卷	《隋书·经籍志》 《古今书最》	
梁武帝普通间	阮孝绪撰《七录》	44 526 卷	《梁书·阮孝绪传》 《隋书·经籍志》 《古今书最》	含私家藏书
梁元帝承圣间	平侯景收文德殿之书于江陵	70 000 余卷	《隋书·经籍志》	
隋文帝开皇间	隋平陈，充实内外阁书	30 000 余卷	《隋书·经籍志》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西晋的《晋中经簿》著录图书29 945卷，是这一时期官府藏书的最高峰，但这一高峰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猛然跌落到3 014卷，十不存一。历经一百多年的聚散辗转，到南朝图书事业最发达的梁代《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中，藏书数量又迅速回升到23 106卷，接近于《晋中经簿》高峰时的藏书水平。可见，六朝虽偏安南方，处于与北方对峙争战的形势下，图书典籍屡遭破坏，然而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定、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华夏文化主流的南迁，官方藏书数量明显增长。东晋、宋、齐、梁四朝不到二百年，南方政权的藏书数增加了七倍多，可谓我国文化典籍发展历史上的最快时期。在官方藏书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私家藏书与宗教书籍的数量也有明显增长。西晋所编国家书目《晋中经簿》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及宋文帝元嘉初年，由谢灵运等编撰之《宋元嘉八年四部书目》中著录有佛经55帙438卷即是明证。在此时期的图书事业发展中，西晋和梁朝在官藏整理方面成绩最为突出，它们分别编纂的《晋中经簿》及《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是这一时期书目编纂水平与特色的代表，前者开书目四分法之先，又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后者将数术书

单独立类，创书目五部分类法。从对以上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代所著录的图书数量与编目质量起落悬殊，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一战乱时期图书整理、再版、复制的艰难，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著精神和强大向心力。

第四节　私人及寺观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写书的普及，使书籍便于抄录、携带和保存，从而为私人藏书开辟了新的天地，而私人著述的兴盛，亦为私人藏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魏晋六朝时期，虽时逢乱世，政府公藏时聚时散，相反，私家藏书却由于散布民间，不会受到兵火的集中破坏，且易于转移而蓬勃发展起来。人们在不能利用官藏的情况下，就转而依赖于民间私人间的借阅、传抄，从而又进一步刺激了私家藏书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与聚散无定的官府藏书相比，可谓盛矣。

一、私人对图书的收集、典藏、抄写复制

三国时，藏书数千卷的人很多。“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得到蔡邕赠书数千卷，他死后，其子收藏，后来又传到王粲族子王业手中。蜀国丞相长史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两晋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有西晋的张华，他学识渊博，“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东晋初，虽政府藏书甚少，而私人手中却有不少藏书，如殷允、张尚文、郗俭之、桓石秀等人都是“多书之家”，以至东晋政府在收集、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不时找私人借书，使秘书郎“分局采借”，即按每人专管一部来抄写，以增加国家藏书。南北朝时私人藏书发展更快，出现了拥有万卷以上书籍的私人藏书家。梁武帝时著名的私人藏书家有谢弘微、刘善明、沈麟士、崔慰祖、王僧孺、沈约、

任昉、张缅、孔休源、张攒、萧励、马枢、江总、徐伯阳等。据《隋书》卷32《经籍志一》载，梁武帝时，“四境之内，家有文史”。这些藏书家多收有“异本”，如陆澄“家多坟籍，人所罕见”之书[1]。王僧孺“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2]。梁秘书监任昉卒后，梁武帝使贺纵和沈约“勘其书目”，发现很多书为国家藏书所无，于是，“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3]，任昉的藏书补充了国家的藏书。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较多，私人藏书的人数和图书数量都比南方少。进入北朝以后，战争有所减少，私人藏书开始出现，辛术、司马子端、李兴业、李谧等人都藏书较多。辛术除了在北方收集图书外，还到淮南收集宋、齐、梁的佳本，藏书达万余卷。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为藏书而建的藏书楼，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具有私家图书馆的意义。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大致相似，南朝藏书多北朝藏书少，其中心逐渐南移。

在当时，得到书籍的主要途径是抄写和购买，也有的来自家传，或在战争中得到一些图书。如北齐人辛术是个“虽在戎族，手不释卷”的人，据《北齐书》卷38《辛术传》载，辛术“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已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门”。许多藏书家买书不惜巨资，甚至不置家产，如南齐人刘善明卒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4]。沈麟士的藏书被烧数千卷，当时他已年过八十，但不灰心，仍然抄书不辍，“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5]。这一时期私家藏书的主要复制方式还是抄录。书籍的手抄复制，在先秦就已出现了。纸张被普遍应用后，由于它的经济和便利，使抄书的风气更为兴盛起来，从民间到官府形成了一个写书、抄书的高潮。在《南史》、《北史》等文献里，都记载了不少当时人不畏艰苦、勤奋抄书的情况。政府抄书之风也很盛，北朝的秘书省甚至设立了抄书的专职官员“正字”和“弟子”，弟子专门负责抄书，正字负责校对弟子所抄的书。中央政府还常常派人到知名学者家去抄取他们的

【1】《南史》卷48《陆澄传》。

【2】《南史》卷59《王僧孺传》。

【3】《梁书》卷14《任昉传》。

【4】《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

【5】《南史》卷76《隐逸下·沈麟士传》。

著作，抄写以备官藏。如晋代陈寿去世后，晋惠帝便派人带着纸笔去陈寿家中，抄写他所撰写的《三国志》。除文献记载外，尚有不少当时的手写本实物存留至今，仅晋代实物便有两种《三国志》残卷及一些佛经残卷等。

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的是，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不仅重藏，亦重使用，“藏以致用”的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为官府图书的整理、复制提供范本，如“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私家图书的整理和相互借阅现象极为普遍。私人藏书不仅方便了自己，也为别人提供了方便。很多藏书家对于图书的利用已不局限于个人阅读，他们有的利用所藏编辑新著，有的让人借阅传抄，充分发挥了图书的作用。比如，梁朝的孔休源从藏书中辑录奏议文集，《南史》本传说他“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练，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安成王萧秀则利用自己的藏书，聘请刘孝标等学者编成《类苑》一百二十卷。至于不秘私藏，供人借阅，对所藏图书勤加整理者则更不乏见，如蜀国的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不仅收藏书籍，还亲自校书，“刊定谬误”[1]，齐王司马攸亦“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他不仅“治护”书，还“手刊其谬”[2]。范蔚家有藏书七千卷，允许人们到他家看书，“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3]，而且，范蔚待客热情，还为他们置办衣食。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以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偿为辞”。这种无私奉献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不仅对当时藏书事业，就是对后代私人藏书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随着收书来源的拓宽，藏书数量的增多，藏书活动的内容必然逐步丰富起来。这一时期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已不限于收藏，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对藏书进行整理，开展一些校勘、编目工作。例如，宗室静好学博文，收集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4]。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恭加题帖”[5]。梁朝任昉整理藏书，编撰了私藏目录。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南北朝时期，随着私家藏书

【1】《三国志》卷41《蜀书·向朗传》。

【2】《太平御览》卷618。

【3】《晋书》卷91《儒林·范平传附范蔚传》。

【4】《梁书》卷22《南平王伟传》。

【5】《魏书》卷84《儒林·李业兴传》。

的发展，除了个人编写私藏目录外，还有个别见识广博的学者，超出私人藏书的范围，广泛著录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图书，编制出内容丰富、体例严整的私家目录，这就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部重要的私家藏书目录——王俭编制的《七志》和阮孝绪编制的《七录》。

宋元徽元年（473年）王俭主持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四卷，同时，他自己修撰的《七志》也在当年完成。《宋书》卷9《后废帝纪》曰："元徽元年八月，王俭表上所撰《七志》卅卷。"（《南齐书·王俭传》作四十卷）《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是国家书目，《七志》是私家目录，后者的份量几乎是前者的十倍，而且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者。《七志》采用七部分类，即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和图谱志。它的体制大致是：一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即《七略》的六艺略；二诸子志，纪古今诸子，即《七略》的诸子略；三文翰志，纪诗赋，即《七略》的诗赋略；四军书志，纪兵书，即《七略》的兵书略；五阴阳志，记阴阳图纬，即《七略》的数术略；六术艺志，纪方技，即《七略》的方技略；七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这是新增的；另附佛经录和道经录，实为九大类。《七志》原书虽早已亡佚，但根据《隋书·经籍志》及其他文献对《七志》体制的记载，可以了解《七志》的基本概况。《七志》是一部解题目录，除著录书目外，有序，有传录体解题。书目前有九篇条例，据《南齐书》卷23《王俭传》记载，《七志》完成后，王俭"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就是说《七志》应有上书表和条例。《七志》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均著录为《今书七志》，张舜徽先生《广校雠略》卷3曰："造书目者止录当代著述始于王俭《七志》。"王重民先生也是如此看法，认为《七志》著录的是今人之书、当代著述。它的分类采用七分法，阮孝绪的《七录序》说它"以向、歆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这就是说，《七志》在《七略》六分法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变化，前边的六类如《七略》的六

分，又加上图谱一类，此外还附录佛经和道经。应该说《七志》在图书分类的改动上，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当时史书数量已很多，但却未能单立一类，而将图谱独立一类，凑成七分，事出勉强，不尽合理。但是，总的看来，《七志》在古籍目录的发展史上，有几方面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七志》继承了刘向、刘歆编制目录的优良传统，在书目之外有序，有解题，并且创立了传录体解题的形式，而不像南朝的各种国家书目，只是简单地著录书名。

第二，《七志》是最早出现的私家目录，虽然是私人编撰，但其体例和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官修目录的水平。

第三，虽然在《七志》之前，《中经新簿》曾经附录佛经，但《七志》是最早一同著录佛经、道经著作的综合目录，它的著录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书籍流传的实际情况，扩大了著录范围。

第四，《七志》首创只记录当代著述的先例，开辟了断代目录的道路。从东晋渡江到《七志》完成有一百七十年左右，在此期间，渡江以前的书籍西晋所存甚少，又加日渐散亡；但是新的著作却大量出现，刘裕从北朝得来的四千卷图书中，有许多也是北朝人士的新著。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凭空照抄《七略》、《中经新簿》，不如按照当时所藏图书的实际情况，著录"今书"。所以《七志》的这一做法，也是符合当时图书实际的，王俭以后数百年间，《七志》是反映刘宋典籍最有参考价值的目录。一千余年以后，《明史·艺文志》自我标榜"去前代之陈编，纪一朝之著述"的做法，其实王俭的《七志》早已开了先河，只不过彼此的出发点各不相同而已。王俭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推动了南朝目录事业的进展。

王俭之所以要在《四部书目》之外另编《七志》，主要原因是对官修目录不满，认为官修目录"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另外，感到四分法有局限性，所创七分法，他参考了荀勖的《中经新簿》，而主要依据刘向、刘歆的分类法，正如梁朝学者任昉所说："(俭）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弘度（李充）

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1] 除此而外，王俭之所以能私家编制全国性的图书总目，开私人编目之端，也有他的优越条件。王俭出身南朝大族，先为刘宋驸马都尉，后又辅佐齐高帝即位，历任侍中、尚书令、中书监等职，由于他在宋、齐两朝都是比较活跃的政治人物，又与当时的学者多有交往，有许多门生故吏，所以他能博览公私藏书，有编制目录的优越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他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他才能依据自己的学识及丰富的分类编目实践，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美的分类目录《七志》，在目录方法和著录内容上都有所贡献，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说王俭是"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但他变更了《七略》中的五个类名。据《七录序》载，王俭变更的理由是：六艺不足标榜儒家经典，故改六艺为经典；诗赋未能概括其他文体的著作，故改作文翰；"兵"字浅薄不雅，故改为军书；数术之称繁杂而又不明确，故改称阴阳；"方技"一词，无典可据，故改为术艺。在结构上，《七略》虽名为七而实为六部，其中辑略为总序。王俭《七志》却增添了图谱志，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七部，这一创造被郑樵誉为"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2]。可见，图书的七分法是从王俭开始的一种新的分类法。《七志》不足之处是王俭不顾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收录在经典志内，这是退步。阮孝绪《七录序》指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3]

阮孝绪（479—536），河南尉氏人。梁朝的目录学家。一生酷爱读书，隐居不仕。普通中，博采宋、齐以来公、私图书记录，参考《梁文德殿五部目录》，编成《七录》十二卷，共著录图书七类五十五部，6 288种，44 526卷，"总括群书四万余，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指"，"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完整、全面地反映了梁一代的藏书情况，是继《汉志》之后，《隋志》前的一部群书总目，是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全国综合性系统目录，对《隋书·经籍志》影响很大。《七录》分内篇和外篇，

【1】[梁]任昉：《王文宪集序》，《昭明文选》卷12。

【2】[宋]郑樵：《通志·图谱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3】[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3。

图书共分七大类，即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并继承了《七略》撰写提要之遗风。阮孝绪及其目录事业与过去的目录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刘向、刘歆到王俭，几乎都有比较显要的政治地位，不仅能尽观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也很丰富，又有助手协助工作，所以编目比较方便，但阮孝绪却是一名隐逸不仕的“处士”，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学者，缺乏许多必要的物质条件。他必须尽量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加倍的刻苦努力，所以他对目录事业所作的贡献应该说是更为可贵的。阮孝绪在《七录》的序言中叙述了自己辛勤治学和编目的经过，他说自己“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对“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读书工作不辞辛苦，“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他在搜集遗文、校阅书目的过程中发现“校之官目，多所遗漏”[1]，于是在广泛披览图书，搜集各种官、私目录之后，“总集众家，更为新录”，编制了《七录》十二卷。所以他著录的图书既非官藏也非私藏，而是据其所见所闻，对当时社会上各种典籍的广泛著录，其特征则同于后世所谓的“知见目录”。据《古今书最》记载，阮孝绪除《七录》外，还有《文字集略》、《正史删繁》、《高隐传》、《古今世代录》、《序录》、《杂文》、《声纬》等七种著作。

[1] [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3。

《七录》的体制和具体内容，由于原书久佚，已不能全部了解，仅能从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中保存的《七录序》和所附的《古今书最》中，了解《七录》的编撰意旨和基本情况，并且还可以由此对梁以前的目录略知轮廓，这两篇著作是古籍目录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七录序》及其他文献记载的概括，我们可对《七录》有如下的认识：《七录》也是一部解题目录，它的解题也属于传录体形式。它的分类体系参考了《七略》和《七志》，但有很大的创新。采用七分法，全录又分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大部类下分设五十五小类，类目的设立比较合理。

全书十二卷，共著录图书44 526卷。从有关材料可看出《七录》在参考国家书目时，全面利用了《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亦称《五部目录》）。《史通·点烦篇》曰："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这说明了《七录》对梁《五部目录》的利用。从《七录》内篇的五部分类上，也可看出它对《五部目录》的模仿。《七录》内篇著录图书37 983卷之多，比梁《五部目录》著录23 106卷多了14 877卷，多余的这部分图书应当是阮孝绪披览私人藏书和私藏目录补充的。《七录》的主要成就有三个方面：一是分类体系上有所创新。《七录》的七分法比较合理，不像《七志》的七分那么牵强。它从书籍数量的实际出发，把史书从附庸的地位提到独立部类上，设立了"记传录"。又把佛法录和仙道录纳入七部之中，以集中反映社会上出现较多的佛经、道经。此外，《七录》在大部类之下又分细类五十五小类，如经典录分易、尚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部；记传录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十二部；子兵录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十一部；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术技录分天文、纬谶、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刑法、医经、经方、杂艺十部；佛法录分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经五部；仙道录分经戒、服饰、房中、符图四部。这种分类法，细致得体，形成一个较为严整的分类体系，推动了分类学的发展。许多小类类目的设立，为后世目录书所承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收书甚广。著录44 526卷图书，较之当时的国家书目《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的23 106卷要多出一倍。处于南北朝的动乱时期，阮孝绪在较差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样一部搜罗比较完备的目录，确实很不容易，值得肯定。三是《七录》同《七志》一样，能够继承刘向、刘歆的目录工作传统，撰写解题，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七录》的传录体解题被后世一些典籍所引用，说明了它的价值，同时也为今天的评论提供了依据。

阮孝绪仅是个读书人，社会地位不高，而且“内寡卷帙”、“旁无沃启”，缺书缺人，以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拥有的客观条件，要编制一部反映一代藏书之盛的图书目录无疑有很大困难，但由于他孜孜不倦，多方搜寻，终于完成了这部比较完备的书目。在阮孝绪编目时，曾得到了刘杳的慷慨帮助。刘杳在《梁书·文学传》中有传。史称，刘杳，字士深，平原人，自少至长，多所著述，撰《古今四部书目》五卷行世。刘杳的这部目录流传不广，除列传记载外，不见于诸家著录。阮孝绪在《七录序》中曾提到："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这里说到刘杳得知阮孝绪编写《七录》一事，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搜集到的材料慷慨相赠，助阮孝绪编成《七录》，阮孝绪盛赞刘杳的帮助“实有力焉”[1]，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刘杳成人之美的情操更体现了学者的胸怀。刘杳后来可能仍继续收集材料，撰成《古今四部书目》这部私家目录，在小范围中流传，否则《梁书·文学传》也无由记载。因此，《古今四部书目》也应在此提及。

【1】[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3。

总之，私人藏书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而且对于历经战火的官府藏书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于保存、传播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贡献殊大。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活跃，私人藏书来源、品种及质量的各具特色，都为补充和整理官藏提供了条件，诚如《晋书》卷36《张华传》所载，“天下奇秘，世所希存者，悉在华所”，“秘书监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南史》卷59《任昉传》亦说任昉“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凡官家不藏之书，皆“就其家取之”。可见，当时的私家藏书为补充、整理政府官藏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而魏晋南北朝私人藏书家们勤奋抄书、聚书，精心护书、校书的精神对后世亦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珍贵典籍正是借他们之手传抄、复制才得以不失传，从而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图书事业的发展。

二、寺观对佛经、道经的收集、收藏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官府藏书起伏不定，藏书事业发展缓慢。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和门阀士大夫阶层的清谈、佞佛，社会上宗教盛行，使得佛教译经和道教典籍大量涌现，佛寺、道观对佛道经典的收藏成为这一时期图书事业的一大特色。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到梁代已超过儒学，被定为国教。一般来说，寺院作为传释佛法和僧尼聚集之所，基本上都藏有一定的佛典供僧尼使用，有寺院就可能有佛经的收藏，这是符合情理的，因史籍中虽有寺院的记载，但记载藏经者甚少，所以各寺院的具体藏经情况现已无从考证。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随着寺院的增多，佛经的陆续译出，藏书也就渐成规模。寺院大规模收藏佛教经典是从西晋时代开始的。唐释道宣《释迎方志·教相篇》载：西晋两京有寺一百八十所，译经七十三部；东晋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译经二百六十三部。在西晋官府藏书中，亦已有佛典的收藏。姚名达先生曾说："考四部之兴，世人仅知晋秘书监荀勖因魏秘书郎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而不知其收更有《佛经》也。《广弘明集》引《古今书最》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其第三句语意不明，似此簿共十六卷。"[1] "荀勖之《晋中经簿》收佛经，足见佛经之在晋初，不特已有目录，抑且深入秘阁矣。"[2] 东晋的庐山东林寺和建康道场寺也是当时译经、藏经中心。刘宋著名藏经寺院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南牛头山之佛窟寺，藏有各类佛经、道书、佛经史、俗经史、医方图符等，用意为永镇山寺，相传守护。萧齐储藏佛典之处为大云邑。关于各寺院原具体藏书数量，因文献记载不详，我们无法得知。此后，梁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崇佛达到极点，他特辟华林园，既专门庋藏佛典，又是著名译场，大小寺院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220页，上海书店，1984。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220页，上海书店，1984。

也是传经、藏经之所，著名的梁钟山定林寺即藏有佛经400余卷，并以此著称江南，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曾为之编定《定林寺经藏目录》。另外，建初寺、长沙寺也都是当时收藏佛经的著名寺院。北朝佛教藏书亦初具规模，有寺院佛藏、石窟佛藏和佛经专藏。东魏专储佛典之处是经书库[1]。北齐、北周均有经藏专地，北周弘农郡五张寺藏佛典300余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开始趋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佛教典籍和佛教学者数量之多亦大大超过前代。有学者估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籍，佛经、道经居其半。

【1】《北齐书》卷24《杜弼传》。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搜集卷帙、建立经藏的，可能是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的经藏。据《高僧传》卷11载：僧祐建康人，"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祐乃竭思钻求，遂大精律部。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梁初，武帝"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勒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深戒。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因为法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僧祐受其师法颖的影响甚大，遂集合众力，更广其事，"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寺营建般若台造立了经藏，成为我国第一个建立经藏的人。北朝元魏和高齐两代统治者皆佞佛，李廓、法上曾两度结藏。李廓自北魏到东魏曾整理过经藏，并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在整理佛藏的基础上，编撰了《众经录》。法上，朝歌人，自东魏至北齐历任统师，掌管昭玄寺及全国佛教。据《续高僧传》卷8载："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四方试运行地，咸禀成风。崇护之基，罕有继乎！"法上利用其地位，在昭玄寺建立了经藏，并且依据李廓的《众经录》进行了整理，所结经藏共有787部，2 334卷。南北朝时期，除手写佛经以外，还出现了一类石刻佛经，即将相关经文刻在石

窟中摩崖上。北朝开凿的石窟甚多，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除北魏开凿的云岗、龙门石窟以外，北齐的天龙山、响堂山石窟亦十分有名。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其中北响堂山石窟包括刻经洞、释迦洞和大佛洞三大窟。刻经洞是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所刻。他认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佛教经典难以久存。于是发愿把佛经镌刻在名山之上，以为保存之计。从后主天统四年（568年）三月起，开凿石窟，并将窟内外的壁面山镌刻《维摩经》、《胜曼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历时四年，至武平三年（572年）五月才完工，刻经洞所刻的佛经与儒家石经异曲同工，是北朝佛藏的一个类型。除此以外，北朝还有一些专门的译经或梵本藏书。

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增多，需要加工、整理，以供检阅，于是产生了佛典目录。据统计，此时期所产生的佛经目录有近四十部[1]，但大都亡佚。下文附表所列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披沙拣金，目的仅在于助读，以了解当时佛经目录编撰之概况。其中较著名的有晋释道安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编制的《综理众经目录》和梁释僧祐撰成于梁武帝天监四年至十年间（505—511年）的《出三藏记集》。佛经目录的编撰记载了佛经译著在中土流传的情况，同时保存了各时期的许多文化史料，更为可贵的是，佛经目录的编制方法有相当高的水平，值得一般目录借鉴和参考。此期佛经目录的产生，推动和影响了后世佛经目录的发展。其独特的编撰方法，为古代目录事业增添了光辉。

【1】姚名达：《中国历代佛经目录所知表》。

《综理众经目录》是我国较早的佛经目录书，著录汉光武以来，迄晋宁康二年（374年）所出的佛典，是对当时中国佛教书的一次总结，正如梁释僧祐所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2] 全书分六类：一为"经论本录"，收完整而优质的译经，按翻译家的年代顺序收录自汉至晋17家247部经书；二为"失译经录"，指失却译者姓名的译经，共收134部；三为"异经录"，指不同地区的佛经翻译本；四为"古异经录"，收古代翻译的佛经92部；五为"疑经录"，即不

【2】[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5。

能断定经的真伪，表示疑问，共收26部36卷；六为“注经杂经录”，收道安自己所注佛经共18部27卷。近代学者梁启超对其评价极高，认为它的体例，“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1]。梁释僧祐辑录《出三藏记集》中的经录部分，就是在道安经录基础上补充而成的。

梁释僧祐在建立经藏的同时，一方面“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伽谱》及《弘明集》等”[2]，撰著诸书。另一方面，他又对经藏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僧祐认为：“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传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收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夫一时圣集，就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复生疑惑，奚所取明。”[3] 有鉴于此，释僧祐决定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以建经藏进行全面整理。虽然释僧祐曾试图依《综理众经目录》综为新录，但是他发现读书目太简，且“众录苞杂经，苞定卷部”，遂对它进行了考订。同时，释僧祐又“总集众经，遍阅群录”。这样，又发现佛典“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声实纷糅，尤难铨品，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摄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芳丝”，所以，整理佛典，已是“于斯为急”[4]。在这种情况下，释僧祐“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对佛藏进行了细致的考订、校雠。同时，著名的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治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这样，经过僧祐和刘勰等人的历年校雠，编撰了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全录15卷，著录佛经凡2 162部，4 328卷。全书分为四部分：一“撰缘记”，记载佛教三藏和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记从东汉以来译经目录，其中又分十二录；三“总经序”，

【1】梁启超：《佛家经典在中国的目录学之位置》，《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6。

【2】《高僧传》卷11。

【3】[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

【4】[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

记各经的前序和后记一百二十篇；四“述列传”，记译经人的传记。前二卷外国二十二人，后一卷中国十人，共三十二人。录内又有《集三藏录记》、《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出入藏记》三篇文字，详细地叙述了佛经结藏的经过，是研究南北朝时期佛藏发展的重要文献。

表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目录

书名	作者	备注
《汉录》	（曹魏）朱士行	佚。记汉代诸家译经。见隋朝费长房《开皇三宝录》（以下简称《费录》）、唐朝释道宣《大唐内典录》（以下简称《宣录》）记载。
《众经目录》一卷	（西晋）释竺法护	佚。是一部简单的佛典登录簿，以记录译经为主，按译出经的先后排列，间有译者、译地。见《费录》、《宣录》记载。
《众经录目》一卷	（西晋）聂道真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经论都录》一卷	（东晋）支敏度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综理众经目录》一卷	（东晋）释道安	佚。道安，常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史书称其“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证，实韶斯人”。
《庐山录》一卷	（东晋）释慧远（？）	佚。专录庐山译经。见《费录》记载。
《二秦众经录目》一卷	（东晋）释僧睿	佚。专录秦凉译经。见《费录》、《宣录》记载。
《魏世经录目》一卷	（东晋）竺道祖等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吴世经录目》一卷	（东晋）竺道祖等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晋世经杂录》一卷	（东晋）竺道祖等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宋齐录》	（南齐）释道慧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河西经录目》一卷	（东晋）竺道祖等	佚。见《费录》、《宣录》记载。
《定林寺藏经录》	（南齐）刘勰	佚。《梁书·刘勰传》云：“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续 表

书名	作者	备注
《众经别录》二卷	（南齐）佚名	残。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古典目录，出《敦煌遗书》中，残卷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收佛典1 089部，2 593卷，分十类，采用以内容分类为主、兼顾形式的双重分类体系，它标志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理解的深入。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	（梁）释僧祐	共著录佛经2 162部，计4 328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初、定林二寺的佛藏数目，是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
《华林殿众经目录》	（梁）僧绍	佚。取《出三藏记集》，"分长四色，余增减之"。见《费录》、《宣录》记载。
《梁世众经目录》	（梁）宝唱	佚。见《宣录》记载。
《真谛录》	（陈）释真谛	佚。见《大隋众经目录》记载。
《魏世众经目录》	（北魏）李廓	佚。见《宣录》记载。

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由我国古代的巫术和战国秦汉之际的方术逐渐演化而成。道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理、教义与修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并最终形成以卷帙浩繁的道经总集——《道藏》为中心的宫观藏书体系，与佛教寺院藏书一起被视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原始道教从民间信仰逐步演变为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的时期，与之同步发展，道教典籍也与日俱增。道教的宫观藏书，开始于晋宋之后，并随着道教的发展而日臻完善。据《抱朴子·释滞篇》云："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陈国符先生亦言："汉末三国，道书先后出颇众。及晋初，卷帙滋繁。"[1] 道教典籍的收藏，最初是官府、民间兼而有之，至西晋末期，道书已为数不少，开始出现了道士私藏道书的现象。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郑隐。郑隐是西晋末年道士，本为大儒，明五经，善

【1】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律、历、候、纬，晚好仙道，从葛玄学炼丹术，兼综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解音律，善鼓琴，藏书甚丰，道经居多，计有道经约670卷，另符500余卷，合计约1 200卷。郑隐藏经情况在《抱朴子·遐览篇》中有如实记叙，它可以说是道教藏书被记录的开始。东晋末，“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南北朝时，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改革旧天师道，制定乐意诵诫新法，得到太武帝的赞助。于是，官方道教组织逐步健全。寇谦之所创的道派称为“新天师道”，因流传于长江以北，故又称“北天师道”。据称，寇谦之曾于天师道场集聚道经，但收集到的道书尚少，于是寇谦之“将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之书混而为一”[1]。在南朝，到宋、齐时期，道教祀神、作法事的道馆多起来，并且由僻地深山渐渐发展到都市。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庐山道士陆修静于崇虚馆整理三洞经书1 200余卷，编著斋戒仪范，使道教的科仪基本完备，他所创道派称为“南天师道”。他利用自己在崇虚馆的名望和地位，广集道经，由此他发现“但经始兴，未尽显行。十部旧目，出者三分。……顷者以来，经文纷至，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2]。于是，陆修静躬加整理甄别，裁去旧目中疑伪之道经，区分类别，以成条目，将道经分成“三洞”，于泰始七年（471年）撰定了《三洞经书目录》。该目共收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计2 228卷，其中1 910卷已行于世，138卷犹隐在天宫。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早年入云梦山修道，为了搜集道书，寻求仙踪，曾南至衡、湘、九嶷、罗浮，西至巫峡、峨嵋。宋元嘉末，陆修静到京城建康市药，宋文帝曾诏之入内讲经说法，后因避太初之难，遂拂衣南游，入庐山隐居。作为南朝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他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搜集和整理道经方面，贡献卓著。在整理道经方面，他首创道经分类法，采用“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体系，即将道书分为三洞、四辅七大部类，其中三洞各部又分为十二小类，客观地反映了早期道经传世的情况，是整理、分类、编目道经的第一人，在道教史上

【1】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2】《云笈七签·灵宝经目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

影响深远。继陆修静之后，萧梁时期道士陶弘景又在其基础上，致力于在各处搜寻道书，进行校勘整理。此后道观藏书转盛，南朝齐、梁、陈三代所建道观遍及江南各名山大都，虽规模大小各异，但其构造大多为宫殿式，内有藏经楼，专贮道藏，为出家道士所用。齐的兴世观，梁的华阳上下观、朱阳观等都富有藏书。到北周时，周武帝先后于玄都观和通道观集聚道书，并令人整理，还“亲御法讲说，公卿道俗论难”[1]。玄都观道士曾整理过道经，并于天和五年（570年）编撰了《玄都经目》。此目收录道经甚多，其“传记、符、图、论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须纸四万五十四张。其一千一百余卷经传、符、图。其八百八十四卷诸子、论。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中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2]。道书收藏最盛的，要属北周的通道观。建德中（572—578年）通道观建成，王延整理通道观道经，编撰《三洞珠囊》，共著录通道观所藏道经8 000余卷。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传统宗教，自东汉成型以后，与儒学和佛教相互排斥、互相吸收、相互融合，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道教藏书吸收、保存了先秦诸子中许多早已被儒家正统思想所摒弃的思想内容，使它们免于湮灭。道教藏书中存留的许多先秦诸子著作及道教徒对它们的重新诠释，为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周书》卷5《武帝本纪》。

[2]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从古至今，图书的收藏、整理、复制、出版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奠基于先秦，起始于两汉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由幼稚到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是政局动荡、朝代更迭频繁的动乱年代，战乱的频繁客观上妨碍了图书事业的繁荣与兴旺，但这一时期图书管理制度日臻完善，朝廷设官治书，委任专人各司其职，有利地提高了书籍出版的质量，纸写书的普及客观上为图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而私人著述的不断丰富则成为了图书事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因此，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图书事业无论从图书的管理形式、典籍的内容以及在图书的收藏、整理、复制、再版上都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聚散无常的官府藏书、蓬勃发展的私家藏书以及方兴未艾的寺观藏书构成了这一时期图书事业的三大人文景观。在此期间，收藏和利用图书已不再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功利行为，而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支柱，形成了一种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朝廷对于图书出版业的重视程度，还是图书的编校方法、出版工艺、图书出版的数量和品种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图书的收藏、整理、复制和利用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客观上，为隋唐图书事业的进一步兴盛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编撰和出版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时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动荡不安，但是图书的编撰和出版却兴旺发达，卓有成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究其原因，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客观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造纸术已较前大为进步，造纸材料的来源由麻扩大到楮树皮、桑树皮、檀树皮以及藤等，大大增加了产量，纸张质量也不断提高。用纸书写的优越性不仅很快被社会认可，而且还有封建统治者下令以纸代简。价值低廉、流通方便、能持久保存的纸，逐渐取代了简牍和绢帛，普遍应用于书写，这就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包括图书的编撰和出版，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二是方便书写的字体已多种多样。汉代隶书取代小篆等古文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到魏晋南北朝又出现了行书和楷书，而南北朝时期楷书已成为主要的字体，并且一直流传至今。楷书和行书用于书写更加简易和迅速，这也是促使图书文献大量涌现的客观基础（图35）。

从主观方面看，魏晋南北朝虽然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争战，争权夺利，但大部分统治者没有置文化事业于不顾。如魏文帝曹丕对图书的编撰和出版就相当重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魏文帝“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



图35
敦煌千佛洞写于416年的敦煌地名词典

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南朝梁武帝也特别重视图书事业，即位不久即下诏向民间收书，要求“依密阁旧录，速加缮写”，并设立了文德殿、华林园典藏经籍。北魏曾三次大规模搜集图书，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还命人检查了北魏缺少图书的情况，编订《魏阙书目录》一卷，到南齐去按目借书抄录。此外，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私人修书风气盛行，也是图书编撰和出版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魏晋南北朝图书的编撰主要有几个特点：

其一，图书数量大大增加。关于历代图书文献的数量，史料所限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但通过大概的比较也能看出其变化。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了596家著作，共13 269卷。至魏晋南北朝，图书数量则明显增加。西晋编写的国家书目《中经新簿》，已著录图书1 885部，共20 935卷。南朝梁代目录学家

阮孝绪编撰的《七录》，著录图书达到44 526卷。《隋书·经籍志》所载图书包括了隋代的文献，但主要反映的是南北朝图书存亡状况。其中著录书籍总计14 466种，89 666卷。由此看出，魏晋南北朝图书的编撰和出版确为一个大发展时期。

其二，新类别、新体裁的大量出现，丰富了图书的表现形式。以图书新体裁而言，经学如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创立了汇聚注家经学的“集解”形式。史部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梁朝周兴嗣《梁皇帝实录》等，分别创立地方志和实录等史书新体裁。文学方面有诗文评、总集等新体裁产生。子部则有《皇览》等一批类书问世。此外，还有一大批原有的图书体裁在此期得到完善而流行。如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谱牒著作、佛教道教典籍。新类别、新体裁的不断涌现，不仅丰富了图书的表现形式，而且刺激了学者们的创作热情，不断形成图书编撰的高潮。

其三，以抄撰形式出现的著作增多。抄撰，就是在抄书时加入自己的意见，边抄边撰，把抄的内容和撰的内容糅为一体，形成一本似是而非的“混血”的著作。之所以会出现抄撰，最初可能是因为一些有批判精神的抄书者在抄写大部头的图书时不胜其烦，不甘于逐字照录，而喜欢根据自己的识见，对当简处加以删节，对当繁处添加资料，对错讹处加以修改，对感慨处加以议论，对相关者加以汇集。这样一来可以消解抄书的枯燥，二来可以展示学识，何乐而不为？这样生产的图书多了，便逐渐蔚为成风。“抄撰”一词在史籍中经常出现，如《梁书·庾於陵传》称庾於陵“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陈书·杜子伟传》称杜子伟“与学士刘陟等抄撰群书”；《陈书·陆瑜传》称皇太子“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南史·庾肩吾传》称庾肩吾与刘孝威等十八人“抄撰众籍”。

抄撰既是图书复制、流通的方式，也是图书编撰的方式。抄撰著作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原书只删改不添加，形成原书的节本；二是对原书既删削又增改，形成与原书相补充的新著或参

考书；三是抄撮众书，汇集相关资料，形成类书性质的工具书。有的抄撰者把抄撰作为治学的一大法门，作为成就学者的一种途径，有的抄撰著作广泛传播，甚至逐渐代替原著。抄撰之作遍及各类，尤以两类书为多。一类是日常用书，如经书、谱牒、医书等，因读者面广，需求量大，经常成为抄撰的对象；一类是长篇巨著，如《史记》、《汉书》、《地记》等，这类书卷帙浩繁，通读一遍要花费不少时间，抄撰之作压缩了篇幅，保留了精华，节省了读者的阅读时间，因而也颇受欢迎[1]。抄撰作为一种图书流通和编撰的方式大范围流行，直接结果是产生了大量抄撰著作，间接作用是促进了类书等工具书的发展，后世的类书和史抄都借鉴了魏晋南北朝抄撰著作的编纂方法。

【1】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尽管魏晋南北朝图书分类是四分法和七分法并行时期，但是考虑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主流，这里还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和出版的图书。佛经情况特殊，不宜归入四部，故单独分节记述。

第一节　经部典籍的注疏和出版

经部是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儒学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学中最具有学以致用和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其时有“六经”之说，指《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种古籍。至汉代，《乐》经亡佚（或说《乐》经未曾编成），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其余“五经”设立博士，儒学取得了独尊的、正统的地位。整理研究儒学经典的“经学”，在贾逵、马融、郑玄等众多经学大师的带动下，在汉代逐步形成规模，十分盛行。后来“五经”陆续得到充实，经书范围扩大，到宋代形成了“十三经”，并一直维持到清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

语》、《孝经》、《尔雅》和《孟子》等十三部典籍。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玄学兴起，致使儒学独尊的地位动摇。所谓玄学，是以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基本内容的“三玄”之学，以探究宇宙本源的奥秘为主要课题，是魏晋南北朝盛行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新的学术思潮。其产生的背景，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思想渊源。东汉后期，社会矛盾重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东汉王朝被黄巾起义摧垮后，又出现了豪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不仅使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垮台，也动摇了当时作为统治思想的被谶纬迷信神化了的儒学。严酷的社会现实，使继起的统治者不能不总结经验、教训，为封建秩序、纲常名教寻求新的理论依据。而那些不满现实又恐惧杀身之祸的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卷入危险的政治斗争漩涡，开始抛弃单一的儒家说教，倡导老庄之学，并用道家的观点去解释儒家学说。这样，玄学便逐渐形成了。玄学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名实之辩”、“才性之辩”、“言意之辩”，以及理想人格、人生价值、养生之术等等，其核心思想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儒道合一。玄学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等人崇尚老庄，用玄理注解儒经，使魏晋时期的经学带有了浓重的玄学特色。到了南北朝时期，经学南北分流。大体看来，北朝较多继承两汉的经学，南朝较多继承魏晋的经学。北学崇尚朴实，笃守持重的习俗；南朝多慕华侈，常沾清淡的风气。华侈则多新意，朴实率由旧章。南北朝经学的趋尚虽然不同，但治经的方法又大多一致，主要是对经文进行注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自出己见的新注，也有在前人注解基础上加以引证和发挥的新疏，并且取得了较多成果。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五章中说：“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

【1】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1] 这里指出了魏晋时期注释经书的六部代表作，说明了这一时期经书注疏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经学实际已成为注经之学，经部典籍的出版与注经紧密联系，故下面对这一时期经书的新注新疏进行叙述。须说明的是，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十三经"还没有全部取得经书的地位，但考虑到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这里均放入经部加以评述。

一、《尚书》新注新疏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秦始皇焚书时一度被禁。汉代《尚书》重现，分为今文与古文两个学派。之后历经战乱，多有散佚。东晋时梅赜向朝廷献上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自宋吴棫、朱熹开始辨疑，至清代有了明确的结论，阎若璩及惠栋等经严密考证，认定《古文尚书》为梅赜伪造。另外，朱熹在怀疑《古文尚书》的同时，对"孔安国传"也提出质疑，认为恐是魏晋人所作。后经明梅鷟、清朱彝尊等学者考订，《尚书孔氏传》非出自孔安国之手，其伪作者不出魏晋间人，已成定谳。那么作伪者究竟是谁呢？大多数学者以为是三国时期曹魏王肃所为，至少与他有关。

王肃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对《尚书》颇有研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肃注《尚书》11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为10卷），王肃撰《尚书驳议》5卷；《旧唐书·经籍志》又有王肃《尚书答问》3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孔安国问答》3卷，似为一书）。经学者比照，"孔安国传"内容与王肃注大多相同；加之王肃为壮古文经学的声势和反驳郑玄之学而提供证据的需要，喜造伪书，故认为"孔安国传"实出于王肃之手。也有学者看法略异，如清人崔述《古文尚书辨伪》，认为是王肃门徒所作，但也属王肃学术流派。《尚书孔氏传》虽为托名孔安国的一部伪书，但其注释出于王肃这位研究《尚书》

颇有成绩的专家之手，而且又是流传至今的唯一的系统的《尚书》古注，自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说到魏晋南北朝经书新注新疏的成果，不能不提及此书。

除了《尚书孔氏传》，魏晋南北朝时期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研究《尚书》的著作，总体看成果超过了汉代。《隋书·经籍志》著录《尚书》类书籍32部，247卷；通计亡书合41部，296卷。其中汉人编撰仅6部，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的著作。其中有通论《尚书》的，如谢沈注《尚书》15卷、刘叔嗣注《尚书》21卷等；有汇集前人注的，如李颙《集解尚书》11卷、姜道盛《集释尚书》11卷等；有阐述《尚书》内容的，如梁武帝《尚书大义》20卷、刘炫《尚书述义》20卷等；有疏解《尚书》注的，如《尚书疏》20卷、蔡大宝《尚书义疏》30卷等；有对《尚书》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的，如顾欢《尚书百问》1卷、虞氏《尚书释问》1卷等。

二、《周易》新注新疏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卜筮之书，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易传”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加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共计十篇，又称“十传”。《周易》经过历代注释者的充实，成为哲理非常丰富和深奥的经籍，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在世界也享有盛誉。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整理注释过《易经》。但流传至今的最早古代注本，是三国时魏王弼所作的《周易注》。

王弼《周易注》包括“易经”六十四卦的《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以及“易传”《文言》、《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的注释。王弼注《易经》是以西汉费直所传古文《易》为底本，他承袭了费氏以传解经的成法，并且变乱旧式，将解释《乾》、《坤》二卦的《文言》附入《乾》、《坤》二卦经文之中，将上下《彖辞》、大小《象辞》附入六十四卦经文之中。关于将

《周易》以传附经之人，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说出于郑玄或费直之手的。对此，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作了论辨，定于王弼，言之成理，其说可信。如云："改窜《周易》以经附传，实颇出于王弼之手。《玉海》朱震曰：'王弼以《文言》附《乾》《坤》二卦。'则《文言》传之附入经文，始于辅嗣（王弼字——引者注）。又《正义》云：'弼意象本释经，宜相近附，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下。'则《小象》传之附入经文，亦始于辅嗣。又按《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夫古注单行，康成注《易》，合《彖》《象》于经，为之解说。然其于《周易》本文，据高贵乡公之言，实经传未尝混合。是则以《彖》《象》附入经文，似非如世人所言出于康成。而读王弼《易略例》，首章即为《明彖》。其以《彖》说经者，昭然如见。或者以《彖》《象》连入经文亦即出于辅嗣。而此久以流行之今本《周易》，以经传相附，或即出王弼一人之手也。"[1]

王弼《周易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黜象申义"，即贬抑象数，注重义理。汉儒以"象数"解《易》，有时拘泥卦象，并杂入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义支离破碎。王弼一扫旧习，独树新帜，"黜象申义"。但他重于意义，并非尽弃象数，"其宗旨实在于探寻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经义条贯不紊"[2]。二是以道释儒，即用《老子》说《周易》。王弼在注《周易》时，援用老子思想的情况非常明显。例如《周易·乾卦·象辞》王弼注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这里用了道家虚无为本、形器为末的思想。又如《周易·恒卦·上六爻辞》王弼注："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就是用了《老子》二十六章"静为躁君"的话。

王弼《周易注》简要精当，长于义理，对汉儒附会之说有廓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前言》，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之功。虽然疏于训诂，且以老、庄释儒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压过郑玄《易》学，成为当时《易》学的主流。唐初修撰《五经正义》，《周易》即采用王弼及东晋韩康伯(注“易传”之《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的注，孔颖达为之作疏。故王弼《易》学在唐代广为学者传习，几定于一尊，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周易》作为“三玄”学说之一，很受推崇，故研究《周易》者甚众，面世的成果也很多。《隋书·经籍志》共著录《周易》类著作69部，551卷；通计亡书合94部，829卷。其中只有五种由汉人所撰，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的著作。其中为《周易》作注者，三国时期曹魏有卜子夏、董遇、荀辉等；孙吴有姚信、虞翻、陆续等；晋代有韩康伯、黄颖、干宝、王廙、张璠等；南北朝有费元珪、谢氏、尹曹涛、崔浩、何胤、伏曼容、朱异、姚规及傅氏、卢氏等。另有汇集前人注释的，如《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10卷、《周易荀爽九家注》10卷、《周易杨氏集二王注》5卷等；有疏解《周易》及前人注的，其著作主要集中在南朝，如梁武帝《周易注疏》35卷、陈周弘正《周易义疏》16卷等；有专注《周易》中《系辞》部分的，如晋桓玄《周易系辞注》2卷、萧子政《周易系辞义疏》3卷等；有对《周易》及某些部分进行评论的，如晋阮浑《周易论》2卷、晋栾肇《周易象论》3卷、杨乂《周易卦序论》1卷等；有对《周易》体例进行探讨的，如崔觐《周易统例》10卷、干宝《周易爻义》1卷、《周易四德例》1卷、《周易释序义》3卷、梁蕃《周易开题义》10卷等。

三、《论语》新注新疏

《论语》是儒家经典，记述了孔子同弟子们以及当时人商讨问题的言论，也记载了他们的部分活动。为《论语》作注的人很多，现在最早的《论语》注本，是三国时曹魏编成的《论语集解》。该书为集体编著，据其序，参编者有孔邕、郑冲、曹羲、

荀顗等人，但主持者，在编著工作中起决断作用的是何晏，故后世对该书作者独举何晏。

《论语集解》首创集解之体，是汉魏人注解《论语》的集成之作。其体例，何晏在《序》中明确说明："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咸）、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1] 何晏注意采摭诸家之长，但不是堆积资料式的简单罗列各家注释，供读者选择，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对诸家之说进行筛选，一般只列出最后选定的一家之说。只有在一家解释不够充分、完善时，才兼采他家之说加以补充。何晏这种择优而从、主旨在阐明正文的注解原则，是《论语集解》的主要特点。

【1】《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序》，影印本，2455—24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除采各家之说外，何晏对诸说皆不能令人满意处还兼下己意，有补阙纠谬之功。凡注中不标举姓氏者，皆何晏等人所作的新注。如《卫灵公》"在陈绝粮"章，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下注云："滥，溢也。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又如《子罕》，于"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下注："以道为度，故不任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无可无不可，故无固行；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这里须说明的是，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其注《论语》有据道家思想立说、援道入儒的倾向，故其学术上有调和儒道的特点。

何晏之后多有注《论语》者，至南朝时又出现了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皇侃不仅征引广博，集各家注释，共达五十余家[2]，而且对前人之注加以解释说明，在注释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2】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7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一般先解篇名，次注正文，再疏注。其解篇名，注正文，与前人大体相同；而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对前人注的疏解上，这也是其主要成就。皇侃解注的内容，主

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补充注之不足。如《里仁》“子曰父母之年……”孔安国注曰:“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也。”皇侃疏曰：“李充之解小异，云：孝子之事亲也，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忧乐之情深，则喜惧心之笃。然则献乐以排忧，进欢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皇侃所引李充的解释，进一步揭示了孝子事亲的内心世界，他们知父母的年龄是为了更好地事亲，不限于对父母存亡的忧患，这更接近孔子的原意。其二，发挥注之含义。如《述而》“子所雅言……”郑玄注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皇侃疏曰:“若读书避讳，则疑误后生，故《礼》云，教学临文不讳，《诗》《书》不讳也。”很显然，经皇侃发挥，郑注的含义更加明了了。其三，评论注之价值。如《学而》“有子曰礼之用……”马融注曰:“人知礼贵和，而每事从和，不以礼为节，亦不可行也。”皇侃疏曰：“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礼为节义也。”这是皇侃称马注道出了孔子之真谛，肯定其说。其四，探索注之用意。如《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孔安国注曰：“《韶》，舜乐名也，谓以圣经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皇侃疏曰:“注不释尽美，而释尽善者，释其异也。”这样的提示，对理解孔子原意有所帮助。其五，指出注之错误。如《八佾》“管氏有三归”，包咸注曰:“三归者，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为归……”皇侃疏曰:“然媵与夫人，与大国宜同姓，今虽三国，政应一姓，而云三姓者，当是误也。”皇侃所说亦未必正确，但直接指出注的错误，也是其疏的一部分内容。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对《论语》原文及注，或补充，或解释，或评论，或纠谬，都充分发挥了“义疏”这种形式的优越性，提高了注释的学术水平。皇侃首开为注作疏之先河，唐以后学者多所仿效，各类“义疏”接踵问世，其推动注释学进步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

《隋书·经籍志》著录《论语》类书籍时，将《尔雅》及五经

总义类附后，合计73部，781卷；通计亡书合116部，1027卷。其中附录两类著作约占总数的一半。关于《论语》，魏晋南北朝除何晏《论语集解》和皇侃《义疏》外，还编撰出版了许多研究注释《论语》的著作。而属注解《论语》的著作，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大概受何晏《论语集解》影响，这一时期注疏《论语》多采集注的形式，如卫瓘《集注论语》8卷，崔豹《论语集义》10卷等。

四、《春秋》“三传”新注新疏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订，故被汉人尊之为《春秋经》。因其文字简略，记事不完备，随之出现传释其内容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三传”在汉代实际已取得了经书的地位，之后有许多学者为其作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春秋》和《左传》作注成就最大的是西晋杜预。他所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成一家之学，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主要特点有四方面。

其一，以《左传》附《春秋》，合而释之。杜预认为，《左传》是因《春秋》而作，其义符合《春秋》，故应引“传”而解“经”。其《集解序》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于是杜预改变过去“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的状况，变动旧式，按年将《春秋》和《左传》分割，然后把《左传》之文相应地附在《春秋》经文之后，最后自己再为之注释，定其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其二，信守《左传》，不以《公羊传》、《谷梁传》相乱。杜预《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

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注。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杜预信《左传》而疑《公羊》、《谷梁》，并非从主观好恶或门户之见出发，而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不相抵牾之处，也有所采纳。

其三，博采前人之说，兼用己意。杜预《集解序》称："然刘子骏（歆）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徽、逵）、许惠卿（淑），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容）者，虽浅近亦多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杜预虽然自云以采刘、贾、许、颍四家注为主，但实际征引远超出四家的范围。对此后人多有考证，尤以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为博详。这里须说明的是，杜预对前人注释不是客观地援引，一般不标明所引注释的注者，而往往是把前人的注融合在自己的注释之中，故要区分前人之说与杜预己意需作专门考证。这应该说是其不足之处。

其四，有明显的史注特征，其内容重在注明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春秋》、《左传》所特有的义例笔法，而不局限于训诂、名物、典制。关于时间，杜预精于历数，于《春秋》、《左传》所记时节、月、日之失多所推详，对传抄中所造成的有关错误多所纠正。例如《春秋·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杜注："周十二月，今（指夏历）十月。是岁置闰，而失不置，虽书十二月，实今之九月，司历误一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关于地理，杜注颇为精详，且多古今对照，注明今地。其例俯拾皆是，正误得失兼而有之。关于人物，杜注重视注明名号、身份、官爵、世族、世系，有时兼有品评，详略视需要而定，也有疏误之处。关于义例，杜注《春秋》凡遇义例随文阐明，并注意前后呼应，综合归纳，但严守《左传》所发，指明出处，较少臆断。对于整个历史事件则采用互注的方法，前后

呼应，前呼后称“为……年……事张本”或“为……年……事传”；后应前称“前年（指前一年）……事”，或“事见……年”、“在……年”。这样便点明了事件原委、始末，弥补了编年史割裂历史事件的不足。

总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虽然正误兼存，但成就是主要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预）注孔（颖达）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炫），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1]

[1]《四库全书总目》卷26《春秋左传正义提要》，影印本，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另外，杜预还撰有《春秋释例》一书。其《集解序》说："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类，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详之也。"该书与《集解》互为表里，密切配合，于校勘、释义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也是杜预研究《春秋》和《左传》的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谷梁传》作注贡献最大的是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谷梁传》旧题作者为战国谷梁赤，初皆口授，约在西汉时期始写定成书。《谷梁传》体例与《公羊传》完全一致，都是以一问一答式逐层逐句解释《春秋》，但二者又不尽相同，互有长短。《公羊传》解经，兼释《春秋》的“微言”与“大义”；《谷梁传》则只解“大义”，舍弃“微言”。《谷梁传》行文清新婉约，说理透彻，多有新义，文章优于《公羊传》，但逊于《左传》。《谷梁传》虽在汉宣帝时曾一度被立为学官，但其地位及影响都远在《左传》、《公羊传》之下，注家寥寥，终未成为显学。至东晋，范宁认为其前的十余家注讲《谷梁传》者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传》、《公羊传》以解传，文义违反，颇不利于后世。于是商略名例，

敷陈疑滞，博采诸儒同异之说，又参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撰成《春秋谷梁传集解》。

范宁之注的特点，是兼列诸家之说，并且注意标明所引诸家之说，以与己说相区别。例如《谷梁传·庄公六年》:“王人，卑者也；称名，贵之也。”范宁注:“何休以为，称子则非名也。郑君释之曰：王人，贱者，录则名可。今以其衔命救卫，故贵之。贵之，则子突为字可知明矣，此名当为字误尔。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称也，当直称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卫而拒诸侯，故加名以贵之。僖八年，公令王人、齐侯，是卑者之常称。”此注罗列了何休、郑君、徐乾等人的解释，尽管三者大同小异，但同时列出，互为补充，则使注更加完善和丰富。

范宁自己的见解，采取两种方式表达。一是自己直接作注，如《谷梁传·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贵复正也。”范注:“鲁次国，旧二军。襄十一年，立三军，今毁之，故曰复正。”二是在引他人注释之后加按语，如《谷梁传·隐公九年》:“聘诸侯，非正也。”范注:“《周礼》：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许慎曰：礼，臣病，君亲问之，天子有下聘之义。《传》曰聘诸侯非正，宁所未详。”此注范宁先引《周礼》，以证明天子聘诸侯早有明文规定；再引许慎注释，进一步肯定；自己虽只加注“未详”二字，实际上指出《谷梁传》所记“聘诸侯非正也”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这种针对《谷梁传》正文的征引的议论，具有考辨的意味，是值得肯定的。

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实际上对前人的注释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整理，是自汉至晋《谷梁传》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对谷梁学的研究与传播贡献颇大。书成之后，深为当时所重，对后世也影响较大，是今存最早的《谷梁传》注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许多注疏《春秋》及“三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此类书籍97部，983卷；通计亡书合

130部，1 192卷。其中汉人编撰二十余种，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的著作。关于《春秋》的著作，有作注的，如三国吴士燮注《春秋》11卷、魏糜信《春秋说要》10卷等；有探讨《春秋》体例的，如刘寔《春秋条例》11卷、方范《春秋经例》11卷等；有研究《春秋》思想观点的，如梁沈宏《春秋五辩》2卷、王述之《春秋旨通》10卷等；有专说明《春秋》某一特殊内容的，如《春秋大夫辞》3卷、《春秋土地名》3卷等。关于《左传》的著作，有系统作注的，如王肃注13卷、董遇章句30卷、王朗注12卷等；有对前人注进行比较研究的，如《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5卷等；有比较《春秋》与《左传》不同之处的，如何始真《春秋左氏区别》30卷等；还有对春秋传某些内容进行归纳整理的，如《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13卷等。关于《公羊传》的著作，汉代何休注已为时人赞许，魏晋时成果较少，主要有晋王愆期《春秋公羊经传注》13卷、高龙《春秋公羊传注》12卷等。关于《谷梁传》，有唐固注13卷、糜信注12卷等7种注本，以及徐邈《春秋谷梁传义》10卷、范宁《春秋谷梁传例》1卷等。综合研究“三传”的，有韩益《春秋三传注》10卷、潘叔度《春秋经合三传》10卷、胡讷《春秋三传评》10卷等。

另外，《国语》也以“春秋外传”归入此类，有孔晁注20卷、唐固注21卷等。

五、“三礼”新注新疏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是经部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又名《周官》，是一部记载西周政治制度的书。全书六篇，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述，所载职官，均先叙其官名、爵级、员数，再分叙各自职掌，保存了大量古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仪礼》原名只称《礼》，汉代称为《士礼》，到晋代始称《仪礼》，是记载东周以前古礼仪的最早著作。其内容包括古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活动的具体礼仪。《礼记》是儒家叙述礼论形

成和礼制变迁，既有理论又有史实的一部综合性著作，是研究古代儒家礼学思想的必读书。

“三礼”在汉代已确立了经书的地位，经学大师郑玄遍注三书，融通众说，简明精当，很受时人推崇。但郑玄之注也有牵强附会处，而郑玄注“三礼”影响巨大也带动了对“三礼”及郑注的研究，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出版了大量注“三礼”、疏郑注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三礼类书籍136部，1 622卷；通计亡书合211部，2 186卷。其中汉人编撰十余部，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著述。

注《周礼》的，主要有晋干宝注《周官礼》12卷，崔灵恩《集注周官礼》20卷等；疏郑注的，有沈重《周官礼义疏》40卷等4种；另有王懋约《周官宁朔新书》8卷、陈劭《周官礼异同评》12卷、孙略《周官礼驳难》4卷、《周官分职》4卷、《周官礼图》14卷等。

《仪礼》类，除了王肃注《仪礼》17卷以及《仪礼义疏》6卷等几种外，其他均集中在丧服的研究上。其中书名《丧服经传》的，有王肃1卷等4种；书名《集注（解）丧服经传》的，有孔伦1卷等4种；书名《丧服经传义疏》的，有司马宪5卷等5种；书名《丧服要记（集、略）》的，有王肃1卷等6种；书名《丧服谱（图）》的，有蔡漠1卷等5种。另有裴子野《丧服传》1卷、皇侃《丧服文句义疏》10卷等13种。以上近四十部著作，分布在魏晋至南朝各个朝代，说明这一时期丧服的研究始终是个热点。也可看出，郑玄注《仪礼》的丧服部分缺陷很多，而这些新注新疏将丧服制度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礼记》类，主要有王肃、孙炎注《礼记》各30卷，王懋约《礼记宁朔新书》20卷等；疏解《礼记》注的，主要有皇侃《礼记讲疏》98卷、沈重《礼记义疏》40卷等；另有何承天《礼论》300卷、贺玚《礼论要钞》100卷等二十余部。

总论“三礼”的，主要有崔灵恩《三礼义宗》30卷、元延明《三礼宗略》20卷、司马法《三礼杂大义》3卷等。

六、《诗经》新注新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305首诗歌。《诗经》经孔子整理而成定本，战国时期即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西汉初讲说《诗经》者主要有齐、鲁、韩三家，后又有了毛苌传授的《毛诗》。至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逐步取代了三家诗，专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诗经》类著作39部，442卷；通计亡书合76部，683卷。其中汉人编撰3部，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的著作。

这一时期，“齐诗”、“鲁诗”相继亡佚，“韩诗”亦无传授者，唯“毛诗”盛行，故新注新疏全是为《毛诗》而作。为《毛诗》作注者，主要有曹魏王肃、晋谢沈和江熙等。撰《毛诗义疏》者有舒援20卷、沈重28卷等7种。另还有崔灵恩《集注毛诗》24卷、鲁世达《毛诗章句义疏》40卷、孙毓《毛诗异同评》10卷等二十余种。

七、《孝经》新注新疏

《孝经》是儒家专讲孝道的典籍，大约成书于西汉初期。汉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西汉时即将《孝经》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至东汉取得了经书的地位。但是汉代《孝经》没有出现权威的注本。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冲击，注疏《孝经》的成果也不很多。而且这一时期编撰出版的有关《孝经》的书籍，在南朝末已大多亡佚，传至唐代者不足三分之一。《隋书·经籍志》著录《孝经》类著作18部，63卷；通计亡书合59部，114卷。其中汉人编撰2种，其余为魏晋南北朝的著作。主要有王肃、释慧琳注《孝经》各1卷、谢万《集解孝经》1卷、徐孝克《孝经讲疏》6卷等。

八、《尔雅》新注新疏

《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释义为主的辞典。其作者与成

书年代，古往今来说法各异，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汉儒又有所增补。由于《尔雅》成书时代久远，训释简略、笼统，使后人难以理解。又因为《尔雅》是专门解释经传文字之书，故汉代设立《尔雅》博士，之后即有学者为其作注。但现在最早的完整注本，是晋代郭璞所作的《尔雅注》。

在郭璞编校注释《尔雅》之前，为《尔雅》作注者已有十余家，然而说法不一，注解疏漏，未能详备，还有不少错误。于是郭璞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用心几二十年，重新做了注释。其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于不言自明处，不画蛇添足；对于一时无法解释的词，不强不知以为知，直接注明“未详”。有人曾作过统计，全书中注“未详”、“未闻”者共有142处[1]，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颇值肯定。郭璞精通前人“传注之学”，注重吸纳前人成果，在《尔雅注》中所引典籍近五十种。“璞时去汉未远”，“所见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据”[2]。赖其注保存的晋代以前有关《尔雅》一书的许多材料，对于后人研究古汉语、古文献及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有很大帮助。郭璞不仅为《尔雅》作注，还另作有《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将书中难以识别的字音注明，把所掌握的图像绘出，使后世学者一目了然，可说是晋代集《尔雅》学之大成者。郭璞《尔雅注》成就突出，不仅淘汰了此前的其他注本，而且为其后的注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3] 宋代邢昺在作疏时也说：郭璞注“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4]。

《尔雅》类著作，《隋书·经籍志》附在《论语》类之后。除郭璞有关《尔雅》的著述外，还有孙炎注《尔雅》7卷、沈琁《集注尔雅》10卷等近十种。

须说明的是，《隋书·经籍志》经部专设有小学类，著录文字、音韵、训诂类著作108部，447卷；通计亡书合135部，569卷。其中汉人编撰仅十余种，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的著作，说

【1】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4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四库四全总目》卷40《尔雅注疏提要》，影印本，3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四库四全总目》卷40《尔雅注疏提要》，影印本，3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十三经注疏·尔雅疏叙》，影印本，25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明这一时期编撰和出版的语言文字类书籍数量颇大，成果还是很突出的。这部分书籍与《尔雅》内容相似，故顺便在这里提及，不再单独详叙。

九、其他

以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书的新注新疏分别作了叙述，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编撰出版了一些综合研究几部经书的著作。《隋书·经籍志》在《论语》类附录了五经总义类，但两者毕竟不同，故对有关研究五经的著述这里另作记述。魏晋南北朝综述五经的著作主要有：谯周《五经然否论》5卷，杨方《五经拘沈》10卷，何妥《五经大义》5卷，邯郸绰《五经析疑》28卷，元延明《五经宗略》23卷，孙畅之《五经杂义》6卷等。另还有相关著作，如樊文深《七经义纲》29卷、《七经论》3卷、《质疑》5卷，沈文阿《经典大义》12卷，鲍泉《六经通数》10卷等。

《隋书·经籍志》经部还设有乐经类，著录此类书42部，142卷；通计亡书合46部，263卷。其中有半数未标明作者，但依其编排顺序及惯例判断，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著述。例如，梁武帝《乐社大义》10卷、《乐论》3卷、《钟律纬》6卷，智匠《古今乐录》12卷，信都芳《乐书》7卷，萧吉《乐谱集》20卷等。

为了校正经书传抄中的文字错误，汉代创刻石经，作为标准本。三国魏正始年间亦刻石经，于是经书又有了"传拓之本"。《隋书·经籍志》小学类著录有十余种，例如《一字石经周易》、《三字石经尚书》、《一字石经鲁诗》、《一字石经仪礼》、《三字石经春秋》、《一字石经论语》等。

《孟子》在魏晋南北朝还未取得经书地位，著述较少，《隋书·经籍志》列入子部，主要有刘熙注《孟子》7卷、綦毋邃注《孟子》9卷等。

第二节　史书的编撰和出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动荡不安，但是史学却兴旺发达，卓有成就。史书的编撰和出版，也极其繁富，前所未有，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标志主要有三：

其一，史书已自立门户，成为图书文献的单独大类，并取得了仅次于经书的地位。众所周知，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并编写出了第一部系统的图书目录《七略》。《七略》所分图书类目，从“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可知，共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史书没有单独列出。东汉班固虽然是史学家，但他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也未能认识到史书专门分类的重要性，仍沿用刘歆的分法，将《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及《史记》、《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附于六经的《春秋》之后。而魏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晋荀勖在魏郑默所著《中经》基础上作《新簿》，将群书分成甲、乙、丙、丁四部，史书单独划出，归为丙部。这表明，这时随着史学的发展与繁荣，史书已摆脱了经书附庸的地位，成为学术上的一个单独部门。东晋李充编《四部书目》，又调整四部秩序，“五经为甲，史记为乙，诸子为丙，诗赋为丁”，进一步提高了史书的地位，并从此确定了经史子集的次序。

其二，史部图书数量大增，速度惊人。反映西汉之前图书文献状况的《汉书·艺文志》，其中可列入史书的只有《书经》9家，412卷和《春秋经》23家，948卷，合计为32部，1 360卷。唐初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经籍志》，主要是依据南朝梁时阮孝绪《七录》写成的，是我国现存第二部史志目录，所收图书大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其中著录史部书籍874部，16 558卷。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史书比汉代之前猛增了十几倍，

增长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汉代以前所不可想象的，足以反映史书的编撰与出版的进步。这里需指出的是，由于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文献散佚严重，《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文献并非史书编撰与出版的全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梁朝以前已经散佚，而为隋志所无者，必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从各史列传所记，类书摘录，注家所引，尚可考见而不见于隋志者，当不下数百种之多。我们只要看一看裴松之注《三国志》，仅止关于三国这一段，引用的史书就有一百四五十种，其中绝大部分已失传而不见于隋、唐史志，这就可想而知，当时的史部著作，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1]

【1】王俊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2),9页。

其三，史书包涵内容丰富，种类增多。汉代之前，史书数量较少，尚未明确分类，实际包括的品种也不多。魏晋南北朝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总量的扩大，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种类也日益增多，并且直接反映到目录著作中。阮孝绪《七录》的史籍类"记传录"下分史书为12类，即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隋书·经籍志》经过调整，史部下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增多的史书种类，不仅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与出版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为古代史部书籍的分类奠定了基础，成为后世目录学著作分类的重要依据。

以上是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与出版的发展和进步的简单概括，下面再分两个方面作具体叙述。

一、各朝的修史工作及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十分混乱，朝代更迭频繁，分裂割据的局面长期得不到统一。在这样的乱世中，统治者为了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寻找治乱的药方，也为了给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都特别重视撰修前代及当代史，专设了著史之官，这一措施促进了史书撰著的繁荣。另外，自东汉末年战乱以后，官府控制史学

的局面已经打破，而王朝的频繁更迭又为私人著史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个人编写某一个王朝的历史，史料便于搜集，撰写容易见效，首尾完整，自成一书，因而私人撰写断代史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撰写的断代史著作，有据可查的就达百种以上，这种盛况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是绝无仅有的。

下面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的前代及当代史著作，分别加以叙述。

(一) 东汉史

记载东汉历史的最早著作是《东观汉记》，这是东汉一百多年中政府先后多次派人陆续撰写的一部东汉史。它一度影响较大，曾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但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一是各篇详略不均，人物空缺太多；二是材料庞杂，取舍不当；三是志不完全，不能构成一代史志。因此，魏晋以后许多人重撰东汉史。

三国时期，东汉史著作主要有三部，即谢承《后汉书》、谯周《后汉记》和薛莹《后汉记》。谢承所著纪传体《后汉书》130卷，是继《东观汉记》之后的第一部东汉史，其“所载人物及其言行，有很多是范晔《后汉书》所看不到的，六朝词人多读此书，因而谢书轶事，往往见于其他各书，说明这部书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1]。清代姚之骃尝称之为“东汉第一良史”[2]。惜谢承《后汉书》久佚，清代始有辑佚本。谯周所著《后汉记》是根据《东观汉记》删削而成，其中“志”的部分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此书唐初就已失传，《隋书·经籍志》不载。薛莹所著《后汉记》本100卷，唐初有残缺，《隋书·经籍志》著录为65卷。薛莹之书亦久佚，清代始有辑佚本。

两晋时期东汉史著作增多，主要有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汉后书》97卷、谢沈《后汉书》122卷、张莹《后汉南记》55卷、袁山松《后汉书》100卷、张璠《后汉纪》30卷、袁宏《后汉纪》30卷等。其中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之书早已亡佚，清代虽有辑佚本，但内容保存甚少。比较重要的是司马彪、

【1】王俊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2),14页。

【2】姚之骃:《后汉书补逸自序》,转引自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1版,7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华峤和袁宏所著三书。

司马彪的纪传体《续汉书》，编录从东汉光武帝到汉献帝十二世200年间史事。其纪、传已佚。但八志30卷编撰较好，在南朝梁刘昭为范晔《后汉书》作注时用以补范书无志之缺，宋代范书与八志合刻，故《续汉书》八志流传至今。华峤博闻多识，有良史之志，他认为《东观汉记》烦秽，于是遍阅秘府藏书，撰成《汉后书》。其书为纪传体，其中帝纪12卷、皇后纪2卷、典10卷(华峤未竟而卒，由其子彻、畅继成之)、传70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各1卷，共97卷。华峤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他认为前史将皇后载之于外戚传不当，因而新设《皇后纪》，又改志为典。《汉后书》体例完整，一经问世，就受到时人赞誉，中书监荀勖、太常张华等称其书文质事核，有司马迁、班固之规，实录之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诸家后汉书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后汉史“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后来范晔作《后汉书》，很多地方都是以华书为蓝本的。《汉后书》唐初已残缺，《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7卷，后亦亡，清代始有辑佚本。在袁宏之前，记载东汉事迹的史书已有十余种数百卷，但袁宏认为或烦秽杂乱，或缺略无序，或各有错谬、互有同异，均难满意。于是博采群书，重新撰作，历时八年，成《后汉纪》30卷。其书为编年体，简明扼要，纠正了此前后汉史书中时间概念不清、叙述次第错乱的缺点，编撰颇为精密，深为后世推崇，流传至今，始终没有散佚。

南北朝时期，东汉史著作又产生了宋刘义庆《后汉书》58卷和范晔《后汉书》90卷，以及梁萧子显《后汉书》100卷，王韶《后汉林》200卷。其中刘、萧、王三书均散佚，只有范晔之书传世。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内乡县）人[1]。历仕秘书丞、尚书吏部郎等，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任宣城太守，开始撰写《后汉书》。在此之前，记述东汉事迹的史书已

【1】范晔籍贯，其说不一，此据张述祖:《范蔚宗年谱》,《史学史研究》,1981(2),21页。

有多种，但他认为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并博采众家《后汉书》之长，删繁补缺，撰写了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所撰《后汉书》，原计划有十纪、十志、八十列传，惟志未成。范晔受华峤《汉后书》影响较大，列有《皇后纪》，在每篇之末所附论赞中也吸收了不少《汉后书》的内容。此外，范晔又根据东汉历史的具体特点，新增加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类传。唐代刘知几在《史通·补注篇》中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又在《史通·书事篇》中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范晔《后汉书》一经问世，其他各家纪传体东汉史书便逐渐销声匿迹，以至于亡佚，唯范书流传至今。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范晔《后汉书》必有其过人之处。后人惜范书缺志，遂以司马彪《续汉书》八志30卷补上，始得完帙。

（二）三国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府和社会都重视史学，当朝人写当朝史成为一种风气。三国史的撰写，即开始于三国时期。因为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分立，所以史书大多是分国编撰。

王沈的《魏书》是曹魏政府委派官员撰写的第一部魏国史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说："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44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刘知几批评王沈《魏书》"多为时讳"，说明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不过其书毕竟是魏国官员奉命而撰，书中采纳了比较原始的资料，故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太平御览》都有不少引用其书内容之处。此后曹魏郎中鱼豢私修魏国史，成《魏略》89卷（一说50卷）。刘知几认为该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名不副实。其实《魏略》不略，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魏略》虽散佚失传，但《三国志》裴注及

《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御览》等书，都有大量征引。此书有纪、志、列传，列传中有游说传、纯固传、清介传、勇侠传、佞幸传、止足传等，从这些标题来看，《魏略》对历史人物，显然作了不同于其他史书的区分，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点。尤其是《魏略》中有东夷、乌桓、鲜卑、匈奴、西戎等传记，对于国内的少数民族特为载记，为我们保存了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史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1]。该书亦佚，清代始有辑佚本。此外，魏国史书还有晋孙盛《魏氏春秋》30卷及其他晋人所作的曹魏史多种，这些书后均亡佚。

【1】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2),16页。

韦昭的《吴书》是东吴政府组织撰修的本国史。《三国志·吴书·薛莹传》引右国史华覈上疏说:"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2] 这里提到两次吴修国史，第一次未成，第二次由五人共同编写。其中提到的韦曜，就是韦昭，史为晋讳而改。在编撰过程中，周昭、梁广先逝，薛莹远徙，写作班子解体，最后由韦昭完成了纪传体《吴书》55卷。该书是记载吴国历史最完整的一部史著，为三国史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资料。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韦昭《吴书》的地方，多不胜举。《文选》注、《后汉书》注、《通典·礼门》注、《艺文类聚·服饰部》、《太平御览·服章部》及《布帛人事部》都有引用。可惜唐初《吴书》即已残缺，《隋书·经籍志》著录为25卷。吴国史书还有晋环济《吴记》9卷、晋胡冲《吴历》6卷、南朝梁张勃《吴录》30卷，以及晋周处《吴书》等。以上诸书均已亡佚。

【2】《三国志》卷53。

记载蜀国历史的史书有王崇的《蜀书》。《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条说:"少弟崇，字幼远，学业渊博，雅性洪粹。蜀时东观郎……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王崇《蜀书》不知亡于何时，但同时代的陈寿是看过的。《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说：杨戏"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

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陈寿在蜀国时任东观秘书郎，对曾同在东观任职的“东观郎”王崇应该是了解的，尽管二人之间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他写《三国志》时参考《蜀书》且采用其资料。蜀国史书还有谯周《蜀本纪》、东晋王隐《蜀记》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或作《汉阳春秋》)。其中谯、习二书内容不限于三国时期。《蜀本纪》记载自上古至三国时在蜀帝王的事迹。《汉晋春秋》54卷，编年记述东汉光武帝至西晋愍帝二百八十余年间的历史。记三国事，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以晋承汉，故以名书。其书久佚，今有清代黄奭、王仁俊辑本各一卷，汤球辑本三卷。

将三国历史合为一书的是陈寿的《三国志》。陈寿，字承祚，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时受学于同郡名儒谯周，在蜀国历仕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1]、散骑黄门郎。入晋后，经司空张华举荐，任佐著作郎、著作郎等职。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后，他搜集魏、蜀、吴三国史料，约经十年，撰成纪传体《三国志》65卷，其中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陈寿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写《三国志》时已入晋朝为官，而晋是承袭曹魏统一全国的，为了既不触犯晋代魏而立这一政治现实，又不任意贬低蜀、吴两国的历史地位，陈寿采用三国历史并叙的方法，为曹魏几代帝王立“纪”，而蜀、吴皇帝则称“主”立“传”，但记事方法是基本相同的；而且书名统署《三国志》，以示三国地位相当。《三国志》出版发行后，颇受赞誉。当时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2]。《三国志》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列传照顾面很广，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重要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都尽力网罗其事迹编入书中。二是叙事简洁，文字精炼，取材审慎。《三国志》也存在缺陷：编纂体例上，只有纪传而无表、志，使典章制度及纪传中不便反映的许多史事无法记载；在内容上，为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多所回护。《三国志》是三国史书中唯一完整流传至今

【1】《晋书》卷82《陈寿传》说陈寿“仕蜀为观阁令史”，而《华阳国志·陈寿传》谓陈寿在蜀曾任东观秘书郎。缪钺《陈寿评传》认为：所谓“观阁”，大概即指东观，可能陈寿是先为令史，后升秘书郎的，故从《华阳国志》。见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上，12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晋书》卷82《陈寿传》。

的著作。

（三）晋代史

两晋南北朝时期编撰的晋代史著作，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说有十八家，但经后世学者研究，还有至唐代已散佚的史著未包括在内，实际至少有二十多家。据笔者所见，当代有关著作罗列最多者为26种，但尚有不完全重合者，综合各书所载总数为27种[1]。

这些晋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书体裁。编年体晋史中，以干宝《晋纪》为佳。《晋书·干宝传》说："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干宝是两晋之际著名的史学家，有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他能够打破魏晋以来曲笔回护之习，在《晋纪》的史论中，"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社会现实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卓识"[2]。干宝写史还重视凡例，并影响到其后的撰史者写史之前都注意了发凡起例，这是史学上的一个进步。干宝《晋纪》出版后多被其他各书引用，后散佚，清代始有黄奭、汤球、陶栋等辑本。

纪传体晋史中，王隐、何法盛和臧荣绪三家《晋书》较好。东晋王隐《晋书》93卷，是东晋较早完成的完整记载西晋历史的纪传体著作。其书内容丰富，是唐修新《晋书》时主要参考书之一。书已久佚，清代始有汤球、王仁俊、陶栋等辑本。南朝宋何法盛所撰《晋中兴书》，完整记载东晋一代史事。此书出版后流传至唐朝，刘知几对该书评价较高，《史通·杂说中》云："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其书已佚，今有清黄奭、汤球及近人陶栋等辑本。南齐臧荣绪《晋书》是首先总括西晋和东晋事迹为一书的史著。其书110卷，纪、录（表）、志、传四种体例俱全，成为后来唐修《晋书》的蓝本。唐新《晋书》修成后，臧荣绪《晋书》曾一度并行，约"安史之乱"后散佚，今有清黄奭、汤球等辑本。

（四）南北朝史

南北朝时期也是史家辈出，史著林立，但南北发展不平衡，

【1】27种晋代史著作具体如下：晋王隐《晋书》93卷，晋虞预《晋书》44卷，晋朱凤《晋书》14卷，晋谢沈《晋书》30卷，晋何法盛《晋中兴书》78卷（一作80卷），晋陆机《晋纪》4卷，晋干宝《晋纪》23卷，晋曹嘉之《晋纪》10卷，晋邓粲《晋纪》11卷，晋孙盛《晋阳秋》32卷，晋荀绰《晋后书》15卷，晋习凿齿《汉晋春秋》47卷（一作54卷），南朝宋谢灵运《晋书》36卷，刘宋刘谦之《晋纪》23卷，刘宋王韶之《晋纪》10卷，刘宋徐广《晋纪》45卷，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20卷，刘宋郭季产《续晋记》5卷，刘宋裴松之《晋纪》，南齐臧荣绪《晋书》110卷，南齐袁炳《晋书》，南齐庾铣《东晋新书》7卷，南朝梁萧子云《晋书》102卷（一作110卷），梁萧子显《晋史草》30卷，梁郑忠《晋书》7卷，梁沈约《晋书》110卷（一作120卷），以及刘璨《晋纪》。以上所列晋代史著作是综合多种著作统计的结果，除《隋书·经籍志》外，主要参见两书，即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480—48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赵吕甫《史通新校注》，724—725页，重庆出版社，1990。其中无卷数者，原书未详。

【2】李颖科：《论干宝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7（3），53页。

总体看南朝胜过北朝。

南朝写成的第一部刘宋史，是徐爰的《宋书》。据沈约《宋书·徐爰传》说，早在元嘉年间，就有著作郎何承天草创本朝纪传体史书，之后又有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及裴松之等续补。大明六年（462年），著作郎徐爰根据前人撰述，写成《宋书》65卷出版，所载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即自刘裕实际掌握东晋政权之年起，至宋孝武帝大明末年止，凡六十年的史事。其书对宋末十余年的历史缺而不载，且叙多虚，难以取信。徐爰之后，又出现了多部刘宋史书。如南齐孙严《宋书》65卷、佚名《宋书》61卷、南齐王智深《宋纪》30卷、梁沈约《宋书》100卷、梁王琰《宋春秋》20卷、梁裴子野《宋略》20卷。以上诸书，除沈约之书外，后均亡佚。沈约，字休文，南朝梁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他历仕三朝，梁时官至扬州大中正、尚书令。《宋书》是他于南齐永明五年（487年）奉诏撰修，在徐爰《宋书》的基础上，补充订正的，共100卷。《宋书》的志卷数不多，但分量却几占全书的一半；其内容不限于刘宋一代，而是上追先秦延及魏晋，可补《三国志》及各家晋书无志之缺，是其精华。另外，《夷蛮传》中所记述的林邑、扶南、天竺、高句骊、倭国等材料，对于研究当时我国与东南诸国和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之，沈约《宋书》内容丰富，是研究刘宋历史最主要的参考书。

南齐史书有齐熊襄《齐典》10卷，梁刘陟《齐纪》10卷，梁沈约《齐纪》20卷，梁江淹《齐史》13卷，梁吴均《齐春秋》30卷，以上诸书后均亡佚。南朝人所写南齐史书，唯一流传下来的是萧子显的《齐书》。萧子显，字景阳，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历仕中书郎、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吴兴太守等。所撰《齐书》60卷，唐代亡《序录》1卷，现存59卷，包括纪8卷、志11卷、传40卷。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故在撰述南齐历史时，对其祖先溢美回护处甚多，受到后代史家批评。但书中也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如《祖冲之传》，是现在关于大数学家祖冲之的最早记录。

另外列传中多用类叙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宋代始为与唐李百药所撰《北齐书》相区别，称其书为《南齐书》。

梁是南朝学术文化最繁荣的一个朝代。在梁武帝的几十年中，由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吴等先后执笔，写出《梁书》100卷。可惜后来江陵被北周攻陷，书稿焚烧净尽。南朝编撰的梁史，还有梁萧韶《梁太清记》10卷，陈许亨《梁史》53卷。另北周萧欣亦撰《梁史》100卷。以上诸书，后都亡佚。

南朝陈写的当朝史，有陈顾野王撰《陈书》3卷，陈傅縡撰《陈书》3卷，陈陆琼撰《陈书》42卷，陈陆绩撰《陈书》42卷[1]。以上诸书后均亡佚，另外，历仕梁、陈、隋三朝的史学家姚察，曾撰写梁、陈二史，未成而卒，但成为唐初姚思廉撰修《梁书》、《陈书》的基础。

【1】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48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北魏初期，邓渊编写《国记》十余卷，此为北魏修国史的开端。之后崔浩、高允续修魏史，都是编年体。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参加修史，改为纪传体，记事从开国起，到献文帝时止。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主持编撰魏史，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参与其事。天保五年（554年），书成，这就是北朝唯一存世的史著《魏书》。魏收，字伯起，北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所撰《魏书》问世后，由于多人指责其叙事不实，在孝昭帝、后主时曾两次命魏收修改，才成定本。隋唐时曾多次重撰北魏史，但终究未能取代魏收《魏书》，说明其确有独存的价值。《魏书》本纪14卷，列传96卷，志20卷，共130卷，资料丰富，且富有创见。如魏晋之后，史家多不撰志，或有志而无最重要的《食货志》；魏收写了十志，不但有《食货志》，而且独创了《官氏志》和《释老志》。《官氏志》除详记官制、阶品外，还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的姓氏及孝文帝所改汉姓，是研究姓氏变化的重要资料。《释老志》叙述了与当时社会密切相关的佛教和道教在北方流传及寺院经济的情况，是宗教史的重要资料。《魏书》传至北宋时已散佚不

全，残缺了39卷，经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补成今本，仍分为130卷。

（五）通史

南北朝时期除撰著了大量断代史著作外，还出了几部通史著作。据《宋史·刘义恭传》载，宋江夏王刘义恭曾编撰《要纪》五篇，记录了上起西汉，下迄东晋五百多年的历史。又据《陈书·顾野王传》记载，顾野王曾经撰写过《通史要略》100卷，也属通史著作。当然，最重要的是梁武帝萧衍组织史官撰修的《通史》。《隋书·经籍志》题《通史》梁武帝撰，但实际上是他命群臣集体编写的。如《梁书·吴均传》云："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当然，梁武帝亲自为《通史》撰写了序，并为某些篇章作了论赞，还不是徒有虚名。《通史》有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无表，共602卷[1]。记事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南朝梁初[2]。可惜参加《通史》编撰人员的史学史才都很平凡，其书质量不高，不为当时学者所重，流传不广，约在五代末年至宋朝初年散佚[3]。

（六）传记

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史书。汉代司马迁著《史记》，有七十列传，即典型的人物传记。但《史记》的列传，只是纪传体史书中的五体之一。最早的单行传记专著是西汉末年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在其后东汉的近二百年间，传记史学未见进展。到了魏晋南北朝，传记才大量涌现，形成规模，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人物传记《隋书·经籍志》列入"杂传"，其所著录通计亡书合219部，1 503卷。其中只有《三辅决录》、刘向《列女传》、《列仙传》等寥寥几种为汉人著作，其余二百多种皆为魏晋南北朝的作品。这些著作，包含了多种类型。其中有人物总录类，如《四海耆旧传》1卷、《海内先贤传》4卷等；地方人物类，如刘义庆《徐州先贤传赞》9卷、陈寿《益部耆旧传》14卷等；高士

[1]《通史》卷数，史载不一，有480卷、600卷、620卷、602卷多种说法，此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参见郝润华《论梁武帝〈通史〉与南朝修史风气》，《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134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关于《通史》记事下限，《梁书·吴均传》云："讫齐代"，但《隋书·经籍志》说"起三皇，讫梁"。修《隋书》时《通史》尚存，其说当可信，可能是吴均之后，又有人续写至梁代。

[3]关于《通史》亡佚时间，其说不一，此据郝润华《论梁武帝〈通史〉与南朝修史风气》，《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142—14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隐逸类，如皇甫谧撰《高士传》6卷、阮孝绪《高隐传》10卷等；孝友类，如王韶之《孝子传赞》3卷、梁元帝《孝德传》30卷等；忠良类，如梁元帝撰《忠臣传》30卷、钟岏《良吏传》10卷等；名士类，如刘义庆《江左名士传》1卷、孟氏《七贤传》5卷等；文士类，如张骘撰《文士传》50卷等；儒者类，如《孔子弟子先儒传》10卷等；家传类，如裴松之《裴氏家传》4卷、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20卷等；幼童类，如王瑱之撰《童子传》2卷、刘昭《幼童传》10卷等；妇女类，如曹植《列女传颂》1卷、杜预《女记》10卷等；名僧类，如释宝唱《名僧传》30卷、王巾《法师传》10卷等；仙道类，如葛洪撰《神仙传》10卷、华存《清虚真人王君内传》1卷等；鬼神怪异类，如刘义庆《宣验记》13卷、干宝《搜神记》30卷等。上述传记，完整传世者甚少。

这一时期的传记，都是当时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状态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高官显贵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封建社会黑暗的一面充分暴露，许多有识之士坚守气节，不与权贵共事而避世隐逸。于是产生了一批专记隐士的传记，皇甫谧《高士传》即其中之一。《高士传》今本3卷，纂录自唐尧至魏晋二千多年高节之士96人的事迹，其中老子、荣启期、许由、颜渊、梁鸿等19人被认为是高逸楷模。他们或傲啸林泉，或带经而农，或自隐佣作，尽管避世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是有卓识高论、笃守义行的隐士。“这些人之所以鄙弃一切名利，超凡脱俗，成为高人逸士的典范，并不是生来就是如此。应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折光，五光十色，但它的本身却饱含着历史本来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书中所截取的隐士们生活的片断，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从中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1]。再如，神仙怪异类传记，现称为志怪小说，所记神仙鬼怪的故事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也是人们在乱世中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通过编造谈鬼说怪的故事，去揭露黑暗的现实和憧憬美好的未来。这类作品虽较粗糙，但其丰富的素材，以及写作的技巧，却对唐宋传奇、宋元白话小说和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

【1】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4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新体裁史书的编撰和出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编撰突破了纪传体、编年体等传统的体制，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局面。不但新体裁的著作纷纷涌现，特殊内容的史著自立门户，就是一些魏晋以前已萌芽的史体，也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才真正确立体例，形成规模，成为独立的部门，现分述如下。

(一) 少数民族史

魏晋之前虽然已经有了对少数民族史事的记载，但往往都是作为“夷狄传”附属在正史之中。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各少数民族的专著，这是史学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记载少数民族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十六国史的撰写上。十六国时期，在我国北方及西南地区出现的割据政权，主要是由匈奴、羯、鲜卑、氐、羌、賨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即使有的割据政权由汉族人掌权，其统辖地区内也是各族杂居，具有浓重的少数民族特色。因此，有关十六国的史书，均可看作是少数民族史的专著。这方面的著作数量多达四十种[1]，惜后皆散佚。这些史书记述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上述先民，下迄当世，备述立国始末，为古代各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期的少数民族史著作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重要。崔鸿，字彦鸾，北魏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淄博东南）人。他“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2]。历事孝文、宣武、孝明三朝，自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搜集资料，正始元年（504年）开始撰写，历时十余年，于孝明帝时撰成《十六国春秋》100卷，附《序例》1卷，《年表》1卷。其内容包括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蜀、前凉、西凉、北凉、后凉、后燕、南凉、南燕、西秦、北燕、夏等国史。每国各为篇卷，称为“录”；记其君臣事迹，则称为“传”。崔鸿把十六国作为一个历

[1] 关于少数民族史著作的数量，是综合多种著作统计的结果，除《隋书·经籍志》外，另见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482—4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73—7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2]《魏书》卷67《崔光传附崔鸿传》。

史发展时期综合研究，把各国作为区域性政权加以考察著录，不把东晋、南朝宋、齐作为“僭伪”附庸于十六国，亦不推崇北魏为正统，而是将它们放在同等地位上，互不统摄，分国立史。崔鸿著史态度认真慎重，取材力求翔实丰富，使《十六国春秋》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唐修《晋书》时，其中30卷《载记》就是依据崔书编成的。其书约在北宋中期散佚，现有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传世。

（二）实录及起居注

实录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是以起居注一类史料为根据纂修的资料长编，这种史体即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录编纂的基础是起居注。魏晋时期起居注多由著作郎兼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开始设置起居令史，从而确立了此职的专官。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侍从皇帝，掌记录皇帝言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编修的起居注数量很大，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达四十多种，历西晋、宋齐梁陈、北魏北周各代皆有起居注的出版流传。

实录的编修一般认为创始于萧梁时期。近年有学者提出，“实录体当起源于公元四世纪初西凉史家刘昞撰《敦煌实录》”。其形成过程，“最初是刘昞于420年前撰十卷本《敦煌实录》。以都城名国（指西凉——引者注），记一个割据政权以人物为主的历史。然后是南朝梁的史官，以皇帝二字或其年号为书名，记载一个皇帝在位的一段时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1]。南朝修撰的实录，有梁周兴嗣《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事；梁谢吴《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另据《史通·杂说》，尚有《梁太清实录》等。实录是当朝人所撰的当朝史资料编年，修撰者都是专职史官，既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又能利用最原始的档案和起居注，所引资料丰富而可靠，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上述实录及起居注均已亡佚，殊为可惜。

（三）地方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地理、历史、政治、经

【1】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3)，42页。

济、文化、风俗、人物等全面情况的综合性著作。方志萌芽于先秦时期，东汉至西晋涌现了一批记载地方史事的著作，但其内容或记述方国的历史，或记载州郡的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或叙论乡党人物，还没有一部贯穿古今、内容广博、体列完备的地方通志。真正把编年史、地理志、人物传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体裁的是常璩所撰《华阳国志》。

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西北）人。十六国成汉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入晋后曾任参军。所撰《华阳国志》12卷，记事起自远古，止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内容可分为三部分：1至4卷以地域为纲，记载梁、益、宁三州（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一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接近正史中的地理志。5至9卷以年代为纲，用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10至12卷以人物为纲，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当然，按广义的方志概念，常璩以前的许多著作都可划入方志的范畴。即使如此，《华阳国志》至少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通史，这是方志编纂学的一个重大发展”[1]。有学者称《华阳国志》为“现代方志的初祖”[2]，也是符合实际的。《华阳国志》一直流传至今，其重要原因是内容丰富，记事详审，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一，弥补了魏晋时期我国西南地理沿革的空白。其二，保存了西南地区巴、蜀、氐、羌、濮、夜郎、哀劳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史料。其三，可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如关于李冰修筑都江堰一事，在《史记》、《汉书》中只有十几个字，而在《华阳国志》中却叙述详细。另外，《华阳国志》还采录了大量流传民间的诗歌谚语，有助于真实地反映社会思想状态，开了将诗歌谚语入地方志之先河，也是值得肯定的一大特色。

方志，《隋书·经籍志》主要载于史部地理类，依其著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可归入广义方志类的著作多达一百三十余部。比较重要的，如晋代挚虞所撰《畿服经》170卷，“其州郡及县分

[1] 陈清泉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13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 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1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

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1]。南朝陆澄汇集《山海经》以来160家之说，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任昉又在陆澄之书基础上新增84家，编成《地记》252卷。陈顾野王编有《舆地志》30卷。北朝有《大魏诸州记》21卷，北周将地志地图合编为《周地图记》109卷。地区性的有《会稽记》、《荆州记》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体例不同、内容集中的专门性志书。其中有山水志，如《汉水记》、《衡山记》等；有风俗志，如《陈留风俗传》、《诸蕃风俗记》等；有物产志，如《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等；有寺观志，如《庙记》、《京师寺塔记》等。总之，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志，以数量大、类别多、体例新为主要特点，为后世地方志的编修从体例上、资料上都奠定了基础。

【1】《隋书》卷33《经籍志二》。

（四）典章制度史

记载典章制度的著作，亦称政书或典志体史籍。其起源很早，《周礼》、《仪礼》、《礼记》就是古代礼仪制度的奠基之作。但是，“三礼”尽管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可古代统治者和学者都把其视作儒家经典而列入经部，从未将其看作政书。汉代司马迁著《史记》，设有“八书”，班固撰《汉书》，列有“十志”，都是典章制度的篇章。但是，其“书”、“志”附在纪传体正史中，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还没有独立成书。因此历来也不称其为政书，体裁也未形成。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的典章制度史纷纷出现，也是史书编撰与出版的一个新特点。

《隋书·经籍志》史部中，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等类目所著录的书籍都属于典章制度史的范畴。旧事类著录之书，凡25部，404卷。所谓“旧事”，都是与“朝廷之政，发号施令”及“品式章程”[2]密切相关之事，涉及到典章制度的制订和内容。这部分除《汉武帝故事》等少数几种外，其余如《汉、魏、吴、蜀旧事》8卷、《秦汉以来旧事》10卷、《晋、宋旧事》135卷、《晋东宫旧事》10卷、《梁旧事》30卷、《东宫典记》70卷等都

【2】《隋书》卷33《经籍志二》。

是魏晋南北朝的著述。职官类，通计亡书，合36部，433卷。除《汉官解诂》等四五种外，其余皆为魏晋南北朝的职官专著。其中记载魏晋职官的，如荀攸《魏官仪》1卷、《晋百官名》30卷等；记载南北朝职官的，如《宋职官记》9卷、《齐职仪》50卷等；综合记载职官的，如《职官要录》30卷、《新定官品》20卷等。仪注类，通计亡书，合69部，3094卷，除牛弘《隋朝仪礼》外，几乎都是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仪制度的著作。其中记前代礼仪的，如《汉旧仪》4卷、《大汉舆服志》1卷等；记晋代礼仪的，如《晋新定仪注》40卷、《晋杂仪注》11卷等；记南北朝礼仪的，如《宋尚书杂仪注》550卷、《后魏仪注》50卷等；综合记载礼仪的，如《杂仪注》180卷、《礼仪制度》13卷等；分记“五礼”的，如《梁吉礼仪注》10卷、《杂凶礼》42卷等。另外，还有专记某一礼制的，政礼如《政礼仪注》10卷等；皇室礼如《皇室仪》13卷等；避讳如《汝南君讳议》2卷等；车服如《古今舆服杂事》20卷等；卤簿如《卤簿仪》2卷等；书仪如《书笔仪》21卷等；家礼如《赵李家仪》10卷等。刑法类，通计亡书，合38部，726卷，除《隋律》等七八种外，亦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其中记曹魏刑法的，如《魏王奏事》10卷、《魏廷尉决事》10卷等；记晋代刑法的，如《晋令》40卷、《晋刺史六条制》1卷等；记南朝刑法的，如《晋、宋、齐、梁律》20卷、《梁科》30卷等；记北朝刑法的，如《后魏律》20卷、《北齐律》12卷等；另有晋杜预《律本》21卷、晋张斐《杂律解》21卷等。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章制度史书数量巨大，品种繁多，虽然体例还不够规范，且其书后世大部亡佚，但是确为唐代典章制度通史的撰著奠定了基础。

（五）谱牒

谱牒是记载氏族家谱世系的史书。我国最早的谱牒之书，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世本》。东汉王符《潜夫论·姓氏篇》、应劭《氏族谱》也是谱牒类的著述。但是，谱牒作为一门学问，却是在魏晋时期才正式形成的。

谱学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能够盛极一时，与门阀制度的确立息息相关。世家大族当时在社会上取得了多方面的特权，为了巩固本集团的利益，保持其门第、血统和婚宦等方面的纯洁性和排他性，因而特别重视谱学。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卷17《谱学》中所说："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赵翼所说的贾、王二氏是当时精通谱学，且数代相传的谱学世家。贾氏谱学始于东晋，《通典》卷3《乡党》载："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这部谱学之书名为《姓氏簿状》。其后贾弼之子贾匪之，孙贾渊、曾孙贾执、玄孙贾冠等，都撰有谱学著述。如贾渊曾为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撰《见客谱》，又撰《姓氏要状》15卷；贾执撰《姓氏英贤谱》100卷，又撰《百家谱》20卷；贾冠撰《梁国新皇太子序亲簿》4卷。王氏谱学，渊于贾氏。南朝宋王弘就对贾氏谱学颇有研究；南齐王俭为补充《姓氏簿状》，撰成《百家集谱》10卷。至梁武帝时，王僧孺奉诏改定《百家谱》，东南诸族别为一部，编成《十八州谱》710卷，又撰《百家谱集钞》15卷、《东南谱集钞》10卷，是王氏谱学的代表人物。

除贾氏、王氏谱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谱牒著作也很多。据《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类著录，通计亡书，合53部，1 280卷。其中除刘向撰《世本》2卷外，其余大部为这一时期的谱牒之书。其种类大体如下：总序类，如何氏《姓苑》1卷、姚最《述系传》1卷等；帝王类，如《汉氏帝王谱》3卷、《齐梁帝谱》4卷等；宗室类，如元晖业《后魏皇帝宗族谱》4卷、《后齐宗谱》1卷等；地方类，如《益州谱》30卷、《洪州诸姓谱》9卷等；百家类，如王逵之《续（王）俭百家谱》4卷、傅昭《百家谱》15卷等；家族类，如《京兆韦氏谱》2卷、《谢氏谱》10卷等。

谱牒是门阀的标志，是世家大族用来维护其政治、经济既得权益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门阀家族重门第、血统、婚宦，谱牒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而它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是有其消极作用的。然而，它又有其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它是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魏晋南北朝的谱牒而言，乃是研究当时氏族源流、人物事迹、门第制度、选举制度、民族关系、婚姻状况的重要史料。随着门阀制度的瓦解，隋唐之后谱学逐渐衰落，因而谱牒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颇具特色的出版门类。

（六）史注与史考

史注与史考是对史书的注解和史事的考证，二者密切相关，但侧重有所不同，史注一般附于原著，而史考则可独立成书。史注出现于汉代，如延笃《史记音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但其时史注还仅限于解释文字、说明制度。到了魏晋南北朝史注之风盛行，考订音义、补遗纠谬二者兼有，史注体例才得以完备，且成就显著。考证古史，在魏晋南北朝也揭开序幕，出现了一些成果。现分别举要叙述。

首先是《史记》的注本。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记》的主要成果出现在南朝。先是由东晋入宋任中散大夫的徐广作《史记音义》12卷，其书多着眼于《史记》不同版本的异同上，对词义解释较少。接着宋中郎外兵参军裴骃作《史记集解》80卷。《集解》以徐广《音义》为基础，兼采经、传、诸史等七十余家之说，其中包括著名的古文学家、今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字学家，甚至还有称雄的君主。他们的思想、学术主张不尽相同，风格各异，而裴骃能删其游词，取其要实，使得各家之说在《集解》中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在《史记》的注解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须指出的是，《集解》不完全是采前人之说，其中也有不少裴骃自己的观点，因而备受后人重视，成为流传至今著名的古代“《史记》三家注”之一。

《汉书》文字艰深，十分难读，其书一出，就有多家为其作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汉书》者，《隋书》卷33《经籍志二》

著录有三国吴韦昭撰《汉书音义》7卷、南齐陆澄注《汉书》102卷等16种。其中晋灼是第一个《汉书》集注注家，他的《汉书集注》13卷是颜师古之前《汉书》注承上启下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较早为范晔《后汉书》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梁书·刘昭传》云："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世称博悉。"《隋书·经籍志二》著录《后汉书》125卷，亦注曰："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刘昭所注《后汉书》以范晔纪、传为主，但范书无志，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分为30卷，加注补于范书之后。但是，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后，刘昭对范书纪传的注就渐渐散佚了；而因30卷志非范晔所撰，李贤未加注释，刘昭的注才得以流传。刘昭史注的体例，从现在《后汉书》志的注中可看出，基本承袭裴松之《三国志注》，同样以补阙存异、广辑史料见长。其引书极为丰富，遍涉经史子集，总计约二百种左右。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注释主要有四种方法。首先是补阙，即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这是裴注的主要特点。其二是备异，即一事各书记载不同，条列参考。三是惩妄，即《三国志》错谬之处，裴注加以订正。四是论辨，即对《三国志》中史料运用不当或记载不合史体处，加以论辨，阐发观点。裴注的重心是补充史实，故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以充实三国史的内容。对于裴注引书的数目，古今研究者因统计原则和方法不一致，得出的结果多有出入。少者如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5所说，裴氏引书"凡百四十余种"。近又有学者撰专文重新统计，并将所引书目全部列出，认为"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1]。裴注引书众多，内容详尽，值得充分肯定。当然，也有时失之繁芜，甚至有画蛇添足之处，这亦应指出。

除了为前四史作注外，此期还有几种重要的史注著作出版面世，引起了时人和后世的重视。三国时吴韦昭的《国语解》是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韦昭注《国语》吸收了东汉郑众、贾逵，三国时虞翻、唐固等许多前人成果，可谓汉、魏旧注的集成之作，但注文中更重要的是韦昭自己的见解。韦昭在《国语解

【1】张子侠:《〈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2),77页。

序》中说：其注“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指《左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可见韦昭《国语解》亦注重广集资料，补充史实，纠正错误。其“发正”者，不仅数量可观，见解亦多精当，并且涉及史实、训诂、名物、制度诸方面。韦昭是史学家，其注解很注意在年代上各国与周纪年、鲁纪年的对照，地理上古今地名的对照，史事上与《春秋》、《左传》的照应。这是韦注一个鲜明的特点。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也是当时著名的史注。《世说新语》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其书将上自东汉，下讫东晋，以士大夫为主的历史人物的轶事琐语，分三十六门辑录。其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简明生动，虽带小说家言意味，但并非荒诞不稽之作，反映的社会内容、风俗人情非常广泛，可作为正史的补充，也可视其为记言记事的杂史。《世说新语》问世后，即有人为其作注，但最有价值的是南朝梁刘孝标注。刘孝标博极群书，精通文史，所作《世说新语注》具有鲜明的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史注特点。首先是征引繁富。其引书遍涉经、史、子、集，还有不少佛经。其中“经部三十五家、史部二百八十八家、子部三十九家、集部四十二家、释氏十家，共四百十四家”[1]。引书内容成为后世考史、辑佚的重要资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40《世说新语》提要所说：“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据焉。”其二，能根据《世说新语》的风格和特点，增加注释的内容。一般注释，以注音、解释方言、考镜名物典制为主。由于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尚清谈，故《世说新语》所记言语多雅谑、含蓄，所以注释要交待人物的身份，言行的背景，方能发其含蕴，解人难明之惑。这是《世说新语》注释的突出特点。其三，态度谨严。刘注无论考异、纠谬还是增补事实均严谨详审。有关歧异的史载，不管是迥别，还是微异，倘难定其是非，刘孝

[1] 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序》，见沈家本:《世说注所见书目》卷首，归安沈氏民国刊本。

标皆并存其说，概不轻下论断。对于所记之人之事其他诸书无以资证者，皆注“未详”二字。关于纠谬，刘知几《史通》卷5《补注》颇为称道：“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这类例证甚多，有学者统计，“达五十七处之多”[1]，此无需举例。由于《世说新语》叙事简单，刘孝标还大量增补了相关事实。总之，刘注不仅大大提高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其本身也堪称古代最有成就的史注之一。

[1] 李颖科：《试论〈世说新语〉》，《史学史研究》，1985（4），52页。

《水经》是一部记载水道的古书，仅记137条水流，内容十分简略。北魏郦道元以其为蓝本，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并亲自实地考察，获取山水等地理学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水经注》（图36）。《水经注》以作注的形式写成，实际上已是一部创造性的著作。其书为《水经》补充了大量内容，所记河流增至1 252条，篇幅亦达到三十万字，是《水经》的二十倍。其引书多达四百余种，遍涉经、史、子、集，并收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水经注》不仅内容翔实丰富，而且文字生动，因而很受后世推崇。唐代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徐坚撰《初学记》、杜佑撰《通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以及北宋时期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等，都曾援引了《水经注》的大量资料。

图36
《水经注》书影


重刻水經序

水經注

魏晋南北朝的考史著作，主要有三国蜀谯周撰《古史考》、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和徐整撰《三五历记》。

《古史考》25卷，是一部考证先秦史及远古传闻之书。《晋书·司马彪传》云：“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可见，《古史考》

是针对《史记》而作，是用经典所述的古史事实对《史记》进行考辨。谯周揭开了考辨古史的序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针对《史记》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不同见解，也激发人们思考。《古史考》在唐宋期间颇受重视，和《史记》并行，但在宋元之际散佚。今有清黄奭辑本1卷，收入《黄氏遗书考》；章宗源辑本1卷，收入《平津馆丛书》。

《帝王世纪》和《三五历记》也是研究古史值得注意的两部重要书籍。皇甫谧鉴于汉代史书记述三皇五帝以来的史事多有缺略，于是博案经传，旁观百家，著《帝王世纪》，对古史加以补充考证，颇受后世重视。如其所载太皞、神农、黄帝、少皞等事，被《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所引用。《三五历记》则把我国历史提到了三皇五帝之前。徐整根据南方苗瑶民族的传说，参合各种书籍记载的传说，提出了盘古开天辟地之说。

第三节　子部典籍的编撰和出版

子部典籍起源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从而在学术思想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思想家四方游说，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思想流派。后世将这些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合称诸子，其书称为子书，古典目录专立子部统属其书。但魏晋之后，按四部分类的目录著作，大抵凡经、史、集部无法容纳的书籍皆归入子部，故内容十分庞杂。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出版的子部典籍，内容丰富，数量众多。《隋书·经籍志》将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以及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14类，共著录子书853部，6 437卷。其中除了墨家3部都是前人著述外，其他各类均以魏晋南北朝的著作为主。

一、儒家、道家著作的编撰和出版

儒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62部，530卷；通计亡书合67部，609卷。其中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书籍占了大半。因儒家典籍主要集中在经部，故子部所录数量不大，且以教化训诫类著作为多，如三国蜀谯周《谯子法训》8卷及《众贤诫》13卷、《妇人训诫集》11卷等。须提及的是，《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部《论语》类录有《孔子家语》21卷，当视为魏晋时期一部重要的儒家著作。《孔子家语》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有著录，题为“周孔丘门人撰”，但经学者考证，原书早佚。魏晋之后流传的《孔子家语》，是三国魏儒王肃伪撰。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玄之学。他摘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大戴礼记》、《礼记》、《说苑》等书中有关古代婚姻、丧祭、郊禘、庙祧诸制度与郑玄不同处，以及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综合成编，借孔子之名，攻击郑学。由于王肃将详洽的引证、精细的考证集于一书，故深获历代儒家学者好评。清儒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指出：“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王学代替郑学，以此书为标志，故此书对研究儒学历史颇具参考价值。

道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78部，525卷，另录亡书50部。其中汉人著述仅十余部，其他均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学派，其创始人为老子李耳，代表作为《老子》。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老子》作为“三玄”之一，受到格外重视，其书风行于世。为《老子》注疏者也很多，《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的道家著作，有关《老子》者，合计亡书占到一半。其中作注者有王弼注《老子道德经》2卷等近20种；作疏者有韦处玄《老子义疏》4卷等5种；还有论《老子》者多种，如何晏《老子道德论》2卷、毌丘望之《老子指趣》3卷等。庄周也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与弟子著作结集而成的《庄子》亦列入“三玄”，故魏晋南北朝注解《庄子》

的著作也很多。仅《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即达到23种，如司马彪注《庄子》16卷、梁简文帝《庄子讲疏》20卷等。这一时期的道家著作还有三国魏任嘏《任子道论》10卷、东晋符朗《符子》20卷等。

二、法家、名家、纵横家著作的编撰和出版

法家、名家、纵横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学术流派，均曾盛行一时。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衰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少有传人，编撰出版的著作也数量十分有限。

法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共著录6部，72卷，另录亡书7部。其中属魏晋南北朝的著述，有刘邵《法论》10卷等6种；而梁之后仍传世者，则仅剩三国魏桓范《世要论》12卷1种。

名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共著录4部，7卷，另录亡书5部。其中属魏晋南北朝的著述，有三国魏卢毓《九州人士论》1卷等7种；而梁之后仍传世者，只剩魏文帝《士操》1卷、刘邵《人物志》3卷两种。《人物志》12篇，是关于品鉴人物的才能和性情的专书，其中提出的一些考察人才的原则和方法颇有见地。如《九征》篇，认为人的内在性情可以在外部表现出来，并概括为九个方面：“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八观》篇提出鉴识人才的八种方法：“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七谬》篇则探讨了选拔人才失误的七种原因：“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此外，还涉及到人才

的分类、能力的研究、成功与失败的分析等诸多问题。因此，《人物志》可说是一部系统的人才学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书中多次引用《论语》和《周易》的观点，也有用《老子》的观点解释孔子思想之处。这说明在三国曹魏初期，儒、道之间已在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这也是玄学兴起的基础。

纵横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2部，6卷，实则只有《鬼谷子》一书的两种版本。该书原题周楚鬼谷子撰，但后世学者多疑其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魏晋时人伪作；因《隋书·经籍志》著录西晋皇甫谧注《鬼谷子》3卷，或以为该书即皇甫谧所作而托名于鬼谷子。该书对纵横家思想做了一番系统整理，故对于研究古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以及纵横家的历史状况具有参考价值。

三、杂家、小说家著作的编撰和出版

【1】《隋书》卷34《经籍志三》。

杂家"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1]，其著作以杂取百家之说为特点，故目录著作杂家类也包罗较为庞杂。《隋书·经籍志》著录杂家著作97部，2 720卷，另录亡书23部。其中汉代及之前撰述不足10种，其余均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关于政务的，有晋杨伟《时务论》12卷、陆澄《述政论》13卷等。关于轶闻旧事的，有《备遗记》3卷、南朝宋徐益寿《记闻》2卷等。关于箴言的，有晋张显《古今训》11卷、南朝宋范泰《古今善言》30卷等。关于用语的，有刘霁《释俗语》8卷、北周卢辩《称谓》5卷等。关于典故的，有谢吴《物始》22卷、沈约《珠丛》1卷等。摘抄众书的，有《杂书抄》44卷、梁庾仲容《子抄》30卷等。

【2】《晋书》卷47《傅玄传》。

此类中有西晋傅玄《傅子》120卷。傅玄是魏晋之际一位有名的思想家，所撰《傅子》分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名为区例"[2]。刚写完内篇时，其子傅咸曾送给司空王沈过目。王沈阅后大加赞赏，在给傅玄信中说："省足下所著书，言富

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1] 该书在后世也很受重视。唐朝魏征《群书治要》一书中，就摘引了《傅子》不少篇章和治国安民的至理名言。

【1】《晋书》卷47《傅玄传》。

西晋张华所撰《博物志》10卷、《杂记》11卷、《张公杂记》5卷均收入杂家类，而《博物志》尤为重要。《博物志》内容庞杂，山川地理、历史人物、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神仙方技，无所不包。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资料，如海客浮槎、东方朔偷桃、西使献香、巴蛇食象等，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记载了许多自然现象，诸如冰透镜、静电火花、积油自燃、孔雀毛和交州虫光衍射现象等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对于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颇有价值。该书还对后世的笔记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一些仿作，其中以宋人作的《续博物志》较为著名。

这里还要提到《颜氏家训》，因历来将其列入杂家类。《颜氏家训》旧题“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根据书中内容考证，认为此书成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以后。颜之推历仕萧梁、北齐、北周、隋四朝，本传在《北齐书·文苑传》，一般将其归属为南北朝人，故在此也对其著述加以介绍。《颜氏家训》分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物、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等20篇。其著述宗旨在于陈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用以训诫子孙。家训、家诫、家规在我国古代十分盛行，而《颜氏家训》是此类著作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0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因此颜之推有开创一类新书品种之功。须指出的是，此书虽然名为“家训”，但内容十分博杂。其中对南北风俗、士人好尚、佛语玄谈、鲜卑语传播、俗文字盛兴、治学作文方法、音韵字训、典故考证、文艺品第等多有评述，颇可取资，因而《颜氏家训》还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另外，杂家类还包括类书和有关道教、佛教的著作，下面另作叙述。

小说家类，《隋书》卷34《经籍志三》主要是收录以里巷琐语、遗闻轶事为内容的杂谈、杂事一类杂录图书，共著录25部，155卷，另录亡书5部。其中除《燕丹子》等少数几种外，其余大部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列入此类，不过因其真实地反映了魏晋士大夫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可补正史之不足，故后世亦将该书视为杂史。比较重要的还有梁殷芸《小说》10卷。该书是一部轶事小说集，所记琐事遗闻，起自周秦，迄于南朝宋齐。纵观全书，有四个特点：一是故事编排以历史发展为序，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体例有明显不同；二是故事素材来源和题材范围广泛，除文人清谈事迹外，还有民间传说故事和地方风物、名人遗迹的记载，内容丰富；三是突破了志人小说真人真事的局限，采用虚构表现人物故事；四是有一定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不足，为史家所珍重。该书第一次把“小说”这一体裁的通名变成一书的专名，并将一朝一时一地的小说发展成通史性的记多代琐闻逸事的作品，对后世轶事小说的编撰起了促进作用，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农家、兵家著作的编撰和出版

农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5部，19卷，另录亡书4部。其中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最重要的是北魏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该书10卷，分92篇，主要记载公元6世纪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和副业生产情况。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举凡耕种粮食、栽种瓜果蔬菜、畜养家禽家畜、酿酒造曲等靡不毕书，还记载了有关农作物的异闻以及中原以外和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对于烹调、制革、制墨、染纸、保护书籍乃至修理房屋等也多所涉及。贾思勰著书取材广泛，且态度认真严谨。《齐民要术·序》说：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

行事”，最后成书。仅征引前人著作即达一百五六十种，而其采用的大量著作，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原书已佚，全赖贾氏的引用才保存了部分内容，后人因此而辑佚成书。《齐民要术》反映了作者许多重要的农学思想。例如，贾思勰认为天时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土壤有肥、瘠、温、寒之区别，劳力有多、少、勤、懒的不同，因而要注意天时、地利和人力三要素的统一。这种因时因地所宜合理经营生产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再如，先秦以来的重农思想专重于五谷桑麻，而对于农业以外的林、牧、副、渔等却多所忽略。《齐民要术》十分广泛的内容，反映了贾思勰以农为本、多种经营的思想，对于唐宋以后乃至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又如，《齐民要术》中专有《货殖》一篇，在其他篇章中也多次提到商业经营和计算，认为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单纯为自己消费，还有一个流通和变换其他生活资料的内容，只有把生产、流通、消费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贾思勰这种经济观点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总之，《齐民要术》是当时成就最为突出的农书，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著作，对后世农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该书不仅在我国古代农业科技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而且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还有两部书值得提及。一是晋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植物学著作。该书分为三卷，上卷记草类29种，中卷记木类28种，下卷记果类17种、竹类6种，四类植物共载80余种，均生长于两广和越南，故称《南方草木状》。其中所记利用蚂蚁防治柑桔害虫的内容，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敌消灭害虫的记载，说明利用天敌防治害虫的方法是我国劳动人民首先发现并使用的。二是刘宋戴凯之所撰《竹谱》，书中载有竹类品种六十多个，内容以四言韵语叙述，然后附以注释。该书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料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

类植物专著。《竹谱》出版不久，贾思勰便从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后世编撰出版的有关竹类著作，也都深受其影响。

兵家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133部，512卷，另录亡书54部。其中汉代及之前著述二十多种，其余均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这一时期兵书的种类及包含的内容颇为广泛。有为前人兵书作注的，如魏武帝注《孙子兵法》2卷、贾诩注《吴起兵法》1卷、成氏注《黄石公三略》3卷等。有魏晋南北朝帝王撰著的兵书，如魏武帝《兵法接要》3卷、梁元帝《玉韬》10卷等。有记载当时军事家兵法的，如《诸葛亮兵法》5卷、《慕容氏兵法》1卷等。有辑录兵书的，如北周宇文宪《兵书要略》5卷、伍景志《兵书要术》4卷等。有记录军阵的，如《阵图》1卷、《杂兵图》2卷等。有关于战术的，如赵煛《战略》26卷、吴氏《对敌权变》1卷等。有关于用兵占卜的，如《兵书杂占》10卷、《兵法日月风云背向杂占》12卷等。还有关于兵器的，如《古今刀剑录》、《马槊谱》等。

此外，中国古代的许多军事家都喜爱下棋，他们经常运用棋理去研究战术，指挥战争；而古代的棋手，特别是围棋理论家，也常常运用兵法和战争实例来解释围棋，研究围棋的理论。甚至有学者认为，围棋从一诞生就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它是适应战争的需要、模拟战争的形式而创制的一种智力游戏。因此，棋类著作也列入兵家。关于围棋，这一时期编撰出版的著作约二十种，如徐泓《围棋势》7卷、梁武帝《围棋品》1卷等。其中晋马朗等撰《围棋势》29卷，是我国古代卷数最多的一套围棋谱。另外，20世纪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也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围棋著作。该书分7篇，末附《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两篇论文，是一本较为完整的围棋论著。中国象棋定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编撰的《象经》1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象棋谱。此外还有王褒注《象经》1卷等4种。汉代开始还流行一种弹棋，晋徐广《弹棋谱》1卷亦归入兵家类。

五、天文、历数、五行著作的编撰和出版

天文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97部，675卷，另录亡书33部。此类书目约有三分之二未注明作者，但依其体例可知，属汉代及之前撰著的寥寥无几，大都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我国古代天文较为发达，魏晋南北朝处于发展期，天文学著作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宽泛。有关于宇宙观的，如《浑天义》2卷、三国吴王蕃《浑天象注》1卷等。有关于天文学说的，如陶弘景《天仪说要》1卷、祖暅《天文录》30卷等。有记录天文图的，如《天文五行图》12卷、《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1卷、《日月薄蚀图》1卷、《日行黄道图》1卷、《杂星图》5卷等。有关于占星术的，如丁巡《五星占》1卷、陈卓《天官星占》10卷等。北周庾秀才《录台秘苑》115卷，以及《垂象志》148卷等，也都保存了大量古代天文资料，有助于天文史的研究。

历法数学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100部，263卷，另录亡书24部，其中汉代著述仅数种，大都为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我国古代历法自成体系，不断改进，十分发达，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大量著作的编撰出版就是很好的证明。其中历法书有二十多种，遍及这一时期的各朝各代。杨伟《景初历》3卷，为曹魏到晋初使用的历法。该书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阚泽注《乾象历》3卷，为三国时孙吴使用的历法。晋刘智《正历》4卷，用于晋代。北凉所用赵歐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19年七闰法，提出了600年设置221个闰月的新闰周期，使回归年和朔望月精度都有所提高。北朝使用的《正光历》、《天和历》、《大象历》等，均有专书行世。南朝最好的历法是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

刘宋何承天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年，积前后80年的实测资料而编成《元嘉历》2卷。《元嘉历》的改革

和成就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东晋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三是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另外，何承天还编撰了《历数》1卷、《验日食法》3卷、《漏刻经》1卷，也都是他研究历法的计算方面的成果。

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开始于青少年时代，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反复推算，他发现当时行用的何承天《元嘉历》已经与实际天象不合，于是精心编制了一部新历法，即后世所称的《大明历》。祖冲之《大明历》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历法计算中首先考虑了岁差的影响，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大明历》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二是关于闰周的改革，祖冲之提出的新闰周是319年144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21222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月点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27.554550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059日。这些数据都是当时最精确的。这一时期还有研究历法的著作三十余种，如崔隐居《推历法》1卷、张胄玄《七曜历疏》5卷等。

秦汉时期《九章算术》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数学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在此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数学研究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编撰出版的数学书不下数十种，《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二十余种。其中如赵爽《周髀算经注》，刘徽《九章算经注》（图37）和《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数术记遗》等，都是重要的数学典籍，后被收入有名的"算经十书"而一直流传至今。魏晋之际刘徽作《九章算经注》10卷，对《九章算经》的大部分数

学方法作了相当严密的论证，对一些概念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为中国古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许多新的思想、方法、原理和获得的新成果，对后世数学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例如他创造的“割圆术”，就为圆周率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祖冲之所撰《缀术》6卷，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数学专著，唐代收入《十部算经》，并曾传到朝鲜、日本。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也是举世公认的重大数学成就，在数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北周甄鸾所撰《五曹算经》分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卷，涉及田亩面积、军队给养、粮食征收等计算方法，是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应用算术书；《五经算术》则是对儒家经籍及其古注中有关数学计算的解释，这都是实用数学方面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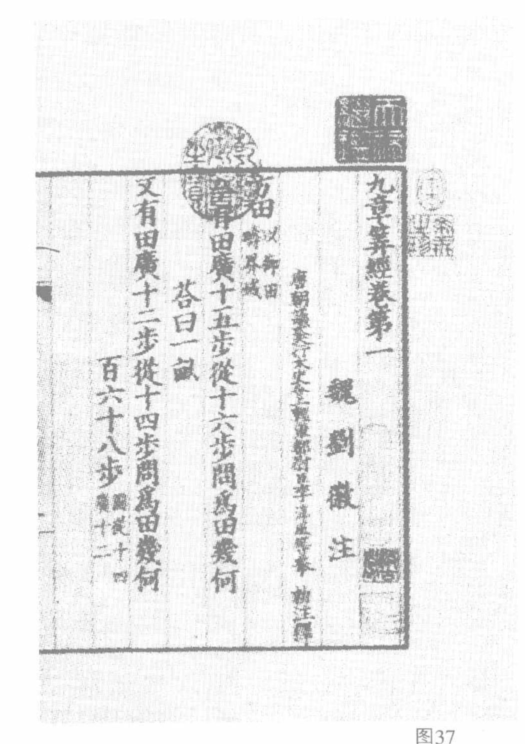

九章算經卷第一　魏　劉徽注
方田　以御田疇界域
今有田廣十五步從十六步問爲田幾何
答曰一畝
又有田廣十二步從十四步問爲田幾何
答曰百六十八步

图37
九章算经注

五行古代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各种元素之间相生相克，互相依存，互相作用，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思想方法和模式，是一种朴素的哲学体系。五行说盛行于汉代，《汉书·五行志》是较早的五行著述，但其中反映出浓厚的神秘观念和迷信色彩。魏晋之后，五行类著作迷信色彩逐渐淡薄，而其中记载的水灾、火灾、气象、天象、地震、动物变态、植物异象等内容，则保存了大量宝贵的自然科学史资料，颇具史料价值。《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五行类著作272部，1 022卷，另录亡书148部。这部分书目多数未署作者，但依其体例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出版的著作约占九成。其中关于占卜术的占了很大比重，如《风角杂占》、《太一九宫杂占》、《遁甲法》、《龟卜要决》、《杂筮占》、《杂占梦书》等近二百种。《周易》是一部利用卜筮形式而赋以哲学内容的奇书，

对古代的方术有很大影响，许多五行类书籍都托名于《周易》，在《周易》的基础上发挥和运用。此类书籍亦达六十余种，如《周易杂占》13卷、《易内神筮》2卷等。还有关于禁忌的，如《杂忌历》2卷、《百忌通历法》1卷等；有关于婚嫁生产的，如《阴阳婚嫁书》4卷、《推产妇何时产法》1卷等；有关于灾祥的，如《祥瑞图》11卷、《灾异图》1卷等；有关于地震的，如《地动图》1卷等；有关于风水的，如《地形志》80卷、《五姓墓图》1卷等；有关于相术的，如《相书》46卷、《相马经》1卷等。

六、医学著作的编撰和出版

我国中医学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初步形成体系，至魏晋南北朝无论医学基础理论，还是治疗经验都取得明显的进步，也编撰出版了大量医学药方类著作。《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医方类著作256部，4 510卷，另录亡书131部。其中大部分书籍未著录作者，但依其体例可知，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著作占了九成以上。

对前人医书的整理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部医药书上。一是《黄帝内经》，该经本来文字古奥难懂，流传至魏晋已部分散佚，且多有传抄之误，使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受到损害，急需整理训解。南朝医学家全无起经过深入研究，注《黄帝素问》8卷，使这部医学古籍得以部分保存。二是汉代编成的《神农本草经》，经过辗转传抄出现不少谬误，且分类不科学。南朝梁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集注》7卷，将原365味药增加到730味。书中摒弃了以前的分类法，采用了以药物的天然属性为标准的新分类法，即将药物分为玉石（矿物）、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和有名未用等7大类。在每味药的后面，均注明药性和用途。这使药物的分类更加科学，是又一次系统的药物总结。另外书中还制订出丸、散、膏、丹、汤、酒等的制作规程，这也是药物学上的新成就。陶弘景《集注》的分类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其基础上充实和完善起来的。三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起初流行

并不广泛，且因兵火战乱已散乱。西晋医学家王叔和将该书重新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出版。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后者专述一般杂病。这两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我国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形成了一套从辩证、立法、拟方直到用药的比较完整的医疗原则，奠定了中医医疗学的基础。后世将这两部书称为“医经”，至今仍然是中医理论和临床治疗的重要典籍，并受到世界特别是亚洲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医学界的推崇。

王叔和还在前人脉法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最为系统的脉学专著《脉经》。该书10卷98篇，对中医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进了切脉的方法，明确了切诊的部位，将切脉原则规范化；二是将脉象详细分类，总结出24种脉象，使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三是注重脉、证、治的结合。《脉经》在6世纪时传到朝鲜和日本。11世纪初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编撰的《医典》中，曾引用《脉经》中的材料。14世纪波斯学者编写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一书中，载有王叔和的名字和他的脉学内容。17世纪《脉经》被译成英文、法文，开始刊行于欧洲。这说明王叔和及其《脉经》，不仅发展了中医脉学，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西晋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则是这一时期针灸学发展承前启后的代表作。该书12卷，计128篇，是皇甫谧根据自己中年犯风痹症的治疗经验，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反复论证，取其精华，厘正谬误，精心编撰而成的。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以医学的整体观念出发，在“辨证论治”的思想指导下去叙述针灸的部位和疗效，把生理、解剖、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论断、治疗等相关的内容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书中还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针灸操作手法和各种注意事项。《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太医署设有针灸专科，将此书作为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唐时传至日本

后，日本医学院校也将其列为针灸科学生教材；之后还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直到今天的许多有关针灸学的著作，也莫不以此书为蓝本。

这一时期的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时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小品方》12卷、范东阳《范汪方》176卷、姚僧垣《集验方》10卷、徐叔响《杂疗方》22卷等，都是有较高医学水平的佳作。《小品方》曾流传到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此外，还有关于养生的，如张湛《养生要集》10卷、萧吉《帝王养生要方》2卷等；关于食疗的，如《四时御食经》1卷，《服食诸杂方》2卷等；关于兽医的，如《疗马方》1卷、《治马牛驼骡等经》3卷等。

七、类书的编撰和出版

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文献资料以供检索之用的工具书。它将群书解析，然后按天文、地理、人事、典制、生物、医药、衣食、住行、工艺、珍宝、宗教、方术、鬼神、灾异等等，分门别类汇编，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因而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类书产生于三国时期，曹魏初年编成的《皇览》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类书，从此开创了这一新体裁。《皇览》是魏文帝曹丕命令儒臣王象、桓范、刘邵、韦诞、缪袭等人编纂的，完成于黄初三年（222年）。该书有四十多个部类，每部又有数十篇，通合1 000多篇，800多万字。如果每篇为一卷，则有1 000多卷。因《皇览》部头太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靠传抄全部保存十分困难，故逐渐散失。到南朝梁类书流行时，对《皇览》有许多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实际只存680卷。《隋书·经籍志》则仅著录120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无记载，说明至唐代已散佚失传。晋代除陆机《要览》3卷外，再无类书编纂出版，且《要览》南宋以后已失传。

南北朝时期，由于沿袭魏晋风尚，作文讲究用典，崇尚骈体，在文人中形成了抄集典故，排列偶句，以补记诵不足，供随

时查检的风气。这自然促进了类书的发展。加上当时皇帝贵族多喜招揽文士，编撰书籍，于是步曹魏后尘，编撰出版了一批类书。先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崔安编纂《帝王集要》30卷，是一部有关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接着类书递相出版，南北竞美。梁武帝萧衍仿效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就诏修类书。天监元年（502年）命刘杳领修《寿光书苑》，是辑录甲乙丙丁四部书资料而成。在《寿光书苑》即将完成时，另一部类书也在着手编辑，这就是刘孝标为萧衍之弟萧秀所编《类苑》。刘孝标很有才学，《类苑》质量较高，未及完成，才编了120卷，就已流行于世。《类苑》编得比《寿光书苑》好，萧衍为争高低，便命诸学士再编一部新类书《华林遍略》。《华林遍略》由徐勉领修，华林园学士七百多人参与，自天监十五年（516年）至普通四年（523年）历时八年编成。该书700卷，收录资料多于《类苑》数倍。《华林遍略》出版后流传很广，并且冲破了南北对峙的界限，在北朝也受到了欢迎。据《北齐书》卷39《祖珽传》载，北齐文襄帝高澄在北魏辅政时，曾有扬州商人来卖《华林遍略》，高澄招集很多抄书手另抄了一份。这说明《华林遍略》出版不久，就被商人贩运到了北方。《华林遍略》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其后编纂的类书，如北齐《修文殿御览》、隋《长洲玉镜》都以它为蓝本。《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图38），祖珽、阳休之等三十多人参与其事，编成于武平三年（572年）。该书分55部类，下设240子目，共360卷。它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特用，只是补充《华林遍略》未收的书籍，所补以南方没有见到的北朝文史书籍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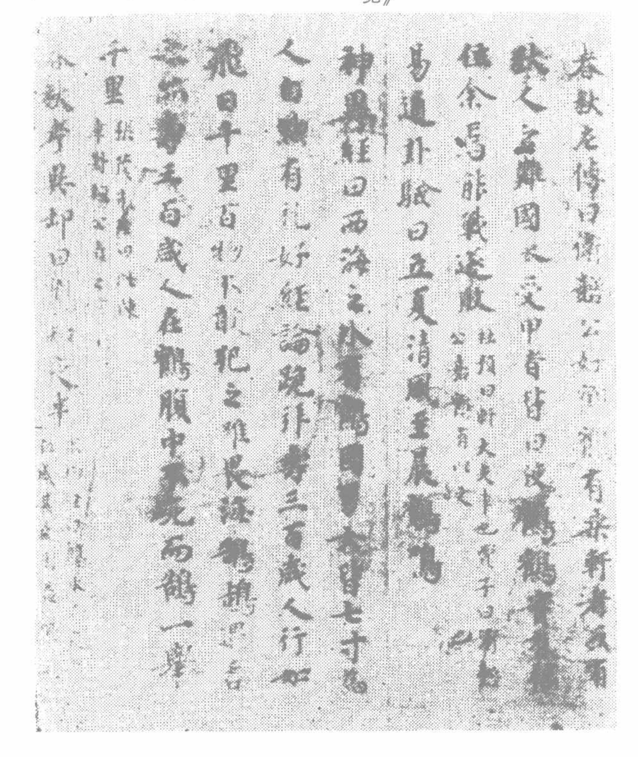


图38
唐写本北齐类书《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编纂体例合理严谨，对后世影响很大。北宋编《太平御览》不仅以此书为蓝本，而且分部的数目也完全按其体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类书，还有北魏元晖《科录》270卷，朱澹元《语对》10卷、《语丽》10卷，以及《法宝联璧》、《雕玉集》等多种。可惜上述各种类书后均逐渐散失，只有少数存有残卷，至清代辑佚成书。

须提及的是，1899年敦煌文书被发现，在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的文卷中有一部分唐人抄本类书残卷。因仅存259行，无头无尾，也没有书题和作者，难以判断是哪一部类书。1911年经罗振玉考证，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发表《所谓〈修文殿御览〉者》一文，提出异议，认为这卷残本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不管孰是孰非，均认定为南北朝时期的类书残卷，说明这一时期编撰出版的类书传播的范围还是很广的。

八、道教典籍的编撰和出版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走向成熟化、定型化，也编撰出版了一批道教典籍。据《隋书·经籍志》称，道教书有：经戒301部，908卷；饵服46部，167卷；房中13部，38卷；符箓17部，103卷。共计377部，1 216卷。足见道教典籍数量之大。

魏晋时期比较重要的道教典籍，是东晋葛洪所撰《抱朴子》。该书分两部分，外篇凡50篇，主要议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是作者政治哲学基本观点的集中体现；内篇凡20篇，主要反映作者的道教思想，保存了早期道教的很多史料，其中《遐览》篇所录道经书名，实际上是道教史上最早的教典经籍目录。葛洪之后，东晋杨羲写成《上清真经》31卷，进行传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上清派道教。大约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部《洞玄灵宝经》，并以此经为主，产生了灵宝派道教。另外还出现了一部《洞神三皇经》。

至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典急剧增加。但道经在师徒传授过程中，不断有人增扩、伪造，搞得十分混乱，真伪难辨，急需加以整理，以弄清源流，去伪存真。刘宋陆修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广收各种道教经书，加以整理甄别，写成《三洞经书目录》，其中著录道经和药方、符图多达1 228卷。陆修静整理道德经书，编写目录，奠定了后来《道藏》分类方法的基础。《道藏》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就是在陆修静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1]。“三洞”包括洞真、洞玄、洞神，“洞”即通，意为三洞各有其统而玄义相通。洞真类收录的是《上清经》，洞玄类收录的是《灵宝经》，洞神类收录的是《三皇经》。“四辅”是《太玄经》、《太平经》、《太清经》和《正一经》的总称。“辅”是补助之意，即以太玄辅洞真、太平辅洞玄、太清辅洞神，正一通贯补充以上三洞三辅。三洞四辅合称“七部”。“十二类”是：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诀，第四灵图，第五谱录，第六戒律，第七威仪，第八方法，第九众术，第十记传，第十一赞颂，第十二章表。陆修静编写《灵宝经目》时将《灵宝经》分为这“十二类”，后来的道士进一步把其他两洞经典也按这种分类法编排。所以，现存明代官修的《正统道藏》，三洞各分十二类，共有三十六部类。

[1]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152—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梁陶弘景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也是南朝道教“上清派”的一位重要传人。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医药学、炼丹术都有研究，一生著述宏富，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就编撰出版了近五十种。所撰《真诰》是一部有名的道教经典，也是“上清派”道教的集成之作。该书分为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共20卷。书中以摘录引用的方式记录了杨羲、顾欢等人亲手书写的上清经典和修行秘诀，并详细记载了东晋以来上清经出世和传播的经过，以及早期上清派人物的家世和生平事迹，是研究早期上清派历史的重要资料。书中还保存了不少有关天文、医药、炼丹等科技史料，很值得重视和研究。陶弘景所撰《登真陶诀》和《养性延命录》也是两部重要的

道教论著。前者专门论述上清派各种内修养生的方术秘诀，也有一些天师道请神驱鬼的符箓咒语等法术内容。后一部书的内容也是总结魏晋流传的道经中，有关服气疗病、导引按摩等炼养人的形体和精神的各种方术学说，宣扬上清派的思想教义。此外，道教自葛洪以来，就崇拜各种得道成仙的神仙真人以及天神地祇，所编造的道经也大都自称得自神仙传授。所以，编写的道经越多，编造的神也越多，而不同的道经有不同的说法，致使道教的万神殿既拥挤又杂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陶弘景对上清派信奉的各种神鬼进行整理，并广泛吸收各教派信奉的神仙，写成《真灵位业图》一书。书中按从天上到地下的次序，把神鬼世界分为七层，每一层有一位主神，居中心位置，其他神排列左右，还有各种散仙的位置。该书建造了一个整齐有序的神仙世界，使道教神仙信仰体系进一步完整化，这是对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出版的道教典籍，还有北魏寇谦之《老君齐诵诫经》、《录图真经》，南齐顾欢《夷夏论》等。另外，敦煌藏经洞遗书中，有关道教经卷凡357件，其中除大量唐写本外，亦有两晋南北朝写本。这说明此期编撰出版的道教典籍已流传到了西域地区。

第四节　文集的编撰和出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集的编撰和出版仅次于史部书籍而占有重要地位，以致于影响到四部目录中集部的确立。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说："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1]，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2]。在集部书籍中，除原有的《楚辞》外，别集先兴，总集继起。

【1】指把王俭《七志》的"文翰志"变为"文集录"。

【2】[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一、别集的编撰和出版

别集是指一人的诗文集，其编撰与出版始于汉魏之际。别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别集以人相

从，著述力求搜罗无遗，因此对研究某一历史人物，它是第一手的直接资料。二是别集文体庞杂，一般包括诗、文、书牍、奏议等，其中文章内容有记赞、序跋、记叙、碑志、墓表、人物传记、记事、杂著等，包含有丰富的史料，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对有些断代史与专题的研究，文集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有些别集的作者是造诣精深的学者，其文集中不乏纵论经史、考证文献的名作，可为历史研究取证。历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大都有自己的文集，由于每一家文集往往编者不止一人，本子不止一种，流传当中又有变化，故版本众多，数量巨大。《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437部，4 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 126卷。其中除隋代18部外，其余基本上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出版的著作。

（一）前人别集

别集有作者自己编撰者，但更多的是后人收集作者诗文汇编成册，在别集产生之初尤其如此。魏晋南北朝编撰出版的前人别集，《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四十多部，合计亡书有近百部。可惜这些别集后世大部失传，难以了解详情，可知大概内容者也是少数。

如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扬雄，少好学，博览群书，喜辞赋，作品很多。有《扬雄集》5卷，亦称《扬子云集》，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版流传。但至《崇文总目》已不见著录，大概亡于唐末之乱了。宋人谭愈患其散落，乃杂取《汉书》、《古文苑》诸书所载之41篇，仍辑为5卷，已非旧本。明人郑朴又取扬雄所撰《太玄》、《法言》、《方言》及《蜀王本纪》、《琴清英》诸残篇，辑为6卷，流传至今。但经学者考证，其中掺杂进了后人伪托的内容。

又如东汉文学家和书法家蔡邕，少博学，好辞章，通音律，善鼓琴，且深于经术，通晓天文，长于碑记，工篆隶，创“飞白”书，博学多才，有《蔡邕集》20卷。因其在董卓专权时曾拜任为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集》。《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

称:“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执》、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当为其别集内容。蔡邕散文音律谐美，工整典雅，多用偶句，在汉末很受推重。至《宋史·艺文志》著录该集为10卷，可见已有散失。今传本为清雍正时陈留所刊，凡6卷，94篇，已不足原104篇之数。且经考证，其中还有后之好事者混入的部分。可见原本已佚，传世者只是后人的辑佚本。

再如汉末“建安七子”之首孔融，为人刚直，文章好发议论。五言诗直抒胸臆，哀婉动人。散文词藻华丽，有较多的骈俪成分，能以气运词，刚劲犀利，反映出建安文学的新气象。“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1]。这当是孔融别集的最早编纂。南朝梁时《孔融集》有10卷本行世，因其曾任北海相，又迁任少府，故其别集亦称《孔北海集》或《孔少府集》。原集亦早佚，现传世有明人辑佚本1卷，计收36篇诗文。

【1】《后汉书》卷70《孔融传》。

（二）三国时人别集

三国时人别集，《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32部，合计亡书为66部。曹魏别集合计亡书48部，占了大部分，说明其时北方别集的编撰和出版多于南方。

汉魏之际，由于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文学创作取得巨大成就，并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均有别集出版。曹操别集有《魏武帝集》30卷和《武皇帝逸集》10卷、《魏武帝集新撰》10卷三种。曹操虽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但其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有许多诸如《龟虽寿》、《观沧海》等名篇在后世广为传诵。惜上述三种别集早佚。其诗文后人又辑佚为《曹操集》，收诗1卷20余首，文3卷151篇，流传至今。魏文帝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曾一度“以著述为务，

自所勒成垂百篇”[1]。至南朝梁时，有《魏文帝集》23卷流传。其诗内容以反映贵族生活和感情为主，形式则颇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描写细致。他的名作之一《燕歌行》以完整的七言体写出，是诗歌句法的一种创新，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特别提及。原别集亦散佚，后世有《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辑佚本《魏文帝集》2卷，收诗歌40首，辞赋30首。曹植富于才华，为三国时著名诗人。他善于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词采华茂，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了两汉以来乐府民歌和五言诗的形式，对诗歌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有《陈思王曹植集》30卷出版流行。但原集亦早佚。后有宋人所辑10卷本《陈思王集》传世，凡赋4卷、诗1卷、乐府1卷、文4卷。

【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曹魏末期，感时伤乱、纵酒谈玄的“竹林七贤”之代表人物，也有别集编撰出版。如颇有奇才、博洽多闻的嵇康，就有《嵇康集》15卷行世；因其曾拜中散大夫，别集又称《嵇中散集》。原集亦早散失，至宋仅存10卷，包括诗1卷，文9卷。嵇康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在魏晋诗坛占有重要地位，师法其人品诗风者大有人在。《嵇康集》刻本较多，在各类总集、类书、丛书中有著录者多达七十余种，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

蜀国只有别集3种，其中有《诸葛亮集》25卷（或作24卷）。《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载有陈寿于刘宋泰始年间编定的《诸葛亮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共“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从中可知，集中内容多关军政大事，反映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特色。其原集已佚。后有明人所刻《诸葛忠武侯集》21卷本，清嘉

道年间有张澍刻《诸葛忠武侯文集》11卷本，均为辑佚本。后者分文集4卷、附录2卷、故事5卷；其中辑有后人对诸葛亮的论述及清姚振宗《诸葛亮著作考》等，颇便参考。今还有《诸葛丞相集》4卷传世，为清人朱璘所编，中多伪作，虽有辑存之功，亦多芜杂之失。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首卷所录诸葛亮遗文一卷，陈寿所上目录皆不载，盖摭拾《三国志注》及诸类书而成。……二卷以下皆为附录，所列《八阵图》及《分野》诸条，猥杂尤甚。"[1]

[1]《四库全书总目》卷174《诸葛丞相集提要》，影印本，1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孙吴别集合亡书共15种，如《张温集》6卷、《骆统集》10卷等，后皆散佚。

（三）晋人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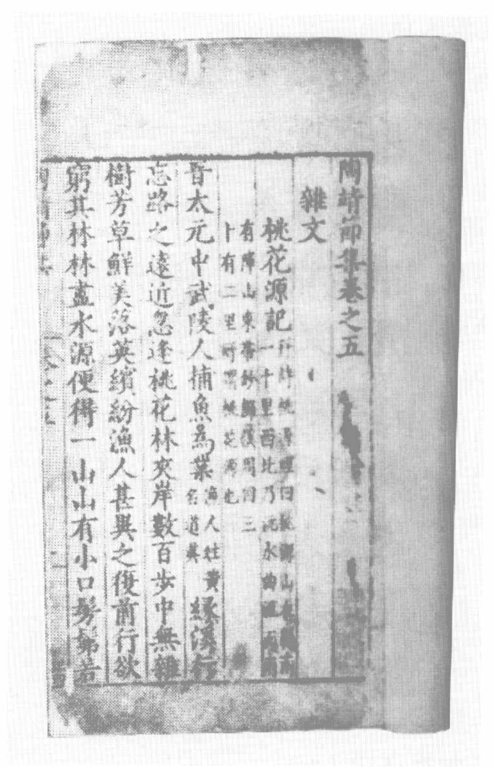
晋代始编撰和出版别集之风大盛，数量剧增。《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晋人别集156部，合计亡书多达376部。但这些别集大部陆续散佚，完整流传至今者甚少。

晋初人物，有《左思集》5卷。左思字太冲，又称《左太冲集》，出版后有散失，传世有1卷本。左思曾以十年时间著成《三都赋》，虽是仿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而作，但内容之丰实与辞藻之宏丽，实可追步前人而无愧色，充分表现出其深厚广博的学问和才华。当时名士皇甫谧、张载、刘逵、卫瓘等为其作序和注释，张华又赞赏其为班固、张衡之流，于是豪富之家争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其别集1卷本存诗14首，都精美可观，其中《咏史诗》八首，可推为这一时期杰出的诗作。虽名"咏史"，实质是"咏怀"，即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其诗格调高尚，不拘陈式，时出新意，笔力充沛，感情强烈，吐洒自如，一气贯注。这种一反同代诗人重形式轻内容的风气，代表了西晋诗歌创作的成就。

潘岳与陆机在西晋文坛上并称"潘陆"，是当时文学的代表作家。潘岳出身文学世家，从小即受文学熏陶，才华出众，著称一时，有《潘岳集》10卷。因其官至黄门侍郎，别集又称《潘黄门集》，有明张溥辑6卷本传世。其作品中有四言体《关中诗》16

章，反映了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关中氐、羌族人民因不堪压迫而起来造反的情况，对人民死亡之惨及因战争引起的饥疫祸灾之重有如实的艺术描写，具体地补充了史书叙述的不足。《悼亡诗》三首，表达对亡妻的哀念，情意真挚，富于感染力，成为时人所赞赏的名作，专以"悼亡"为哀悼亡妻的诗题即由此而起。还有诔、哀辞、祭文等二十余篇，语言华美明畅，文笔轻敏灵浅，受到时人好评。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曰："安仁（潘岳字）轻敏，故锋发而韵流。"《才略篇》又云："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陆机，字士衡，先辈为孙吴重臣，吴亡后入洛阳曾官平原内史，有《陆机集》47卷，其文学创作就数量而言，在当时作家中最为丰富。《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其集14卷，可见当时已多散亡。传世者有明人辑《陆士衡集》10卷。陆机极富文才，曾在晋初轰动一时，就艺术技巧而言，无论是诗、赋、论或其他杂体文，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的艺术境地。《陆士衡集》包括赋4卷、诗3卷、文2卷、杂著1卷。其《文赋》以论述创作构思为核心，附及文章体制文格、功能作用等，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其诗现存104首，入洛阳前多发国破家亡之慨，入洛阳后多抒人生离合之情，内容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真切感人。其词句工丽，间用排偶，开辟了骈俪风气，亦为近体诗之萌芽，对后代诗歌艺术技巧的提高颇有影响。

东晋别集中以《陶潜集》影响最大。陶潜，字渊明，卒后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故其文集又称《陶渊明集》或《靖节先生集》。在他生前，就曾编撰出版过诗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深爱陶潜诗文，收集其作品编成《陶渊明集》8卷。北齐阳休之又加入《五孝传》、《四八目》，合序目为10卷。《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为9卷；又云："梁五卷，录一卷。"可见其时版本已有多种。至北宋宋庠重刊为10卷，疑即阳休之本。清四库馆臣认为："昭明太子去潜世近，已不见《五孝传》、《四八目》，不以入集，阳休之何由续得？且《五孝传》、《四八目》所引《尚书》自相矛盾，决不出于一手，当必依托之文，休之误信而增



陶靖節集卷之五

雜文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

图39
《陶渊明集》书影

之。以后诸本，虽卷帙多少，次第先后，各有不同，其窜入伪作，则同一辙，实自休之所编始。”[1] 故清收入《四库全书》为萧统编8卷本。《陶渊明集》中收四言诗9首，五言诗118首，赋辞、记传赞述、疏祭文等12篇，其中以诗成就最大（图39）。陶渊明的时代文学创作一般着重追求形式的美，而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但他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其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感情的真实反映。诗中既有对当时现实社会黑暗腐朽的曲折反映，又表现了他对所不满的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反抗，使读者充分感受到了他个性之坚强和人格之高尚，对后世士人不屈服于邪恶势力有一定激励作用。陶渊明创作了大量歌咏农事的诗，为我国的诗歌艺术宝库增添了一种罕见的珍品。他融合自己心境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兼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极为精炼，独具风格，开创了田园诗一派，对唐代及后世许多诗人很有影响。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尽管他们艺术面貌各有不同，但在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图画中寄寓各自的生活情趣这一点上，都继承了陶渊明的艺术风格。另外，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显示其志行高洁，影响深远；《桃花源记》表现了对美好事物和理想的向往，已成为历史名篇。

（四）南北朝别集

南北朝时期编撰出版的别集数量也很大，但主要集中在南朝，北朝处于十分明显的弱势。

《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宋、齐、梁、陈别集共179部，合计亡书达346部。刘宋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其诗歌面貌的显著特点是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大量进入诗篇，使人为之耳目一新。这种新诗风的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出版有《谢灵运

【1】《四库全书总目》卷148《陶渊明集提要》，影印本，1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集》20卷。因承袭祖父晋车骑将军谢玄爵位康乐公，故其集亦称《谢康乐集》。原集早佚，后有明人辑本为4卷，包括赋2卷，乐府诗1卷、文1卷。其诗大多描写会稽、永嘉、庐山等地山水名胜，善于刻画自然景物，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不仅使当时的诗坛面貌一新，而且在我国诗歌史上别开生面，创立山水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比谢灵运稍晚的鲍照，也是刘宋著名的诗人。《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有《鲍照集》10卷，又注“梁六卷”，可见也不只一种版本。因他曾任临海王刘子顼参军，其集亦称《鲍参军集》。鲍照诗作或表现寒门对士族政治的不满与抨击，或写下层人民饱受战乱、徭役、压迫之苦，或抒雄心壮志，洋溢着爱国热忱，其反映的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使从建安经历阮籍、左思以来久已消沉的现实主义精神，重新发出强烈的光辉。另外在诗歌体裁方面，鲍照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把在建安时期仅仅萌芽的七言体诗，从内容到形式加以创造发展，开创了七言体诗发展的新局面。

南齐最优秀的诗人是谢朓，《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谢朓集》12卷，又有《谢朓遗集》1卷。因他曾任宣城太守，其集亦称《谢宣城集》。原集已佚，后有5卷本传世，卷1为赋、乐歌、四言诗，卷2为曲，卷3为五言诗，卷4、5为诗赋咏联句。谢朓的诗具有一种清秀俊美的风格，其诗之声律与对仗的技巧，对唐代近体诗形成与发展有深刻影响，写景状物之技巧也为唐代许多名家所倾倒。杜甫、李白都在诗中对谢朓加以赞扬，如李白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清人王士禛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足见其诗影响之大。

齐梁之际有著名的文学家江淹，《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江淹集》9卷，注云：“梁二十卷”；又有《江淹后集》10卷。说明其时已编撰出版了不同的文集，惜这些版本后均散佚。传世的有清人辑《江文通集》（江淹字文通）4卷。江淹的诗多拟古之作，对各家风格长处心领神会，摹拟酷似，然缺乏独创之处。唯有《恨赋》、《别赋》两篇新颖别致的骈文作品显示出纯

熟的艺术技巧，颇富盛名。

何逊为梁朝著名诗人，他自幼即有能诗之名，官至尚书水部郎，世称“何水部”。其友王僧孺曾辑其诗文，编为8卷出版；《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何逊集》7卷。惜两种版本均已亡佚。传世有明人辑《何水部集》1卷，收何逊诗95首，附载范云、刘孝绰同作拟古2首、联句13首，末载黄伯思跋，跋后附《七召》1篇。何逊诗题材较狭窄，多为赠答酬唱、送别伤离之作，然写来颇能婉转切情，给人清新之感，而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上尤为精妙。何诗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杜甫极为赞赏，称道“能诗何水部”（《北邻》）。

北朝别集数量与南朝相差甚远，《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北魏8部、北齐3部、北周8部，合计19部。究其原因，自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期处于争战状态，随着经济的破坏，文化亦严重低落。北魏统一北方，特别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文化才渐有起色。然就文学而言，北方质朴的社会风尚造成实用文学的倾向，文学作品不多，艺术质量也不高。直到周齐时期，才出现了有影响的作家。

北周庾信是北方文坛泰斗级的人物。字子山，初仕梁，后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其文集最早由北周滕王宇文逌编成，凡20卷。《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庾信集》21卷，因为其中杂有许多梁时旧作，有人便认为这增多的一卷乃平陈后所得的南朝旧作。两《唐书》又著录20卷，当是对隋本的重新编次。宋代官私书目并称20卷，之后原集散佚。明清庾信文集刊刻版本繁多，其中有明人屠隆评点本《庾子山集》16卷及汪士贤校刊本12卷，清人吴兆宜笺注本《庾开府集》10卷、倪璠集注本《庾子山集》16卷等。庾信诗作笔意清新，对仗工整，情感真切，色泽绮丽。晚年作品多思念故国家园，雄健苍老，颇见精神。庾信历经南北，他把南方诗歌的声律技巧传至北方，同时又改变了早年浮艳轻逸之风，吸收北方的刚健之气，是南北文学集大成者，对律诗、绝句、七古的发展都起

了重要作用。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他的《哀江南赋》是集中抒写他的身世及故国之痛的宏篇巨制，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形式的发展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这一文体的最高成就。清四库馆臣评价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1]

[1]《四库全书总目》卷148《庾开府集笺注提要》，影印本，1275—1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二、诗文评与总集的编纂和出版

总集是在别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魏晋以来，写诗撰文形成风气，编撰出版的别集日益增多。无论从文化的进步还是文学的发展来说，都需要对这些作品分析得失、评论高下、分别流派，也有必要将作品或依门类、或选精华，重新汇编，以利学习研究，广泛传播，如此总集便自然形成规模了。两晋南北朝编纂出版了大量总集，《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了这一时期总集107部，2 213卷；通计亡书合249部，5 224卷。《隋书·经籍志》总集下未再分类，考察其书目，主要包括了诗文评和作品总集两种著作，下面分别叙述。

（一）诗文评著作

《隋书》卷35《经籍志四》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这是将晋挚虞编《文章流别集》作为这一时期总集之始，著录亦排在总集第一位。该书梁时尚有60卷，隋时已残，仅存41卷，今已全亡。清严可均《全晋文》辑有部分残存的篇章，从中可看出《文章流别集》是一部分类选取文章的总集，并且对各类文体的源流、优劣以及各体裁之间的联系和差异都做了比较中肯而深刻的评述。因其重在评述作品，分清流别，故可将其作为总集中诗文评类的开创之作。继挚虞之后，东晋李充撰《翰林论》54卷。其书明确题名为"论"，可见除纂集各类文体文章外，重在评论各家文章的优劣和不同风格，是又一部诗文评类的总集。

该书至隋只存3卷，后亦早亡，仅能从严可均掇拾的残文中窥其一二。

这一时期诗文评类总集的代表作是南朝梁刘勰所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5篇，阐明文学的本源，指出文学创作取法的准则，如作者所谓“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要求一切都应本之于道，宗之于经。从《明诗》至《书记》的20篇，是论辩文体的。对于每一文体都探讨其源流，阐释其名称及含义，指出在这一文体上某些作家作品的得失，并在理论上提出创作要点。下部，除了最后一篇《序志》为全书的序言，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外，其余可分为两类。其中《体性》、《指瑕》、《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6篇是关于文学批评的，涉及到作家作品及时代风气，以至批评态度和方法等诸多问题。其余则是讨论创作问题的，大致看来，有关于构思的，如《神思》、《养气》等2篇；有关于结构布局的，如《定势》、《镕裁》、《附会》、《总术》等4篇；有关于表现方法原则的，如《风骨》、《通变》、《情采》、《比兴》、《夸饰》、《隐秀》、《物色》等7篇；有关于形式技巧的，如《章句》、《声律》、《丽辞》、《事类》、《炼字》等5篇。下部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各篇性质只是就其主要内容而区分，其实在绝大部分篇幅中都是兼包创作和批评两个方面。《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这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而且见识卓越，论述详审，笔调精美，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巨著（图40）。

图40
《文心雕龙》书影



《文心雕龙》的文学观点和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强调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原则。刘勰认为文学是受当时客观的社会现实制约的，因此在《时序》篇中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状况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历史根源。例如，论《诗经》是“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论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论晋代诗赋，指明“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最后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刘勰强调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出发来理解文学的变化，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观点校正了曹丕、陆机等过分突出文学家天才的偏颇，也是他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其二，提出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主张。在《情采》篇中，刘勰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并且揭露了两晋、刘宋以来许多作家“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清高面目。在《风骨》篇中，十分强调文章要有风骨：“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群，负声无力”。这是反复说明文学作品必须先有思想然后可以述情，先有事义然后可以铺辞。同时，刘勰也强调文学作品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而“空骋其华”（《议对》）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那些“衔华而佩实”（《征圣》）的文章才是理想的作品。刘勰倡导的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主张，不仅奠定了后代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其三，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刘勰明确反对秦汉以来文学批评“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

等错误倾向，认为正确的批评态度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并且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关于如何评价作品，他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立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条包含了文章体裁、遣词造句、继承创新、表现手法、事理用典、声律韵律等，就文学作品的形式而言已较全面。至于内容，刘勰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亦言之成理。因而可以说，《文心雕龙》已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文心雕龙》也有不足之处，如这一时期很有成就的文学家陶潜和鲍照，在书中未加评述，似欠全面，这当是儒家正统思想及当时门阀观念影响文学批评而形成偏见所致。

《文心雕龙》编撰完成后就受到当时文史学家沈约的赞赏，认为此书深得文理。他常常把《文心雕龙》置于几案随时阅读。出版后便在士林中广为传播。《隋书·经籍志》及两《唐书》均著录《文心雕龙》10卷，与后来传世者相同，说明由于其深受学界珍视而得以完整流传至今。

钟嵘《诗品》又名《诗评》，《隋书》卷35《经籍志四》即著录为《诗评》3卷，这是因为其内容除了品第等级之外，还对作家作品的优劣进行了评论。《诗品》所论范围只限于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包括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针对当时许多重要的创作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他对当时诗歌发展中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声律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为了扫清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束缚和障碍，使之步入平坦的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诗经》以来的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钟嵘专以五言诗而撰《诗品》，

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进行探讨，指出五言诗正方兴未艾，这就为五言诗的发展和进步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现代学者认为，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1]。他评论诗歌风格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喻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如在序里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说张协诗“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也是着眼于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如在序里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诗句的例子。此外，钟嵘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但钟嵘在《诗品》中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不能恰当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如他把陆机、潘岳放在上品，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而曹操置于下品，研究者多不以为然。另外，他论诗过分强调历史传承关系，对现实生活影响作家之处有所忽视，而且直说某诗源出于某人某体，把传承关系看得太简单，难免牵强臆断。尽管《诗品》存在缺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创性的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的诗歌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徒，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上，都

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二) 诗文总集

汇集多人诗文编纂成册，是总集的主要类型，其中有按体裁分别编纂的，也有综合各种体裁汇编于一书的。单选一种文学体裁的作品，易于成编，故《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的总集以此类为主。其中有文集，如《吴朝士文集》13卷、孔逭《文苑》100卷等；有赋集，如谢灵运《赋集》92卷、梁武帝《历代赋》10卷等；有诗集，如谢灵运《诗集》50卷、徐陵《玉台新咏》10卷等；有乐府歌辞集，如秦伯文《乐府歌诗》20卷、崔子发《乐府新歌》10卷等；有箴铭集，如《箴集》16卷、张湛《古今箴铭集》14卷等；有诫鉴集，如綦母邃《诫林》3卷、徐湛之《妇人训诫集》11卷等；有论赞集，如《画赞》5卷、谢庄《赞集》5卷等；有碑文集，如《杂碑集》29卷、陈勰《碑文》15卷等；有诏书集，如《晋朝杂诏》9卷、《宋永初杂诏》13卷等；有上表集，如虞和《上法书表》1卷、陈长寿《魏名臣奏》30卷等；有露布檄文集，如《杂露布》12卷、《杂檄文》17卷等；有启事集，如《山公启事》3卷、《范宁启事》10卷等；有书函集，如王履《书集》88卷、徐爰《杂逸书》6卷等；有对策集，如《孝秀对策》12卷、殷仲堪《策集》1卷等；有诽谐文集，如袁淑《诽谐文》10卷，及《续诽谐文集》10卷等。有些体裁下还有划分更细的专集，如赋即有《三都赋》、《述征赋》、《神雀赋》、《围棋赋》、《观象赋》、《洛神赋》、《枕赋》、《海赋》、《射雉赋》等专题集。总之品类很多，无所不包。

综合类诗文总集以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最具代表性。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于天监元年（502年）被立为皇太子，死后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能诗能文，著述较多，有《昭明太子集》传世。史载，萧统以东宫太子之尊而喜爱收集图书，交结文士。《梁书》卷8《萧统传》说他“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

以来未之有也。”《文选》就是萧统延集文人学士编订的一部文章选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全书30卷，收录周代至梁朝（不含当时在世者）七八百年间130位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七百余篇。萧统按文章体裁将所选诗文分为三十七类，即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戕、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有的类又分有多个子目，如赋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类；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二十二类。这些类目基本上是以赋诗内容划分的，从体裁角度看未尽科学合理，但编辑总集注重体裁分类是理所当然的，这有助于强化文献分类意识，对推动文学体裁的研究与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图41）。

《文选》选编诗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划定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明了自己编辑《文选》的原因：“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如此多的作品，都收集在一起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才能达到“兼功太半”的效果。至于选文的标准，他认为经、史、子书都是以立意记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那些“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章，才是他编选的范畴。这样，他就把哲学论辩、史籍记事和一些应用文章摒弃于文学作品之外，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构思

图41
《文选》书影



和词句华美的特征。这种区分未必恰当，但划定文学范畴，明确文学概念，是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这种大胆尝试，有利于促进对文学作品性质认识的深化，很有积极意义，应予肯定。二是采用了略古详今和偏重文采的原则。《文选》中入选的作品，以晋宋以来最多，周秦、两汉文章入选者较少，这是与文学的发展与作品多寡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萧统特别强调作品的文采，所以在选文中辞藻华丽、声律和谐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赋就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诗歌方面也较多地选录了格律比较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的作品，而对于诸如南朝“吴歌”、“西曲”和北朝民歌等均摒弃不录。这说明萧统的文学主张是深受当时文风影响的。另外，《文选》中还存在着因考证不精，收入伪作的情况。尽管如此，《文选》所选诗文大多数仍然是文学史上的佳作，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初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基本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资料。

《文选》的编撰成书，结束了秦汉以前文学被经学吞吃的局面，意味着文学的独立和勃起，出版后受到普遍的重视，影响深远。南朝末，即有萧该编撰《文选音》3卷出版，之后论家不断。隋唐之际曹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以至研治《文选》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旧唐书·儒学传上·曹宪》云：“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现存最早且影响最大的是唐李善《文选注》60卷。李善学问渊博，注《文选》用力甚巨，数易其稿而成。其中所引书籍多达1 680余种，此前的许多亡佚之书都赖以存其片段，有“考证之资粮”的美称，以至研究李善注本身也成了“文选学”的重要内容。唐代因科举以诗赋取士，注重文采，《文选》便成了读书人的案头必备书。杜甫把此书作为教授儿子的课本，还告诫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宋代开始还有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总之，《文选》的出版标志着总集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文

化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五节　佛经的译撰和出版

佛教起源于印度，大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之末，它并未能引起统治者足够的重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的，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玄学家宣扬老、庄思想，主张逃避现实，无为而治，认为万物以无为本。而佛教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在思想上与玄学一致，其时佛教名僧亦常与玄学名士交往，多能清谈，所以受到士大夫欢迎。在分裂割据、军阀混战时期，佛教因果报应和彼岸世界的教义迎合了处于动乱中的广大民众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佛教有时甚至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因此便迅速传播开来，盛行一时。佛教是外来宗教，印度的佛经只有译成汉文才能为汉人阅读和接受，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佛经的译介和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影响的日益加深，也编撰和出版了一批关于佛教史事的著作。下面分别记述。

一、佛经的翻译和出版

正式见于史籍记载的佛经翻译，大约是在东汉末桓帝、灵帝时期。这时佛经翻译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安息人安世高为代表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二是以月支人支谶为代表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其时翻译佛经的数量尚少，魏晋南北朝翻译和出版佛经逐渐形成风气，数量才日益增加。《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的佛教典籍有："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经。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小乘经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杂经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杂经目残缺甚，见数如此。）杂疑经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

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讲疏。）杂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论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三十部，九十四卷，论。十五部，四十七卷，疏。）小乘论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论。十部，七十六卷，讲疏。）杂论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二部，三百九十九卷，论。九部，一百三十八卷，讲疏。）记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共计“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1]。可见魏晋南北朝翻译出版的佛经已包括多种品类，且数量巨大（图42）。这一时期的译经活动及佛教著作的编撰出版，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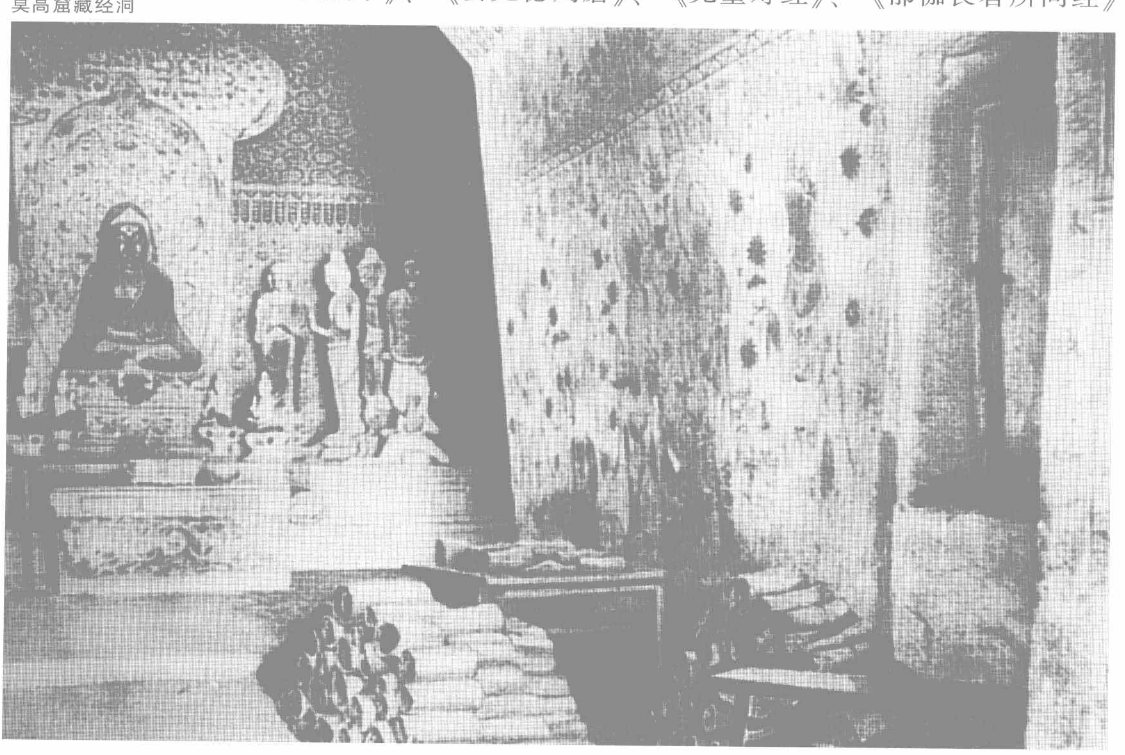
【1】《隋书》卷35《经籍志四》。

（一）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都城洛阳、孙吴都城建业（今南京）及陪都武昌，都有著名的佛学大师主持佛教典籍的翻译整理工作。

洛阳有昙摩迦罗及昙谛、康僧铠等人，先后将梵文佛典《僧祇戒本》、《昙无德羯磨》、《无量寿经》、《郁伽长者所问经》

图42
莫高窟藏经洞



等译成汉文出版。昙摩迦罗是古印度僧人，据《高僧传》载，嘉平二年（250年）来到洛阳，应僧人之请翻译的《僧祇戒本》是大众部戒律节要，包括比丘戒法和比丘尼戒法等内容。他还在中国首创了授戒度僧的僧法制度。

孙吴翻译佛经者，则以支谦和康僧会最有名。支谦，原籍西域月支，其祖父法度在汉灵帝时率数百人归汉，官拜率善中郎将，故他出生于汉土。支谦天资聪敏，学识宏博，备通六国语言，师承支谶、支亮学大乘理论。后因中原丧乱，迁居吴国，孙权闻其才学，拜为博士。在吴居三十余年间，致力于翻译佛经事业，先后译出大小乘经典36部，48卷。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等。又译注了《了本生死经》等；并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作了《赞菩萨连句呗》三契，流行于世，使歌颂佛德时伴以抑扬顿挫之声，或佐以管弦钟鼓之声。支谦主要阐扬佛教般若学，主明本，特重般若智慧，由智慧证体达本。所译经典辞旨文雅华丽，开中国佛教玄学化之先河，深得后世佛徒赞许。康僧会祖籍康居，世居天竺，因其父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双亲并亡，遂出家为僧，从师学佛教义理。后到建业，孙权为之立建初寺，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最有名的寺院。他居建业三十三年，此间先后翻译出《小品》（即《吴品》）、《六度集经》二部14卷，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康僧会所传为安世高小乘佛学，主张养生成神，其说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总之，三国时期佛教得到一定发展，也翻译出版了一些佛经，但此时的译经者还仅限于印度及西域僧人，佛经的传播还不够广泛。

（二）两晋十六国时期

两晋十六国，佛教陡然兴盛，寺庙林立，佛徒骤增，进入大发展时期（图43）。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社会动乱，民生凋敝，广大民众哀苦无告，而佛教的善福报应和生死轮回之说成为麻痹精神的良药，故民间信仰佛教者日多。二是魏晋玄学的虚无与佛



图43
十六国弥勒菩萨（敦煌275窟）

学的空无在哲学上同属唯心主义体系，其思想学说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二者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依靠，互为补充，故公卿名士赞誉佛教者日众，佛学与玄学日趋合流，遂使佛教日益兴盛。三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大多信服崇敬名僧，重视提倡佛教，这也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这一时期，在立志弘扬佛法的高僧的带动下，佛经之翻译、注经之盛行、教义之发扬蔚然成风，大有压倒儒学的势头。当然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佛教和佛学理论已有了逐渐中国化的倾向。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佛经，也涌现出许多佛学大师。西晋时有月支僧人竺法护，世居敦煌郡，世称“敦煌菩萨”。他师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随师漫游古西域各地，号称精通三十六国语言。自晋武帝太始二年（266年）至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先后游历敦煌、长安、洛阳等地，沿途传译佛经，有《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文殊师利净律经》、《正法华经》、《大哀经》等154部，309卷，大部分属大乘经典。东晋时有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以精于禅定与戒律闻名，应中国僧人智严之请从海道来华。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到长安，弘传禅学。后南赴庐山，与慧远相会，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义熙十一年（415年）至建康（今南京），后与法显、法业等在道场寺先后译出《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新无量寿经》、《大方等如来藏经》等共13部，125卷。他所传译的禅法经籍对稍后出现的大乘瑜伽学说有一定影响。

东晋负有盛名的中国佛学大师是释道安。他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12岁出家，师事佛图澄十余年，常代师讲

经。后到襄阳传法15年，讲习《放光般若经》，考校译本，制定寺规，维护了佛教的严肃性和纯洁性。此前曾两次分散徒众，传法四方，对佛教的发展产生强大影响。后受苻坚延请，住长安五重寺，主领数千人的大道场，组织译经（图44）。他深知翻译和注释佛经的困难，总结出译经存在着“五失本三不易”(指译文五种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况和三种不易表达佛经原意的情形)，对以后的译经具有指导意义。为了使翻译的经典能保持本真和通俗，他强调求实和质朴，尽量做到“不令有损言游字”。因此，除了组织中土的弟子门人从事译经外，还敦请僧伽提婆等许多胡僧协助翻译。在他主持下，译出《道行品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等大量佛经。他还撰有《光赞折中解》、《光赞抄解》、《实相义》、《性空论》等研究般若学的著作。并将所见佛经编写出《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书。释道安集印度佛学之大成，逐渐使之中国化，他将当时印度佛学主要的禅法和般若两系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创立了“本无宗”，对玄佛合流和佛教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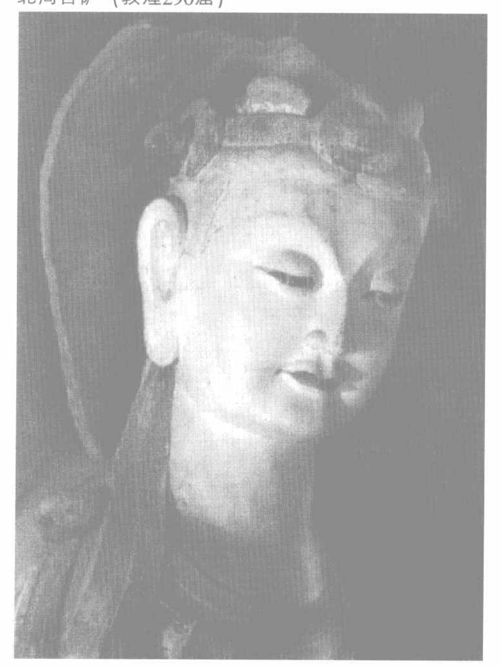
图44
东晋《光明经》抄本

这一时期译经成就最大的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且依时序排在首位。他祖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7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后遇莎车国大乘名僧须利即苏摩，改学大乘。他博读大小乘经论，名闻西域诸国。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王姚兴派人迎罗什至长安（今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姚兴的支持下，开始了规模宏大的译经事业。当时参加助译的约有三五千人，著名者数十人，其中道生、僧肇、道融、僧叡，被称为“什门四圣”；“四圣”加道恒、昙影、慧观、

慧严称为“什门八俊”。经过13年的努力，据《开元释教录》所载，共译出佛教经典74部，384卷（《出三藏记集》记为35部294卷）。其中至为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这些经、论后来都成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也是大乘各教派的主要依据。如三论（即《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成为“三论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则为成实学派的主要学说，《阿弥陀经》为后来“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华严经》（图45）开“天台宗”绪端，《金刚经》启发慧能禅宗。另外，过去所译诸经，“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即由于直译而使译经与原经的宗旨多有乖违。而罗什主持下译出的诸经，既能符合原经的旨趣，又与中国固有的思想、语言相应，做到义意圆通。因此“众心惬服，莫不欣赏”，对于佛教和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图46）。

图45
北魏《华严经》抄本

图46
北周菩萨（敦煌290窟）



这里还应提到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对佛学的贡献。僧肇，俗姓张，东晋京兆长安（今西安）人，曾参与罗什的译经工作。他对罗什的般若学说有深刻的领会，在此基础上，他总结批评魏晋时期般若学的各家观点，系统地建立自己的般若学说，撰写了一部重要的佛学著作《肇论》。该书卷首《宗本义》概括全书大意，然后载四篇论文：《物不迁论》发挥般若思想，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论证世界万物看似变化而实际没有变化的道理，所谓“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变化的只是假相；《不真空论》从正面阐述般若学说，认为世界万物由因缘和合而成，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虽无而有，虽有而无，非有非无，本质是空；《般若无知论》着重论述佛教的般若智慧不同于世俗的智慧，般若对世俗认识而言是“无知”，对佛教教义而言则是“无所不知”；《涅槃无名论》主要阐述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的无生无灭，永恒真实。《肇论》把魏晋般若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佛教在理论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学逐渐摆脱了对玄学的依附，走上独立的道路，为隋唐佛教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东晋末刘宋初著名的佛学家竺道生。竺道生，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15岁便登讲座，当时才僧名士皆服其精致。曾辅佐鸠摩罗什译经，居于“什门四圣”之首，后居庐山讲演《涅槃经》。他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维摩经义疏》、《妙法莲花经》、《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辨佛性义》等。在道生之前，翻译佛经主要有三个系统，即僧伽提婆弘阐的《毗昙》、鸠摩罗什倡导的般若学三论和昙无谶所译的《涅槃经》。竺道生集三者之大成，对涅槃学更是深有所得，被后世誉为“涅槃圣”。他的突出贡献，是其佛学理论摆脱了玄学色彩，使佛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把大乘佛教的般若学与涅槃学结合起来，提出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让人人都能成佛，而且只要马上觉悟便能立即成佛，扩大了宗教弘扬的对象和范围，使中国佛学发展到强调“心识”即内心修养的新阶段。因此，后代一些佛学家认为竺道生是中国佛学的第一代表人物。

南朝翻译佛经成果最多的，是被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位列第二的真谛。真谛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后至扶南（今柬埔寨），大同元年（546年），应梁武帝邀请到达南海（今广州）。两

年后辗转游历今苏、浙、赣、闽各地，沿途从事译经。最后又到广州，在广州刺史欧阳颜父子支持下，与弟子专心译经。从梁武帝末至陈太建元年（569年），共译经论纪传64部278卷。其中主要有《十七地论》、《金光明经》、《天上依经》、《仁王般若经》、《广义法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释》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瑜伽行派思想。所译《摄大乘论》影响最大，是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所译《大乘起信论》出版后，多以此书为大乘佛教入门读物，流传较广，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南朝佛教在梁武帝当政的几十年间达到全盛时期。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不仅常于寺院讲习佛经，还编撰出版了大量有关佛经的论著。主要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101卷、《大品注解》50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12卷、《制旨大集经讲疏》16卷，以及《三慧注讲疏》、《净名经义记》、《立神明成佛义记》等；并为僧宝亮所著《涅槃经义疏》作《序》，又敕僧朗撰《涅槃经集注》72卷。梁武帝还于天监年间（502—519年）先后两次命众僧整理佛教典籍，并据此编成《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和《梁世众经目录》二书，共著录佛教典籍1 400余部，3 700余卷。

北朝佛教不崇尚虚玄高深的理论，而强调具体的修行，故佛经的翻译及佛教著作的撰述不及南朝。但出版流行的佛教典籍亦不在少数。北魏孝武帝元脩当政时，曾命属官整理北方流传的佛教典籍，编订《魏世众经目录》，共收入佛教典籍400余部，2 000余卷。

二、中土佛教史籍的编撰和出版

自晋代始，随着佛教的发展，对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也相应产生了一批记载佛教典籍、人物、寺庙以及发展史事的相关著作。这也是当时图书出版门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关于佛教典籍的著作

这一时期，有关佛教经籍以及研究佛教文献的汇编类著作，主要有《弘明集》和《出三藏记集》，两书作者均为南朝梁僧祐。《弘明集》14卷，该书《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全书辑录东汉末至南朝梁百人有关佛教的论著，多为书启论述之文，旨在弘扬佛教。其选文编排不按时代顺序，也不按文体分类，而是依文章内容区分。其书多选信佛、排佛间的辩论文章，希望通过辩论"弘道明教"，而辩论每每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论题，故文章大体是根据辩论的问题分类的。这样很方便从收录的文章了解印度佛教初传中国后思想界争论的情况，其中引起争论的问题主要有：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华夷之辨、沙门是否应敬王者、拜父母、出家在家、生死、神形、教化等。因其注重论辩，故所收文章包括两方观点。如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论题，不仅收了范缜著名的《神灭论》和《答曹思文难神灭论》，而且还收了萧琛、曹思文难"神灭论"的文章，与此同时又收了梁武帝《敕答臣下神灭论》以及释法云《与王公朝贵书》，并附有编辑的柳澄、司马褧、谢绰等62人难"神灭论"的言论。这就使后世有可能了解梁代朝野展开的一场崇神、灭神的大辩论的概貌，进一步认识范缜《神灭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另外，书中所载牟子《理惑论》、宋炳《明佛论》、宋屈《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郑道子《神不灭论》、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均为研究中国佛教历史的重要资料。《弘明集》保存的重要文献还很多，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1] 该书对后世影响较大，唐《广弘明集》即步其后尘而作，清严可均《全梁文》也于此书多所采录。

【1】《四库全书总目》卷145《弘明集提要》，影印本，12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15卷，或析为17卷，是佛教经录。"出"即翻译，"三藏"即经、律、论，"记集"即东汉至梁中土所译经、律、论的目录、序记以及译经人的生平传记等。书前有序，后分四部分：一为《撰缘记》1卷，记载佛教三藏及

译经起源；二为《铨名录》4卷，记载东汉末至梁历代译经目录，以时代、撰者分类，又记异译经、古译经、失译名经、抄经、疑伪经、注经及律部，共2 162部，5 310卷；三为《总经序》7卷，共收经前序和后记120篇；四为《述列传》3卷，即译经人传记，立传者32人，其中中土人10名。所记内容尤以南朝译经颇详。僧祐以前的经录多散佚，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簿录体佛教目录解题著作，其中还保存有道安的经录原文。书中所载诸经序、后记，为考见中土译经经过与内容及其时间、地点的重要资料。书中涉及到僧人所交帝王士庶等世俗人物，可补裴松之《三国志注》者颇多。后人辑录文编，补作史志，从中多所采取（图47）。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407—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二）关于佛教人物的著作

这一时期，随着佛徒数量的增加，名僧影响的扩大，还编撰出版了一些佛教人物传记类的著作。有一人之传，如《佛图澄传》、《支遁传》等；有一类僧人之传，如竺法济《高逸沙门传》1卷、释法安《志节传》5卷等；有一时一地僧人之传，如郗超《东山僧传》、张孝秀《庐山僧传》等；有尼传，如释宝唱《比丘尼传》4卷等；有感应传，如王延秀《感应传》8卷、陆杲《观音应验记》等；有通录僧人之传，如裴子野《众僧传》20卷、虞孝敬《高僧传》6卷等[1]。

图47
西魏飞天壁画（敦煌249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释慧皎是佛教史学家，因对宝唱《名僧传》等前人僧传不满，遂于天监十八年（519年）撰成《高僧传》出版。其序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

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高僧传》亦称《梁高僧传》，共14卷，分为十个门类：一译经，3卷；二义解，5卷；三神异，2卷；四习禅，五明律，合为1卷；六亡身，七诵经，合为1卷；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合为1卷；另序录1卷。记载僧人从东汉末至梁初共计257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其材料来源十分广泛，如慧皎自序所说：“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纪，并博咨故老，广访贤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所载僧人的生平事迹，包括译经注经、讲说论辩、师传嗣法等情况，对研究中国佛教史有很高价值。其中诸如支道林、竺法深、康法畅、释昙迁及王曼颖等人事迹，多可补订考史。不足之处是北朝僧人有欠搜罗，立传未备。《高僧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僧人传记，对后世影响很大，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宋赞宁撰《宋高僧传》、明如惺撰《大明高僧传》都大致依其体例。以上四书合称为“四朝高僧传”，是研究中国佛教人物及佛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而慧皎则有着开创之功（图48）。

（三）其他佛教史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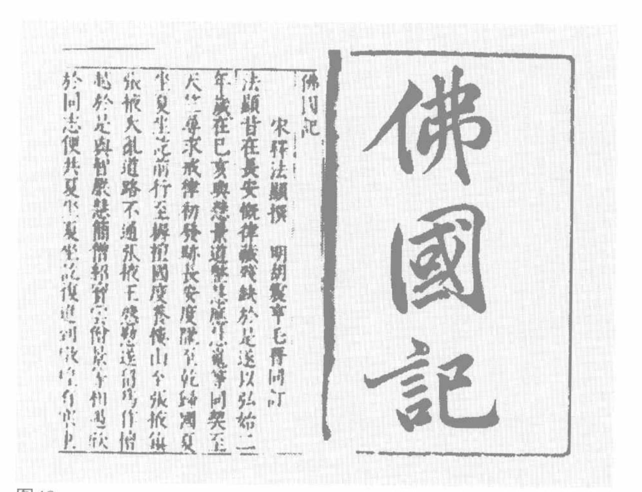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还编撰出版了许多关于佛教的其他著作，有专记佛教史事的，如南齐竟陵王《三宝记传》、北周净蔼《三宝集》等；有记各地寺塔的，如南齐刘悛《益部寺记》、梁刘璆《京师寺塔记》等；有僧人西行所记外国传志，如北凉法盛《历国传》、刘宋道普《游履异域传》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东晋法显《佛国记》和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佛国记》又名《高僧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法显游天竺

图48
西魏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壁画（敦煌285窟）



记》、《法显行传》、《三十国记》等，国外或称《法显佛国行记》。法显是东晋一位诚笃矢志的佛教名僧，“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真本。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与慧景、道整等人自长安西行，至天竺寻求戒律经典，历时十三四年，后由海路返回。他是我国和世界上著名的探险家和旅行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可考的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大约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法显编撰出版了《佛国记》（图49）。书中不仅记录有天竺各国所传佛陀的本生故事和佛陀周游各地传教的事迹，还记载了他亲身所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道里、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状况和宗教、典章、风俗、寺庙、古迹等社会生活见闻。这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最早记录，所述关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诸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举世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佛國記

佛國記
宋釋法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
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
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
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
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殷勤遂留爲作檀
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
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

图49
东晋法显《佛国记》书影

《佛国记》的出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北魏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就对《佛国记》中的材料多有引用。近人岑仲勉所著《佛游天竺记考释》和贺昌群所著《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都是在研究《佛国记》的基础上撰写成的。《佛国记》除在我国得到较高评价外，在外国也广为流传，深受学界重视。已有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国外出版。诸如印度学者恩·克·辛哈《印度通史》，以及法国伯希和、德国夏德、苏联阿瓦林、美国洛克希尔等人的著作中一再提及，并引用其内容；《大英百科全书》中亦有法显和《佛国记》的专条；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还写出了《法显传考证》一书。

《洛阳伽蓝记》的写作起因，杨衒之在自序中有明确交待：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杨衒之因公出差重返洛阳，见到这座曾

繁盛一时的都城经过永熙之乱后，已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的一片凄凉景象。他抚今忆昔，不胜“黍离之悲”。为了寄托对北魏王朝覆亡的哀悼，以及谴责王公贵族“损费金碧”、“侵渔百姓”的行径，便以伽蓝（即佛寺）的兴废为题，写成了这部《洛阳伽蓝记》。全书共5卷，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1卷。内载奢华壮丽的佛寺四十余座，并在《序》中提及，当初“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足可看出北魏佛教之盛。所记佛寺及洛阳建置、结构、宫殿、官署、城门、里坊、名胜，清晰细致，十分具体，每多可据。如对永宁寺佛塔的描述：“中有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屠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屠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屠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其十二门二十四窗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洛阳伽蓝记》每卷下以著名佛寺的盛衰兴废为纲目，还兼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人物、风俗、地理、苑囿、建筑、传闻故事，多为实录，间以小说寄托讽喻。如在卷四《法云寺》所记洛阳大市，反映了当时洛阳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景况：“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

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辆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另对北魏高祖迁洛、女主临朝，宣武以来朝中变乱、诸王废立、阉宦用事、权臣专政、南北关系、文人学者事迹以及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外国僧人活动和佛教对民间的影响等巨细毕陈。不但是重要的佛教史籍，也可补《魏书》、《北史》等正史之缺，或与之相互参证。书中还首次记录了北魏佛教徒宋云、惠生经西域及中亚各国至印度取经求法的史事，并附录了他们所写的《家记》和《行记》，是极为珍贵的古代中西交通史及佛教史的文献。总之，《洛阳伽蓝记》内容丰富，叙事可信，出版后广泛传播，深为后世所重，一直流传至今。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重要人物和事迹

第一节　编撰家和翻译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的大量应用，图书的复制呈现规模化的趋向，出现了抄书谋生的佣书人，也有了买卖图书的书肆，但以营利为目的，把图书作为产品长期生产的专门机构并未出现，图书出版尚未真正实现产业化，创作、编辑、复制、发行这四个出版环节还没有因为专业化而彼此分离，尤其是创作和编辑处于合一的状态，作者不仅是书的构思者、执笔者，同时也是书的内容和格式的把关者，甚至是书的复制者，一本书的创作和出版过程均由作者自己完成。

另外，这个时期纯粹出于主观虚构，完全凭借个人想象力、人生阅历和语言技巧而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比较丰富，但不占图书的主流，当时最为繁荣、最有代表性、流通最广的是经史及其注疏一类的著作，而这类著作以广征博引为特点，写作必须有所凭借，体裁本身就有编的性质，所以作者不仅要有杰出的文学才能，能够以优美的文笔表达识见，还要有突出的编辑才能，能够以清晰的思路取舍材料。

基于以上原因，这个时期鲜有以加工著作为专责的现代意义

上的编辑家，多是全过程参与图书生产的编撰家和翻译家，他们既是天才的创造者，又是一丝不苟的编辑者，还是严谨认真的学者。

一、编撰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述丰富，编撰家灿若列星，难以尽举，下面按照魏晋、南朝、北朝的顺序，略述几位最有代表性的编撰家的事迹。

(一) 陈寿及其《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郡安汉（今南充市）人。年轻时十分好学，拜同郡学者散骑常侍谯周为师，研读过《尚书》和《春秋》三传，对《史记》和《汉书》尤为精通，聪明机智，富有文采。仕蜀时任过观阁令史、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皆曲意奉承，唯独陈寿不屈服盲从，由是屡被谴黜。到晋灭蜀时，司空张华特别欣赏陈寿的才华，推举他为孝廉。陈寿撰写的《益部耆旧传》，得到了晋武帝赞赏，被升为佐著作郎，不久调任阳平令。陈寿接着着手收集整理诸葛亮的史料，于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24卷，共十多万字。公元280年开始撰写三国史书，历时15年终于撰成《魏》、《蜀》、《吴》三书，后人合称《三国志》。《三国志》写成后得到了广泛赞誉，人们认为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学者夏侯湛也在写魏史，读了陈寿的《魏书》，自愧不如，便毁掉草稿，断了写《魏书》的念头。张华对《三国志》的评价很高，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来写。陈寿一生著作颇丰，除前述外，还有《古国志》等，可惜多数散佚，只有《三国志》保存完好，流传至今。《三国志》基本属于纪传体史书，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三国志》成书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

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陈寿自采资料撰写而成。

《三国志》的编撰特点是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陈寿作为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出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人们在赞誉陈寿的史才之外，对他也有一些批评性的看法，如《晋书》卷82《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这里揭露陈寿竟然以为其父立传为诱饵，向丁仪、丁廙的儿子索要千斛米，并因为自己的父亲曾为马谡部属，在诸葛亮斩马谡时受到牵连，自己在朝又被诸葛瞻所轻视，所以对诸葛亮和诸葛瞻都抱有成见，不惜在著作中贬低他们。实际上对陈寿的这些责备都缺乏充分的根据。陈寿虽然没有为丁仪、丁廙兄弟单独列传，但他们的传记附见于《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则对诸葛亮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实际上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明显加以粉饰，多所回护，这才是其受时代局限之处。

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风云人物，以及在学术、文学、艺术、科技领域有贡献的人，都在《三国志》中被比较忠实地记录下来，此外《三国志》还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书·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的一个缺陷是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由于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偏于简略，所以还有人认为《三国志》"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二）范晔及其《后汉书》

范晔（398—446），字蔚宗，小字博，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西晋“永嘉之乱”后随家族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范晔的高祖范晷、曾祖范汪、祖父范宁、父亲范泰均在朝为官，且各有著述，家学渊源深厚。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自幼好学，加上天资聪慧，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范晔17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辞而未就。公元420年，23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等多种职务。

范晔颇有魏晋名士的风度，行事越名教而任自然，率性冲动，他一生当中的两次大挫折皆与不守丧礼有关。第一次是在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去世。刘义康把范晔等故僚召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照理说上司失去了母亲，作为下属至少在表面上应该装作悲伤，表示同情。可是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刘母临葬的前一天晚上，轮到范晔和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竟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酒。醉意朦胧之际，范晔一时忘了利害，竟推开窗子，以挽歌助酒。这件事被刘义康得知后，极为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贬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隐痛。范晔虽然生于名门，但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更不幸的是，范晔是在厕所里出生的，一落地就碰伤了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叫“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他，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生而不幸与宦海失意，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痛苦。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35岁那年他终于写成了传世名作《后汉书》。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东汉196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其中的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谁知谢俨搜撰完毕，却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续汉书》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后汉书》采用的体裁是纪传体，虽然大部分沿袭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结合东汉历史的具体特点，在编撰方法和叙述策略上又有所创新。

首先，《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目的是“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表明了范晔以史资政的历史观。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言简意赅，用意很深。

其次，范晔根据东汉历史的实际情况，大胆突破《史记》、《汉书》的体例，首创一批新的纪、传，表现出卓越的识见和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例如，他在帝纪之后增设了皇后纪。因为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位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他还在《后汉书》中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等七个类传。类传《文苑》反映了汉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第一次把文学家从经学家和史学家中分离出来，将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承认文学家群体的存在，提高了文学家的地位。类传《列女》的增设也是破天荒之举，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的收录原则是“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

不必专在一操而已”。所收录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多次改嫁，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此外，《党锢传》、《宦官传》也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

由于《后汉书》是范晔私撰著作，不完全受制于官方意志，有一定的个人发挥空间，因而较多地体现了范晔个人的思想倾向。例如，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后汉书》里，佛教的虚妄被给予猛烈的抨击。范晔对治国之道有不同的看法，同情思想上的叛逆者，因而在《窦宪传论》中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抨击黑暗政治。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则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同情和歌颂正义。范晔钦佩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所以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范晔对灵异的事情不排斥，所以《后汉书》也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如《方术传》中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和栾巴的潠酒灭火等都被描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范晔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所以《后汉书》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但有的时候，过于重文，对于史料删削过甚，原本翔实生动的史料，到了范晔那里只剩下文笔优美的寥寥几句，过滤掉了太多的信息，有些可惜。

范晔《后汉书》的编撰主要完成于宣城任上，按照刘宋初年六年一任的官吏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438年），范晔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次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由于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再一次因违反礼教，受到弹劾。宋文帝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

音乐，长于隶书。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弹琵琶的技艺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有意欣赏，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却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话说到这份上，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可是等宋文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演奏，竟不肯多奏一曲。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上朝，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同进去。然而同僚对他从来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当然沈演之入朝向来也没有等范晔的习惯。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暗心术，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针对各个同僚的特点，将他们分别比作"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自然为同僚所不容。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彭城王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且负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自然成了他们网罗党羽时所注意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他频致歉意。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446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后汉书》十分自负，认为它"精意深旨"，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逊色，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的

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1] 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2]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后汉书》外，范晔的遗著尚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俱见《隋书·经籍志》。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上述各书，今皆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见《艺文类聚》卷90；《乐游应诏诗》一首，见《文选》卷2。

（三）刘义庆及其《世说新语》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本为刘道怜之子，后过继给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刘义庆一生仕途顺利，步步擢升,历任要职，做过豫州刺史、散骑常侍、度支尚书、辅国将军、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领过军，管过财，掌过文书，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宗室表率。刘义庆爱好文学，善于交游，在军政活动中每到一地都能与当地有名的文士打成一片，并热情地推荐他们入朝做官，因而在文士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只要是他出面召聚，文士们往往近远毕至。刘义庆只活了42岁，生命中的大部分都忙于政治，撰文编书充其量只能说是生活中的副产品，但署名刘义庆的一本书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比其生命中其他贡献更能为其赢得不朽，这本书就是《世说新语》。

从史学角度看，《世说新语》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在品评人物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该书原名《世说》，由于汉代的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了将此书与刘向的书相区别，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为《世说新语》。该书原为八卷，梁朝的刘峻为其作注后，增为十

【1】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2】刘知几：《史通》卷5《补注篇》，卷8《书事篇》。

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还有一些记载了晋司马氏的暴政、豪门士族的享乐生活，此外还有称颂好人好事的内容。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基本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很高。

从文学的角度看，《世说新语》可以说是中国笔记小说、轶事小说的雏形，《隋书》卷34《经籍志三》将其列入小说家是有道理的。该书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记言叙事巧妙结合，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世说新语》作为比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初创时期的“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书中的许多故事常被后代作家作为创作素材加以利用。如果没有《世说新语》，后人对南北朝的社会风情和人物风采的感性认识不知将会减少多少。

一般认为，《世说新语》非刘义庆独著，而是由其门下聚集的文人学士共同完成的，这些门人仿效前人裴启的《语林》的编撰方式，合力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该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明显的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看来刘义庆还是尽了主编之力。

(四)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时称南东莞，今江苏镇江）。刘勰的生卒年，难以确考。关于他的身世，《梁书》卷50《文学下·刘勰传》中有简略记载。刘勰少年孤苦，家境贫寒没有婚娶，依于沙门僧祐，在定林寺度过了十年。因为笃志好学，刘勰在寺中遍览经书、精通佛典，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同时刘勰对儒、道亦不排斥，在思想上表现出儒、释、道三者合一的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他在三十多岁时“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梦见一回孔夫子，便兴奋得不得了，可见刘勰对儒学尤为崇尚。刘勰在梁武帝时出仕，历任奉朝请、东宫

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职，为萧统及文士沈约所重。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南齐末年，刘勰编撰成《文心雕龙》五十篇，涉及文学创作的多方面问题，创见迭出，是我国古代系统的文学理论名著，刘勰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

《文心雕龙》书名中的“文心”的意思是“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的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合起来，“文心雕龙”意指“文章写作之精义”。该书所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学。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系统性和完整性前所未有，具有理论性质，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文学概论。

《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或者说是艺术性，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认为文学应该符合儒家思想的规范，但在何谓雅正问题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随意以是否符合雅正的标准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主张文以宗经，但不要求文以载道，承认文学的抒情作用。

（五）萧统及其《文选》

萧统（501—531），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梁天监元年（502年）11月册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只活了三十岁。死后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博览典籍，雅好文学，信佛能文，所作多宣扬佛学，表现贵族生活情趣。萧统最大的成就是引纳文士，编成《文选》三十卷，世称《昭明文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对后代文学颇有影响，并形成研究《文选》的专门学问——“选学”。萧统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

据《梁书》记载，萧统性情敦厚，宽和容众。立为皇太子后，梁武帝萧衍曾让其代理朝政，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他

明于庶事，纤毫必睹，辨析仔细，发现谬误巧妄之处，都耐心示其可否，令其改正，不加按劾。据《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载：梁普通年间，武帝发兵北讨北魏，都城谷价很贵，他就“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下雨落雪天气，他派“心腹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有流离道路”的就“密加赈赐”。他还拿出布帛，制成实襦裤，寒冬腊月，“以施贫冻”。每当他听到远近百姓赋役勤苦的事，就面有愁容，以重于劳扰为忧。

萧统一生勤奋读书，博涉众学，他所居住的东宫聚书三万卷，为当时私藏之冠。他喜欢广聚文士，商権古今，品评历史上各种有名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倡导和主编下，选辑了古今优秀文学作品编成三十卷的《文选》，带动了文学的繁盛和研究学问的风气，一时间文才并集，局面为“晋宋以来未之有”。

据武进、江阴地方志记载，萧统留给后世的除《文选》三十卷外，还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华集》二十卷，《陶渊明传》一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后世又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六）徐陵及其《玉台新咏》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幼通经史，在梁、陈两朝为官，历任东宫学士、上虞令、尚书左丞、秘书监、散骑常侍、吏部尚书等，封建昌县侯。徐陵一生主要负责草拟朝廷重要文书，诗文为当代所宗，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体”。徐陵著有诗文集三十卷，现已散佚，今仅存诗近四十首，文八十余篇，明人辑有《徐孝穆集》。

后人所知徐陵，更多的是由于他编选了一本供皇宫后庭歌咏的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此书十卷，成于梁代，书名中的“玉台”是宫廷的别称，所谓“玉台新咏”，即说这是一部供宫廷歌咏的新诗集。书中所收诗歌，上自汉魏，下至梁代，共796首，内有五言诗八卷，歌行一卷，五言二韵诗一卷。为《文选》所收者六十九篇。该书选诗范围较窄，题材比较单一，多为产生于宫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或为迎合当时宫廷欣赏

趣味的表现男女闺情的离愁别恨、感时伤世之作，所以后人把《玉台新咏》所收录的诗歌称为“玉台体”或者“宫体”。但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堪称佳品，是全书的精华。

那么，宫体诗有什么特征呢？唐初魏征的《隋书》卷35《经籍志四》集部叙从两方面来说明什么是宫体诗：“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可见宫体诗是一种有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宫廷文学，其基本风格一是浮靡，二是轻艳。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卷3载，梁简文帝晚年“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徐陵应诏而编的《玉台新咏》正是根据类似的标准来收录梁代诗歌的，所以主要为宫体诗，而又以简文帝的为最多，也最有代表性。如简文帝的《咏内人昼眠》、《咏舞》、《春日》、《独处怨》诸诗，或描写宫女的睡态、舞姿，或假托女子的口吻作伤春之辞，杜撰思妇对塞上征人的相思，凡此种种，莫不着一“艳”字。至于其他一些写景诗和咏物诗，如《咏风》、《秋夜》、《晚景出行》之类，则基本不出宫廷的范围，而其中也往往有宫女的影子。如《晚景出行》开头云：“细树含残影，春闺散晚香。轻花鬓边堕，微汗粉中光。”虽题作晚景，但第二句就写到了“春闺”，其风格也同样是轻靡艳丽的。

如果仅收这些轻靡浮艳的宫体诗，《玉台新咏》便不会如现在那么重要。或许徐陵也没有想到，或许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打着简文帝的“以大其体”的旗号，为了证明宫体诗源于古诗、合乎风雅，硬把古代作品乐府民歌和梁以前很多作家的诗篇也拉进这些“艳歌”之列，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古代作品使之不至于亡佚的作用。这些乐府民歌和梁以前的诗歌虽然不是全书的核心，但却赋予了《玉台新咏》强大的生命力，由于后人对这一部分诗歌更为重视和欢迎，反过来带动了其母体《玉台新咏》的广泛传播。一些乐府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本来是表现真挚爱情和反映妇女痛苦的，与宫体诗的基调并不和谐，基于一般的编辑原则，收入该书很不合适，然而这首诗却是借《玉台新咏》保留下

来的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是全书的代表作，很多人都是从《孔雀东南飞》入手，踏上了《玉台新咏》的阅读和研究之旅。

(七) 郦道元及其《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涿州郦亭（今河北涿县南）人。关于他的生年说法不一，尚难确定。史书仅记载他于孝昌三年（527年）被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东）。他出身仕宦之家，父亲郦范做过不少地方官，最后升至平东将军，并进爵为永宁侯。郦道元从小就跟着做官的父亲到处旅行，酷爱祖国的明山秀水，培养了“访渎搜渠”的兴趣。成年后，郦道元承袭父亲的封爵，封为永宁伯，出任过太尉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他利用任职和陪北魏孝文帝巡视的机会，周游了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足迹遍布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区。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道形势，溯本穷源，游览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中广泛搜集各种地理资料，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公务之余，郦道元醉心于搜集舆图方志，最喜欢阅读地理方面的文献，诸如前代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以及汉魏时代佚名作者所著的《水经》等。经过博览精研，郦道元发现这些古代地理文献各有局限，《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皆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完备的揭示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经过反复对比，他认为《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但对全国的地理有提纲挈领的潜力，可惜的是未记水道以外的地理情况。于是他决定选择《水经》一书，以“作注”这种体裁和形式，“因水以证地”，以水为纲来描述全国的地理情况，把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积累的十分丰富的地理知识和所见所闻充实进去，传之于后人。作注《水经》，除具有便于展开叙述，易于整合见闻的优点外，郦道元还

另有其他的考虑：其一，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都十分复杂，只有以水道为线索，才能"即地以存古"，便于描述处于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天下四分五裂，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郦道元向往《禹贡》所描写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渴盼祖国统一，利用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打破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使破碎的山河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充分表达人民渴望统一的美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注》也是一部蕴含着爱国主义情愫的著作。

《水经》共载水道137条，1万余字，而经郦道元花去巨大心血加注后发展而成的《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 252条，如将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等都算入，实记2 596条，共计40卷，约30万言，把《水经》的内容扩大了20余倍。

《水经注》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二千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民情、人物掌故、奇闻逸事、神话故事等，可谓是我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各种现象的单纯罗列，而是有机地综合在一起。

《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也是我国北魏以前古代地理的集大成之作。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宏观而言，《水经注》描述到的地域非常宽广：北起阴山、南达汉水和淮水、西至华山、东到山东半岛。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天的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描写这些地区的素材，有的来源于亲自考察累积起来的笔记，有的是从前人文献中辑录的。至于绝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和域外的资料，则全部采用前人的记载，经过校勘以后整理而成。微观而言，《水经注》

的内容相当丰富，资料特别翔实，所记大小河流有1 000余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流速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 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水经注》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 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 000处。在这些城市中还包括国外的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并不只是单纯地做河流的描述工作，而且非常重视水利与人民生产、生活的联系，强调水利工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内容属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地理的范畴。例如，他在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资料，多次提到战国时期的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堤、塘、堰、堨、覩、坨、水门、石逗等。还提供了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方面的资料。由此出发，郦道元还进一步阐述冶炼业、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煮盐业、酿酒业等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以一定的篇幅加以论述，涉及的内容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金属矿物有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

雄黄、硫磺、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此外，还有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兵要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等各方面的资料。

因为《水经注》采用的是以水记山、因地记事的写作手法，以水为中心层层展开相关资料，牵涉面极广，不少篇幅实际上超出了地理学的范围，为许多学科提供了材料。例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左右，其中加以解释的地名就有2 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书中对湖南湘乡石鱼山的鱼化石（埋藏于当地第三纪地层中）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鱼类化石材料中比较早的记录，受到古生物学家们的重视。可以说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文学、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学、农学、生物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诸多课题。以上这些内容不仅价值上可贵，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旅游文学的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说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实不为过。《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水经注》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与郦道元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为了写作此书，郦道元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的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的各种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郦道元还仿效司马迁写《史记》前的准备工作，亲自实地考察，所到之处，寻访古迹，拜访耆老宿绅，追

本溯源，经常根据确凿的材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订正前人的记述错误，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例如，在提到有关陕北黄河段（今黄河故道）时他写道：所谓“悬水百余仞，水涌起方数十丈”的情景，并不是秦始皇铸铜人沉没于此处所致，而实际情况诚如《史记》中所说的，在魏文侯二十六年（前443年）此间发生强烈地震，虢山崩坍，堵塞河道所致。这一科学论断，澄清了长期以来的讹传。

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也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在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关于这些地方的记载错误也较多。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的价值。

《水经注》原有四十卷，宋初已缺五卷，后人将其所余三十五卷，重新编定成四十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讹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五百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今人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也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

郦道元一生中，除《水经注》外，还撰有《本志》十三卷及《七聘》诸文，可惜都已亡佚，仅《水经注》得以流传。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八）贾思勰及其《齐民要术》

贾思勰是东魏杰出的农学家，他的生平事迹史书缺乏记载，难以确考，不过他所撰的《齐民要术》各本皆题有“高阳太守”，可知他曾在朝廷任职。《齐民要术》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农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业名著。全书共有十卷，九十

二篇，又有启序和杂说各一篇。从书中内容的下限年代看，撰成当在东魏武定二年（544年）以后（一说为533—544年之间）。在书的自序中，贾思勰写道“今采据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说明此书是总结书本知识和实际经验写成的。全书援引古籍近二百种，所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汉晋以来很有价值的农书现都已失传，后人只能从本书中加以辑录，知其梗概。该书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五谷、瓜果、蔬菜、树木的栽培，牲畜、家禽、鱼类的饲养，酒、酱、醋、豉、脯、羹、臛（肉羹）、菹（泡菜）、饼、饭、馅、糖等的制作，以及煮胶、造笔墨、染纸的方法等有关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技巧，都有论述。书的最后列举“非中国（指中原）物”，亦即北方不生产的蔬菜、瓜果的名称。该书总结了6世纪以前中国北部黄、淮地区农业、畜牧业的生产经验，主要如防旱保墒、选种和培植良种、轮作和绿肥作物栽培等，并提出农业生产应当综合考虑各项生产因素，生产过程中要抓紧各个环节的原理。《齐民要术》是《氾胜之书》以后内容更为丰富的一部农书，也是研究北朝时期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二、翻译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佛经翻译成为图书生产、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家，如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真谛等，其中尤以鸠摩罗什和真谛贡献最大，被认为是北方和南方佛经翻译的两大家。

（一）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3—413），汉语名字叫童寿，龟兹人，出身为印度世袭高位的婆罗门族。鸠摩罗什一家与佛教似乎结有宿缘，其父鸠摩罗炎本该遵从父命继承相位，却毅然抛弃荣华，苦修向佛，他东渡葱岭，远投龟兹，被龟兹王迎为国师，后被逼和龟兹公主结婚，生下鸠摩罗什兄弟二人。罗什母亲当年以公主之尊热

烈追求鸠摩罗炎，迫使其还俗，没想到自己身怀六甲时却忽然对梵语无师自通，萌生向佛之心，终于在结婚四年后背叛丈夫，绝食六天，决意出家。鸠摩罗什7岁便随同母亲剃度进入佛门，9岁学经。12岁时他随母亲回龟兹，中途在沙勒停留一年。沙勒国王听从当地僧人的建议，为了勉励国内僧众，兼以对龟兹王表示友好，特举行大会，请罗什升座讲法，年轻的罗什从此扬名。随后，罗什又随母北行，经过龟兹北境的温宿时，又以论议挫败当地一位有名的道士，声誉更隆，龟兹王亲自来迎他归国。不久，罗什的母亲只身前往印度，临行特勉励他到中国弘法，他毅然引为己任，表示即便忍受炉镬之苦也要使大法东传。

苻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中土僧人僧纯、昙充等从龟兹游学归来，宣扬龟兹佛教盛况，特别提到才智过人、尤通大乘佛教的鸠摩罗什。这个时候高僧释道安正在长安积极推动译经事业，听说罗什享誉西域，就一再劝苻坚迎罗什来华弘法。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派吕光等出兵西域，特别叮嘱道："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行。"要求吕光攻下龟兹后，火速把罗什迎送入关。建元二十年（384年），吕光攻陷龟兹，也找到了罗什，但因为他不信佛，对罗什的造诣和价值不甚明了，又见他年纪轻轻，便不以为然。更深层的原因是，苻坚临行交代的话使吕光对罗什预先有了嫉妒之心，他不但没有礼遇罗什，尊皇命将其迎送入关，反而想方设法戏弄罗什，他让昔日被龟兹人视为活佛，出入乘金车，踩着王公贵族脊背升座讲法的罗什骑着劣马、乘着牛车穿行于闹市，企图以这种方式粉碎罗什的自尊心。他还把灌醉的罗什和龟兹公主关在同一密室，诱迫罗什犯了大戒。

很快一年过去了，吕光还未把罗什带入中原，短命的前秦便随着苻坚在建元二十一年（385年）的被杀而灭亡，吕光失主，便干脆割据凉州，登基称帝，建立了后凉，罗什也就成了后凉的子民，留置凉州。后来姚苌取代苻坚称帝于长安，慕罗什高名，

也曾虚心邀请，而吕光父子对罗什预测吉凶的才能有所领教，认为其还有些利用价值，不放其东行。罗什被留在凉州达17年之久，空有满腹经纶，却苦无机会弘传。但他天资过人，在凉州与汉人交往，长期接触汉语，深有领会，为他以后的译经事业奠定了有利条件。后来姚兴嗣位，于弘始三年（401年）出兵西攻凉州，凉主吕隆兵败投降，罗什才被迎入关，此时他已经58岁了。

姚兴对罗什十分敬重，待以国师之礼。宗室显贵也都信奉佛法，对罗什更是尊崇有加。长安此时佛教已盛，名僧群集，但对罗什都很钦服，拥戴他犹如众星捧月。弘始四年（402年），罗什应姚兴的邀请，主持长安西郊的逍遥园译经道场，开始译经，他生命中的辉煌时刻终于到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经活动也就此拉开了帷幕。罗什对翻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译经谨慎不苟。其译经的程序是，每译一经，先亲自在澄玄堂当众解析，然后手持胡本口译为汉语，旁有一僧对照旧译本核对，如确认是胡本谬误，则用天竺本加以校正，如发现旧译本用词不确切，就加以改正，直至参与译经的僧团中的数百众僧详加审定，均无异议，才笔录下来。最后还需全面校正一遍，方能形成定稿。在罗什的主持下，先译出《阿弥陀》等经，接着又译出《大智度论》和《百论》。姚兴对旧译的《大品般若》不满意，劝请罗什重译。弘始六年（404年），罗什校定了《大品般若》译文，译出《十诵律》的大半，并重治《百论》译文。以后相继又译出《佛藏》、《菩萨藏》等经。从弘始八年（406年）起，罗什迁住大寺，陆续译出《法华》、《维摩》、《金刚》及《小品般若》等经，《中论》、《十二门》等论，最后又应请译出《成实论》。他前后所翻译的佛经，据《出三藏记集》卷2所载，共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比较可信。后来《开元录》著录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内缺本二十二部，八十二卷），这个数据沿袭的是《历代三宝记》的记录，可能混入了一些伪托的经论，须加辨别。罗什本人精通佛理，译经的程序又严谨科学，所以译出

的佛经质量很高，佛教界以罗什的译经为分水岭，把此前的译经称为“旧译”，把罗什的译经称为“新译”，而“新译”一出便引得人们交口称赞，几乎完全取代了“旧译”。就翻译的数量而言，罗什稍逊于唐僧玄奘，而系统深入地用汉语传播佛经却是从罗什开始的。罗什带来的大乘空宗理论，可谓唯心主义的极致，以丰富的内涵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哲学界，使魏晋的玄学讨论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罗什译经采取的是意译的译法，以便使中原僧众易于接受理解。为了保留经籍的文学趣味，他的翻译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由于罗什既博览印度经典，对梵文极有根柢，又因留华日久，对汉文颇有素养，同时对文学具有高度的欣赏力和表达力，故能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因此他所译经论，中原僧众都很喜欢诵读，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罗什在翻译上的成就，也与长安先期的译业基础、以及当时参加译场的许多得力助手分不开。长安在苻秦时代，由于高僧释道安在此奖励译事，译场初具规模，已渐成为译经的重镇。到了罗什入关，姚秦奉佛更盛于前，译经事业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译场得以扩充，成为国立译场。曾经参加前期译事的名僧等，此时都参加罗什主持的新译场，成为得力的助手。同时还不断有来自各地的名僧加入译场。他们既精教理，兼善文辞，故能各展所长，相得益彰。此外，与罗什合作的还有西域僧人，罗什遇到翻译困难时经常向他们请教。

罗什来华后专注于翻译，著作不多。系统的著述相传有《实相论》二卷，现已佚。他曾注《维摩经》，又有答庐山慧远及王稚远问的文章多篇，现存后人所集他答慧远问大乘深义十八科三卷，题为《大乘大义章》。此外，《广弘明集》收载他答姚兴《通三世论》书一篇。其他口义散见于关中诸疏。至于答王稚远问二十四项，现仅存略目，载于《出三藏记集》所辑收的陆澄《法论目录》中。

罗什的门人号称三千。当时名僧云集长安，多趋于他的门下。罗什译经，常边讲边译，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便成了罗什的亲授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僧肇、僧睿、道融、昙影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

罗什为人神情开朗，秉性坦率，平时虚己善诱，专以大乘教人。他具有文学才能，出言成章，不待删改；所作赠法和慧远偈文，都辞理婉约，韵味深长。在来华的外国译师中，他对中土语文最为精通。他虽届高年，仍从事传译，未尝停歇。弘始十五年（413年）四月，因微疾，罗什骤卒于长安大寺，时年七十。他对自己一生翻译的经卷的质量非常自信，临终遗言，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订，自信诸译所传非谬，可供后世流通。

罗什的一生留下了一些极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故事，例如，罗什早年曾因被吕光设计而犯了男女大戒，尚情有可原，但到了晚年的时候，鸠摩罗什又接受姚兴的关照，收下了其所赠的美女10名，再次破戒。当人们怀疑他是否还是佛学大师的时候，他当众吞下一钵铁针，声称谁若能做到，便也可以娶妻生子，并以出淤泥而不染为自己开脱。另据说，罗什圆寂前曾当众声称：自己一生所讲经论皆有所本，句句无误，焚身之时当以舌头为证，薪灭形碎，唯舌不烂。罗什肉身火化后果然如此，现存甘肃武威的罗什寺塔，便是葬其舌的地方。神秘和渊博相互映衬、人性和佛性彼此交织，罗什身上的这些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气质，注定使他成为历史上难以被忘却的大师。

（二）真谛

真谛（499—569），公元5至6世纪名僧，天竺人，婆罗门种姓，聪敏强记，精内外典籍，明大乘妙理，是古代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中无相唯识学（唯识古学）的传人，以弘道为怀。公元546年，应梁武帝的邀请，泛海入华，成为南方最著名的翻译家，与北方的鸠摩罗什齐名。后世通常把真谛、鸠摩罗什、玄奘、不空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佛学翻译家。

真谛在印度博采众家，沉醉于大乘佛教，是印度佛教唯识学中的大家。他很早就有传教异邦的宏愿，曾在扶南大行法化。接到梁武帝的邀请后，便携带二万余卷梵夹东来，弘道中土。

然而入华后立足未稳，真谛便遇到两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一是社会动荡不安，安定的译经场所难觅；其二是思想上不能与中土佛教界引起共鸣，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这两个问题时时困扰着他，使他的传教宏图很难施展开来。

真谛见到梁武帝后，奉诏译经，谁知同年秋便遇上了“侯景之乱”。为避战乱，真谛被迫潜形南游，逃难于苏、杭一带，焦灼度日。好不容易熬到国难稍平，重开译席，可是他所钟情的唯识论中土佛教界又不感兴趣，这使他的内心甚感孤独。很快，局势再紧，他旋又奔波于江西九江、南昌、奉新等地。

公元554年，真谛南投萧勃，居广东韶关译经，稍得平静。但不到三年，战火又起，不得不再次流离于江西赣州、南昌、抚州等地，接着越武夷山直抵福建福州，后又南下，至广东惠阳。此间，真谛虽然且行且译，法化无辍，但一直颠沛流离、栖遑靡托，加之知音稀少，甚感失意。公元562年，63岁的真谛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的叹息中，挥别中土，泛舟西返。

然而真谛与中土因缘未尽，562年底，真谛西归的船舶被风吹回广州，刺史欧阳頠对其竭诚供养，智恺等高徒亦皈心唯识，相继来聚，终于在广州形成一个安定的讲席译场，真谛的弘法本怀始得伸展，相继译成《摄大乘论》、《俱舍论》等大部头著作。可是中土广大地区对其学说犹抱抵触态度，致使唯识新法仅限于岭南之地。对此，真谛伤感不已，临寂前，聚众徒于佛前结盟，誓弘《摄论》、《俱舍》，永不断绝。誓毕即以古稀之躯，登坛说法，终因积劳成疾，寂灭于讲台之上。

真谛来华所带梵典240余夹，约2万余卷，译出者共计76部315卷，其中主要的有《转识论》、《大乘唯识论》、《金光明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律二十二明了论》、《中边分别论》、《十七地论》、《俱舍论释》、《大乘起信论》等。

尽管这只是其传法大业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已是相当可观，其范围比历史上任何一位译经家都要广泛，其中既有小乘又有大乘；既有经、论，又有戒律；既有内学又有外学；此外还有教史、因明、经录、翻译理论等。真谛既是翻译家，也是义学大师。在华弘法期间，他边译边讲，译述并进，对许多译著都作了义疏注记，总计达一百五十余卷，这也成为他译经的一大特点。真谛不但学识渊博，传译广泛，而且汉文程度好，翻译态度严肃认真，史载他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反复斟酌，方乃落墨。

真谛最热衷于瑜伽行派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无相唯识学说，这是他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内容和目标。经过真谛的不懈努力，无相唯识学终于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并在此后不久，由弟子们传向全国各地，形成盛极一时的宗派——摄论宗，真谛被尊为摄论宗的祖师。后来，玄奘大师又将有相唯识学译介过来，形成新的唯识宗。至此，印度瑜伽行派中的两大学说体系都传到了中国，真谛和玄奘便成为中国传播唯识思想的两位最重要的译经大师。

除了偏宗《摄论》之外，真谛还特别重视《俱舍论》，这是一部佛教百科全书，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在印度早有盛誉。真谛历时十个月始译出本论及义疏共七十六卷，旋登坛讲演，接着又重译再订，定本形成后，大弟子智恺代师开席演讲，历时半年，惜亦未终而化。众弟子不忘盟誓，经过艰苦努力，将《俱舍》之法传向全国，又形成了另一个盛极一时的宗派——俱舍宗。

真谛大师历经辛酸与磨难，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以其坚忍不拔的意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译撰出大量的佛学著作，为中印文化交流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重要的出版家

出版家指的是在图书生产领域统揽全局、高瞻远瞩、屡有建树、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而优秀的出版家则应具备超前的预见能力、远大的战略眼光、杰出的组织才能、高超的策划水平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从而能够在图书出版史上留下生命力永久的图书品种。他们的出版成就应能够代表当世的图书生产水平，他们的出版思想和实践应能够对后世的出版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上表述虽然是现代意义上的优秀出版家的概念，然而借助这些标准，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出版事业发展贡献最大者，恐怕要数魏文帝曹丕和梁武帝萧衍二人。

曹丕和萧衍之所以贡献突出，这与他们个人的秉性、权力以及当时的图书生产方式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仍然局限在官僚及其周围的文士这个狭小的空间，图书的编撰和复制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文人的个人创作，二是政府组织的集体创作。曹丕和萧衍天性好学，均是博学能文之士，他们登上帝位后，不改近书之习，不废向学之志，反而更加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兴趣，利用皇权充分放大自己在图书生产方面的天才和能力，发起、策划、组织撰修了许多名垂史册的重要图书。

一、魏文帝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安徽亳州）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史称魏文帝。登基以后，在黄初三年（222年）、六年曾两次亲征孙吴，皆未能过江，不果而还。七年五月，病卒于洛阳。曹丕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今存诗歌较完整的约40首，著作据

《隋书》卷35《经籍志四》著录有集23卷，又有《典论》5卷，《列异传》3卷等，皆已散佚。

曹丕在图书生产方面有破天荒之举，开发出了一些图书新品种，创下了新纪录，而且接力前贤，整旧经出新篇，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提出了具有永恒价值的出版理念，开创了图书出版的新局面。他亲自从事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编撰经验，是学者化编撰家、出版家的光辉典范。他还改革出版机构，竭力培养人才，通过确立制度从根本上振兴出版事业。他在图书出版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编撰出版最早的诗文总集

中国古籍传统上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之所以称为集，是因为其主体是总集和别集。所谓总集，就是多人的诗文作品集。那么何书为最早的总集？许多人会想到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两书都是很多作者诗歌作品的汇编。然而《诗经》、《楚辞》只是诗歌总集，还不是那种能够囊括诗文等多种文体的、真正意义上的总集。那么，综汇多种文体的诗文总集产生于何时呢？

一般认为，诗文总集是在我国历史上诗文著作增多，品类多样化以后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称："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隋书》卷35《经籍志四》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根据这则史料，文献学家们多判定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最早的诗文总集。然而细读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在晋代挚虞之前还提到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建安"，"众家之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以滋广"。这个关于总集的源点的设定是有依据的，因为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魏太子曹丕就编辑了一本多人诗文集，被《三国艺文志》称为《建安七子集》，可以说该书便是总集的滥觞，曹丕就是总集的开创者。至于《建安七子集》为什么没能被公认为是总集之发端，则因为

其既无明确的书名，又流传不远，后人无实物可以确判，只能舍此而求彼。所谓创始者难为功，曹丕不能毫无争议地得到诗文总集创始者的荣誉，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1]。

“建安七子”是汉献帝建安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七位文人，他们是孔融、徐幹、应旸、陈琳、刘桢、阮瑀和王粲。曹丕与这七位文士都有交往，对他们的文采十分敬佩。可是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中原爆发疫情，曹植记其景象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2]。一年之中，徐幹、应旸、陈琳、刘桢皆因疫俱亡，没有染疫的王粲也于这一年的春天死在征吴途中。加上孔融和阮瑀已在多年前辞世，七子无存。朋友们转瞬间全部离去，对曹丕打击很大，他回忆起不久前的欢聚，不由感叹“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3]。痛定思痛，他想出了“撰其遗文，都为一集”的办法来表达对亡友的怀念[4]。

或许是因为第一个编这类多人合集的缘故，曹丕似乎并没有给集子命名，书成后流传也不远，姚振宗细心搜讨文献的记载，将这本书考据出来，在《三国艺文志》中将其列于三国著述总集类之首，拟书名为《建安七子集》。但是有的学者根据218年曹丕写的《又与吴质书》，认为所谓《建安七子集》实际上只收录了六人的作品，莫如叫作《邺下六人集》[5]。原因是，从《又与吴质书》内容看，很像是交代编辑上述集子的缘起，但其中只对与曹丕同辈的徐幹、应旸、陈琳、刘桢、阮瑀和王粲等一一加以评说，没有论及年辈较长、去世又较久的孔融。由于曹丕所编总集早佚，究竟是七人集还是六人集，以及其体例是按文体排列还是按人集中，则已无从考定了。

曹丕编撰的总集虽然失传，但他编撰总集这个事实是没有疑义的，这一贡献在中国出版史上不应该被忽视。

（二）组织编撰出版第一部类书《皇览》

关于类书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类书源于杂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其创始之作，一种观点则认为

【1】孟昭晋：《曹丕与图书》，《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1版，4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太平御览》卷742引《说疫气》。

【3】《三国志》卷21《吴质传》注引《魏略》。

【4】《三国志》卷21《吴质传》注引《魏略》。

【5】孟昭晋：《曹丕与图书》，《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1版，4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尔雅》实开类书之先河。但是如果把“述而不作”和“以类相从”作为判断类书的标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皆非单纯的抄撮资料，而是杂有议论，《尔雅》虽然明分部类，目的则是为训释字词，三书都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类书。宋代王应麟在《玉海》卷54中说：“类书之事，始于《皇览》。”他的这种说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成为定谳。

《皇览》的发起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便是曹丕。《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三国志》卷21《魏书·刘劭传》载：“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2]《三国志》卷23《魏书·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鱼豢著《魏略》：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在提到《皇览》的篇幅时皆只称“篇”而不言“卷”，那么这里的“篇”是不是就是“卷”呢？根据《隋书》卷34《经籍志三》著录，《皇览》在梁时余680卷，到隋朝的时候就只有120卷了，这说明《皇览》在流传中散佚很快，诚为可惜，但依这样的散佚速度推算上去，《皇览》初成时当在千卷，所谓“凡千余篇”实际上就是“千余卷”。那么“凡千余卷”、“通合八百余万字”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以52万字的《史记》作比，就相当于十五六部《史记》。由于《皇览》是以“撰集经传、随类相从”这种类书特有的编撰方式编成的，所以它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大型类书，被推为类书之祖，可谓名副其实。

【1】《三国志》卷2。

【2】《三国志·魏书·刘劭传》。

关于编撰《皇览》的缘起，从《魏书·文帝纪》所保存的延康元年（220年）秋七月庚辰令可窥得一二，令曰：“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此时，曹丕刚刚接受汉献帝刘协的禅让称帝，便在庚辰令中借黄帝、尧舜旧事，告诫百官各司其职，接受自己的

“兼览”。编纂《皇览》自然是为了更好地“兼览”天文、地理、人事。当然，编纂《皇览》还可以达到其他政治目的。首先，他借修《皇览》之机，把名儒集中到一起，史载可知姓名的就有王象、刘劭、缪袭、韦诞、桓范等，并对其中的一些骨干加以提拔，如让王象“领秘书监”，将刘劭“迁秘书郎”，封桓范“为羽林左监”等。如此一来，素有忠君传统的儒士为官缄口、为事压身，在改朝换代之际，面对新君竟失反对之声。其次，西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儒学大盛，皇帝往往视儒家经传为必修课，多有亲自讲述经义、回答诸儒诘难的才学，也经常组织群儒辩驳议论。然而到了汉末，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太学生激抨时政，遭到两次血腥镇压，使儒学遭到巨大打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又重法度、破传统，更使得儒学衰微，一落千丈。“讲论大义，侃侃无倦”的曹丕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则与父不同，他向往西汉时儒学繁荣的景象，所以登基后修孔庙、开太学、立石经，采取了一系列为儒学“拨乱反正”的举措，撰修《皇览》可视为系列举措中的一项。第三，封建王朝的君臣在论证统治政策合理性的时候，素来就有从经传中断章取义、取予所求的传统，以增强其政令的说服力。曹丕乃禅代称帝，在预谋篡位的数月间曾百般利用谶纬书大造舆论，深知文字的厉害。编制一部《皇览》，一来可以广收于己有利的资料，继续为巩固帝业造势；二来可以作为资政参考，无论是策问群臣还是颁发政令，事先都可以从中寻找依据。《皇览》有颇为实用的价值，确有修撰的必要。最后，不能忽视的是曹丕出身于文学之家，与父亲曹操、弟弟曹植并称“三曹”，以文采享名于世，年轻时交往的也多是雅好文学的翩翩才俊，称帝后诏修《皇览》乃顺理成章，可谓秉性使然。

可惜的是，《皇览》同《建安七子集》一样，流传得并不久远，本有千卷之多，到梁时只存680卷，到隋时只存120卷，到《唐志》时已不见著录，至宋代已遗佚，目前我们只能在一些辑佚材料中窥其一斑。然而，《皇览》的编纂，开创了类书编纂的体例和风气，丰富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宝库。《皇览》编成后，仿

作并起，如《史林》、《四部要略》、《法宝联璧》等，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的热潮。

（三）增刻黄初石经

曹丕称帝后意在复兴儒学，诏令议郎孔羡为崇圣侯，奉孔子祀。修复孔庙，派兵守护，且在其周围广建房屋，以供求学者居住。又在京城重开太学，“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1]。鱼豢《魏略·儒宗传序》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2] 曹丕下令补救的石碑乃是受董卓之乱而被毁坏的熹平石经，既然是补救缺坏，最好的方式莫若修旧如旧，曹丕也正是这样做的。此次修补仍然全部采用原来的字体隶书，依旧被称为“一字石经”，书法出自当时的大家邯郸淳等人之手。后代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经过这次补救竟然多出了两部石经，一是毛诗，一是郑氏尚书，理由是这两本书在后汉根本就没有被官办学校所采用过，更不可能在熹平年间被刊于石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黄初年间借修复石经的机会增刻的，所以姚振宗在补修的《三国艺文志》中明确著录：“黄初一字石经两部。”[3]

刻立石经不仅可以起到规范文本、平息学术纷争的作用，也是图书按需复制或者说是自助复制思想的萌芽。人们在石经上覆纸捶拓，快速得到复本，这种方式催生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说，石经的刻立在出版史上具有多重意义。曹丕主动承担起接力者的责任，发扬光大了刻立石经这种文献传播方式。因其垂范在先，后嗣自然努力仿效。魏明帝曹叡将曹丕的著作《典论》刻立为石经。魏齐王曹芳时将《古文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刻立为石经，每字皆以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并写三遍，所以称为“三字石经”，又因为此项工程开展在公元240—248年间，年号为“正始”，又称“正始石经”。后来这两部石经

【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2】《三国志》卷13《魏书·王肃传》裴注引。

【3】《二十五史补编》，32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的刻立虽然功劳不能算在曹丕头上，但多少都受到了曹丕刻立石经的影响。黄初石经的价值在于它的承前启后性，由于它的出现，使石经这种特殊的文献形式形成了系列和链条，如果说“熹平石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风景点的话，那么黄初石经的出现则使这个风景点变成了一道风景线。

(四) 写作出版《典论》

从出版家的角度来论说曹丕，显然不能忽视他在创作方面的贡献。曹丕父子都是对时间的流逝极为敏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曹操的名诗《燕歌行》就充分流露出了对人生苦短的无奈和感慨。曹丕充分遗传了父亲这方面的气质，尤其是当遭遇到瘟疫突起、挚友竞殇的磨难时，他对生命脆弱、人生短暂、何以不朽的思考和追问的深刻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父亲。

夺取曹丕五位良朋的公元217年的大瘟疫，除促使曹丕编辑《建安七子集》悼怀亡友外，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警悟，他更加深入地思考幸存者何以度过余生，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从而赢得不朽等人类生而面对的终极问题。一段时间里，他在与朋友的书信里表达的都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在与王朗书中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1] 他在《又与吴质书》中写道:“观古今文人，类不获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又写道:“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2]。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曹丕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实际已有了答案，他认为著述是除立德之外的又一不朽方式，他深为有著书之才，而生命短暂未偿宏愿的好友应旸(字德琏)感到惋惜，结合自身，他觉得应该以徐幹(字伟长)和他著的《中论》为榜样，抓紧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在瘟疫这个突发事件带来的紧迫感的鞭策下，曹丕花了5年时间，终于在

【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2】《三国志》卷21《魏书·吴质传》注引《魏略》。

222年写成《典论》一书，此时曹丕的身份已经由太子转为皇帝。

《典论》写成后，曹丕比较满意，曾作为外交礼品赠人，史载他“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与权”[1]。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从这件事可见当时魏国和吴国之间关系的微妙，同时也可以得知当时书的载体是帛、纸并用。或许是由于紧迫感过于强烈，写作仓促，《典论》各篇的质量参差不齐，未能像曹丕向往的《中论》那样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典论》到底有多少篇已不可考，至今可知的有《奸谗》、《内诫》、《酒诲》、《论郤俭等事》、《自叙》、《太子》、《剑铭》、《论文》、《论（汉）太宗》、《论孝武》、《论周成汉昭》、《终制》、《诸物相似乱者》等13篇。其中以《论文》和《自叙》流传最广。《论文》是曹丕对他的“文章不朽观”的系统的阐发，基本观点与他在大疫之后与朋友的书信中所表述的差不多，但更为精确和严密，最为人称道的点睛之笔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 在这里，曹丕充分阐发、肯定了著述活动的意义和图书文献的价值，他呼吁有志之士切莫“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号召他们抓紧时间成一家之言。这段精辟的论述不仅对个人有警醒作用，激励文士奋发努力，勤奋著述；对生产、流通、收藏和管理图书的机构而言也有指导意义，是它们认识自身工作价值的理论基础。《自叙》是曹丕《典论》中完整传世的另外一篇，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有“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句，反映了后来由魏晋间郑默、荀勖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社会上已经流行。

曹丕的《典论》在传播方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他想象的程度，但创作的经历和创作中所形成的系统思想对他策划、组织编撰其他图书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正是抱着坚定的“文章不朽”观，曹丕发起的图书编撰工程才能有不凡的气魄，无论是《皇览》还是“黄初石经”，都是规模较大、精益求精的项目，最终都青史留名，堪称不朽。应该说“文章不朽”观是曹丕的人生

【1】《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历》。

【2】《文选》卷52。

观、文学观，也是他的出版观。一般认为，曹丕倡导“文章不朽观”的《典论》开创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同样也可以说，曹丕的《典论》开创了出版的自觉时代。从此，人们从事出版的目标更加明确，行动上更加积极，出版事业找到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产和传承不朽的文明成为它永远不变的宗旨和目标，出发点和归宿皆系于此。

（五）加强出版机构

秦汉时期，因为图书不多，政府对图书事业的管理也比较粗放，文书、档案、图书等互相关联的工作没有特别明确的分工，这方面的管理有时候归尚书，有时候归中书。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在政治生活和学术活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图书事业进行管理越来越显得必要。东汉桓帝时，“初置秘书监官”，设“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1]，“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核异同”。公元213年，曹操称魏王后，设立整套官职，“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即中书之任也。兼掌图书秘记”[2]。这两次机构调整，反映了文书、档案、图书的管理呈现分化的趋势，逐渐向专业化对口管理的方向转变。

曹丕称帝后，为了赢得士族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设立九品中正制，大范围提高士族的品位和官阶。由于原有的政府机构设置不足以让更多的士族分享权力，就只能通过细分政府机构职能的方法来安插更多的官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曹丕对图书事业的管理机构也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3]。这一改革实际是将秘书令的权力和职能一分为二，机要文书剥离出去归中书令管，艺文图籍专归秘书监管。秘书监的最高长官称为秘书监，俸禄为六百石，官居三品，监下设秘书丞二人，四百石，多从秘书郎升迁，再下设秘书郎四人，四百石[4]。如此一来，图书事业有了专门的对口管理的机构，政府对这个方面的注意力更加集中，管理的力度逐渐加强，官员编制增多，专业化程度提高，比过去更容易有所作为。

【1】《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

【2】《唐六典》卷10引《魏志》。

【3】《宋书》卷40《百官下》。

【4】《三国职官表》，《二十五史补编》，2276页。

曹丕对秘书监相当重视，任用的官员皆为上佳之选，如秘书监王象文采温雅，人称儒宗，秘书郎刘劭也以才学见称。此外，秘书丞严苞、何桢、薛夏等也非等闲之辈，皆以博学多才闻名当时。曹丕与这些人的关系都比较亲密，他令王象领秘书监，主修《皇览》，拜为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重视尤加。当何桢未按曹丕的意愿被任命为秘书丞时，曹丕"案主者罪"，把阻挠者治罪以示不满[1]。曹丕因为经常与薛夏在一块切磋学问，两人私交甚厚，曹丕居然放下皇帝的架子，对薛夏以朋友相称，嘘寒问暖，不拘君臣之礼，史载："文帝又嘉其才，黄初中，为秘书丞，帝每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谓之薛君。夏居甚贫，帝又顾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赐之。"[2] 曹丕去世前不久，还在考虑进一步重用薛夏。

【1】《唐六典》卷10引《魏志》。

【2】《三国志》卷13《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

在知人善用的曹丕的特别关照下，秘书监成了名副其实的典籍富集之所和人才荟萃之署，为有计划地撰修一系列大型图书提供了文献保障和组织保障，创造了优越条件。曹丕各项出版成就的取得与他对秘书监的改革和对人才的遴选是分不开的，重视出版机构的建设，出版人才的选拔、培养，以及出版人才知识结构的互补优化，可以说是曹丕成为一个优秀出版家的宝贵经验，值得后世出版事业的管理者认真领会和学习。

曹丕在出版史上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在诗歌史、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他的出版思想和出版实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图50
梁武帝萧衍画像



二、梁武帝萧衍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武进西北），汉相萧何的第24代孙（图50）。萧衍与南齐同族，曾任齐之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于公元502年起兵，禅代称帝，建立梁朝。萧衍博学能文，勤政爱民，生活简朴，在任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发

展文教，梁朝一度呈现盛世之象。但由于他晚年信奉佛教，大建寺院，人称“皇帝菩萨”。他曾四次戏剧性地舍身同泰寺，每次又都被众臣以巨资赎回，以致全国百姓因他的重佛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肌肉略尽”，“骨髓俱罄”。大同二年（547年），萧衍接受东魏大将侯景归降。次年冬，侯景反叛，引兵渡江，攻破都城，萧衍于围困中饥病而死，卒谥武，庙号高祖。萧衍自幼酷爱读书，至老手不释卷，博通经史，著作颇丰，有《孝经义》、《中庸讲疏》、《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等书。萧衍还以多才多艺著称，琴棋书画皆通。他精乐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通”；又制长短不同的笛子十二支，以应十二律。兼能书法，尤善草隶。

萧衍在位48年，是南朝统治最长的一位皇帝，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读书皇帝。虽然从政治角度看，梁武帝不是英明一世的雄主，他在年轻时颇有勇略，起兵夺取帝位，天下初定后便逐渐对政治丧失了兴趣，专注于学术、宗教、文学艺术，晚年因佞佛和纳降侯景最终丢掉了江山社稷，历来为史家所诟病。然而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梁武帝却是一位有为可敬的文化创造者。他不仅终其一生保持书生本色，潜心学问，孜孜不倦，著述颇丰，还利用九五之尊的权威，领导、组织、策划出版了一些煌煌巨著和传世名作，称得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出版家之一。

（一）策划刊行识字课本《千字文》

大凡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受到最好的教育，能有盖世的才华接下治国安邦的大任，永续万世基业。作为开国君主的萧衍自然也不例外，萧衍很希望皇嗣在太平时期早读书、多读书，可是却难以找到一本理想的启蒙课本。当时通行的识字课本是东汉史游的《急就章》，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三国朱育的《幼学篇》、晋代杨方的《少学》等多种，但这些课本缮写随便，书体不定，只有识字功能，没有书法之美，从学者识字和习书不能兼得，这在书法为才艺之一，颇受社会重视的写本书时代无疑是个缺憾。酷爱王羲之书法的萧衍有一天突发奇想，他令一位名叫殷铁石的文

学侍从，从王羲之“飘若游龙、矫若惊蛇”的手迹中拓下1 000个互不重复、各不相干的字，每纸一字，然后一字一字地教给皇子，达到了既教皇子识字，又教皇子临摹世上一流书法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萧衍感觉这1 000个字杂乱无章，内容无内在联系，不但难以记忆，而且小孩只可以据此识字，而学不到有意义的句子和其中所蕴含的知识。萧衍寻思，倘若将这1 000字连缀成一篇文章，岂不更妙。于是，他又召来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令周兴嗣将这1 000字编撰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

周兴嗣接受任务后不敢怠慢，回家便将王羲之的这1 000个字的拓片一一摊在桌上，逐字揣摩，反复吟读……就这样，他苦思冥想了一整夜，直到东方既白，金鸡报晓，终于茅塞顿开，文思泉涌，谋篇成功。他乐不可支，边吟边书，将这1 000字联串成一篇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这就是流传至今已1 400多年的《千字文》。相传，周兴嗣因一夜成书，用脑过度，次日已鬓发皆白[1]。

【1】《太平广记》卷270。

《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以“谓悟助者，焉哉乎也”结尾。全文共250句，每四字一句，字不重复，句句押韵，前后贯通，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农耕、园艺、饮食起居、修身养性以及封建纲常礼教等各个方面。周兴嗣因出色地编撰了《千字文》，深得萧衍的欢心，萧衍对他优渥有加，赏以金银玉帛，赐以高官显位，派其佐撰国史。

《千字文》流传至今，被公认为是世界教育史上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启蒙识字课本。它比宋代编写的《三字经》和《百家姓》还早600余年。《千字文》嘉惠杏坛数千年，沾溉的总角童稚无以计数，梁以后的文人学士无不知晓，可以说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常销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可估量。

《千字文》经历了两次创意，第一次，萧衍将一流书法和识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想到把王羲之书法作品中不重复的字拓下集为一帖，编成独一无二的识字课本。第二次，萧衍又有了把这些字编排成有意义的文字的巧思，终于编撰出了既是法帖

又有识字功能和教育意义的新型识字课本。在这两次创意中，萧衍不仅出点子，还知人善用，分别选准学有专长的得力臣子去创作和编辑，其图书创意和知人善用的才能达到了完美统一。

（二）组织编撰刊行《华林遍略》等大型类书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齐梁间，无论是文人学士游宴，还是达官要人集会，甚至君臣朝中议事，均喜欢以博闻强记相高，常常用征事（亦叫策事或隶事）的方式展示、考察彼此的学问，互相标榜，较量胜负，一时蔚为风气。所谓征事，就是围绕着某一事物，尽可能地答出与其有关的经义、典故等一切现存文献中与之相涉的片断，答出的越多越好，最多者便为胜者。征事、隶事的风气史不绝书，一些大臣为了比赛谁读书更多，往往以征事的方式互相较劲，例如陆澄在尚书令王俭面前声称自己读书很多，王俭不服，比赛隶事，陆澄竟比王俭多说出100多条，王俭方才心服。王俭还喜欢拿出巾箱、几案、服饰等物，让人就物隶事，多者便赢得该物，陆澄也从王俭那里赢得过物品[1]。

【1】《南史》卷48《陆澄传》。

这个时候未开科举，策事还是皇帝选拔人才常用的方法。萧衍下决心组织编撰类书《华林遍略》，就是在一次策事时埋下了伏笔。据《南史·刘峻传》载："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2] 这则史料告诉我们，萧衍曾广召文士，不少有才华的人都被举荐上来，萧衍经常召集他们"策经史事"，范云、沈约等人每次都表现得比较活跃，令武帝十分满意。个性突出的刘峻则不会随机应变，讨武帝的欢心。有一次，武帝以"锦被"为题让文士们隶事，别人都说完了，武帝试着又问了一下刘峻，寒酸而又憔悴的刘峻起初表现得漫不经心、无精打采，一会儿忽然又要来纸笔，竟补充了10余条。刘峻的"一鸣惊人"令在坐的人另眼相看，但却并未赢得武帝的欣赏，武帝或是厌其神态，或是厌其表

【2】《南史》卷49。

现过分，令自己失颜，从此以后对刘峻反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不再召见他。

然而就是这个让武帝厌恶的刘峻，却被武帝的弟弟萧秀看中了，“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1]。《类苑》的修成让气量不够宽宏的萧衍受到了刺激，因为《类苑》不仅是自己的弟弟发起的，是由其门人、自己不屑的刘峻编修的，况且《类苑》编成后，竟不无狂妄地声称“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2]。这使得武帝这位嗜好读书，在文化建设方面好大喜功的一国之君深感失颜。原来早在梁开国之初，为了显示本朝“文章之盛，焕乎俱集”，萧衍就曾仿效魏文帝曹丕诏修《皇览》的做法，诏令太学博士刘杳领修类书《寿光书苑》，该书编到天监七年杀青，共200卷，乃统辑秘阁四部资料而成，因为编书的机构为寿光省，故而以“寿光”入书名。《寿光书苑》的编修本来是萧衍在文治方面的得意之笔，谁知不知趣的安成王竟让刘峻领修了《类苑》，该书虽然篇幅上没有越制，只有120卷，不及《寿光书苑》，说“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未免夸大其词，但其内容却比《寿光书苑》要精，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这一点让博览群书的萧衍敏锐地发现了，自然不悦，甚至不能容忍，出于维护皇帝的尊严的需要，他很快就启动了编撰更大型类书的计划，“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3]。时为太子詹事的徐勉被任命为领修，何思澄、顾协、刘杳等学者参与其间，在名为“华林园”的编书场所，用了八年时间方编成了700卷的大型类书《华林遍略》。该书的内容全面覆盖了《类苑》，篇幅是其数倍，终于挽回了萧衍的面子，基本实现了他编纂一部篇幅空前的大类书的愿望。

从表面上看来，《华林遍略》是萧衍与臣弟意气之争的产物，实际上萧衍在文化建设上素有雄心、期有作为的愿望才是《华林遍略》诞生的深层原因。除了《寿光书苑》和《华林遍略》，萧衍诏修的类书还有《长春义记》100卷、《法宝联璧》300卷等。

【1】《梁书》卷50《文学下·刘峻传》。

【2】杜宝:《大业杂记》，辛德勇辑校，23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3】《南史》卷49《刘峻传》。

《华林遍略》因为迎合了当时隶事盛行的风气，问世后广受欢迎，不仅在梁传播，还被民间书商作为奇货运到了北朝，东魏的中书监高澄就曾从扬州书商那里诈抄了一部。《华林遍略》流传广，影响大，为后世多种类书的蓝本，北齐的《修文殿御览》、隋朝的《长洲玉镜》、唐朝的《艺文类聚》都是在该书的基础上修成的。

《华林遍略》的问世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首先，它继承和发扬了由《皇览》所开创的类书这种著作体裁，进一步巩固了类书在文献家族中的地位。如果说曹丕是类书的始作俑者，那么萧衍可称类书的繁衍者，他多次诏修类书的行为使类书的编纂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传统，被后世沿袭下来，代有新著，力作不断，以致蔚为大观。其次，它拓展了以《皇览》为代表的类书的内容，将其由“撰集经传”专供皇帝参阅的课本扩大为服务类事、排比众书的万有文库。而且它也没有像《皇览》那样明确地标上“御览”的标签，等于默许类书流出“皇家之学”的藩篱。它在民间的传播，使类书逐渐演变成为新型的大众学习参考用书。第三，它的流通进一步助长了当时隶事、策问的风气，加快了选官方式由魏晋时期的考察门第向考察知识转移的步伐，激发了寒门子弟的学习热情，某种程度上为隋唐的开科取士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

类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献类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科学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华文明中独具魅力的一部分。在类书由政治向教育、由皇室向平民不断拓展功能和读者对象的过程中，萧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图书出版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竞争精神令人敬佩，堪励后人。

（三）复制图书，充实国藏

萧衍不仅在新书的策划、编撰方面颇有作为，对传统经典的复制和收藏也极为重视。作为经历战争、起于乱世的皇帝，他对汉末书遭厄运、礼乐崩坏、国异家殊的局面深以为憾，对齐末兵

火下青编素简一同煨烬的惨景十分惋惜，为防止悲剧重演，他认为国家藏书必须多置复本，分存异处，以备不测，于是他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天监初年（502年），萧衍命张率主持抄写乙部典籍；天监二年，张率已升职为司徒主簿，又奉旨主持了甲部图书的抄写；天监七年，张率再次应诏主持抄写丙部和丁部图书。这样四部图书便均有了复本。萧衍还接受沈约的建议，召集了五名旧学士，令他们各自荐一名助手分抄五礼，遣沈约、张充和徐勉参与此事。并规定在抄写的过程中，如有不明确的地方，"莫不网罗经诰"，依石渠、白虎故事，请制旨断决。天监十一年（512年），五礼抄成，共1 176卷，8 019条，其副本缮写校定完毕后，列于秘阁，正本颁行天下。这四次抄书，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年，可见规模之大，亦可见萧衍在图书复制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持之不懈的恒心。

这种由国家发起的图书复制行为具有垂范作用，鼓励、引导和推动了社会上图书复制和发行业的崛起，尤其对京师建康抄书、卖书风气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些复制的图书充实国藏后，成为国家宝贵的基础学术资源和出版资源，在由政府主持的大型图书的编撰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这些基本的传统经典都不完备，梁朝根本不可能编出以《华林遍略》为代表的一系列包罗万有的大型类书。萧衍能做到推陈出新皆不偏废，可见他深谙继承方能创新的出版规律，善于处理积累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正是由于出版资源雄厚，梁朝在图书生产方面才拥有了不断发展的能力，保持了长期繁荣，不仅北朝不可企及，在南方六朝中也遥遥领先。

（四）勤于著述，著作等身

萧衍在图书出版方面发挥了多种角色的作用，他不仅是策划者、组织者，还是一位富有成果的创作者和编撰者。萧衍一生迷恋图书，博学多才，早在齐朝时，已经和王融、谢朓、沈约、任昉等八位知名的文士，并称为"西邸八友"。就学术和才艺而言，萧衍在东晋和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较突出的。萧衍高寿，享国长

久，创作条件优越，加上他个人异常勤奋，即便在冬天也是四更即起，把灯披览，冻裂双手，亦不放弃，因而著述等身。《梁书·武帝纪》称萧衍著有《制旨孝经义》等200余卷，《文集》120卷。据《隋书·经籍志》所列，萧衍的著作不仅品类多，而且涉及的面相当广泛，计有《周易大义》、《尚书大义》、《毛诗大义》、《礼记大义》、《孔子正言》、《通史》、《梁武帝诗赋集》、《梁武帝杂文集》、《净业赋》、《乐论》、《黄钟律》、《梁主兵法》、《围棋赋》、《梁武连珠》等等，凡是萧衍感兴趣的方面，如儒学、史学、文学、佛学、音乐、兵法、围棋等，皆有著述，萧衍的多才多艺通过这些论著得到了充分展示。不过，在萧衍论著中占绝大多数的、能够反映他学术水平的还是释经编史注解佛书之作。他认为："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1] 遂亲撰《五经讲疏》、《孔子正言》等书，并使名儒孔子祛为其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书成，除收入秘阁后，还立于国学，并置《正言》助教2人，学生20人，后又加置博士1人，按照朝廷所需，研究、阐释、宣讲经文，即所谓"正先儒之谜，开古圣之旨"。

[1]《梁书》卷3《武帝纪中》。

萧衍在图书创作方面的积极表现，一方面在图书出版领域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上行下效，带动了广大文士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萧衍论著的主题相当广泛，除传统的选题外，还有兵法、音乐、围棋、回文诗等边缘性、娱乐性的选题，这表明当时的图书品种已经达到了多样化。另外，学问和著述是相辅相成的，萧衍通过大量著述，不仅表达了学术思想，也在创作中提高了学术水平，史载他在礼学、佛学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每逢众臣遇到学术问题，需要制旨断决时，萧衍都能说得有理有据，令满朝叹服。这种深厚的学术根底使他在组织大型图书的编撰时能够以专家的姿态指挥若定、游刃有余，能够把不同选题的图书，正确地交给长于此项的人才。萧衍亲历创作，体验著述的甘苦，对图书编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有切身的了解，这对指导全国的图书生产也大有益处。

（五）修订政策性图书，加强文治

萧衍十分重视图书的政治作用，及时诏修了一些政策性图书，强化文治。在称帝之初，为使梁王朝长治久安，萧衍立即着手制定法律及典章制度。天监元年（502年），他得知济阳蔡法度藏有南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凡1 530条，未曾施行过，且字迹已经磨灭，便将此书抄付秘阁，并以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修订王植之的旧律。同时，又命王亮、王莹等，广集旧律，参与修订。次年，修成新律，即为《梁律》，凡20卷，2 529条，又有《令》30卷，《科》30卷。《梁律》的修成为梁朝的法制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为笼络和安抚士族，赢得他们的支持，萧衍在禅代之前就许诺修订《百家谱》，以明确高门大族的地位，确保他们的利益。登上帝位后，他积极地践行诺言，令王僧孺入直西省，以官藏谱牒书为依据，重修《百家谱》，以改变“齐宋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缺”的状况。

以上两本书的修订是作为政治行为而不是文化行为来开展的，由此可见图书出版对于治国安邦是不可或缺的。这两个事例在出版史上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昭示了图书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图书出版的价值和力量。

（六）发展教育，提倡读书风气

图书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与社会教育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落后，文盲众多，读书人口上不去，读书风气不浓厚，对图书的需求不旺盛，出版就会缺乏发展的动力。令人钦敬的是，萧衍对教育十分重视。他不仅关心基础教育，有策划编撰《千字文》之举，对高等教育更是大力倡导。他认为图书既是开展学术研究及编撰大型图书的资粮，也是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延揽人才的根本，图书出版和发展教育相辅相成。天监三年（504年），萧衍亲自策试秀才，自称：“闭户自精，开卷独得。九流、《七略》，颇尝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敦促诸生远利禄而勤读书，“犹其寂寞，应有良规”。天监四年（505

年），他又诏开5馆，因此时《梁律》已成，即在刘宋儒、玄、文、史四馆基础上，增设律学，并广建馆舍，招纳后进，成绩合格者，即委派官职。结果，一年之内，各地学子怀经负笈云集京师。随着藏书日益丰富，萧衍又仿效宋、齐总明观、学术馆的模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并在二馆置放部分藏书，供学者研读。当时的著名学者朱异、贺琛、孔子祛等都曾奉诏赴各馆讲学，萧衍本人也曾亲临学馆讲学听讲，一时之间，建康学风大盛。在萧衍的积极推动下，读书向学的风气逐渐从首都蔓延到乡村。《隋书》卷32《经籍志一》称："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茅屋中的陆倕、孤贫的臧严、砍柴的孔子祛、寄人篱下的刘峻等为数不少的生活在下层的文士，在相当艰苦的环境里居然都有书可读，并通过发奋苦读，终于崛起于寒门庶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图书出版的繁荣和读书风气的浓厚。

中国历史上不乏"敦悦诗书"的皇帝，但像萧衍这样具有异乎寻常的号召力和拓展力的则十分罕见。这种本领是萧衍特有的魅力，惹得与南朝对峙的东魏丞相高欢也不无妒意，他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可见，萧衍的文化号召力不仅作用于梁，还影响到了北朝。萧衍在文化教育上的巨大影响力和出色驾驭能力，使他能够兼顾并有效地促进图书出版的协调发展。

萧衍统治梁朝将近半个世纪，与图书出版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晚年一心向佛，对寺院流连忘返，多次设坛讲经，也大力支持佛经的翻译和刊行。另外，萧衍在文化学术方面富于理性，容忍争鸣，即便像范缜写出《神灭论》猛烈抨击他虔信的佛教，萧衍也不施加迫害，而是亲率群臣与之辩难，自己还专门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进行论辩。应该说，他对当时的学术发展和图书编撰出版事业，是有较大贡献的。

第三节　佣书人和写经生事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流行，由轻薄廉价的纸而刺激起来的对图书的社会需求十分巨大，而此时适合高效批量复制图书的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大量的书籍复制工作全靠人工抄写来完成，书写材料的改进和复制技术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抄写很快成为一个新兴的容量很大的行业，为不少出身贫寒，但有书法和文史知识的读书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为了谋生，受雇于官府或个人以抄写书籍为务的文士自东汉以来被称为"佣书人"，东汉出使西域的班超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最早的"佣书人"之一，他曾靠为人抄书赚来的钱赡养母亲。《后汉书》卷47《班超传》载：班超早年"与母随（班固）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书写受直以养老母"。"佣书"人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佣书人"后来又分化出一批专门抄写佛经的人员，被称为"写经生"。魏晋以来，佛教东渐，佛经的汉译和复制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起初佛经的抄写主要由佛教徒来完成，是僧侣的分内事。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影响十分广远，深入乡野，平民百姓已接受并习惯于把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寄托于对佛的信仰，有人开始尝试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写经，以表达自己的虔诚，至于向菩萨申报的种种愿望则巧妙地写在抄写的佛经的题记中。信士之间免不了彼此效仿攀比，写经之举一旦有人开端，众人相随，很快蔚为风气。以写经来做功德明显的好处是经济实惠，比起当时流行的凿窟造像、盖寺庙建浮屠，开支要少得多，许多家境贫寒、经济拮据的善男信女便选择写经的方式以示虔诚、表达心愿。写经既然是做功德、表虔诚，最佳的方式当然是亲自抄写，所以有的信徒为了某个愿望便日日写经，认为经卷抄成之日，便是大愿得偿、福庆臻集之时，若届

时仍不灵验，则以虔敬不够、功德不圆满而自责，写经不辍。然而当时教育并不普及，无舞文弄墨之能的文盲大有人在，还有养尊处优、四体不勤的豪门世族和终日劳碌、不得分身的坐贾行商，这些人有了写经的愿望该怎么办呢？只有找人代劳，再把写好的经卷舍入寺庙。最初，代人写经的是寺庙的和尚，但随着写经风气的日炽，靠和尚写经根本满足不了需要，这时一般读书人也开始参与写经，以抄写普通图书谋生的一部分“佣书人”也转而受雇写经，写经逐渐成为一种职业，造就了一批职业的写经人。写经人通常在写好的经卷上署款“经生”，后人便称之为“写经生”。写经和抄经虽然意思相同，但这个时期佛经的抄写通常只称为写经而讳言抄经，这是因为凡是抄写佛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俱包容在内，称为写经显得尊重，称为抄经则显得不敬。写经生受人钱财，写经的目的又是为了替人发愿、消灾，顾主为了避免财德两亏，往往把发愿的灵验与否归责于写经生心境的虔诚程度、书写态度、书写水平、书写举止、书写环境的选择等方面，对写经生要求甚苛。寺庙对供奉的经卷也有很高的质量要求，经过严格的审查、校勘方肯接受。再加上写经生本人在佛教盛行的大环境下通常也有佛教信仰，所以他们在写经时承担的宗教、道德、技能等各方面的压力要比一般佣书人大得多，抄写过程极不轻松，必须一丝不苟、战战兢兢方能克尽责任。

从道理上讲，经是书的一类，把写经生看作是佣书人的一支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写经生的专指性较强，一般不把写经生称为佣书人，史书中通常也不将这两个词混用，似乎受雇抄写宗教经卷以外的普通图书的抄书人才称为佣书人，写经生和佣书人似乎是分工不同的两类人。写经生的“经”也是狭义的，特指宗教经典，佛教兴盛时指佛经，后来道教兴起时又包括道经，但不包括儒家经典，不能按传统意义上对“经”的认识，想当然地认为“写经生”就是抄写儒家经典的佣书人。

这个时期，佣书人和写经生的基数很大。由于抄写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学习的过程，不少佣书人和写经生经过长期笔墨生涯的磨练，在潜移默化中学问和书法大有长进，有的著书立说以名作传世，有的学优而仕建功立业，有的书法精进而成为艺术大家。这些人物仅在史书上有明文记载者就有十余人，无名者更是不计其数[1]。

【1】任继愈:《中国藏书楼》，44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下面按照先魏晋、再南朝、后北朝的顺序，介绍在某一方面终有所成且具有代表性的佣书人和写经生的事迹。

一、魏晋时期的佣书人和写经生

佣书是一项艰辛的劳动，非门寒家贫者不愿为之。佣书人社会地位低下，起家入仕的机会很少，他们中的佼佼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幸运儿，都离不开一些特定的历史机遇。例如三国时，天下三分，魏、蜀、吴都想完成统一大业，求贤若渴，唯才是举，阚泽才能在这样的形势下意外崛起。两晋时期通行九品中正制度，门第森严，朝廷主要从豪门大族中选仕，对寒门庶族子弟非常不利，但偶尔也有一些例外的政策出台，如晋武帝就发过“开寒素”的诏令，给一些出身低微的佣书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文化上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则是造就学者的良机，在魏晋时期佛学东渐的潮流中，一些佣书人在仕途之外另辟蹊径，走上了研究佛学的道路，佛学家释僧肇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一）吴国的阚泽

阚泽，字德润，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43年，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国大臣，任过骠骑将军、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擅于辞令。阚泽在赤壁之战中起到了谋士的作用，立下了功劳。阚泽的过人之处在于知人。刘备伐吴时，东吴连战连败。阚泽在关键时候向孙权推荐年轻的陆逊，并用全家性命作保，陆逊果然在彝陵大败刘备，后来成长为东吴的著名将帅。

阚泽是佣书成才的典型，东汉以来佣书有为者虽不鲜见，但

后世多以阚泽的事迹以及班超的事迹作为典故，“阚泽佣书”常用来类比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学成才。《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是这样介绍阚泽的身世的：“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大意是讲，阚泽家世代务农，到了阚泽却很喜欢读书学习，由于家境贫寒，阚泽便经常靠为别人抄写书籍来挣得购买纸和笔的费用。阚泽在抄书时边抄写边默记，抄写完毕内容也已熟记，然后还要找老师请教，就这样，他遍读群书，兼通天文历法。

佣书阶段的苦学，终于把阚泽造就为饱学之士。阚泽入仕后，博学的优势很快发挥出来，他曾担任的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接近皇帝、参与机要的关键职位，需要经常拟写诏旨，没有才学是难以胜任的，自然权力也很大。阚泽的博学享誉朝廷，“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谘访之。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1]。阚泽病逝后，孙权痛失能臣，连续数日都吃不下饭。

【1】《三国志》卷53《吴书·阚泽传》。

（二）东晋的范汪

范汪，字玄平，幼年丧父，家境贫寒，6岁时跟随母亲由中原来到江南，投靠外公家。到了30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经历家庭的变故，范汪已变得十分好学。可是“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2]。范汪住的是自己在亲戚家园子里搭的棚子，吃穿从简，靠抄书、卖书挣得读书的机会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凭着这股奋发图强的精神，他边抄书边读书，增长了知识，“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3]。终于成名入仕，历任中书侍郎、安西长史，进爵武兴县侯。年老后“自请还京，求为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65岁卒于家中，赠散骑常侍。

【2】《晋书》卷75《范汪传》。

【3】《晋书》卷75《范汪传》。

（三）后秦的释僧肇

释僧肇（384—414），京兆（今河南洛阳）人，俗姓张，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据《高僧传》卷6记载，僧肇“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玄微，每

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僧肇通过佣书博览经史，在读书中又培养起了对“玄微”之学的浓厚兴趣，时常为书中玄幽莫测的高深哲理所叹服。特别是读了《维摩经》后，对其深邃义理“欢喜顶受，披寻玩味”，毅然决定皈依佛门，剃发为僧。僧肇出家后遍览佛书，佛学造诣日高，二十几岁便“名振关辅”。因为久仰龟兹鸠摩罗什的高名，僧肇便西去凉州求法，终于得到鸠摩罗什的真传，对佛学中的“空”颇有心得，被鸠摩罗什赞誉为“秦人解空第一者”。后秦皇帝姚兴曾命僧肇在逍遥园辅助鸠摩罗什翻译佛经。

僧肇31岁早逝，但留下了一部佛教哲学论文集《肇论》。该书由《涅槃无名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物不迁论》4篇文章组成。《肇论》的哲学思想丰富，思维绵密，体系严谨，逻辑性强，从南朝起就享誉中国佛学界，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代表作之一，在国内外有深远的影响。

二、南朝佣书成学者

在南北朝对峙期间，知识界的精英大多南渡，南朝又碰上过梁武帝这样的读书皇帝长期执政，所以南朝的文化远比北朝繁荣，图书出版领域也是如此，佣书人增长很快。另外，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朝的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更笃，佛教传播如火如荼，大量写经生应时而生。随着佣书人和写经生数量增多，成名发迹者也明显多于魏晋。概言之，南朝青史留名的佣书人和写经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佣书成学，起家入仕者；二是佣书养亲，赢得孝名者；三是长期佣书，书法称善者。

（一）刘宋的陶贞宝

陶贞宝长期抄写佛经，是南北朝时期写经生的代表人物。他写经的事迹不见于《南史》，而是在《云笈七签》卷107被提及，称他“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书体以羊欣、萧思话为法”。这里不但肯定了陶贞宝的书法，还披露了当时写经的付酬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我们可以根据当

时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水平来衡量一下。宋元嘉时期，一匹麻布值500多钱，“一纸直价四十”，那么写12张就可以赚到一匹麻布。况且随着麻织业的发展，到刘宋末期和南齐初期，入宫的好麻布每匹实际只值100多钱，这样算来，写经3张纸的佣金差不多就够得上一匹麻布的价格[1]。如此一比较，看来当时写经的报酬还是比较高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纸的尺幅没有写清楚，对陶贞宝书法的质量却写得很明白，那就是要师法羊欣、萧思话的笔体来书写，这两位都是东晋的著名书法家，要赶上他们的书法水平可并非易事。或许当时抄书的付酬原则也是优质优酬，陶贞宝抄的书字迹工整美观，有大家书法之妙，所以才能得到比较高的报酬。

【1】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1版,12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二）刘宋的周三图

周三图，字季寂，义兴义乡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有气干，为吴郡晋陵防郡队主”。周三图是个贫穷有志气的佣书人，本来是个小小的地方官，后来因在跟随宋孝武帝征战时立功，被赐爵关中侯。兖州刺史沈僧荣是周三图的老朋友，还请他做过一段幕僚，他在平叛过程中又有功劳，但受到中书舍人戴明宝的压制。宋泰始初，周三图为殿中将军。这时四方反叛，仆射王彧推举周三图为将领，让他率船百艘为平叛先锋。周三图领军破城两座，被加封为振武将军，接着又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宋明帝犒赏将领，赐周三图“苑西宅一区”。

（三）萧梁的王僧孺

王僧孺（465—522），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幼聪慧，……七岁能读十万言，及长笃爱坟籍。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写毕讽诵亦了”[2]。由于天资聪颖，加上长期抄写书籍的磨练，王僧孺不仅练就了一手好书法，被公认为“善楷隶”，而且博闻强记，所抄之书皆能成诵，以知识面广博而闻名，史书说他“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3]。著名学者任昉为之做“荐士表”，向齐明帝推荐王僧孺，称赞他“即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4]。而孝道和学问都是当时选仕的重要标

【2】《南史》卷59《王僧孺传》。

【3】《南史》卷59《王僧孺传》。

【4】[梁]萧统:《昭明文选》卷38,北京,中华书局,1956。

准，明帝采纳了任昉的举荐，封王僧孺为太学博士，后来又迁其为侍御史。梁朝初年，王僧孺任南海太守，政绩卓著。官至御史中丞，后因事被免官。

王僧孺以佣书成才，自然也喜欢藏书，据《南史》记载："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1] "埒"是"等同、并立"的意思，王僧孺的藏书量超过万卷，已赶上了著名的藏书家沈约和任昉。王僧孺还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著有文集30卷，另著《东宫新记》、《两台弹事》，奉旨整理的图书有《百家谱》。

【1】《南史》卷59《王僧孺传》。

（四）南齐的庾震

庾震，字彦文，新野人。庾震佣书的事迹非常悲凉和感人，他为人抄书的缘起是"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2]。为了凑齐父母的丧葬费，庾震拼命抄书，以致手掌都被笔杆磨穿。南阳人刘虬为他写了《孝子传》，他以佣书行孝而被载入《南史》。

【2】《南史》卷73《孝义上·庾震传》。

如果说从王僧孺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佣书人辉煌的一面，他们以佣书起家而学成名就、加官进爵；那么从庾震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佣书者悲凉的一面，他们为养家行孝、紧急之需而无奈走上佣书的道路，自身希望速有所得，只得默默领受着繁重的抄书任务。庾震尚能赢得一个"孝子"的美名，在史册上占据一隅，更多的佣书人则不见经传，湮没于他们曾经抄写的茫茫书海中。史籍中未见高门世族参与佣书的，一些寒门出身的高官也只是靠佣书度过穷苦的青少年时期，一旦入朝为官，自然便不涉此道。在史书中，佣书通常是被作为成功者人生灰暗时期的苦涩奋斗经历而被提及的，佣书的艰苦性可想而知，那些终生以此为业的无名佣书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牺牲恐怕是后人所难以想象的。

（五）萧梁的朱异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人。朱异小时候就有福相，他的外祖父曾拉着他对他的祖父说："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3] 可是

【3】《南史》卷62《朱异传》。

朱异10岁左右还是个不良少年，喜欢聚众赌博，为患乡里。到了青年时期，朱异才开始拜师学习，当时梁武帝在建康开五馆，在馆中讲学的博士明山宾最为朱异所佩服。朱异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史载他“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1]。因为刻苦上进、博学多才，朱异虽然出身下层士族，但在21岁便当上了太学博士，梁武帝向朝臣讲《孝经》的时候，命朱异在旁捧书朗读，自己逐句讲解。朱异不但学问很好，能够与博学的梁武帝相商经传，而且在政务上非常能干，《梁书》卷38《朱异传》说他："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议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2] 可见朱异大权在握、日理万机、处事果断、效率极高，这与那些徒居高位，却无应世经务之能的出身甲族的官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异恃才傲物，藐视高门，凡遇到朝贤贵戚，经常先自报出身，曰："我寒士也。”以挫对方锐气。朱异也有致命的缺点，其一是曲营世誉、阿谀媚上。他“居权要三十余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宠任”。梁武帝将其步步高升，视为臂膀。然而这种无原则的媚上，有时是以误国为代价，为臣民所不齿。其二是“贪财冒贿，欺罔视听，远近莫不愤疾”。公元549年侯景谋反，就是打着“清君侧，杀朱异”的旗号兴兵。侯景的叛兵攻入建康，围困皇宫所在地台城。梁武帝“登南楼望贼，顾谓异曰：‘四郊多垒，谁之罪欤？’异流汗不能对，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赠尚书右仆射”[3]。在朱异畏罪发病而死不久，在位48年的梁武帝也饿死于文德殿内，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六）萧梁的沈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吴兴武康人，和庾震类似，是佣书行孝的又一典型。沈崇傃6岁时曾任兖州刺史的父亲就不在了，供养母亲的责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史载沈崇傃“及长，事所生母至孝，家贫，常佣书以养”[4]。沈崇傃的出身本来不错，经常佣书，

[1]《南史》卷62《朱异传》。

[2]《梁书》卷62《朱异传》。

[3]《南史》卷62《朱异传》。

[4]《南史》卷74《孝义下·沈崇傃传》。

看来也有一定的学问，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齐建武初，起家为奉朝请。永元末，迁司徒行参军。天监初，为前军鄱阳王参军事。三年太守柳恽辟为主簿”[1]。沈崇傃出任主簿后，返乡迎接母亲，不巧的是还未到家母亲就去世了。沈崇傃认为母亲生病的时候，自己没有服侍在侧，实为不孝，便打算一死了之，随母而去。他滴水不进，昼夜号哭，折腾了十天左右险些断气。这个时候有人劝他，说你的母亲还未殡葬，你就绝食而死，这算什么尽孝。沈崇傃这才吃了点东西，将母亲草草埋葬，不管刮风下雨，依坟而哭，相传惹得飞鸟和猛兽都来观望，且发出叹息之声。沈崇傃还以行乞数年所得，将母亲迁到了一个更好的墓穴，并在旁边结庐而居，睡单席，吃糠不食盐，重新守孝三年，弄得全身浮肿。梁武帝从地方官那里得知了沈崇傃的至孝事迹，认为可树为榜样，敦兹风教，便派中书舍人到他家中慰勉。又得知沈崇傃佣书成学，闻名乡里，便让他担任太子的侍从官——太子洗马，他却辞而不就；又让他担任永宁县令，然而他仍然走不出丧母之痛，未及到任就病逝了，时年仅39岁。

【1】《梁书》卷47《孝行·沈崇傃传》。

（七）后梁的张景仁

张景仁，济北人，“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世宗并引为宾客。……自苍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2]。张景仁经过佣书生涯的磨练，草书、隶书写得非常好，成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之一。明帝萧岿很喜欢他的书法，于后梁天保八年（569年）将其召去，让他在身边担任侍书，在内府缮写书籍。后主萧琮即位，张景仁当上侍中，封建安王。据史书记载的情况看，多数佣书成名者跨入仕途主要靠的是博学多才，书法才能倒在其次，而张景仁入仕主要靠的是他的书法，其学问和人品都不足以服众，所以《北齐书》说他是自仓颉以来以八体取进的第一人，北齐颜之推所谓“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指的也是张景仁之流。

【2】《北齐书》卷44《张景仁传》。

三、北朝佣书成学者

历史上记载的北朝的佣书人多集中在北魏，原因是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决心采取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方针，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诏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要求各少数民族学汉语、说汉话、读汉文书籍，然而由于战争破坏、图书南移和文人南迁，这时北方尚存的图书少得可怜，为了在短时间内使汉化政策取得成效，只有利用汉人大量抄书来满足需要，这样佣书人集中于北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北魏的崔亮

崔亮，字敬儒，清河东武城人也。崔亮的父亲曾任尚书郎，在征战中为敌所害。当时崔亮年幼，随母亲投奔亲戚生活。《魏书·崔亮传》载："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佣书自业。"[1] 也就是说到了10岁的时候，崔亮就开始以为人抄书的方式养家糊口了。

【1】《魏书》卷66《崔亮传》。

崔亮的堂兄崔光在当朝为官的李冲手下办事，曾劝崔亮说："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2] 堂兄以李家书多，劝崔亮前往借读，崔亮虽然是个书迷，去李家读书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但他首先考虑到弟妹无人照顾，况且寄人篱下读书还要看人脸色，倒不如到市场上自由阅览。崔亮的回答，反映出了他无私高尚的人格。李冲从崔光那里听到后，对崔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经过进一步考察，认为崔亮乃可造之才，便将崔亮迎进府中办的学馆做客，还推荐他为中书博士。

【2】《魏书》卷66《崔亮传》。

后来，崔亮历任显职，做过议郎、尚书二千石郎、吏部郎、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青州大中正等，办事谨慎果断，深受朝野好评。崔亮为官清正廉洁，妻子照样亲自舂米簸糠。

北魏迁都洛阳后，把新都的建设任务交给崔亮，崔亮“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可见崔亮在城市建设方面颇有一套，他通过增收节支，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新都的建设任务，还额外修建了两条水渠。由于崔亮处事公正严明，皇帝还多次令其办理皇亲大臣违法犯禁的案子，崔亮均依法妥善处理，令朝野满意。

【1】《魏书》卷66《崔亮传》。

崔亮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的时候，城北的渭水上没有桥，水浅又不能通船，行人过河十分不便。崔亮出一妙计，令收集雨天发洪水刮下来的长木头，用这些免费的木头快速建起了一座木柱长桥，百姓们十分高兴，将此桥命名为“崔公桥”。崔亮还在雍州推广碾、磨技术，为民造福。

崔亮还能武领兵，但有功有过。老年病卒后，被诏赠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

(二）北魏的蒋少游

蒋少游（？—501），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史载其“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2]。蒋少游因为能写会画，有艺术天赋，先是在民间抄书，出名后被孝文帝召为中书写书生，经高允推荐又补中书博士，各项才艺才逐渐得以展示。太和（477—499年）初，蒋少游受命在宫中主持百官衣冠服饰的改革，并参与礼仪制度的制定。北魏首都平城的太庙、太极殿、华林殿、金墉门楼等宫廷建筑的修造，蒋少游皆参与了设计、施工。蒋少游还担任过都水使者、前将军兼将作大匠，负责监修舟船、车辆及与舟船相关的各种器具。太和中，蒋少游曾作为李彪的副使出使江南。

【2】《魏书》卷91《艺术·蒋少游传》。

虽然一生多与剞劂绳尺打交道，奔忙于园湖城殿的建筑工地，很多人都对蒋少游腹有文才而长期从事工程建设而惋惜，认为这是浪费才华，可蒋少游丝毫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喜爱的事业，不以为憾。晚年，蒋少游官兼太常少卿之职，死后追赠龙

骧将军、青州刺史。蒋少游有文集10余卷，可惜皆佚，人们已无法领略这位书画家、建筑家、工程师的文学才华。

（三）北魏的崔光

崔光（449—522），北魏东清河鄃人，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光。史载崔光“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转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参赞迁都之谋，赐爵朝阳子，拜散骑常侍，黄门、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寻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叙古事，因而赋诗三十八篇。还，仍兼侍中，以谋谟之功，进爵为伯”[1]。可见崔光虽少年家贫，靠为人抄写书稿，以润笔之资赡养父母，但成年后仕途顺利，北魏高祖既为其赐名，又称之为“今日之文宗”，荣耀之至。

【1】《魏书》卷67《崔光传》。

崔光高才大量，喜怒不见于色，经常以德报怨，这是高祖欣赏他的原因之一。崔光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利用自己文采好、口才佳的优势，经常借题发挥，以委婉之词规谏皇帝，比如正始元年夏，有人给皇帝献了个四只脚四只翅膀的鸡，崔光上表，以这只怪禽为引子，纵横捭阖地讲了一番治国安邦的道理，世宗非常赞同。还有一次，禁卫捕获一只秃鹫，在宫中饲养。崔光得知后上表说，“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于殿廷”，“陛下为民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形恶声哉？”以此规谏皇帝关心民生。崔光曾与秘书丞李彪共撰国史，后来李彪因事被解职，史事便由崔光专任。崔光还被封为太子少傅、右光禄大夫、博平县开国公、国子祭酒、车骑大将军、平恩县侯、太子太保等。

晚年的崔光疾病缠身，然而自强不已，他以撰述魏史为己任，常食宿在办公、写作的地方。孝明帝正光三年（523年）6月，崔光病危，召集子侄至榻前，嘱咐说：“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速可送我还宅。”至第而

薨，年73岁。崔光死后极尽哀荣，“肃宗闻而悲泣”，“车驾亲临，抚尸恸哭”，谥文宣。

崔光一生著作宏富，“凡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勒成五十余卷”。后来大多散佚。

(四) 北魏的刘芳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汉楚元王之后。由于父亲过世早，刘芳年少时随母亲流离失所，投奔洛阳做官的亲戚崔浩，崔浩竟拒而不见。“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1]。经历穷苦生活的磨练，刘芳不仅不堕其志，而且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白天佣书，晚上苦读，赚钱和学习并举，还养成了坚毅放达的性格，淡泊名利，安贫乐道，自撰《穷通论》聊以自慰。

【1】《魏书》卷55《刘芳传》。

天资聪明加上后天刻苦，刘芳在佣书人中脱颖而出，他是史书中记载的极少数靠佣书发家的佣书人之一，据《魏书》载：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2]。刘芳经常为僧侣抄写经论，属于写经生的代表人物，他佣书的报酬之所以比较高，一年的收入能买一百匹布，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法相当好，另外刘芳博闻强记，精于儒家经典，学术造诣也非常高，当时许多学者都经常向他请教，人称“刘石经”，这样的素质能保证所抄书有较高的校勘质量，恐怕也是他取酬较高的原因之一。刘芳佣书成学，终于受到朝廷的注意，他中年入仕，官至中书令、太常卿，一度出任青州刺史。他保持了年少时养成的高洁品格，一生“廉清寡欲，无犯公私”。61岁卒，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著有《徐州人地录》、《礼记义证》等多种著作，共83卷。

【2】《魏书》卷55《刘芳传》。

(五) 北魏的房景伯

房景伯，字长晖，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佣

书自给，养母甚谨”[1]。房景伯利用佣书提供的读书条件，涉猎经史，学识渊博。尚书卢渊将其推荐给了负责选官的李冲，李冲提拔他为奉朝请，后来他又陆续出任过齐州辅国长史、司空祭酒、给事中、尚书仪曹郎等。房景伯任清河太守时，曾与其有过节的刘简武吓得携家而逃，房景伯将其擒获后，不念旧恶，善待他的儿子，作乱地方的山贼得知这件事后纷纷下山归顺。因治理有方，百姓生活安宁，房景伯任期届满时，有三百多郡民上书乞留，诏准，又留任二年。后来他又升迁辅国将军、司空长史，年50卒于家。

[1]《魏书》卷43《房景伯传》。

以上佣书人和写经生都是史籍中以一定篇幅记述其抄书事迹的，史籍上记载不多，留下蛛丝马迹的佣书人和写经生还有一些，如赵隐、沈光、虞世基、姚察等。一般而言，佣书和写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报酬，养家糊口，但也有为写经而不断付出的，据《陈书》载，徐陵的弟弟徐孝克“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饥寒，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2]。徐孝克享受皇帝特拨的津贴，居然能因为写经而花费净尽，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动手抄写，花销用于买纸笔所需；二是雇人写经，用于支付佣金。这项记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写经之盛。

[2]《陈书》卷26《徐陵传附弟徐孝克传》。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物的材料和形制

中国古代书籍出版物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籍出版物，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载体材料上看，三国时期是简、帛、纸并存，两晋十六国是纸为主、简帛为辅，南北朝则纸写本普及，虽然其中也有交叉，但大体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第一节　三国时期并行的简、帛、纸出版物

一、三国时期简牍的形制

简，是指竹木制成的简册；牍，是指木制的版牍。竹木是我国最早的书籍材料之一。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简，最早的属战国前期。春秋战国以前的出版物，大多写在简册上，也有的写在缣帛上。简册与帛书、纸书的存在，有一个相当长的交叉时期。两汉时期虽然发明了纸，但简牍、缣帛与纸，几种书写材料仍然混杂使用。在三国时期简牍、纸、帛三种书写材料的出版物

中，简牍所占的比重还是最大。在东晋，官府公文、户口黄籍等还常用简牍书写，以示庄重。直到桓玄（369—404）在东晋末年代晋称帝，简牍才逐渐为纸代替。

从有关史籍的记载和文物考古发掘来看，三国时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有纸、简、牍、帛等，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简牍，分为木简、竹简、木牍，其次是纸，再次是帛书。这种排列顺序，是当时状况的真切反映。从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牍中可以得到证实（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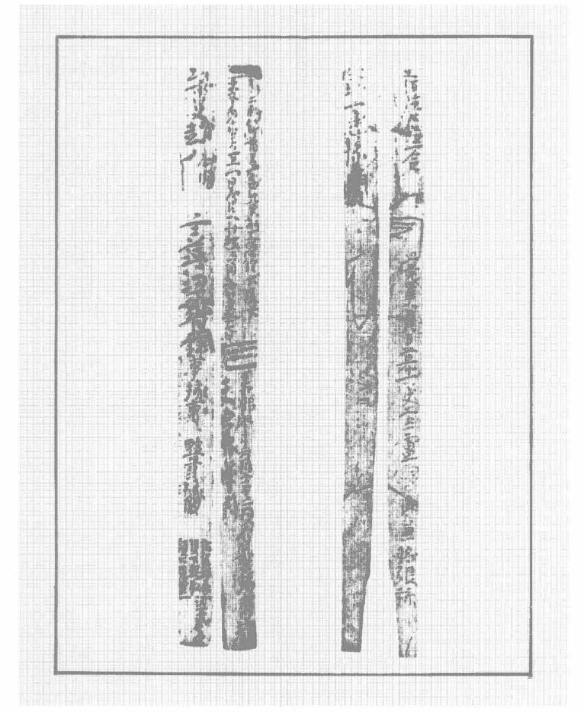


图51
楼兰魏晋简

（一）从文献记载情况来看，简牍是三国时期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书写材料。

1. 用于军队士兵的花名册。曹植的《白马篇》诗云："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里所说的"壮士籍"，就是兵卒名册，指在大约一尺二寸的简牍上记录士兵的姓名、年龄、籍贯、相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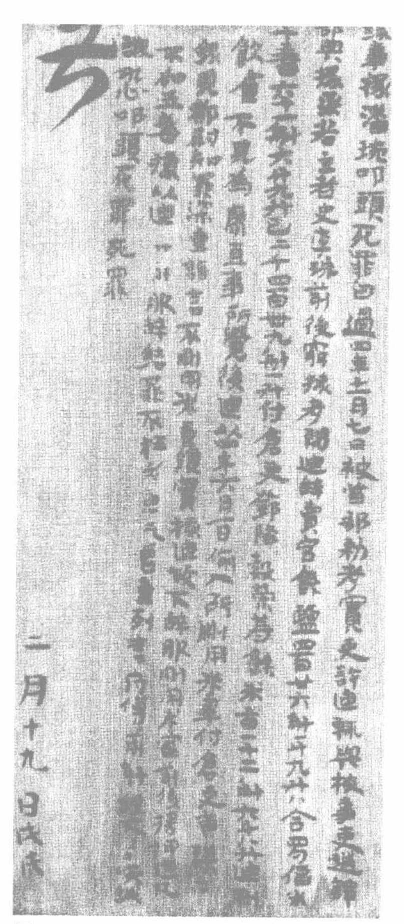
2. 用于皇帝诏令。魏曹芳嘉平元年（249年），大将军曹爽护驾魏明帝赴洛阳谒陵，司马懿趁虚发动军事政变，封锁洛阳城门。曹爽的谋士桓范想奔赴城外报讯，便用随身携带的版牍，诈称是皇帝召见的版诏，"举手中版示之"，骗过城门吏[1]。这时已属曹魏的晚期了。又《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甘露五年（260年），魏高贵乡公曹髦召见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等大臣，密谋诛杀权臣司马昭，"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2]。版令即是书于简牍上的诏令。元胡三省说三国时"犹用版诏，至晋时则有青纸诏矣"[3]。胡三省的论断是正确的。

【1】《资治通鉴》卷75。

【2】《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

【3】《资治通鉴》卷75元胡三省注。

3. 用于官吏作文奏事。《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杨修答曹植书，曰："尝亲见执事握牍执笔，有所造


图52
三国吴官文书木牍

作。”另有史料说明当时地方州郡的文书档案的书写也多用木版牍（图52）。又《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张既出身寒门，进仕艰辛，为巴结州郡的大吏，身边常储存版牍和刀笔，以供大吏奏事时的不时之需，颇能说明当时地方官吏书写公文常用的是版牍而不是纸。

4. 用于官吏文人之间通信。咸熙二年（265年），蜀国学者谯周曾将魏相国司马昭即将于八月死去的预言，用木板书写给蜀国名卿文正看。《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曰:“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周。周语次，因书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曰:“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版答曰……”这里的“书版”、“露版”均是用于通信的简牍。

5. 用于军情急书。《三国会要》曰:“魏武奏事，边有警，辄露板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又《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载，董昭领会稽太守，为了平叛，厚待商人，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二日之间，羽檄三至”。又曹植《白马篇》诗云:“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颜师古对“羽檄”的解释是“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急速也”。这里的羽檄与“露板”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用简牍为书写材料。

6. 用于书籍誊抄。《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又《晋书·张华传》称张华“雅爱书籍”，某次搬家，仅书籍就“载车三十乘”。蔡邕、张华分别是东汉末年和西晋王朝的著名学者，既然他们的书籍搬迁要动用这么多车，这就从一个侧面证实，处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三国时代，其出版书籍的书写材料，大多或主要是简牍，

而不是帛书与纸张。

（二）从考古出土情况来看，简牍是三国时期用量最大的书写材料。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出土的三国简牍包括尼雅、楼兰简牍、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楬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其中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影响最大，它的数量之大再次证明了三国时期不但经济类文书是写在简牍上，而且许多未削治篾皮的短简，其主要用途也是用来记载户籍内容。长沙走马楼简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研究三国孙吴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都是很珍贵的资料。这些实物，从不同角度补充了现代人们对于三国时期书写材料的认识，从而更加清楚和丰富了简牍的使用范围。并且，它们同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相互弥补，共同支撑着前人记录的可靠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三国吴简于1996年在长沙市中心走马楼建筑区域内的22号古井中发掘出来，于2002年清洗完毕，数量为10万枚以上。出土简牍大部分呈灰棕色或黄褐色，按质材与形制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牍、封检和签牌等，长短宽窄各异。据《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记载，材质经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检测鉴定，竹简所用为毛竹，木质简牍所用为杉木。木质简牍保存较好。走马楼简牍的字体工整有序，介乎隶、楷、行之间，从整体上看，书风仍具有隶书意味，尤其是带有波磔的横笔，还有隶书的风格，但有许多笔划，特别是竖划、竖钩、横折、点等，又多与楷法相合，也有一些笔画带有行书特点，唯整体而言还不是标准的楷书与行书。简牍中还有一些很漂亮的草书。每枚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目前简牍所见年号大多为三国孙吴年号，包括孙权的黄武（222—228年）、

黄龙（229—231年）、嘉禾（232—237年）等，也有少量东汉晚期的建安（196—220年）年号（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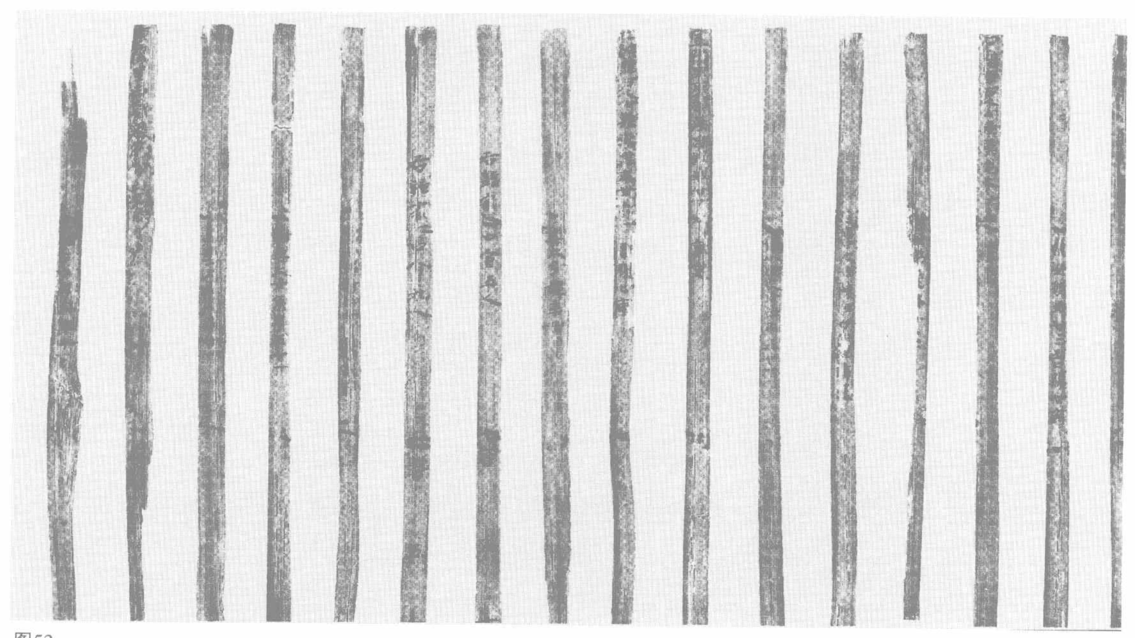


图53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经考古工作者研究，走马楼简牍的内容相当丰富，从现已释读的部分来看，这批简牍主要是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大致可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签牌、缴纳各种赋税与出入仓库（关邸阁）的簿籍等种类，按出土简牍的用途与形制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券书；二是司法文书；三是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四是名刺、官刺；五是账簿。

目前整理的部分简牍，就形制而言有简、牍、签牌、封检等。竹、木简多编连成册。从简牍自身残存的编连痕迹看，一般为上下两道。有的简牍在需编连的部分，预先用锐器刻划出线条。牍，多以木板为之，极少数用竹板做成，长与竹简略同，宽窄不一，厚度均超过竹简。签牌多为长方形，两面书写，上端刹角，中部留有三角形缺口，用以系绳。封检发现在第三层堆积内，其形制为长方形。

走马楼简牍中首先整理出版的《嘉禾吏民田家莂》[1]，是记录

【1】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

嘉禾四、五两年（236、237年）临湘一带乡里（丘）吏民佃租田地顷亩数、旱熟亩数以及向仓库官吏缴纳米、钱、布等租税由田户曹吏核校后制作的总券书。这是一种形制很特别的大木简，长49.8—56厘米，宽2.6—5.5厘米，一般长50厘米左右，宽约3至4厘米，厚约0.5厘米。但约二千枚简长短宽窄差别很大。嘉禾四年莂券中最长的有55.4厘米（4206号），最短的仅有42.2厘米（4264号）；最宽的有5.5厘米（4207号），最窄的仅1厘米（449号）；最厚的有1.5厘米（4491号、4404号），最薄的仅0.1厘米多（4129号），相差很大（嘉禾五年莂券中最长的达56.7厘米）。每简容字少则数十，多则二百六七十。颜色呈黄褐色，杉木制作。简体未见剧痕，系用金属工具采用刨、凿、削等方法制作而成。木简顶端均有用墨书写的“同”字或描画的与“同”字具有同等意义的符号，有的明显地为剖开的“同”字的左侧，该券当为左券，如4251、4266简；有的为“同”字的右侧，该券应为右券，如4271、4293简；有的只有若干横线，可能是对合“同”字作了符号式的简化，也有可能是汉简中屡次提到的“叁辨分”（一式三份的券书）的中券，如420、423简。大概是为了增加破莂合同时的记号。许多莂券在剖开的“同”字或横线的边缘，还添加了一个或两个“乂”形的符号，如4246、4253简。根据券书残留的“同”字或横线推测，莂券可能是一式两份或一式三份的类型，现存的莂卷应当是保留在田户曹吏手中存底的档案。莂券先书写后破莂，唯书写前预先用刀刻画了边线，有的还用一种长18厘米、宽2毫米的小凿子沿边线打凿孔，破莂时用利器自顶端一劈，券书便顺着边线和凿孔砉然而开。由于木材纹理的缘故，也有少量的券书没有按照预先划定的边线剖开，致使该券上残留了被分离的左券或右券上的若干文字。凿孔的痕迹见于441简。一般都是单面书写，极个别两面有字。右行直书，大部分字迹清晰，字体隶中带楷，一简自上而下分为若干栏。木简左侧或右侧残留着用锐器切划的痕迹，甚至有将部分简文切划去一小半的现象。在木简的背面，还发现在同一条直线上用金属器等距离凿斫的眼

孔，研究者推测可能是便于将所需部分分开。这种形式的大木简是一种券书，与新疆楼兰遗址的残简和甘肃敦煌悬泉驿出土的简牍同样属于左右莂券形式。木简上大都残存着编痕，编绳已朽，从固定编绳的契口与残留的编绳痕迹看，木简原有两道编绳，写好编联成册。上下二编，上下编与两端的间距基本上是一致的。如41号简，简长51.7厘米，上端至上契口17.9厘米，下契口距尾端19.3厘米，上下两契口间相距14.5厘米（图54）。

关于赋税的竹简，目前看到的有两种：一种稍宽，长25—29厘米，宽1.2—1.5厘米，厚0.15—0.18厘米；另一种稍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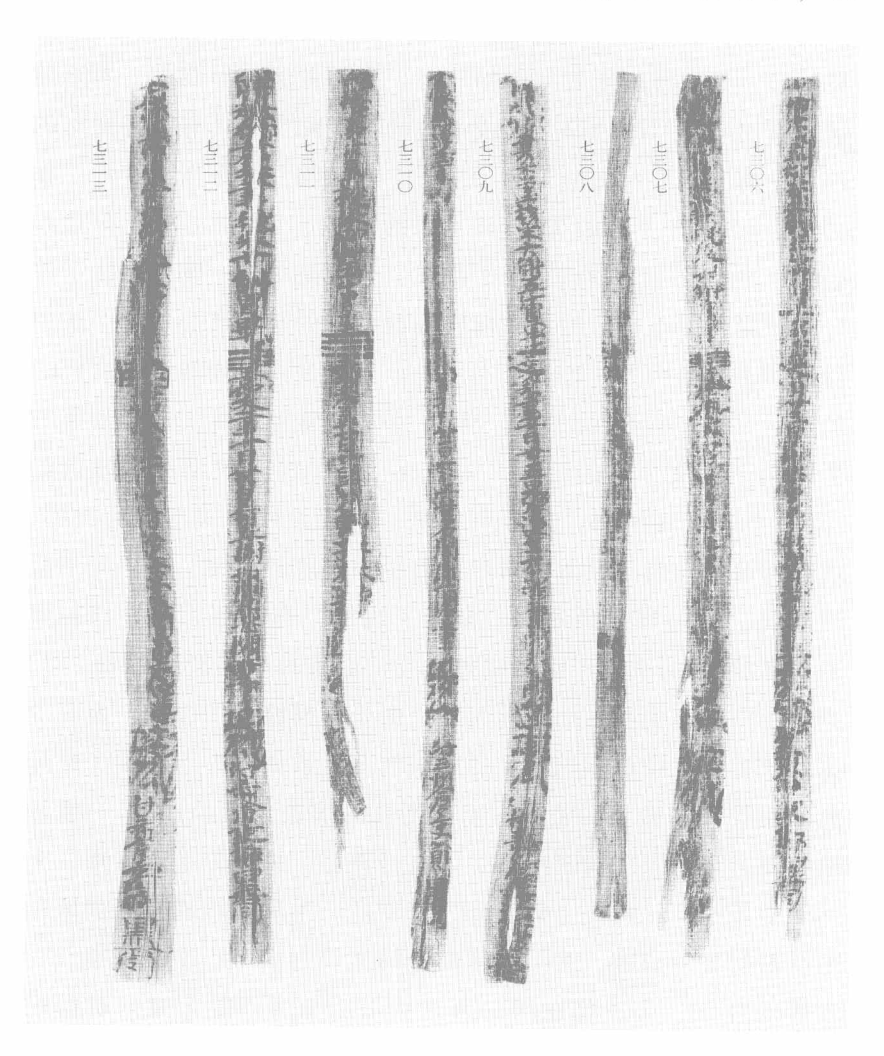


图54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7306–7313片

22.2—23.5厘米，宽0.5—1.2厘米，厚0.05—0.1厘米。竹简颜色一般呈棕褐色，剥离到里层的竹简，竹黄初显黄褐色，出土后转瞬即呈棕褐。由于长期埋在地下，受水和泥土污染腐蚀，竹简质地较差，编绳毕已朽断，从残存的痕迹看，竹简有的是用上下两道编绳连缀在一起，并且表层有一层薄薄的漆状物。竹简有事先编连好再书写的，文字一般书写在竹里。一简一行，记一事或数事。属于户税性质的竹简，两面书写，常常是正面（竹里）书写户品的等级和户訾（赀）的数量，背面（竹黄）书写户赀交纳后还必须遵守的规定。属于算赋性质的竹简，中间书写一"同"字或与"同"字具有同等意义的符号。竹简中曾见"右莂十四枚"、"右莂卅一枚"的内容，常常包括这一类的简。具有分莂后以为凭据的意义，与大木简分券的用意完全相同。竹简记载的赋税内容十分繁杂，征收的对象有米、布、钱、皮、豆等，其种类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此类竹简记载赋税的征缴、收藏和转运、调入，常常与长沙各级官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些签牌、木牍和竹简上经常出现三州仓、中仓、州中仓等仓名及"关邸阁"的名称。如签牌，长7.5厘米，宽3.3厘米，厚0.4厘米（原文图三二，签牌正、背）。木牍，长24.5厘米，宽7.5厘米，厚0.4厘米（原文图三三，木牍）。

关于户口簿籍内容的简牍，其形制与赋税简牍相同。黄簿即黄籍。《太平御览》卷606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走马楼简的户口籍简，长23厘米左右，与晋一尺二寸之制略异。黄簿主要记家庭住所、户主姓名、爵位、年龄及家口情况。在两汉简牍中有户籍资料发现，敦煌石室文书中也发现了西凉初建的户籍（图55），但数量都很少，而走马楼简牍户籍简数以千计。户口簿籍分别记载于木牍和竹简，涉及到的等级十分广泛。木牍一般长23—23.5厘米，宽4—5厘米，厚0.4—0.8厘米，颜色呈黄褐色。木牍上端绘有"同"字或同等意义的符号，木牍一侧尚保留用薄金属器划切的痕迹。简文结语经常使用"破莂保据"的字样，很显然是为剖莂分券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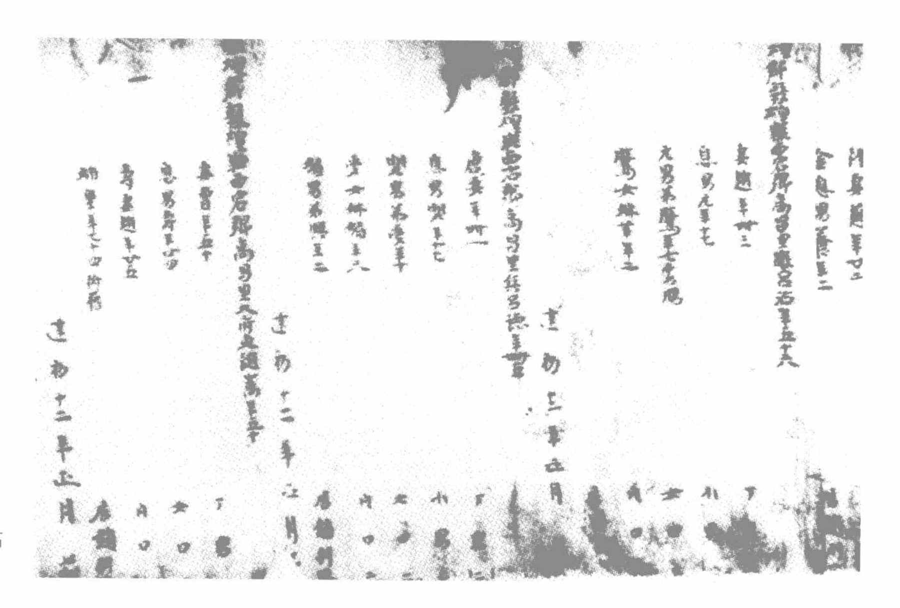


图55
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

的。木牍有上下两道编痕。

关于其他内容的官文书简牍，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为州、郡、县（侯国）各级官府之间、各部门之间往来文书，涉及征讨平息武陵蛮叛乱、军粮督运、借贷还粮、司法审讯、民案调查诸多方面。其中对三国时期一些著名的将领、官员，如步骘、吕岱、顾雍、潘濬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竹简的书写格式有单行、双行。形制大小同赋税简。木简长24.2厘米，宽1.5—1.9厘米，厚0.4—0.5厘米，例如，东阁祭酒刘武议（J22—2564，原文图三九）、主记史谭超省（J22—2561，原文图四十）。木牍长23.4—25厘米，宽6—9.6厘米，厚0.6—0.9厘米，例如“东乡劝农掾番琬叩头死罪白”（J22—2695，原文图四一）、“录事掾潘琬叩头死罪白”（J22—2540，原文图四二）。

关于私人信札、名刺、礼单等内容的简牍，性质杂乱，不相类属。名刺数量不多，内容为问安、谒见、荐举、赠物等。例如：长24.2厘米，宽3.2厘米，厚0.5厘米的木刺，背文为习字所写，正文与倒文相同（原文图四三，正、背）；长24.1厘米，宽6.1厘米，厚0.4厘米的木牍（原文图四四）。信札，木质，多为行书，两面书写，有些字迹漫漶不清。例如，长24.2厘米，宽3.2厘

米，厚0.4厘米的木牍（原文图四五）；长23.9厘米，宽3.4厘米，厚0.3厘米的木牍（原文图四六，正、背）。

另据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记录，三国木刺、木牍共有三次发现：一次是于1979年出土于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东吴高荣墓，时代系东吴早期，共出土木刺21枚，每枚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0.6厘米。出土木牍2枚，每枚长24.5厘米，宽9.5厘米，厚1厘米。其中一枚字迹不清，另一枚字迹较清晰，是随葬器的清单。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湖北鄂城县鄂城水泥厂1号墓的木刺。时代系东吴早期。木刺6枚出土时分散在墓室四周，长24—25厘米，宽3.3厘米，厚0.4厘米。还有一次是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安民村东吴朱然墓出土木刺共14枚，每枚长24.8厘米，宽3.4厘米，厚0.6厘米。出土木楬3枚，每枚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木楬项端中央墨书“谒”字。

二、三国时期帛书及纸的运用

东汉以来，造纸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推广，为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纸写书逐渐取代了简书、帛书，成为重要的图书出版形式。不过，纸写书完全取代简帛，大约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总的来说，三国时期，帛书和纸写本在出版物中所占分量不多，其原因在于帛书贵重，纸还不甚普及。

三国时正处在简帛并行的过渡期，并兼有其他形态的书写方式。东汉董卓之乱，国家藏书遭到破坏。《后汉书·儒林传序》曰：“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其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1] 军士还把帛书扯开制成车棚、提囊、口袋之类的用品。可见帛书在东汉末至三国还在使用，尚盛行未衰，直到三国以后，纸已流行，才逐渐减少。

三国时期帝王的诏书除了用木牍外，也有用帛素的记载，看不到纸诏。如建安四年（199年），刘备投奔曹操后，就与接受汉

[1]《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

献帝密诏的董承等人谋杀曹操，这道诏书是用帛素写后缝在衣带中，因而称“衣带诏”[1]。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密召王沈、王经、王业等大臣谋诛司马昭，“出怀中黄素诏示之”[2]。关于“黄素诏”，元胡三省注：“《说文》曰：素，白缴缯也。此黄素诏者，盖以白缴缯染为黄色以书诏。”[3]

三国时期著名文人所获得的赏赐大多为用于书写材料的帛，很少见到纸的记载。如，鱼豢《魏略》载：“邯郸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4]

此外，三国时期的文书档案的书写也多用简牍帛素，很少看到用纸的记载。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十月发布的《乙亥令》有“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日朔各进得失，书纸封函，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5]。这条命令是曹操要求丞相府的下属人员每月初一都要进言，尽管他求言心切，却特地命令主管官吏要限定额数，进言者限给纸一张、信函一个，足见当时纸的稀贵。杨修是曹操丞相府主管文书档案的主簿，他善于揣摩曹操的意向，每有事外出，都预先用数张纸写好准备回答曹操推问公事的教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丞相府实际上是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主管文书档案的主簿当然有条件用纸来写公文，而不必用木牍。

三国时期有关纸的史料记载极少，考古发现则近乎零，我们只能从有关书籍里找到一些零散的材料，其中魏国的有关记载还有几条，而蜀吴两国则是绝无仅有的。据有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期社会上出现或使用的名纸有“左伯纸”和“谷皮纸”。

“左伯纸”，见载于《三辅决录》挚虞注：“韦诞字仲将，……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合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笔，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之（应作“千”）言。’”左伯纸是东汉人左伯继承蔡伦而进一步改良的优质麻纸，韦诞说“御笔墨皆不合用”，唯独没有说纸不

[1]《三国志》卷32《蜀书·刘先主传》。

[2]《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

[3]《资治通鉴》卷77元胡三省注。

[4]《三国志》卷20《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

[5][唐]徐坚:《初学记》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62。

好用，可见当时朝廷使用的就是“左伯纸”。韦诞（179—253）是东汉末三国时魏国著名书法家，“左伯纸”产生于东汉末年，但属曹魏时皇家所使用的名纸则是无疑的。

“谷皮纸”又称谷纸，也是一种名纸，南朝梁刘孝感在《谢赍官纸启》中列举的四大名纸之一：中宫谷树（另三种是邺殿凤衔、汉朝鱼网、平准桃花），从三国吴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鱼虫疏》中，我们可以看到“谷树”的注脚：“谷，幽州人谓之谷桑，荆扬人谓之谷，中州人谓用之楮，……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谷皮纸。”据陆玑所说，谷皮纸产于江南，纸质洁白光辉，属魏晋时期南方的贡纸，应该是宫廷中后宫的用纸，故称“中宫谷树”。

在纸的使用方面，由于汉末以来长期战乱造成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三国时期造纸技术发展缓慢，虽有“左伯”、“谷树”之类的名纸可以书写图书档案，但仅限于统治阶级中少数上层人物使用，社会上普遍使用的还是帛素简牍和粗糙的笺记纸。

纸运用于书写，给通信带来了便利，见诸文献记载用纸写信始于东汉末年，马融（79—166）的《与窦伯向书》说：“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可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二十言耳。”[1] 从行文中可以看到马融收到写满两张纸的信很是高兴。公元195年东郡太守臧洪死守城池，袁绍久攻不下，令臧洪邑人陈琳作书劝降，臧洪“捐弃纸笔，一无所答”，陈琳又作书“援引古今，纷纭六纸”[2]，臧洪因此作书回绝。这件事说明当时往来用的是信纸。魏国上层人物也以纸写信。吴质《答东阿王书》说：“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3] 东阿王是曹植（192—232）的封号。可知曹植也以纸写信。蜀汉刘备也曾以纸写信，曹丕《答刘备书》中有“获累纸之命”[4] 一语可证。可知汉末三国时期，纸开始成为书信载体。

三国时书法家韦诞用纸写字，但他的纸笔是魏帝供给的，可见纸作为书法书写材料还是凤毛麟角的。在此前的记载中，书法

【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5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

【3】［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7，北京，中华书局，1958。

家写字是用帛素简札的。师宜官是汉灵帝时著名的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序》说他“甚矜其能，每书，辄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1]。说明这两个书法家是用木札写字的。师宜官气量狭窄，字迹不肯轻易授人，故梁鹄用酒肉计盗换其书写的木札，用为范本以练字，后也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张芝字伯英，也是汉末的大书法家，他练写草书，是先在衣帛上练习，然后再写在视为稀世珍宝的纸上的，“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寸纸不见遗，至今世人犹宝之”[2]。

在三国以前，就有以纸抄书的记载。东汉崔瑗（77—142）著有《许子》一书，抄录给友人，在给友人葛无甫的一封信中就写道：“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3] 崔瑗信中所说的纸可能就是“蔡侯纸”，虽然他更喜欢用缣帛誊录自己的著作送人，因为“贫不及素”而不得不采用纸，但也因此成为现知最早采用纸抄书的历史人物。另一条则见于《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其师）唐溪典以废笺记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4] 笺记是公文的一种，是写给长官的书启。笺记纸是当时社会上用来写信和记事的一般用纸，质地粗劣，不能用来抄书，也不能用来书写有保存价值的文书档案，所以尽管延笃的老师唐溪典让他用正面写过字的废笺记纸的背面来抄写《左传》，但延笃仍用背诵来代替抄书。直到建安三年（198年），汉献帝令荀悦按照《左传》的体裁将《汉书》改编为《汉纪》30篇，但还是“诏尚书给笔札”[5]。也就是说，到建安初年荀悦编纂《汉纪》是用木札。

纸之所以在三国时期没有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完全是因为当时的造纸技术尚未成熟到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水平。这个结论大概是合乎实际的。不过，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会稽山阴人，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佣书，是东汉以来专门

[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

[2]《三国志》卷21《魏书·刘劭传》裴松之注引《文章序录》。

[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后汉书》卷64《延笃传》唐颜师古注引。

[5]《后汉书》卷62《荀悦传》。荀悦《汉纪序》言“尚书给纸笔”，与此相异，中华书局，2002。

替人抄书的一种职业。会稽距离魏晋时期著名的藤纸产地剡溪（今浙江嵊县）不远。当时剡溪两岸遍地皆是的藤可以取代麻为纸张生产原料，于是较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便逐渐形成了。这说明当地的纸价并不昂贵，而价格不贵的原因是因为距离产地近。阚泽抄书主要用纸，说明纸的使用在当时某些地区还是经常的事。

三国时期用纸抄书的记载始见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这年曹操平定乌桓，特将汉末战乱中流落到南匈奴的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迎回中原。蔡邕是汉末的大名士，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家中"有书近万卷"[1]。后来曹操问及藏书事，她说父亲分给她四千卷书，全都散失了，现在她还能记忆默诵的才四百余篇，只要曹操给她纸笔，她都能默写出来。蔡琰出身于名门大族，像这样的书香门第抄书还要政府提供纸张，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晋初，当时西晋政府要抄写陈寿《三国志》，也是派官吏自带纸笔到陈家抄写的。

【1】《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

但当时的贵族文人中仍然存在贵帛贱纸的习惯，如魏文帝曹丕将自己的著作《典论》用帛和纸各写一套，作为外交礼物：把帛素写本赠给孙权，把纸抄写本赠给张昭。《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记载：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这材料说明两种情况：一是仍以帛书为尊贵；二是反映当时帛书、纸书并行。证明当时名纸虽稀贵，但还是贱于帛素（图56）。

曹魏官府设有管理纸张的机构。东汉时纸已作为书写材料储藏于宫廷中，以供朝廷之用。公元102年，邓太后掌政，"万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太后"悉令禁绝，但供纸墨而已"[2]。纸被用作外交的珍贵礼品，说明纸的生产量还是不大的。《后汉书·百官志》载：少府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尚书令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也就是说少府令所管的纸库供皇宫所需，尚书令右丞所管供百官所需。三国魏时，官府设立了管理纸张的机构"诸纸署监"，职为九品[3]。

【2】［唐］徐坚：《初学记》，5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清］钱仪吉：《三国会要》，4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图56
三国吴末帝建衡二年(270)《道德经》敦煌写本

三国时期，除了以纸帛为载体的出版物之外，还有以石刻为定本的儒家经典，最著名的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年）在洛阳太学立的石经，这是继东汉著名的熹平石经之后的第二批石经，称“正始石经”。石经用古文、篆字、隶字三种文字书写，也称“三体石经”。石经上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至庄公中叶止，未完）共三十五种碑（1922年在洛阳出土了正始石经的残石）。《三国志》记载：“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1] 著名学者王朗的《易传》也被刻石，立于太学。将书刻石，在当时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定本，供人们校

【1】《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

对、抄录，甚至捶拓，以订误正讹，平息纷争，《隋书·经籍志》载有三体石经的残卷，并指出："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这说明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捶拓是保存图书的方法之一；二是以石刻书，有对书及作者尊崇之意，以求永久保存。

总之，三国时期，由于汉末以来长期战乱造成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使造纸技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尤其是在建安初年，从上述的一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当时用来书写图书档案的良纸仅限于少数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使用。然而，名纸虽贵，还是贱于帛素，在曹操统一北方和三国鼎立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造纸技术得到发展，成本降低，其代替帛素和简札是必然的，虽然基本上完成这一过程是在两晋，但应该说三国时期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两晋十六国以纸为主、简帛为辅的出版物

一、两晋十六国的简帛书

两晋十六国时期，纸写书相当流行，成为这时图书出版物的主要形态，人们已习惯于用纸写书、抄书。这时虽然还有简、帛及以石刻为载体的图书出版物，但其在图书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流通范围也日趋狭窄。1949年后，晋代简牍很少发现，较重要的有下列两项，皆为楷书，故容易懂。一是吐鲁番晋简：1966年至1969年，在吐鲁番TAM53号墓出土木简一支，是泰始九年（273年）的纪年。二是南昌晋简：1974年，在江西南昌市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出土木简6支。这6支木简中，有5支约为25.3×3厘米，可以称为简，另外一支为26.2×15.1厘米，应称为牍，《文物》的发掘报告，称为木方，内容系陪葬品的清单。

关于帛书的形制，古籍中还未见到过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安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

朱介，青首，朱目。”又唐徐坚《初学记》卷21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帛可以根据需要截取，而且装饰也很漂亮，中画有界行(也有预先织成的)，其用红色的称为“朱丝栏”（朱介），黑色的称为“乌丝栏”。马王堆帛书上就画有极细的朱丝栏。从形式上看，朱丝栏很像编连的简策：每行宽6.7毫米，与简策宽度相近；大部分帛书是抄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其高度与二尺四寸简相近；每行字数，一般写六七十字，也与简相近；有的分上、下栏，很像简策的编绳。从内容上看，帛书有抄错抄漏之处，错漏的字数往往是一枚整简的字数，这说明帛书的形制是由竹书演化而来的，其内容也是由竹书转录而来的。

过去说到帛书，总以为是卷轴，其实卷轴式是后来变化了的形式。马王堆发现的帛书有两种形式：一是写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它是折叠存放在一个漆奁的下层；一是写在高24厘米的半幅帛上，才是卷轴存放的。可见帛书并非全是卷轴，半幅帛与整幅帛不同之处，是未分上下栏，每行只有30多字，其高度与一尺简相近。

帛书的计量单位是卷，由于帛书很多是由简策过录而来的，而且帛的幅度较长，所以在一卷内可包括策书的几篇。甚至一幅帛上，当一书抄完剩有余幅时，有时再写上其他文字附于后。马王堆帛书中也有这种情况，在一幅帛上抄有几种书，并且在每一种书的起首一行的上端，涂有一个墨钉作为标识，表示一书的开始，而书名则写在正文后面，并标以数字。

两晋时期，一些重要的图书是用缣帛来誊抄的。比如，《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序》就说，西晋秘书监荀勖整理国家藏书，共得29 945卷，对这些珍贵的国家藏书，荀勖是“书用缃素”来抄写，再“盛以缥囊”收藏。所谓“书用缃素”，则是当时仍使用帛书的明证。

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帛书，考古发现比较突出的，是北凉一代王妃墓发掘中出土的一件帛书。

北凉（401—439年），是我国东晋时期北方匈奴沮渠蒙逊建立的王国。传位二代，都城在姑臧城（今武威市）。北凉的政治、文化，远承秦汉，衍生于晋。北凉流亡政权奠定了吐鲁番盆地此后二百年高昌国（460—640年）的基础。

1972年冬天，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古墓清理工作时，发现了著名的北凉王室张氏家族墓地。1973年秋天，新疆博物馆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对这片张氏坟地进行了全面发掘，张氏家族是高昌地区中古时期最大的一门望族。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张氏家族墓地附近发现了两座北凉时期的墓葬，将竖穴偏室墓编为79TAM382，将找出墓道的墓葬编为383号墓。383号墓主人是北凉的一代王妃。这两座墓葬的发现，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北凉残余势力举国西迁的记载，使史学界对高昌北凉流亡政权的王室社会生活，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383号墓是一座小型斜坡墓道洞室墓，全长12.7米，深4.15米。墓室约3米见方，靠后壁留出高0.1米的生土台，上铺苇席，置棺木，有成年女性干尸一具，保存不好。出土随葬品共17件，其中帛书1件、绢画像1幅、丝织品5件、铜器2件、铅器5件、木器3件[1]。

在出土随葬品的清理中，这件帛书极有价值，帛书前部略有残缺，残长58厘米，高11.4—12厘米，用两块素绢粘联而成，存墨书汉文38行。内容为《北凉承平十六年（459年）十二月十八日大且渠武宣王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疏中除了记载墓内实际随葬的东西以外，还明确记载着墓中死者为“大凉承平十六岁在戊戌十二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大且渠武宣王夫人彭”（图57）。

二、两晋十六国的纸写本

两晋时期，纸的应用正在推广。陈寿死时，西晋惠帝曾“诏下河南，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国志》”[2]。这条记载表明魏晋时期，纸的应用正在推广。

[1] 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9）。

[2]《艺文类聚》卷58《杂文部·纸》，引王隐《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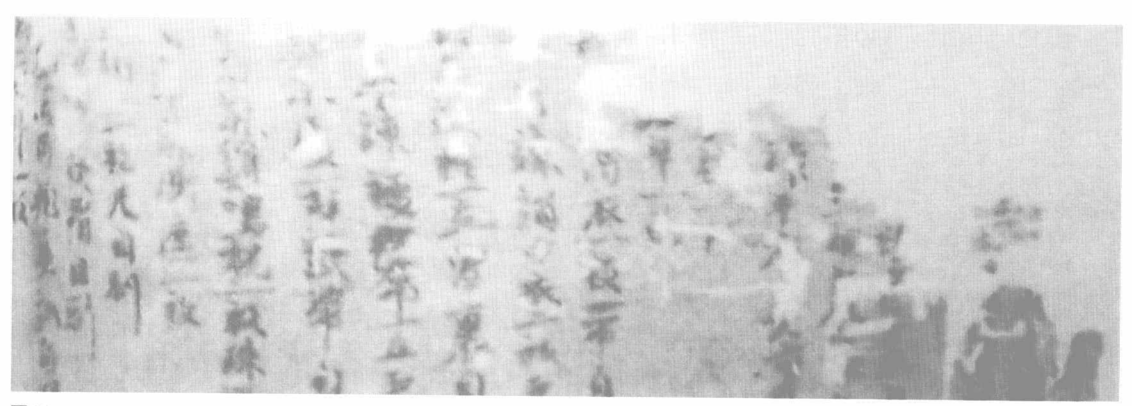


图57
吐鲁番出土北凉帛书“承平十六年随葬衣物疏”

虽然东汉至魏晋，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素贵纸贱”，用纸写书以为不敬；但纸书却以抄写携带方便、价廉物美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自然到处传播。现所见最早的歌咏纸的文章《纸赋》就出自西晋的傅咸（239—294）之手。所以魏晋以后（3、4世纪），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王公贵族之家也用纸写书了。西晋时，文学家左思（？—约336）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写成《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1]。荀勖（？—289）整理汲冢竹简书《穆天子传》后“以二尺黄纸”抄录[2]。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废太子遹，文献记载中出现过白纸、青纸与黄纸等三种颜色纸的名称，表明纸的种类在逐渐增多。太子遹《遗妃书》：“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使写。”[3] 惠帝因此有《以太子书及青纸示公卿诏》[4]。虽然西晋时纸的使用渐多，种类也超过以往，但在生活贫困的人眼里，纸还是贵重的东西。葛洪（283—363）少年时好学，为了写作，常常砍伐柴草自卖，以供纸笔[5]。

【1】《晋书》卷92《文苑·左思传》。

【2】［晋］荀勖：《上穆天子传序》。

【3】《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

【4】《全晋文》卷7。

【5】《晋书》卷72《葛洪传》。

从上述这些例子可知，在西晋上至皇帝、太子，下至士大夫、贫寒之士皆用纸；既用纸于写作，又用于诏令；既用于传抄著作，又用于缮写收藏于秘阁的典籍；官方有纸，寒士也可以买纸。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当时纸正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人们除了用纸撰写文章书籍外，还用纸创作书法，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纸本书法，虽然纸张的纤维已经老化，但由于几经装裱，精心保护，一直保存了一千七百多年，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了东晋，由于纸的增多，使图书价格逐渐低廉，一般人都可以用得起。而随着纸的流行，简、帛等图书形态逐渐被淘汰。东晋初年，著作郎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布纸（即麻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史，书写起居注。"[1] 可见，此时官府文件已在大量用纸了。又《太平御览》卷605引《语林》曰"王右军（羲之）为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这是一个郡的库存纸，说明当时纸的生产量实在不小（图58）。

【1】[唐]徐坚：《初学记》卷21引何法盛《中兴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唐]徐坚：《初学记》卷21《纸》，北京，中华书局，1962。

由于纸的用量与生产量的增加，纸终于完全代替竹简，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公元404年，东晋权臣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改国号楚，随即下令停止用简牍书写文书，而代之以黄纸，诏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2] 这是我国最早简废弃不用、用纸书写的规定。桓玄所说的黄纸，是经过黄蘗汁染过的纸，有防虫蠹的作用，是当时书写的主要材料。除了黄纸以外，当时还有其他种类的纸，如土纸、藤角纸。还有不同颜色的纸，如赤纸、缥红纸和五色纸等。由于统治者的承认，终于最后结束了竹简时代，确立了纸作为文字载体的绝对地位。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也证明晋灭之后，不再有简牍文书，而多为纸写材料。这一史实，也说明统治者在推广科学技术和促进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



图58
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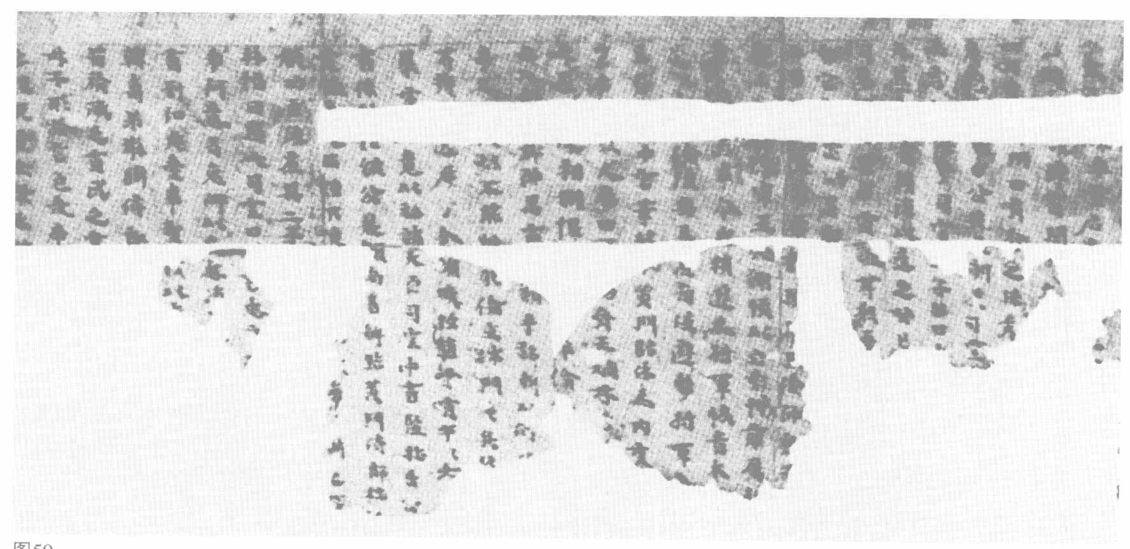


图59
东晋写本《毛诗关雎序》残卷

【1】[唐]徐坚:《初学记》卷21《纸》,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序》。



图60
新疆吐谷峪发现东晋佛经写本

用(图59、图60)。

北方也不例外,崔鸿《前燕录》记"慕容隽三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隽曰:'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1]表明十六国时期,纸在北方也代替了简。此外,《隋书·经籍志》记十六国时,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统治时文教兴盛,纸写本图书有些积累,宋武帝刘裕入关,收苻、姚府库所藏图书典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2]。

纸的广泛使用,对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绢帛由书写物变为征调物亦由于此。

纸的运用也促使汉字字体产生了变化,出现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所以从晋朝开始,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晋书法的代表人物,是被后人誉为"二王"的两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图61)。我国现存的书法珍品中,以"三希墨宝"最具魅力,它们是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快雪时

晴帖》被人称为“天下书法第一”，这部帖是麻纸写成，宽23.6厘米，长16.4厘米，行书3行，共28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中秋帖》是麻纸本，草书3行，共22字：“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肖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伯远帖》的作者王珣是王导的孙子，跟王献之是同族兄弟。这部帖也是麻纸，宽25.1厘米，长17.2厘米，行书5行，共47字：“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竟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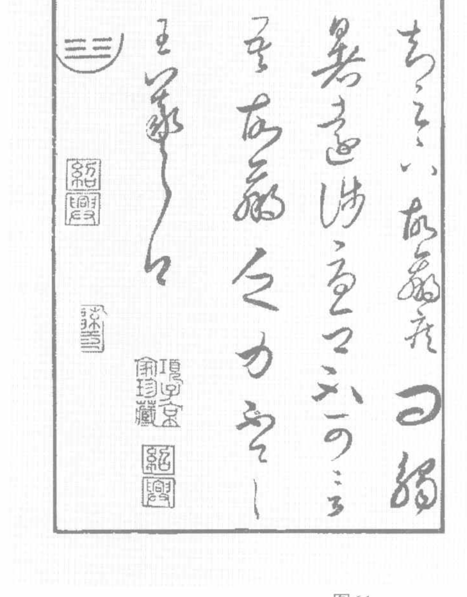


图61
王羲之《秋月帖》

20世纪初以来，从我国西部边疆和中亚发现许多晋代纸写件的残片，说明中国的纸不仅已经流行，而且已由内地向境外传播。其中1900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楼兰地区发现的一部分残片写有年代，其时代约为公元252—310年。1914年斯坦因于同一地区发现残纸数百件，为公元263—280年间的纸件。1902—1914年间的普鲁士考察团以及1909—1910年日本西本愿寺考察团也在吐鲁番及高昌地区发现了一批相同年代的纸制文件。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古烽燧遗址中，曾发现九封纸写的粟特文书信，认为写于西晋永嘉年间，即公元313年前后[1]。粟特文是居住在我国西北和前苏联中亚细亚一带粟特人所使用的文字，这九件纸写书信，可以说是最早的外族文字纸写物。1949年后，在新疆的哈拉和卓发现的书信纸，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汉文纸写书信。据考古研究，这些书信纸为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年）之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地区发现了26件年代约为346—907年的纸文书，这里边就有一些两晋时期的纸文书[2]。

通过对这些纸写物的类比排队，现存的早期纸写物为晋代人

【1】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7)。

【2】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

所写。如在新疆出土的写于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文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纸写文书。

除了纸写书信之外，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一批此期书写出版的纸本书籍。纸本书因导源于简册与缣帛，所以多有一定的尺寸。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1]。晋代一尺合今25厘米，即宽度约25厘米，长度约38厘米。据宋苏易简《文房四宝谱》中记载，晋朝制定所有造纸规格，大纸广1尺3分，长1尺8分，听参广1尺4寸；小纸广9寸5分，长1尺5寸。从敦煌文书来看，就生产的时代而言，东晋时代的纸张，有大小两种尺寸：年代早的，尺寸稍小，略近于汉代的尺牍；年代晚的，尺寸较大。

【1】[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

这时的纸写书，是以卷轴形式出现的。卷轴，是将幅度相等的纸粘合在一起，由后向前卷成一卷，纸面有直线和边栏为界，前后加签和轴，便于舒卷，后世称为“卷子本”。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至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抄书之语大致相符。

现存的古卷轴绝大多数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已知的敦煌古写本文书总数约4万余件，包括4世纪至10世纪的写本，绝大部分为手写卷子，最早有手抄于晋代的。1907、1908年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去万余件，法国人伯希和盗去7千余件，余下的现由国家图书馆保存。20世纪30年代，在陈垣先生主持下，将这部分写本编成目录，即《敦煌劫余录》。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用纸写的，写本中佛经居多，还有迄今稀见的经、史、子、集写本和公私文书、契约等。不仅有汉文，还有我国境内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和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文字书写的书卷和文书。1949年前，在我国西北新疆、甘肃等地曾发掘出数以千计的纸写文书、经卷残页，其中不少是晋代的。如发现于新疆鄯善吐峪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图62），发现于新疆楼兰遗址的晋代手抄《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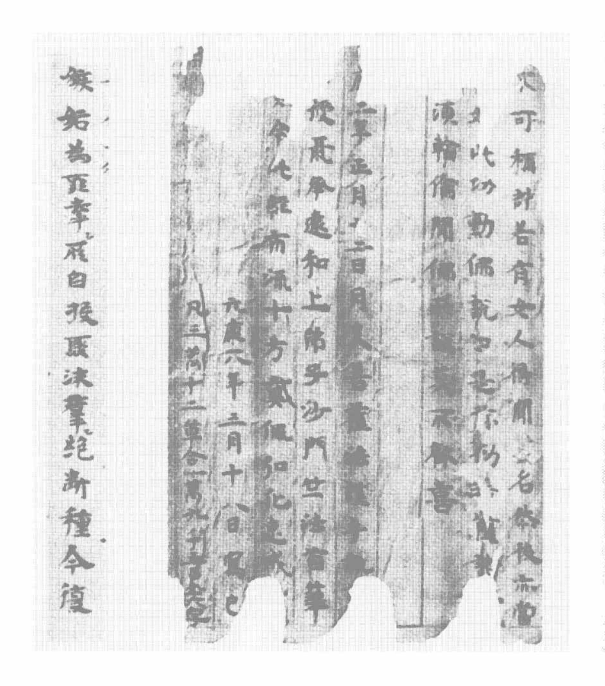


图62
西晋竺法护译写《诸佛要集经》残卷

图63
1924年发现的东晋《三国志》抄本

策》残页（现藏日本），都是早年的纸写实物。敦煌经卷中年代最早的就是一部抄写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的经卷《陀罗尼神咒经》卷，上面题有西晋咸宁四年（278年）七月七日的经跋，此经现流失国外[1]。

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了晋人手抄的《三国志》残卷（图63），它是陈寿撰成后不久抄写的。上有《吴书·虞翻传》、《张温传》的部分内容，计80行字，1 090字。后被英国人盗往国外，原卷已流入日本。

1965年初，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附近的—座佛塔遗址中，又发现晋人抄的《三国志》残卷，包括《吴书·吴主权传》和《魏书·臧洪传》，计40行，570余字。这两种抄本皆为隶书体，行款恭正，但非一人抄写。从时间上看，后者早于前者。这些晋人纸写书的发现，证明纸已成为晋代流行的书写材料。

据考证，这两份抄本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成书后不久抄写的，时间在3至4世纪。这可以算是我国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纸本书籍了。

【1】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卷首配图，中华书局，1962。

第三节　南北朝纸写本的普及

一、南北朝纸的普及

纸虽然出现较早，但真正用于书写和推广使用是在蔡伦造出质地优良的“蔡侯纸”之后。简策具有取材容易、整治刮削工艺简单、方便书写修改、连缀成册、容量加大等优点，虽能负载文字到处传播，但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厚重，不便翻阅，也难以携带。与笨重的简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轻柔的书写材料，那就是缣帛。用缣帛书写比用简策书写具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帛是舒卷成匹的，在书写的时候，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剪裁，随意舒展。决不会像简册那样出现散乱与倒错。其二，缣帛柔滑绵软，便于书写，质地轻薄，宜于收藏，倘在缣帛一端贯上一根轴，两端露出卷外，像车轴一样，则舒卷和携带都十分便利，不似简册那样庞大与笨重。其三，简册的竹简和竹简之间缝隙很大，宜于写字，不宜画图，而缣帛平整，面积也较大，适于作图。由于缣帛的这些优点，缣帛与简册几乎并行使用，简策是以“篇”来作为计算书籍的数量单位，帛书是以“卷”作为衡量藏书数的计量单位。

缣帛虽有许多优点，但以缣帛作书籍，成本太高，价钱昂贵，一般的人，一般的事务，是不会用缣帛的。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蔡伦传》中就说过“缣贵不便于用”的话。公元404年，东晋桓玄曾下令废简用纸，使纸的应用日益推广和普及。

黄纸与白纸之分，在那个时代，含有贵贱异等的意义。南朝立案，关于官府、官吏的事用黄纸，关于民事或犯罪官吏的事用白纸[1]。

【1】《南齐书》卷16《百官志》。

南北朝时期的纸的普及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民间造纸业发展。纸张原来多由尚方制造。但纸张原料易得，民间造纸业在逐渐发展中。盛弘之《荆州记》说枣阳县

有蔡伦宅、蔡子池。自蔡伦“以渔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作纸，盖伦之遗业也”。此即民间的造纸业。

南北朝的地主庄园，多有造纸作坊。谢灵运《山居赋》有“剥芨岩椒”，“采以为纸”的话。贾思勰《齐民要术》卷5《种谷楮》也有“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大，自能造纸”的话。到南北朝时代，纸的制造在民间显然已很普遍，这是纸所以能在那个时代完全代替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公私藏书的数量剧增。自从有了纸张，写字就更方便，小小一卷纸可以代替整车的竹木简，并且价钱便宜，连穷人也有抄书的机会了。知识得到普及，学者增加，著述自然也就多起来。晋初官书29 945卷，宋元嘉八年（432年）64 582卷，梁元帝（552—555年）在江陵有书七万余卷，北齐藏书大约三万卷，北周藏书一万五千余卷。至于私人藏书也慢慢多起来：三国王粲曾得蔡邕藏书数千卷，后由其子继续收藏，后来又传到族子王业手中；曹曾家中的书放在一个石窟存放，称为曹氏书仓；王修有书数百卷[1]；王业之子、玄学家王弼藏书最多，达万卷；蜀国丞相长史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2]。西晋郭泰有书五千卷[3]，张华徙居有书三十乘[4]，范蔚也有七千卷藏书，“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5]；宋齐以来贵族的藏书，已有“名簿”，即私人藏书目录。南朝到梁武帝时（502—549年），“四境之内，家有文史”[6]。

第三，南北朝的纸写本已经普及。清朝末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发现大批书籍，多为六朝唐人遗物，大部分为汉文，又有藏文、梵文、维吾尔文所写，间杂少量印本。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偷走了经卷的精华部分，现存伦敦、巴黎。其余较次的8 738件，又残页3614号，均存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之中。敦煌经卷中的南北朝写本，是南北朝时期纸写本的突出代表（图64）。

【1】《三国志》卷11《魏书·王修传》。

【2】《三国志》卷41《蜀书·向朗传》。

【3】《晋书·郭泰传》。

【4】《晋书》卷36《张华传》。

【5】《晋书》卷91《范平传附范蔚传》。

【6】《隋书》卷32《经籍志一·序》。

二、南北朝纸写本的形制

南北朝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与造纸技术的改良，纸写本



图64
敦煌经卷

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这从这一时期纸写本的卷轴制度、纸卷的形制、纸张的尺寸、纸书的粘接、纸书的界栏、纸书的注解、纸书的格式、用纸的数量等多方面表现出来。

帛书与纸卷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由于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书，就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帧[1]；隋炀帝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褾（包首）、带、帙、牙签等附用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问。

【1】[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

敦煌汉文遗书，现藏国内的有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处；国外收藏单位则有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印度、日本、韩国、德国等有关机构四十多处。已发现遗书合四万

卷左右，其中有纪年的约一千多卷。最早者除前文提到的抄写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的《陀罗尼神咒经》外，较早者还有英国藏（S.797）《十诵律波罗提木又戒本》，写于北凉建初元年(406年）十二月。这些纪年遗书，按纪年排列，大致可以分为南北朝、隋朝、唐朝、吐鲁番四期。各期遗书，形式不同，纸质、书法、字形等各有特征。北朝时期遗书，都写在麻纸上。尺寸稍小，一纸25—26×40厘米左右，有粗而厚者（0.15毫米)，有细而薄者（0.1毫米)，透视看，则皆有麻丝细片，知道是以麻布为原料。书法，处于由隶体到楷体过渡阶段，早期者与汉隶无异，晚期者颇近隋唐楷体，其与隋唐楷书相异的原因，是因用笔之不同。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遗书，如公元511—513年间，在敦煌镇官写经所令狐崇哲带领下，抄有大量写经，今存者不下十卷，513年令狐崇哲书《华严经》卷第三十九（S.9141）是其中一卷(图65)。又531—533年间，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捐献佛经数百



图65
敦煌千佛洞的《华严经》抄卷

卷，现在还保存若干卷，如公元533年，东阳王施写《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S.4415），其笔法与令狐崇哲稍异。从书卷上划界线所用的定规来看，令狐崇哲所书经卷与东阳王所寄进经卷等，总在每纸的右端，以针穿孔，以便于划线。英法收藏中有带南朝纪年者四卷，如公元506年书写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书法是完全的楷书，麻纸薄而细（厚0.08—0.09毫米）且韧，染色鲜明，褐色或黄褐色，也有黄色，表面施蜡，透视看无麻丝细片，所以知是捣碎树皮而抄造，即所谓“益州麻纸”，也叫“蜀郡麻纸”，后来的隋朝一直遵用南朝样式。吐鲁番遗书，几乎全是零碎断片，其中北朝前期者不在少数，而北朝后期又明显多于前期[1]。以下可以从几个方面大致了解一下南北朝时期纸写本的形制。

（一）纸书的材质。东晋六朝的写本，多用麻纸。如抄于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年）的《法华经文外义》，藏于上海博物馆（图66）；抄于北朝的《究竟大悲经卷第四》，藏于香港虚白斋；抄于北朝的《太子成道经》，藏于敦煌博物馆编号为3号；抄于北朝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五》，藏于敦煌博物馆编号为5号；抄于前凉时期的《法句经》，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1号。白麻纸：如抄于后凉吕光麟嘉五年（393年）年的《维摩诘经卷上》，藏于上海博物馆；抄于北朝的《大般涅槃经》，藏于敦煌博物馆编号为2号；抄于北朝初期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照明品第十》，藏于敦煌博物馆编号为4号。黄麻纸：如抄于北朝的《大般涅槃经》，藏于敦煌博物馆编号为12号；抄于西魏的《敦煌太守邓秀彦妻元法英供养为一切》，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4号。

（二）纸卷的形制。纸卷的形制是沿袭帛书卷轴形制，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敦煌所出的写本，几乎全部为卷轴形式，把几张纸粘接成一长幅，一端用一根小木棒做轴，把纸卷起来成一卷，同现在所看到的书轴一样。因多为民间善男信女、僧俗所施写，故木轴很朴

[1]〔日〕藤枝晃：《敦煌遗书之分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图66
上海博物馆藏《法华经文外义》

素。不如当时帝王对于书轴的材料极为讲究，宋明帝所装二王法书，有金、珊瑚、玳瑁、旃檀等轴。

(三) 纸书的尺寸。南北朝时代的纸张，继承晋制，也有大小两种尺寸，然大抵而言，略大于晋纸。纸幅的大小与产地有关，如蜀纸便较一般的纸宽而高。小幅的敦煌文书的尺寸，大抵在宽21厘米、高19厘米的幅度之间。较宽的达到24厘米，较窄的只有16厘米。大幅的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抄书之语大致相符。

(四) 用纸的数量。敦煌文书无论是卷子或册叶本，系将纸逐张粘接而成。由于当时纸张并不充裕，用纸力求节俭，所以重要文书记有用纸数量，也可以作为日后审查文书是否有残损的根据。敦煌文书题记中，常记有用纸数量，尤以佛经居多，像四部典籍与道经则较少。计量纸的多寡，大抵以“张”为单位，偶有用“枚”的；也有仅记数目，而没有计量单位的。从经卷文书题记的记载看，各卷用纸大致在20—40张之间。

(五) 纸书的粘接。纸书长卷的制作，需经粘接。纸卷的粘连在较多的情况下是先在单纸上抄写完书的内容，再逐张连接。如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六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卷7，在僖公二十八年传“余赐女孟诸之麋”句下，有关“孟诸”的注文则因粘贴不慎被盖住了1/3行[1]。古人用浆糊粘连纸卷，在粘接书卷的方法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据文献记载，粘接纸是“用古椿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粘接纸接缝”，可“永不脱解”。白芨是一种植物药材，块茎含糊液质和淀粉等，可做糊剂，用它调和的粘糊，不但能使纸接缝牢固，大概也可以对纸起到保护作用，使之不易腐朽。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10米，甚至十数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

[1] 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民国初影印本。

（六）纸书的界栏。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敦煌写本每卷有浅淡如铅笔划成的天地线与直线，后来印本也都有墨栏。每一直行和一根竹简的宽度与长度相近，可说是古竹简制度的痕迹。界栏是指文书的纸面以直线与边栏所画成的界格，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界栏一般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用朱笔画出界栏者，称为“朱丝栏”；用墨笔画出界栏者，称为“乌丝栏”；也有用铅笔画出界栏的，这是因为使用朱、墨画界栏，同一叶中有时难免造成深浅浓淡之别，不够美观，而用铅笔线，则可以除去没有调匀的缺点。

敦煌文书中，凡佛经、道经及儒家重要典籍，多由正式写书家所抄，行款精细，大都画有界栏。画有朱丝栏的文书，不及画有乌丝栏的文书清晰，然而仍然可以辨认，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编号为4560号的《维摩诘经卷下》。不过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朱丝栏甚少，大多为唐以后的文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界栏形式是画有乌丝栏的文书，数量甚多，不胜枚举。如抄于后凉吕光麟嘉五年（393年）的《维摩诘经卷上》，上海博物馆收藏（图67）；抄于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的《太上洞玄灵宝妙经众篇序章》，日本京都博物馆藏，编号253；抄于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年）的《法华经文外义》，上海博物馆收藏；抄于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九》，上海博物馆收藏；抄于北朝的《究竟大悲经卷第四》，香港刘氏虚白斋收藏（图68）。

图67（左）
上海博物馆藏《维摩诘经卷上》

图68（右）
香港刘氏虚白斋藏《究竟大悲经卷第四》

（七）纸卷的字数。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每纸行数在八行到十几行之间，每行字数在十几字到二十字的都有（图69）。以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法国巴黎所藏六朝写本《毛诗传笺》残本、《春秋经传集解》残本为例，因各卷皆由不同抄手抄成，故每纸行数、每行字数均不相等，大致每纸行数在8—12行之间，每行字数在12—20字之间，平均为每纸10行、每行15字[1]。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有的卷子正面抄佛经，背面抄四部典籍，或者相反；有的正面抄佛经，背面抄道经；有的正面为汉文文字，背面为其他文字，如回鹘文、藏文、梵文、粟特文等。

[1] 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民国初影印本。

（八）纸卷的格式。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图70、图71)。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然后写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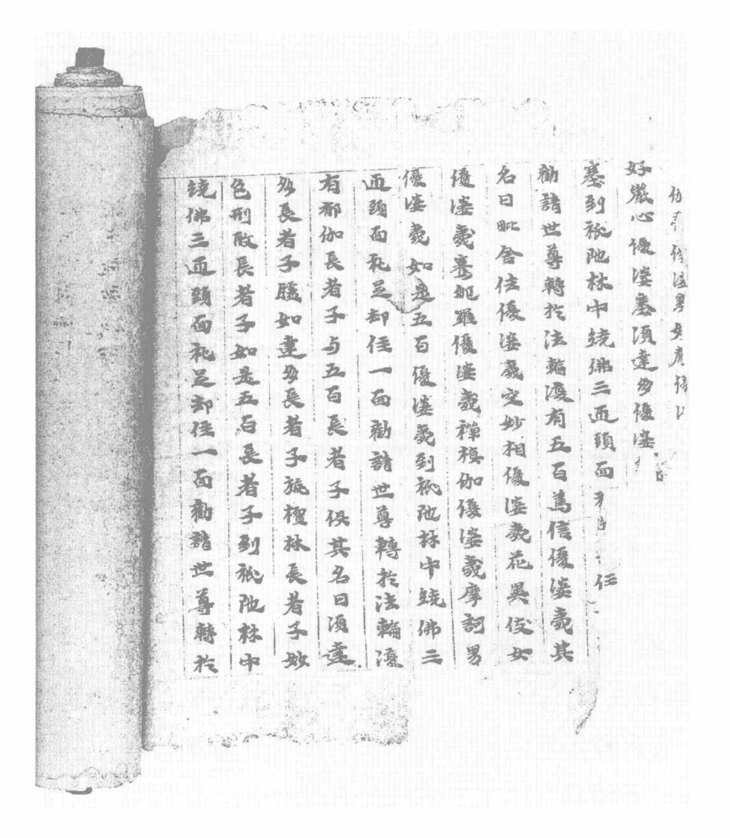


图69（左）
敦煌千佛洞写于521年的佛经抄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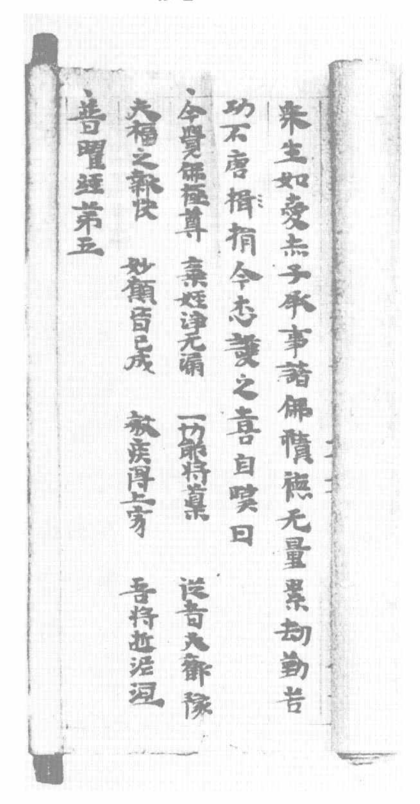


图70（右）
敦煌千佛洞写于北魏天兴三年（400年）的《普曜经》抄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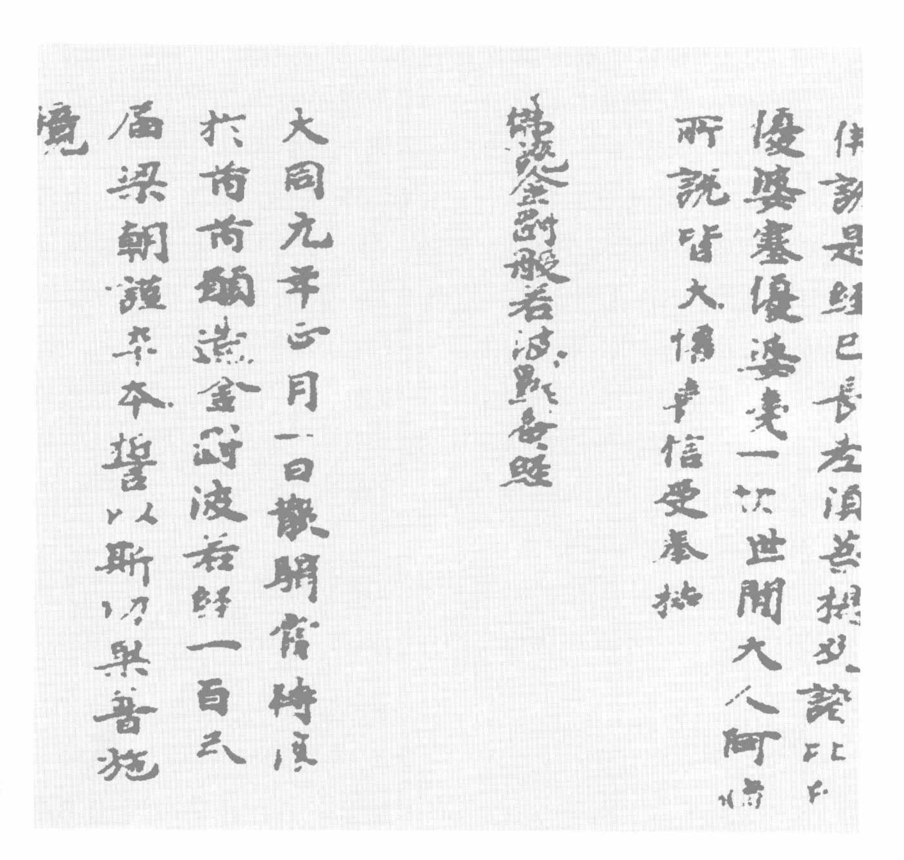


图71
梁大同九年（543年）写本
《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如抄写于西魏，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敦煌文书斯坦因编号736的《大比丘尼羯磨一卷》，卷末就有长篇题记[1]（图72）。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

【1】林聪明：《敦煌文书学》，282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

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

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

图72
斯坦因736号《大比丘尼羯磨一卷》卷末题识。西魏文帝大统九年（543年）抄本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相关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笔的改进，使得中国的文字向着简化、工整、规范和易于镌刻、复制的方向发展；而造纸技术的提高及墨、砚的发明、发展和应用，为印刷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承印和转印材料；以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为基础的盖印和拓印不断完善和结合，为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技术基础；社会的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造就了发明印刷术的社会环境和客观要求。这四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具备和结合，使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一节　造纸技术的提高

魏晋是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发展较快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造纸业的迅速成长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造纸原料的扩大，工艺技术的提高，纸张取代竹简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比起两汉，无论是纸的产量、质量或是种类，均有长足的发展。造纸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图书档案制作材料的变革，我国图籍的制作材料从以帛素、简牍为主过渡到普遍使用纸张，基本上是在魏晋时期完成的。

考古学证明纸在西汉已经发明。但造纸业的普遍，造纸技术

的进步，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南朝梁时。

一、纸张质量的提高

纸是印刷术的承印物，是知识和信息的载体。由于有了纸，印刷术才得以完善，并迅速推广开来。纸同印刷术一起，对人类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瞩目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历史上，纸有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之分。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中，把纸解释为人们漂丝时残留在竹席子上的一层碎丝绵晾干后所形成的一张薄片。将这种粘附在席子上的薄丝绵片加以利用，最初可能是无意的，后来就有意识地进行加工，制成一种漂丝的副产品，当时称之为“纸”。然而，这种纸价格贵、数量少，是难以推广使用的。人们在总结动物纤维纸的制作工艺之后，经过不断摸索、实践，终于发明了人们现在所说的纸——植物纤维纸。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东汉到魏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造纸技术的进步，纸的使用逐渐普及，终于代替了帛素简牍。我国图书档案书写材料的又一次大变革，基本上是在魏晋时期完成的。

根据学者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西汉的纸是一种质地粗厚的麻纸，多用以包裹物品，不适于书写[1]。东汉时，造纸技术已有所进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笺记纸，这种纸虽还不适宜用于书写图书档案，但可以用来记事和写信[2]。东汉和帝时，宫廷中制作出一种用于书写图书档案的纸，后人称之为“蔡侯纸”。“蔡侯纸”，就是由尚书令蔡伦监制的一种纸。《初学记》曰：“伦捣故鱼网作纸，名网纸；后人以生布作纸，丝縆如麻，名麻纸；以树皮作纸，名谷纸。”“蔡侯纸”之所以被后人列为名纸，应该是因为其比以前制作的麻纸精细，纸质较细较白，可以用来书写图书档案。至于谷纸，则正如《初学记》所引，并非蔡伦制作，是后来才出现的（图73）。

两汉造纸术的出现，开辟了新的造纸原料，纸在社会上日益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3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后汉书》卷64《延笃传》李贤注。



图73
楼兰出土残纸

流通，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自从东汉蔡伦对造纸作出重大贡献以后，中国的造纸技术又有不断的改进。魏晋时期，纸的应用正在推广。魏晋以后，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到东晋，纸终于完全代替竹简，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造纸技术又有较大发展，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国之后，特别是晋代，纸在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表现在纸的白度增加，表面较光洁，纤维束减少，质地细薄坚实，易于书写，因此人们日益喜纸而淡帛了。有的文人还以纸为题材作诗赋加以歌颂。如晋代傅咸《纸赋》曰："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表达了对纸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说明这时的纸张质量有了明显的进步。

西晋建立后，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又出现了短期的统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造纸技术在承继三国时期的基础上，有了较明显的进步。有学者根据近现代的考古发现，将出土的汉纸与晋纸进行比较，发现晋纸的加工比汉纸精细，纸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表现在"汉纸白度差些，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质粗厚"，而晋纸则"洁白平滑而又方正"[1]。这与西晋傅咸《纸赋》所说的"廉方有则，体洁性真"，以及南朝梁人萧绎《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所称颂的正相吻合（图74）。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技术发展的又一大成就是纸的研光与染色，也就是纸张除白色之外，又被染成各种颜色。如王羲之紫纸、石虎五色纸、简文帝红笺及四色笺。梁代用石头把纸研光，称研光纸。人们用植物原料来染纸，制作各种彩色纸，南朝制造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52—5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图74
敦煌悬泉置出土西晋纸文书残片

的纸不但洁白精美，而且还有红笺等彩色纸张。梁朝的时候，纸的制作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梁江洪《为傅建康咏红笺诗》写红笺“灼烁类蕖开，轻明似霞破”。梁刘孝威的《谢赍官纸启》写梁时官纸质量之高，“虽复邺殿凤衔，汉朝鱼网，平准桃花，中宫谷树（以树皮作纸名谷纸），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光”[1]。

另外，根据考古发现，我国纸的涂布技术也是始于晋代。为了提高纸张的平滑度、白度、不透明度、均匀度，改善其吸墨性，降低其吸湿性，中国古代发明了将白色矿物粉借淀粉糊成胶粘剂均匀涂布在纸面的技术。这种纸，古代称粉笺，近代叫涂布纸。近年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即晋穆帝永和四年，384年）纸和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用纸，经检验，均属表面有涂布的麻纸[2]。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威斯纳（J.Wisner）对新疆出土的中国南北朝（至7世纪）古纸作了化验之后，反映出纸表涂有一层石膏粉[3]。这说明南北朝时，中国已经掌握了涂布技术。过去我们在检验南北朝古纸时，也发现过这类纸。不仅如此，从新疆哈拉和卓十六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4世纪古纸中，也发现了涂布纸。涂布料一般用烧石膏、高岭土、滑石粉、白垩等

【1】上述均见《初学记》卷21《纸第七》。

【2】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

【3】赫恩勒:《谁是破布纸的发明者？》,《亚洲文会学报》,22卷,681页,1903。

细粉。据美国造纸专家亨特（Dard Hunter）说，欧洲纸的涂布技术出现于18世纪，“1764年库明斯（George Cummings）首次在英国获得涂布纸专利权。他用铅白、巴黎石膏、石灰和水混合，用刷涂于纸上。这看来是欧洲最早的涂布纸。这些方法为中国人首先使用”[1]。涂布能使纸张更加洁白、平滑而吸墨性好，质地差的麻纸经涂布后，便可以用以抄写图书和档案。同时，晋代造纸用的原料种类增多，尤其是东晋南渡后，南方经济迅速繁荣，造纸业在江南发展更快了。

【1】〔英〕亨特：《造纸——一种古老工艺的历史及技术》，英国伦敦第二版，496页。

自从东汉蔡伦用树皮、破布等植物纤维造纸之后，魏晋造纸原料更加扩大，许多植物纤维都可用于造纸，纸的种类逐渐增多。除麻类纤维纸之处，以藤为原料的纸称“藤纸”，又称“藤角纸”；以水草作原料的纸称“苔纸”，因纹路侧斜，又称“侧理纸”。还有用桑皮制造的纸、草纸、布纸等。

西晋以后不仅利用麻纤维来造麻纸，而且利用藤来制造藤纸。用三吴所产野藤皮制造的藤皮纸，质地优良。至东晋，藤纸的产量增多，这样，就使造纸原料更易获得，纸张成本较前降低，纸的产量增多，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曾将会稽郡库存纸九万赠与名臣谢安[2]，说明纸的消费量已逐步增长。当时，浙江的剡县（嵊县）和余杭的由拳村是藤纸的著名产地，据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云：“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中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百郡，洎东雒（洛阳）、西雍（长安），历见言书文者，皆经剡纸相夸。”由此可见，剡溪上游一带的藤纸生产成为当地人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在洛阳、长安一带非常著名。藤皮纸纸质优良，不仅应用于民间，还被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书。东晋时范宁令下属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3]

【2】《太平御览》卷605引《语林》。

【3】《太平御览》卷605。

西晋时还创制了一种以水草为原料的加工纸，称为“发笺”，亦称“苔纸”。发笺是一种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加工纸，系在捞纸前向纸浆中添加少量有色的纤维状物质，再打槽捞纸，于是纸面呈现纵横交织的有色纹理。由于添加物质常用绿色的水苔或黑色

的发菜之类，故称为发笺或苔纸。按《太平御览》卷605、宋人苏易简《文房四宝》卷4均引后秦王嘉《拾遗记》记载：西晋张华著《博物志》成，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此纸乃南人以海苔作成，呈青绿色，并有纵横斜侧的纹理，此苔名陟厘，后人更讹为侧理，因之名曰侧理纸。苔纸系借纸浆中装饰用的填料而得名，并非指整个纸的原料而言。

东晋时，采用纯大麻造纸，纸质坚韧而耐水浸，纸色细致而洁白。遗存至今的大麻纸，如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写本《羯摩经》，距今已有1 500多年，竟未发黄变脆，这是与纤维素的强度、纸浆的纯净分不开的。用麻制造的纸，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书写和印书最主要的纸张。

敦煌文书的主要材料为纸，虽然时代久远，由于在石室中封闭多年，未受阳光、空气、水分与虫蛀的侵蚀破坏，其保存状况颇为良好，实是研究中国古纸的极佳材料。考敦煌使用的纸，除少数自外地，如蜀地、洛阳等中原地区输入外，大部分为就地取材，多以麻、楮、桑为材料。至于竹纸，乃是长江流域的特产，很少见于敦煌文书之中。

前面说过，胡三省说三国时用版诏，入晋时才用青纸诏。宋人苏易简也说："晋时为诏以青纸紫泥。"[1] 他们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据《晋书·楚王玮传》，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楚王玮以擅杀汝南王司马亮罪被斩，临刑前"出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可以证实胡、苏二人所言不虚。青纸除用于诏书还用于写书。据《北史·牛弘传》：东晋末年，刘裕平定后秦姚泓，"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

[1] [宋]苏易简：《文房四宝·纸谱》，北京，中华书局，1985。

西晋时诏令文书主要用青纸，到了东晋时诏令文书出现多种色纸，其中以黄纸居多。纸的染色始于汉代，而黄纸的广泛使用却见载于东晋。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都说，当时的黄纸是用黄蘗染色的。黄蘗皮色黄味苦，能杀虫防蛀，用来书写有利于图书档案的长期保存，是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的防虫蛀的方法，也是造纸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晋代黄纸的制作有两种方法，一是先写后潢，二是先潢后写。西晋的陆云为其兄陆机编纂文集12卷，抄完11卷时写信给陆机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1] 这是抄完书后再染潢的例子。《晋书》卷36《刘卞传》载："（卞）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 这里讲的是先潢后写。刘卞是兖州东平郡人，原被本州郡的中正评为九品中的四品，在尚书台当官，朝廷里推一鹿车黄纸叫他抄写。这一记载说明，西晋政府机构用黄纸书写文书档案已是相当普遍了。晋代大臣给皇帝上奏章也是用黄纸。崔鸿《前燕录》载：前燕慕容俊三年（晋穆帝永和四年，384年），慕容俊即燕王位，尚未称帝而称臣于晋朝，有僚属给他上奏疏用黄纸，他便下令说："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2] 这条记载说明，晋代朝臣给皇帝上奏章是用黄纸，而给王公上书则用白纸。黄纸除用于官府公文之外也广泛用于抄写图书。随着黄纸成为社会上写书、写字、绘画和官府公文的主要书写材料，到了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桓玄篡位后曾下一道诏书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3] 此禁令的发布反映了东晋末年用刀笔刻写文书档案已近尾声，至此，简全部为纸所代替，这是中国公文书写材料的重要进步。

【1】《陆文龙集》卷8。

【2】[宋]苏易简：《文房四宝·纸谱》。

【3】[唐] 徐坚：《初学记》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62。

晋代纸的染色当然不止是黄、青二色。《邺中记》载："（后赵）石虎诏书，以五色纸着凤雏口中。" 又《桓玄伪事》说：桓玄篡位后，"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这些均被后人列为名纸。

纸的制作工艺及其原理，自发明迄今两千年来，并无多大实质性变化。其制作方法，是将砍伐来的植物，比如麻类植物，用水浸泡，剥其皮，再用刀剁碎，放在锅里煮，待晾凉后再行浸泡、脚踩，用棍棒搅拌，使其纤维变碎、变细，然后掺入辅料，制成纸浆，最后用抄纸器（竹帘之类）进行抄捞、晾干，即可制成为纸。

纸的制作技术，到东晋南北朝之时，也大有提高，尤其是民间的制纸技术。《宋书》卷52《张永传》记张永“有巧思”，为宋文帝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文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磋，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张永自己造的纸，比皇帝用的纸还要好。

晋代造纸技术的一大成就是出现了用横帘竖帘捞纸的方法，西晋时创制的艺术加工纸“发笺”（又称“苔纸”）已经利用这一技术。纸帘是手工造纸时代的捞纸工具，即抄纸器。抄纸时，纸帘平放在木制帘床上，左右两边用边柱压实绷紧，双手提起，斜插入浆池之中，纸浆便流到纸帘上面。取出纸帘，翻扣在平板上，这样一层一层地叠起来，挤出水后，逐张刷在墙壁上晾干，这便是用纸帘抄纸的全过程。纸晾干后，纸帘上的纹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帘纹。精美的帘纹对纸张有很好的装饰作用。纸帘在我国造纸业中很早就开始应用，汉代造纸没有固定纸帘，表现为纸面帘纹不清，而晋代纸帘的制造和使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在见到的晋纸坚实轻薄，透眼少，纸面上帘纹遗迹非常清楚。纸帘的使用是造纸技术上的重要革命，不仅增加了纸的产量，而且提高了纸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纸的成本，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创造了条件[1]。

【1】〔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63—6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纸的帘纹是纸浆打成后，荡帘抄纸所形成的。从敦煌文书中的帘纹来看，或粗或细：粗帘纹系用较粗的竹篾条编成帘床所致，细帘纹则是由细的竹篾条编成帘床之故。大体来说，东晋南朝之时，多为粗横帘纹。

二、纸的染潢与保护

由于书的珍贵，所以人们把爱护图书称为美德。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说：“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他还讲：“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

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

爱护书还要特别注意防虫蠹，早在汉魏时，中国就用黄蘗汁染纸，除增添黄色外，还因染液中小柏硷的存在而具有防蛀作用。由于从东汉以来图书出版物开始以纸为载体，所以至三国时，官府中的藏书已有纸卷书。纸卷书容易生蠹虫，纸书防虫的问题是藏书家的老大难。魏时采用芸香防虫的办法，当时人鱼豢《魏略》记录了下来：“芸台，香辟纸鱼蠹，故藏书台称芸台。”[1]魏时因采用芸香防书虫而使藏书台有芸台之称。芸香防治书蛀的办法后来一直为藏书者采用，至今仍有沿用者。魏晋南北朝时书写纸一般是用黄蘗汁染过，刘熙《释名》释“潢”为染纸，染过的纸发黄，故称“黄纸”。黄蘗汁液中的化学成分可以使纸长期防蛀。

【1】［唐］徐坚：《初学记》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62。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西晋荀勖整理汲冢竹简后，在《穆天子传叙》中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

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纸的最大敌人除水、火、老鼠、土鳖外，又有书虫（旧称蠹鱼）。古人对书虫除于书橱“安放麝香木瓜，令蠹虫不生”外，又发明了黄蘗汁染纸避蠹的办法。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3中，载有“染潢及治书法”，详细叙述了用黄蘗汁染书的方法。

染潢及治书法，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3《杂说》，其具体做法是：“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人浸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蠹压讫，复捣煮之，三捣两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功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

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久则零落矣。豆黄特不宜裛，裛则全不入潢矣。”（图75）

图75
贾思勰《齐民要术》“染潢法”

可见这一方法是先将止消渴、杀蛀虫的植物黄蘖泡在水里，浸出纯汁；然后把渣滓捣烂来煮，煮过装入布袋，挤出渣里的汁，再取出捣煮，前后捣三次，煮两次，所得的汁，与最初泡出的纯汁掺合在一起。以之染纸，变成黄色，不生蛀虫。

这种方法不仅对于没有写过的纸适用，对于已经写过的纸也可以采取上述染法。但如果若干纸张已粘成一卷书，则最好过一夏天再染，这时纸的衔接处才不致脱离。未经染潢的书卷，先用熨斗烫过接缝之处，然后入潢，以免脱开。这是中国关于染纸最早的详细记载。

因为黄蘖能“杀蛀虫”，所以古书多先写后潢。这一防止纸张、书籍被虫蛀，延长纸的寿命、保护书籍的方法，在唐代应用更为广泛，并传播到日本。唐人用光泽莹滑的硬黄纸写经，“染

[1]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明]屠隆:《考盘事》卷5。

以黄蘖，取其辟蠹”[1]。今所见敦煌六朝唐人写经，完全用潢纸，虽有残破而无虫蛀，就得力于潢染。

此期发明的染潢技术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有专门的工匠负责染潢工作，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唐秘书省有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潢，《集韵》音胡广切。《释名》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法，后有雌黄治书法，则古用潢纸写书久矣。写讫，入潢，避蠹也。今唯《释藏经》如此，先写后潢。《要术》又云：‘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则打纸工盖熟纸匠也。予有旧佛经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诏于大明宫译，后有鱼朝恩衔，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也。”所以唐代书籍往往写上“装潢手”辅文开、解善等人姓名。弘文馆有“熟纸装潢匠九人”，秘书省有“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宋代以后只有装裱匠，而少染书的装潢匠了。宋淳熙四年（1177年）为避免“蠹鱼伤牍”，特用“椒纸”印造《尚书》、《左传》等各十部，以供孝宗阅览。用能避蠹的纸来印书，是值得提倡的。从现存晋以来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虫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虫法是行之有效的。

除染潢技术外，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对纸的修治、保护技术，如涂改、补纸、晒纸、装帧等种种技艺。

涂改技术：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仍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宜’”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补纸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不仅懂得染纸，而且能补纸。在《齐民要术》一书中，也讲到修补纸张的方法。据称，用薄似薤叶的纸来补，可以做到“纤维相入，殆无际会”的地

步。这种补过的纸，如果不向亮光照着看，就不会觉察到是补过的。

晒纸技术：在《齐民要术》中，还讲到如何保存书卷。其法：在阴历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把书卷摊开来晒三次。晒的时候，要放在屋檐之下的通风凉爽地方，不宜直接放在阳光之下来晒。而且晒热的书，须等其热散去以后，才能卷好收起，否则更易生虫。

装帧技术：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古人又称为“褾”。褾的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备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这样，褾、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我国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第二节　笔、墨、砚的使用和改进

一、笔、墨、砚生产技术的提高

（一）笔的制作技术的提高

出版物印刷必有印版。最早发明的雕版印刷术的印版是手工雕刻的，而在雕刻之前必须先书写字样。书写字样使用的工具就是毛笔。因此，笔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是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毛笔的发明和应用，对印刷术的影响与作用有二：一是毛笔对汉字的发展演变具有推动作用，为印刷术提供了易于书写和镌刻的规范文字；二是它为印刷术提供了手书上版、书写字样的工具。

笔的历史甚为久远。其产生的年代，过去人们一直依晋崔豹《古今注》中"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之说，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创造的，但出土文物证明，毛笔远在蒙恬之前很久就有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朱、褐、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线条图案，这些线条起落处的笔势，很像是类似于毛笔之类的工具描画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朱书、墨书的，而且甲骨文中已有笔的象形字"聿"，看来，远在三千年以前的商朝已有毛笔是无庸置疑的。从文献记载来看，《庄子》说"舐笔和墨"，《韩诗外传》说"墨笔操牍"，可见蒙恬以前就已有笔。

古笔比较简朴，或以竹、或以毛，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毛笔是中国特有的书写工具，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图书出版技术更是与毛笔制作工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密切相关。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古墓中出土了一支迄今所见最早的毛笔实物——楚国笔。这支笔笔杆长18.5厘米，杆粗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笔杆系竹制实心，笔头为兔箭毛，笔头紧

紧地扎缚在笔管的一端，用细丝麻缠紧，再涂上漆汁。这种笔，适于在竹木上书写，不便于像今人用毛笔写字那样挥洒。此笔还配有一支竹筒，长23.5厘米，整支毛笔可放置其中。

蒙恬的主要功劳是对毛笔的笔头和形制作了重大改进。据说，蒙恬是在出产最好兔毫的赵国中山地区，取其上好的秋兔之毫制笔的。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一支毛笔实物，用竹制笔管，在笔管前端凿孔，将笔头插在孔中，另有一支与笔管等长的竹管做笔套，将毛笔置于笔套之中。为取笔方便，笔套中间镂有8.5厘米长的长方孔槽，竹筒涂以黑漆，并绘有红色线条。可见，这支秦笔的制作已采用了一套完整的制作工艺，与现在的笔及其制法颇为相似，较之战国时期的楚国笔已大有进步。或许这就是蒙恬始造之秦笔。

秦代毛笔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影响到字体的改变和发展，促进了秦代书法艺术的进步和成熟。汉代经济文化空前发达，毛笔的使用更加广泛和普及，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用品。

汉代毛笔多用硬毫，以兔毫鼠须为主；笔杆以竹质为主，但木质笔杆也很多；开始更换笔头；讲究毛笔的装饰工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艺术走向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毛笔制作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主要表现为：制笔技术更加规范和完善；毛笔种类增多，能适应不同的书法需要；取消簪白笔制度；在更换笔头等制作技术上进行了重大改进。

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韦诞，字仲将，擅长制笔造墨，他在长期的制笔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制笔方法，著有《笔方》一书。具体方法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有详细记载，内容大略为：先用铁梳梳理兔毛和羊青毛，去掉不能用的“秽毛”，然后用铁梳背用力拍打整齐，毫毛的顶端（包括毫尖）都要拍得非常非常扁，使毫毛均匀、顺溜、平整，再把羊青毛排至毫头下2公分左右，兔毫卷青羊毛，卷到极圆，使羊毛在中央作为笔柱，接着再用兔毫包裹羊青毛，做到中心整齐，毫毛均匀平

整，这样毛笔的笔头就加工完成了。再把笔头栽进选好的笔管中，上胶、涂漆、缠线，便可上市使用了。韦诞《笔方》中的制笔法又称“韦诞法”，是我国传统制笔的正宗方法，一直为后世广泛采用。

晋代王羲之《笔经》中也载有制笔方法，兹选录原文如下：“制笔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后，强者为刃，要者为辅，参之以麻，束之经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濡墨而试，直中绳，勾中构，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散，故曰笔妙。”

魏晋南北朝制笔业进步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毛笔种类增多，并被书法家用于书法创作。除上述笔毫外，鼠须是当时的第二大热门。汉魏大书家张芝、钟繇以及晋王羲之写《兰亭序》，都用鼠须笔。三国时期，笔的制作在汉代笔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锋毫更加饱满，并出现了软毫和硬毫相杂的兼毫笔。韦诞就制出了兔毫与青羊毛相间的笔[1]。“岭外尤少兔，人多以鸡鸠作笔，亦妙”[2]，这无疑是制笔工艺的一大改进。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得笔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遣之鼠须笔。”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中评价王羲之用鼠须笔写《兰亭序》时说：“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无比。”称誉极高。晋张华用鹿毛笔。南朝书法家子云喜欢用胎发笔。其他还有鹿毫笔、人须笔、鸡毫笔等等，但最常用的还是用“韦诞法”所制的那种羊毫为柱、兔毫为被的兼毫笔。可以说，各种禽兽的毛羽，如鹅毛、鸡毛、雉毛、羊毛、鼠须、猪毛、兔毫、狼毫（黄鼠狼）、虎毛，以及人须、胎发等，都被用来作制笔的材料；而最常用的是羊毫与兔毫（即紫毫）两种。

【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9，北京，中华书局，1956。

【2】［晋］王羲之：《笔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取消了簪白笔制度。簪白笔制度产生于汉代以前，流行于汉代，就是官员上朝议事头上须插一支毛笔，以便随时记录有关问题。因此汉代毛笔的笔杆上端都要削尖，以满足“簪”的需要。这就构成了汉代笔杆上尖下圆的特殊形制。其实这种制度并不实用，头上所“簪”的笔只能是新笔，蘸墨之后就不能再“簪”在头上了。因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

期，这种制度就被取消了，而且笔杆比以前要短，这也适应了当时在矮几案上书写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毛笔制作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改进就是可以更换笔头，即古人所说的“退笔”。无论是竹质笔还是木质笔，笔头都藏纳于笔杆一端的空腔或劈开的空地处，再用细丝捆扎牢固，当笔头用秃之后，可以解开丝线换上新的笔头。退笔的好处就是一支笔杆可以重复使用，既节省费用又提高效率。唐代河延人《兰亭记》中载：晋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七世孙南朝智永和尚在永欣寺阁上练习书法，“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后人把退下的废笔头埋葬，称为“退笔冢”。大竹簏即大竹篓，每只竹簏的容积有一石多，五只竹簏至少应该有六石。退笔的使用时间很长，隋唐时期仍有不少人爱使用这种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笔更加讲究装饰工艺。自汉以来，通用竹子为笔管，奢侈的用金、银、玉、水晶、琉璃、玳瑁、象牙、犀角等做成。晋王子敬得三国韦昶所做笔，叹为绝世。同时宣州陈氏笔已有名，东晋时王羲之曾向其求笔，留下《求笔帖》。唐代宣州贡纸、笔。宋元以来浙江湖州笔最有名，而湖笔发源于浙江湖州（今浙江吴兴）善琏镇。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到该镇教习当地居民制作毛笔，智永和尚也曾指导过该镇的笔工，帮他们提高制笔技术。这些制笔实践为湖笔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墨的制作技术的提高

墨是印刷术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印刷术所用的印刷材料，主要分印墨和承印物两大类。就中国古代印刷术而言，承印物除纸张之外，还有远远早于纸张而存在的织物。印墨、纸张、织物，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印版上的图文，要通过墨，转印到承印物上。墨对于印刷术的发明，也是必不可少的。

墨的起源较笔为早。中国的墨不但用来写字、印刷、拓碑、染饰宫殿建筑，也被用作妇人画眉，好的墨能止血生肌，并治目

疾，所以又被入药。墨字从黑从土，因为古人利用黑土或石墨一类天然黑色的物质来写字。又用竹梃点漆而书，汉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东汉有人贿改兰台漆书经字，因此才刻石经。漆性浓腻，不能任意挥写，往往头粗尾细，成为蝌蚪形，故称蝌蚪书。也有利用海中墨鱼（乌贼鱼）腹中的墨汁为墨，来进行书写或染色的。这些采用天然材料的早期墨都有缺点。等到人造墨出现，石墨、漆书等自然被淘汰了。出版印刷所用的墨，是采用一定的工艺方法，由人工制造的墨。

关于人造墨的发明，有多种说法：一说墨始造于黄帝之时，一说汉代田真造墨，一说周宣王时的邢夷作墨。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又有凿额涅墨之刑。新石器时代陶器有多种颜色的图画，其中就有黑色图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用黑墨先写后刻的。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上的文字墨色，至今漆黑。可见先秦墨已产生并得到使用，是可以肯定的。

最早关于“墨”的文献记载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庄子》上说：“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现存最早的人造墨的实物，是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四号古墓中出土的呈圆柱形的墨块，还出土了一方石砚和一块用来研墨的石头。石砚和石头上均有研磨的痕迹，并留有残墨，可与《庄子》之“舐笔和墨”相印证。由此可见，在秦朝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人造墨和用于研磨的石砚了。

1965年，河南省陕县刘家渠东汉墓中出土了二锭尚保留部分形体的东汉残墨，和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秦朝墨块，以实物证明，中国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捏制成型的墨锭。换句话说，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通过一定的工艺方法制成的人造墨在应用了。

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中国古代制墨的原始产品，除上述秦、汉墨锭外，还有1958年在南京老虎山晋墓中出土的晋墨，其长度为6厘米，宽度为2.5厘米，据化验，其成分与现代墨相近。

汉魏制墨技术不仅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文献记载上得到印证。史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墨，有石墨、油烟墨、松烟墨之分。其中，石墨即石油燃烧所制之墨；油烟墨系燃油所获烟炱所制之墨；松烟墨则是燃烧松木所制之墨。当时的制墨方法，简言之，是将易燃的烛心，放在装满了油的锅里燃烧，锅上盖好铁盖或呈漏斗形的铁罩；等到铁盖或漏斗上布满烟炱，即可刮下来，集中到臼里，加入树胶，混合搅拌，使其成稠糊状；将成稠糊状的墨团，用手捏制成一定的形状，或放到模具里，模压制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墨锭，这是油烟墨的制法。松烟墨则是通过燃烧松木来获取松烟粉末，然后与丁香、麝香、干漆和胶加工制成。汉代宫廷中有专门掌管纸、笔、墨、封泥的官员，做官的每月可得到隃糜大墨、小墨各一枚。东汉郑众说："九子之墨，藏于松烟。"三国魏曹植诗："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刊。"都说墨是松烟制作的。可见松烟墨应用之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但文化事业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制墨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松烟墨的生产已全面走向成熟。以烟煤作黑墨的起源很早，因为它是举火时的一种副产品。油烟是另一种较优良的烟煤，是在焚烧桐油、石油或漆木等木料或油质后取得的。青松木是制烟墨的最常用的材料，而松烟直到现代仍是制黑墨的最佳材料。曹植的《长歌行》说"墨为青松之烟"，当是以青松烧烟而制墨。

魏初在继承汉代烧松取烟质制墨方法的同时，在生产工艺水平和配料上加以全面改进，极大地提高了松烟墨的品质。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韦诞为松烟墨的改良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国时的魏国制墨名家韦诞，是合墨技术的创始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后汉太仆韦端之子，官终光禄大夫，卒于魏嘉平三年（251年），享年75岁。韦诞能书善画，又能制笔，尤精于制墨，享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的美称。京兆是汉代隃麋墨的故乡，隃麋墨以当地松烟为主要原料制成。韦

诞经常同制隃麋墨的墨工接触，并亲自参加制墨实践，创造出一套先进的制墨方法。

韦诞的制墨配方和工艺方法，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但并未述明其原料。其方法是："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缸内，筛去草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麹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亦以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则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自解碎。重不得过三二两。墨之大决如此，宁小不大。"[1]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5《墨谱》中也有详细记载：第一、用上好醇松烟干捣，并用细绢筛去草芥等杂质；第二，烟质1斤以上，加好胶5两，浸入梣皮汁中；第三，黄鸡子白5枚，珍珠粉1两，麝香1两，用细筛筛过后放入铁臼中；第四，所有原料放入铁臼中，用杵捣3万次，多多益善。

【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9。

从上述记述不难看出，三国时期的制墨工艺，已包括去杂、配料、舂捣、合墨等工序。其中：去杂，是筛去制墨原料"烟灰"中的杂物，使其成匀细粉末状；配料，是把筛过的烟炱与胶、朱砂、麝香、梣皮等胶和辅料，按配方要求匹配混合；舂捣，是把配好的料置于铁臼中进行舂捣，舂捣次数不能少于3万下，越多越好；合墨，即将舂捣过的墨泥，按要求制成成品墨。制墨时间要求在每年的二月和九月，此时天气不冷不热，是合墨的最佳时机，因为天热了墨容易变质发臭，天冷了墨块不易干燥。韦诞这种"捣胶和烟"、添加贵重配料的制墨法，使烟墨容易凝固成型，而且质地细密，手感温润，色泽光亮奇丽，黑香宜人，防腐防蛀，彻底改变了以前制墨不易凝结的散碎状况。

韦诞墨是对隃麋墨的改进和发展，其质量和性能已远非隃麋墨可比。当时许多文人、书法家都以用韦诞墨为荣，如书法家蔡邕就偏爱用他的墨写字。韦诞之后，世人很长时间都用他所创的

制墨方法制墨，所以后人都将韦诞作为制墨的创始人。

晋代，特别是东晋，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江南逐渐形成几个松烟墨生产中心。如江西庐山松林茂密，是制作松烟墨的好地方，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就非常喜欢庐山松烟墨。1974年，江西省博物馆在南昌市区的两座东晋墓中发现了两块墨质非常好的墨块：一块呈圆柱形，长9厘米，直径2.5厘米；另一块长12.3厘米，由于长期被水浸泡，形状难以确定。同时出土的木方也遭水浸泡，但上面墨书字迹仍十分清晰。

南北朝时期河北易州（今河北易县）出产的“易墨”也崭露头角，引人注目。易水流域生长着大片优质古松，墨工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出许多品质上乘的好墨，很受大江南北的书法家的欢迎。易墨成了北方墨的代表，易水墨工在全国制墨行业享有很高的声誉。

汉晋二代，以“丸”和“枚”作墨的单位，当即指圆形或扁形而言。汉代文献记载大臣“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晋代张敞谓“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1]。韦诞善合墨，他的墨“一点如漆”。陶侃献晋帝笺纸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极精妙。张金好墨著名于晋代。

【1】《太平御览》卷605。

中国古代用墨，秦朝以前，以墨粉合水而用，秦汉始成墨丸、墨锭，后汉用墨模压制成各种形状。模压制墨一直延续至今。自曹魏韦诞始，制墨名家辈出，品式繁多，技艺精湛。

中国古代的墨有很多优点，制作也非常讲究，是享誉中外、中国特有的“文房四宝”之一。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为书写、印刷所不可缺少，而且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由此也可看出制墨工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的墨是水墨，用于书画和雕版印刷，有着无以复加的良好效果，但它不适于金属版的印刷。因为墨汁不易均匀附着在金属版面上，印刷出来质量欠佳。

（三）砚的质料与形式

我国古代砚石之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主要功用是将墨色

等颜料磨细成汁，作书写之用。作为研磨器，早在距今5 000多年前的属于仰韶文化初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就曾出土过一方古代方砚，由此可以得知早期砚的基本形制，即砚心微凹，有磨杵，有砚盖。目前关于砚石最早的文献记载资料是公元100年左右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所说："砚，石滑也。"公元200年前后三国刘熙的《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由此可以确定，汉代已用石制的砚来磨墨。

西汉砚的制作技术和选材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有圆形、方形、长形、瓢形、峰形、龟形、箕形等造型，有二足和三足，有石砚、陶砚与玉砚，非常美观。东汉砚的制作又有很大进步，已从纯实用工具开始步入实用工具兼工艺品的行列。东汉主流是圆形三足砚，墨锭可以放在手中研磨，而且砚具摆脱了研石的束缚，还出现了漆砚和金属砚，并多有砚盒。

三国时，砚向轻巧、精致及多样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种类。曹操《上杂物疏》云："御物三十种，有纯银参带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1] 魏繁钦《砚赞》："方如地象，圆似天常，斑彩散色，沤染毫芒，点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无疆，浸渍甘液，吸收流光。"[2]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砚的研制和广泛使用。

【1】《初学记》卷21《砚第八》。

【2】［唐］张怀瓘：《书断》卷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瓷器工艺的迅速发展，瓷砚成为砚台家族的新成员。这时的瓷砚大多是青瓷制成，呈圆形，砚心无釉，有足，以马蹄形为多，更加追求实用性和稳定性。考古发掘的东晋和南朝瓷砚很多，有三足砚，也有五足砚。瓷砚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这一时期制砚业的一大特色。同时，开始使用砖砚。

瓷砚是烧制成砚形的瓷器，是随着魏晋时期制瓷业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直到明清，仍有人制造和使用瓷砚。瓷砚砚面坚硬平滑，不利于研磨和发墨，但瓷器耐高温，瓷砚在冬天可加热作暖砚使用。上海博物馆藏有两方晋代青瓷砚，一方有盖，口径11厘米，高7厘米；另一方无盖，口径13厘米，高5.7厘米。

砖砚是用古砖制成的砚。天津博物馆藏有一方南北朝画像砖砚，由方寝砖改制而成，长23.7厘米，宽23.5厘米，高3厘米。砖面上的画像很清晰，人物形象及衣纹飘带都很生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我国古砚定型的重要时期。就砚型而言，圆形、长方形、风字形，多足，代表了当时砚的基本模式。同时石砚的雕琢装饰更加趋向艺术化。例如，1970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一方北魏石砚，长21.2厘米，宽21厘米，高8.5厘米。砚的全身都雕刻着各种图案，砚心两侧浮雕耳形环水池和方形笔舔，两端雕鸟兽饮水图，砚面对角有莲花座笔插和联珠纹圆形笔舔，周边雕刻骑兽、角抵、舞蹈、沐猴四组图案。砚的外侧和砚底雕刻有力士、云龙、朱雀、水禽衔鱼、莲花等图案。此砚现藏山西省博物馆。这是最典型的工艺石砚，无论造型还是雕刻都非常精巧美妙，达到登峰造极的艺术境地。当然，像这样雕琢精细、题材繁复的石砚在当时并不是很多，但它体现了当时制砚的实际水平和发展方向。

二、笔、墨、砚的改进对图书生产的影响

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在雕版印刷术产生之前，图书等出版物的复制主要靠书写。因此，笔、墨、砚是图书生产的主要工具和材料。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砚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1] 他将出版物的生产形象地比喻为一场战争，出版物的创造，取决于人的智慧，这自然是最重要的，但是离开了锐利的兵器，坚固的城池和有利的地形地势，要打赢一场战争也是很困难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以手工抄写作为图书生产主要手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笔、墨、砚的改进对图书生产有着重要影响。

书籍的手抄复制虽然在先秦就开始了，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纸的普遍使用，毛笔、墨料等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大大方便了书籍的抄写复制，于是抄书的习尚蔚然成风，从民间

【1】［晋］王羲之：《笔势论略》，见《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卷83，台北，鼎文书局，1977。

到官府，形成了手抄复制书籍的高潮。在《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等史书中，记载了许多人勤奋抄书的事迹。代人抄书已成为一种职业，“佣书”人既为自己获得经济收入，又为社会生产了大批图书。而他们的劳动工具和材料，除了纸，就是笔、墨、砚了。

各个时期的政府为了文化发展的需要，要生产出版大量图书，因此抄书复制的活动也很多。北朝的秘书省还为此专门设立了抄书的专职官员“正字”和“弟子”，弟子专门负责抄书，正字专门负责校对。而每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前，政府都要为他们提供大批纸张、毛笔和墨丸。

笔、墨的改进和不断精良，大大方便了书写，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当时的文人、书法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谈到笔的优劣和作用。如晋成公绥《故笔赋》:“采秋毫之类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属象齿于纤锋，染青松之微烟，着不泯之永纵。”大意是采秋天野兔的毫毛，经过加胶加漆、多次裹毛制成笔头，再配上犀角笔管，然后用松烟墨写成不会褪色、永不泯灭的文章。又如晋傅玄《笔赋》:“简修毫之奇兔，……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反映了他对名工巧匠制笔高超技术的赞赏，以及使用一支良笔在书写中得心应手的快意。东晋著名书法家卫夫人《笔阵图》中对良笔的要求说得更清楚、更具体：笔要取崇山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笔长五寸，锋齐腰强者。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严格选料和精细制作是当时制笔工匠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使用者对毛笔的偏爱和狂热更使笔工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工艺水平。

有了得心应手的妙笔，自然可以挥毫如意，如挥百胜之师了。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留下了许多歌颂笔的诗句。晋傅玄《笔铭》:“韦韦彤管，冉冉轻翰，正色玄墨，铭心写言。”晋郭璞《笔赞》说:“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梁武帝萧衍《咏笔》:“昔闻兰蕙月，独日桃

李年。春心倘未写，为君照情筵。”梁徐摛《咏笔》：“本自灵山出，名因瑞草传。纤毫奉积润，弱质散芳烟。直写飞蓬牒，横承落絮篇。一逢提握重，宁忆仲升捐。”

由于笔毫的选料更精，笔锋的不断改善，人们可以比较方便地用笔书写或大或小的各种字体。当时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喜欢用蝇头小字将书抄到开本极小的袖珍纸张上，放在巾箱里随身携带，以便阅读。比如，晋朝葛洪就曾将刘歆写的《汉书》100卷抄到两小轴纸卷上，时常带在身边。南朝萧梁衡阳王萧钧将“五经”用小字抄写在小纸卷上，每经一卷，放在巾箱中随时取阅。其他诸王得知后也纷纷仿效，后世所出现的“巾箱本”就是由此而生的。

魏晋南北朝制墨名家很多，除制墨大师韦诞外，还有晋武帝时的张金，南朝宋文帝时的张永，北朝易州奚氏家族。据南朝沈约《宋书》卷53《张茂度传》记载：张永字景云，博览群书，会写文章，擅长隶书，通晓音律，多才多艺，尤其是能够自己制作纸墨，质量比宫廷御用品还好，很受宋文帝的赏识。南朝宋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极力称赞张永制墨，说：“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意思是说张永用秘法制出的墨，外观漂亮，质量优良，远远超出同类墨，黑色像漆那样黑且有光泽，渗透力强。奚氏家族生产的易墨在当时已经引起书法界的关注，至隋唐则更上一层楼，在制墨业中独领风骚达200多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手抄复制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制墨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大批质量精良的墨又为书法家的创作、佣书业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珍迹至今已过1 600余年，依然墨色清晰，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西晋陆机章草《平复帖》墨书真迹，距今已超过1 700年，墨色依然不褪不损，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墨迹能保存到现在，反映了当时的制墨水平之高。

王献之《中秋帖》真迹，敦煌所出六朝人写经，墨光漆黑，

千年如新。自魏晋六朝以来有了光辉如玉的纸张，与久而不渝如小儿目睛一般的好墨，为图书生产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促进了此期出版业的进步。

图书的复制途径主要是书写、印刷。书写需要用笔墨将有关内容誊抄在载体材料上；印刷要先用笔将内容写样、上版，再通过印墨将印版上的图文转移到承印物上。因此，无论是抄写复制还是印刷复制，笔墨都是图书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材料。

笔和墨的改进，为图书抄写、印刷提供了更新、更好的工具和材料，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而推动了图书出版的进步。

第三节 反书刻印的成熟与传拓技术的出现

中国最早出现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中外学者认为印章与捶拓两项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雕版印刷术主要用于以纸为承印物的书籍印刷。由于有了物美、价廉而又能够大量供应的、适于印刷的纸，才使得印刷术得以成熟和完善，并迅速发展、推广开来。纸是印刷术得以成熟、完善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有了纸以及墨、笔、砚这样的物质基础，加上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这一社会环境的推动，同时也由于应用已久的盖印、拓印，以及二者结合所创造的技术条件的具备，促成了雕版印刷术这一工艺技术的产生。

一、印章的盖印与反书刻印技术的成熟

印章的盖印，大致说来，主要有三方面的用途：一为直接盖印在封盖公私简牍的黏土之上，谓之封泥；二为模仿印章制成模具，用以模印砖瓦；三为在印章图文之上涂以朱砂等染料，捺印于织物或纸张之上，与当今之盖章完全一样。其中，封泥和模印，类似于近现代印刷工艺中的凹凸印；而捺印，则与近现代印刷术中的压印术颇似，与印刷术更为贴近了。

印章的盖印，由来已久。在印章尚未通行之前，原本作为

印信使用的，称符节，以竹或玉制作。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制度与组织日趋复杂，玺印逐渐取代了符节。到了汉朝，民间和宫廷使用印章越来越普遍，刻印成了一种具有欣赏价值的美术。其时刻印之完美，为后世所莫及。汉朝的盖印多印在封泥之上，后来逐渐向敷印颜色转化。在印章上敷涂染料，再捺到纸、帛之上的方法，逐渐向雕版印刷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把印章上的文字通过颜色转印到纸上，与雕版印刷并无多大实质性不同。印章尺寸较小，目的在于取信，而雕版印刷尺寸较大，目的在于制造复制品。二者在作为转印复制术方面，性质是一样的。

古代的印章有阴文、阳文之分。汉代以前的印章多为阴文，后来逐渐向反刻阳文演变。用阴文印章盖印，得到的是黑地白字；用阳文印章盖印，复制品则是白地黑字。白地黑字更接近于雕版印刷。

印章的使用，创造了从反刻文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方法，而印章从反刻阴文发展到反刻阳文，则又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刻文字取得与当时书写一样的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加之，由于纸的流行而使印章的盖印由封泥盖印进化到纸墨盖印，这就为印刷术的发展——尤其是雕版印书——突破了一个重要关口，大大加快了印刷术从雏形到完善的发展进程。

经过数百年的进化，到东汉末年，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条件均已具备，尤其是纸的发明和完善，为印刷术提供了远胜于织物且又价廉的承印材料。东晋元兴二年（403年），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字敬道，又名灵宝）废晋安帝，于十二月称帝，改国号楚，年号建始，后改永始。次年（404年），桓玄下令废简用纸。这说明纸的质量和产量在公元5世纪初已经达到可以代简、普遍采用的程度。无疑，这对印刷术的成熟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南北朝所处数百年间，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严重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致使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关早期雕版印刷术的文献和文物证据。然而，东晋葛洪《抱朴子》所载“木

刻入山符”和梁代反书倒读华表的刊刻，却预示着两晋南北朝时期乃是以纸为承印物的印刷术的发端。

东晋时期，道教作家葛洪（字稚川，句容人，自号抱朴子）所著《抱朴子》一书，内篇卷十七《登涉》篇载有“入山佩带符”，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同卷又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一块四寸见方大小的大型印章，上面刻着120个反体字，用来在所住之四方压印出正体文字，这与当今仍在使用的平压平式凸版印刷机原理相同，印法相似。所不同者，一为印在泥土之上，一为印在纸上。这样的印章，可用来复制一篇短文。如果当时有人在这块黄神越章之上刷墨，再覆上纸，用刷子在纸背面进行刷拭，就是印刷术了。何况当时从物质上、技术上，均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见，印章的盖印也是印刷术发明与完善的前奏这一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史载，两晋时期，除葛洪《抱朴子》记载的木刻入山符之外，到了北齐河清中（562—564年），还有一块更大的木印“督摄万机印”。这块大印“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1]。如此大的一块木版印，而且是把字印在纸上，尽管它有钮，采用盖印的方法，但实质上与印在纸上的印刷术没有什么区别了。后人认为是“条印”和“关防”之始，专门用它来印“籍缝”，即两张文字的联结处，也就是骑缝章[2]。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起来。魏晋兴起的石刻线描画佛，多以佛、菩萨、诸天形象入画。南北朝时广泛应用于寺院、佛塔、门楣、佛像台座。南北朝时期还盛行一种捺印佛教图像的印模，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这种模印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状态。罗振玉曾亲眼见过这种印模。他在《敦煌石室秘录》中说：其印“上刻阳文佛像，长方形，上安木柄，如宋以来之官印，乃用以印像者，其余朱尚存”。

【1】《隋书》卷11《礼仪志第六》。

【2】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汉魏石经及一般石刻文字，皆为凹形的方格大楷字。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洛阳老君洞始平公造像碑，北齐武平二年（571年）马天祥等造像碑，都是阳文隶书大字，读法自左至右。这种刻法，为反书提供了先导。除了石刻，还有砖刻瓦刻。晋代的砖瓦上文字已出现有反文。如晋泰始七年（271年）、太康六年（285年）、永宁元年（301年）等砖。太康二年（281年）的造瓦，也都有阳文凸起的反写字。社会上这种石、砖、瓦上的阳文反刻工艺的存在，也为最后发明雕版印刷术开启了先河（图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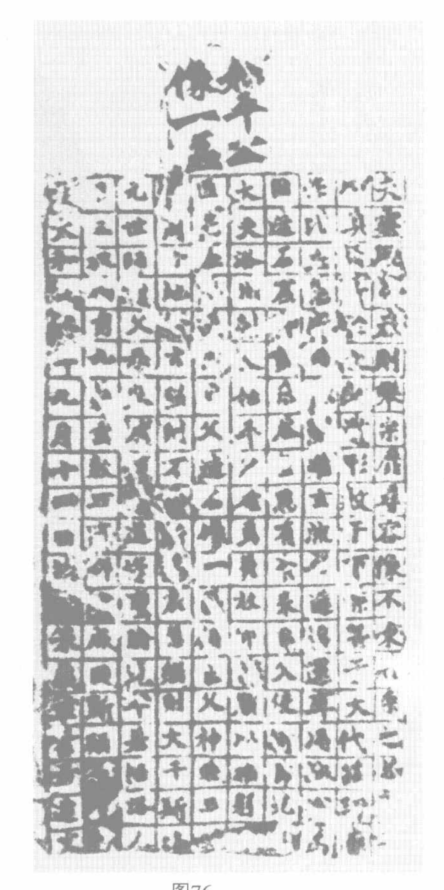


图76
龙门石刻阳文正体碑文（刻于5世纪）

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于天监元年（502年），追尊其皇考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在其墓前竖立石兽、石碑、华表。其中，华表呈十字形，在华表的横石上刻有“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华表分左右两个，左面华表上的八个字是阴刻正字，右面华表上的是阴刻反字（图77）。

另外，卒于梁普通四年（523年）的萧景神道石柱，柱额反刻阴文“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1]。这种反书倒读的刻法，与后来的雕版印刷完全一样。只要在华表上涂墨，然后敷纸刷印，印在纸上的便是正体顺读的印刷品了。据载，这反书倒读的阴刻华表，是为了印下来送给参加祭祀的官吏作纪念品用的。应该说，在华表上刻反书倒读的文字，用途是明显的。这足以证明，早在公元6世纪初的梁代初期，中国已经出现了用反刻文字取得正体文字的木版雕印技术之雏形了。

【1】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1版,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二、刻石的拓印与传拓技术的出现

就中国传统的印刷术而言，印刷必有印版，而印版是手工雕刻的。可见，手工雕刻技术的出现实乃印刷之源。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手工雕刻技术在大约五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





图77
梁文帝神道碑正反文

已经用于陶器的制作和树皮布印花。这是印刷工艺技术的开端。到了商朝，手工雕刻技术被广泛用于在龟甲、兽骨之上雕刻文字。此后，手工雕刻技术日益成熟，并用于钟鼎彝器、碑文、玺印、砖瓦，从而引发出封泥、盖印、印染、拓印等与印刷术颇为近似的转印、复制技术，为印刷术的发明和完善奠定了技术基础。

自从发明了纸张，配合得心应手的毛笔和好墨，于是写本书籍开始大量出现，但是一个一个字仍须用手来写，同时一次只能写出一部。一部卷帙浩繁的书籍，往往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抄写工夫。经过长期的摸索与钻研，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拓技术应运而生。

捶拓方法的出现与石经密切联系。在纸开始流行的同时，还出现了石头的书——石经。

现存的刻石以石鼓为最早。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仍继承着这种风气，在各地巡游时都刻石纪功，但现在只有琅琊台和泰山刻石还残存一小部分，其余都已毁坏了。

西汉时代，刻石风气更加流行。碑、碣、摩崖种类繁多。东汉沿袭这种风气，刻石活动更有发展。其上所刻文字往往有鸿篇巨制，极富史料价值。现在留存下来的汉碑大多数是东汉时代的遗物。《西峡颂》、《石门颂》、《耿勋碑》、《赵宽碑》都是著名的东汉石刻，可以考证当时的史事。

对于出版史说来，最重要的是熹平四年（175年）所刻的石经。在《熹平石经》之后，三国时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8年）又在洛阳太学立了一批石经，称《正始石经》。这次石经用古文、篆字、隶字三种字体书写，所以也称“三体石经”。

石经的目的主要在于正定文字。可是它却产生了另一种积极的影响，就是石经的出现导致捶拓方法的发明，从而促进了雕版印刷术在我国的诞生。采用刊刻石经的办法以正定文字，于《熹平石经》之后的历代各朝，几乎都认为是一种职责，历代相沿。据《唐书·百官志》载，百官中有“拓书手”，其职责似乎就是拓印标准的“拓本”。既然唐朝已在政府中设有拓书手官职，那么拓印术的发明自然要远在唐朝之前了。

刻石的拓印，由来已久。捶拓就是在石碑面上铺以预先浸湿了的一张坚韧的薄纸，用刷子刷平，将纸密切附着于石面，使纸入字口，待纸张干燥后用装有丝棉絮做成的“朴子”蘸墨，在纸上轻轻、均匀地捶打，使墨捶印纸上。因为石上的字是凹入的，所以有文字的部分受不着墨。因此把纸揭下来后便成为黑地白字的读物，一张黑地白字的拓片就复制完成了。这种方法，与雕版印刷颇为近似。所异者，碑刻文字是凹下的阴文，而雕版印刷的印版是凸起的阳文，复制下来的拓片和雕版印刷品，一为黑地白字，一为白地黑字。就印刷复制术而论，拓印术实际上已经是雏形中的印刷术了。这种拓印下来的拓本，也称拓片。捶拓可以代替抄写，拓片可以携带流通，可以保存久远，而且一块石碑可以随要随拓，不须重刻。这就大大便利了书籍的传播，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成为复制图书的极好的方法。

捶拓的基本条件，是要有质地比较轻薄的纸张。初期造纸，

粗厚质劣是不能适用的。传统的说法认为拓印起源于公元2世纪，其主要依据是从“摹写”一词而来。《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记载：“(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但这里的“摹写”二字，是指以手抄写，而不是拓印。再者，从石面上或其他坚硬的表面上拓印，只有在制造轻薄纸张的技术已臻完善之后方才可能，因而捶拓的方法必须发生在造纸技术有较大提高之后。《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部小学类记载传拓本一字石经、三体石经的残卷，连同当时存在的12种，以及在梁代亡佚的7种，共19种。小学类小序指出“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这说明隋以前已有了传拓方法。由此可以推测在公元4世纪，造纸技术得到较大发展后到公元6世纪之前，已开始有了传拓的方法。

如果把这种传拓的方法反转过来，就成了雕版印刷了。以墨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先河。有些学者认为，拓印对印刷的影响未免被夸大。事实上，二者的原则和目的大致相同；无论材料是石块、青铜或木板，模拓和印刷都是以纸从雕刻的表面取得复本。二者的差异，只是雕刻过程和复印的技术不同。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写凹入，而雕版印刷的字，则都是凸出的反文。拓刷是将纸复在石面，用墨在纸面上捶拓。而印刷的方法则是以墨施于木板，复纸板上，刷压纸背，将板上的反文印成纸上的正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拓印的方法，现已不可详知，我们只能假设它和现代拓印方法大致相同。

现存最早的拓印品，是在敦煌石室中保存下来的公元6世纪的遗物“温泉铭”。但这绝不是最早的拓印品。拓印技术的出现远在“温泉铭”之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皇家图书馆中藏有拓石文字，以“卷”为单位，包括秦始皇东巡会稽的石刻文1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曹魏三体石经17卷，并述及梁室所藏石刻文字，在隋时已散佚。但这些纸卷的复本，却“犹在秘府”。这说明，梁时已有石刻文字拓本，也就是南北朝时期已有

拓印术。由此可知，隋代保藏的，虽是公元六七世纪的拓本，但拓印技术却是由前朝承继而来。所以王国维先生在《魏石经考》中认为，拓印石刻文字的事，一定还在此之前。

三、反书刻印与传拓技术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出版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传拓技术的出现在印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拓印术的出现，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在纸上刷印的复制方法。仔细分析，拓印术已经具备了印刷术定义中的基本要素，有一套完整的、有刷有印的工艺技术，可以说，拓印术本身就是朦胧之中的印刷术。把它视作雕版印刷的雏形，是比较适宜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拓技术的出现，对于唐代拓印石刻文字技术也有重要的影响。唐朝宫廷中至少有二处雇有专管拓印的“拓书手”。据《大唐六典》所载，崇文馆有拓书手3人。《旧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均载，公元718年，集贤殿书院有拓书手6人，还有从事其他工作的书记、装潢匠、制笔匠等。

通常人们所说的拓印，指的是在石碑上拓印碑文，实际上，拓印并非专指碑拓。人们在传拓碑文的启示下，又把需要拓印复制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制成印版，然后再在印版上进行拓印，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杜甫诗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记述了在木板上雕刻文字，制成木刻印版，然后在印版上进行传拓或印刷的史实。后人将古代书法家刻石的文字，以木板摹刻成阴文正字，再从这雕版上拓印，以作学习书法的范本，称为“法帖”。这也是从石刻转移到木刻的例子。

自从在石刻文字上发明了拓印技术，甲骨文、金文、陶文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取得复本。青铜器内部的文字，可用长柄的刷和拓包取得。如果载文较长而又分布各处，则要用纸数张，分开拓印。如拓全器，须辨别阴阳、凹凸，配合墨的浓淡，而成全角拓本[1]。公元1051年，宋仁宗诏令拓印青铜器文字，存诸秘阁[2]。这是青铜器铭文拓印之始，当系模仿石刻拓印的技术。现在，几

【1】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册,172—182页。

【2】[宋]翟耆年:《籀史》卷1。

乎所有的铭刻文字，包括甲骨文、陶文等，都可以用同样方法拓印而取得复本。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传拓技术，但雕版并不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由于刻石的工程浩大，不是平常人的力量所能办到，所以一般书籍仍然依靠在纸上（在初期立石经的时候还在简和帛上）抄写流传。

拓石是印刷术的先驱。但是这一反转过程，又经过人们几百年的经验积累才得以实现。有的学者主张雕版始于这一时期，这是不准确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是东晋咸和（326—334年）说。19世纪末法国人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根据《蜀志》及《后周书》，主张晋成帝咸和中，蜀中成都即有雕版印书之举；但是此二书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或者以为摹拓碑版，误为印书云[1]。

另一种是六朝（222—584年）说。主张此说者为清代道光年间李元复。他说："书籍自雕镌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藉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其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但未盛行耳，乃谓肇兴于宋，是其不然。"[2] 李氏只凭主观臆测，并没有提出证据，他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日本岛田翰则据《颜氏家训》以为北齐（550—577年）以前，已有刻版。他说："予以为墨板，盖昉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版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版矣。《玉烛宝典》引字训'沦'字曰，其字或草下，或水旁，或火旁，皆依书本。已曰皆依书本，亦可以证其对墨版也。是隋以前有墨版之证。……先儒云隋时始有佛书雕本，监本始于冯道，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不知其昉于北齐已前，而唐太宗以前已有监刻本。私谓是先儒未道之遗，故举以质诸博雅。"[3] 颜之推只说"江南书本"、"河北书本"，这些书本都是抄写的，并非刻本。清俞

【1】向达：《唐代刊书考》。

【2】[清]李元复：《常谈丛录》卷1。

【3】〔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2《雕版渊源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樾说得好，“如颜氏果以书本对刻本言，则当时刻本当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时犹不多见也？”叶德辉也驳他说：“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录》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版始于两汉乎？”六朝虽然比汉朝更具备了发明印刷术的条件，但是像岛田翰那样所说的理由，还是不充足。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流通和管理

魏晋南北朝期间山河破碎、南北对峙、政权交迭、兵接祸连，在政治上给中国历史留下的是战马征尘、君臣弄权、百姓流离的乱世景象，而在文化学术上，局面却非同政局一般纷乱不堪，反而在某些方面有不虞之盛。一方面，政权割据和不断对抗打击了封建政权的专制统治，使思想文化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发展；南北分裂和谋求统一虽然造成了社会生产力下降，但却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知识分子也因为地域流迁而养成了个性自由和思想多元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业勃兴，轻薄、廉价的纸张逐渐代替竹木和简帛成为记录文字的载体，有力地扩大和提高了学术文化传播的规模与速度。

学术文化繁荣的表现之一便是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玄学兴起，人物潇洒，创造力活跃，不但涌现了一批目光敏锐、非常重视图书选题的编辑家和出版家，开发出了总集、类书、谱牒、佛经汉译本等前代所未有或稀缺的图书类型，而且与之相适应，图书的发行和流通呈现出初兴的气象，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第一节　图书流通的方式

一、图书在国内的流通

秦汉时期，文字书于竹木或缣帛，竹木既笨且重，缣帛价格不菲，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克服了竹帛不足的纸变得平常易得，成为复制图书的理想材料。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还不能改变书于竹帛的习惯，纸与竹帛并用。随着接触纸张日多，人们渐渐适应了在轻薄廉价的纸上书写和阅读，加上到东晋时，政府明令提倡用纸，图书复制和发行的规模终得以迅速扩大，图书的普及面远远超过以往的范围。可以说，秦汉时期图书多是在行政系统和文人圈子中流通，尚未大量进入市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大量生产和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已经促成了图书市场的形成，书肆已赫然占据商品市场的一角。这个时期，图书流通的主要渠道是设肆出售和流动贩卖，同时为克服图书商业发行的不足，还有其他的图书流通方式作为补充。

(一) 设肆出售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市场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仍沿用前代的列肆制度。同类商品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与后世一个店铺称为一“肆”，含义是不同的。不但大的店铺要列肆销售，即使小贩也要按所售商品的类别，把货摊摆在相应的肆中进行交易。当时市场中常见的肆有马肆、酒肆等，都市的大市里还有出售珍贵珠宝的金肆、玉肆等，还有将商品进一步细分而形成的帽肆、葱肆等。当然，市场上也有专门销售图书的书肆，梁朝的任昉在《答刘居士诗》中云:“才同文锦，学非书肆”[1]，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书肆的明确记录。另据《梁书》卷26《傅昭传》载，傅昭11岁“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朱雀航所在的城市建康，是当时南方新兴的最大的商业都会，特别是在梁时经

【1】叶德辉:《书林清话》，1版,2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过改建和扩建，规模十分宏大，《金陵记》记载："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南北各四十里。"如以每户5口人计算，则有一百四十万人，实为罕见的大都会。朱雀航可能是建康摆摊贩卖日历等日用图书的书肆。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肆是出售同类商品的一排店铺的统称，专卖书籍的店铺此时能够衔接成行，自成为肆，可见图书发行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书肆不仅贩书，而且容人阅览，不少贫寒好学之士就是通过在书肆里"观书"，实现求学的愿望。据《魏书》卷66《崔亮传》载，"(崔亮)居家贫，佣书自业。""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容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崔亮宁愿一边受雇给人抄书，一边到书肆里蹭书读，也不愿为了换得良好的读书环境而攀附权贵，看人眼色，这种精神跟东汉王充在书肆"阅所买书"是一脉相承的。

书肆所卖图书不仅在量上有一定的规模，品种也比较丰富，除了前面提到的历书，还有书画作品和俗文学作品。《魏书》卷24《崔玄伯传》载："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木。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这条史料表明，当时北魏都城（山西平城）的书肆经营范围很广，除图书外，还有书法作品，著作郎王遵业就是在那里淘得了珍贵书法作品，并精心收藏。俗文学作品在书肆的发行也有史料为证，《北史》载："休之弟绑之，天平中入关。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后待诏文林馆，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1]可见，俗文学作品不仅在书市发行，而且畅销，作者有名誉上的

【1】《北史》卷47《袁休之传》。

顾忌却无版权观念，在淫邪之作上不敢署真名，对其无偿的大肆流传却暗自高兴。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割据，朝代更替频繁，都城的兴废和迁移节奏也比较快，南方和北方都巩固或新兴了许多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北方的主要商业都会有洛阳、长安、邺等。南方的主要商业都会有建康、成都等。这些因政权割据而加速形成的星罗棋布的大都市，尤其是南朝新兴都市的崛起，打破了城市集中于北方的旧格局，在华夏大地上编织出了更加细密的商业网。

这些数量众多的大都会无一不是物资丰富，商贾云集，市场星布，书肆自然也有相当的规模。北周庾信在《答移市教》中说："希风慕义之士，举袂成帷；卧辙攀车之人，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阅书之处，远出荒郊；石苞贩铁之所，翻临涯岸；圣德谦虚，未安喧湫，欲令吹箫舞鹤，还返旧廛，卖卜屠羊，请辞新阓。"[1] 这段话写作的背景是，当时的市场按照旧规必须集中在城里，然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户们为了经营方便、招揽顾客，希望政府突破陈规，把市场迁到市外交通要道等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朝廷官员对此意见不一，往往发生辩论。庾信的《答移市教》便是陈述自己反对移市的理由，其中"遂使王充阅书之处，远出荒郊"一句，非常清楚地说明当时市场上已有书肆，而且庾信将"阅书之处"和"贩铁之所"、"卖卜屠羊"并列说出，表明书肆十分常见。庾信在北周为官，文中所说的"阅书之处"指的是北周都城长安的书肆，而当时长安的商业比起洛阳、建康尚有差距，天下同长安发展水平相近的都市还有不少，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书肆在城市相当普及，如"卖卜屠羊"一样为市民见惯不怪，到书肆购书已成为市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由于都市的快速发展，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书肆在这个时候已成为图书发行的主要渠道。书肆上图书的存量和藏书家的藏书数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确切记载的藏书家，魏晋有22人，北朝有34人，南朝有46人，共计102人，是两汉时期藏书家人数的四至五倍，藏书万卷的藏书家屡见不

【1】[唐]徐坚：《初学记》卷24《市第十五》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

鲜，沈约、萧统等人的藏书的最高纪录突破三万，梁元帝萧绎号称藏书八万卷之多[1]。如此多的藏书从何而来，购于书肆无疑是重要的途径。晋朝的司空张华、北魏的秘书监常景等都是朝中名臣，俸禄不薄，以毕生之资尽数购书，仍不尽兴，可见当时书肆中图书存量大、品种繁，书价也较高。书肆的规模跟佣书人的数量也有关系，东汉时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佣书人只有班超、王溥二人，到魏晋南北朝时文献上明确记载的佣书人已达十余人之多，佣书人数量增长的情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书肆规模扩大的程度。虽然在记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佣书人的雇主是谁，大多语焉不详，但从东汉时王溥插笔洛阳肆上佣书的情况看，这些雇主当中少不了书肆的店主。根据中国古人的心理，读书人普遍贵学而贱商，可能大部分佣书人为生活所迫，仅会被动地躲在幕后为书肆抄书，只有小部分像王溥那样思想开放、在时人眼里有些另类的佣书人才会主动走上前台，干脆到书肆上光明正大地现场为人抄书。究竟有多少佣书人从被动接活、被动抄书，发展成自办书肆、自立为雇主，反过来再组织、雇用别人抄书，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这种情况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其可能性是存在的。

[1]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1版,92页,宁波出版社,2001。

文献中记载的书肆都出现在大都会的市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停战的时候还经常在边境开设市场，互相交流物资，称为互市。互市建在动荡不安的边境，比较简陋，其规模和管理都远不及城市的市场。互市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不时会遭到军队的掩杀或偷袭，险不可测，但越是边境地带，受战争的创伤越大，物资越匮乏，物资交流的需求也就越大，利润也较可观，所以互市的生命力也相当强劲。互市在政权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图书也是互市交易的对象，但却不乏南北图书互相流通的事实。这些图书如何经过边境呢？方式无非有几种，要么秘密走私进入，要么纳过关税贩入，要么作为礼物遣使报聘，要么便在互市上销售。互市上销售的商品虽以生活消费品为主，但也不能断定没有图书。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种市场比较有名，那就是建在

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的“草市”，这里的“草”是简陋的意思。草市销售各类日用品，至于卖不卖书，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二）流动贩卖

设肆售书之外，流动贩卖也是魏晋南北朝图书发行的一种重要形式，两者互为补充。这个时期图书的流动贩卖比较活跃，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图书以纸为载体后，重量变轻，体积减小，便于运输，而且生产成本下降，人们的购买力提高，对图书的需求增长；二是在列国争雄、壁垒森严的环境中，流动贩运图书虽然困难大、危险多，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贩卖一部图书的风险越大，这部图书的附加值和利润就越大，为得到高于设肆出售的图书的利润，自然就有人愿意采取流动贩卖这种形式。然而，仅有这两个因素，流动贩卖还不足以实现，它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割据，疆土分裂，南北对峙，但越是这样，人们交流商品的需求就越大，愿望就越强烈，政治疆界没能阻断人民的贸易往来，商品流通依旧保持着相当活跃的态势，水陆交通事业比较发达，不但秦汉以来许多商旅往来的重要交通线大都继续保持畅通，不少新的道路还得以开辟和拓展，成为连结各个分裂地区的纽带。在南朝，长江是水运交通、货物运输的主动脉，它将中下游的荆、扬二州与上游的益州联系起来，商船动以万计，商品流转量非常大，对南朝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朝，丝绸之路由汉朝时的南北二道拓展为南、北、中三道，三条道路均畅通无阻，加强了内地与西域的商品流通。在西域的鄯善与南方的益州之间，也增辟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重要交通路线——河南道，此道是南朝与西域进行商品交流的主干道。在这些南北交通干线的两侧和周围地区，众多的水陆支线也被开辟出来。

在这张由长江和丝绸之路为主干构成的覆盖全国的交通网上，流通着各类商品，活跃着各色商人，其中也有贩书商人的身

影。《北齐书·祖珽传》载，“事文襄（高澄）。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这里的“州”指的是扬州，扬州的书商把图书运到北朝东魏的邺城来贩卖，足见当时的书贩行踪之远。书贩千里迢迢将图书由南方运送到北方，走街串巷、穿门入户，终于寻访到了识货的买家，谁知卖的竟没有买的精：“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至于高澄为什么放着现成的图书不要，非要雇人日夜抄写，是嫌其书法不好还是价钱太贵？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如果是嫌其书法不好，在夜以继日地仓促抄写后，日后必然会找人重新缮写，而高澄并没有这样做。这个例子一来说明当时图书的价钱比较高，买家宁愿雇人连夜抄写，也不愿购买现成的图书；二来说明当时受雇从事图书抄写的佣书人很多，以致可以招之即来，在一日一夜之间迅速抄毕一部七百多卷的《华林遍略》。

流动贸易促进了南北图书的流通。由于流动贩卖付出的劳动多，成本高，风险大，常见的一般图书长途贩运无利可图，所以行商多选择珍贵的、有价值的、有代表性的大型图书来贩运，如上面提到的《华林遍略》就是由梁武帝亲自监修的代表南朝文化繁盛的当时最完备的大型类书。卷帙众多的《梁武帝集》也被贩卖到北方，在北朝北周的宫廷能够见到，梁武帝的后人萧大圜被北周明帝召为学士，入长安麟趾殿，见其先人所著《梁武帝集》40卷、《简文集》90卷，“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1]。不仅南朝的书通过行商贩卖到北朝，北朝的《修文殿御览》和《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名著也被贩运到南朝[2]。这些图书的南贩北运对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皇帝赐读，朝廷推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推行秘书监制度，秘书监兼具图书馆和出版社的作用，其主要职责之一是编修或组织抄录图书，图书修成或抄毕后多数收藏在秘阁备用，并不大量向公众发售。秘书监所制之书与当朝意志统一，编校细致，质量精良，一般都是当时最权

【1】《北史》卷29《萧大圜传》。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1版，11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威的范本。

那么秘书监所制之书通过什么方式流通呢？主要有两种方式：

其一是赐读，君主向臣下赐书是汉代以后图书流通的特殊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向臣下赐读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例如皇甫谧是晋代一位藏书家，经常在干农活时也携带经籍，发奋苦读，勤于著述，颇有文名，人称“书淫”。不幸的是他在青年时因病致残，然而他身残志坚，向学依旧。晋武帝闻其名，有意招其入朝。但天性清心寡欲的皇甫谧不愿为功名所累，遂以疾辞。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请求，据《晋书》卷51《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武帝的慷慨赐予，为皇甫谧写出《针灸甲乙经》和《帝王世纪》等一系列著作创造了条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孝武帝“诏赐会稽王秘阁书八千卷”，“何无忌在秘阁求赐秘书，诏与一千卷”。《宋书》卷100《自序》载，刘宋时曾任南阳太守的沈亮，为官清约，为太祖所嘉，赐书二千卷以资奖励。齐武帝第七子晋安王子懋，祈求所好书，武帝“赐以杜预所写《左传》及古今善言”。另据《南齐书》卷24《柳世隆传》载：“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南齐书》卷23《王俭传》载：明帝“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这说的是永明三年（485年），齐武帝下令废除了在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设立的总明观，总明观下设儒、道、文、史、阴阳五学部，是国家的藏书机构兼综合性大学或研究院，其藏书主要是服务于教学与学术的专业典籍。齐武帝废除总明观后，下旨将其四部图书及秘阁藏书中的善本皆运往王俭家中，在王俭家中开办国学，这样王俭家就成了齐朝最高学府的所在地及学术典籍的收藏处，这在中国历史上真可谓一件咄咄怪事。《陈书》卷27《江总传》载，江总“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

由上述这些记载可见，朝廷赐书的情况相当普遍，赐书需要

的条件也比较灵活，往往大臣一请赐，皇上就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慷慨赐予成车上千的书籍。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秘阁藏书颇富，皇帝可以灵活支配，赏赐显臣，却并不至于削弱秘阁藏书的实力。另一方面说明，秘阁之书并不主动到市场上发售，系统完整的图书还为朝廷所掌握和垄断，朝臣无法或无力在市场上购买的图书，最后的办法都是向皇帝请赐。皇帝通过赐读的方式，既宣隆了自己的恩德，表现了朝廷对教育和文化的关注，又促进了由朝廷监修的图书的流通，起到了教化万民、统一思想的作用。朝廷藏书通过赐读的方式转化为官员的私家藏书，同时也就改变了“秘而不宣”的性质，有了公开借阅和复制的可能性，有了与市场接触，进入流通领域的可能性。

其二是由政府公布范本，告示天下，由需要者自行复制而达到文献传播的目的。这种赐读活动或者说是朝廷出面的图书推广形式东汉时曾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一次，那就是《熹平石经》的刻立[1]。魏时，这种规范经典的方式被继承下来，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曾诏令修葺遭董卓之乱而被毁坏的熹平石经，并增刻了《毛诗》和《郑氏尚书》两部石经，被称为《黄初石经》。魏明帝时刻立《典论》一字石经。魏正始年间，又刻立“正始石经”，所刻经书有《古文尚书》、《春秋》和《左传》(至庄公中叶止)，因为这次刻经不像以往一样单纯采用隶书，而是每字皆以古文、小篆、隶书并写三遍，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正始石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经的代表作，共用石碑35块，每块碑高192厘米，宽96厘米，约14万7千字，通过它可一览文字演变过程和三种书体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种以推广经典范本为目的的图书流通方式经济、便捷而高效，尤其适用于复制靠手抄、本本皆难同的写本书时代。石经对中国出版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石经所体现的按需复制思想，可以说是图书出版业的一个核心理念，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石经出现后，人们为了快速复制石经文字，不断改进捶拓技术，最终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

（四）多方借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诚然已经有了设肆销售和流动贩卖这样的商业发行渠道，但由于这个时候造纸业的生产规模不可能很大，纸的价格不会像后世那么低廉。加上这一时期分裂的政权征战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即便有一定的发行渠道，大多数文人学士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购买需要的书籍。无力从正常的商业渠道得到图书，一些文人便开始想方设法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获得图书，借读便成为图书流通的一种重要途径。借读根据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很多种。

第一种是向政府借读。由于秘书监是当时政府最重要的编书、出书、藏书的机构，是接触众书、研究学问的最佳所在，所以自认有资格的文士往往趋之若鹜，以期利用职务之便，求得读书治学的最佳环境。据《晋书》卷92《文苑·左思传》记载，左思欲作《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可见左思自荐做秘书郎，动机是想利用这个职位阅读秘阁的藏书。又据《梁书》卷34《张缵传》载，张缵“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缵好学，兄缅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犹仕矣。”秘书监历来是储才之地，儒士由此入仕，升迁很快，然而张缵为了遍读秘阁藏书，宁愿请求留任秘书郎。也有直接向皇帝申请到秘阁观书的，如《梁书》卷43《江子一传》载：“起家王国侍郎，奉朝请。启求观书秘阁，高祖许之。”

第二种是借读于官办学校。当时有的官办学校学费很低或者几乎免费，学生只要能够自给自足就可入校学习，为了利用官办学校藏书较多的优势，好学之士不惜千里迢迢前往就学。如《晋书》卷94《隐逸·祈嘉传》载，祈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可见，当时不仅洛阳、建康这样的大都会设有书肆，藏书丰富，开办官学，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等地

也是文化教育繁盛之地，吸引着一些好学之士前往求学。

第三种是借读于寺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描绘出当时寺庙之多。寺院通常设有藏经楼，藏书较多，是清静的读书之地。《文心雕龙》的作者，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就是通过在寺院里苦读，完成了知识积累，写就了千古名著。据《梁书》卷50《文学下·刘勰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刘勰在僧人朋友的帮助下，寄居寺院，寺院藏书为他研究文学理论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四种是借读于师门。据《魏书》卷48《高允传》载：“(高允) 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据《周书》卷45《儒林·樊深传》载：“樊深，字文深，河东猗氏人也。早丧母，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三河，讲习五经，昼夜不倦。”这种负书外出求师的行为，从两方面扩大了图书的传播，一方面很多人是为了借读师门的图书而求学，对师门藏书的阅读和复制，扩大了师门藏书的流通。另一方面既然是求师问学，各个求学者自然要携带必要的图书前往，这些图书汇聚师门，也有一定的数量和品种。大家同窗学习，彼此自然会交换阅读和复制各自所带的图书，又扩大了这批图书的流通。借读师门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梁书》卷48《儒林·范缜传》载：“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闻沛国刘瓛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屩布衣，徒行于路。瓛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再如《北史》卷81《儒林上·徐遵明传》:“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游燕、赵，师事张吾贵……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写。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徐遵明这种读书方式可谓逐书而学，正是借读于师们的典型事例。

第五种是借读于藏书家。有的私人藏书家思想开通，认为藏书为用，对借读不但不拒绝，有的还表示欢迎。据《三国志·向朗传》和《华阳国志》记载，三国时蜀国的丞相长史向朗是马谡的好朋友，马谡失街亭逃亡后，向朗因知情不报而获罪，被革职遣还成都。丢官后，向朗“优游无事，乃鸠合经籍，开门诱士，讲论古义，不预世务”。经过20年的积累，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成为蜀地首屈一指的藏书家，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精于校书，勘定谬误”，还“开门接宾，诱纳后进”，热心接待读者，向他们讲学传经。向朗这种“开门诱士”、“开门接宾”的精神在古代藏书家中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开创了私家藏书对公众开放的先例。向朗的做法受到了广泛欢迎，“上至执政，下及童冠”对其“皆敬重焉”。据《南齐书》卷52《文学·崔慰祖传》：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崔慰祖藏书每天借出几十本，他都能耐心地亲自取与，精神实为可嘉。更有甚者，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1]。范蔚不但免费借读，而且提供衣食，其义举更加令人感动。具有开放藏书观的藏书家还有北魏的元晏、李彪等。元晏遇到“诸以假借，咸不逆其意”[2]。李彪的藏书也对人开放，北魏名臣甄琛就曾在他家中“假书研习，闻见益优”[3]。私人藏书家对家藏的慷慨外借，对图书的流通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六种是游历借读。中国古人素来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京师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自然是游历借读的首选。据《陈书》卷33《儒林·贺德基传》载，“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袴”。京邑一带藏书颇富，借读机会较多，贺德基宁愿缺衣少穿，寒冬无以避寒，也要留在那里借读。《南史》卷76《隐逸下·沈麟士传》载：“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北史》卷81《儒林上·李铉传》：“以乡里寡文籍，来游京师，读所未见书。”这些记载表明，到京师读书最为解渴，有过到京师借读经历的人更容易

[1]《晋书》卷91《范平传附范蔚传》。

[2]《北史》卷15《元晏传》。

[3]《魏书》卷68《甄琛传》。

成才。到京师借读又有多种方式，《北史》卷81《儒林上·刘昼传》说：刘昼“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他采取的方法是到官宦之家当家庭教师，这不失为一条聪明的途径。除了有目的地旅行到京师借读，也有无目的云游，随机借读的，如晋葛洪在《抱朴子·自叙》中说：“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

不少人还通过借读的机会动手抄书，以求拥有这部图书而长期阅读，采用这种方式的多是经济拮据而又嗜书如命的寒门庶士。据《梁书》卷49《文学上·袁峻传》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袁峻抄书成癖，但当时类似袁峻的人并不少见，如此借抄循环，图书流通的范围自然越扩越大。再如《梁书》卷33《王筠传》载：“余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从王筠的自述看，当时“请人假手”，雇人抄书是普遍现象，相比起来，亲自抄书反显得可贵，当事人有一种自豪感。又据《南齐书·沈缡士传》载：“驎士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沈驎士，《南史》作沈麟士，见前页所引。）“反故”指纸的背面，贫穷的沈驎士在心爱的藏书毁于火灾之后没有灰心，以耄耋之年居然在字纸的背面抄写图书数千卷，重建自己的藏书，令人钦敬。自抄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自行设计图书的装帧和形式。如晋人葛洪、齐人萧钧都曾把常规的图书抄成巾箱本，便于携带和温习。图书的形式改变后，给人以新奇感，

容易引起一连串的模仿，进一步扩大图书的流通。

（五）前辈遗赠

藏书的代代相传也是图书流通的一种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的遗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血亲间的家传，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魏晋间的范平是一位大藏书家，他将藏书传给孙子范蔚，范蔚拥书七千卷，但不护惜如秘物，而是开门供读，每天“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南齐人褚湛之是个藏书家，他过世后，其子褚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另外一种是非血亲的师友间的传承。如汉魏之间的蔡邕为一代文宗，声名显赫，家富藏书。王粲是一个早慧少年，十几岁即有文名。有一次王粲登门拜访蔡邕，此时蔡家宾客满堂，年近六十的蔡邕听说王粲来到，竟“倒履迎之”，引得满座皆惊。蔡邕不仅当着众人之面称赞王粲，表示要培养他，还宣布“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1]。不久，蔡邕即把六千卷藏书赠予年方十四五岁的王粲。王粲成人后，果不负期望，经史皆通，博识多才，尤善诗赋，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对这批有特殊意义的藏书十分珍惜，不断扩大其数量，使之增至万卷。身后这批藏书又辗转传到宗亲王弼手中，王弼弱冠之年即为经学大师，名公巨卿都自叹弗如，究其渊源授受，这批书可以说是无言之师，发挥了很大作用。蔡邕藏书的流通可以说先靠师承后靠家传，培养出了王粲、王弼两大俊贤，还惠及了他们周围的士人，可谓物有所值。

效仿蔡邕，将藏书不传后人而传可造青年的还有南朝梁时的沈约。沈约十分欣赏王筠的才学，每读王筠的文章，“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誉之为“当今王粲”，并向梁武帝推荐说：“晚来名家，惟见王筠独步。”[2] 沈约多次对王筠讲：“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3] 以沈约之名位，自然不会口出虚言，很可能将藏书传给了王筠。梁时的藏书家刘显，藏书观也颇为通达，他经常以蔡邕赠书于王粲自比，身后果将大部分藏书传给了自己推重的孔奂。北周的徐勉也抱着类似的观念，将藏书不传子孙，而是传给了朋友

【1】《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

【2】《梁书》卷33《王筠传》。

【3】《南史》卷22《王筠传》。

蔡大宝。

无论家传还是师友间的传承，都为图书的流通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师承所表现出的开阔胸襟，尤其值得后人弘扬。

（六）遣使报聘，民族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各割据政权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又建交修好。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中原地区以外的我国境内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它们都与中原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贸易联系。不论是汉族政权之间，还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他们经常以聘使贡献、奉使赠答的名义进行一些贸易往来，彼此交换方物，索求土产。

三国时期，魏的马，蜀的锦，吴的海产，都是三国之间经常交换的礼品。图书偶尔也作为外交礼品相送，如曹丕的《典论》写成后，自我感觉甚好，就以帛抄写一部送与吴主孙权，以纸抄写一部送给吴臣张昭。

自曹魏以后，西域和中原也经常通使报聘，保持密切联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即便在晋朝内地混乱之时亦未间断。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以朝贡和回赠形式开展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关系达到兴盛时期，所谓“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1]。汉文图书也成为中原与西域交易的对象，以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建立的高昌国（在今新疆吐鲁番）为例，据《魏书》卷101《高昌传》载，高昌王“自以为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梁书》卷54《诸夷传》说，高昌国“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卷50《异域下·高昌传》也说，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古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可见在西域建立的一些国家，统治者向往汉民族文化，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索借图书，有时还请求

【1】《魏书》卷110《食货志》。

派学者前往讲学，显然汉文图书在少数民族中间有一定读者，也有一定数量。在政府交流之外，民间交流也比较活跃，尤其在佛经的东传方面，西域各民族贡献颇大。据《出三藏记集》载，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259年）出家学道于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90章，60万余言。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镜，送经胡本至洛阳。僧纯于龟兹得《比丘尼戒本》，昙摩侍等译出。据《开元释教录》记载，道泰往葱西，获《毗婆沙》梵本及诸经论多种，后译出。昙无谶自西域至凉州，携有《大涅槃经》前分《菩萨戒经》等，后译出。法献在于阗得梵本及佛牙，后由达摩摩提译出。还有文献表明，惠生与宋云往西域，采得经律170部。宝暹于北齐时经西域得梵本260部。[1]如果把佛经的东传比喻为江河的东流，那么印度就是源头，西域是上游，中原、朝鲜和日本是中下游，大多数佛经都是先传入西域，由原版的梵语翻译成所谓的“胡言”，再由少数民族的“胡言”翻译成汉语。

【1】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1版,1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南北朝初期，南朝的刘宋王朝与北凉政权和睦相处，多次互赠书籍。《宋书·氐胡传》载：宋元嘉三年（426年），“世子兴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这一次是北凉提出请求，刘宋君臣慨然给以满足。北凉王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继位，继续与宋修好，又有交换图书的记录：元嘉“十四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敃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2]。这一次，北凉是先奉献后索取，双方互通有无，各有所得。

【2】《宋书》卷98《氐胡传》。

与三国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南北朝时期不但各个朝廷之间互派使臣，地方政府也可以派使出访，如东晋的陶侃曾遣使聘石勒。另外，在官派使者出访之时，不少官僚、贵族也派人随行，买卖商品，图书文化交流随之发展。《北齐书·崔暹传》载："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赞呗送至馆焉。"[1] 此时佛教盛行，南北统治者不约而同笃信佛教，因同气相应而互赠佛经之事屡见不鲜。大同六年（540年），梁武帝还赠与西部少数民族政权吐谷浑佛经一百零三卷[2]。

【1】《北齐书》卷30《崔暹传》。

【2】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1版，第116页，宁波出版社，2001。

这个时期，中原与西域民族的密切交流还造就了一批跨文化的西域商人，他们不仅精通汉语，部分人还进入了汉族政权的主流社会。北齐境内就有不少西域商人定居，有的求仕上进，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官僚，如幸臣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3]。齐宗室高思好起兵反高纬时，在给并州贵族的书信中写道："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朝市。"[4] 可见西域商人太多，在部分汉人眼里已经成了祸患。跨文化商人的增多是跨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跨文化交流离不开书本知识的学习和传播，离不开图书的跨民族、跨文化流通。

【3】《北齐书》卷50《恩幸·和士开传》。

【4】《北齐书》卷14《上洛王思宗传附思好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遣使报聘相当频繁，民族交流十分广泛，以上事例只能窥见当时图书跨疆界、跨民族、跨文化流通状况之一斑，全面的情况应更为可观。

以上是图书在国内常规的流通方式。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是烽火连绵、和战无常、社会动荡，实际上还存在一些非常规的图书流通方式，比如战争劫掠。战争劫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交战者一方有计划地在战争中劫掠对方的藏书，劫掠图书是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如建安三年（198年），曹操破吕布，令官军收集战利品，"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5]。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6]。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将领王濬率军进入吴国都城建业后，"搜其图籍，封其府

【5】《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

【6】《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操》。

库”[1]。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姚秦，进入长安后，“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这些图书“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刘裕将其全部运到了建康[2]。萧衍在平东昏侯后，“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3]。另一种是战争中爱好藏书的官兵乘战乱之机私自劫掠图书，据为己有，这种行为既没有得到上级明许也没有被禁止。如晋人应詹与陶侃在长沙打败了杜弢，杜弢库中“金宝溢目”，而“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4]。北齐人辛术“虽在戎旅，手不释卷”，“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以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门”[5]。

【1】《晋书》卷42《王濬传》。

【2】《隋书》卷49《牛弘传》。

【3】《梁书》卷1《武帝纪上》。

【4】《晋书》卷70《应詹传》。

【5】《北齐书》卷38《辛术传》。

二、图书的国际流通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世界缺乏完整的认识，视野相当有限，自足保守的封建王朝采取相对封闭的对外政策，没有探索世界的动力。加上中国本身地理状况复杂，东临大海，内陆地形多样，幅员辽阔，人们凭借当时的交通能力很难克服重重障碍远出异邦，况且图书的载体又相当笨重，所以中外图书交流极少，发展的速度相当缓慢。从秦到西汉，中外图书交流在历史文献中只留下点滴记录。一般认为，中外图书稍有规模的交流始于东汉，佛经的传入为其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佛教，当时佛教在中原已被广泛接纳，传播迅速，极为盛行，为使广大信众皆有经可念，佛经便源源不断地由国外输入，其中既有国外僧侣带入中国的，也有中国僧人出国求取的。佛经的传入、整理、翻译、流通成为当时最热闹的文化现象。由于中国是佛教传播的接受者，是吸收的一方，以佛经为代表的图书的跨国流通是单向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输入图书而不输出。大约在西晋以后，少数中国人就近移民朝鲜和日本，佛教也通过中国继续东渐，人际交流和宗教传播带动了图书的流通，中国图书才开始向朝鲜和日本输出，兼有了输入和输出两种形式。

（一）图书的输入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输入的类型比较单调，基本上都是佛经。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佛经多由域外僧人主动携来，当佛教在中国立足，有一定信众的时候，诵念佛经就不仅仅是通晓多种语言的个别高僧的事，为了满足僧众诵经，佛经翻译变得甚为迫切，中国僧人也开始跨国取经，以供翻译之需。历史上有关佛经输入的记载屡见不鲜。据《高僧传》载，天竺僧竺佛朔，携《道行经》来洛阳。昙果于迦维罗国得梵本，由康孟祥、竺大力译为汉文。据《隋书·经籍志》载，法显与慧景等从长安出发，经三十余国到达北天竺、中天竺，取得《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等，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取得《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经》等佛经。智猛自天竺携归《泥洹经》、《僧祇律》等，于凉州自译《泥洹经》20卷。据《开元释教录》载，昙无竭在印度得《观音受记经》，后译出。据《续高僧传》载，曼托罗自扶南至建业，携来大批梵本，后译出。真谛携经至中国，多罗树叶凡有240夹[1]。另外还有大量佛经是从西域输入的，西域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域佛经转移到中原可以看作是图书在国内的流通，特别是那些已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佛经的东传更是如此。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自西域传入的佛经，乃国外的原版书，这些书实际上是先到西域再到中原，既可以理解为是在国内流通，也可以理解为是自国外输入。

【1】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1版，1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本无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却被大面积地佛化，有些朝代还将其列为国教，可见佛经输入的惊人速度和规模。据《大唐内典录》统计，三国魏时参与译经的有6人，译经律等13部24卷，吴参与译经的有4人，译经传等148部185卷。据《历代三宝记》统计，西晋参与译经的有13人，译出经籍450部717卷；东晋参与译经的有27人，译出经籍268部578卷。据《大唐内典录》统计，南朝译经最多的梁参与译经的有21人，译出经论等90部780卷。据《魏书》卷114《释老志》记载：“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

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此句反映了北朝收集佛经的情况。佛经流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和僧侣还用汉籍的图书形式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佛教图书类型，例如出现了将同本异译的佛经合编，经注集于一书的合本；出现了汇集大量佛教文章的总集，如宋时陆澄编的《法论》；出现了以类相从、排比众经的类书，如《三宝记》、《法宝联璧》等；出现了揭示众经的佛经目录，如西晋竺法护编撰的《众经目录》、东晋释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梁释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以上统计数据和佛经目录所记载的传入中土的佛教文献，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外图书向中国输入的盛况。

(二) 图书的输出

中国东邻太平洋，唯有东北陆上与朝鲜相接，与日本列岛一衣带水。中国人不仅在陆路上有到达朝鲜的地理之便，而且早在秦汉时期，一条自渤海、黄海通往朝鲜半岛南部的海上航线就已开辟，一些中国人曾沿此线移居朝鲜。传说秦始皇时，中国人徐福就曾携书东渡日本，所以有人认为徐福东渡乃是中国典籍外传之始。但因为既无实证又无明确的记载，徐福东渡的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好事者的幻化敷衍之说。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孙吴政权，出于经济、政治的多方面考虑，曾多次派万人大船队远航辽东，又开辟了东南至东北亚的海上航线。随着第二条航线的贯通，江南六朝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流格外频繁，图书的东传也加快了节奏。《北史》卷94《高丽传》载，高丽在南北朝时已“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汉文图书已在高丽广泛流传。东晋、宋、齐、梁时，高句丽都曾遣使贡献方物，并引进和吸收文化。前秦建元八年（372年），苻坚遣使并派僧人送佛像及经论到高句丽，不久在高句丽兴建寺院，传播佛教。百济王也很重视与中国修好，经常“诣阙贡献”，宋、齐、梁三代也曾赐给百济王封号和官职。百济对中国文化十分景仰，尤其对中国的图书、学术、工艺感兴趣，在贡献之时多

次请赐图书，请求派学者和工匠前往讲学传艺。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百济王余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1]。百济也向梁请赐过图书，《梁书》卷54《诸夷传》载：“(梁）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这两次请赐，百济都指定图书，而且这些图书不是最基本的典籍，似为补阙之用，看来中国图书在百济的传播非一时之事，汉籍在百济已有了一定的积累，百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已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新罗在刘宋时或称斯罗，在朝鲜半岛诸国中势力最弱，“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新罗曾附于百济使者和梁通好，贡献方物。南朝陈天嘉六年（565年），陈文帝遣使到新罗，送去佛经1 700多卷。由上述情况可见，这个时期中朝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交流的层面也比较丰富，不但中国的经史典籍、汉译佛经和书画等流通到朝鲜，中国还向朝鲜派出了博士、工匠、画师等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中日两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常友好往来，日本使臣来华的路线，多是从九州经海路到朝鲜，再从朝鲜经陆路到中国。由于中日交流需要借道朝鲜，所以朝鲜自然就成了中日交流的中介。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卷中“应神天皇”条曰：“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迩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迩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2] 公元720年，第一部日本史《日本书纪》的“应神天皇十六年”条也有与《古事记》相类似的记载：“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之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3] 另据《日本开国五千年史》记载：“应神帝之朝，百济王遣阿直歧至日本。阿直歧善谈经典，尚言其国有王仁者，胜于己。帝即征王仁。翌岁，王仁来朝，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在践阼十六年之时，太子菟道稚郎师事王仁，

【1】《宋书》卷97《夷蛮传》。

【2】【3】严绍璗：《中国古代典籍东传日本考略》，见《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1版，5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而得通晓于典籍。"[1] 后两书提到的"王仁"就是《古事记》中的"和迩吉师"，之所以名称有所不同，是因为《古事记》是用"真名"写作，《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作，《日本开国五千年史》则可能是对《日本书纪》的引用。公元751年，日本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在谈日本开化历程的《序》中说："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2] 王仁再一次被提及。那么这位被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一致指称为汉籍东传的始祖、日本开化的启蒙者的王仁究竟是何许人呢？从他的姓名与文化教养上可以推知，他很可能是移民朝鲜的汉人，或者是朝鲜汉族移民的后裔。即便不论王仁的身份，上述材料也可以表明在日本应神时代，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已传到日本。按照日本史家的权威观点，应神时代约为4世纪后半期，此时正值中国的东晋。至于《古事记》中提到《千字文》，这是一个疏漏，因为《千字文》在应神天皇之后百余年才由梁武帝发起编撰。但《千字文》传入日本或许也是事实，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追述两三百年前的历史，史事错位是可能的，但基本事实应有所依据。另外，《日本书纪》中有一些传说中天皇的故事，其中的很多对话和情节都颇似《论语》、《左传》、《史记》等汉籍中故事的模演。因而，也可以看到除《论语》之外，也有其他汉籍当时已传入日本。

中国文献中虽然未见图书东传日本的明确记载，但不乏百济学者到日本讲学的记录。日本继体天皇七年（513年，梁武帝天监年间），百济五经博士段扬尔至日本传授儒学。一直到继体天皇十年（516年），段扬尔的讲学任务又由新来的五经博士汉安茂接替，日本从此才有五经之名。日本钦明天皇十五年（554年），百济五经博士王柳贵、马丁安，易博士王道良又至日本，讲授经学[3]。既然不断有博士到日本讲授经学，至少表明全套的五经已经流通到了日本，中国图书向日本的传播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冯瑶林：《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考》，自印本，1947年版。见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1版，2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严绍璗：《中国古代典籍东传日本考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1版，5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1版，2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从以上论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的国际间流通基本上可以说是单向的，一方面中国从国外主要是天竺输入佛经，一方面中国向国外主要是朝鲜和日本输出儒家经典和佛教文献，国与国之间图书的双向传播尚未展开，与中国在图书流通方面发生关系的国家还十分有限。然而这个结论只是根据文献明确记载的情况得出的，实际上中国与域外很多国家都有政治和商贸方面的交往，如中国与中亚的大宛国、大月氏、粟特、康居、忸密以及西亚的波斯（今伊朗）、大秦（东罗马帝国）等国都有外交、商贸关系；中国与东南亚的天竺（今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南洋群岛诸国（今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诸多物资的流通都是双向的而且是频繁的，中国出版的典籍流通到这些国家和地区，虽未发现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也应存在较大的可能性。

第二节　图书发行的种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收藏和生产的总量相当可观，远远超过秦汉之和。那么当时广泛流通的图书品种主要有哪些呢？根据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特点、图书交流的情况来看，主要包括以下门类。

一、四部图书中的经典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创“四部”的概念，把古今图书归入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四部图书当中的经典著作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它们的滋养，所以经典著作在图书市场上无可辩驳地占据着主体地位，无论政府还是个人最基本的阅读需要通常都表现为对经典著作的搜购。

政府方面，立国之前，不少开国者就注意在征战中收集经典著作，如宋代开国皇帝刘裕在任东晋大将军北伐姚秦时就“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1]。立国之后，更是把鸠集、抄写经

【1】《隋书》卷49《牛弘传》。

典著作作为文治的首务，如少数民族出身的北魏道武帝听博士李先说“惟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1]。北魏文成帝接受秘书郎高谧的建议，广访群书，大加缮写。北魏孝文帝颁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2] 梁武帝曾四次组织抄写经典著作，使其各有复本，分置异处，以备不测。政权稳固后，开设学馆、发展教育需要经典著作。例如，宋文帝时开设玄、儒、文、史四个学馆，齐明帝时在王俭家开设学士馆，梁武帝时开设玄、儒、文、史、律五个学馆。梁代学馆最盛时，学生的数量达到500人，听众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如果图书市场上对作为教材和参考资料的经典著作没有一定的供应能力，如此规模的国学是很难开展的。编制大型图书也需要经典著作，否则《皇览》、《华林遍略》等都会成为无米之炊。明先圣之教、易民视听、凝聚海内、修好四夷还需要经典著作，例如北周向西域的高昌国输出五经、诸史；刘宋接受北凉政权的要求，赐给《周易》及子集诸书；南北朝时向高丽输出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向日本输出五经等。

个人方面，彼此借读、交流的也多是经典著作，如北魏皇室曾向民间访购经论[3]。齐武帝的第七子晋安王子懋祈求所好书，武帝赐给他杜预所写的《左传》及古今善言。梁代的张缵为秘书郎，朝廷要提拔他，他“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士矣”[4]。沈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5]。梁元帝萧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拥书最多的藏书家，他在称帝前借游宦的机会，每到一地都亲自或遣人四处访书，他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述道：“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赍‘五经’正副本。……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于长沙寺经藏，就京公写得四部。……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又聚得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6] 从萧绎的交代看，他收集的五经和前四史都不止一部，而是各种版本、各种形式兼有，

【1】《魏书》卷33《李先传》。

【2】《魏书》卷7《高祖纪下》。

【3】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1版，17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4】《梁书》卷34《张缵传》。

【5】《南史》卷76《隐逸下·沈麟士传》。

【6】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1版，134页，宁波出版社，2001。

看来当时藏书家对经典著作的态度是不厌其多，多多益善。史书上称赞梁朝文化繁荣时说“四境之内，家有文史”[1]。种种事例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出于维护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广大士人出于成名入仕的需要，经典著作乃官私必备之书。与这种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相适应，图书市场上发行的主要图书品种也是经典著作，其中尤以五经、前四史、先秦诸子发行量最大，可谓长销不衰的品种。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二、当代文学作品

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解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发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一些当代文学作品已经具有了畅销书的特征，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应该上溯到这个时期。

当时的文学家们已经善于利用名人为作品造势，每有新作，往往先请托前辈名人评论、推荐。如西晋秘书郎左思利用在秘书省工作的优越读书条件，博览群书，精心构思，以丰富优美的辞藻写出了描述魏、蜀、吴三国都城盛衰巨变的《三都赋》。文章写成后，首先请有名望的皇甫谧、卫瓘、刘逵、张载等为之作序、作注、作略解。著名文学家张华给出的评语是："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经过多位名人的推荐，《三都赋》很快轰动京城，畅行社会，“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2]。这个事例反映出的图书发行信息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当时佣书之风甚浓，“豪贵之家”是不可能全部亲自抄写的，传写一文达到纸贵的程度，说明当时的佣书者众多，也就是有一支庞大的出版队伍。其次，在写本书时代，纸张的主要用途就是抄书，卖纸差不多就是卖书，洛阳纸贵是图书发行量大的直接体现，而且卖纸的商人懂得利用价值规律，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调整纸的价格，可见图书发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京师为之纸贵的文学家还有南朝的谢灵运和北魏、北齐间的邢卲。谢灵运引领山水诗派，诗风清新，“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3]。邢卲嗜好购书、藏书，是洛阳书

【2】《晋书》卷92《文苑·左思传》。

【3】《南史》卷19《谢灵运传》。

肆的常客，他“雅有才思，聪明强记……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卲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1]。可见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大都会里的市民对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都一样浓厚，谢灵运寄情自然的诗歌和邢卲精雕细琢的美文，每创作一篇，不仅复制、发行的量非常大，而且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范围非常广。左思、谢灵运和邢卲的作品的畅销都是市场上读者的自发行为，没有受到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干扰，符合畅销书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畅销书。

【1】《北史》卷43《邢卲传》。

不过这个时期只能说是出现了畅销书的萌芽，还不能说是进入了畅销书时代，这是因为：第一，畅销的作品都是单篇文献，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第二，作者虽然在文章写成后注意宣传，但在创作前并没有强烈的市场意识，事先没有对文章的内容进行商业策划，主观上是为了追求艺术而不是为了迎合大众进行创作，有图名之心而无图利之念。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概念和举措，而这是畅销书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除了这些典型的畅销作品，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新作还有很多，主要集中于别集和总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文学评论与文艺理论等几个类型，其中的经典之作在当时就颇受欢迎，像《诗品》、《文选》、《文心雕龙》等更是长销不衰，直至今天。

这个时期文学图书的销售情况和受欢迎程度还可以从“汲冢竹书”的命运得到佐证。“汲冢竹书”指的是西晋时一个名叫“不準”的盗墓贼在汲郡这个地方盗墓时所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这批竹简约有数十车，被政府保护起来抢救整理，但随着西晋的灭亡，整理后的“汲冢竹书”绝大部分散佚，唯有《穆天子传》因为故事性较强，有小说味道，人们乐于阅读，积极传抄复制，才使其流传下来。《穆天子传》本来是编年体史书，只因为有小说的色彩而改变了散佚的命运，可想当时小说、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受欢迎程度。

三、佛道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经典不在“四部”之列，也是当时大规模生产和流通的图书类型。佛经于东汉开始有规模地输入中国，道教于东汉正式创立，可以说魏晋之前佛道经典基本上无甚积累，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目所反映的佛经和道经的品种差不多就是这个时期所生产和流通的这两类图书的品种。

梁朝阮孝绪所编的《七录》是这个时期收录图书最完备的书目，我们不妨透过此书目了解一下当时佛道典籍的流通情况。《七录》设有两个“外篇”专门著录佛经和道经，其中外篇第一为“佛法录”，即佛经，下分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五个小类，收录佛经2 410种，5 400卷；外篇第二为“仙道录”，即道经，下分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四个小类，收书425种，1 138卷。这是阮孝绪在精心甄别之后确定的佛经和道经的品种数量，由于图书市场上每种佛经、道经不可能仅售一本，而是发售大量复本，所以当时实际流通的佛道经典应该是阮孝绪著录数目的数倍以上，已经相当可观。

这个时期尤其是佛教流行朝野，佛寺遍布南北，各地踊跃译经，在功德心理的支配下，传抄、供养、念诵佛经成为普通信众日常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僧侣和信众抄写不能满足需要，还出现了专门为人抄写佛经的写经生，佛教经籍流通之快，传播之广，数量之大，前所未有。

四、识字课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蒙教材比较多，销售情况比较好。一方面东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章》风行不衰，在市不绝。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编撰的识字课本层出不穷，有三国时期朱育的《幼学篇》、项峻的《始学篇》，晋代杨方的《少学》、束皙的《启蒙记》、王义的《小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梁代周兴嗣的《千字文》，还有《常用字训》、《俗语难字》、《杂字要》、《杂

字指》、《字指》、《要字苑》等等。不过影响最大、使用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还属传统教材《急就章》，其普及情况可谓“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许多著名学者幼年都以此书启蒙，如夏侯德、崔浩、刘兰、李绘、刘铉等人，其中魏时的崔浩童年以《急就章》开蒙，成年后颇有文名，精于书法，又成为人人求写《急就章》的对象。《魏书》卷35《崔浩传》载：“崔浩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这个例子说明，当时有条件的家长都希望得到一本由书法家书写的识字课本，使孩子在识字的同时能练得一手好字，提高书法艺术修养。因为在写本书时代，书法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知识修养的集中体现，家长为了使孩子将来走入社会有较强的竞争力，不得不对孩子的书法训练给予格外的重视。

童蒙读物由于篇幅不大，需求量大，又易于复制发行，因此传抄之人甚多，也有不少书法家乐于为人抄写此类图书，以扩大自己书法的影响力。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如三国时期的钟繇、皇象，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及其早年宗师卫夫人、尚书郎索靖等人，也都抄写过《急就章》。

名气稍次于《急就章》的《千字文》也有书法家抄写、复制。《千字文》是在南朝梁武帝时期编写的。梁武帝非常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图78），他为了教育皇子，特命拓书人殷铁石从王羲之遗留的书法作品中挑选出各不重复的1 000个字，分别拓在小纸片上，又令周兴嗣将其按韵编排成识字教材。可见最初的《千字文》是王羲之的手书剪辑，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于是根据现有的字而编写成文，有削足适履的意味，该书早期的珍贵之处主要体现在它是由王羲之的手书拼贴而成的，其语句内容只起辅助记忆、提高识字兴趣的作用。既然宫廷已采用《千字文》作为识字课本，臣民自然也就纷纷仿效。王羲之的第七世孙释智永就曾抄写过大

图78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画像



量的《千字文》。释智永与哥哥王孝宾均皈依佛门，居住在永欣寺，整日临水池练习书法。他练习书法30年，每当一支笔写得毫毛脱落，便称为“秃笔”置于笼中，共积攒了5笼。他的草书水平极高，享誉南北，请他写字的人很多，他只好用铁皮将门户包起来，称为“铁门限”，还为所用笔修了一座墓，叫“退笔冢”，但来求书的人依然不绝。他在30年间抄写《真草千字文》800本，在浙江诸寺每寺置一册，所以传世很多。到了隋朝的时候，人们淡忘了《千字文》是由王羲之手书拼成的法帖，更多地表现出对其语句内容的欣赏，《千字文》开始广泛流行，形形色色的抄本和改写本、续写本大量出现。释智永的抄本也急剧升值，曾出口到日本，有了国际影响。

由以上事例可见，由于书法家的推波助澜，出版发行了许多识字类读本。这类书的销售，成为图书发行的一个特殊品种。

五、书法、绘画作品及其理论著作

在历史文献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图”和“籍”两个字往往是连用的，形成一个联合词组“图籍”。如“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1]。再如“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2]。这里的“图籍”是图画和以文字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的合称。这个时期，图画和书籍有时是结合起来发行和流通的，图画不仅在市场上和书籍一并销售，而且买主也多是聚书之人，藏书家通常也就是字画收藏家。另外，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画大增的依据还有南齐王俭编制的书目《七志》，在《七志》中新增了图谱志，突破了汉代刘歆的《七略》收书不收图的旧例。

[1]《梁书》卷34《张缵传》。

[2]《南史》卷43《萧锋传》。

由上引事例可见，只探讨以文字为内容的书籍的发行情况，而忽视图——也就是书法和绘画作品的发行，还不足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发行的全貌。

书法在东汉末年已经从实用需要转向艺术追求，其标志是草书的产生。由于汉章帝对草书喜爱尤加，所以草书在当时又被称为“章草”。统治者的鼓励导致部分士人习练草书成风，达到了

狂热的地步。唐代张彦远的《书法要录》中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一文，描写了当时士人迷恋草书的情景："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息。[1]"以如此勤奋的态度练字，显然不是追求实用，而是为了提高书法艺术的造诣。以章草的崛起为契机，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都在魏晋南北朝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书法艺术成为士人张扬个性、挥洒精神、传达感情的重要方式（图79、图80）。

【1】黄新亚：《中国魏晋南北朝艺术史》，1版，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图79
钟繇《宣示表》

这个时期流通的书法作品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书法文稿，就是直接写在纸上的书法作品及其摹本。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书法，不少帝王都是书法迷，如王羲之就是梁武帝的书法偶像，王羲之的佳作《兰亭序》、《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都享有盛名。有名的书法作品通常为帝王显贵、书法家后代或藏书家所珍藏，一般人很难接触到。但既然作品名声已响，爱好者总要想方设法一睹为快。《兰亭序》产生后，就为许多人所摹写，大量摹本满足了普通人亲近、欣赏、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愿望（图81）。《兰亭序》的真品流传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至为推崇，便千方百计将真迹搜罗到手，欣赏了一生还不够，临终前还遗命将其陪葬昭陵，真迹自此绝于尘世。现在我们所见的《兰亭序》实际只是摹写得比较逼真的摹本，由《兰亭序》摹本的流传，可知摹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作品复制和流通的重要方式。

图80
王献之《洛神赋帖》



当时市场上摹写的书法作品很多，一些不诚实的摹写者还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冒充真迹出售，大肆渔利。例如有个名叫康昕的士子和南州的惠式道人共学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模仿得惟妙惟肖，足以乱真，写好的作品拿到市上高价出卖，不少人将其作为王氏父子的墨宝珍藏。这样

图81
王羲之《兰亭序帖》（神龙本）

【1】《书林纪事》卷2。

摹本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变成了赝品。也有书法家以卖字暴富的，如南朝侍中萧子云善草隶，远近闻名。百济国派使臣向他求书。他花了三天时间，“书三十纸与之，获金数百万”[1]。

第二类是碑石帖，就是从碑石上捶拓或摹写的书法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刻碑勒石之风甚浓，甚至发展出了一种方整遒劲的适合刻在碑上的字体——魏碑。这个时期留下的名碑有《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受禅表》碑、《广武将军》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名石有《石门铭》摩崖、龙门二十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这些碑石的文字皆由著名的书法家书写，都是非常优秀的书法作品。这种刻在石头上的书法作品虽然不是图书，但是通过捶拓和摹写可以转换到纸张上，而且由于碑石巨大，整张摹拓的纸不能展读，还要折叠成册，装订为书。当时已经出现了捶拓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士——拓书人，通过捶拓和摹写的方法，可以生产很多复本，将复本拿到市场上出售，碑石上的书法精品就能够广泛传播开来。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能亲临众多的摩崖和碑石，他们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拓帖和摹本来欣赏和学习书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的国家书库就藏有石刻文字，可惜在隋代流失了，但“相承传拓之作，犹在秘府”，隋代皇家藏书中尚保存有“秦始皇东巡会稽石刻文一卷”、“熹平石经残文三十四卷”、“曹魏三体石经十七卷”等。可见碑石帖这种拓印的书在魏晋南北朝确已流通，并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将其搜购到秘府收藏（图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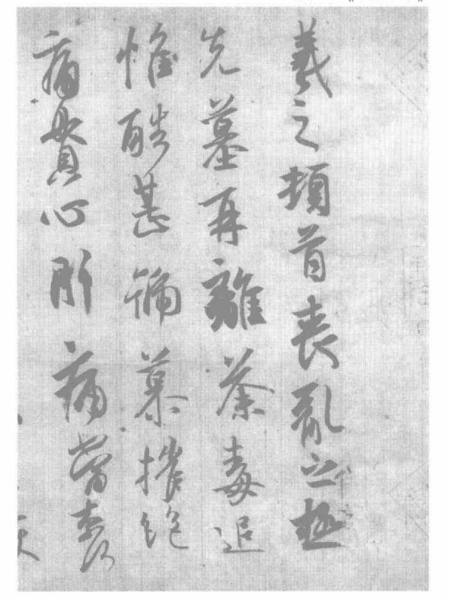
书法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增值，作为一种投资手段，收藏的人很多。据《魏书》卷24《崔玄伯传》载，“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这里的“诔”指的是祭文，整句话的意思是书法家崔潜曾给其兄崔浑写了一篇祭文，后来流散到书市上，近两百年后，被王遵业在书市上偶然碰到，视若珍宝，秘不示人。又过了30年，王遵业的儿子将其赠送给崔季舒，知道的人纷纷前来摹拓。王遵业买这幅书法作品的书市在北魏的都城（山西平城），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其书肆经营的范围就有如此之广，除书籍外，还有字画作品，更不用说洛阳、建康这样的大都会了。



图82
西晋左棻墓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书法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图83），名家辈出，名作迭现，取得了很大成绩，书法理论创作也十分繁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著名的有卫恒的《四体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自论书》，王珉的《行书状》，王献之的《进书诀表》，王僧虔的《书赋》、《论书》、《笔意赞》，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等，这些论著有的是单篇文章，有的是书，它们丰富了这个时期图书的品种，在书市上占有一席之地。

图83
王羲之《丧乱帖》



魏晋之前，绘画是一种实用技艺，画家的地位很低，被归入工匠之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为统治者绘制宫室和陵墓壁画，设计服饰和用具图案等，作用和木匠、瓦匠差不多，绘画作品融入到建筑等综合艺术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

评价。东汉末年，尊崇儒家、以经取士的大一统王朝大厦将倾，以曹操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势力改革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强调唯才是举，有绘画等特殊才能的士人受到欢迎，如张衡、蔡邕等都是有绘画之才的官僚，画家的地位开始提升。到了魏晋，谈玄之风日炽，社会弥漫着清虚简远的气氛，具有寄情、自慰、调适、消遣作用的绘画便和谈玄、饮酒、歌舞、书法一样，被追求风雅和自在生活情调的士人所接纳，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的乐趣，绘画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天机，画家和画作一下子成批出现，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时期。

当时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人物画、山水画、鸟兽画等几种。以人物画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品藻人物，加上佛教异军突起，受善画人物的佛画和西域画技法的影响，不少知名的画家都能画人物画，人物画达到了一定的成就。如卫协在西晋画坛曾有"画圣"之称，据说他画有《七佛图》，不敢点睛，惟恐点而成真。东晋王羲之不仅是书法名家还是画家，曾画《临镜自写真图》，还善于在扇子上画人物。东晋最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尤其善于画人物（图84），画作有《中兴帝相列像》、《列仙图》、《三天女图》、《洛神赋图卷》等，尤以《女史箴图卷》影响最大。

图84
东晋顾恺之《列女传》画卷局部



梁武帝时的宫廷画家张僧繇尤工道释人物，画了很多佛教人物故事画。与品藻人物的时代风尚相结合，这个时期的人物画通常要在所画的人物画旁边加上对人物的评语，以起鉴戒、教化的作用。由于被画的基本上都是人们景仰的人物，所以画边的评语多是赞美之辞，因而被称为"画赞"。画赞在某些画家那里逐渐由赞美人转变为赞美画，于是"画品"等绘画理论著作便慢慢产生了。

人物画因为具有鉴戒、教化的作用，所以有一定的社会需求量。据文献记载，南朝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

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江夏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1]。由此可知，当时的人物画《孝子图》颇为流行，是皇帝提倡诸王阅读的读物。另外，只要不怕犯禁和费功夫，在建康的市场上，其他图画和书籍也是可以买到甚至备齐的。

[1]《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下》。

此外还有地图。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征战不休、战旗猎猎的时代，军事斗争中战略战术的制订离不开一种特殊的实用美术作品——地图，于是以画地图为专长的画家也出现了。这个时期以画地图而流传千古的画家是三国时吴王孙权的夫人。孙权在三分天下的激烈军事斗争中，深切体会到地图的重要性，热切期盼能得到一个善画的人才，绘出天下山川形势，便于作战指挥。谁知丞相赵达之妹就有绘画的天赋，自幼习画，且有刺绣绝技。赵达将妹妹推荐给孙权，作了孙权的夫人。这位夫人不负孙权的期望，她向孙权建议说以丹青绘制的地图容易掉色，不耐使用，倒不如用丝线绣出一幅地图，于是“作列国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于方帛上；既成，乃进于吴王，时人谓之针绝”[2]。除了赵夫人，做过魏帝的曹髦也画过地图性质的作品《黄河流势图》。

[2]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版，2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根据魏晋南北朝战事稠密的程度，这个时期地图的生产和销售应该十分活跃。正如孙权夫人所言，由于地图使用频繁，使用和保存的环境恶劣，容易掉色破裂，所以更新的速度还很快，需要及时地加以补充。除了正规战争的需要，军事训练和军事爱好者钻研军事也要用到地图，地图在军中和民间都有一定的市场。

同书法的情况相类似，魏晋南北朝的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也是互相促进、并驾齐驱的，这个时期的画论也有不少传世之作，顾恺之的《魏晋胜流（名臣）画赞》、谢赫的《古画品录》、孙畅之的《述画记》、姚最的《续画品录》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这些著作都具有批评和赏析性质，因而被称为“画品”，与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相映成辉。在这些画品著作中，尤以齐梁间谢赫的《古画品录》最为著名，此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绘画批评著作，奠定了中国绘画理论批评的基

础。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高度概括了中国画的技法和特点，是中国绘画理论的界标之一。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则是对南朝崛起的山水画的思考和总结，阐发了士人以玄对山水、以佛对山水、以情对山水各不相同的丰富精妙的审美体验。这些富有灵气的画论的出现，使魏晋南北朝的图书品种显得更加丰富多样，更具有时代特色。

以上图书类型因为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潮和风气相合拍，所以都是图书市场上常见的并且发行量有一定保障的品种。此外，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著作具有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特点，尤其是《大明历》、《齐民要术》、《肘后备急方》等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凡识字之人皆可参照应用，所以其读者面也较广，这些图书复制、发行的数量也比较可观。至于这个时期出现的另外一些新的图书品种，如类书、谱牒、地理书等，虽然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比较高，但因为篇幅太大或者读者面较窄，发行情况不是很好，在书市上聊备一格，难以占居主流地位。

第三节　南北方图书发行的中心

一、洛阳图书发行业的繁荣

洛阳地处中原，开发极早，是中华民族最先的活动中心之一。东汉时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60年，在各个方面都无可争议地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也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然而从"董卓之乱"起，洛阳为战争所累，屡经劫难，盛衰无常，发展之路极为坎坷。

董卓之乱时"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1]。"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2]。自曹丕称帝到西晋统一，洛阳复为首都，久无战事，繁华再现。曹魏时"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

【1】《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

聚”[1]，西晋完成统一大业后，洛阳更是“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2]，“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然永嘉之乱，洛阳再遭摧残，“城阙萧条，野无烟火”[3]，衰败不堪达100多年。但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起，到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534年）移都至邺止，洛阳又一次崛起为北国名都，商业的繁盛甚至赶超魏晋之时，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居民多达10.9万户，共有22个里坊。此时的洛阳不仅有马市、金市、阳市，还新设了大市、小市和四通市。四通市位于城南宣阳门外，靠近洛水上的永桥，因而民间又叫永桥市。当时洛阳有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与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专门供给外国使臣、客商及四方归附之人居住，“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4]。四通市恰在此四馆四里之侧，因而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奇珍异宝，纷然杂陈。

洛阳的图书发行业萌芽很早，在东汉时就有书肆和佣书。据《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嘉《拾遗记》卷6还记载了王溥佣书的事迹。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图书发行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当洛阳暂无战事、百业昌盛的两个时期，图书贸易十分活跃。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是广采博收，官藏充实。西晋代魏，定都洛阳后，承继了曹魏的国家藏书。继而又通过灭蜀，得到了蜀国所藏典籍。公元280年，晋军灭吴。晋将王濬自蜀率水军沿长江东下，势如破竹，很快攻入建康，吴帝孙皓投降。王濬是一位儒将，博涉坟典，入城后首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军无私焉。帝遣使犒濬军”[5]。当西晋六路大军在建康会师后，晋军统帅琅邪王司马伷“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把吴宫藏书全部运往洛阳，受到武帝的嘉奖。在武帝的倡导下，各地政府也纷纷向中央呈现典籍，并沿习成风。凉州刺史张寔就曾“遣都护王该送诸郡贡

【1】《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

【2】《晋书》卷26《食货志》。

【3】《晋书》卷55《潘岳传》。

【4】《洛阳伽蓝记》卷3《龙华寺》。

【5】《晋书》卷42《王濬传》。

【1】《晋书》卷86《张寔传》。

【2】《晋书》卷3《武帝纪》。

【3】《魏书》卷7《高祖孝文帝纪》。

【4】《魏书》卷8《世宗纪》。

【5】[梁]钟嵘:《诗品》,哈尔滨出版社,2004。

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1]。晋惠帝曾接受裴頠建议,刻石写经,所写经书藏于三阁。另外,西晋初年,中国图书史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汲冢竹书的出土和整理,咸宁五年(279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2]。因为不準是个盗墓贼,盗墓的目的在财不在书,发现竹简后,点着火把焚烧了不少,但剩余的仍有数十车,都被政府抢救到洛阳,在那里进行整理和重抄。这样,西晋王朝通过承袭曹魏官藏,收蜀吴图籍,从地方搜集图书,以及组织抄书、盗墓者意外得书等方式奠定了皇家藏书的基础,藏书达到29 945卷,超过了三国的藏书量之和。以后定都洛阳的王朝也多数执行广集图书的政策,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3]。又派人编制《魏阙书目录》,向南齐借书抄录,充实秘阁藏书。北魏宣武帝于永平三年(510年),也曾“诏重求遗书于天下”[4]。由于历朝对图书事业的重视,洛阳的藏书在和平时期一般都能保持较大的规模,成为开发不尽的出版资源,为旧书的复制、流通和新书的创作、编撰创造了条件。

二是创作活跃,佳作不断。洛阳作为历史名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天下文士有极大的吸引力,时贤多荟萃于此,图书创作者的阵容十分强大,他们的名作自然也多由洛阳传抄而流布天下。例如史学领域,陈寿在这里写成《三国志》,司马彪在这里写成《续汉书》。尤其是在晋武帝太康中,洛阳的人才密集令人赞叹,当时“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5]。文章之中兴势必带来图书出版发行业的中兴。除了上述名流,“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也都聚居于洛阳,经常往来切磋,吟诗作赋。洛阳的文化底蕴深厚,豪门密集,王公贵族无不追慕风雅,文坛上一有佳作问世,马上便竞相传抄,一睹为快。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和北齐邢邵的美文都是先闹得洛阳纸贵,然后风靡全国。

三是数量繁多，搜访不尽。定都洛阳的各朝住洛京官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有的藏书家终生清贫，将绝大部分的薪俸都用来购买典籍，藏书往往在万卷以上，仍有搜求未尽之憾。这表明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洛阳的图书发行业相当发达，不仅有书可买，而且质量较高，品种很多，纵是朝中大僚，倾其终生资财，也难以将所有的图书一网打尽。如西晋官至司空的张华，所得几乎都用于搜购图书。他搬家的时候“载书三十乘”，藏书规模为全国私藏之冠。张华的藏书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很高，多为珍善之本，史称“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1]。甚至执掌国家藏书的秘书监挚虞在撰定官书时，也要到张华府中，“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2]。张华一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3]。北魏末期的秘书监常景也常在洛阳倾资购书，史载他“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4]。

【1】《册府元龟·总录部·聚书》。

【2】《晋书》卷36《张华传》。

【3】《晋书》卷36《张华传》。

【4】《魏书》卷82《常景传》。

四是形式多样，不乏珍本。西晋的秘书监荀勖对图书的保管和设计十分重视，曾提出过一个图书的设计要求，即“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意思是图书该用浅黄色的丝织品来书写，书成后放入淡青色的丝织品袋中。这个时期，纸已经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也是抄书的主要材料，荀勖提出的图书设计方案，抄写和装帧的材料不用纸而用丝织品，这不是针对一般图书而是针对秘书监收藏的图书而言的，按照这个要求生产的图书可以称为豪华书、精装书，通行的纸本书则可称为平装书。晋朝的葛洪是巾箱本的发明者之一，葛洪《西京杂记·跋》称:“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巾箱是当时人们放置头巾或其他零碎杂物的小箱子，能装在这种箱子中的书开本很小。巾箱本实际上是一种微型书，它突破了图书的常规大小，是袖珍书、口袋书的滥觞，后世刻印的小开本图书习惯上也称为巾箱本。由以上两个例子，可见当时洛阳既有豪华书，又有微型书，图书在形式上是丰富多样的。洛阳的书肆上还有许

多珍本，甚至包括南朝的图书。北魏的散骑常侍崔鸿为撰写《十六国春秋》，经常到书肆“搜集诸国旧史”作为参考资料，花了7年时间草成了95卷，但是“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未及缮成”[1]。也就是说因为缺少一本由南朝人撰述的重要参考书，而不得不停止写作。二十年后，崔鸿的儿子崔子元任秘书郎，终于在洛阳书肆“访购始得”李翊《蜀书》。有了这本书作参考，崔子元对父亲未完成的著作加以补充改写，最终以102卷的篇幅完成了《十六国春秋》一书。

【1】《魏书》卷67《崔鸿传》。

二、建康图书发行业的繁荣

秦汉时期我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基本上都分布在北方，进入魏晋以后，由于南方的开发速度加快，工商业崛起，动乱相对较少，社会大体安定，水陆交通便利，一些商业都会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后来居上，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北方著名的都会，如南朝的建康和成都，其在鼎盛之时都不逊色于北方的名都洛阳和长安。

魏晋南北朝时，建康（又名建业、建邺）是东吴、东晋以及宋、齐、梁、陈六朝的首都，也是南方新兴的最大的商业都会。建康原名秣陵，在两汉时仅为丹阳郡的一个小县。自孙权于建安十六年在这里建都，改名建邺后，民户渐实，商业繁盛，从此揭开了建康“六代豪华”的新篇章。建康不仅成为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发展成为商业贸易中心。东晋南朝时，建康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市场更为繁荣。据山谦之《丹阳记》载，东晋时“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永安为吴王孙休年号）；秣陵都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中人交易，因成市也”[2]。在秦淮河两岸也有不少市，其“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3]。可见建康内外已形成了众多的商业区，大市、小市星落棋布，列肆、店铺鳞次栉比。南朝梁时，建康经改建扩建，规模更加宏大，《金陵记》记载：“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

【2】《太平御览》卷827。

【3】《隋书》卷24《食货志》。

山，南北各四十里。”[1] 如以每户5口人计算，则有140万人，实为罕见的大都会。

【1】《资治通鉴》卷162《梁记》18胡注引。

建康商业的繁荣决定了这里的书肆比较集中，尤其是城南市场的朱雀桥（航）附近，史书多次提到。另外六个朝代的国家文化机关都设在这里，包括主管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秘书监、开展高等教育的国学馆等，这些机关都是用书和著书的大户，它们既是最大的图书消费者，又是活跃的图书创造者。这样，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相结合，使得建康的图书生产和流通形成了良性循环，成为名副其实的书业中心。其表现是：

（一）北书南移，群书汇集。西晋灭亡后，“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中原士人为躲避战乱大量南渡。失势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纷纷选择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建康为落脚地，家藏典籍也随之南移，建康的藏书一时大增。宋武帝刘裕为东晋大将军时，曾率兵平后秦，将后秦府库中所有的4 000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的藏书统统运回了建康。自刘宋建立后，南朝长期维持相对安定的局面，其和平环境、文化氛围对遗留在北朝的文士始终具有吸引力，“中朝遗书，稍流江左”。此外，北方政权也有向南朝献书的，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北凉王沮渠茂虔向宋奉献文物，内中包括一批图书，计19种，154卷。

【2】《晋书》卷65《王导传》。

（二）鸠集抄写，充实国藏。定都建康的各代统治者对图书的收集和复制基本上都比较重视。东晋开国之初，晋元帝在宰相王导的建议下，采取“鸠集遗书”的政策，多方搜求图籍。萧衍在称帝后不久，接受秘书丞王泰的建议，下诏向民间收集图书，要求“便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阕。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3]。梁元帝、陈文帝也曾下力征集过图书。鸠集之外，各朝还组织抄写活动，充实国藏。宋文帝时，官府曾召集人员抄写图籍，以补秘阁遗阙。梁武帝认为国家藏书必须多有复本，分存异处，以备不测，于是多次组织抄书活动，终于使四部图书均有复本。政府组织的收书、抄书，对社会上图书复制和发行业的崛起具有鼓励和推动作用，尤其对首都建康抄书、卖

【3】《梁书》卷1《武帝本纪》。

书风气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由于政府的大力征集和抄写，建康的图书数量增长很快。梁朝由于图书剧增，还施行分类典藏，以文德殿列藏众书，以华林园集中佛典，以秘阁庋藏经史杂书。对广置的复本，则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地方和部门。

（三）藏书家多，私藏殷实。据统计，南朝文献确切记载的藏书家有46人，超过北朝的34人和魏晋的22人，藏书万卷的藏书家多集中在建康，如梁朝的太子萧统、大臣沈约的藏书都在三万卷以上。私藏图书大部分得于市上，其数量的增加，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书肆上图书发行的规模之大。另一方面，私藏的图书若有书肆上所无的品种，还会成为大量复制的对象，孤本和新作一样是图书生产、发行的源头。

（四）书肆林立，品种丰富。齐武帝时，江夏王萧锋，自幼练习书法和绘画，热爱读书，兴趣广泛，于是便暗悖"诸王不得读异书"的上旨，"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1]。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南北战争气氛紧张的时候，建康的书肆仍然遍及市里街巷，且品种丰富，有图有籍。建康书肆上所售图书品种甚多，如东晋初，藏书家梅颐售给秘府《古文尚书》一部，唯缺《舜典》一篇。过了180年，南齐建武三年（496年），名儒姚方兴于建康朱雀桥"市得其书"[2]，后列为国学必修之书。失传近两个世纪的书竟能在建康的书市上再次找到，建康书市上图书品种丰富的程度可见一斑。又有《梁书》卷26《傅昭传》载，傅昭十一岁"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朱雀航就在建康，可见当时建康图书市场上还有卖日历等俗杂实用的生活用书的，当然更不用说史书、佛经、道经、类书、地理书、总集、别集等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品类繁多的图书了。

【1】《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下》。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

建康图书品种的丰富不仅反映在内容上，还反映在形式上，同晋朝的葛洪一样，齐高帝第11子萧钧也抄写、收藏了不少巾箱本。《南史》卷41《萧钧传》说他"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

览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梁元帝也有收藏巾箱本的习惯，他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述道：“又聚得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1] 由此可见巾箱本在皇室贵族中的流行。

【1】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1版，123页，宁波出版社，2001。

（五）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图书发行。拥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是开展教育和学术活动的必要条件，图书生产和流通的情况与教育和学术著述活动的活跃程度为互动关系，图书事业繁荣必然会对教育和学术活动起到促进作用，反过来教育和学术活动活跃也会为图书生产提供新的资源和素材。由于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方城市的图书生产和发行能力日趋强大，南朝的教育和学术创作活动大有起色。宋文帝元嘉年间，开始在建康兴办国学，分设玄、儒、文、史四个学馆，打破两汉魏晋以来中央高等官学仅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局限性，扩大了学科设置的范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开创了分科大学之先例。梁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又下诏开设五馆，学生人数多达500人。如果没有种类繁多、基础雄厚的官府藏书作为后盾，如果没有稳定强大的图书复制和发行队伍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教材和参考资料，政府是没有能力开设四馆、五馆这样大规模的国学的，即便勉强开设，也很难维持下去。不少学馆出身的学生后来都接下了文化传承的薪火，创作出了新的著作，如撰修《宋书》和南京最早地记《丹阳记》的山谦之就是史学馆培养的学生。

由于建康图书发行业繁荣，文献富足，经史臻备，硕师宿儒热衷讲学。讲学的内容之一是玄学，如南朝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学，生徒常数百人。丹阳尹何尚之奉明帝之命，“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2]。南朝盛行玄学，梁武帝、简文帝都曾亲自登坛讲学，述“《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学徒千余，实为盛美”[3]。陈朝的博士马枢讲授《老子》、《周易》，听众达2 000人。据《南史》和《北史》的记载，这些生徒在听讲时“皆当持本”，也就是说生徒在听讲时都

【2】《宋书》卷66《何尚之传》。

【3】《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要带上玄学的课本，因此《庄子》、《老子》、《周易》这“三玄”及其注释著作如《庄子内篇义》、《庄子外篇义》、《周易义》、《老子义》等成为常销图书，以学生人手一本估计，发行量可达数千册以上。讲学的内容之二是儒学，这个时期儒家经典仍是太学生的必读课程。梁武帝萧衍贵为人君，还亲撰《五经讲疏》、《孔子正言》等书作为讲义，置《孔子正言》助教2人，学生20人，后又加置博士1人，按照自己书中的意思研究、阐释、宣讲经文，美其名曰“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并亲自参与听讲。在梁武帝的垂范下，建康学风大盛，人才辈出，“江左风俗，于此为美”。与儒学教育的良好局面相适应，儒学经典的生产和发行自然需要保持相当的规模。

在建康优越的读书环境中，士人们通过讲学、听讲大量接触图书，见闻日广，自然会引发创作的冲动，以《文心雕龙》、《文选》、《华林遍略》为代表的诸多名篇巨著纷纷问世。这一方面是作者潜心钻研的结果，另一方面应归功于建康图书发行业的繁荣，可以说图书发行业对教育和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在建康得到了充分体现。

除了洛阳和建康，其他都会的图书贸易也比较活跃。在北朝，曾是北魏的大城市和东魏、北齐都城的邺城，其书肆也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销售的品种较多，不仅有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而且不乏通俗读物，如东魏的阳俊之写的内容庸俗的六言歌辞《阳五伴侣》就“在市不绝”[1]。北魏时期的长安和晋阳是一方的都会，图书贸易也较活跃。平城是北魏的旧都，随着鲜卑族的日益汉化，那里也出现了书肆。从平城至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境内）这一东西古道上也开始出现图书买卖活动。在南朝，荆州的图书事业繁荣，梁元帝在这里担任刺史时，广采博收，得书甚多。成都的书业也很有名。西晋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中描述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三积，纤丽繁星。”在“罗肆巨千”中就包括书肆，北朝人往往通过成都购买南朝的书籍。寿春和襄阳位于南朝北部边境，是南北互市

【1】《北史》卷47《阳俊之传》。

的枢纽。南朝撰注、复制的大批图书（包括佛经）经常通过这两个城市的书肆流通到北朝境内。北魏的辛术就在寿春买去大批图书。梁代邵陵王萧纶长期驻守寿春，聚书两万卷，有不少书籍也是在寿春购买的[1]。

【1】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1版，11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第四节　政府对图书发行的管理

一、政府对图书出版发行的税收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肆已经普遍地出现在市场上，图书已经成为常见的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政府市场管理机构的监管。那么当时的政府对图书发行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在税收上是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鼓励图书发行业的发展，还是与其他商品贸易一视同仁？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究的。在现有的文献中，很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对图书发行市场进行区别管理的记录，我们只能通过政府对一般商品贸易的税收政策来讨论图书发行业的税收情况。

当时经营图书的商户可能需要交纳以下税种。

（一）市税。又称市租或市调，也就是摊位、房屋等场地租金。市税大概自东晋开始收取，当时有个叫杜夷的庐江人学问很大，许多人请他做官，他都坚辞不就。扬州刺史刘陶尊重人才，指示庐江郡对杜夷多加关照，那么怎么个关照法呢？方式是“常认市租供给（杜）家人粮廪，勿令缺乏”，也就是从市场收取的租金中拨出款项供养杜家。宋文帝在元嘉十七年（440年）也曾下诏说：“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

（二）估税。即商品交易税。据《隋书》卷24《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段记载说明，东晋、南朝的商品交易税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文券（合约或订单）的，买

卖双方有交易合同或订单，按合同交易额收取估税（或曰输估）；另一种是无文券（事先无合约或订单）的，按照实际交易额收取估税（称为散估）。两者都是抽取交易额的4%作为交易税，其中3%由卖者出，1%由买者出。这个税率东晋及南朝各代均未变动，看来是固定的，但并不限于向固定市场上的商贩收取，在市场外只要发现商品交易行为，政府随时可以征收。从这条材料看，当时重要商品的买卖，包括人口、牲畜、地产的买卖是需要交纳交易税的。图书交易的规模如果比较大，交易税恐怕也是难免的。

（三）关、津、航（桁）、埭税，也就是商品流通中的货物过境税。其中的关税是陆路关口税，津税是水路关口税，航税是大江大河航渡税。埭是在河流水浅处修的水坝，过埭所收之税，被称为埭税。那么过境税的税率是多大呢？曹丕代汉称帝前曾下令说："关津所以通商旅，……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1] 这段记载表明，关津税在汉代就有了，而且税率不止"什一"，曹丕为了收买人心，才专门下令将其降为"什一"，也就是10%。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各个政权国土狭小，商业来往本来就过境频繁，各个地方为了多收过境税，又人为设置了重重关口，加重对行商的盘剥。如东晋的都城建康，东有方山津，西有石头津，各设负责全面事务的津主一人、负责治安和刑法的贼曹一人、主管检查和税收的直（值）水一人。况且自丹阳、吴郡往浙东，还有西陵埭、浦阳南、北津、柳浦等津口。一般来讲，通往江北他国的关口对货物管理较严，如石头津；通往本国的关口对货物检查较疏，如方山津。当时规定，凡是过津的货物如荻、炭、鱼薪等，皆征"什一"之税。实际上，津埭官员征税并不完全按官府规定行事，往往横征暴敛。南齐的顾宪之说：津埭的官员为了多征税收，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断绝别道，令来往商人只能由此处通行；二是空船照样收税；三是货物刚把船底填满，便加倍收税；四是过埭不需要人力畜力帮助，也照样收税。

以上税种和税率都是官方明示的，如果严格照此执行，当时

[1]《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魏书》。

行商越境贩卖1 000钱的一本书，至少需要交纳40钱的交易税，100钱的过境税，坐商在书肆售书，需要交纳数目不详的场租税。倘若是长途贩运，在分立的小国间频繁过境，不断地通关越津，税赋的压力就相当沉重了。显然，这个时期的税收政策对图书贸易而言谈不上有利，起不到什么促进作用。

二、政府对部分图书出版发行的禁止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图书作用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据《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载："魏国初建……（袁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这里，袁涣敏锐地指出了图书的政治功能，并赢得了曹操的认同，曹操在当政期间相当重视图书的收集和整理。

魏文帝曹丕博闻强识，才学出众，对图书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曹丕在其著作《典论》的"论文"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一方面肯定了图书的政治功能，认为图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政治功能不仅强烈地发挥在当代，而且将深远地影响后世。另一方面加入了生命的感慨，认为书比人长久，著书立言乃实现生命不朽的一种途径，肯定了图书的社会作用。

北魏时期，谋臣李先与道武帝有一段对话，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图书作用的认识："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1] 李先特别肯定了儒家经典的政治功能，认为其具有治化和补王者神智的作用。北魏宣武帝时期，秘书丞孙惠蔚在上疏要求朝廷开展图书搜求活动的时候，也对图书的功用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是以温柔疏远，诗书之教；恭俭易良，礼乐之道。"[2] 除了统

【1】《魏书》卷33《李先传》。

【2】《魏书》卷84《儒林·孙惠蔚传》。

治阶层，一些不得仕门的藏书家对图书的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阮孝绪在《七录序》中写道："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这里突出强调了图书在风俗伦理方面的教化作用。

正是由于对图书的作用有十分清醒、深刻的认识，魏晋南北朝各代统治者一方面鼓励图书的生产、发行，一方面又根据政治需要和价值判断适时地采取一些措施对图书发行加以管理和引导，以促进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图书的生产和传播，减少或遏制对统治者利益有损的图书的生产和传播。

第一次对某类图书的发行和传播加以禁止的是魏武帝曹操。东汉时期，在汉光武帝刘秀的提倡下，谶纬图书红极一时，畅行社会。这类书的主要内容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家经典，鼓吹天人感应思想，以所谓上天的预言来附会或攻击现实的人事政治。几乎每一种儒家经典都有数种纬书与之相对应，例如《易》有《乾凿度》、《坤灵图》，《书》有《刑得放》、《帝命验》，《诗》有《推度灾》、《含神雾》等，从谶纬图书怪异的书名便可推知其内容的虚幻和迷信。汉魏之际，黄巾四起，天下大乱，地方武装争战不息，各路军阀纷纷利用谶纬之书为争夺天下大造舆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他权力稳固后，不希望诸侯利用谶纬图书作乱，于是便下令禁止谶纬图书（所谓"内学"）的流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禁谶[1]。

西晋朝廷对谶纬图书也严加查禁。有一部书叫作《春秋元命苞》，是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纬书，其内容迷信色彩浓厚，对朝廷统治不利。晋武帝下诏禁止传抄售卖。此书在后赵、前秦、北魏和南朝均被朝廷查禁。天文学专著《甘石星经》因涉及星相问题，有损天子至高无上的威严，在晋代也被查禁[2]。

后赵对传播谶纬图书的处罚十分严厉，石虎下令"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3]。前秦的第二代皇帝苻坚采纳王猛的建议，下诏禁止谶纬图书，太史令王雕因宣扬图谶而被杀。对如

【1】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1版,8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1版,9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实记录皇家家丑的书，苻坚也断然采取焚毁措施。著作郎赵泉、车敬把苻坚母亲年轻守寡期间一度与将军李威同居的事如实记入史册，苻坚阅后，“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其加罪”[1]。只不过苻坚读到此书时，写书的两个著作郎已经过世，苻坚方才作罢。

[1]《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是一位器量狭小的皇帝，他在神䴥二年(429年）曾命崔浩等人共同撰写北魏国史《国记》，共编成30卷。后来，经崔浩同意，这部国史被刻在石碑上，立于城郊要道。谁知20年过去了，忽然有人告发，说崔浩把拓跋部的丑事在国史上直书不讳。太武帝大怒，将崔浩打入大狱，极尽侮辱后灭族，崔浩的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受到株连，也都惨遭灭族。与编纂《国记》有关的“秘书郎吏已下尽死”[2]。北魏太武帝还发起了取缔和销毁宗教典籍的行动。北魏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太武帝为了继统中华，表明自己亲汉不亲胡，采取崇奉道教、排斥佛教的政策，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在长安下诏灭佛，“诸有佛经图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是魏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佛经的传播遭受重大打击。

[2]《魏书》卷35《崔浩传》。

北魏孝文帝对谶纬之书也采取严厉的查禁措施。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3] 这条禁令同后赵石虎的禁令一样是十分严厉的，凡收藏有谶纬、巫卜之书者一旦发现都要处以死刑，更不用说复制和贩卖此类图书了。

[3]《魏书》卷7《高祖纪上》。

北周武帝继北魏太武帝之后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不过这次不但针对佛教，而且还针对道教。北周政权建立后，周武帝为了提高皇权，尊崇儒家，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禁绝佛、道二教，毁佛像，烧佛经，剥夺寺产，勒令沙门道士还俗，以“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4]。不但佛教经典再

[4]《广弘明集》卷8。

一次惨遭厄运，道教经籍也一道被毁。建德六年（577年），周灭齐后，这一禁令还扩及关东。但不久，周武帝死，佛教、道教又兴。

南朝的梁武帝是一位颇有才学、热爱读书的皇帝，可能是对图书的作用认识深刻的缘故，他一方面热衷于编辑出版事业，自撰和组织他人编撰了很多图书，为梁王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对违碍自己意志的图书的出版发行也果断采取了限制和禁止的政策。天监六年（507年），范缜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杰作《神灭论》，给武帝极力尊崇的佛教神不灭思想以沉重打击。为此，武帝以华林园藏书为基础，令臣僚六十余人著文反驳，以维护皇室尊严。梁人吴均曾作《齐春秋》一书，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梁武帝恶其实录，不仅拒绝吴均借阅秘阁《齐起居注》、《群臣行状》的请求，还令人持官藏之书当廷诘问，谓其出不实，下诏将其书付秘书省焚毁。后虽曾复诏吴均撰《通史》，但最终因前事而难以信任，遂另行改定，自撰聘赞序，作为己著。

南朝末代王朝是陈朝，陈朝的亡国皇帝陈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但他的秘书监傅縡却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文臣，经他奏请，后主亦曾下诏禁"淫祀妖书"。

通过以上事例，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查禁图书的类型和范围主要是谶纬图书、国史、宗教典籍，查禁的目的主要是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皇家尊严、促进少数民族的汉化等。这些查禁活动有的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如对谶纬图书的查禁；有的则是矫枉过正之举，出发点是为了民族融合，却对文化交流和发展造成了重大破坏，如对佛教、道教典籍的查禁；有的则暴露了封建帝王的无知和狭隘，如前秦苻坚和北魏拓跋焘表面上假装雅好文史，在目光远大的文臣的建议下采取一些积极的文教政策，并聘选文士修编国史，实际上对编撰国史的规则并不了解，对编撰国史的意义也不甚了了。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国史应该秉笔直书当朝国事，为后人留下一代信史，为防止因帝王干涉而

使史官曲笔阿世，当朝皇帝是不能翻看国史的，更不能肆意篡改国史的内容，自然也不能因国史的内容而加害史官。苻坚和拓跋焘在撰修国史之初给人以开明宽容的面目，国史修成后似乎也遵守了回避不读的制度，实际上在内心里对国史的内容是十分在意的，国史定稿多少年后，居然听信小人的检举、挑拨，专注于国史的讳碍之处，一怒之下，本性暴露，对修史者大肆杀戮，把多少人心血的结晶付之一炬，这种前后不一、喜怒无常的表现，充分反映了独裁者的无知和残暴。

相比起来，博学多通的梁武帝对图书的管理政策则宽松得多、温和得多，少了很多刀光火影，对自己反对的《神灭论》，他采取的是用学术辩论的形式加以反驳，对自己厌恶的实录起居注，他虽然下令焚毁，但并不加害作者，仍旧留用。由于梁武帝的图书管理政策比较开明，他把南朝文化带入了最发达的时期，史学家评论梁武帝的统治时说："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1] 同为北魏皇帝，雄才大略的孝文帝对待国史的态度就与太武帝截然不同。孝文帝对太武帝毁国史的做法深不以为然，"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2]。他将撰修国史看作一种对朝廷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认为国君犯了错误，国史又不记载，只会助长国君的骄横，使之无所畏惧，增加进一步犯错误的机会。他特召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要求他们以"无讳国恶"的原则重撰国史。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对图书出版发行的管理是围绕着政治需要来变换重点的，其对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固然有一定破坏作用，但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侯景之乱"等战乱相比起来，可谓小巫见大巫，其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1】《南史》卷7《梁武帝纪下》。

【2】《魏书》卷7《高祖纪下》。

第九章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出版

汉代在西域有三十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十六国已合并为六个大国，它们是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和高昌。西域居民族别很多，有汉、月氏、柔然、铁勒、吐谷浑、羌、塞人和吐火罗人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和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文献，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这些文献记载的是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几种方言，这是古代塞人和吐火罗人的语言。

塞人在西方史书中称为“塞克”（Saka），在《汉书·西域传》中有多处记载，称为“塞种”[1]。佛经中有“释迦”、“赊迦”等多种译名。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属印欧人种，其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自先秦或汉初，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地区，后大部分南下，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和克什米尔等地区建立国家，约3世纪逐渐进入中国和田等处。塞人信仰佛教，有自己的文字。

【1】《汉书》卷96《西域传》。

吐火罗人是古老的原始印欧人，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上，包括龟兹、焉耆、鄯善、吐鲁番等地。吐火罗语属原始印欧语系Centum语支的西北语组，使用古印度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文字。

塞人和吐火罗人在历史上创造了很高的文明，留下了很多文献，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先河。

第一节　佉卢字书籍的出版

一、鄯善国和佉卢字

鄯善王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位于丝绸之路南道，扼丝绸之路要冲，原名楼兰国，旧都是楼兰城，后更名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鄯善王国在西汉时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有人口14 000余人，东汉时期，又兼并了一些小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王国，与汉朝有着友好密切的关系。鄯善王国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也有较发达的制造业。若羌地区还出产铁，有较发达的冶炼和制造业，当地制造的兵器很有名。在这里生活的民族有吐火罗人、羌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占统治地位，公元3世纪时，他们接受了佛教。随着佛教的传播，一种名叫佉卢字的书写符号也广泛被鄯善国人使用。

佉卢字是一种字母，因为没有相应的佉卢语存在，所以不用“佉卢文”来称谓。佉卢文字是由阿拉美文字演变而来，公元前5世纪随着古波斯帝国大军传入印度河流域，流行于喀布尔与白沙瓦地区，用来拼写当地居民使用的印度语支中的西北俗语，即犍陀罗语。现在发现的最早文献是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的刻石[1]。

“佉卢”是“佉卢虱吒”的简称，是梵文Kharoṣṭha的音译，这一译名及简称出自古代佛经译本，相沿成习，遂成定名。在中国古籍中，还有“佉楼”、“佉留”、“佉路瑟吒”、“佉卢虱底”等译称。梵文Kharoṣṭha意思是“驴唇”，因此在中国古籍中也有将佉卢字意译为“驴唇书”的。如隋代阇那崛多译本《佛本行集经》中提到“佉卢虱吒书”，其下注“隋言驴唇”[2]。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提到：“西域书有驴唇书。”[3]

佉卢文字传入我国的时间不可考，但至少在2世纪中已传入

【1】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第11。

【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1《广知》。

于阗地区，3世纪中传入鄯善（尼雅）地区[1]。传入中国于阗和鄯善地区的佉卢文字字母发展到44个至57个。著名的和田马钱，就是2世纪在于阗铸造的。这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正中为一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一圈佉卢文字，为犍陀罗语"Maharajasa, rajati rajasa, MahatasaGugramayasa"，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的、矩伽罗摩耶婆（之钱币）"[2]。钱币上王的名字因铸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

【1】黄振华:《佉卢字》,《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夏鼐:《和阗马钱考》,转引自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二、佉卢字母文献

佉卢字的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其次是国王诰敕、账册、契约和文书，拼写的语言是犍陀罗语，或称尼雅方言或鄯善俗语。现已发现的佉卢字文献表明这种文字还用来拼写梵语和吐火罗语[3]。

【3】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15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新疆出土的佉卢字文献分属于阗王国和鄯善王国。佉卢字最初先传到于阗，但于阗居民使用的是和田—塞语，属东伊朗语族，不属于印度语族，因此佉卢字在于阗民间并不通用，而只用于王国上层和宗教人士中间，这是受贵霜王朝影响所致。于阗王国使用的佉卢字到5世纪已经衰落。

佉卢字在鄯善王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鄯善王国居民使用的语言是属于印度语族西北俗语的一支变种，被称为鄯善俗语，但其中渗入了大量非印度语词，主要是伊朗语词，还有本地楼兰语词。鄯善王国的佉卢字在书写形式上和语法上也有自身的特点。现在发现的佉卢字文献大多属于鄯善王国，时间约在3世纪上半叶至4世纪上半叶[4]。（图85）

【4】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892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在和田购到了一种写在桦树皮上的写本残卷，经研究认出这是写于公元2世纪的佉卢字佛教经典《法句经》。《法句经》共二卷三十九品，是从早期佛经十二部经和四阿含经中的偈颂采集分类编成的，在古印度是佛教徒的初学入门读物。大月氏高僧支谦评论《法句经》时曾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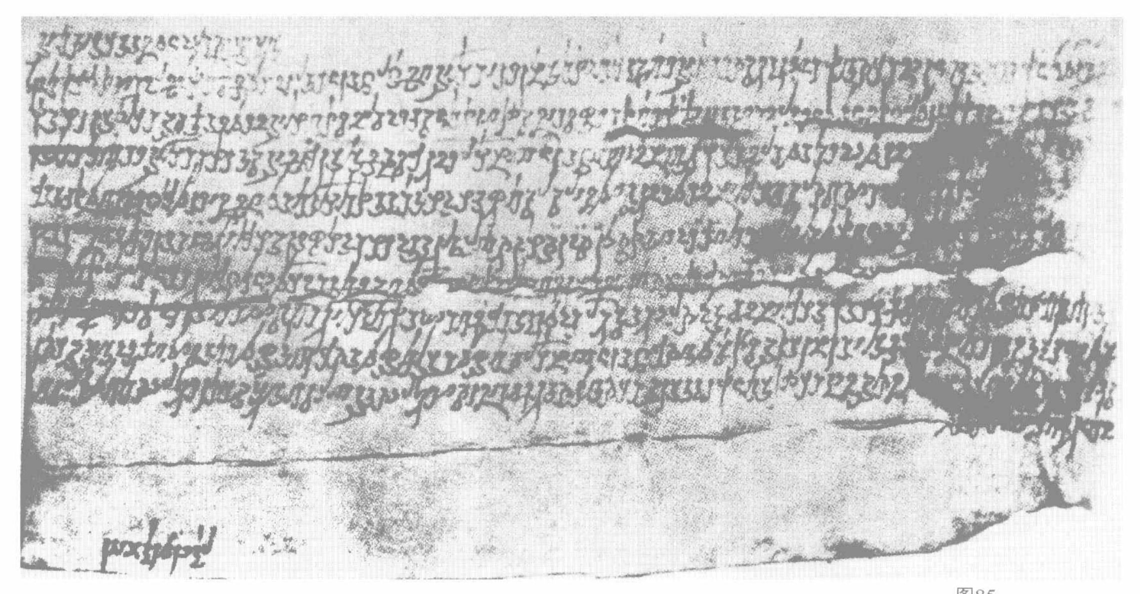


图85
佉卢字鄯善国文书

藏也，可以启蒙、辨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包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1]《法句经》在三国时期（3世纪上半叶）被译成汉文。佉卢字《法句经》译自巴利文，是公元2世纪桦树皮写本。经一千多年的岁月沧桑，桦树皮已有多处破损或折断，有的已断为两截，以致影响文字的对接拼读。

[1] 法救传、维只难等译:《法句经》,支谦序。

在这部写本中有一段题记，内容为“这部《法句经》写卷由法藏在阿兰若森林写成，属于沙门佛喜的同住佛铠”。这位法藏是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小乘教法藏部的创始人[2]。

[2]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3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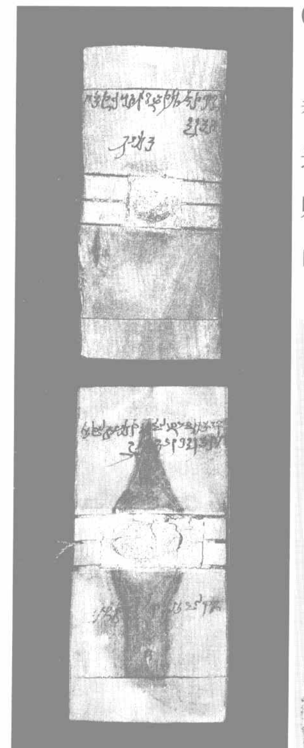
佉卢字《法句经》在1897年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大会上首次披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佉卢字仅出现在古印度的碑铭上，它的写本还是首次面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宣布这一写本的主要部分在圣彼得堡。原来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早就在新疆地区大量收集古代文物，和田马钱就搜集到21枚，在和田附近买到了佉卢字《法句经》的大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奥登堡只发表了这部抄本的一张残叶，主要部分至今尚未刊布。

就这样，公元2世纪写在桦树皮上的佉卢字《法句经》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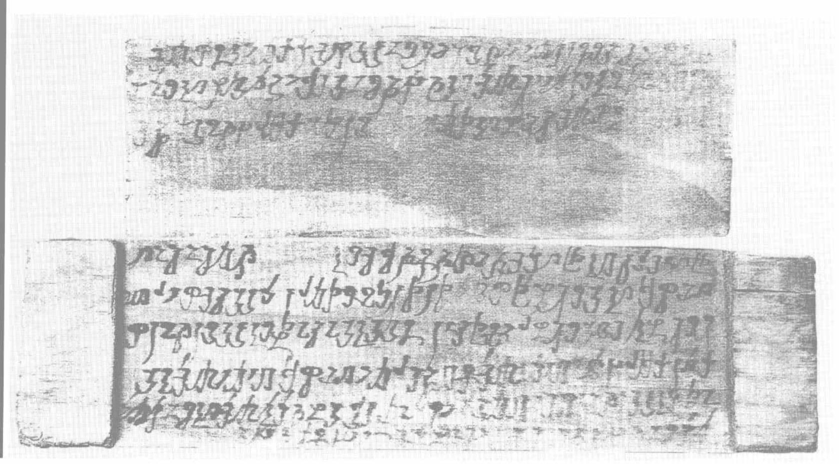
佉卢字文献大都属于公元3—4世纪，出土地点大多在尼雅、安得悦、楼兰，这些都是鄯善王国的故地。其中尤以尼雅出土最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收集的758件佉卢文书中有703件出自尼雅，占近93%。此外还有敦煌、玉门关遗址等地。20世纪30年代在洛阳发现了有佉卢字题记的井栏，已折为三截，出土地点不详，据考证为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之物，后入藏北京大学。

佉卢字文献的材质较多，有桦树皮、皮革、绢和纸等，个别也有写在壁画上的题记。最常见的是木牍，大量公文信函都用墨笔写在木片上，这种木片大约9厘米长，6厘米宽，厚0.7厘米左右，在上角处钻有小孔，以便用绳穿拴。写有信函内容的木片正反面较为平整光滑，以便写字，称之为底牍，作为信封的木片称为封牍，比底牍稍短，宽度完全相同。封牍的下面凿有封泥槽和线沟。信写好后将封牍夹住底牍，用绳索捆好，将绳索打结后置封泥槽中，充填封泥，在封牍下面再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图86)

图86
佉卢字木牍



佉卢字木牍中有一种形状奇特的楔形木牍。这种形式的木牍都是鄯善国王的诏令，发送对象主要是地方行政长官州长，其余还有督军、税监、监察、祭司等重要官员。诏令内容广泛，涉及财政、税收、军事、司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楔形木牍只能由国王使用，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因其造型与其他木牍不同，容



易区分，保证了投递的迅速与安全。（图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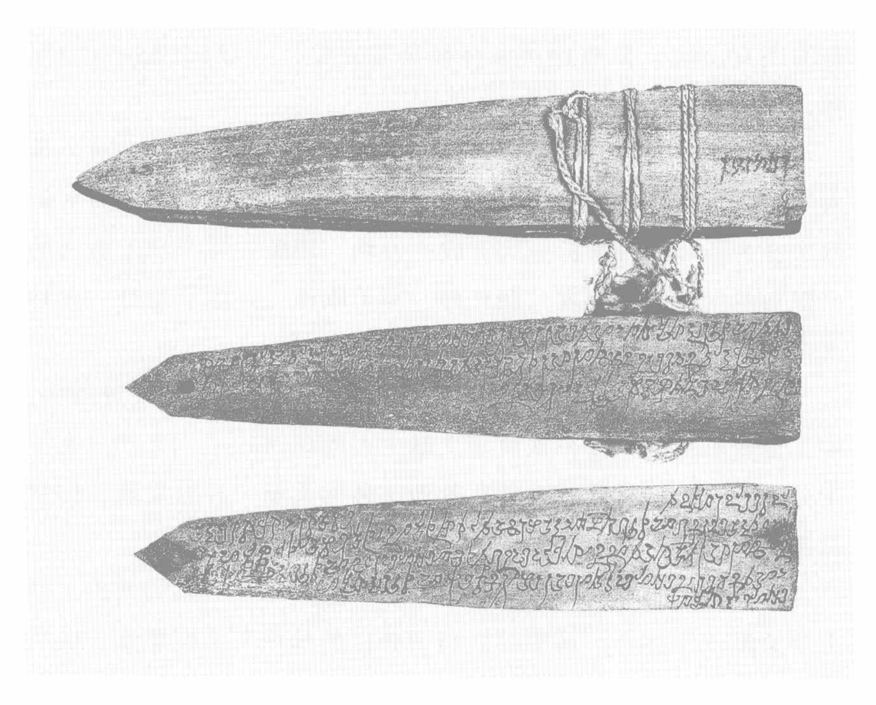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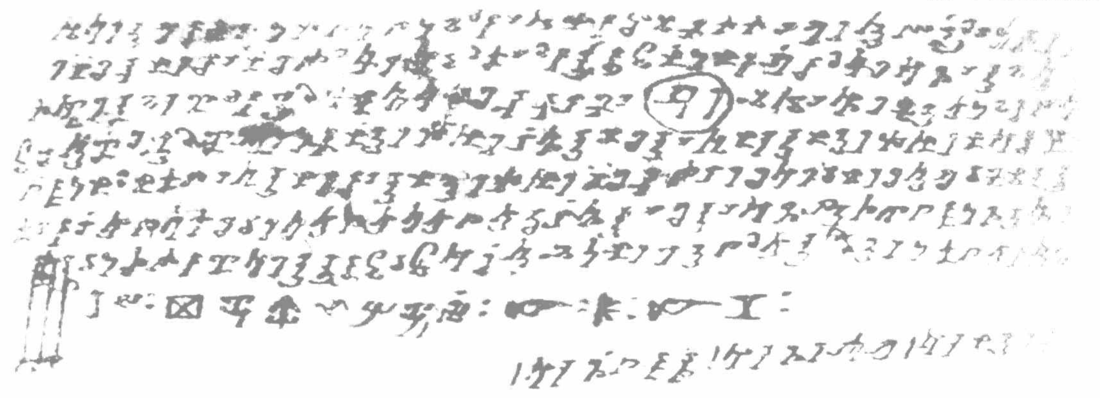


图87
佉卢字木简《国王敕谕》

用佉卢字记载居民财产、诉讼、纳税账目、水利灌溉、户口登记等情况的木牍因不需传递，所以没有封牍，写字的木牍形状、尺寸也无统一规定，大小视记录内容多少而定。在木牍的一端往往有钻孔，以便使用绳编栓。（图88）

用羊皮制作的佉卢字文书也是十分独特的。1902年斯坦因在

图88
佉卢字买卖骆驼契券



新疆尼雅发现了大小不等的32块羊皮，大部分写有佉卢字，有一小部分尚是空白未用的。这批佉卢字羊皮文书大多数已经残破，有的还有虫蛀。只有14块保存得稍微完整，一般长19.5—32.3厘米，宽6—17.5厘米。

这些羊皮上书写的都是鄯善国王诏令，用黑色墨汁书写，最大的一块写有11行佉卢字。羊皮书只是单面书写，写成之后对折两次变为四层，再横折一次变成一方块，用事先在羊皮上剪出的一根与羊皮相连的细皮条捆扎好，写上收件人姓名、地址，再钤上官印。

羊皮文书较之木牍容纳的文字更多，但比木牍要昂贵得多，加工也较麻烦，所以在佉卢字文献中占的比例较小，大约只有三十分之一。这种材质的文献在其他文种的文献中亦有发现，但数量不多[1]。

【1】景爱：《尼雅之谜》，117—143页，北京，中国书店，1999。

从19世纪末发现佉卢字文献到20世纪80年代，大约共出土佉卢字文献一千多件，其中英斯坦因获得的佉卢字文献最多，前后三次共收集、发掘佉卢字文献共有758件，在全世界现有的佉卢字文献中占了大部分，这些文献涉及古代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斯文·赫定、亨廷顿、大谷光瑞等外国探险家也在新疆收集了许多佉卢字文献，分别收藏在英、俄、印、日、美、瑞典等国。新中国成立后，佉卢字文献还时有发现，国内收藏较多的是新疆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据说有200种以上。

林梅村教授对1875—1992年中国境内发现的佉卢字文献及研究情况作了介绍，这是迄今见到的最为详尽的的一份目录，主要内容如下：

1.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佉卢字文献，用龟兹变体佉卢文和婆罗米文书写，出自库车，未解读。

2. 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佉卢字《法句经》等文献，出自和田。1962年英国学者布腊夫将其照片及法国藏的同一写本的另一部分作了全面校订。

3. 法兰西学院藏佉卢字《法句经》残页三张，杜特雷依获自和田。

4. 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斯文·赫定收集品，主要出自楼兰。其中一件佉卢字帛书为2世纪遗物，是最早的佉卢字资料之一。

5. 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主要出自尼雅、安迪尔、楼兰、米兰、和田和敦煌等地。共758件，另有18件文书为1930年第四次考察所得。这些文书已经由欧洲学者校订。

6. 美国收藏亨廷顿收集的6件佉卢字木牍，出自尼雅，已刊布。

7.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收集品，包括许多龟兹变体佉卢文和婆罗米文混写的文书残片，7世纪遗物，出自龟兹，未解读。

8. 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藏勒柯克收集品，包括大量佉卢字木牍、文书和石窟题记，出自龟兹。另有一件类似佉卢字的残品，出自吐鲁番吐峪沟。

9.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收集品，有十多件木牍，出自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

10. 北京大学藏佉卢字井栏，出自洛阳，已断为三截。

11. 大连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收集品。

12. 释迦牟尼青铜坐像底部佉卢字铭文，1979年陕西长安县黄梁乡石佛寺村出土。

13. 新疆博物馆藏佉卢字木牍，66件，1959年出自尼雅。另一件在巴楚托克孜沙来古城采集。

14. 新疆和田文管所藏佉卢文木牍，几十件，1981年出自尼雅[1]。

佉卢字文献对研究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填补汉文历史记载中的空白，但这种文字本身有许多不解之谜尚待解决。

【1】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第二节　焉耆—龟兹文书籍的出版

一、龟兹、焉耆国和龟兹—焉耆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龟兹（今库车）、焉耆一带是两个城邦国家，在汉代便已闻名于丝绸之路上，与汉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娶乌孙解忧公主之女为妻，元康元年（前65年）夫妇二人"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且留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分裂局面，与西域的关系相对松散，但魏晋两朝仍继承东汉制度，设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龟兹、焉耆等国岁岁朝贡，派遣王子入侍，并接受魏晋王朝的册封。龟兹、焉耆地处绿洲，土地肥沃，农牧业和手工业、商业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两地居民笃信佛教，尤其是龟兹，是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国内伽蓝林立，香火鼎盛。焉耆佛教也十分兴盛，至今仍有规模巨大的佛寺遗址明屋可供凭吊。当地还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彩绘壁画，这些佛教艺术成为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璀璨的明珠。龟兹的音乐、舞蹈更是声名远播，传至中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都十分丰富发达的环境下，图书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89、图90）

公元3—9世纪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一种用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作字母的文字，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得出的结论，这种文字拼写的语言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原始印欧语的一支。即操这种语言的居民是最古老的原始印欧人[2]。

从新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古人骨骸研究，这些骨骼带有明显欧罗巴人种特征，其外在的形象则在库车的克孜尔洞窟壁画上有十分具体的反映。在龟兹王国开凿的佛教洞窟中，描绘的吐火罗

【1】《汉书》卷96《西域传下》。

【2】王欣：《吐火罗史研究》，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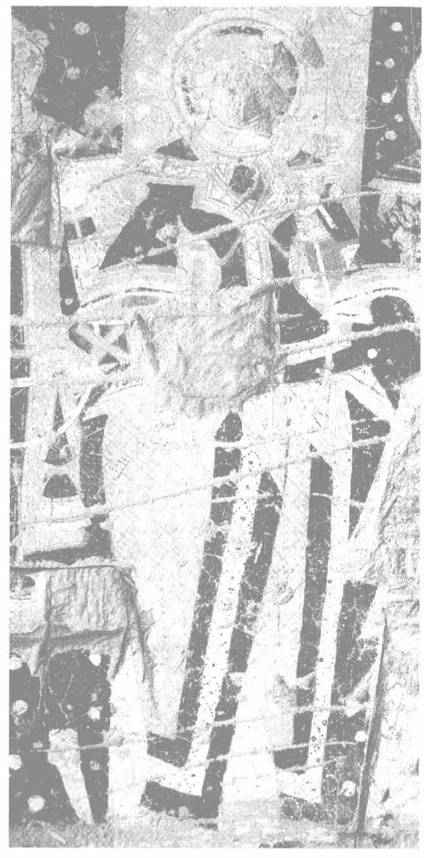


图89（左）
龟兹王供养像

图90（右）
龟兹王后供养像

供养人，一部分是身材高大的白种人，另一部分是蓝眼睛红头发。德国探险家勒柯克（A.Von Lecoq）在看到库车佛教洞窟中的供养人壁画时，不禁说，“极其生动地令人想起了欧洲骑士时代的绘画”[1]。从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了从公元前至9世纪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属于欧罗巴人种，但对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应如何定名却是众说纷纭。后来发现了回鹘文书写的《弥勒会见记》，在这部抄本的后面有一处题跋："乌古从苦先语译成Toγri语，从Toγri语再译成突厥语。"经过考证，认为这里的"Toγri"就是历史上屡见记载的吐火罗[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支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的铭文是用希腊字母拼写的一种伊兰语，这种语言被认为是真正的吐火罗语。但是国际语言学界关于对所谓吐火罗语

【1】〔德〕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2】李铁：《焉耆—龟兹文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的名称的争论至今仍未有定论[1]。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者根据季羡林先生的意见，将这种文字定为焉耆—龟兹文，由于地域的不同，吐鲁番一带的方言被称为甲方言，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的方言被称为乙方言。这种文字拼写的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中的两种方言。“焉耆—龟兹语”这种提法也并非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有些学者认为语言名称应该依据讲这种语言的民族来命名，而车师和楼兰地区的居民所讲的语言是这印欧语中的另一种方言，只讲“焉耆—龟兹语”并不能包括这一地区的方言，因此至今仍以“吐火罗语”来称呼[2]。焉耆—龟兹文有元音字母12个，辅音字母47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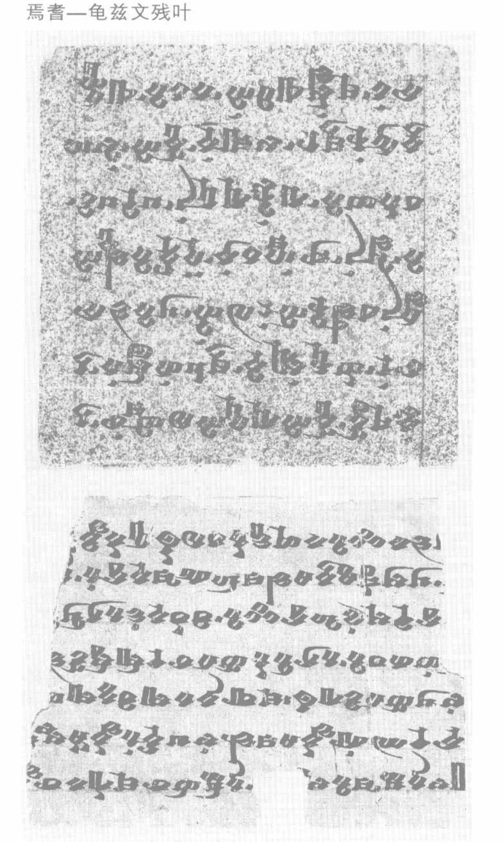
【1】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7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匈〕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18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3】刘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116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二、焉耆—龟兹文文献

图91
焉耆—龟兹文残叶



当时的图书是用这两种方言书写在纸张或木牍上的。作为文献的载体，纸张的发明和应用无疑对文化的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据统计，近年来在新疆境内发现的古纸共26种，其中晋代6种，南北朝1种，隋代2种，唐代17种，这些古纸大多发现于吐鲁番一带。古龟兹境内共发现4片古纸，属于唐代遗物，为米色或黄色，均为帘纹纸[3]。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两页焉耆—龟兹文残页，正反两面均有文字，内容和所属时代均不详。纸色发青，纸质较厚。新疆发现的古纸是内地传入的还是当地制作的，因没有确切的依据，现在很难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焉耆—龟兹文已有较多的纸质文献，这比佉卢字来说是一大进步。后者的载体还是传统的木牍。（图91）

现已发现并刊布的焉耆—龟兹文文献种类较多，数量丰富，包括佛经、文学作品、公文档案、经济账目、辞书、医书和洞窟中的题记、

铭刻等。(图92) 文学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剧本《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内容是弥勒菩萨上兜率天，以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该剧长达27幕，每幕都标出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这一剧本共有两个写本，一是20世纪初新疆出土，藏德国柏林；一是1974年在新疆发现，现藏中国新疆博物馆[1]。焉耆—龟兹文图书还有剧本《佛弟子难陀生平》、故事《六牙象本生故事》、《木匠与画师故事》、《国王的故事》等，诗歌《箴言诗集》、《摩尼赞美诗》等。佛教经典是焉耆—龟兹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部分，较为重要的有《法句经》、《杂阿含经》、《十二因缘经》、《十诵律比丘戒本》、《托胎经》、《辨业经》等。语言类书籍有梵语—龟兹语、龟兹语—回鹘语等对照字书。(图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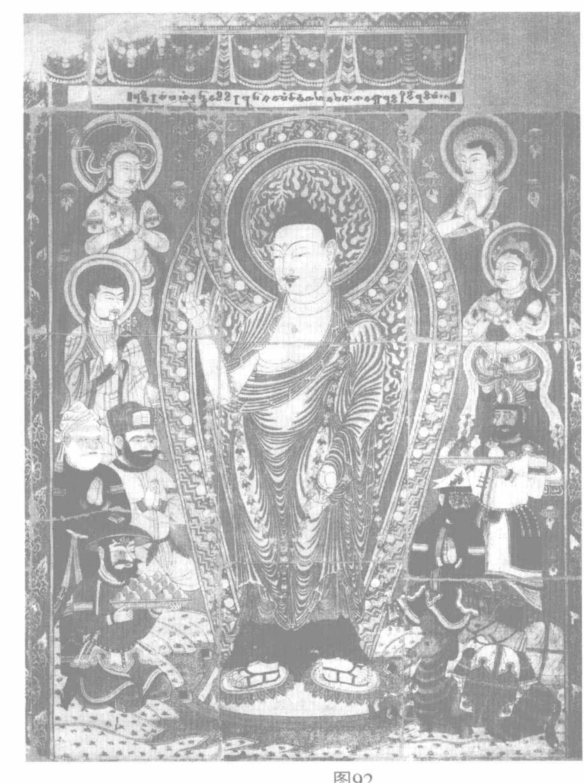


图92
焉耆—龟兹文本行经变题记

【1】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文》,《语言与翻译》,1992(3)。

焉耆—龟兹文文献大多收藏在国外，以德、俄、法、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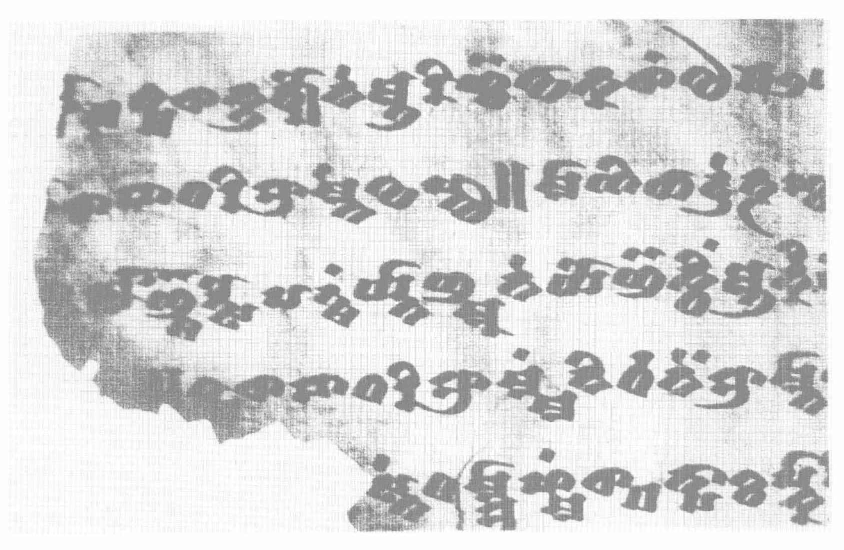


图93
焉耆—龟兹文《弥勒会见记》

英、日等国为较多，国内也有部分收藏。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未整理和刊布。德国收藏的文献在1921年由西格和西格林合作发表了《吐火罗语残卷A》两卷，第一卷是甲方言转写和德文释义，第二卷是图版[1]。1949年和1953年托马斯根据两人的遗稿，出版了《吐火罗残卷B》两卷，属于乙方言文献[2]。

法国巴黎收藏的乙种方言文献，于20世纪30年代以《龟兹文献残卷》之名刊布。1958年又出版了一本《龟兹语医学和咒语文献残卷》。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卷，分主册和别册两种。主册介绍了吐火罗语文献的刊布、分类情况，别册刊布了《七法中皮革法》第五、《入阿毗达磨论》、《寺院出纳记录》片断等文献，由井之口泰淳释译[3]。

【1】〔德〕西格和西格林：《吐火罗语A残卷》(2卷)，哥廷根，1921。

【2】〔德〕托玛斯：《吐火罗B残卷》，1949—1953。

【3】李铁：《焉耆—龟兹文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情况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内地是个乱世，三国鼎立，南北分治，战火纷飞，政权更迭。在西域，随着汉代的衰亡，西域都护府已不复存在，原来的西域三十六国也加速了兼并，成为疏勒、龟兹、焉耆、于阗、鄯善、高昌六个政治实体。与此同时，民族的迁徙，人种的更替，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更加多样、丰富的内涵。在六个政治实体中，除高昌以汉族为主体外，其余都是以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和吐火罗人为主。他们信仰佛教，使用的文字是古印度的婆罗米文，文献的内容大多与佛教有关。现存的2世纪的佉卢字《法句经》写本，不但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的最早文献，而且这样早的文献在同时代的汉文古籍中也是难得一见的。在佉卢字流行的时代，纸张在当地还很稀见，现在看到的佉卢字文献，大多写在木牍上，也有少量写在羊皮、桦树皮和纸上。无论是使用的文字和材质，都带有浓重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这是属于与中原传统文化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文明。

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也有相合相融的例子。1980年在楼兰古城的晋墓中出土一件丝织品，锦上织有“延年益寿大宜

子孙”汉文图案，在锦边上用墨水写有一行佉卢字，有十几个字母。

在楼兰古城官署遗址边出土过一批木简，上有西晋泰始四年(268年）纪年，在这批汉文木简中有一枚写有一行佉卢字，形制与同时出土的汉文木简一样，可能属同一册簿。至于著名的于阗马钱更是将汉字、佉卢字融于一体，正面周围为汉文篆字，标志币值，中间有一象形图案，反面正中为一马或一驼，周围一圈是佉卢字书写国王的尊号和名字。这些古代文献生动地表明汉族和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互动关系。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意义和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出版事业在此期生产技术、经济水平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于图书编纂、复制技术、载体材料、书籍形制、图书的发行和流通，以及对出版工作各个环节的组织和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比秦汉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版事业的繁荣是社会综合发展的产物，而反过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事业的发展也对当时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不断改进完善的出版技术也对后世的出版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节　图书出版事业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事业对社会发展进步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各家学术异彩纷呈。人们已冲破西汉时“独尊儒术”的藩篱，而更为深入地探究“天人之际”的深刻关系。王弼《周易注》、《老子注》、何晏《无为论》等著作的出版流传，开启和传播了玄学

新思想；而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郭璞《尔雅注》、韩康伯《周易传注》、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则推动了传统经学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史学出版的数量最多。按《隋书·经籍志》史部的记载，共著录有史书824部，16 558卷[1]，这八百多部史书中除少量是西汉、隋朝人所著外，绝大多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出版的史书。按《隋书·经籍志》说法，当时，一个朝代的历史，常常有几十部史著来记述，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仅据文献记载所知，在刘宋范晔撰《后汉书》之前，此期就有谢承、司马彪、华峤等10家《后汉书》出版问世；记三国史的除陈寿《三国志》外，还有郭颁、孔衍、王隐等六七种记三国各国历史的著作；唐朝写《晋书》参考了18家晋史，其中10家是晋朝人所著。史书的大量出版广泛传播了历史知识，提高了史学的地位，自晋朝起，史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多样化的学科，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见《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实际著录为803部，附记亡书64部，共867部。

贾思勰《齐民要术》、郦道元《水经注》、王叔和《脉经》、葛洪《肘后卒急方》、刘徽《海岛算经》、《九章算术注》，以及祖冲之、马钧等人科技著作的出版，推动了古代科技的进步，更由于他们的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遥遥领先的地位而闪烁着光芒。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及田园诗、山水诗和宫体诗等大批文学作品的出版，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形成了我国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理论系统。以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为代表的许多著名书画作品的出版问世，则为我国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大批艺术瑰宝。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佛经翻译出版，有大量的道教经典编纂出版，两大宗教典籍大都记载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些经书的流传，使两大宗教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原始的道教经过不断改造，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和教义、教规，形成不少新的流派。佛经的翻译和注释，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接受了中国文化

的洗礼，从而逐渐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二、形成爱书勤学的良好风尚

大量图书的出版促进社会形成爱书勤学的良好风尚。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普遍运用，使人们更为方便地通过传抄的方法，制作复本书，从而大大提高了图书出版的数量，促进了书籍的流通和收藏。社会的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藏书已不是贵族豪门独享的专利，贫寒爱书之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藏书。于是爱书勤学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不少人爱书胜于爱财富和爱荣誉。比如东晋的王昙首是王导曾孙，先世为琅琊大族，在继承祖先遗产时，王昙首就只要图书而放弃其他财产。晋代的应詹、北齐的辛术、北周唐瑾等人，攻城略地，对满目金银珠宝皆不动心，只大收图籍，而成为当时有名的藏书家[1]。中国历史上许多爱书勤学的故事，如晋朝车胤"囊萤"[2]、孙康"映雪"[3]苦读的事例，皆出于此时。随着藏书的增多，此时期的藏书家已不仅仅限于收藏本身，除了读书治学外，他们还有目的地开展对图书的编目、整理和校勘。如梁朝任昉就聚书至万余卷，还编制了收藏目录[4]。梁朝宗室萧静收集经史，"亲自雠校"[5]。有人充分利用图书编辑新著，有人将藏书开放让人阅读，充分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如梁朝宗室安成王萧秀广收经史纪传，利用自己的藏书请刘孝标等学者编成《类苑》120卷[6]。蜀人向朗、晋人范蔚、南齐崔慰祖都开放自己的藏书，供人借阅，"未尝为辞"。而珍爱图书，保护典籍也被看作社会公德的准则之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就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1】《晋书》卷70《应詹传》、《北齐书》卷38《辛术传》。

【2】《晋书》卷83《车胤传》。

【3】李善注：《文选》，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引《孙氏世录》。

【4】《梁书》卷14《任昉传》。

【5】《梁书》卷22《南平王伟传》。

【6】《梁书》卷22《安成康王秀传》。

三、带动社会经济活动的繁荣

出版业的发展和需求，带动了造纸、佣书、贩书等经济活动的繁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逐步

普及是不争的事实。现有最早的纸卷书籍，大都写成于3世纪。三国曹魏甘露元年（256年），用“六合纸”抄写的《譬喻经》是最早的纸写本[1]。《太平御览》卷605引《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惟有九万枚，悉与之。”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动用府库中的藏纸一次赠人就有九万多张，可见当时纸的产量是非常惊人的。除了当时有大批的造纸作坊外，我们知道，贾思勰《齐民要术》已经记载了当时大量使用的“染潢”技术。通过黄蘗的药液将普通纸张染色，以防止虫蛀，并使纸面光滑的工艺，造就了一批以此谋生的手工工匠。在发现的敦煌经卷中，就有一些经卷还提到了染潢匠的名字，可见这些匠师在书籍的生产出版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当然，与图书生产出版密切相关的行业还有佣书业。书籍的手抄复制虽然出现很早，但是在纸张被普遍应用后，由于纸的经济和便利，抄书的风气更为兴盛起来。于是社会出现了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专门代人抄写复制图书。“佣书”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生产部门的一种新兴职业，翻检文献，可以看到当时一大批以佣写书籍为生的人物，阚泽、刘芳、常景、崔光、崔子元、蒋少游、姚察、陶贞宝、朱异、庾震……这些人大多因家贫而“佣书”，一方面可以获得利润养家糊口，不少佣书人由于工于书法，抄书很受欢迎，所以收入颇丰。比如，北魏的刘芳为寺庙“佣写经论，笔工称善，卷值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为此数十年，赖以颇振”[2]。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也为社会复制了大批图书，传播了文化。除了佣书，当时将抄写好的图书制成卷轴的装裱业，也是一门与图书生产密切相关的行业。据文献记载，南朝刘宋孝武帝时，就曾命徐爰将所藏书卷重新装裱，每卷用纸十张，最长的卷轴有20尺[3]。

至于与图书流通密切相关的贩书业，在当时就更发达了。除了有固定的书肆贩书外，还有流动书商送书上门出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藏书家便是通过书肆、书商购书来丰富自己的私人藏书的。总之，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繁荣，推动了经济领域不

【1】现存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2】《魏书》卷55《刘芳传》。

【3】[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2。

少行业的产生、发展，对于社会的经济活动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较之秦汉时期，无论在交流的国家和地区、交流的渠道，还是在交流的内容上，都有较大的进展，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宗教、学术思想、艺术和文化等方面。此期的图书出版业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常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按文献记载，西晋时，中国的《论语》就通过百济人王仁带到处于应神时代的日本。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百济人段杨尔又将《诗》、《书》、《礼》、《易》、《春秋》等传入日本，这些儒家经典对日本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我国的许多典籍就已通过藩属高句丽进入朝鲜半岛，到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已经流行“五经”、“三史”等图书，并用此在太学中教育子弟；半岛上的百济国通过海路到建康向刘宋赠送礼物，请求《易林》等图书和日历，此后又遣使向梁朝求佛教典籍；南朝陈朝的陈文帝遣使到半岛上的新罗国传播佛教，带去佛经一千多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出版物不仅向东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还向西流传到中亚、西亚各国。20世纪初叶以来，我国西部边疆发现许多晋代带有文字的纸张残片，说明当时的出版物已由中国传到中亚各国，也反映出其传播于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态势。其中，1900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楼兰地区发现一部分残片写有年代，时间相当于公元252—310年。1914年斯坦因于同一地区发现残纸数百件，为公元263—280年出版产品。1902—1914年，普鲁士考察团以及1909—1910年日本的西本愿寺考察团也在吐鲁番及高昌地区发现了一些相同年代的纸质出版物[1]。20世纪60—7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又在上述地区发现了大批4世纪出版的古纸书籍及其他文物[2]。这些都说明此期图书出版事业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

【1】〔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4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

第二节　图书出版技术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出版的大量学术文化作品承继文化传统和精粹，传播了一个时代的创造和思想成果，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文化内涵和精神层面来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物质层面上来讲，此期的出版技术对后世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可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造纸技术的影响

魏晋以前，造纸的用料主要是麻。到魏晋时期，江南的浙江、江西一带扩充了造纸的原料，大量运用藤株纤维造纸。晋人范宁曰："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藤造纸盛产地区一直延续到唐代，藤纸的生产在唐朝依然盛行，产地由剡溪而广及江南许多地区，《元和郡县志》卷26记载浙江的杭州、衢州、剡溪、婺州和江西信州所生产的藤纸，都被列为贡品。藤纸的特点是光滑、细密和耐用，所以在唐代被用于一些较为重要的场合，如规定白藤纸用于赐予、征召、诏书；青藤纸用于太清宫道观的荐告词文[2]，等等。

除了开发以藤造纸的原料外，这一时期还开发出以海苔为造纸的材料，这种纸成为"苔纸"，因纹路侧斜，又称"侧理纸"。东晋时的王嘉说，"(张华）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即于殿前赐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此为名"[3]。这是两广一带利用海苔修长、坚韧和有黏性的纤维造成的纸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造纸术上的另一个巨大改进是对于捞纸工具的改进，即抄纸器的改善。造纸有一道工序，就是要用布或席把沤烂的纤维从水中滤出，成为薄薄的一张，这是造纸过程的重要一步。要使纤维成为纸，关键是要有一种既能留下纤维又能滤去水分的工具，这就是捞纸用的帘模。考古研究表明，汉代古纸

【1】《太平御览》卷60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唐］李肇：《翰林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东晋］王嘉：《拾遗记》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的残片上没有明显的帘网印纹。有关专家认为，汉代造纸采用的工具应是浮式布帘，即事先将布制帘模水平置放，把沤解的纤维浆液倾倒在帘上，让布帘把纤维质阻留在模上形成薄页，余水从布的细孔中滤下。由于湿的纸页在布上不易剥离，因此要连模一起晒干才能将纸取下[1]。这种浮式布帘的缺点是一纸就要一模，需要帘模太多，而纸的产量却不高。从晋代到六朝（265—581年）生产的纸张，都已可以看到有明显帘网印痕。按照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描述，此时的帘模是由细竹丝编成，每次抄纸时，将帘模浸入浆液中，捞起帘模后滴干余水后，由于竹模表面光洁平滑，只要将帘模反扣，结成薄页的湿纸就会自动落下。这种新工具的优点是同一帘模可以连续使用，抄捞大量纸张，因此大大提高了纸的生产速度。这的确是造纸技术的极大进步。晋代开始发明的抄纸竹制帘模一直成为后世手工造纸的最重要工具，也是现代造纸机械设计的依据和基本原理。

[1]〔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6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与造纸相关的，是在成纸之后，为了增进纸的美观，更重要的是为了防蠹蛀腐朽，对纸进行染潢，这样对于纸张的加工，也应属于造纸技术上的进步。染潢之事，魏晋时就已出现。西晋学者陆云在给其兄陆机的信中曾说："前集兄文二十二，适讫一十，当潢之。"[2] 表明西晋时期普通纸染潢已很通行。染潢的技术还一直影响着隋唐五代的纸张保护工艺，现存的敦煌经卷中，经过染潢处理的极多，七八世纪的手抄本中尤为多见。在残卷中，有20部缮写于671—677年的佛经，其中还专门注明了染潢匠解善集、王恭、许芝、辅文开等人的姓名；不少装潢纸张的手工匠人，还供职于唐政府的各部门[3]。这种染潢的工艺一直延续到宋代，因书籍的装帧形式由卷轴改变为折页后，才停止下来。

[2]［晋］陆云：《陆士龙集》卷8。

[3]〔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7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二、纸书卷轴装的影响

晋代傅咸在《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洁白方正、便于书写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合之则卷"。这既是对纸张性能的夸赞，也是对纸书卷轴装特色的描述。卷轴装的形式虽然出现于魏

晋以前的帛书卷子装，然真正完善和形成是在魏晋纸书的出现以后。魏晋时期，纸被大量利用之后，从抄写到制卷，逐渐改进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卷轴制作制度。纸书卷轴装的形式从敦煌发现的纸卷中可以得到实证，此外，在古代文献和目录的记载中也可了解。从实物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晋代的纸张已有一定规格，一纸高一尺许，长有一尺半。晋代一尺约合今25厘米，即纸宽25厘米，长约37厘米。卷轴的形成过程大致是，先将书籍内容抄写于纸上，一部用多张纸抄写完的书，要按顺序粘结成长卷；卷子的长短视内容的多少而定。短卷有两三张纸，长卷有几十张纸。为了舒卷长卷，要在左边最后一张纸上粘接一木轴；为保护书的内容不受污损，要在右边第一张纸前加一空白纸张，作为包头。长卷由左向右卷成一卷，为了翻阅方便，还可在轴的一端写上书签，标明书名和卷数。

纸书卷轴的制作需经粘接。据文献记载，粘接纸张时，“古法用楮树汁、白面、白芨末三物调和为糊，以粘接纸缝，永不脱解，过如胶漆之坚”[1]。白芨是一种植物药材，块茎含丰富胶质，可做糊剂。用白芨调制糨糊的方法也发明于魏晋，东晋时葛洪《抱朴子》中谈药物时就提到“作糊之白芨”[2]。古时还注意在糨糊中调入一些香料，也起到防腐防蛀的作用。

【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

【2】[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1《仙药》。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书卷轴装的装轴方法影响了隋唐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隋唐时的书籍基本上采用的是卷轴装，只不过是在装帧的外观上作了一些改进，使之更为美观。如《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序记载隋朝炀帝丰富的藏书，这些卷轴装的书籍按质量区分为上中下三品，采用不同颜色、原料的卷轴以示区别：上品为红色琉璃轴，中品为绀色琉璃轴，下品黑色漆轴。《唐六典》卷9《集贤殿书院》记载唐代国家卷轴装藏书分类：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卷轴装的装帧方法一直盛行到宋代才被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装帧形式所替代。而一直沿袭至今的传统书

画装帧，还是用的卷轴装方式。

三、捶拓技术与水色印章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的推广使用和制墨工艺的进步，复制文献的技术在传统的抄写方法之外，又出现了捶拓技术；水色印章的使用也更为广泛，这些都为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捶拓也称拓印，它是此期所发明的一种把石碑或器物表面的文字、图形复制到纸张上的方法。《隋书·经籍志》著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拓印的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以及“秦皇东巡会稽刻石”的拓本共12种；同时附记了7种在梁朝时出现、后来亡佚或未见的拓本，一共19种。并明确指出“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1]。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也在他的《观堂集林·魏石经考四》中说:“《隋志》著录之二种石经，确为拓本。”这些材料都是此期发明拓印技术的明证。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部·小学类著录《小学类小序》。

拓印技术的出现为后来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思路，创造了条件。因为此二者都是用纸从雕刻物上取得复本，不同之处在于，拓印的石刻文字是正写字，雕版版面的字是反写字；拓印是将纸铺到石刻上刷墨以得正写字，印刷是将墨先刷在版面上将反文印到纸上成正文。可见，拓印与印刷在技术上有相通之处。如果将拓印方法反转过来就是雕版印刷，这便是拓印技术对于发明雕版印刷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中国古代用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秦汉时期使用印章，主要是用于捺印在封泥之上以呈凹凸形文字。自纸通行以后，竹木不再作为书写材料，封泥也失去作用。于是直接盖在纸或缣帛上的水色印章出现了。根据考古发掘，魏晋以前也出现过将印章直接加盖在缣帛上的实例，但很少；只有在魏晋以后，水色印章在纸上盖印形成文字图形的现象逐渐增多。东晋葛洪说：“古之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二寸，其字一百二十。”[2]道教中人先是使用木刻印章在泥土上加印，后来用朱墨盖在纸上复制符咒。又有《通典·礼典》记载北齐自天子玉玺至各政府部

【2】［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7。

门官印的使用，其中提到的“督摄万机”之印，木制，长一尺二寸、宽二寸半，常加盖于户部所管户籍的接缝之处，以防被人改动[1]。水色印章印制文字图形的技法其实与雕版印刷的方法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文字的多少和篇幅的大小。因此它对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启迪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图书出版技术对后世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一时期是我国出版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代。

【1】[唐]杜佑:《通典》卷63《礼典二十三》。

附录一　魏晋南北朝出版大事记

三　国（220—265年）

220年　正月，曹操死，曹丕袭魏王爵。10月，曹丕废汉献帝，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魏”，都洛阳。

221年　正月，魏封孔子后代孔羡为宗圣侯，奉礼孔子。4月，刘备在成都称帝，改元章武，史称“蜀汉”。

222年　10月，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吴王。

223年　4月，刘备托孤。5月，刘禅继位，是为蜀后主。同年，支谦在孙吴开始翻译《明度无极经》等佛经，至孙亮建兴二年(253年)，共译佛经88部，118卷。

224年　4月，魏复立太学，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

226年　正月，孙吴开始屯田。5月，魏文帝曹丕死，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魏文帝爱好文学，曾命王象等人编辑成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孙吴朱应、康泰等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地，凡经历一百多国，归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

229年　4月，孙权即皇帝位，改元黄龙。9月，吴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

230年 2月，吴遣卫温、诸葛直领兵至夷洲（今台湾），这是大陆军民大规模到达台湾的第一次明确记载。

235年 著名机械制造家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马钧曾改进织绫机，创制翻车。

239年 正月，魏明帝死，曹芳继位。曹爽、司马懿辅政。

240年 何晏、王弼等开始提倡玄学。

241年 3月，曹魏开始刻立儒家经典石经，因本年为正始二年，故称正始石经。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及部分《左传》，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写刻，又称三体石经。

252年 4月，吴大帝孙权死，孙亮即位，改元建兴。是年，印度僧人康僧铠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经。

259年 5月，魏帝曹髦讨司马昭被杀，曹奂继位。是年，魏朱士行前往西域求佛经，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取得梵书正本《大品般若经》，后译为汉文《放光般若经》。

263年 11月，邓艾攻破成都，刘禅出降，蜀汉灭亡。是年，魏数学家刘徽写成《九章算术注》九卷，并著《海岛算经》，这是有关测量数学的最早著作。

西 晋（265—317年）

265年 8月，司马昭死，司马炎继晋王位，12月，司马炎迫魏帝退位，自称皇帝，改魏为晋，史称西晋。是年，大封宗室诸王。

271年 3月，裴秀卒，裴秀著有《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其所创“制图六体”理论，在世界地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73年 4月，吴左国史韦昭被杀，韦昭著有《吴书》、《国语注》、《汉书音义》等。

279年 10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墓，“汲冢书”出土，晋朝廷藏之于秘府。

280年 3月，晋军攻克建业，孙皓出降，孙吴灭亡。

281年 晋武帝令卫恒整理“汲冢书”，卫恒死后，由束皙完成

整理工作，并作考证。

286年　月氏僧人竺法护到中国，译佛经210部。

289年　11月，荀勖卒。荀勖曾据郑默《中经》，作《中经新簿》，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类，即经史子集四部，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90年　4月，晋武帝卒，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291年　6月，惠帝皇后贾南风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专擅朝政，“八王之乱”开始。“八王之乱”持续16年，至306年终结。

304年　刘渊反晋，建国号“汉”。

316年　刘曜进围长安，11月，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东晋（317—420年）、十六国（304—439年）

317年　3月，司马睿称晋王，都建康，改元建武，史称东晋。

318年　3月，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10月，刘曜称帝，前赵建立。

319年　11月，石勒称王，国号“赵”，史称后赵。

351年　正月，苻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都长安，史称前秦。

353年　3月，王羲之写出《兰亭序》。

357年　苻坚自称大秦天王，任用王猛治理前秦。

366年　沙门乐尊营建敦煌莫高窟，是为敦煌石窟之始。

386年　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4月，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称后魏、拓跋魏。拓跋珪即道武帝。

398年　桓玄之乱。

399年　法显赴印度、斯里兰卡取经，前后10余年，历30余国，归国后著《佛国记》，并翻译佛经6部24卷。

401年　鸠摩罗什至长安，先后译出佛经74部，384卷，系统介绍大乘空宗的学说。

404年　桓玄下令废简用纸。

南北朝（420—588年）

420年　6月，刘裕称帝，都建康，史称刘宋。东晋灭亡，南朝开始。

429年　裴松之注《三国志》成。

439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中国北部。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对峙局面，北朝开始。

446年　北魏太武帝灭佛。

453年　北魏文成帝在武州山（今山西大同）开凿云冈石窟。

460年　名僧昙曜监造云冈石窟，凿成大佛。

462年　10月，祖冲之制定新历法——《大明历》。

471年　北魏孝文帝元宏即位，在位28年，推行汉化改革。

479年　萧道成代宋称帝，建齐，史称南齐。

488年　沈约撰成《宋书》。

495年　北魏迁都洛阳，推行汉话、汉服、汉律历等改革。洛阳龙门石窟开始修建。

496年　北魏孝文帝推行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改革。

501年　刘勰撰成《文心雕龙》。

502年　萧衍代齐称帝，建梁，是为梁武帝。

507年　范缜完成《神灭论》。

534年　北魏高欢专权，孝武帝元修逃往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

535年　宇文泰杀孝武帝元修，另立元宝矩，都长安，史称西魏。

547年　东魏杨衒之撰成《洛阳伽蓝记》。

550年　西魏建立府兵制。高洋废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北齐。东魏灭亡。

557年　宇文觉废西魏恭帝元廓，建国号周，史称北周，西魏灭

亡。陈霸先代梁称帝，建国号陈，梁灭亡。

574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道二教。

577年 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

581年 杨坚代周建隋。

589年 隋灭陈，统一全国。中国重新出现统一局面。

2世纪 在桦树皮上写成佉卢字佛教经典《法句经》。近代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

2世纪至3世纪 今新疆和田地区开始使用于阗文。

2世纪至4世纪 今甘肃敦煌地区开始使用粟特文。

5–6世纪 长达27幕的焉耆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成书。近代新疆出土。

魏晋南北朝末或唐初 彝族著名大毕摩举奢哲著作有《彝族诗文论》。

附录二　参考书目

一、史料类

【1】[晋]张华:《博物志》,《增订汉魏丛书》本。

【2】[晋]王羲之:《笔势论略》,《古今图书集成》本,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

【3】[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晋]王嘉:《拾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5】[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6】[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8】[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9】[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1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2】[梁]萧统:《昭明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13】[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14】[梁]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5】[梁]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6】[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7】[梁]钟嵘:《诗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

【18】[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9】[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

【20】[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21】[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22】[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23】[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24】[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5】[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6】[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7】[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8】[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9】[唐]刘知几:《史通》,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0】[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1】[唐]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2】[唐]李林甫等:《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影印广池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33】[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34】[宋]王应麟:《玉海》,大华书店。
【35】[宋]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36】[宋]李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37】[宋]苏易简:《文房四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9】[宋]郑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40】[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41】[元]陶宗仪:《说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2】[明]屠乔孙:《十六国春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3】[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44】[清]朱铭盘:《南朝梁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45】[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6】[清]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7】[清]叶德辉:《书林清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48】《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9】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民国初影印本。
【50】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

【51】冯瑶林:《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考》,自印本,1947年版。

【52】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年。

二、文集类

【5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54】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55】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傅懋勣主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6】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57】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8】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三、著作类

【59】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60】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61】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62】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63】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64】王仲荦:《北周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5】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66】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67】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68】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69】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70】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73】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

【74】张涤华:《类书流别》,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75】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7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77】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78】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7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0】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81】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82】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83】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84】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85】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外交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8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87】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88】黄新亚:《中国魏晋南北朝艺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8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7、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90】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91】刘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9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93】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94】景爱:《尼雅之谜》,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
【95】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96】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97】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98】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99】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100】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1】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3】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4】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
【105】任继愈:《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6】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107】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8】杨寄林:《太平经今注今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9】王素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10】〔德〕西额和西额林:《吐火罗A残卷》(2卷),哥廷根,1921年。
【111】〔德〕托玛斯:《吐火罗文译释》、《吐火罗B残卷》,1949–1953年。
【112】〔德〕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113】〔匈〕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114】〔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115】〔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四、论文类

【116】梁启超:《佛家经典在中国的目录学之位置》,《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117】夏鼐:《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7–8)。
【118】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
【119】王俊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2),9页。
【120】张述祖:《范蔚宗年谱》,《史学史研究》,1981(2),21页。
【121】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6页,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84年。
【122】李铁:《焉耆—龟兹文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23】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序》,转引自李颖科《试论〈世说新语注〉》,《史学史研究》,1985(4),51页。
【124】李颖科:《试论〈世说新语注〉》,《史学史研究》,1985(4),52页。
【125】李颖科:《论干宝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7(3),53页。
【126】黄振华:《佉卢字》,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27】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文》,《语言与翻译》,1992(3)。
【128】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9)。
【129】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3),42页。

【130】孟昭晋:《曹丕与图书》,《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1版,4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1】严绍璗:《中国古代典籍东传日本考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语言文献卷》,1版,5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2】郝润华:《论梁武帝〈通史〉与南朝修史风气》,《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13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3】张子侠:《〈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2),77页。

【134】赫恩勒:《谁是破布纸的发明者?》,《亚洲文会学报》,1903(22),681页。

【135】〔日〕藤枝晃:《敦煌遗书之分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后　记

《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终于要出版了。本书从设计框架，搜集材料，撰写初稿，到延请多位专家审阅，作者多次修改，前后历时8年。

在8年的撰稿、修改过程中，本书的编撰工作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帮助。

首先，与我合作的各位作者为书稿的编撰和完善付出了大量心血。本书的编撰分工如下：周少川设计全书总体框架，撰写前言、第一章第四节、第十章、附录，并与郝艳华合写了第三章；李文才撰写第一章前三节、第二章；王炜民撰写第四章；董文武撰写第六章、第七章；王波撰写第五章、第八章；史金波、黄润华撰写第九章。全书由周少川统稿、修订。

本书的框架体例及内容，得到李致忠、肖东发及编委会各位专家学者的指导。

8年以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余敏、郝振省、魏玉山等各位领导对本书的编撰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出版界的老专家、老学者在审稿、评议过程中，表现了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至诚热爱，以及学术上的严谨执着，使我深深感动。

谨借此机会，向以上各位先生、女士致以衷心感谢！因本人学识和理论水平所限，书中必然存在疏漏纰缪，企盼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周少川

二〇〇八年九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2 魏晋南北韩卷
作者=周少川等著
页数=469
SS号=12243665
出版日期=2008.12